

声明：

该书被称为最危险的书，在过去半个世纪中被很多国家禁止出版。希特勒和他的极端思想已经被普世所否定。本社坚信，该书中弥漫的反犹太主义和种族主义等极端丑恶的思想不会对当代读者带来蛊惑和负面影响。但对于有兴趣了解二战史的人们，该书是不可或缺的必读史料。

这是本社最终决定出版此书的主要考虑要素。

南洋出版社董事兼总编辑 董玉振博士
时政、金学、战略及产业研究学者

阿道夫·希特勒【著】

我的奋斗

(上、下卷合订完整本)

王诚译



南洋出版社

©ALL RIGHT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书名：我的奋斗

作者：阿道夫·希特勒

翻译：王 诚

策 划：董玉振

编 校：周 妍

出版发行：新加坡南洋出版社 South Ocean Publishing House

地 址：37A Hong Kong Street, Unt 2191,

Singapore 059676, Singapore 新加坡

出版日期：2016 年 11 月

国际书号 ISBN：978-981-11-1147-1

译者的话

翻译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这本书实属偶然。

那是在 2009 年的一次朋友聚会上，一位友人谈及他这些日子里正在读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我知道他是不懂英文或德文的，猜想他看的肯定是中文版的，于是问他是否也可以借来看一下。没想到他随即从随身的皮包里拿出一沓电脑打印出来的纸。我一看，那里面有的是从网上下载的，有的是原书的复印件；有横版的，有竖版的。翻看了几页以后，顿觉汗颜。虽然当时我还没有通读过这本书，但我面前这些纸上所写的东西，无论是语言风格，还是文字内容都和我以前所读过的德文原版的内容，以及我在柏林街头的旧书摊上所看到的纳粹时期出版的希特勒《我的奋斗》中的内容完全不一样。不仅里面所涉及的历史事件、地理名称和人物姓名和原文有很大的出入，而且从内容上也是明显看得出来是残缺不全、七拼八凑的，有种粗制滥造、张冠李戴、错讹百出的感觉。特别是那半古半白的中文水平也着实不敢恭维。可在当时我却无法说明和指出这些有什么不妥之处。

随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便找来德文原版的希特勒《我的奋斗》，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认认真真地通读了一遍。说实在话，这第一遍，我真是硬着头皮读下来的；第二遍，我是翻字典，查资料读下来的；第三遍，我是和德国朋友、同事询问、答疑、讨论读下来的。第四遍，可以说是较为轻松地读完的。在我把这本书完完全全地通读了第五遍之后，就开始把脑子里自然形成的文字写了下来。在接下来近两年的时间

里最终完成了翻译工作。

其实，我翻译这本书的初衷就是想证明我当初所看到的那些纸上的文字时的感觉是正确的，那的确确实不应该是希特勒《我的奋斗》原文里所应该有的东西。所以，我为中文读者没有看到他们本应该看到的东西而感到惋惜。

而这样的结果完全是事出有因的。在我翻译这本书期间，曾查阅了各种版本的中文译本。虽然在中国大陆以及香港、台湾地区都出版过《我的奋斗》的几个中文版本。虽然出版机构不同，但这些版本的译文内容基本上都大同小异。因为这些中文译本所采用都是由一家美国出版社出版的“英文节选本”为底本翻译而来的。德文原本的内容经过两次转译难免失真，经过删节后的版本也难以让读者一窥其全貌。

另外还有一种中文版本是英文节选版加上其它的内容编译出版而取名为希特勒《我的奋斗》。这些译本虽然在文字内容上有修改、补充，可还是以原来的英文节选本为基础，并把其它书中的内容加进去而形成的。这些书中的内容我们可以从其他人所写的《阿道夫·希特勒传》，《希特勒的遗嘱》和《狂人的狂言》等等中找到。尽管出版社也说明这些是编译的作品，但是这种人为编纂过的作品会误导读者。所以，就算是读者读过这些书，那么一种是断章取义或添盐加醋的作品，这令人深感不安。我认为，中文读者应该看到与原著相符的译本。

希特勒所著《我的奋斗》这本书对人类近代历史影响极大。他既是德意志帝国的元首，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恶元凶；他使德国走向强盛，也把欧洲推向战争；他曾让德意志民族无比自豪，也让德国和其他民族陷入灾难；他梦想着要把德国建成千年帝国，结果却化成一片焦土。不可否认的是，希特勒撰写《我的奋斗》是他的政治生涯中极其重要和关键性的一笔。同时，这本书也成了研究希特勒和与其相关的重大政治和历史事件的重要史料。

该书曾被奉为纳粹党的圣经和政治纲领。那么，读懂和理解《我的奋斗》这本书是我们如何看待希特勒这样一个人，如何了解第二次世界

大战，甚至如何审视战后的世界政治格局的重要和关键步骤。

另外，还应该说明的是这本书的创作特点。如果我们把这本书当作是理论著作或者是学术论著来看待那可就错了。我们知道，希特勒是在监狱服刑期间由他口述完成这本书的上册，出狱后又创作了下册。既然是口述，那就是想到那儿，说到那儿；说到那儿，写到那儿。希特勒的文化水平并不高，写作能力也有限。书里难免有东拉西扯、信口开河，甚至胡说八道的地方。也避免不了啰哩叭嗦、唠唠叨叨的叙述方式。虽然经过了整理，我们从其目录中就可以看出这本书在各个章节上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和逻辑。而且就算是有目录，文章内容也是文不对题的。这本书并不是什么理论著作，也不是学术文章，倒很像是自叙加时事评论，加名词概念解释，加观点阐述，加名词堆砌，加情感宣泄的大汇总。

人们长期以来都以邪恶、毒药、臭名昭著来形容的这本书，在很多国家甚至被列为禁书。当今的读者在政治上已经足够成熟，现在是揭开其神秘面纱的时候了。

本译稿所采用的底本是由德国 FranzEher 出版社 1940 年出版的两卷合订本。当时正值第三帝国鼎盛时期，该版本也成为该书最完善的版本。原著中的索引部分累赘而且对多数读者没有价值，本译稿中删去，特此说明。

由于本人的水平有限，书中不妥之处难免，希望广大读者给予指正，特此感谢。

本书的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新加坡南洋出版社总编辑董玉振博士的大力支持和协作，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王 诚

2016 年 9 月 25 日于天津



1924年12月20日希特勒从兰兹贝格监狱获释,正是在这座监狱里他完成了该书的上卷,出狱后又完成下卷。

(说明:从下页开始的所有文字内容皆来自德文原著的翻译,没有任何删减或添加。唯图片为本次出版时编辑所加,图片皆为希特勒的画作。有些画作设计为页面背景图片,不仅可节省篇幅,使页面更有质感,也有防止盗版之效。画作的位置与内容没有必然联系)

谁要是能从这本书的立场观点出发去审视近百年来的历史发展进程，那么他就会立刻明白犹太人的新闻里所极力鼓吹的那些东西了。

因为只有当这本书成为广大民众共同的精神财富，犹太人的危害才会不攻自破。



序 言

1924年4月1日，按照慕尼黑人民法院的判决，从即日起，我开始在兰兹贝格监狱服刑。这也是第一次在多年不间断地工作后，能够让我有机会安静下来着手进行写作。一方面曾有很多人要求我这样做，同时另一方面我自己也希望有一本专为群众运动而写的著作。因此我决定着手写作此书。这本书分为两部，这不只是单单要阐明我们运动的目标，同时也要描绘出这一运动发展的前景。和其它空泛教条般的论著相比，我们可以从这本书中学到更多的东西。通过这本书的第一卷和第二卷能够让人们了解我的成长过程，同时消除由犹太人报章上所编造和散布的那些关于我个人的恶毒谎言。这部著作并不是给局外人的，而是为那些全心拥护这一运动和通过心灵感悟后能够理解并努力追随这一运动的人们所写的。我知道，要获得人们的拥护，用口头说服远比文字叙述要有效得多，世界上每一项伟大运动的发展，大都归功于出色的演说家，而不是有名的作家。尽管如此，作为一种学说，其理论应得到完整和一致地阐述，因此，这两卷书的内容就是对这一理论的具体阐述。

作者 于兰兹贝格狱中



1923年11月9日下午12点30分，在慕尼黑陆军司令部的门前和当时国防部的院内，以下真正相信其民族再次振兴的勇士们阵亡了：

阿法特·费里克斯	商人	生于1901年7月5日
包利德·安德烈	制帽匠	生于1879年5月4日
卡塞拉·特欧德	银行职员	生于1900年8月8日
埃利希·威廉	银行职员	生于1894年8月19日
弗斯特·马丁	银行职员	生于1901年1月21日
海肯贝格·安东	钳工	生于1902年9月28日
科纳·奥斯卡	商人	生于1875年1月4日
科恩·卡尔	酒店服务员	生于1897年7月26日
拉夫斯·卡尔	工程系大学生	生于1904年10月28日
纽恩鲍尔·库特	勤杂工	生于1899年3月27日
帕博·克劳斯	商人	生于1904年8月16日
普弗登·特奥德	州法院委员	生于1873年5月14日
瑞克迈尔·约翰	骑兵上尉	生于1881年5月7日
施而布纳·冯·马克斯	工程学博士	生于1884年1月9日
沃尔夫·威廉	商人	生于1898年10月19日

但所谓的政府部门却拒绝将这些死去的勇士一起安葬。

为了共同的怀念，我将这部书的第一卷作为殉葬品奉献给他们，而他们将永远照耀着我们这场政治运动的追随者前进。

于兰兹贝格狱中

1924年10月16日

阿道夫·希特勒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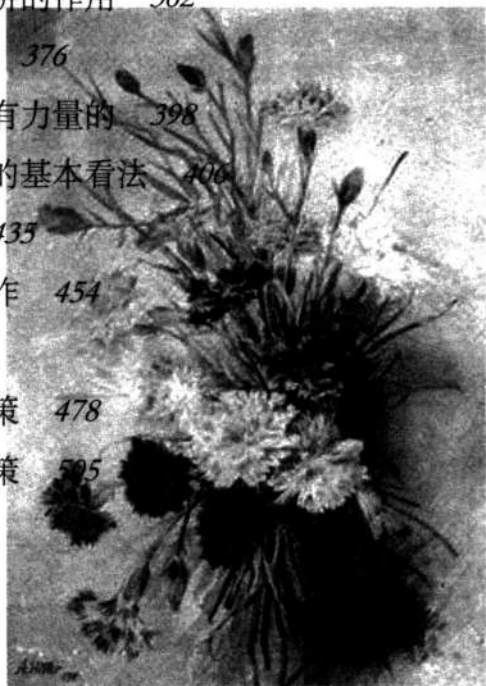
上卷 一个总结 1

- 第一章 故乡 3
- 第二章 在维也纳求学和苦难的日子 15
- 第三章 在维也纳的日常政治观察 52
- 第四章 慕尼黑 99
- 第五章 世界大战 122
- 第六章 战争宣传 136
- 第七章 革命 145
- 第八章 政治活动的开始 160
- 第九章 德国工人党 167
- 第十章 帝国崩溃的原因 174
- 第十一章 民族和种族 218
- 第十二章 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最初发展 255



下卷 国家社会主义运动 287

- 第一章 世界观及政党 289
- 第二章 国家 300
- 第三章 国民和公民 341
- 第四章 个人品质与民族国家观念 344
- 第五章 世界观与组织 352
- 第六章 初期的战斗——演讲的作用 362
- 第七章 与红色阵线的较量 376
- 第八章 强大的国家就是最有力量的 398
- 第九章 对组建冲锋队意义的基本看法 406
- 第十章 伪装的联邦制度 435
- 第十一章 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 454
- 第十二章 工会组织 468
- 第十三章 战后的德国联盟政策 478
- 第十四章 向东推进和东方政策 525
- 第十五章 紧急自卫权 527
- 结束语 543



《我的奋斗》节选

由于饥饿和长期的营养不良，一些地方如德国中部、萨克森州和鲁尔地区的人民羸弱不堪，而布尔什维克的浪潮再也找不到比那里更容易进行侵袭的地方了，这并不是偶然的。在这些地方所谓的知识分子几乎对犹太瘟疫不再进行有力的抗击，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知识分子自己的身体完全垮掉了，与其说是由于饥荒倒不如说是因为教育。在不靠思想而靠拳头说话的年代里，我们国家的上层人士对教育工作的特殊态度让这些知识分子无能为力，他们也只好独善其身，更不用说是有所作为了。身体虚弱很少能成为个人胆怯的主要原因。

选自第 10 章

布尔什维克主义（颓废）的艺术完全就是一种唯一可以表达布尔什维克式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思想的艺术形式。谁要是感到奇怪，那只需要看看那些有幸成为布尔什维克国家的艺术，你会惊奇地发现那些自上个世纪末我们认为精神错乱和思想颓废的人所创造的，并归结为立体派和达达派的畸形病态的东西在他们那里竟公然成为了大家所赞赏的艺术。

选自第 10 章

谁要是能从这本书的立场观点出发去审视近百年来历史发展进程，那么他就会立刻明白犹太人的新闻里所极力鼓吹的那些东西了。因为只有当这本书成为人民群众共同的精神财富，犹太人的危害才会不攻自破。

选自第 11 章

目前已渐渐失去日耳曼上流社会特征的俄国完全不考虑其新主人的内政计划，因而也不会是为自由而战的德意志民族的盟友。单是从军事方面考虑，如果是德俄联盟对西欧国家作战，或许也就是和整个世界开战，那么这种形势简直就是灾难性的。这场战斗将不会在俄国，而是在德国的土地上进行，况且德国从俄国那里也只能获得少之又少的一点必要的支持。目前德国的统治手段也非常软弱，根本不可能对外发动战争，甚至针对西欧国家包括英国的边境防御都无法进行，并且恰恰是德国的工业才使得针对敌人的进攻武器处于毫无自卫能力的状态。另外在德国和俄国之间还有一个法国时常插手的波兰。

选自第 14 章

俄国从前所遇到的危险现在则不断地出现在德国。只有资本主义的傻瓜才能够假装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着迷。也就是说他们是按照表面上的认识根本就不知道这是关系到一个犹太人想要谋求统治世界的大事，当然同样也关系到盎格鲁撒克逊人自己也要统治世界的愿望。

选自第 14 章

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理论中我们看到了犹太人在二十世纪所要表明的就是要成为世界主宰的企图，正如他们在其它的历史时期也通过相互有内在联系的事件试图谋求同样的目标一样。

选自第 14 章

而一旦利己主义主宰了人民的思想，社会秩序就会变得毫无拘束，人人都只是唯利是图，这时的人类可真要从天堂堕入到地狱里去了。

选自第 11 章

犹太人在过去和现在都是那些把黑鬼带到莱茵河地区的人，他们一贯以同样的阴谋和明确的目标，通过必然发生的杂交去毁掉他们所痛恨的白种人，这样就使得白种人从政治和文明的高度上跌落下来，犹太人自己则跃然成为了他们的主人。

选自第 11 章

一旦要仔细剖析这样的毒瘤，人们就会像发现腐烂尸体里的蛆虫一样，突然在耀眼的灯光下找到了一个犹太小东西。

选自第 2 章

但让人无法理解的是，伴随这个民族无比的仇恨，他们却反而因此损毁自己的伟大、玷污自己的历史、恶意中伤自己著名的代表人物。对自己的习俗、自己的家乡、自己的故土甚至那些无足轻重的东西进行攻击，这是很不正常的。

选自第 2 章

要是犹太人靠马克思主义信条战胜了世界人民，那么这顶胜利的桂冠将是全人类的坟墓，而后地球就会像数百万年前一样再次变得荒无人烟在太空中翱翔。

选自第 2 章

所以，现在我确信要遵循万能上帝的意愿抵抗犹太人，为上帝的事业而奋斗。

选自第2章

所以，今天的犹太人才是想要彻底毁灭德国的最大的煽动者。我们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所看到的那些攻击德国的报道都是犹太人制造的，正如在和平时期还有战争期间犹太人的证券新闻以及马克思主义分子报道一直都是在有计划地编造对德国的仇恨，直到政府为了国家利益而放弃了中立，甚至还放弃了人民的真正利益在世界大战期间为同盟国去卖命。

选自第13章

要么被迫面对共同的危难，要么被同一块鱼饵所吸引，只有在这两种情况下犹太人才能团结，所以，除了以上两种情况，他们性格的主要特征就是极其自私自利的，因此转眼间他们这些人就会变成一群拼死相争的老鼠。

选自第11章

犹太人在其它国家和人民中间寄生虫般生存的一个特征就像是叔本华以前已经道出的缘由那样：犹太人是撒谎的行家。

选自第11章

他们（犹太人）的精神对于这个世界和真正的基督教信仰来说在心灵上是难以接受的，他们的生活环境以及他们的本性依旧和两千年前宗教创始人时期一样。当然宗教创始人不会向犹太人隐瞒他的观点，必要的时候甚至还拿着鞭子将在那个时候就把宗教只看作是一种经商手段的这些人赶出了圣殿。耶稣就是因此而被钉在了十字架上的。

选自第11章

因为就在犹太复国主义试图欺骗别人说什么犹太人的民族自决就是要在巴勒斯坦建立国家才得到满足的时候,犹太人也在十分狡猾地欺骗着其他非犹太民族。他们完全不想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以色列)来进行定居,而只是期待建立一个具有自我主权的、摆脱其它国家干涉的国际诈骗中心和一所培养骗子的高等学府。

选自第 11 章

但同时如果不认真考虑基本原则的话,那么所有出色的宣传工作也不会取得成就。宣传工作不应受到限制,并且要反复进行。就像许多其它的工作一样,坚持不懈才是宣传工作取得成功的首要 and 重要的前提条件。

选自第 6 章

宣传工作不是让那些自负的家伙不断地得到有趣的东西去进行消遣,而是要说服他们,特别是要能够说服广大民众。这就需要在他们懒洋洋的时候的一个特定的时间段里,在他们想要了解一件事情之前,向他们的脑子里无数次地、重复着去灌输一个最简单的概念。

选自第 6 章

任何一个广告,无论是用于商业,还是用于政治,都是通过其长期不断的一贯性和统一性才获得成功的。

选自第 6 章

只要每天早晨还有成千上万的市民虔诚地祈求犹太民主主义分子的新闻报道,或者是取笑“同志们”的愚蠢行为,对统治者来说都是极为不利的,因为即便是报道的篇幅有所不同,但彼此也会纠缠不清,最

后都会陷入同样糟糕的境地。而这两种情况的制造者就是犹太人自己。

选自第5章

否认这个事实，不仅证明说谎者的无耻，同样也证明他的愚蠢。

选自第5章

人类生活中最丑恶和残留下来的东西就是对奴隶进行迫害。

选自第6章

到最后连自己的人民都不相信自己国家的宣传，反倒更加相信日益完整和统一的敌人的宣传时，这又该做何解释呢？还有哪个民族像德意志民族能够如此地忍受着那些客观上的古怪想法吗！因为对于德国人来说，每个人都只是在尽力不去冤枉敌人，自己反倒处于最危险的境地，这是在消灭自己的民族和国家。

选自第6章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只是积极或者消极，爱或者恨，真理或者谎言，但从来就不会是半遮半掩，模棱两可的。

选自第6章

对犹太人利用的马克思主义的武器所感到的恐惧就会像恶魔一样渐渐地笼罩在那些老实人的头脑和心灵之中。人们开始在这个可怕的敌人面前发抖并且最终成为它的牺牲品。

选自第11章

上卷

一个总结



第一章 故乡

对我来说，这是幸运的一天，命运让我降临在布劳瑙镇。她坐落在两个德语国家之间。而统一这两个德语国家是我们年轻的一代需要尽一切努力，并要为之奋斗终生的一项使命！

德语国家奥地利早应该再次归属到大德意志帝国的版图上了，这并不是出于什么任何经济方面的原因。不是，绝对不是，如果统一要考虑什么经济原因，即使会带来什么损失，那也要进行统一。既然我们都流着相同的血，那就应该共同生活在一个帝国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德国人已经失去了殖民地统治权，难道我们的孩子就不应该共同生活在一个国家里吗？当帝国的边界还能容得下最后一个德国人，而我们却无法保障其食物时才从人民的痛苦中产生出要获取其他国家土地的正当要求，那可就为时已晚了。这时，铁犁就会变成利剑，透过战争的眼泪为我们的后代争取面包。所以，这座边境小镇是上天赋予我伟大使命的象征。即使在今天，出于其它原因，她对于我也有着特殊的含义。一百多年前，这座偏僻小镇演绎了德意志民族多次遭受侵略悲壮和不幸的一幕，从而在人类历史上，尤其是在德意志历史上将永远得到铭记。在德国深受欺凌的时候，一位来自纽伦堡的书商约翰尼斯·帕尔姆怀着对苦难中的祖国的满腔热血死在了这里，他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也是法国的敌人。他严词拒绝承认他的过失，或者说成是罪行，就像雷奥施拉格特一样，他也是被政府官员向法国告密后被杀的，这个告密的人来自奥格斯堡，并因此而得到个可悲的好名声，还作为新德意志帝国官员们学习的榜样。

这座属于奥地利的小镇笼罩着德意志先烈的金色光环，流淌着巴伐

利亚的鲜血，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的父母就居住在这里。我父亲是个忠于职守的国家公务员，母亲全心操持家务，尤其是充满爱心地照顾我们这些孩子。这段时光在我的记忆中并没有留下多少痕迹。不久后，父亲不得不离开这个令他渐渐喜欢的边陲小镇，去德国境内的帕骚市任职。

那时，一个奥地利海关官员的命运总是四处迁移。不久，父亲就被调到林茨市，并在那里一直工作到退休。“宁静”对于这位老先生来说是毫无意义的。作为一个贫苦雇工的儿子，他早已无法忍受继续呆在家里。还不满十三岁，他就打起行囊，离开了森林茂密的家乡。尽管村里一些好像是见多识广的人也劝过他，但他还是去了维也纳，他想在那里学一门手艺。这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事情了。他身上仅带着三个金币当作饭钱流浪在街头，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就这样一个十三岁的小孩长到了十七岁。他去参加学徒考试，希望得到满意的结果，但却事与愿违。经历了长时间的穷困、痛苦和抱怨，他最终放弃了做手艺人的主意，而想成为一个“更高一级的人”。对于来自一个穷乡僻壤的孩子来说，牧师曾是所有人中完美、高尚的化身。可那是从前，而现在他的视野开阔了，他眼中的体面职位是在城里当一名公务员。就这样，一个乳臭未干，却有些少年老成的半大小伙子，凭借他在苦难中磨练出的坚韧，在他十七岁的时候找到了他新的目标。我想，差不多 23 年后，他达到了他的目的。就像他所夸耀的誓言中所说的那样，在他未成才之前，绝不回到他那可爱的故乡。

现在，他做到了。可是，故乡的人却不会记得从前这个小毛孩子了，而他自己也对那小村庄感到十分地陌生了。

在他 56 岁的时候，他退休了。但他却无法忍受那无所事事的日子。他在上奥地利州的拉姆巴赫附近买了块地。从此，就像他祖祖辈辈的人们一样，他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过着春耕秋收的日子。

在这期间，我也在勾勒我的梦想，也许这正是我最初的梦想。那外面蹦蹦跳跳的孩子们、记忆中上学时那宽阔的路、尤其是那时常流露出忧虑的母亲和矫健的孩子们交谈的情景，这一切都特别吸引着我，而不

是那些整天闷坐在家里的人。那时我对我今后的职业从没有认真考虑过，所以从一开始就绝对不会和我父亲的人生轨迹相重合。我想，从那时起我的演讲天赋或多或少在和同学们激烈的争论中得到了锻炼。我成了一个学生里的小头头。当时在学校里学得很轻松，成绩也很好，而其他人学得要相当吃力。课余时间我还参加拉姆巴赫的合唱班，所以常常有机会在宗教节日的时候，在金碧辉煌的教堂里陶醉在那华丽壮观的庆典场景中。就像当初父亲仰慕乡间牧师一样，我现在是和至高无上的修道院的院长在一起，难道这场景不令人非常羡慕吗？至少这也应该是相同的场景吧。可父亲大人却并不十分赞赏这个爱顶嘴的男孩所具有的演讲天赋，为了儿子的今后，他打算找出一个好办法，但他却对这个小毛孩子的想法无法理解，他冷眼旁观这个天生的小怪物。

可后来发生的事情的确让我暂时失去了去找工作的愿望，而且这希望还占据了我的心灵。我翻阅了父亲的藏书，在各种书中，尤其被军事题材的内容所吸引，其中就有关对 1870 至 1871 年期间普法战争的描述。那是当时出版的两本带插图的杂志，至今仍是我喜欢的文章。没过多久，那残酷的战斗场面使我难以忘怀。从那时起，我就越来越沉迷于一切涉及到战争和士兵的东西。

但另一方面，有一件事也对我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对我来说，那也是第一次有一个模模糊糊的疑问：参战的德国人和别人是不是不一样？有哪些区别？为什么奥地利没有参战？为什么父亲没有去打仗？其他人怎么也没有去呢？

难道我们和其他德国人不一样吗？

我们不属于同一个国家吗？我的小脑袋瓜开始反复思索这样的问题。伴随着内心的焦躁不安，对于这样一个的问题，我终于找到了一个答案，那就是在俾斯麦的帝国里，并不是每个德国人都那么走运。

我真无法理解。我应该对此进行研究。

按照我的性格，尤其是就我的脾气来说，父亲觉得我的才能不适合

上人文学科的高级中学，而适合上普通中学。他认为这样可以学到一种可以看得见的本领，而恰恰就是这一点才被奥地利的高级中学所忽略了，至少他是这样认为的。也许是因为他的坎坷的人生经历导致他有这样的想法。在他眼里人文学科不实际，没有什么用，不值得去学。或许是因为他也希望他的儿子和他一样成为一名公务员，是的，想必如此。他日后所取得的成就来自那苦难的童年所磨练出的钢铁般的顽强和坚韧的毅力。这是他自己所取得的值得骄傲的荣耀。当然他也希望他的儿子也会像他一样，或许还有可能达到更高一级的人生高度。他还想通过他的付出来减轻一点他儿子在成长过程中的艰辛。

从父亲这一辈子的人生经历来看，遭到拒绝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他的决定简单、果断、明了，这在他眼里看来是理所当然。出于他那艰难拼搏的一生所养成的粗暴专横、简直无法让人忍受的性格，做出这样的决定最终也就是强加给他眼里还是个涉世未深、自己还无法承担起责任的孩子。而这只不过就是为了显示出父亲的威严，所以无法对孩子今后的生活负责，也不会顾及孩子想法，更谈不上有什么帮助了。

所以，结果也就不一样了。

我平生第一次表达了反对意见，那时我还不到11岁。父亲固执己见，决心要执行自己的计划；而他的儿子也执意反对，拒绝他父亲的想法。

我不想当公务员。

我不想答应他的要求，也不想去“认真”地考虑他的想法。这样的顶撞已无法改变了。我不想当公务员，就是不想当，我再说一遍。我不会重蹈我父亲的覆辙，也不想追寻他的生活轨迹，更不愿意从事和他一样的工作，所有要说服我的尝试只会适得其反。当一名公务员，整天只能呆坐在办公室里，一点自由也没有，无法支配自己的时间，而最后自己这一辈子都浪费在填写表格上，想起来真是无聊和乏味。

那什么样的想法能够吸引我呢？和我父亲想的完全不一样，只是在常人看来有点不“乖”罢了！学校里的学习简直轻松得可笑，空闲的时

候，我看太阳的时候比看教室的时候长。如果我的政敌要想仔细研究我的生平的话，那就应该追溯到我的童年时光，他们会发现这位“希特勒”在他的孩童时期就已经开始干那些啼笑皆非、哭笑不得的事情的一些蛛丝马迹了。我要感谢天空，它让我有了那幸福欢乐的记忆，直到现在它仍可以给予我一些东西。那时的草场、森林是我们驱逐“敌人”的格斗场。

那么接下来，不去上普通中学恐怕是不行了。当然我还要对抗到底。

只要父亲还有让我当公务员的想法，那我反对当公务员的原则就不会动摇，这个分歧轻易不会改变。在此期间，还应该隐藏我内心的想法，不要总是锋芒毕露。这样反而强化了我拒绝当公务员的决定，让我的内心也感到一点安慰，更加坚定了我的决心。可问题是，什么时候反击父亲的计划呢？在我12岁的时候，我反击了。怎么开始的，现在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天，我想成为一个画家，一个艺术家。我画画的才能显现出来。但我需要给父亲交一个底，他可以送我去普通高中上学，但他别想在那里培养我的职业前程。针对父亲最喜欢的想法，我第一次直接告诉他我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并告诉他，这是我最后的决定。父亲顿时暴跳如雷，继而哑口无言。

“一个画画的？艺术家？”

他竟然怀疑他是不是听错了，或是没有听懂我说的话。然后他听懂了我的解释，感觉到我是认真的，马上毅然决然地否定了我的想法。他并没有考虑我所具有才能，就断然做出了决定。

“当一个画家，不行！只要我活着，就绝对不行”。而他的儿子显然继承了他父亲的个性，其中一个那就是固执，也说出了差不多的话，当然是反对他的话。双方僵持着，父亲坚持着“绝对不行”，而我则强调着“无论如何”。

当然，这样不会有令人满意的结果。我那老父亲很伤心，当然我是爱他的，是的。他不准我有当画家的想法。我只得退一步，告诉他我不

再想学画画了。这样我就显得很被动，而现在父亲大人则毫无顾忌地板起面孔，以父亲的威严开始他的行动。我只得以沉默来静待其变了。我想，如果父亲看到我在普通中学几乎是停滞不前的，那么兴许他还会赞同我所期待的想法。

我不知道这样的打算对不对。但至少在学校里表现不好是显而易见的。可让我高兴的是学校里竟然还有我特别喜欢的东西，尤其是那些我认为可以对我今后成为画家有用的课程。而那些乏味的、没用的、毫无意义的东西我就根本不学。所以按照当时学校对学科和成绩的评分标准，除了“优、良、及格或不及格”，给我的评语不是最好就是最差。在所有学科中，地理和世界历史成绩最好，在班里名列前茅，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两门课。

当我多年后重新审视当年所发生的事情时，我认为，有两件事对我意义重大：

第一件事就是我成为了一个民族主义者；

第二件事就是我是按照历史的深刻含义去理解和学习历史的。

奥地利原本就是一个民族国家。

其实它本来就属于德意志帝国，当时我还不十分有把握，但至少我就是那样认为的。这对在那里的人们和他们的日常生活会产生什么意义呢？普法战争后随着英雄们的胜利凯旋，德意志帝国反而逐渐失去了殖民地，至少有很大一部分不再拥有或无法控制了。我们轻易地把德语国家奥地利与那个没落的帝国和在那里天生就羸弱的人民混为一谈了。

那些在奥地利有着高贵德意志血统的人们，难道他们就没有能力去占领这个国家，给那个有五千两百万人的国家留下德意志的烙印；奥地利是属于德意志的，难道只有在德国才会有这样疯狂的想法？这简直无法让人理解！由此给这个神圣帝国东部地区的千百万德意志人民导致一个不幸的后果，那就是他们当中只有极少数的人才知道为了德意志的语言、德意志的学校以及德意志的思想所曾经发生的那些坚持不懈的战

斗。时至今日，要让我们帝国的人民自己知道这苦难的过去，要想到在外族的统治下有一个共同的祖国，渴望建立一个共同的国家，至少要尝试讲母语，这也是我们神圣的权利，要让大多数人明白，我们是在为我们的民族而战。现在，也许我们应该重新评价在神圣帝国的东部疆域中所存在的德意志精神中那些有价值的东西。德意志精神是德意志所特有的，近百年来它在帝国的东移过程中得到了保护，德意志语言在短期残酷战争的过程中也受到了限制。当时，德意志帝国只看到了海外的殖民地，而忽略了眼前的亲骨肉。

无论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发生什么样的战争，即使是在过去的奥地利对于应该使用哪种语言的争论中，都会出现三种人：勇士、懦夫和叛徒。

其实早在学校里就已经开始出现争论的迹象了。语言的渗透力是很明显的，它不断地向四周扩散着。当然也向学校扩散，这个其它东西很难波及到的地方，影响着下一代。为了引导孩子们，最初的号召是：“男孩子们，不要忘记，你们是德国人！”；还有：“姑娘们，要记住，你们要成为德国人的母亲！”

谁能了解年轻人的心灵，他就能懂得，面对战斗的呼唤，他们敞开心扉，激情迸发。他们以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武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战斗。他们拒绝演唱不是德国的歌曲；尽管有人挑拨离间，他们依然非常崇拜德国英雄；他们把从嘴里省下的饭钱捐给英雄的战争；他们不听从不顺从那些不讲德语的老师；他们冒着挨打和受罚的危险佩戴被禁止的、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标志。从他们幼小的身上真正折射出的是伟大的，甚至常常是无比美好和忠诚的精神。

在我少年时期，就有机会参加反抗奥地利的斗争。为了帝国的南部地区和学生联合会我召集成员，用矢车菊花作标记，用黑、红、黄三色表示信念；用“万岁”当作问候语；明知道会受到警告和处罚也不唱歌颂皇帝的歌，而是唱“德意志高于一切”。尽管对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

民族特性还知之甚少，而只是懂得其语言，但在这段时间里，这个青年在政治上得到了锻炼。知道自己不是一个懦夫，而是一个狂热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尽管这和我们现在党章里的概念还完全不是一回事。

这让我进步得很快，在我 15 岁的时候，我就能明白忠君式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区别，而当时我只对民族主义了解得更多一些。

对于从来没有花过力气去研究哈布斯堡王朝内情的人来说，不可能把这个过程讲解清楚。在学校的历史课也只会讲个起因，有关奥地利的历史只能占很小的章节部分。但这个国家的命运和整个德意志国家的生活和变迁却紧密相连，以至于只讲德国历史而不讲奥地利历史，或只讲奥地利历史而不讲德国历史，都是无法想象的。是的，最后德意志帝国被两种势力所分裂，而这个分裂也造就了德国历史。

维也纳昔日皇朝帝国的遗迹依然耀眼辉煌，散射出那迷幻般的光芒，而这也正是帝国千秋万代的象征。

当哈布斯堡王朝垮台的时候，在奥地利的德意志人发出了最初的要求统一德意志国家的呼声，那是一种难以忘怀的重归故土的渴望、是一种由朦朦胧胧的感觉不断形成的、并发自内心深处的呼声。如果德意志和奥地利的历史渊源没能得到良好教导的话，普通民众就无法形成这种愿望，否则这种现象是无法得到解释了。它就像一口永远不会干枯的井；一个让人们不要忘记时间的敲钟人，他无声地指引着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方向，默默地告诉人们从过去走向新的未来。

所谓中学的世界历史课在今天看来是十分让人厌恶的。只有为数不多的老师才明白，历史课不是，永远都不只是对历史年代和历史事件的生记硬背和囫圇吞枣。他们并不知道，学生是否真地知道，哪一次战役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发生；一名统帅是什么时候出生的；或是某一位君主（一般都是些没有用的）是否像他祖辈那样得到加冕。不是，天哪！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学习”历史是为了寻找力量，去发现我们所接触的历史事件的真正原因。

生活的艺术和学习的艺术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记住重要的内容，忘掉不重要的东西。

所以，对于我今后的人生来说，我有幸遇到了一位好的历史老师，特别还是一位是在教课和考试方面能够真正懂得历史含义的老师。当时林茨中学的历史老师是莱奥波德·伯驰博士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完美代表。他是一位慈祥且果敢的老先生，他那极富感召力的口才不仅吸引住了我们，简直是让我们着了迷。直到现在，当我想起这位老先生时，仍然有些心潮澎湃，他那富有激情的讲述，有时让我们竟然忘记了现实世界，他把我们带回到那遥远的过去，透过那千年历史的薄纱让那枯燥无味的过去得以复活。我们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感受着他那火一般的激情，甚至有时还让我们热泪盈眶。

真是走运，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位老师，他知道让我们从现实看到过去，又从过去来昭示现在。比起其他任何一位老师来讲，他更多地是教会我们怎样去理解那些与现实生活中息息相关的问题。通过他培育出我们那幼稚的民族狂热感，他不只一次地召唤着我们民族的自豪感，这很快让我们找到了归属，这是最好的方法。

这位老师让我把历史当成了我最喜欢的学科。

当然，最后我成为了一个年轻的革命者，或许这也正是他所希望的。

跟着这样一位老师学习德国历史，有谁还能变成那种依靠手中的权力，采取卑劣的手段，使国家遭受悲惨命运的国家的敌人呢？

最终还有谁能够对在过去和现在都为了自己可耻的利益而总是一再地背叛德意志人民利益的帝国皇帝保持忠诚呢？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难道就不知道，这个奥地利国家对于德意志人民毫无慈悲之情？不，丝毫也没有。

知道了有关哈布斯堡王朝的历史背景，有助于让我们每天都可以获取新的知识。这个王朝就像一个人身上的毒素，从南到北不断地吞噬着

我们的意志，而维也纳本身也越来越变得不像一个德意志的城市了。这个“王朝”，也只有在这里才可能变得捷克化了，感谢至高无上的上帝那永恒的正义和复仇的威力，让奥地利德意志人民的死敌，那个被枪杀的弗朗茨·费迪南大公终于自食其果。难道他不就是那个自上而下奴役奥地利，使奥地利斯拉夫化的罪魁祸首吗？

这给德意志人民带来的负担是巨大的，那些横征暴敛的苛捐杂税和所剥削的血汗简直是闻所未闻，只要不是瞎子就能看得到，而到后来，这一切又将是徒劳的。最让我们痛心的是，这一切在道义上用与德国进行结盟来加以掩盖，这样就可以慢慢地消灭旧王朝的德意志人民，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让德国自己承认这样的消亡。要知道，哈布斯堡王朝的虚伪就在于总给人们造成一个假象，好像奥地利总还是一个仇恨和蔑视哈布斯堡王朝的德意志国家。

只是在当时，王朝里的那些“高官们”根本什么都看不到。怎么能指望让一个瞎子在死尸旁边绕来绕去从那腐烂的尸体里去发现什么“新的”生命迹象呢？

和那个貌似还是个国家的奥地利结盟真是一个不祥的预兆，这埋下了日后世界大战的种子和走向崩溃的隐患。

我在这本书的其它章节里还会涉及到这一问题，现在就暂且不论。这里我要断言的是，在我的青少年早期就明白一件事，不仅从没有改变过，而且还不断地加深了我的理解，那就是：德意志人民的安全保证是以消灭奥地利为前提条件的。而民族感情和忠君的爱国主义思想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尤其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存在的确是德意志民族的不幸。

因此，在那时我就认识到我对德意志奥地利故乡无比的热爱和对奥地利无比的仇恨。

学校教会了我如何对历史进行思索，这对我今后也有很大的帮助。世界历史对于我来说越来越像是一个取之不尽的源泉，帮助我理解目前所出现的历史争端，也就是政治。对于政治，我不是去“学”，而是它来“教”我。

这让我早就成了一个政治“革命家”，比当一个艺术家还要早。

当时，在上奥地利州府有一座还不错的剧院，什么都演。在我十二岁的时候第一次看了《威廉退尔》。几个月后，我又平生第一次看了瓦格纳的歌剧《罗恩格林》。我被它一下就给吸引住了。一个年轻人对艺术大师的狂热真是无法形容。他的作品一再吸引着我。直到今天，我还能感觉到只有乡下人才有的那种观看演出所得到的满足感和油然而生的幸福感。

尤其在我过了少年气盛的年龄以后（这对于我来说尤其感到特别地痛苦），这一切让我从心里对父亲所给我选择的职业感到厌恶。我越来越相信，当一个公务员是不会幸福的。此前我是这样认为的，在中学里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我决定要让大家知道我的绘画才能。

这一点无论是恳求，还是威胁，我都不会改变。我要成为一个画家，而绝不是什么公务员。

奇怪的是，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反而对建筑艺术发生了兴趣。当时我认为这只不过是我绘画才能的一个补充，或是我艺术才能的延续。由此会有别的事情发生吗？我不得而知。

关于我职业的问题，必须要很快做出决定了，而不像预期的那样了。

我十三岁的时候失去了父亲。是脑中风夺去了他那壮实生命，毫无痛苦地结束了他那奔波劳碌的一生。这让我们大家都万分悲痛。他特别希望的就是让他带到这个世上的儿子不再遭受他所经历的苦难。这在当时似乎未能如愿。是他在有意或无意间，为将来播下了一粒不论是他，还是我都无法预料的种子。至少从表面上看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按照父亲的遗愿，母亲负责我的教育，这就是说，还要接着培养我当一名公务员。而我还是一如既往无论如何都不想成为一个公务员。所以在学校里，我对那些不符合我志愿的学科和教材自然就不上心。一次，我突然生病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我要在几周内对我的将来做出决定，结束这个和父亲长期争执的问题。由于我的肺病很严重，所以医生建议我赶紧去诊所治疗。上学的事情至少要耽搁一年的时间。所

以，我静静地期待着，我那一直在争执的愿望会因为这件事一下子自己会很快变成现实。

根据我的病况母亲终于同意，愿意让我中学后报考学院。我感到那几天真是我最幸福的日子，是让我梦想成真的日子。不过这只是梦想而已。两年后，母亲的去世让我的计划变得无望。

母亲长期的病痛结束了，本来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痊愈的机会。这对我真是可怕的打击。我尊重我的父亲，但更爱我的母亲。

母亲患病几乎耗尽了父亲留下的遗产，连我进孤儿院的钱也不够。痛苦和严峻的现实摆在我的面前，为了生活，为了给自己找到面包，迫使我必须立即做出决定。提着装满衣物的箱子、心中充满不可动摇的志愿，我去了维也纳。父亲在 50 年前所能实现的，但愿命运对我有所眷顾，让我也能实现些“什么”，但绝不是公务员。



第二章 在维也纳求学和苦难的日子

在母亲去世的时候，从某种意义上讲，命运就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安排。

怀着母亲去世的悲伤，几个月后我去了维也纳，参加那里的学院录取考试。在路上我画了一大摞画。我很自信，肯定会轻而易举地能通过考试。在中学里，我是班里绘画最好的，而且我的水平还有很明显的进步，所以这种满足感令我自豪和喜悦地认为，我会考得最好。

一个阴影隐约涌现出来，那就是我的绘图水平超过了我的绘画才能，特别是在建筑作品的绘制方面。当然，我是对建筑艺术发生了兴趣，而且兴趣还在不断增加。特别是在还不到16岁的时候，我第一次在维也纳逗留了两个星期。当时是去参观博物馆的艺术展览，但我的眼睛却只盯着博物馆的建筑。那些天，我从早到晚徜徉在名胜古迹中，而我首先看的都是建筑。我在歌剧院和国会大厦前伫立几个小时，面前的环形大道就像《一千零一夜》中的魔幻吸引着我。这件事让我对建筑的兴趣更加浓厚了。

现在，我又第二次来到这个美丽的都城。忐忑不安，且多少带有些自信地等待着考试结果。带着胜利的信心，可我得到却是拒绝录取的通知，这犹如一声晴天霹雳。而这的确是真的。校长后来向我解释了原因，说看了我的作品后他们认为无可挑剔，可从我的才能来看则不适合当一个画家，而更适合做一个建筑师。所以，我应该去上建筑学院，而不是艺术学院。可我从来就没有上过什么建筑学校，也没有学过什么建筑课程，难道他们不知道吗？

我垂头丧气地离开了席勒广场边那气势恢宏的学院大楼。第一次，我平生第一次对我自己失去了信心。他们对于我才能的说辞，就像一道耀眼的闪电划出一条裂痕般地刺痛了我，使我难以自拔，而又找不出任何解释来说明这是为了什么。

以后的几天里，我自己渐渐明白，我要当一个建筑师。

当然，这条道路是很难的；我没有上完中学，可要上建筑学院，首先我必须中学毕业，再上建筑类学校，然后才可以去报考。现在我这些都没有，可真是上天的惩罚。思前想后，我那想成为艺术家的梦想难以实现了。这是我在母亲去世后第四次去维也纳，这次在这里呆的时间很长，而就在这段流逝的时光里，我又重新找到了冷静和果断，我又重新找到了我的最终目标。我要成为一个建筑师，再不会有任何东西阻碍我，我不会投降，我要冲破任何艰难险阻。父亲从一个穷苦的乡下孩子成为一个国家公务员，我要把这样一幅景象从眼前赶走。因为现在，我的基础要好得多，我有更多的机会和可能，对我来说似乎也要容易得多。以前，我抱怨命运的艰难，而现在我则称赞天公作美。是上天用她那神奇的臂膀把我从那时常威胁我的苦难中解救了出来，锻炼了我的意志，而最后我会成为胜利者的。

我要感谢那个时代，它让我变得坚强，而且我会变得坚强的。我还要感谢那个时代，它让我从那无聊、懒散的生活中挣脱了出来；它把我从呱呱落地中唤醒，让我得到母爱；它把我投入这世上苦难和贫困中，并教会我在今后如何与之抗争。

在这段时间里，我开阔了眼界，我认清了两种危险的存在。以前，我还不知道它们意味着什么。但这两种危险对德意志民族的生存是很可怕的，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犹太民族。

维也纳对许多人来说意味着无忧无虑的喜悦，到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充满了节日的欢庆。可惜对于我来说，那是我人生中悲惨生活的痛

苦记忆。

即使在今天，这个城市依然还能唤起我脑海中的阴霾，那就是我在这里所得到的五年的痛苦和怨恨。在这五年里，刚开始的时候我当过临时工，以后又给别人画画，就算是个一文不名的画家也得挣点饭钱，而我换得的那少得可怜的面包可真可无法安慰我平日里吃不饱的肚子。那时，饥饿是我唯一的忠实伙伴，而且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我读书的时候常常会感到饥肠辘辘，看歌剧的时候也总是食不果腹。在这段时间我和这位朋友进行着不懈的战斗，而我居然学会了如何去忍饥挨饿。除了建筑艺术，用省下的饭钱偶尔去看看歌剧，那便是我读书之外唯一的乐趣了。

那时，我不断地、认真地学习。除工作之外，我把业余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不到几年，我就掌握了一些基础知识，直到现在仍对我有很大的益处。

除此之外，我还学到了更多别的东西。

在此期间，我建立起自己的宇宙观和世界观，这是我为人处事的基本观念。我这种早期所形成的观念以后又不断地得到充实，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

与之相反，今天我依然坚信，人们所具有的创造力通常在年轻的时候就会得以显现，我就属于这样的情况，即便在脑子里完全没有这样的想法。老年人的智慧是经历长期生活后认真细致地积累所得，而年轻人的天赋则是许多旺盛的意念和幻想不假思索、不断倾泻的结果，我是区别对待的。年轻人的天赋就好像石块和蓝图，老年人的智慧则对这些石块进行挑选、打磨、堆砌，这样才不会使年轻人的天赋被老年人的智慧所湮没。

在家乡我的生活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不一样，我本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下去，不会有什么生计上的困难。

我小时候周围生活的都是些小市民，也就是说他们的世界和真正的工匠们只有很少一些联系。很奇怪的是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恰恰就是这些在经济上本来没有什么可以值得炫耀的小市民和那些大拳头的工人之间的裂痕比人们想象的要深得多。这就是社会阶层之间的恐惧所产生的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敌视感的东西。这种敌视的原因就在于短时间内手工业者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但以后又重新回落到了过去那种不被人重视，至少不像他们所期待的那种状态。另外，尽管这些人属于社会下层，彼此间时常表现得很粗鲁，可对于这个阶层的大多数人来说在文化上所遭受的苦难依然让他们记忆犹新，同时虽然他们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很卑微，可是任何对文化和社会地位的触动都会给他们造成无法承受的苦难。

因此，常常所发生的现象就是较为上层的人会更大方地和周围的人相处，那些“暴发户”们则反而显得拘谨。

因为这些暴发户是依靠自己的能力从原有的生活水平向更高一级迈进。所以，异常严酷的争斗最终使他们丧失了同情心，他们自己为生活的痛苦奋争泯灭了对弱者不幸的情感。

而在此方面，命运让我富于同情心。它促使我回到这个贫困和动荡的世界，这个父亲已经撒手人寰的世界，可正是他让我接受了有限的教育，看清了这个世界。现在只有学会分辨出那空泛的虚假、残暴的外表以及内心的本质，我才能真正了解人类自身。

世纪之交以后，维也纳已经变成了社会生活很不优越的城市了。帝国中心和周边城区生活着五千二百万人口，他们的脉搏和民族国家神奇的脉搏一起跳动。金碧辉煌的宫殿有如磁石一般吸引全国各地的财富、智慧和所有的一切，当然还有哈布斯堡王朝的集权本身。

这种集权的唯一用途就是统治人民。其明显的结果就是为了高度的统一而建立的一级高于一级的官府机构和都会城市。

当然维也纳不单单是多瑙河流域古老王朝的政治、文化和艺术中心，而且还是经济中心。这里不仅有官吏、公务员、艺术家和学者，还有一支更加庞大的劳工大军；这里不仅有贵族、富商，也有贫困。环形

大道旁宫殿的四周有数以千计的失业者在游荡，凯旋大街昏暗的灯光下和肮脏的污泥中有无家可归的人们在彷徨。

如果要研究社会问题，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德国的城市能比维也纳更合适的了。但不要误会，这种“研究”不能只是表面上的。要是没有掰开蛇的嘴，你就不可能知道什么是毒牙。换句话说，表面上的空话和虚伪的矫揉造作是不会得到什么结果的。这样只会有害处。一种害处是你不能通过现象看到问题的本质；另一个则是问题会从你身边溜走。我不知道这两者之间哪一个危害更大？就像那些有幸养尊处优，或是高官厚禄的人们对社会疾苦是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呢，还是像那些目空一切的时装女郎呢？尽管她穿着裙子，穿着裤子，可有时就是踩不到节拍上，但还要强迫自己屈尊迁就地迎合观众。而正是这些人才真是罪过，还不如让他们丧失理解力，反而比假装什么都懂要强的多。以后，就连他们自己也会惊讶地感到正是他们所倡导的社会“思想”几乎什么东西都不是而常常被人拒绝，而他们还把这种现象看作是民众不会感恩戴德。

从事社会工作尤其不要以知恩图报作为前提条件，这不是在施恩，而只是以这种方式唤起他们头脑中所不情愿提及的权利。

我坚持认为，学习了解社会问题的途径是你首先应该被社会问题所吸引，希望了解社会疾苦，不是简单地被请去“学习”，而是我自己想要去进行尝试。但不是像自己拿一只小白兔去做做康复实验那种事情。

如果现在让我把当时的体会和感受重新写下来的话，那几乎完全是办不到。但是最为关键、最让我印象深刻的那部分却可以做到。

当时对我来说，找点活干并不难。我不光有手艺，还做帮工，有时打打短工，这样来维持生计。

我的出发点是决心离开欧洲去创造一个新世界、开辟一片新天地、建立一座新家园。什么工作职业、什么社会地位、什么生活环境、什么传统观念，让这些迂腐的想法离我而去。我要抓住一切机会，做好每一项工作，认真总结经验，找出最好的工作方法。我还决定要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进入这个新世界，奋斗到底。

不久以后我就明白了，总有一些工作还是可以找到的，只不过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罢了。

为了每天的面包而四处奔波让我感觉到这是我开始新的生活以后最为艰难的日子。

即使是“有专长”的工人也不会大街上等很长时间，更不用说那些“没有专长”的了，只不过上天没有特别保佑他们。由于没有工作，由于工作短缺他们被解雇或者自己参加罢工，结果就是他们失去了面包。

无法确保日工资收入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本来就很糟糕的整个经济自身。

流落到大城市的农村小伙子们被那些看起来简单是或者的确也很轻松的工作所吸引，这些工作时间比较短，通常还有耀眼的灯光照明，或许是这些灯光也使得整个城市都显得光彩夺目，另外通常还可以拿着比较稳定的工资。可只要有一份新的工作，他们就会离开原来的岗位。最后的结果就是农村劳动力的缺乏日益严重，而长期缺乏劳动力问题本身以及对劳动力需求的不确定性则也就变小了。所以就觉得留在农村老家的年轻人正直，相反以为那些到城里去谋生的从一开始就不是什么好人，其实这是极其错误的看法。不是的，正好恰恰相反，事实证明，自然界中所有能够蔓延出去的东西都是最健壮和最有活力的，而不是与之相反的东西。属于“蔓延”出去的人并不只是指那些流亡美国的人，当然还包括这些决意背井离乡、迁往到那陌生的大城市的年轻人。而且他们都已经做好了接受命运所给予的任何一种安排。一般他们到大城市身上还带着几个钱，但也不至于因为不走运没有找到工作一开始就气馁。其实糟糕的不是找到了工作，而且找到后很快就又失去了。尤其在冬天的时候要是没有可能找一份新工作的话，那将是特别艰难的。开始的几个星期还能将就。他还能领到工会发放的失业救济金勉强维持生计。但当他花光了最后一个铜板，而救济金也因为长期失业而停发的时候，这才是最大的灾难。现在他只有忍饥挨饿，四处游荡，典当或卖掉自己仅有的东西，他失去的不仅是身上的东西，而且还有他在人们面前的尊严，

他遭受的不单是肉体的不幸，同时还有心灵上的伤害。他只能这样无家可归吗？难道（而实际常常如此）冬天就是这样吗？痛苦已经够大了吗？好不容易他又找到份工作，然后又一再重蹈覆辙。第二次发生这种事情，情况还和第一次差不多，第三次也许还要困难，但这种时常动荡的日子让他学会了忍耐冷漠，不断的重复反倒让他习以为常了。

所以，这个平时勤快的人对待整个生活的态度就变得懒散了，觉得自己好像是个被别人使唤的工具，等待慢慢打磨好后，竟然只利用他那最低等的部分。他的失业经常不是因为他的错，或许至少一次都没有。即使不只是他为了夺回自己经济上的权利而抗争，也要为铲除国家、社会，乃至文化上的价值观而战斗。所以他变得对罢工已经毫无兴致，而且已经漠不关心了。

类似这样变化过程的例子，我可以毫不费力地列举出上千个来。这种事情看得越多，越让我反感聚居上百万人的大城市。它贪婪地吸引着人们来到这里，然后又无情地把他们毁掉。

当人们到城里来的时候，还能算是城里人；可一旦他们留下来，就会被城市所遗弃。

迫于生计，我也在这个国际大都市里四处飘荡，命运的多舛我深有体会，让我心力憔悴。另外，我还看到一点，就业和失业，或失业和就业的快速交替，以及因此而常常引起的收入和支出的波动，在这个过程中对大多数人来说，毁掉的不单是对节俭的感知力，还有对省吃俭用的理解力。所以，连人们的身体都很明显地习惯在时运好的时候生活安逸，而在时运不好的时候只能挨饿。是呀！饥饿会彻底改变你在今后挣钱稍微容易点的时候省吃俭用的计划。想象中虚幻的世界长期困扰着他，温饱安逸生活的场景迷惑着他，让他以为这种不断增强的梦想会成为一种憧憬，而一旦在挣到的钱和工资允许的条件下，这种病态的憧憬最后就会变成一种自我束缚。以后，那些几乎无法找到工作的人，尽量为了过好日子，还会立即舍弃不合理的费用开支。这样做的结果，就连少得可怜的一周的费用开支也要节省，开始还够七天过日子，后来只够五天，后来只够三天了，最后就只能维持一天的了，甚至在头天晚上就全花光

了。

女人和孩子经常呆在家里。有时他们的生活和丈夫自身息息相关，特别是要看这个男人对待他们的好坏，是的，也就是他要以他自己的方式去爱他们。丈夫每星期把挣来的钱拿回家，可以用两、三天，买吃的，买喝的，直到钱花完；剩下的几天就只有大家一起忍饥挨饿了。女人这时只有悄悄地到邻居或周围的人那里去赊点吃的，或到小业主那里借点小债，以扛过一周这最后倒霉的几天。星期三就只剩下清汤寡水了，有时还什么吃的都没有。那只有等下一个发薪的日子了，她们念叨着工资，做着盘算；饿着肚子，梦想着即将到来的幸福。

所以，生活的艰难在小孩子的童年时代就已经历历在目了。

男人从一开始就有所作为，女人很讨孩子们喜爱，那是最好了，可如果相反，那就糟糕了。剩下的就只有大吵大闹。然后，男人会去找别的女人，开始酗酒。每个星期六都喝得醉醺醺的。为了自己，也为了孩子的生存，女人则变得烦躁不安，以前还能给丈夫几个零化钱，好让他在下班的路上到小酒馆里喝上两口，而现在也不得不节省下来。星期天或星期一的夜里丈夫喝得醉醺醺地回家，脾气也十分暴躁。只有用家里仅有的几个零钱才能打发他出去。这样的事经常发生，天哪，行行好吧！

这样的事情我经历了很多。开始觉得厌恶，有时也感到气愤。但以后懂得了这种苦难的可悲和深刻根源所在。他们是这个万恶世道不幸的牺牲品。

那个时候，还有更糟糕的就是维也纳的居住环境。那里工人的居住条件差得难以想象。直到今天，一想到那可恨的棚户区、破败的小旅店和污浊的贫民窟时，我都觉得不寒而栗。那完全是一幅由肮脏的废物、恶心的垃圾和无尽的烦恼所描绘出的景象。

如果从这无尽的痛苦中喷涌出挣脱束缚的奴隶所形成的洪流要淹没另外一些在这个时代生活在我们周围但又缺乏头脑的人们，那么现在和将来又该是个什么样子呢！

这些的确是缺乏头脑的人们。

正是因为他们缺乏头脑，同时也因为他们麻木不仁，所以就无法懂得命运早晚会对他们进行报复，尤其是当现在的人们和命运还无法进行调解的时候。

我真应该感谢上天，让我进了这所学校。在这里，我不再对我不喜欢的东西捣乱了。学校很快让我受到了全面的教育。

当时，我要对我周围的人产生怀疑吗？我要学会区别他们的外表和内心以及变化的原因。不要泄气，要学会有耐心。不幸、抱怨；腐败、堕落都不会滋生出人类，而只会产生出可怜的法律所带来的可悲结果。对此，我自己生活奋战的艰难让我不屈服于这个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最终可恶的结果，尽管奋战并不十分轻松，还带有些伤感的意味。

不，对此不应该这样理解。

在那个时候，我首先就已经看到了引导我通向以改变这种状况为目标的道路：深厚的社会责任感是为我们发展所建立的更好的基础；无情地铲除不可救药的毒瘤要坚毅果敢。

大自然不把她的大部分注意力放在维护已存在的事物上，反而重在培植新的、符合其本性的物种。和自然界一样，人类的生命活动中也很少去改良已存的不好的物种。从人类的天赋来看，99%都不可能这样做。因为从一开始就要确保今后要有一个健康的发展方向。我在维也纳为生存而战的时候就已经很清楚社会活动的本质，社会活动绝不能总被看作是可笑的、毫无意义的社会救济那样的简单轻率，而要更多地看作是克服我们经济和文化生活组织机构中根本上的不足，而这样的组织机构必然会导致，或者至少会诱发这样的不足。

针对敌视国家的罪行所要采取的最终和最严厉行动的困难至少并不取决于对内心动机判断的不确定性或时间安排上的因素。

这种不确定性的原因所在只是对这种腐败悲剧事件的自责感，每一个庄严的信念和坚定的决心都会因此而丧失活力，从而导致因为左右摇

摆而使自我保护的必要措施执行不彻底或者是半途而废。

只有当自责的阴影消失，自己的内心得以平静，身体获得力量，才会坚决果断地拔掉野生的嫩芽，铲除杂草。

正是因为没有别的地方比奥地利有如此完善的公共裁决和立法制度，所以其最大的弱点却是无法剔除自己身上的毒瘤。

当时在那段时间里最感到惊恐的是什么？是我周围的人处在经济困扰中？还是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野蛮行为，或是文化修养水平的低下？我不得而知。

当从任何一个流浪汉的嘴里说出，对他来说无所谓是不是一个德国人；或者只要他能有钱花，无所谓在什么地方都会感到幸福。如果我们的人民听到这些后会从道义上感到气愤吗？

“民族自豪感”的缺乏，一定要发自内心来进行斥责，对这种思想品质一定要表现出对它的憎恨。

有多少人提出这样的问题，然后自己找到能培养出更好思想品质的原因呢？

有多少人懂得对我们伟大祖国和民族那无限的思念？那里是我们文化和艺术生活的国度，那里是我们民族自豪感汇集的地方，我们是上天所赐福的子民。

有多少人知道，对祖国的自豪感是与了解其疆域的宽广密切相关的呢？

现在再来看看我们周围的人们吧，是在多么可笑的范围里才把祖国自豪感这个基本观念传授给“人民”的呢？人们都会这样认为“其它的地方也没什么两样”，那里的工人也“还是”站在人民一边的。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还不用因为自己的过失来道歉。但事实并不是如此。因为我们接受的是“大国沙文主义”式的教育，就像我们这样描述法国人一样，这和在各个方面都要竭力突出法国的伟大没有什么两样，就如法国人常说的“文明”那样。年轻的法国人所接受的教育并不客观和具体，相反他们所接受的是一种主观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观点，用以强调其伟

大祖国在政治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这样的教育通常会限制各种观点意见，而只是用于不断加深和强化人民的记忆和情感。

而我们在这方面，既有消极的失误，也有主动的摧残，是针对在学校里还能有幸接受到这种教育的少数人的摧残。这种政治毒害就像老鼠一样，不仅撕咬着这些少数人，而且还在心底和记忆深处吞噬着广大群众，只是不用担心痛苦和抱怨早已渗入到他们的生活之中了。

我们可以这样想象一下：

在一个地下室里有两间发着霉臭的房间，里面住着一个七口人的工人之家。五个孩子中有一个男孩，估计差不多有三岁，看样子好像是刚刚懂事的年龄，可他的聪明程度要比实际年龄大些。狭小和拥挤造成人与人关系的紧张，因此磕磕绊绊的事经常发生。人们的生活相互之间不应该是这样的，人们应该相互尊敬。要是在宽敞的住房里，即使发生一点小小的分歧，暂且回避一下就可以自行得到解决，而不会爆发令人讨厌的争吵。孩子们之间的争执一般表现还比较平常，他们一会儿争吵，一会儿很快就忘得一干二净。而一旦父母双方真要摆出一副战斗到底的架势，而且几乎是天天如此，心底的残忍可谓是毫无遮掩地喷发出来，这样对孩子们来说渐渐地只会带来一个后果，那就是一种彻底的亲身演示。那他们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如果双方的争吵是以父亲对母亲采取粗暴的行为，或在喝醉的情形下导致暴虐行为，那么这样的境况就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出来的了。当孩子六岁时，真是可怜的小家伙，他就会对父母心怀恐惧，即使他成年后也会如此。他的品德受到了毒害，他的身体营养不良，身上满是虱子，就这样他作为一个“国家公民”进了国民学校。好不容易学会了阅读和写字，但也就是这些了。在家里学习倒不成问题。可正好相反。母亲和父亲在家里当着孩子的面高声大嗓，当然不是像在学校老师对着学生朗诵课文了；他们痛打孩子时还满嘴粗话。那么这个可怜的小东西在家里还能听到些什么呢？当然不会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这样对他们的个性没有一点好处，他们没有得到正确的引导，从最初的学校教育一直到国家的最高层，都没有做到。也许是宗教或道德本身的原因，或与国家和社会有关，但不管是谁，都要为把这

个孩子用这样卑劣的手段强行拖进了如此下流肮脏的境地而受到指责。简直不可相信，当这个孩子14岁从学校毕业时，已经分不出他身上什么更多一些，是真正的知识和才能呢？还是那野蛮无礼的行为呢？在这个年纪就变得如此的堕落，真是令人毛骨悚然。

像他这样一个会被人瞧不起，也不会有什么出息的人，他们所知道和理解的生活阴暗面正好与我们相反，在他们正要迈向的生活中能处在什么位置上呢？

一个三岁小孩长到了十五岁，成了一个蔑视一切权威的孩子。该年轻人接触到了污泥浊水，还从来不知道有什么东西能够燃起他的激情。可现在他才刚刚踏入社会这一高等学校。

他开始了在整个童年时代就从父亲那里所接受的同样的生活了。他到处闲逛，天知道什么时候才回家；为了消遣，寻求刺激，他打架斗殴，就像以前他父亲对待母亲那样；他诅咒上帝，埋怨世道；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他被判刑而进了少年管教所。在那里他才真正经历磨难。

亲爱的人们这时才对这个缺乏“民族感情”、年轻的“国家公民”表现出无比的惊讶。

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剧院和电影院，低俗的文学作品和龌龊的报刊杂志中那些有毒的东西天天都在不断大量地灌输给了人民。人们对如此少的“高尚内容”，对民众如此的“麻木不仁”而感到吃惊不已。就像那些电影院里拙劣的、报刊杂志中肮脏的、以及其它类似的东西把伟大的祖国给葬送了。这从早期的教育中我们可以略见一斑。

我以前所不知道的东西很快就基本上理解了：一个民族进行“民族化”的问题首先是一个健全完善的社会关系，并以此作为基础来教育每一个人的问题。因为只有通过教育和学校教育来认识自己祖国在文化、经济，特别是在政治方面的伟大，才能从内心感到骄傲，才可以成为这样一个民族中的一员。我只为我所热爱的民族而奋斗；而我只热爱我所尊敬的，至少是我所了解的民族。

我对社会问题的兴趣被激发出来，我开始彻底、全面地研究它们。一个全新的、未知的世界展现在我的眼前。



从1909年到1910年间，我的处境渐渐有些好转，我不用靠给人帮工来维持生活。我自己靠制图和画水彩画来维持生计。所挣的钱虽然很寒酸，生活也无以为继，但还好是我选择的职业。现在我不像以前一样下班回家累得要命，拿起书来就打盹，没法看下去。如今，我的工作和我未来的职业可以同时并进。我还像以前那样可以自己做主安排时间。

我做画是为了糊口，我学习是出于乐趣。

我还可以用必要的理论知识通过社会问题对实际教学来进行补充。凡是我能弄到的这方面的书，我都认真研究，这样还可以让我深思熟虑。

我相信，也许是我当时所处的环境让我成为了一个特殊的人。

很自然，我对建筑艺术迸发出挚爱的火花。除音乐之外，那就是艺术女神让我对如此复杂的工作没有感到什么“负担”，而是一种莫大的幸福。我读书或制图可以一直到深夜而没有一点倦意。所以我深信，许多年后的将来，我那美丽的梦想一定会变成现实。我坚信，我今后会成为有名的建筑师。

同时，我还对政治所涉及的一切都感兴趣，这好像对我没有什么意义。可相反在我的眼中那正是每一个有头脑的人理所应当的责任。谁不懂得这个道理，谁就会失去进行批评和抗议的权利。

通过读书，我学到了很多。

关于“读书”，兴许我和大多数的“读书人”也有很大的不同。

我认识一些人，他们的确“读”了很多书，一本又一本，一擦又一擦，但我认为他们并没有真正地“读”过书。他们只是把大量的“知识”当作素材分门别类地放在脑袋里，并没有用脑子去理解知识。他们没有本领区分书里有价值的内容和没有用处的东西。对于有价值的内容要留在脑子里；没有用处的东西尽可能连看都不要看，千万不要携带这些累赘。读书本身不是目的，方法才能让你达到目标。首先应该帮助每个人不要让天资和能力流失，还要提供学习用具和学习材料，这些都是我们

每个人的职业生涯中所必需的，不管他只是想挣点最起码的面包，还是想满足更高层次的追求。其次，他要表明自己的观点。这两种情况都要求，读书并不只是按顺序记住书的内容或是书的排列顺序，而是要帮助你把那些像马赛克一样支离破碎的观点在头脑中找到相应的位置，然后塑造成型。否则，你头脑中尽是些杂乱无章、死记硬背、毫无意义的东西交织在一起，就像别人胡乱放进你的脑袋里一样。在生活中有所感悟，掌握知识，这时你才会知道受到了真正的“教育”，可要是在每个新的成长阶段所得到这种方式的“教育”使他越来越脱离现实世界，那他最后肯定是进疗养院，而不会去国会里当“政治家”。

千万不要有这样一个头脑。脑袋里所谓的“知识”是乱七八糟的，想要知道点什么半天都想不起来，他的知识容量不是按照实际需要，而是按照他读的书和放进脑袋里的顺序排列的。难道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一切行动都要从所读的书里去追溯其合理的内容，甚至连书的页码都要注明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可怜的家伙恐怕永远也找不到正确的方向。即使他不这样做，这些自以为聪明的家伙也会时刻受到指责，从而陷入极为可怕的困境中，他们会照此类推，按图索骥，刚好好像挺有把握地找到了一个良方，当然那是一个错误的、致命的药方。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政府所极力推崇和用来教导我们的那些英雄人物的丰功伟绩我们就难以理解了，除非我们以病态的行为去接受卑鄙下流的东西。

谁能够正确掌握读书技巧的关键所在，那么在学习每一本书、每一期报刊杂志或宣传小册子的时候，不论是有意或者只是为了掌握知识，他就会有一种感觉，让他在瞬间留心所有在他看来适合长期保留在脑子里的内容。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得的东西，会根据其含义嵌入大脑中已经由这个或那个部分所构成的画面，并起到完善和补充的作用，而使其准确性和清晰程度得到提高。生活中常常会突然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等待你去验证或回答，通过这样的阅读方式，你大脑中所记忆的东西会很快对现有的观点进行检测，并由此把所有多年来积累的凡涉及该问题的所有资料一一呈现出来，附上自己的理解和新的看法，直到把问题澄

清或是得到解答。

只有这样，阅读才会有意义和目的。

比如，一个如果不按此方法来为大脑提供所需资料想要进行演说的人，那他就只能在表达其观点时自相矛盾，也许他的观点很符合实际或事实。在讨论问题时他的记忆力也跟不上了。他无法找到强调他观点的论据，也无法把论据对他的反对派进行说明。一旦这种事情发生，尤其对一个讲演的人来说，首先是自己丢脸，但这还说得过去；可如果上天把这样一个好像知道很多，但实际上却是个无能家伙认定为国家领导人的话，那才真是糟糕透了。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按照正确的方法去读书。这种方法对我的记忆力和理解能力很有好处。尤其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我在维也纳期间，可谓硕果累累，很有价值。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激励我不断地学习新的东西。这样使我能够对现实生活从理论上进行论证，把理论在现实生活中去进行检验。这样可以避免要么我让理论给压死，要么我在现实中变得平庸。

在这段时间里，除了社会问题外，我面临如何把握从日常生活阅历中所得到的感受，并怎样激励我对基础理论学习的热情这两个最重要的问题。有谁知道，当我在那个时候真正遇到这样的问题时，还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及其本质有过很深的感触呢！

说心里话，年轻的时候我对社会民主党的了解不是很多，也并不准确。

社会民主党争取普通选举和秘密选举权的斗争让我从内心里感到高兴。我当时对此的理解就是，社会民主党能够削弱我所憎恨的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我深信，这个多瑙河边的帝国，除了以牺牲德意志利益外，再也不会存在了。把德意志特性渐渐斯拉夫化的代价本身实际上不再意味着成为这个帝国生存能力的保证。斯拉夫人掌权的国家是最让人怀疑的，不值得信赖的。像这样一个只会给成千上万的德意志人民带来死亡的、不成体统的国家应该受到谴责。我坚信，并且真心地希望，这样的帝国会一步一步地走向崩溃。只要那些乌七八糟的语言还存在，就

会不断地侵蚀和瓦解他们的议会，那么这个像巴比伦一样的帝国崩塌的时刻就会离得越来越近，也就是说，我那德意志民族的奥地利人民自由的时刻就会来到了。有朝一日，他们又能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了。

所以，我对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并不是没有好感。就像我当初出于好心，并且还非常愚蠢地相信，社会民主党会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所以我没有反对他们，而且还支持他们。但尤其让我失落的是他们充满敌意的观点，他们反对为保护德意志民族而战斗，这是为了讨好斯拉夫的“同志们”。而他们竟欣然接受了实际上意味着妥协的示爱。不然，他们就会摆出一幅傲慢无礼、目空一切样子，给工钱就像打发难缠的叫花子似的。

在我 17 岁的时候，对“马克思主义”这个字还知道的不多，当时对我来讲，“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基本上是相同的概念。是上帝的力量让我睁开眼看到这个闻所未闻的弥天大谎。

我当时只是在观看群众游行的时候知道了社会民主党，对其追随者的特性或其学说的本质只是略有耳闻，现在一下子就被它的宣教和“世界观”所感染了。否则会是什么东西会让我在几十年后才加入这个党的呢？我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知道了如何领会什么是从社会道德和博爱的胚芽中蔓延出来的瘟疫，并要从中把人类和世界解救出来，因为把世界从人类手中解救出来是要容易些的。

在建筑工地上，我和社会民主党人第一次相遇了。

一开始并不很愉快。我的穿着还算过得去，讲话也有教养，行为也很稳重。我这辈子有很多事要做，所以我很少和周围的人来往。我只是要找份工作，为了不至于会挨饿，如果有可能的话，还可以继续接受教育。其实我根本就不想和周围的人打交道，但三、四天所遇到的事情迫使我不得不表明我的立场。我被要求加入社会民主党这个组织。

当时，我对工会组织知之甚少，几乎为零。我也无法证明其存在是否合理。他们向我宣布，我必须加入工会组织，我拒绝了。我和他们讲，我并不了解他们的事，不必强迫我这样做。或许也有些其它原因，否则

为什么不立即把我扔出去？或许他们希望过几天我就会回心转意或者屈从他们。他们绝对搞错了，14天后我也没有那样做，即使我真的想要加入。在这14天里，我渐渐熟悉了周围的人，不再有什么天大的压力逼着我加入什么组织，那些组织的代表人物对我来说也显得无足轻重了。

可开始的几天真让我气愤。

午饭的时候，一部分人去旁边的饭馆吃，另外一部分就在建筑工地上吃，他们都吃得很差劲。这些人大都是结了婚的，他们的老婆用寒酸的餐具给他们带饭。快到周末的时候，留在工地吃饭的人会多起来，为什么，我以后再说，现在先谈政治方面的话题。

我坐在靠边的地方，一边喝着牛奶，吃着面包，一边细心观察着周围的人，时不时还想着我这倒霉的时运。像平常那样我还是听到有人故意要接近我，想要看看我的态度如何。肯定是这样的，我听见的就是这样，他们要鼓动我表态。但就是避而不谈：民族，说这是“资本主义的”发明，光是这样的话我还要听多少次！阶级、祖国，是资产阶级用来剥削工人阶级的工具；法律的威严是用来压迫无产阶级的；学校是培养奴隶的机构，当然也培养奴隶主；宗教是愚弄和剥削人民的手段；道德标志着愚昧的温顺等等。还能有什么东西会遭到如此丑化的呢。

最初的时候我尽量保持沉默。后来就不行了。我开始发表意见，开始反击。因为我至少必须明白，如果我不对所争论的话题有些了解，那么就会完全处于劣势。所以我开始追根溯源，想把他们从主观意念中拉出来。我给他们一本书一本书地讲解，一个小册子一个小册子地进行说明。

建筑工地上时常会变得热闹起来。我和他们辩论，一天又一天地过去了，我比我的对手自己都更加了解他们所掌握的知识，直到有一天我当然是运用了理智轻易地战胜恐惧和暴力的办法。对方的几个代表强迫我要么离开工地，要么自己从脚手架上跳下去。我自己势单力薄，反抗也无济于事。按照我的经验，最好还是选择了第一条。

我走了，充满着厌恶，但同时又明白，这一切对于我来说要是采取不理睬的态度也是不可能的。不，最初的怒气发泄后，我那倔强的劲头又占了上风。我决定再去建筑工地干活。让我做出这个决定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贫穷。要知道几个星期后我花光了少得可怜的工钱，就只得陷入那无情的贫穷中去。可悲的决定，但我必须这样做，不管我是否愿意。那场博弈又得再一次从头开始，也许连结果都和第一次一样。

当时我内心就在不断地斗争着：他们还算是人吗，有必要算做是我们伟大民族中的一部分吗？

这是一个痛心的问题，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为了民族而战是不值得让优秀的人来为社会的渣滓去花费气力和做出牺牲的；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我们就太缺乏优秀的民众了。

带着不安和焦虑，通过几天的苦思冥想和认真钻研，我认为，这些不应该再算做民众的人们会越来越多，并会形成一个危险的群体。

带着怎样的一种心情，我呆呆地看着天知道从哪一天开始的维也纳工人排成四列长长的游行队伍！我站在那里差不多有两个小时，屏住呼吸注视着这巨大的长蛇阵从身边慢慢地轧过去。然后不安和沮丧地离开，走向回家的路。路上，我在一个烟草商店发现了“工人日报”，这是过去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我到了一个我常常光顾的小咖啡馆里去看报纸。我打开报纸。我真不忍心看下去了，通篇都是卑鄙可耻的，对我来说就像是精神刺激的东西。我连两分钟都没有坚持住就看不下去了。对游行示威的失望让我心里觉得要买下这份报纸并且还要认真地阅读。晚上，我压抑着不断涌出的愤恨阅读着这份谎话大全。

和其它所有的文献资料相比，通过每天阅读社会民主党的报刊，我能够更多地研究其思想的核心本质。

究竟那些在理论文章中光彩照人的空洞词句，如自由、美德、尊严和那些隐隐约约、闪烁其词、貌似赋予深刻含义却又难以表达的牛皮大话以及那些令人生厌的人类道德观与这些用人们坚信不疑的、先知们言之凿凿所写下的、不畏惧任何残暴和卑鄙无耻手段的、千方百计进行诬

蔑、真正用弥天大谎所制造出来的新时代人类神圣教义的新闻报道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呢！其中肯定有一个是给中等的，当然也是给高等的“知识分子阶层”中的傻瓜们准备的，而另一个就是给广大民众的。对文献和报刊中这种学说及组织机构的深刻理解意味着我对民众充满信心。

与以往不同的是，我现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应该首先就是寻找博爱的根源。

为了认识这种毒害要从事大量的工作，也许只有傻瓜还会对所付出的牺牲表示责难。以后的几年里我自己做的工作越多，对社会民主党所取得成就的原因的观察范围也就越大。我所领会其野蛮要求的意思就是只能保留红色报刊，只能参加红色集会，只能阅读红色书籍等等。结果不可避免地让我清清楚楚地看到其学说是无可容忍的。

广大民众的心灵对那些不坚决彻底和软弱无能的东西是没有什么反应的。

同样的情况对一个妇人来说也是如此。她内心敏感度很少是因为抽象理念的因素，而更多的是因为那些无法说清楚的、不断受到鼓励的、单凭直觉所能感受到的某些渴望。因此民众更愿意屈从强者，而不愿意受弱者支配；人们更喜欢统治者，反而不喜欢恳求者；如果一种学说不能容忍其它学说的存在，人们从内心对此更加感到满意，反而不愿意接受自由解放所允许的学说；对此大家一般很少知道应该从何做起，所以很容易有种孤单失落的感觉。精神上的恐惧感使他们变得麻木不仁，同样也使他们对那些粗暴践踏人类自由的行径漠不关心。整个学说所隐藏的疯狂理论恐怕他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所以他们只见到了肆无忌惮的武力和历历在目的残暴，而对这些，他们却是顶礼膜拜的。

如果用一个更具真实性，但同样残暴的理论来反击社会民主党的话，即使是经过最艰苦的斗争，那也会取得胜利的。

仅仅过了两年，我就对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行政机构了解得很清楚了。

我把它理解为可怕的精神恐怖。特别是他们所采取的行动不论在道德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是给不断壮大的市民阶层予以打击。而所呈现的迹象表明，他们针对认为是最危险的敌人展开狂风暴雨般大肆诬蔑和诽谤，直到被打击对象精神崩溃。为了息事宁人，他们奉献出他们所憎恨的人。

而这个傻瓜是无法得到安宁的。

这种游戏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和重复，直到他们习惯了对野狗的恐惧而变得麻木不仁。

社会民主党从经验中总结出实力是极为重要的，所以要不遗余力地攻击另外一些有同样有实力的人，那怕从他们的思想中或多或少地察觉到一点痕迹。相反，有时他们会小心翼翼地，有时则咆哮如雷地赞许反对派中的软弱分子，当然这要看所掌握情况和估计的精神状况而定。

比起昏聩的、意志薄弱的天才，他们更惧怕天生的硬汉，即使他只具有平凡的才智。当然，他们最希望的是在智力和体力方面都很软弱的人。

他们知道去制造一种假象，就像他们希望息事宁人一样。自以为聪明但还是不断地去攻克一块又一块的阵地。一会儿用掩人耳目的手段敲诈勒索，一会儿又突然明目张胆地进行偷窃；当然还要小心翼翼地干些其它的事情，要么不愿意被打扰，要么又嫌事情不足为奇，其目的就是为了引人注目，引起轰动，从而重新激怒可恶的对手。

仔细考虑到人类所有的弱点，就会发现一个能很快取得胜利的奇妙的方法，那就是趁你的敌人还没有学会，采用以毒攻毒的战术。

同时，要告诫弱者这是一个关乎生死存亡的问题。

同样，我很明白对个人、群体施行暴政的意义所在。

这里还要考虑到心理作用。

对工地、工厂、会议地点以及群众大会使用暴力，总会有些效果，但只能在暴力没有升级的情况下。

接下来当然就是整个政党针对每一个有权利的人，实施同样的策略。



就像个年老的怨妇那样尖声地大叫着，大多数情况下会在混乱中真正达到自己的目的，那就是：这个政党要让这个蠢货成为一个更高一级的官员，通过这种手段或许可以让他以后讨好那些他们所惧怕的反对派，来帮助战胜这个像世界瘟疫一样的对手。这是个多么愚蠢的想法。

对广大群众及其追随者甚至他们的反对派的思想意识进行打击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这只有那些对民众的心灵不是通过书本，而是在生活中了解他们的人才能进行判断。因为在追随者的行列中，所期待的胜利现在更多地被看作是个人权利的凯旋，在大多数情况下受打击的反对派还完全怀疑继续进行反击会取得成功。

特别是我对实施暴力的办法了解得越多，那么对成百上千被镇压的人们的歉意就会越深。

这真得要归功于我当时的痛苦经历，让我的人民重新回到了我的身边，让我学会了从引诱者当中如何区别谁是受骗上当的牺牲品。

受骗上当的结果只能称为牺牲品，没有别的表达方式。因为当我现在试图描述现实生活中这些“最底层”民众的本质特征时，却无法做到全面和准确。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我又重新发现了他们的光辉品德，如宝贵的牺牲精神、忠诚的同志情谊、超然的知足心情、矜持的谦逊态度，特别在老一代工人阶级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如果说年轻一代人身上这样的好品德在融入大城市生活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失去了，当然失去的还有很多，那么现在他们身上流淌的健康血液将成为抵抗生活中卑鄙无耻的主宰。而当这些善良、勇敢的人们经常在他们的政治活动中站到民众死敌的行列中，并和他们结合的时候，这取决于要么这些人们已经理解，要么还不能理解新的理论学说的可恶之处。否则不会有人去化气力琢磨这些东西。结果其社会势力比其他所有反对派的思潮都要强大。总有一天会降临的贫困将把这些工人赶到社会民主党的阵营里去的。

现在正是因为民众无数次以极不聪明的，或者说是以不道德的方式去反对自己基本的人权要求，也就是说常常是根本就没有要求或者期待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去得到好处，就把非常正派的工人从工会组织中推到政治行动中去了。

成千上万的工人在开始的时候心里肯定认为是社会民主党的敌人，但他们在抗议时却被资产阶级政党通过使用反对社会公众抗议时也同样使用的，有时看起来还特别疯狂的手段和方法所战胜。对于改善劳资关系、机器设备的保护措施、禁止使用童工以及保护妇女，至少在她们细心孕育下一代的时候要受到保护的所有尝试只是简单、愚蠢地进行拒绝，那么只会对社会民主党有所帮助，他们对此会感激不尽并卑鄙地想到这些人又落进了他们圈套。我们这些所谓的“政治”群众从来就没有把本来应该做好的事情干好。因为反对消除社会弊端尝试的结果也会带来社会矛盾，播种仇恨。而那些只有社会民主党才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断言无非都是在为自身进行辩解罢了。

首先要为工会的实际生存建立起道德基础，也就是政党一向都应具备的庞大的组织机构的道德基础。

在维也纳求学期间，不管我愿不愿意都得对工会问题发表看法。我认为这是社会民主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我的判断过于轻率，而且是错误的。

所以，我直截了当地拒绝加入工会。

但命运却在这个无法了结的重大问题上给我上了一课。

结果就是推翻了我的第一个判断。

有的工会被视为保障工人基本社会权利的手段，从而获得改善个人和工会自身生活水平的条件；而有的则被视为政党阶级斗争的工具。在我二十岁的时候，我学会了如何去分辨它们之间的区别。

社会民主党认识到工会运动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把工会当作工具，还认定会取得成功，但市民阶层对此却无法理解，社会民主党因而失去其政治地位。应当相信，用简单冒失的“拒绝”可以终止逻辑推论，而实际上却因此强行走上了非逻辑的歧途。那种认为工会运动本身是仇视祖国的观点是荒谬可笑和极其不正确的。正确的却恰恰与此相反。倘若工会运动重视民族基本生存地位的提高，并以此作为工会运动目标的

话，那就不仅不是祖国、或是国家的敌人，而且还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运动了。工会运动有助于建立社会基础，可要是没有普及国民教育的话，那就连想都不要去想了。所以它的最大作用就在于能够消除社会恶习和精神流毒乃至根除身体上的病因，而为民族健康的体魄做出贡献。

至于问到工会运动的必要性，那确实是很多余的。

只要在资本家当中有对社会知之甚少，或者极度缺乏公平合理意识的人存在，那么工会运动就不是什么权利的问题，而是资本家所雇用人员的义务的问题。这些雇员当然也是我们人民的一部分，所以他们的义务是为了防止个人的贪婪和愚昧而保护公众的利益；因为保持对全体人民的忠诚和信念和保护民族的利益同样重要，就如同保护人民的健康一样重要。

这两样重要的东西却受到了无耻资本家的严重威胁，而他们则不觉得自己是全体人民中的一员。他们的贪婪和冷酷无情所产生的恶劣后果对未来是一个严重的伤害。要消除此类事态发展的根源，为民族立下丰功伟绩，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

所以，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由于强加给他的实际存在的或者是可以避免的不合理要求就可以随意离开工会组织。不是的！这是在骗人，是在试图分散大家的注意力。为了民族的利益，要么消除这些不良的、反社会的事件，要么什么都不做。但如果要做的话，那么这样的战斗就应该以武力的方式进行，武器是可以为成功带来希望的。一个工人是绝对无法和资本家的强大势力进行对抗的，因为这里所涉及的不是强权胜利的问题，是在承认强权本身存在的条件下，由于缺乏任何理由而使得整个争论都无法进行，那么所涉及的则是更大权力的问题。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以正当方式进行的争论本身就把现实中的公正给终结了，或许还有更加正确的方式，但这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

不可能的！如果人们受到非社会的或不正当的对待就起来反抗，只要法律和司法机构不能解决，那这场斗争的胜负将由更高一级的权力来进行裁决。因此很清楚的就是，为了从一开始就不放弃胜利的可能性，由每一个工人组成的一方就要勇于面对由资本家组成的另一方。

所以，对工会组织在其日常生活的实际作用中能够使其成为一股强有力的社会思潮势力，从而消除那些一再引起不满和抱怨的根本因素。

把大部分责任都怪罪于那些对制定法律条例设置障碍的人是错误的，应该凭借工会组织的政治影响力重新针对社会弊端制定法律条例，以禁止社会不良行为的发生。

正是因为参加政治活动的民众对工会组织的意义不理解，或者说是愿意去理解，他们才会抵制工会运动，并且认为社会民主党是有争议的政治运动。而从长远来看，这样则建立起了一个多次证明在紧要关头仍可以作为最后依靠的坚实基础。当然为了达到新的目标，其自己的核心目标也因此而渐渐消失。

社会民主党从来就没有想到由他们自己组织具有最初使命的政治活动。

不，他们当然不是这样认为的。

在最近的十年里，社会民主党借助保护人权的名义私下里自己已经把工会运动变成破坏国民经济的工具了。工人的利益根本丝毫无法阻挡他们这样做。因为即使在政治上允许可以随时运用经济强制手段进行敲诈勒索，这一方面说明其何等肆无忌惮；而另一方则又充分表现出其多么的愚蠢可笑。

另外，这里还涉及到其它一些东西。

工会运动在本世纪初期就已经停止很长时间了。一年又一年过去了，而工会运动则越来越深地陷了社会民主党政治的误区中，到后来竟变成了专门为阶级斗争所使用的工具。工会运动应该通过不懈的努力投入到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经济体系和国家建设中，在摆脱了经济负担以后，能够让日子过得轻松一些。工人阶级需求的代表实际上很少考虑到为人民消除社会和文化贫困，包括政治方面的聪明才智对此也完全不再显示出有什么值得追求的表现；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满足了他们的愿望，不仅会带来危险，而且还无法永远继续利用这支意志薄弱的战斗队伍了。

可就是这种预期不好的发展却引起了那些主张阶级斗争的领导人

的恐惧，害怕他们最终会真的不假思索地拒绝有利于社会的每一个进步，是的，而且是以极其坚决的态度表示反对。

为了给这样不可理解的行为找出一个客观的理由，对此你们不要多虑。

人们对所提出的要求越是抱有较高的期待，很可能所达到的满足程度就会越低，所以也就显得无足轻重了，那么就要随时说服民众，告诉他们这仅仅只是一个荒诞的尝试。用这样如此可笑看似满足了最神圣权利的做法就削弱了，甚至可以说是废除了工人阶级的战斗力。仅仅靠民众这种愚钝的思维能力，难怪无法取得成功呢。

市民阶层对社会民主党所作所为的明显欺骗性表示愤怒，可是为整个行动策略又没有从中找出一点点的秘诀良策。而正是因为社会民主党害怕工人阶级从其文化和社会的苦难深处真正成长壮大起来，所以他们才尽最大努力确定目标：要逐渐从阶级斗争的代表人物手中夺回权力。

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

除了对敌人采取进攻的方式，最好还可以用压制和逼迫的办法；这样到最后还可以捞取全部微不足道的援助；如果行动晚了，则援助失去了作用，如果援助一旦无足轻重，则还可以轻易进行拒绝。这样实际和以前相比，只是不满的情绪比以往更加高涨。

同时，“自由工会”就像预示着暴风雨般的乌云漂浮在政治准则和个人意识之上。它就像可怕的恐怖利剑威胁着社会的安全、民族经济的独立、国家的荣誉以及个人的自由。

尤其特别的是，它不但没有工人意识，没有自由意识，认识得最清楚，以什么为不，和我们志趣迥合，就打碎你的脑袋。”

在那个时候，我懂得了什么是人类的友情。随着年代的流逝，我始终没有改变对它的认识，而且还在不断拓宽和加深对它的了解。

我对社会民主党的外在表现观察的越多，就越渴望了解其理论内涵。

当然，对此社会民主党的官方文献不会提供太多的资料。因为涉及经济方面的内容，要么结论不正确，要么论据不足；涉及政治方面的内容，谎话又太多。

因此，从心里我要特别有意避开那些强词夺理的表述方式和叙事形式。里面的句子都是由那些含混不清的字眼，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才胡乱拼凑起来的，本来还应该富含哲理，可结果却毫无意义。只有繁华都市的放荡生活所特有的糜烂、堕落才会愿意把理性的迷宫当成自己的家，为了从达达主义的泥潭中找出“内心生活”，这要依靠那众所周知的、我们一部分民众所具有的谦逊行为来支撑，从中可以看出那简直无法让人理解的深刻智慧的蛛丝马迹。

和社会民主党的真实外表相比，我分辨出其理论的虚假和荒谬，我自己也渐渐看清了其核心思想的本来面目。

在此期间，我渐渐预感到沮丧和可怕的恐惧。我所了解的学说充满了自私和仇恨。如果按照其法则进行推算的话，这种理论所要取得胜利的结果就是人类的终结。

同时，我还发现了这种毁灭性的学说和人类本质之间的联系，我在此之前并不十分了解。

光是对犹太人的了解就让我找到了理解社会民主党的本质和其真实意图的关键。

谁要是知道这个民族，在他的眼前就会垂下了一道假象的面纱，掩盖了社会民主党的目标和本质，穿过散布在社会上的空话、废话的轻云薄雾，显现出来的则是马克思主义丑恶嘴脸那狰狞的冷笑。

也许是根本不可能，对于我来说直到今天都很难讲，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接触到“犹太人”这个词，也并没有让我产生什么特殊的想法。我完全不记得父亲在世的时候向我提及过这个词。我想他老人家兴许是在提到什么特别落后文化的时候大概说过。父亲这一生或多或少见过世面，他不会有很强的民族意识，这对我也有所影响。

在学校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原因让我改变已有的印象。

在普通高中的时候，我曾经认识一个犹太男孩。我们注意到他，只是因为他沉默无语。根据以往所积累的经验，我们不会信任他。和别人一样，我也没有别的想法。

从 14 到 15 岁的时候，我才更多地听到“犹太人”这个词，基本上是在谈论有关政治方面内容的时候。虽然有点反感，但也没有什么不愉快的感觉。只有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进行争论时，我才有些感觉。

那时对这个问题也没有什么其它的看法。

在林兹这个地方生活的犹太人很少。几百年过去了，他们的外貌都已经欧洲化了，而且也变成欧洲人了。是的，我甚至还把他们当作是德国人呢。我还不知道这种联系是错误的，因为我唯一的辨别标准就是他们有另外的宗教信仰。他们之所以遭到迫害，我想，有时是因为针对他们的不利言论使我的厌恶很快变成了憎恨。

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有计划有组织的反犹太人团体的存在。

就是这样，我来到了维也纳。

我满脑子都充满了对建筑的痴迷，可生活的艰难也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所以我也无暇顾及生活在大都市中市民的社会阶层。虽然维也纳有二百万的人口，可我竟然不知道其中约有二十万的犹太人。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有许多重要的东西映入我的眼帘，我的脑海里涌出许多想法，让我无暇顾及其它的事情。当我心静下来，头脑中又重现往日的景象。我环顾四周打量这新的环境，也接触到了犹太人的问题。

我并不是想说我结识犹太人的方式方法对我来讲特别地轻松。我还认为犹太教只是另外一种宗教，所以由于人类自身的差异而拒绝宗教间的争斗也是正当的。和我的观点不同的是，特别是维也纳反对犹太人报纸《维也纳新闻报》的另一种论调则认为犹太教是一个伟大民族不光彩的文化遗产。这到让我想到了中世纪所发生的某些我不想再看到的事件。因为这类报纸大都没有什么声望，是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那些都是市民的妒忌心态产生出的基本观点所炮制的结果，当然好多都是错误的观点。

确实有名的报纸对于有攻击性言论都应该给予回应，我觉得采取这

样的方式很值得赞扬，我是这样认为的；另外更值得考虑的方式还可以干脆对此置之不理，保持沉默；我支持这样的观点。

我大量地阅读类似《世界新闻》的报刊，像《新自由报》，《维也纳日报》等，对其所提供给读者的广泛内容和客观的详细描述让我感到惊讶。我之所以尊重他们的观点，基本上是因为其感情奔放的风格，说心里话有时也不十分满意，感觉不太舒服。也许这是因为在这样一个世界性大都会的原因。

因为当时我就是这样看维也纳的，所以，我想这样的解释对我来说也许是一种托辞罢了。

但有一样常常令我生厌的东西就是报纸对宫廷谄媚的卑劣行径。几乎没有一件维也纳宫廷里发生的事情是不被报道的，让读者感到那令人陶醉的激情欢呼声，也能看到他们对震惊事件进行的指责。特别是在报道世上“最贤明的王朝”时那种装腔作势的姿态真好比是发情的松鸡。

我就看到了这种事情的发生。

在我看来，这就是自由民主主义的污浊之处。

以这种极不体面的方式讨好皇室宫廷，简直就是对民族尊严的背信弃义。

这就是“高尚的”维也纳新闻报刊在我心灵投下的阴影。

和往常一样，我在维也纳的时候仍然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在德国所发生的一切，不论是政治方面或是文化方面的事情。我以赞赏和骄傲的心情把德意志帝国的兴盛和奥地利的苟延残喘进行比较。如果在外交事务方面一般没有什么可以让人高兴的地方，那么在本来就无法让人开心的内政方面就更使人感到忧虑了。当时对威廉二世的抨击我是不赞成的，我不但认为他是德意志帝国的皇帝，并且首先还把他看作是德意志帝国海军的创始人。

帝国议会不允许皇帝进行演说，这件事让我非常气愤。因为在我看来，这是毫无理由的事情。那些议员们就像一群公鹅似地在议会开会时唠唠叨叨没完没了，比起历朝历代的皇帝，包括他们那些最不中用皇帝

所讲的话，他们讲的废话要多得多。这些议员才应该被禁止发言。

使我气愤的是，在这个国家里，就算是半个傻瓜都会对批评他自己的话题避而不谈；在议会里的那些“立法者”竟然攻击民众；而戴着皇冠的人反而被议会里最能唠叨的空谈家们给“驱逐”了。

更使我愤怒还有，那些平日里对皇宫里的那个老东西卑躬屈膝，极尽谄媚的维也纳新闻界偶尔也摇头摆尾地欢呼雀跃一番；而在我看来，现在他们似乎带着焦虑的表情，而反对德意志皇帝的言论则越发地欲盖弥彰。这是不是源自他们过去就想和德意志帝国合并的想法呢，不是，上帝可以作证。但是用如此友善的形式触及要害，那么就要满足双方联盟都非常想要的意愿所应担负的职责，等等，就像要满足新闻的真实性一样。而现在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痛击要害了。

这样的情景让我热血沸腾。这是我逐渐对主要新闻报刊仔细观察的结果。其中有一个名为《德意志人民报》的反犹太人的报纸，我得承认，它对此类事件的报道还算是比较公正的。

还让我烦躁不安的是那些当时主要报刊对法兰西令人生厌的狂热崇拜。当那种甜美的“伟大文明民族”的赞歌溢于言表时，作为一个德国人应该感到羞耻。这些卑鄙无耻吹捧法兰西的人经常让我想把这类世界新闻报纸不止一次地愤而丢到一边去。有时我只注意看《德意志人民报》的消息。当然这不是什么主要报刊，但我认为其内容要纯洁得多。那种尖刻的反犹太的报道我是不赞成的，在不断阅读了大量的论据后，也引起了自己的一些反思。

总之，出于这些原因，我慢慢地知道了当时决定维也纳命运的人和事：卡尔·吕格博士和基督教社会党。

当我到维也纳的时候，我和他们是敌对的，在我的眼里，这个人和他所领导运动都是“反动的”。

随着有机会对这个人和他的所作所为不断地进行了解，公平地讲，我过去的判断慢慢地改变了，反倒对他产生出合理和无法掩饰的钦佩。今天我要比以往更多地了解这位历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德国市长。

有多少观点可以把我蓄意转向基督教社会党政治运动的立场推翻

呢！如果把我反犹太主义的思想作为观念转变铺垫的话，也许这将是我非常重大的转变了。

这次的转变让我内心经受了最为激烈的斗争，我徘徊在理智和情感之间，一个月后理智终于取得了胜利。两年后我的情感追随我的理智，并成为其最忠诚的守卫者和警示者。在这心灵上的感化和冷峻的理智之间痛苦角力的时候，我在维也纳街头受到的实际教育给了我不可估量的贡献。因为我不再像最初的几天那样漫无目的地游荡在繁华都市的大街上，而是睁开眼睛，除了建筑物之外，我还观察人。

有一次，当我穿过市中心的时候，突然碰上一个好像是穿着长袍，长着黑色卷发的家伙。

“这是犹太人吗？”这是我的第一个反应。

林兹城中的犹太人并不是这样的。我小心翼翼地观察这个人，尽量长时间地注视他的脸，一点一滴地揣摩着、审视着，在我的脑海中不断闪出一个又一个的问题：“这是个德国人吗？”平时遇到这样的情况都试着用各种画面去消除疑惑。我平生第一次化了几个硬币去买了几本宣传反犹太人的小册子。很可惜这里面的观点原则上适合那些对犹太人问题略有所知或相当了解的读者。而其大部分的论调，同时也引起我怀疑的部分都是非常浅薄的，而且是没有科学论证的断言。

几个星期，简直是几个月我糊涂迷茫了。对于我来说，这个题目显然所涉及的范围太大，而要想找到论据可以说是漫无边际。这样的担心让我苦恼。又恐怕有失公允而忧心忡忡、缺乏自信了。

幸亏这不涉及到信奉某种特殊宗教的德意志人，而只是一个民族本身，我也不能有太大的疑虑；因为自从我开始关注犹太人问题，那我眼中的维也纳也好像成了另外的一个样子了。于是，我专门去能见到犹太人的地方。见的越多，就越能敏感地把他们从其他人中间分辨出来。尤其在市中心和多瑙河北部城区聚居着从外观上和德国人没有相似之处的民族。

如果对此还表示有什么怀疑的话，那么最终要消除我犹疑不定那感觉就是听取一部分犹太人的意见了。



犹太人大型的活动在维也纳不算很少，非常明显具有其民族特点的活动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只有一部分犹太人对此表示赞成，而大部分则表示认同，但内心里却表示拒绝；然而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种纷纷扰扰的表面现象隐藏在一种痛苦的迷雾中，它出于纯粹合理的理由来表达出一种借口，而不说成是谎言。因为自由主义思想的犹太人拒绝犹太复国主义并不是被看作为非犹太人，而是被看作为不切实际的，甚至也许是对其公开教义具有危险性的犹太人。

就其教义内含的相互联系来看并没有什么改变。所以犹太复国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的犹太人之间表面上的争斗使我十分生厌。这越发显得其不真实，也因此而爱说谎，这就和通常人们所认为的这个民族具有传统的高尚和纯洁都十分不相称。而这个民族传统的爱整洁的特点完全是他们自身的标志。这并不是说他们是爱水之人，从他们的外貌就可以看出，很可惜的是你最好闭着眼睛来看。以后我对这种关于穿长袍的人的谣传有时也感到厌恶。另外还有些关于他们衣着不整洁和缺乏英雄形象的谣传。这些事情并没有什么吸引力，而当人们从这个值得注意的民族不洁的身体上突然发现其道德的污浊之处时，那才真的叫人反感呢。

除了对犹太人在一些领域进行逐渐深入地了解，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我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陷入沉思。

还有没有，尤其是在文化生活方面，还有没有犹太人参与的坏事或是不管什么形式的无耻行径吗？一旦要仔细剖析这样的毒瘤，人们就会像发现腐烂尸体里的蛆虫一样，突然在耀眼的灯光下找到了一个犹太小东西。

当我知道犹太人在新闻、艺术、文学及戏剧方面的所作所为时，我眼中的犹太人就成了一个沉重的精神负担。至少用所有一本正经的掩饰都毫无意义。我们只须看看并且揣摩那些贴在广告柱上渐渐变干的宣传低劣粗俗电影和戏剧这类精神作品制造者的姓名就已经足够了。这就是瘟疫，是一种精神瘟疫，它比以前的黑死病还要可怕，因为这种瘟疫是

可以传染给人民的。天知道产生出并且扩散了多少这样的毒素！很明显，这类艺术品制造者的精神和道德水平愈低，其所影响的范围就会愈无边无际，直到这个家伙把这些脏东西像打弹弓一样甩到别人的脸上。

同时，还有要想到其数量的无限扩散；要想到既然大自然能让一尊歌德铜像生锈，那也可以很轻易地让成千上万个铜像锈迹斑斑；这些病菌携带者同样也可以毒害人民。

这很可怕，但不能视而不见，正是因为犹太人的的人口数量庞大，才导致这样屈辱的遭遇，从而显得他们出类拔萃。

应该从中挑一个出来吗？我开始仔细地检查大众艺术生活中这些肮脏作品创作人的名字。

结果反而比我现在对犹太人的观点还要糟糕。就算在情感上是百般地抗拒，那我的理智也不得不做出结论。实际上所有淫秽下流的文学作品、低级庸俗的艺术创作和愚蠢无聊的戏剧表演中的十分之九都应该由公众来承担责任，因为不到百分之一的居民对此听之任之，不予拒绝。本来就是这样。

即使是我喜欢的《世界新闻》，我也用这样的观点去审视。

我越是进行全面细致地探究，那就会发现以前对所接触对象的钦佩感在不断地降低。

这类报刊的写作风格简直让人无法忍受，内容在我看来可以用平淡无味、空话连篇来归结；所谓客观的描述比起真实的写作来看更像谎言，可作者恰恰正是犹太人。

这么多东西，我以前竟然没有看到。值得注意的还有另外一件事，这也是我以前所思考的，就是我要学会理解和领会。

新闻界的自由主义思想在我看来还有另外一个寓意，其以往进行攻击的论调以及保持沉默的作法向我揭示了其更聪明的手法，而不是下流的做派；他们对戏剧评论所写的美化性文章总是相对于犹太作者而言的，没有反对其他人的内容，但对德国人却是例外。对威廉二世长时间的冷嘲热讽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做法，就如同他们盛赞法国的文化和文明所做的那样。那些内容下流的小说应属于不正派的文学作品，里面所用

的语言在我看来就像一个外国人的，整个寓意对德国人来说很明显是有害的。这只能说明他们是故意的。

谁会对此感兴趣呢？这一切都是偶然发生的吗？我渐渐感到茫然。

我对其它一系列的事件的观察有了些进展。就像大部分犹太人所展示的以及我们所能看到的那样，这只是对道德和习俗的一般看法。

对此，大街上时常实际发生的真正可怕的场景倒给我上了一课。

在维也纳，要研究犹太人与卖淫、拐卖少女及更多的社会现象比起其它任何欧洲城市都更适宜，但也许法国南部的港口城市要除外。要是晚上你在维也纳的莱奥博特区走街串巷的话，不管你愿不愿意，到处都可以亲眼看到此类事情的发生，而对待这样的事情大部分的德国人都是很隐秘的。恐怕直到战争期间东部前线上才会觉察到士兵有类似的现象，但也只能说是觉察到。

犹太人善于做生意，这样的罪恶行当是令人愤慨的，是大都市的渣滓，而作为这种行当的领头人他们冷漠到近于无耻。当我第一次以这种方式去认识犹太人的时候，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现在我再也不避讳去进一步探讨犹太人的问题了，不，不会了，现在我愿意这样做。就如同在文化和艺术生活方面的所有流派和其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中学会去寻找犹太人的踪迹一样，我突然在一点上触及到了他们，至少我是这样估计的。

就像眼前拨开了迷雾，我认识到犹太人是社会民主党的头目，这样，我长期的内心斗争终于就此画上了句号。

在我和工人同志们的日常交往过程中，早已察觉到他们那令人吃惊的摇摆不定的态度，对于同样一个问题会出现不同的立场观点，而且时常在几天，甚至是几小时内就发生变化。我很难理解的是，仅仅从谈话来讲，他们总还是有一些合理的观点的，但突然间却没了主张，他们从大众中间所获取的观点也都失去了。这常常令人感到疑惑不解。当我讲了几个小时后终于相信了，这一下可真有突破并把糊涂的想法给澄清

了，心里还对取得的成功感到高兴；可转天我的痛苦又得从头开始；这一切都白费了。这种荒唐的想法就像一个不停的钟摆似地来回摆动着。

同时我认为：他们对自己的遭遇不满意，诅咒他们的命运经常受到打击；仇恨那些无情强迫他们忍受这种命运的资本家；谩骂那些对他们的处境视而不见的政府机构；他们抗议物价，上街游行，而所有这一切如果不冷静思考的话至少还可以理解。但让人无法理解的是，伴随这个民族无比的仇恨，他们却反倒因此去损毁自己的伟大、玷污自己的历史、恶意指伤自己著名的代表人物。

对自己的习俗、自己的家乡、自己的故土甚至那些无足轻重的东西进行攻击，这是很不正常的。

他们可以暂时从这种恶习中得到康复，也许只需要几天，最多也不过几个星期。假设以后可以皈依向好，那他也会变成一位老人家了。

但这不正常的行为重新又占据了他。我渐渐地知道了社会民主党的新闻大部分都被犹太人操纵着。我写这些情况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和其它报纸所报道的一样。也许有一件事应该引起注意：犹太人真正没有在一份报纸上为自己的民族进行呼吁，至少我所受到的教育和观点是这样的。

我强迫自己试着去读有关马克思主义方面的新闻报道，厌恶的心理在不断加重，而我还试着去结识此类下流坯的发行商。

按犹太人说的，从编辑开始下手。

我拿了很多随处可得的社会民主党的宣传册并找出作者的姓名：犹太人。我把所有领导人的姓名都标注出来；发现大部分竟然都是和“上帝的特选子民”有关的人员，如国会议员的代表或是工会的书记，什么组织的主席甚至还有大街上进行煽动的宣传员。同时总会呈现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像奥斯特里茨、大卫王、阿德勒和爱伦波根等等，这样的名字会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的。我现在明白了一件事：就是这个党，几个月来我一直和这些坏蛋们激烈地斗争着，可是党的领导权却差不多全落在一个外族的手里；而有幸聊以自慰的是我从内心里觉得终于知道了犹太人不是德国人。

现在才知道是谁在诱骗我们的民族。

我在维也纳已经呆了一年，并足以让我相信，要不是因为工人得不到更多的知识和更好的引导，他们是不会如此固执的。我渐渐了解他们的理论，并把它作为我战斗的武器。

我基本上总能够获得成功的。

为了挽救民众，应不惜在时间和耐心上做出重大牺牲。

可千万不要从其信仰中去拯救一个犹太人。

当时我还十分天真地想要给他们解释其学说中荒唐的地方，和周围为数不多的人讲得我口干舌燥，自以为这样做会让它们相信马克思主义错乱的思想是多么的腐败堕落。可我得到的结果正好相反，就好像越是认识到社会民主党理论的影响和作用正在消除，反而更加坚定了他们的决心。

我和犹太人争论得越多，就越更多地了解辩证法理论。起初他们还能顾及到反对者的无知，如果无法找到出路，那就干脆自己变得愚蠢起来；要是都不管用，那就只得不再去好好把问题弄懂，而是跳过去，临时找一个大家都容易接受的、不易引起争论的、但是本质又完全不同的问题，重新形成统一的结论，而实际上就是回避原来的问题，不求甚解的做法。不论在什么地方，要攻击此类忠实信徒，就要严防来自外界的唾骂，只要有所松懈，就必须在接下来的时候立即采取措施。真的要否定一个人，那你就必须先观察周围，看看有没有不同意见的人，我认为这已经就算是朝前走了一步了，而到第二天才会有惊人的事情发生呢。这个犹太人对昨天发生的事情几乎一点都不知道，照样还接着讲他过去胡作非为的事情，就像根本没有意外的事情发生一样，然后在热情激昂地谈论的时候会吃惊地发现，除了他的论断在前天就已经得到的证实外，他恐怕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我有时会站在那儿发呆。

不知道是钦佩他善辩的口才，还是他撒谎的本领。

我开始渐渐地讨厌他们了。

至少在我看来，这一切本来可以从一位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或至少是一个宣传员那里产生出一种善意的、对我们民族的爱。谁又能够因为魔鬼的诱惑去诅咒那不幸的灵魂呢？那谁又是这个善于狡辩和说谎的种族的首领呢，真把我给难住了！为了几分钟后自己的需要，刚刚做的许诺转眼就不承认，还张口歪曲事实，这样的人所取得的成功难道不是徒劳的吗！不，我了解犹太人越多，就更多地同情工人。

在我看来，最严重的过错不在于犹太人，而在于那些不愿意去同情工人，并且还不愿意按照铁一般严格的公平原则去帮助我们人民的儿子，给予工人所应得到的东西去痛击那些骗子和坏蛋。

现在受到生活经历的启发，我开始探寻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来源。我清楚地知道其影响力，这要归功于我在日常生活中的仔细观察，再通过我的想象力把结果描述出来。只不过问题是对于创始人来说其创作的结果是否还能像完稿时所看到的那样仍然浮现在眼前，或者他们自己本身就是胡思乱想的牺牲品。

我感觉两者都不是。

一种情况，这是每个思想家的一种义务，也许是为了阻止最坏情况的发生，他们不幸被运动推到了前沿；另一种情况，这种大众瘟疫的创始人想必就是一个真正的魔鬼；因为只有从这个创始人的脑袋里，而不是人的头脑里，才会逐渐形成这么一个有意义的计划，而其行动的最终结果必然是走向人类文化的崩溃和世界的毁灭。

在这种情况下，既要作最后的拯救，又要进行战斗。这里的战斗可以领会为利用各种武器、人类的精神、理智和意志，但不管是哪一个，只要得到命运之神的祝福就行。

所以，我现在开始加深了解这个学说的创始人，以便研究其运动的原理。我接近目标的速度比我当初大概估计的要快得多，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结果，多亏了我对犹太人问题的认识，虽然还不是很深刻。这样可以让我把现实和社会民主党创始人的空话理论进行比较，因为我学习过如何去理解犹太人的语言，这就告诉我怎样去隐瞒或者至少是掩饰

自己的想法；在字里行间是无法看到其真实目标的，但却是暗中隐藏其间的。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我内心所经历的、极大的、划时代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我从一个懦弱的世界公民变成了一个狂热的反犹太主义者。

但是我还要说的是，这也是最后一次说了，这是我内心深处积郁已久的想法愤然的迸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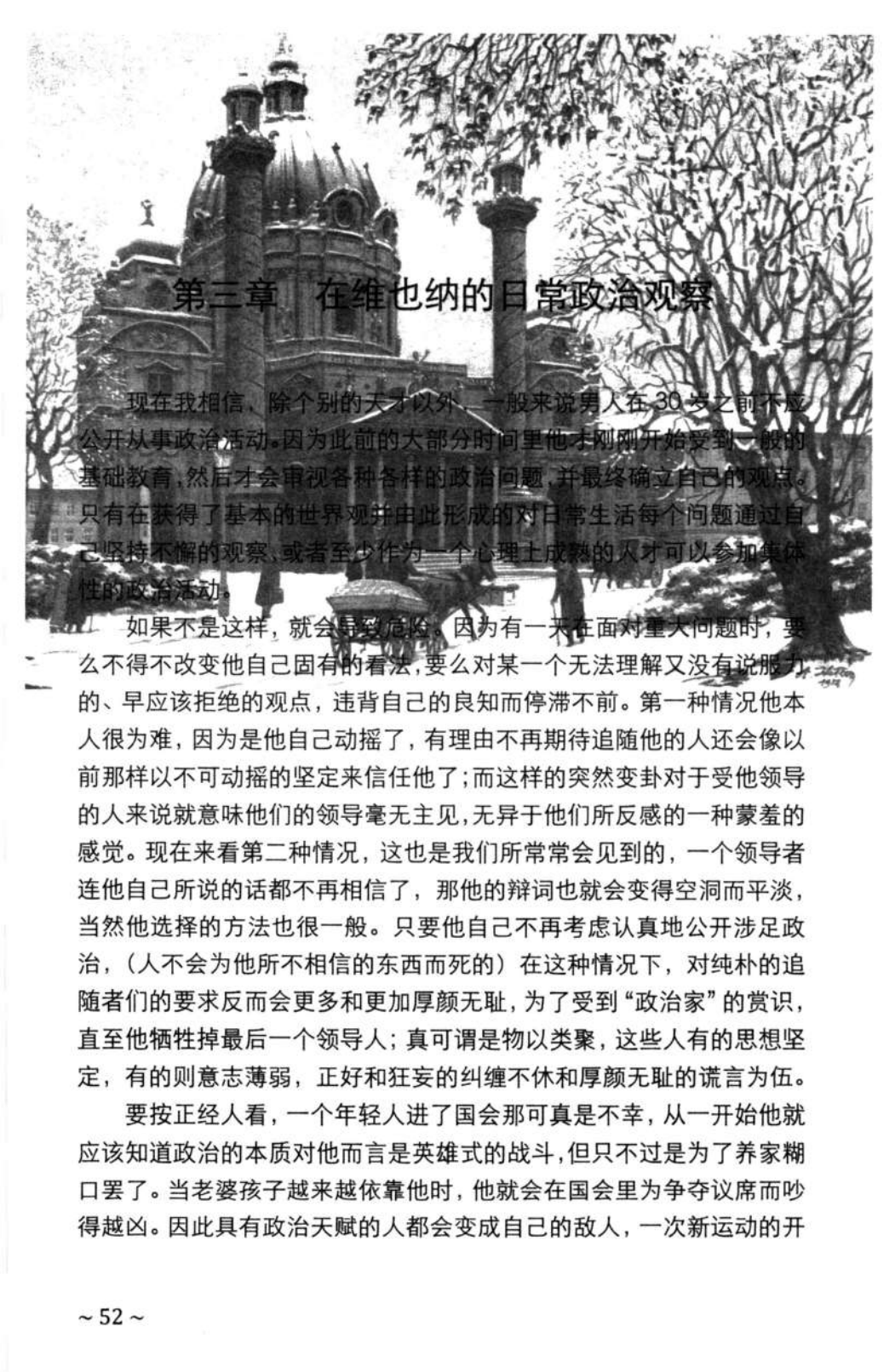
当我通过人类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以审视的眼光去观察犹太民族所产生影响的时候，一个问题突然让我恐惧不安，难道这也许是因为天命难测，才让我们这些可怜的人们默默无闻，才让这个弱小民族最后的胜利而遥遥无期吗？难道只把我们长期所生活的土地作为奖赏赐予我们吗？难道我们没有真正的权利去为自我生存而战斗吗，或者说这只是我们的主观意念？随着我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深入了解，便可清晰地注意到犹太民族的影响力的确是贯穿其中的，其命运本身就给出了答案。

马克思主义的犹太学说摒弃了人类的高贵准则，并以人口数量和毫无意义的重要性作为永恒的优先权取而代之。它否定人类社会中的个人价值，狡辩民族和种族的含义，抹杀人类的本质，并以其作为人类自身存在和文化创造的前提。它认为这才是宇宙万物存在的基础，而最终是人类在思想上所能认可的人类社会制度的基础。并且这样一个显而易见如此庞大的组织机构靠这样的法则来进行运转的话，其结果必然是混乱不堪，那么宇宙中地球上的人类也就走向自己的消亡。

要是犹太人靠马克思主义信条战胜了世界人民，那么这顶胜利的桂冠将是全人类的坟墓，而后地球就会像数百万年前一样再次变得荒无人烟在太空中翱翔。

永恒的大自然会无情地惩罚逾越其戒律的人。

所以，现在我确信要遵循万能上帝的意愿抵抗犹太人，为上帝的事业而奋斗。



第三章 在维也纳的日常政治观察

现在我相信，除个别的天才以外，一般来说男人在30岁之前不应公开从事政治活动。因为此前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才刚刚开始受到一般的基础教育，然后才会审视各种各样的政治问题，并最终确立自己的观点。只有在获得了基本的世界观并由此形成的对日常生活每个问题通过自己坚持不懈的观察、或者至少作为一个心理上成熟的人才可以参加集体性的政治活动。

如果不是这样，就会导致危险。因为有一天在面对重大问题时，要么不得不改变他自己固有的看法，要么对某一个无法理解又没有说服力的、早应该拒绝的观点，违背自己的良知而停滞不前。第一种情况他本人很为难，因为是他自己动摇了，有理由不再期待追随他的人还会像以前那样以不可动摇的坚定来信任他了；而这样的突然变卦对于受他领导的人来说就意味他们的领导毫无主见，无异于他们所反感的一种蒙羞的感觉。现在来看第二种情况，这也是我们所常常会见到的，一个领导者连他自己所说的话都不再相信了，那他的辩词也就会变得空洞而平淡，当然他选择的方法也很一般。只要他自己不再考虑认真地公开涉足政治，（人不会为他所不相信的东西而死的）在这种情况下，对纯朴的追随者们的要求反而会更多和更加厚颜无耻，为了受到“政治家”的赏识，直至他牺牲掉最后一个领导人；真可谓是物以类聚，这些人有的思想坚定，有的则意志薄弱，正好和狂妄的纠缠不休和厚颜无耻的谎言为伍。

要按正经人看，一个年轻人进了国会那可真是不幸，从一开始他就应该知道政治的本质对他而言是英雄式的战斗，但只不过是為了养家糊口罢了。当老婆孩子越来越依靠他时，他就会在国会里为争夺议席而吵得越凶。因此具有政治天赋的人都会变成自己的敌人，一次新运动的开

始时他就在推测结果，一个职位较高的人也被他视为是潜在的威胁。

我还会全面地谈到这一类人，他们就是议会里的臭虫。

这个三十岁的年轻人在他的一生中还有许多东西要学，即使只是为了增加和补充一些涉及世界观的基本知识。原则上并不是改变观念，而是让他增加学习内容，他的追随者也不必对他所教的错误内容有压抑的感觉，而是相反：他们对领导人的明显成长感到满意，而且他所学的东西也正好加深对自己学说的理解。在他们看来这样才可以证明他们现有世界观的正确性。

一个领导者如果认识到他的世界观基本出发点是错误的，从现有的认识中知道错误并得出最终的推断时，那就必须体面地放弃。在这种情况下，他至少应该推掉其它一些公开从事的政治活动。当他第一次认识到陷入迷茫，那就会有第二次这种情况的出现。绝对不要利用其追随者对他的信任或着要求对他信任。

今天像这样正派的人简直太少了，看看那些道德败坏的流氓无赖就可以得到证实，这些人还感到自己有责任去“从事”政治活动。

而要从他们中选出好的几乎一个都没有。

和其它事情相比，尽管我认为应该从事政治，但我还是曾经回避公开露面。只有和很少的人我才谈到我的内心活动和吸引我的东西。在很小的范围里的谈话我得到了许多好的东西：我学会了尽量少“说”，以便能更多地深入了解别人最根本的想法和反对意见。同时这样就不失时机地锻炼我自己，把它当作是一种培训。而在德国像这样有利的机会是别的地方所没有的，比如在维也纳。

一般来说，这个位于多瑙河畔旧帝国的政治思想的影响范围比同时代的德国要强烈和广泛得多，但不包括普鲁士、汉堡及北海沿岸地区。所以我把现在称为“奥地利”的地方看作是属于强大的哈布斯堡帝国的，这完全不是因为德意志人在历史上出于建立国家的原因在那里定居，而是他们展示出了一种特有的力量，一种想要把几百年来精神文化生活赋予这个政治上如此虚假的国家的力量。时代越是向前发展，就越显示

出奥地利的存在和未来是依赖于德意志帝国生命的存在。

这个古老的世袭领地是帝国的核心，它要为国家及文化的生存输送新鲜的血液，就像维也纳是大脑和意志一样。

这个城市从其外观的装潢就能让人感到一种力量，尽管这个多民族帝国有一位加冕的国王，那也不过是用自己华丽辉煌的美丽来忘却整体衰败的丑陋。

难道这个帝国还想通过对一个个民族的血腥战争或是和外国，特别是指和德国的战争从其内部重新振作起来吗，只要看看这个城市可爱的面貌就知道了。当维也纳在此期间好像是取得了兴许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繁荣时，而失落感也极大地呈现出来。这座旧帝国皇宫的所在地是在一个真正天才的市长管制下，久负盛名的维也纳再一次焕发出奇异的年轻生命。这位在帝国东部殖民地出生的最伟大的德国人不能正式被称为是所谓的“政治家”；但就在吕格博士担任市长期间的帝国首都、皇宫所在地的维也纳则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空前成就，可以说，他奇迹般地给所有地区制定经济和文化政策，他强化了整个帝国心脏的作用，就这样他经过曲折渐渐地成为了伟大的政治家，堪比当时所谓的“外交家”们所做的一切。

如果这个由多民族组成的，被称为“奥地利”的国家最终还是走向毁灭的话，那至少不会影响到在东部帝国德意志民族的政治力量，而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一千万人不可能永远维持一个由多个不同民族组成的，有五千万人口的国家，况且还不完全具备一定的条件。

但德籍奥地利人却想得很多。

他们习惯于生活在大帝国里，因而有种无法割舍的责任感。他们虽然身处在狭小的王室领地，但还可以望到帝国的边界；是的，虽然命运将他们和祖国分离，但他们仍然试图成为重大历史使命的主人，为了德意志民族保存其先辈们经过无数次战斗在东部地区所获得的土地。同时还要想到这只不过是一部分的力量而已，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心系祖国和共同的思念是不会停止的，余下的才是对故乡的情感。

在奥地利的德国人的眼界一般地来讲要比较开阔。他们的经济活动

几乎涉及到帝国的各个方面。差不多所有真正的大型产业完全在他们的掌握之中。重要的技术专家和管理人员大多由他们来担任。他们也是对外贸易的顶梁柱，而不是让犹太人来染指这个领域。在政治上他们维护着国家的完整。服役期间他们参军保卫自己的家乡。奥地利的德国新兵兴许也可以到德国军团里入伍，也同样可以驻扎在波黑地区，就像驻扎在维也纳或是加里西亚一样。军官仍旧是德国人，尤其是高级军官更是如此。艺术和科学到底都还是德国的。除了新近发展艺术中那些只有从黑人那里才能产生出来的低级庸俗的东西，只有德国人才拥有和传播真正的艺术思想。在音乐、建筑、雕刻和绘画方面，维也纳就像取之不尽、永不枯竭的源泉滋润着整个二元君主制帝国。

德国人还应该掌管全部的外交政策，不过也有少数的匈牙利人在内罢了。

要想维持这个帝国的任何企图都是徒劳的，因为缺乏最重要的一个条件。

对奥地利来讲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要战胜民族分离主义力量。这个国家要么由中央政府统治，其内部也由中央机构进行管理，要么就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在大多头脑清醒的时刻，圣明的决断能达到“至高无上”的地步，可大部分转眼间就给忘掉或者是因为难以实施而放到一边儿去了。每一项促进帝国联盟的建议都难免因为得不到国家权力核心强有力的支持而受挫。这主要还因为奥地利那些反对德意志俾斯麦宪法的国家内部陈列。在德国只是在政治上进行争斗，而文化传统则是一切事物的基础铺垫。尤其在德意志帝国，除少数一些外国人以外基本上是一个民族。

而这样的情况在奥地利则正好相反。

按照政治上的轮廓还能想起各个国家的国土面积大小，除匈牙利以外，要么完全没有了，要么被时间给抹去了，至少是消失了或模糊不清了。因此在民族发展时代，民族的力量在不断壮大，而其取胜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变得十分艰难，因为它正好处在君主制民族国家开始建立的关键时刻，其国内凡是在种族上和奥地利少数民族同根同源的各个

民族现在都试图更多地利用自身魅力,相反德籍奥地利人也有可能这样做。

维也纳自己却不能长期经受得住这场争斗。

随着布达佩斯发展成为一个大都市也就第一次带来了相互之间的攀比,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整个王朝的团结,而更多的是加强了王朝中的部分势力。不久后,布拉格就会仿效布达佩斯的先例,然后接下来是利沃夫、卢布尔雅那等等其它城市的兴起。以往的省府城市一跃成为国家首都的同时也相应形成了越来越多的特有的文化生活中心。由此,民族政治也才能够获得精神基础和得到加强。各个民族的推动力比普通利益的力量要更加强烈,这种变化将要在奥地利发生的时刻渐渐临近了。

自从约瑟夫二世逝世以后,这种变化过程就显而易见地表现了出来。其变化速度之快取决于一系列的因素。这些因素一部分来自帝国本身,而另一部分则是因为帝国当时的外交立场所导致的结果。

要想为国家的生存进行战斗并坚持到底,那只有坚定地长期坚持把建立中央集权制作为目标。然后必须首先要通过制定统一官方语言的基本原则,来强调纯粹形式上的整体性,为此,行政管理是技术方面的辅助手段,没有这些,统一的国家就不会存在。而且通过学校授课教育才能将统一的国家观念进行传播。这并不是在十年或二十年就可以达到的,恐怕估计要上百年的时间,和所有殖民问题一样,坚持不懈比只顾眼前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不论实行管理,还是政治领导工作都要严格统一地进行,这是不言而喻的。

要想确切地知道为什么这种情况没有发生,或者更明白地讲,为什么人们不愿意这样做,对我来说会受益匪浅。原因只是帝国的衰落导致帝国的崩溃。

以前的奥地利就其领导地位来说会让你把它和另外的国家联系起来。正是因为缺乏作为民族国家的基础,而民族国家则需要维护民族的

力量，即使是其领导机构常常还不听使唤。让人吃惊的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由于其民众天生的懒惰散漫和与此相关的抵触情绪有时反而能够忍受长期的弊政而不至于从内部走向衰亡。就好像是在一个躯体内毫无生命的迹象，好像已经死亡或失去知觉，而这个假死的人又突然振作起来，显示出他那永不消亡的令人惊奇的人类生命力，这也是常见的事。

但要维持一个由不同民族组成的帝国，就不能依靠相同的血统，而更需要的则是联合起来的力量。统治者的软弱不应导致国家的萎靡不振，而是有理由唤起每个人的本能意识并得以发挥，而这在血腥压制和强加意志时代是无法做到的。只有通过上百年统一的教育、相同的传统、共同的利益等等才能削弱这种危险。因此，像这样建立国家的人越是年轻，就越要仰仗领袖人物的崇高地位，而这些杰出的暴君和精神领袖常常在其创始人死后再次摧毁掉。但是又过了一百年后，一旦其统治所暴露出的弱点，教育的影响力和传统的伟大地位都不再能够抵御日益凸显的对生活各种各样不同方式的渴望，这样的危险就不可以再次被战胜了，他们就会从酣睡中里突然醒来。

不明白这个道理，恐怕是哈布斯堡皇室可悲的失误。

命运之神唯独为他们再一次高高举起了火炬照耀那生命的未来，而后立刻就永远地熄灭了。

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十分不安地注意到帝国周边地区所受到的威胁，如果不在最后时刻及时弥补其先辈的过失，那势必会陷于民族纷争的漩涡之中。这位“人类的朋友”用他那超人的力量治理其先辈的疏忽大意，并试图在十年内努力去补救此前数百年间所耽误的事情。如果上天赐予他四十年的时间从事这项工作，并且其后的两代人也以同样方式继续他已开创的事业，那么也许奇迹会真的可以发生。但他执政还不到十年就耗尽了体力和精力，他去世了，他的事业也随着他一起被埋葬，永远长眠在墓穴里，不会再复活了。

而他的继承者不论在精神上，还是在意愿上都没有继承并发扬这个遗志。

现在新时代的革命烽火首次席卷欧洲，在奥地利也逐渐有星火闪烁。当火势渐渐蔓延开来，火焰的炽热很少可以用社会、团体或一般的政治缘由来煽动得起来的，更多的则是源自于民族的推动力。

1848年的革命到处都是阶级斗争，可在奥地利却是民族斗争的新开端。当时的德国人对于这一点不知是忘记了，或是没有意识到就去参加了革命起义，因而就注定了其自身的命运。这样反倒给西方民主精神的觉醒帮了忙，而自身生存基础却在短时间内让这种精神来了个釜底抽薪。

在没有确定使用一种共同语言的情况下就组成议会，这就给德意志民族在这个皇朝时代的统治地位奠定了走向终结的基石。而此刻国家本身也随之消失了。接下来的一切那就只是帝国历史的演变了。

关注这样的消亡过程，不仅触目惊心，而且大有启发。历史判决的详细过程可以有千差万别。大部分人经过帝国崩溃而迅速改变观念的现象就能证明奥地利的消亡是上帝的意愿。

对此我不愿意进行详细赘述，因为这并不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我只想全面地观察事件的整个过程，作为民族和国家衰败的原因，即使是对我们当今时代也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有助于确保为我的政治思维方式打下基础。

很明显，就连那些普通的小市民不需要用敏锐的目光都能得见，奥地利的君主制度被这些国家机构腐蚀着，而其中高高在上的就是由他们大部分自己称为权力象征的议会，或在奥地利称为帝国议会。

显然，这种组织模式来自英国，那个播种了古典“民主主义”的国家。从那里人们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制度，又一成不变毫无保留地带到了维也纳。

英国实行两院制，分上院和下院。但两院本身有不同之处。

当贝瑞先生在泰晤士河岸边建造议会大厦的时候，他是从大英帝国的历史中就地取材，用了一千二百个壁龛、支架和立柱来装点他那富丽堂皇的建筑。在雕塑和绘画方面，这座英雄和人民的礼堂已成为民族荣耀的圣殿。

这在维也纳却是最先面临的一道难题。因为当一个名叫汉森的丹麦人最后完成了新国会大厦大理石的外墙时，除了用古典风格的装饰材料外，他就没有剩下什么东西可以用了。于是就只得用罗马和希腊的政治家、哲学家的肖像来当装饰品，真是一座荒唐可笑的“西方民主”式的建筑模型。具有讥讽意味的是，国会大厦两边侧翼上方的胜利女神雕塑所驾驭的战车都是各自朝着天空的四个方向，这样就把当时人们内心和外来的激情都以最好的形式表达了出来。

这座建筑对奥地利的“各族人民”来说简直就是侮辱和挑衅，但却在奥地利的历史上还获得了殊荣。就像在德意志帝国，只有在世界大战的隆隆炮声中才敢把“献给德意志人民”的题词刻在瓦洛特所设计的国会大厦的墙上。

在我还不到 20 岁的时候，第一次走进了弗朗茨环城大道旁这座华丽的建筑，作为观众和听众去列席下院会议。当时，我就有一种极不愉快的感觉。

从那一刻起我就很讨厌议会，但并不是完全讨厌这机构本身。恰恰相反，作为一个确实感觉灵敏的人，我根本想象不到政府还会是这个样子。从我对哈布斯堡皇室的立场出发，任何一种专制思想在我看来都是违背自由和理性的犯罪。

也许我自己还不知道，把那些英国国会赞美之词灌输给一个像我这样喜欢读报的年轻人不是没有什么作用，也许还不会轻易地忘掉。议会下院恪守其职时所持有的那种庄重威严让我钦佩（正如我们的新闻界所美化的那样）。还会有像这样的一个优秀民族自治政府的样子吗？可正因为如此，我才是奥地利议会的敌人。我认为他们的行为表现完全是对高贵形象的不尊重。另外还有：奥地利的德国人的命运则依赖于他们在国会中的地位。在实行普遍无记名选举法之前，德国人仍旧在国会中占据还并不算明显的优势。这种状况令人担忧，原因是由于社会民主党在民族问题上不负责任的态度，在涉及到德国人的问题上，为了不让各个少数民族的追随者背离自己，总是跳出来反对德国人所提出的要求。社会民主党在当时就不能再看成是德国人的政党了。随着普遍选举法的实

施，德国人在纯数字统计上的优势已不复存在了。这时，国家进一步的非德意志化就已到了无法阻挡的地步了。

出于民族自我生存的意愿，我因此就很不喜欢议会制，因为它不但不能代表，反而常常背叛德意志民族。和许多其它的缺憾一样，这并不能不怪事情本身，而要归罪于奥地利这个国家。以前我还以为要是德国人如果能够在国会中重新获得多数，只要这个国家还能依旧继续存在下去，那么在原则上也就没有反对它的理由了。

当我第一次走进议会时，从内心来说立即感到庄严神圣，可又觉得矛盾重重。我之所以感到其神圣只是因为这庄严的建筑本身所固有的华丽。真希望这座古希腊式的建筑奇迹也能矗立在德国的土地上。

没过多久，当我看到有好几百名议员为一个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问题进行表决时候，其可耻的行径在我眼前一幕幕上演的时候，我立刻愤怒了！

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足够让我思索好几个星期的了。

有几位议员先生并不讲德语，而是讲他们的斯拉夫母语或者就是讲方言；只要人们还能听得懂，精神上所要表达的内涵通常要“高于”平庸的表述。我以前通过读报所知道的东西，现在真是有幸用自己的耳朵来听一下。真是一群手舞足蹈、装模作样、乱喊乱叫的乌合之众；其中还有一个和善的老伯伯，只见他满脸是汗，使劲地摇着铃，一会儿劝慰劝慰这个，一会儿又提醒提醒那个，高声大噪地想试图恢复议会的肃静。我觉得真是可笑。

几个星期后，我又来到了议院。眼前的情景完全变了样，根本认不出来了。大厅里空无一人。人们都在下边睡觉。有几个议员在他们的座位上打着哈欠。有一个议员在“演讲”。一个议院副议长也在场，百无聊赖地望着大厅里的一切。

我开始有些疑虑。这时候只要给我机会，我就会离开这里去仔细看我应该看的场景，去听那些应该听得懂的演讲，去研究这个悲惨国家中那些或多或少还能代表这个民族，还有些聪明相的面孔。这样逐渐有了自己的想法。

通过这一年仔细地观察已经足以完全地改变或消除了我从前对这个议会机构和其本质的看法。我从心里不再反对这个畸形的、但在奥地利却得到认可的议会形式了。不，我不认为议会是像这个样子的。我认为因为缺少德国人的多数议席实在是奥地利议会的不幸。所以现在我看到了这个机构从整个形式和本质上的灾难。

当时我的脑子里产生出了一系列的问题。

我开始了解作为这个机构基础的多数表决的民主原则，同时也没有松懈对作为民族精英的议员们所应致力于的精神和道德价值的细心观察。

因而，我同时还结识了一些组织机构和它们的领导人。

这几年我认识和了解到新时代最值得尊重的、明显是人为制造的典型形象就是：国会议员。并以一种本质上不再改变的形象刻在我的脑海里。

这一次又是现实生活直接教育了我，没有让我误入一种理论窒息而死，这种理论粗看起来非常诱人、而实际上依旧却可以看作是人类衰亡的征兆。

现代西方的民主主义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前身。如果没有它，马克思主义恐怕连想都不要想。正是民主主义思想才为这场世界性瘟疫提供了温床并由此而得以扩散。而议会制度作为其外在表现形式，它还制造出“可笑的污秽和火焰”，很遗憾，我感到现在这“火焰”似乎已经灰飞烟灭了。

真得感谢上天能让我在维也纳来验证这个问题，因为当时我担心如果是在德国的话，恐怕会过于轻率地做出回答。假如我一开始是在柏林知道到这个被称为“议会”的、可笑的地方的话，我大概会反对，并且自己不会没有正当理由地站到那些只把民族和帝国的幸福视为对皇权思想的有力支持，而对时代和人类的幸福则采取排斥或视而不见态度的人们的一边。

这在奥地利是不可能的。

这里的人们不会轻易地就能从一个错误陷入到另一个错误的。如果说议会是个没有用的东西，那么哈布斯堡王朝就更加没有价值了，绝对没有。在这里只是拒绝采用“议会制度”等于什么都没有做；因为仍然还有问题没有解决：现在怎么办？作为唯一的政府权力机构，拒绝和废除国会只能把哈布斯堡王朝保留下来。而这恰恰是我特别不能容忍的做法。

这种特殊情况的复杂性使得我要全面地来研究这个问题，这好像是近几年才发生的事情。

首先应该更多需要考虑的是每个人明显缺乏的责任心。

议会可以做出任何决议，那怕其结果也许是灾难性的。没有人对此负责，也不会追究任何人的责任。难道所谓负责就意味着国家崩溃而有罪的政府下台吗？或者是联合政府发生变化，那么议会就应该解散吗？

一个摇摆不定的大多数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负起责任来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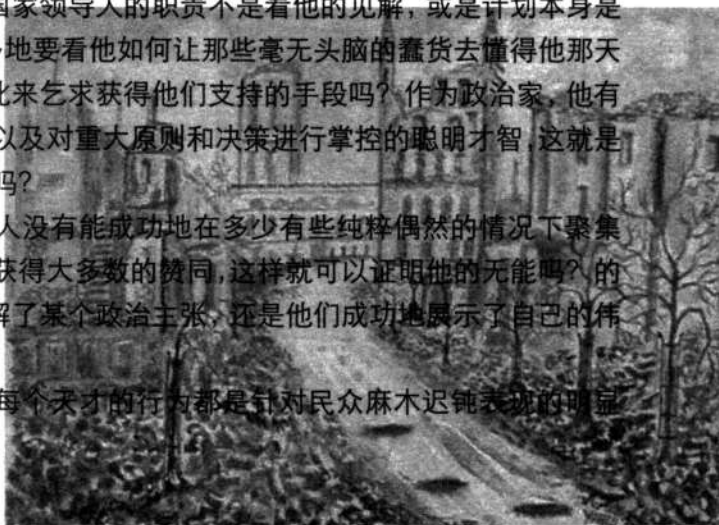
每个负责任的想法都要和个人联系在一起吗？

不论是他将要作的，还是他正在作的，特别是在涉及到大多数人意愿和同情心的时候，实际上谁又能够确保让一个政府的领导人对他的所作所为负责呢？

或者说：难道国家领导人的职责不是看他的见解，或是计划本身是否有创造性，而更多地要看他如何让那些毫无头脑的蠢货去懂得他那天才般的构思，并以此来乞求获得他们支持的手段吗？作为政治家，他有极其高超的说服力以及对重大原则和决策进行掌控的聪明才智，这就是评判政治家的标准吗？

如果一个领导人没有能成功地在多少有些纯粹偶然的情况下聚集起来的一群人当中获得大多数的赞同，这样就可以证明他的无能吗？的确，这一群人是理解了某个政治主张，还是他们成功地展示了自己的伟大呢？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天才的行为都是针对民众麻木迟钝表现的明显



抗议吗？

当政治家不能为他的方案争取到民众认可的时候，他应当做些什么呢？

他应当收买他们吗？

或者，面对国人的愚昧，他到底是应该放弃实施他那生死攸关的方案而退下来呢，还是应该坚持下去？

在这样的实际情况下，难道在认识能力和高尚情操，或者与正当的观念之间就只能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吗？那么普遍义务与个人荣誉所应承担责任的界线又在哪里呢？难道真正的领导人都要以这样的方式来避免退变为政治投机分子吗？难道不应该反过来说，政治投机分子感觉到自己应该去“搞”政治，因为他永远不会去承担最终的责任，而是由一些不沾边的人来承担吗？我们议会的多数原则难道不是在完全破坏领袖的思想吗？

人类世界的进步是大多数人智慧的结果，而不是源自个别人的智力，这个你相信吗？

人们错误地认为，考虑到未来或许可以不要人类文明这个前提？而在今天这个前提不是正好反过来要比以往显得更有必要吗？

议会多数表决的原则拒绝个人权威，而是用一群人的数量来取而代之。这就违背了自然界高贵统治的基本概念。同时，这种基本概念根本就没有必要在我们今天颓废的上层人物中有所体现。

这个现代民主议会制的建立起到了怎样的破坏作用，要是还没有学会独立思考和审视问题的话，那么犹太报纸的读者是很难去想象的。首先难以置信是因为整个政治生活被当今社会中最卑劣的表面现象所淹没。而大部分政治活动不是在进行创造性的劳动和工作，而是为了获得多数人的支持所进行的讨价还价的交易，这样才符合小人物的心态并具有吸引力，因而真正的领袖才退出了政治活动。

比如一个精神空虚、体力羸弱如同侏儒一样的皮货商，他对自己现实生活中的苦难反而会有更加清楚的认识。那么有了一种根本就不需要

他具有巨人般的力量和天分、差不多将就能和一个村官、就像伯里克利一样的智力水平的制度，那他会更加赞赏。这样的一个小人物不用操心对他的工作需要担负什么责任。他已经完全摆脱了这种忧虑，因为他非常清楚地知道，反正和他那些“政治家”的马马虎虎的结果一样，他的结果早已是上天注定的：早晚有一天他得为另一个同样伟大的人让出位置来的。这就是衰落，其标志就是一边是政治家的大量涌现而另一边则是政治家个人准则的降低。由于总要依赖议会的多数，他反而变得越来越渺小，因为大人物拒绝成为无能的傻瓜和夸夸其谈的人，反过来多数的代表，也就是愚蠢的代表都非常讨厌用头脑思考的人。

对于议会的议员们来说，知道最高领导人的才智水平与其他与会者相当，这总算是得到了一种安慰。因为这可以让每个人都能体验一下他的精神偶尔也会有闪光的喜悦，既然叫海茵茨的可以做主，难道叫彼得的就不能也做一回主吗？

捏造出民主这个东西最终会让人形成羞愧的性格，也就是我们大部分所谓“领导人”的懦弱性格。实际上在做重大决策的时候，要是能够隐藏在一个所谓多数派的背后该有多么幸运啊！看看这些政客们，为了乞求获得多数人的赞同他们是怎样地小心处事；为了保住同伙，他们又是如何地随时推卸责任；同时又是怎样地沾染上那些不愿为个人行为来承担责任，反而要逃避责任的胆小鬼的可耻本性；出于这些主要的原因，正派、勇敢的人必然会反对和憎恨这样的政治活动。如果一个国家领导人都是这样的可怜虫，不久他们就会遭到恶报的。以后人们再也没有勇气去做出果断的行动了，人们宁可忍受屈辱，也不会下决心做什么决定；那就再也不会有人准备为实施大胆的决策而献出自己和他的头颅。

因为不应该、也不能够忘记的一点是：多数在这里也不能代替“所有人”。多数不仅往往代表愚蠢，而且还代表懦弱。一百个笨蛋里也未必能找得出一个聪明人；一百个懦夫也未必顶得上一个勇士所下的决心。

每个领导人承担的责任越轻，那么在最艰难的情况下，自己感到有

使命感的人数就会增加，也就是说为国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力军。是的，他们甚至还急不可待地要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他们站在长长的队伍中间，焦躁不安地数着等在他们前面的人数，估算着轮到他们自己的那个时刻。因而他们渴望着他前面位置的变动，感谢缩短他前面队伍的任何一次丑闻事件。要是还不愿意从一个让人反感的位置离开的话，他们会认为这如同撕毁了共同结盟的神圣协定。到时他们会变得很凶，并且很难再安静下来，直到那个无耻的家伙最后被赶走、把他坐热了的地方重新让大家使用为止。而他也不会很快重新得到这个位置了。只要有一个这样的家伙被迫放弃他的位置，只要其他人不断的叫喊和辱骂阻挡不了他，他又会再试图插进排队等候的行列中去的。

在这样的国家体制下，接下来所发生就是其最重要部门和职位的快速变动，而这一切都会导致很不利的、有时简直是灾难性的后果。因为这样牺牲掉的不仅是那些蠢材和不称职的人，甚至真正的领袖会做出更大的牺牲，真该感谢上天还能有这样的人留在这个职位上。要能认识到这一点的话，特别是当某个家伙自己不排队，反而还胆敢挤进上流社会的时候，他们便会立即组成一个完整的防御战线。人们通常只想呆在自己人中间，并且把那个自以为是的家伙当作共同的敌人来憎恨。所以在这一点上，他的直觉越敏感，越容易被别人所忽略。

接下来就是领导阶层的精神匮乏越来越多地蔓延开来。只要他自己不是属于“领袖”这类的人，那他就会估计出这样对民族和国家将会是个怎样的结果。

过去奥地利还只能通过议会单单在文化方面进行统治。

尽管那些部长们都是由皇帝和国王任命的，但这些任命和执行议会的要求没有什么两样。对每个部长职位的讨价还价、明争暗斗都纯粹是西方民主的东西。结果无非是符合实用性原则。特别是在人员变更方面，任职时间越来越短，到最后简直就像把人赶下台一样。这样“政治家”的伟大不断被降低，到最后议会里就只剩下政治投机分子这样的小人，而他们的政治才能只有根据工作能力来进行评价和得到承认，这样就可

以成功地依靠和其他政治力量的联合进行最卑劣的政治交易，并以此来当作考核议员实际工作能力的依据。

要观察这个方面的实例，维也纳应该推荐为最好的学习场所。

还有很吸引我的东西就是如何将人民代表的实际才能、知识水平以及所应具备的责任感来进行比较。不管是否愿意，大家都想对人民中所选出的优秀分子的思想水平不再完全回避地倾注必要的关注，而且还包括我们对公共生活漂亮外表的整个揭秘过程。

这些议员先生们为祖国效劳的实际才能的表现方式和使用方法，还有操作过程都值得全面地进行调查和审查。

议会活动的整个画面越是显得糟糕，就越能促使人们决心要对其内部关系一探究竟，对个人和实际依据以极其客观的态度去进行研究。是的，很明显，对于一个机构来说认为有理由通过其领导人针对每次审查和表态指出“客观性”是唯一合理的依据。人们对议员本身以及严格的原则标准进行审查，而得出的结果就只剩下吃惊了。

根本就没有什么原则可言，客观地讲，那原则简直就是不正确的，议会的原则也是不正确的。

人们不要完全忽视选举人民代表的方式，看他们是如何成功地得到职位和重新获得尊重的。每个人很快就会明白他们当中真的只有可笑的一部分才会满足公众的愿望或者是某种要求，并且清楚地知道，广大群众的政治理解能力完全不是为了获得某个特定的政治观点本身并且为此而选出相关的人员的。

我们常常称为“公共舆论”的这个词只在很小的程度上是以个人自己获得的经验或认识为依据的，而大部分则是建立在通过一种没完没了的、强有力的和持续不断的所谓“宣教”方式所激发出的想象的基础之上的。

以宗教信仰的观点来看，教育的结果也只能使得人们把对宗教的需求蕴藏在心里，所以民众的政治观点其最终结果也只是人们对心灵和理智的一种时常完全难以置信的坚韧的表达。

而最有权威性的要体现在“政治教育”方面，对此人们常用宣传这个词来进行描述，这项工作就落到了新闻界的头上。首先其从事“宣教工作”对于成年人来讲类似于一种学校教育。而且这种教育还不掌握在国家手中，却被最为卑劣的势力所窃取。我年轻时住在维也纳正好有机会结识这样的大众宣教机构的主办人和编辑。开始的时候我很惊奇地发现，他们竟然可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为国内的丑恶势力制造出一种特定的舆论，即使是对已有的公众言论和内心意愿公然进行颠倒黑白。但是几天后，这种可笑的事情反倒成了国家的重大事件，同时有关民生的重大问题反而渐渐地被忘记，干脆就从民众的关注和记忆中给偷走了。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他们的名望又魔术般地从一文不名到与公众的无穷期望紧密相连，使他们得到了连真正的伟人毕生都无法得到的大众知名度，而他们的名字在一个月以前还仅仅是听说，根本就没有人完全了解；与此同时，那些在国家和其它公众事务中还很健康的长者也都相继去世了，或者是在遭受了如此无耻的诽谤而很快使他们的名誉受到威胁成为卑鄙下流的代名词才离去的。为了能够正确认识到新闻界流氓无赖的真正危险性，像犹太人这样无耻地像施了魔咒似的把造谣中伤、毁损声誉的垃圾往清白无辜人的身上一次又一次泼脏水的手段应该去进行研究。

为了实现其本来的目标，对于这类精神强盗再也没有比这更合适的东西了。

他还要窥探最为秘密的家庭隐私，就像到树林里去找松蘑的愿望那样，直到有任何一个确实能够毁掉那个倒霉牺牲品的意外发现，否则是不会提前罢休的。尽管是仔细地闻了个遍，但在公众和私人生活方面还是一点东西都没有找到，那么这个家伙就肯定会直接进行诽谤，即使千百次地想过要停止这样干，但总觉得还有些牵挂；况且其同伙通过多次不断地诽谤就会发现在多数情况下和一个牺牲品作对完全是办不到的，同时这些流氓无赖也不会像其他人一样会出自可以获得信任或至少可以获得理解的动机去做一些事情。上帝呀！就这么一个无赖用最下流的手段把我们可爱的民众玩弄于股掌之中，真的就像一条墨鱼被幼稚可笑

和故弄玄虚的空谈云雾般地团团围住了，喋喋不休地闲谈一些所谓的“新闻记者的义务”和胡编乱造的废话，甚至在组织会议和代表大会上也有机会越来越多地看到这样不幸的事情，这些聚集在一起的无赖竟敢高谈阔论什么新闻所特有的“尊严”，而这新闻的尊严正是让他们明目张胆地给毁掉的。

从这些无赖制造的三分之二以上的所谓“公众舆论”散发出无数的泡沫中走出了议会之神。

要把这个过程详细的进行描述，并且把所有的欺骗性的谎言罗列出来可谓是数不胜数。即使不看全部，光是他们所制造的言论以及衍生出来的行为，即便是以虔诚的态度也足以让我渐渐地看清了这个机构真正的荒谬所在。

如果我们把民主议会制和真实的日耳曼式的民主进行比较的话，那么就会清楚和真正地明白这种荒唐的议会给人们的思想所造成的混乱是多么的危险。

首先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比如拿五百人来说吧，最近还有妇女参加选举的，大家一起来进行表决。他们实际上就是政府本身；因为要从他们中间选出内阁成员来主导国家事务，这不过是个表面现象。而实际上这个所谓的政府在没有事先经过议会的一致同意是不能擅自行动的。这种政府也不需要任何事情承担责任，因为最后决定权并不掌握在政府手中，而是在议会多数派的手中。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只是一个多数派的执行机构。人们判断其政治能力就只能通过了解它所采取的政治手段来进行，要么是附会多数派的意见，要么去争取拉拢多数派。但政府的实际威信也随之降低成为一个向多数派乞求的人。是的，政府最紧迫的任务完全就是按照各自的要求要么保证现有多数派的支持，要么接受组建新的更适合的多数派。如果成功，那么还可以进行一段时间的“统治”，如果不成功，那么只有下台。而政府意愿本身的正义性在此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因此，实际上也就取消了承担负责的作用。

那么这样会导致什么后果呢，只要注意观察就会知道：这些按照每个人职业或能力推选出来的五百个人民代表的内部构成呈现出一幅支离破碎、甚至可以说是可怜寒酸的画面。因为人们不会相信，像这样选出来的人不会是精神和理智的代表！但愿人们不会认为从明智的选票中会立刻蹦出来一百个政治家。人们完全没有必要激烈地反对那种通过普遍选举就能诞生出天才的错误想法。首先一个民族中只能产生出一位真正的政治家，而不是同时一下子就冒出一百个；其次，民众对杰出的天才有一种本能的抵抗。与其说通过选举来“发现”伟人，还不如说是让一只骆驼穿过针孔。

这种大众化的一般标准会真正产生出什么东西呢，世界历史会告诉你的。

那么由五百个人在很小的范围内对国家重大事务进行表决，任命政府官员，而这些政府官员又必须在具体事务或特殊问题上需要征得议会的赞同，因此实际上就变成了由这五百个人来操纵政治了。

还可以看出有更多的事情。

国民代表的聪明才智本身在这过程中却完全被忽略了，应该想到的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涉及到不同的领域应该有不同的解决方法和决策，而且还应该知道人们把国民代表大会的最终决定权授予了政府机构，可如果这个机构在处理现有事务时缺乏知识和经验的话，那么这样的政府机构该是多么的不适宜。重大的经济决策由一个只有十分之一懂得经济的人员所组成的委员会来制定。这无异于说明一项事务的最终决定权落在了完全无能之人的手中。

其它问题也是如此。因为政府机构的组成没有变化，需要解决的问题又几乎涉及到公共生活的各个领域，总是把决定交给那些无能和无知的多数派，而那遥遥无期的议员更换还得取决于议会的判断和决定。要让这些人去管理交通事务，或者说让他们去商讨国家的外交政策，那简



直是不可能的。这得让那些百年来才能真正出现的天下绝顶聪明的人来干才行。可惜这里的大部分都不是什么“头面人物”，而只是类似于一些自以为是、夸夸其谈的半瓶子醋的笨蛋，表面上显得聪明，实际上最让人感到恶心。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人常常轻易而草率地谈论和决定连那些最精明的人都应该深思熟虑的国家事务。要知道这是在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未来的重大事务制定政策，而这些人更像是一个应邀舞会上的傻瓜或是像玩牌时往桌子上出牌那样轻率，根本没有想到这是事关国家命运的大事。

要是相信像这样议会中的每个议员都具有如此少得可怜的责任心的话，那肯定是不公平的。

不，肯定不是公平的。

但是在这样的体制下会迫使每个人对那些他一无所知的问题进行表态，这样就会渐渐损害他的个性。没有人会有勇气真正站出来说：“先生们，我认为我对此项事务一点都不了解，至少我本人是这样的。”（另外，这样兴许会有一点改变，因为像这样的诚实肯定不会完全不被理解，大概是人们不愿意让这样一个老实的蠢驴破坏了一般的游戏规则罢了。）要是认识这些人，就会理解他们身处在声名显赫的阶层中是不想成为傻瓜中的一分子的，况且在某种程度上诚实和愚蠢往往会是同义词。

因此这就让那些还可以称得上诚实的议员们被迫走上了撒谎和欺骗的歧途。可以值得相信的是，只是对某件事情采取与耻为伍的态度本身完全改变不了什么，但却扼杀了其本人或其他人想要站出来表态的真诚行为。最后，他还要自我安慰，因为他自己在这些人当中还不算是最坏的，而且他同流合污的做法兴许还防止产生众怒。

当然，这就会出现不同的意见，个别议员肯定会不理解这样或那样的事情，其政治派别的相关领导人对他本人的观点也会提供建议；而他们最终的决定本来就是通过专家给予了充分的领会后才做出的。

这些在第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这几个有用的聪明人就可以对重大事务做出决定，那为什么还要选出五百个代表来

呢？这才是问题关键之所在。

当今民主议会制的目的并不是将聪明人组织起来，反倒是在按照一定的规则纠结一群傻瓜，这些人越是愚蠢，所担负的职责就越少。现在政党的策略之所以如此糟糕就是这样造成的。而且这样还让那些在暗中操纵的人总可以小心翼翼地呆在幕后，不必担负任何责任。那么现在无论多么有害于国家的决议都不会把罪过推到一个无赖的身上，而是要把责任推卸到政党派别的头上。

这样实际上谁都没有责任，因为责任只能是由一个人，而不能由空谈的议会来承担的。

这样的机构只有那些善于撒谎和干一些见不得人勾当的人才会喜欢，进而对那些诚实可靠、光明磊落、责任心强的人怀恨在心。

这样的民主形式已经成为了某一群人的工具，他们所希望的就是躲在阴暗处干坏事，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只有犹太人才会赞赏这种肮脏和虚伪的制度，就像他们自己也是一样的如此这般。

与此相反的那就是真正的日耳曼式的民主制度，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领袖其职责就是对他的所作所为负全部的责任。这样的制度对每件事务的决定并不取决于多数人的表决，而是由能够把自己的生命和财产都能够倾注到这个决定上来做出的人。

如果有不同意见认为很难找到一位自愿献身于这种极富冒险性使命的人，那么对此有人给予的答复是：上帝呀，这正是日耳曼式民主制度的精神所在，它不是让那些追逐名利的无耻之徒和道德上毫无责任心的人费尽周折成为国人的统治者，而是让他们这些软弱无能之辈在所承担责任的巨大压力下早已变得畏缩不前了。

要是有一个家伙想要混入议会，那人们会很容易地发现并且会毫不留情地呵斥道：走开，你这可耻的无赖！把你的脚缩回去，你把台阶给弄脏了；因为历来只有英雄能够进入圣殿，而不是伪君子。

在我两年来对维也纳议会的观察以后，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以后我再也没有去过那里。

维也纳议会的主要任务就是管理近些年来日渐衰弱的哈布斯堡帝国。而议会的作用使得德国人所具有的优势不断受到削弱，从而更多地陷入各民族之间相互攻击的境地。在议会里本身就是德国人在出钱，当然首先这也是德意志帝国的钱；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就连最幼稚的人都能明白，君主制的魅力所在恐怕再也不能够对国家的分裂趋势有约束力了。

而事实却正好相反。

一个国家维护自身的手段越是少得可怜，那就越会受到更多的轻视。这不仅发生在匈牙利，而且在斯拉夫地区人们对二元君主制的软弱无能并不认为是他们自己的耻辱反倒表现得十分漠然。大家反而对其老态龙钟的表现感到高兴，只希望其早日灭亡，而不是盼望它恢复健康。

在议会里是靠着有失尊严的屈从、妥协，甚至还有对德国人的压榨，在国家内部是通过极有可能发生的各个民族之间的争斗来阻止整个国家的解体。总的方针计划都是针对德国人制定的。尤其是储君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开始施展其影响力自上而下地推行其捷克化的计划和秩序。这位未来的统治者试图使用各种方法推行去掉或者说至少要掩盖二元君主制中的德意志的特征。光是在德国就通过各种渠道在语言混杂的危险地区缓慢地，但却是坚决地推行其国家官员制度。在下奥地利地区这种进程尤其迅速，而且许多捷克人已经把维也纳看作是他们自己的首都了。

哈布斯堡家族的主导思想是要在欧洲中部逐渐建立起一个斯拉夫国家（这位大公的妻子以前就是捷克贵族，出身于素有敌视德意志传统的家族，后来嫁给了王子，成就了这段不愉快的婚姻），并要受到严格的天主教教规的庇护来对抗俄国东正教的影响。因此，哈布斯堡皇室常常是把宗教观念用于纯粹的政治，至少以德国人的观察来看，那实在是一种招灾惹祸的想法。

多方面考虑的结果比想象的还要悲惨。

不论是哈布斯堡皇室，还是天主教会都无法获得他们所期待的利益。

哈布斯堡皇室会因此失去王位，而罗马教廷则失去一个大国。因为从政治上考虑，王冠具有宗教意味，它能够会唤起一种在政治上无法得到的精神。

他想方设法要把德意志民族从原来的帝国中清除出去，但结果却是在奥地利掀起了全面德意志化运动。

80年代类似犹太人基本观念的曼彻斯特自由主义思想在君主制国家达到了无法逾越的顶峰。就像在所有君主制国家所发生的那样，尤其在过去的奥地利反对势力首先不是来自于社会大众的观点，反而来自国家。自我保护意识促使德国人以更加严厉的方式进行自卫。其次在经济政策方面也起到了显著的影响作用。所以从日常政治纷争中脱离出两个派别，一派更多地具有民族思想，而另一派则更富有社会意识，而两派对未来都非常具有吸引力和教育意义。

1866年的战争以屈辱的结果告终，哈布斯堡皇室想要在战场上再次进行报复。墨西哥皇帝马克西米安的去世其实首先要归咎拿破仑三世那可恨的撤军行动以及法国人对墨西哥的放弃，这不仅激起了大家的愤怒，同时也阻止了和法国的密切交往。当时哈布斯堡王朝仍然持观望态度。要是1870至1871年的战争没有获得巨大胜利的话，兴许维也纳宫廷还想要为萨多瓦战役的失败雪耻。当战场上胜利的消息传来时，大家都惊诧得无法相信，但那的确是真实的，而且终于看清了历史上“最圣明”的君主在不适宜的時刻对自己的惨败尽可能地摆出了一幅愉快的表情。

这两年的英勇奋战还创造出一个巨大的奇迹，因为在哈布斯堡皇室要对立场观念进行改变从来都不是出于内心的愿望，而是相互间厉害关系的驱使。在东部帝国的德意志民众更加欢欣鼓舞，把战争的胜利看作是先辈们梦想成为现实的又一次天赐良机。

真正在思想上倾向德国的奥地利人也在赫拉德茨-克拉洛韦的战役

失败的这一刻认清了重新建立一个新帝国所必备的条件，而再也不应该和原来腐朽没落的德意志联邦有什么牵连，尽管有些可悲，但这一点人们是不会含糊的。特别是他们最起码学会了亲身感受到哈布斯堡王朝已经结束了其历史使命，新帝国还要把一位具有“莱茵河之冠”英勇信念的、受人尊敬的首要人物推举为皇帝。还要有多少对上天的赞美之词来感激对哈布斯堡王朝继任者的封赐，而命运则在弗里德里希大帝执政时期就已经赠与这个尚在迷茫之中的民族一个永远振兴的闪亮标志。

世界大战后哈布斯堡皇室最终下定了决心，逐渐铲除威胁二元君主制的德意志民族（其内心的意念是不容怀疑的），这必然是斯拉夫化政策的结果，这样会激起那些起决定作用民族的反抗，而这样的方式在德意志近代历史上是未曾有过的。

这是具有民族精神和爱国思想人们的第一次反抗。

这样的反抗并不针对人民，也不针对国家本身，而是反对他们认为会使自己的民族走向毁灭的政府。

在近代德意志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把一般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区别为对祖国和对民族的热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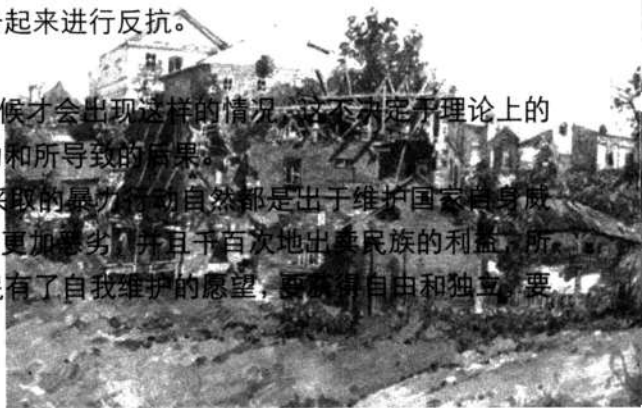
当国家威望符合民族利益，则有权要求受到尊重和得到保护，至少可以要求不受到损害；这是在 90 年代奥地利的德国人泛德意志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并以清楚明了的方式表达了出来。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威望作为目的本身不能让世上的暴君不受约束和神化他们。

如果借助于政府的暴力手段使民族走向毁灭，那么他们中的任何人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起来进行反抗。

所以，问题是什么时候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不决定于理论上的文章，而是要取决于暴力和所导致的结果。

因为政府每一次所采取的暴力举动自然都是出于维护国家自身威望的义务，兴许他们还会更加恶劣，并且千百次地出卖民族的利益，所以要战胜这样的政权人民有了自我维护的愿望，要获得自由和独立，要



拿起和敌人手中一样的武器试图来保护自己。因此这样的战斗只要是为了推翻暴力，那么就可以“合法”地进行；即使是对此进行镇压，也不要被“不合法”所吓倒。

应该不要忘记的是，这样的战斗常常不是为了维护一个国家或者政府确保人类生存的最高目标，而是在进行自我保护。

要是战斗处在被镇压或是完全被打败的危险境地时，那么合法性的问题就只能起到次要的作用了。兴许统治势力会计划使用千百种所谓“合法”的手段，那么被镇压者要求自我保护的意愿就是应该使用所有武器为自己的战斗来进行最崇高的辩护。

光是从这些所描述的句子中就可以看出，在这个世界上反对国内外对人民进行奴役的自由之战伴随着多么暴力的历史例证。

人权将打破国家权利的制约。

即使一个民族为了人权所进行的战斗失败了，那么在命运的天枰上还是可以容易为他们在世界上继续生存找到幸运之地的。要是一个人不愿意或不能够为自己的生存而战，那么永恒公正的愿意就注定已经结束了。

这个世界不是为怯懦的民族而存在的。

怎样轻易地将所谓“合法”的外衣披裹在一个暴君的身上，奥地利再次给出了最为清晰和透彻的实例。

当时合法的国家权力建立在以德意志为敌的议会制度基础之上，议员多数派也不是德国人，而且还出身于反对德意志的王室。因此整个国家的权力机构都体现在这两个方面。在这样的议会里想要改变奥地利德国人的命运，简直就是胡扯。由于使用合法的手段行不通，对国家权力本身的崇拜者和认为唯一可能的“合法”出路的拥护者因而认为现在应该放弃反抗。这就绝对意味着短期内君主制国家里德意志人的末日。而实际上只有这个国家在遭受毁灭的厄运时，德意志人才可以被拯救出来。

那些戴着眼镜的理论家们当然更愿意献身于学说教义，而不是为了民族。

这些人认为要先制定出法律，然后再去遵从法律的条款。

彻底消除这些理论上的教条主义以及其它国家拜物教思想的邪说，是当时在奥地利的泛德意志运动所取得的成就。

哈布斯堡王朝试图利用各种方法和德国人纠缠不休的时候，这个党对“高贵”的王室本身毫不留情地进行攻击。这是第一次在这个腐朽的国家里进行的尝试，并让千百万人睁开了眼睛。其功绩所在就是将热爱祖国的神圣理念从这个悲惨王朝的桎梏中解救了出来。

运动刚开始的时候追随的人很多，简直就像要发生雪崩一样。只是所取得的成就没有持续下来。当我到维也纳的时候，运动规模早就已经被已经掌权的基督教社会党所超过。几乎完全被贬低为毫无意义的运动。

泛德意志运动的整个变化和转变过程，一方面是因为基督教社会党的迅猛发展，而另一方面则是我应当有研究的内容，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当我到维也纳的时候，对泛德意志运动充满了同情并站到了他们的一边。

他们有勇气在议会里高呼“霍亨索伦王朝万岁”令我非常钦佩，还使我高兴的是这可以仅仅看作是一个暂时分离出来的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并且还毫不犹豫地表达了出来，这唤起我内心无比的喜悦和希望。尤其是在涉及到德国人的问题上无所畏惧的态度和从不妥协的作法对我来说是唯一的一条还可以拯救德国民族的出路。但这样的运动在有了一个辉煌的开始以后就衰落了下來，这让我难以理解。但还有一点就是基督教社会党能够在这一时期获得极大的威望。当时这个党正处在荣誉的顶峰。

同时，我把这两个政党的活动进行比较，我可悲的处境也促使我去这样做，这是上天给了我最好的学习机会去了解谜团的原因所在。

我开始先对两个人进行研究，他们被看作是这两个党的创始人和领袖：乔治·冯·施尼勒先生和卡尔·吕格博士。

平心而论，这两个人都远远超出了那些所谓议会里的那些人物。在普遍的政治腐败污浊之中，他们的生活依然能够保持清廉而不同流合污。起初我很同情有泛德意志思想的施尼勒先生，后来逐渐也同情基督教社会党的领袖了。

把他们的能力进行比较，我认为施尼勒先生在原则问题上是一个较为优秀和细致的思想家。他比其他任何人都对奥地利不可避免的结局有更准确和清晰的认识。要是有人能很好地听听他对哈布斯堡皇室的警告的话，那德国和整个欧洲的世界大战的惨剧就不会发生了。

而当施尼勒先生认识到问题的本质时，他总误解为这是人类自身的问题。

而在这一点上，吕格博士则具有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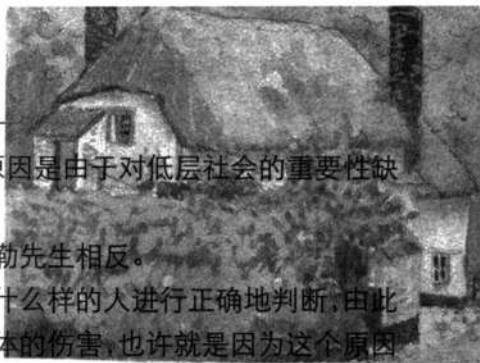
吕格博士在识人方面是一个奇才，他还特别谨防把人类本来的样子看得过分地好。所以他对实际生活中现实的可能性考虑得更多，而施尼勒先生在这点上则了解得很少。从理论上来看，开展泛德意志运动的人们所想到的是正确的，但是缺少向民众宣扬其理论思想的动力和共识，这种思想要以一种适合于人民大众接受能力的模式造就出来，然后在这个范围内把它固定下来，因为这些理论都是预言家们实际上无法实现的观点。

这种本来缺乏对人类特性的认识还继续导致对整个运动所能产生效力的错误预计以及对旧机构的错误判断。

最后，施尼勒先生终于认识到这是涉及到世界观的问题，但是还并不了解这首先是广大民众适合于接受这种几乎是宗教信念般的理论。

可惜他只在很小的范围内才发现所谓“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害怕失去太多而不断地退缩，所以其战斗意志非常的有限。

一种世界观通常只有在将其新的理论学说向广大群众宣讲让他们接受并采取必要的斗争时才会具有胜利的前景。



对社会问题非常浅薄的理解,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对低层社会的重要性缺乏了解。

而在此方面吕格博士恰好和施尼勒先生相反。

对人性的充分了解使得他能够对什么样的人进行正确地判断;由此可以避免受到现有那些过于低估的团体的伤害,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学会了借助于这种对人性的洞察力来实现他自己的意愿。

同时他也十分清楚地知道当今资产阶级上流阶层的政治战斗力极其薄弱,不足以在一场运动中赢得胜利。以后他把政治活动的重心放在那些生存受到威胁的阶层,以获得他们的支持,以鼓舞他们的战斗意志,而不是使其停顿瘫痪。为了将现存的各种势力尽可能地为自己所利用,因此他很适合于把现有的一切力量和大规模的组织机构动员起来。

所以他首先以行将崩溃的中产阶级作为基础组建了新的政党,因而获得了毫不动摇、勇于牺牲、顽强战斗的追随者。他的聪明之举还在于和天主教会进行联合,使他在短时间内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青年教士的支持,这样就迫使旧的教会派别退出争斗,而那些聪明的派别则与新组建的政党进行联合,然后再一点一点地慢慢取得成功。

如果我们只把这些看作这是一个人的本质特性的话,那对他来说则是非常的不公平了。因为作为一个睿智的战略家,他还具备一个真正伟大而极富天分的改革家的特长。当然这要取决于对现有条件的可能性和他本人能力的明智判断。

对于这位极其重要的人来说,这是将要实现一个漫长的目标。他要征服维也纳。那是腐朽的帝国业已病入膏肓、老态龙钟、奄奄一息躯体的心脏所在。要是心脏愈发健康,那么身体也就会很快地生机勃勃。这种想法原则上是正确的,但要在一定和有限的时间内才会行之有效。

而这正是吕格博士的弱点。

他在维也纳当市长时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说是永留青史,但要想由此来拯救整个君主王朝则已为时太晚。

对此,他的政敌施尼勒先生则看得一清二楚。

吕格博士实际上所从事的工作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却没有达到他所期待的结果。

施尼勒先生想要得到的，他无法实现；而他所担心的事情却可怕地发生了。

所以他们两个都没有实现其远大的目标。吕格博士再也无法拯救奥地利了，而施尼勒先生也未能防止德意志民族的衰败。

研究这两个政党失败的原因对我们当今时代具有很大的教育意义。尤其对我们的朋友们非常适用，因为当时的情况有许多和现在的类似，可以避免让我们再次犯错误，它一方面会导致一场运动的完结，另一方面则是毫无成果。我认为泛德意志运动在奥地利的失败有三个原因：首先是没有清楚地认识到社会问题的重要意义，并由此而形成成为一个革命政党新的核心观点。

施尼勒先生和他的追随者们主要面对的是资产阶级，其结果只能是组成一个软弱而温顺的政党。

当涉及到国家或民族内部事务的时候，德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在德国的资产阶级上层都是采取从和平主义到表面上自我克制的方式，即便是大家对此都一无所知。在形势好的时候，这里指的是在好的政府统治时期，这样的观点是这个国家里这些阶级具有非常意义的基础。而在不好的政府统治时期则是灾难性的。即使完全有可能进行真正严酷的战斗，那么泛德意志运动也需要全部致力于赢得广大民众的支持。即使没有这样做，当运动热情在短期内还没有消退的时候，那么运动浪潮从一开始就要受到必要的强有力地推动。

要是开始连这一原则性的东西都没有注意到，即使是运动有所开展，那么这个新组建的政党早晚也会失去因疏忽大意而进行补救的可能。因为随着大量资产阶级温和派的加入，运动内部的思想观点就会取决于他们的态度，这样就失去了从广大民众中获得重要力量的可能性。因此使运动陷入抱怨和指责的境地而无法自拔。这种或多或少类似于宗教信仰和勇于献身的精神密切相连，而且会更多地被人们所发现；而由此产生出替代这种精神的想法就是通过“主动”的合作，这里指的是通过承认这种想法以渐渐消磨斗争的尖锐性，最终的结果就只会得到一个

变了质的和平。

而泛德意志运动也是这样进行的，因为开始的时候没有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从广大民众中去赢得追随者。而成为了一场“资产阶级的，自以为是的，情绪激进的”运动。

由于这样的错误产生出使其迅速消亡的第二个原因。

对于德意志民族来讲，当时奥地利的形势要进行泛德意志运动是已经没有什么希望的。多年来议会已渐渐成为了消除德意志民族的机构。想要在最后的关头进行挽救的希望便是取消议会，但这样成功的机会又是非常小的。

因此这项运动原则意义上的问题就是：为了取消议会而应该加入议会，就像人们常常说的那样：“由内向外进行破坏”，或者应该从外部对议会机构本身进行攻击？人们进入了议会，但又被打了出来。

当然，要进入议会。

要是对这样的权力机构从外部进行攻击，就要具备不可动摇的决心和准备做出牺牲。就像抓住那头公牛的角，你也许会受到顶撞，有时还会倒在地上，兴许还会骨折，但这都是为了能够再次站立起来，只有经过艰苦的搏斗，胜利才会向勇敢者走来。只有牺牲的伟大才会造就出战斗的勇士，直至赢得胜利。

因此，要从广大的民众中得到民族的种子。

他们自己要果敢、决定地把这场血腥的战斗进行到底。

但广大民众并不能控制泛德意志运动，所以除了进入议会以外也就没有什么别的可以做的了。

要是认为这样的决定是内心的精神痛苦或只是思考结果的话，那是错误的；不对，人们完全没有想到还有想别的东西。出现这种错误的想法只不过是消除了对自己加入了这样一个原则上就认为是错误的议会的意义和作用的普遍和不明确的看法。通常人们会期待轻松地向广大民众进行宣讲，同时要在“全体国民的讲坛”上得到说话的机会。同时还表明，对灾难根源的攻击必定比对表面上的攻击会取得更大的成就。通过豁免权的保护，人们相信战斗先锋的保险性加强了，以至于攻击的力

量也得到了提高。

当然实际上这会有本质上的不同。

泛德意志运动议员们面前的讲坛并没有变大，相反变得小了；因为人们总愿意在喜欢听他讲话的人面前进行演讲，或者通过新闻报道来发表他的言论。

但是最大限度直接面向听众的并不是议会的议事厅，而是公开的群众集会。

因为在这样的大会上会有数以千计的人们聚拢来倾听演说，而在议会的会议厅里也不过区区的数百人而已，这其中大多还都是为了“领取议员津贴的，并不是要听这个或那个什么“国民代表”的高论的”。

尤其是：总是相同的人在场，他们也不会学到什么东西，除了所应具备的理解力外，他们连最起码的愿望都没有。

像这样诸如此类的国民代表从来都不会在事实面前说实话来履行他的职责。没有，没有一个议员会这样做的，除非对他下一届的议员席位有利。以往的政党只有当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所获得的选票结果还不很明朗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一些富于男子汉的议员，并看看是否或怎样能够转向另一个政党或者派别，也许还是个落选的政党，以便在职位更迭的时候避开由于道德原因而引发的巨大震荡。如果当选政党显然陷入不利于国民的境地，很明显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就会出现一个巨大的变动：议会的老鼠离开政党的船舱。

这和理智或者愿望没有关系，而就像预言家的天赋告诉我们的那样，这些议会的寄生虫在非常合适的时间受到了警告而又跑到别的政党的温床上去了。

在这样的“讲坛”上讲话可真的纯属是对牛弹琴。根本就是白费口舌！也不会获得什么结果。

另外，那些泛德意志运动的议员们虽然声嘶力竭地进行演说，可所收到的效果却完全是意料之外的。

新闻报刊对此要么置之不理，要么大做删改，以致其上下文关联，

有时甚至整个寓意都被扭曲或者完全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这就给谈论这场新兴运动的公众留下了最糟糕的印象。议员所说的并不重要，而人们所读到所讲的内容却非常重要。尽管这只是其演说内容中被删改得不会有什么意义的一个片断。但那确实在讲坛前所讲的真话，从五百个议员当中能说出这一点就已经足够了。

但更糟的事情还在后面：泛德意志运动只有从一开始就要认清这不只是关系到组建一个新的政党，而更多的是涉及到一个新的世界观的问题，那才会有成功的可能。只有这样的世界观才能唤起内在的力量将这场艰巨的战斗进行到底。也只有最优秀和最勇敢的领导者才适合担负这样的责任。

假如为世界观的战斗不能由勇于牺牲的英雄来指引的话，那么在短时期内就再也不会找到真正的勇士了。要仅仅只是为了个人的生存而战，那还谈什么不遗余力为广大民众而奋斗呢。

但为了维护这样的前提条件，就需要每个人都该知道现在所从事的这场新兴运动是不会给我们的下一代带来什么尊严和声誉的。一场运动设置那些轻易谋取的职位和职务越多，那么就会招致更多的下三滥来参加，到最后一个成功的政党都会被这种人所充斥，以至于原来真正的斗士都再也无法识别运动的原貌，并且新加入的人员还分辨不出他们自己就是那些讨人嫌的“冒牌货”。而且就是这样去执行“任务”的。

一旦泛德意志运动为了议会而献身，那么运动就不再会有领袖和战士，而只有“议员”了。这样不仅降低了平日里政治活动的水平，而且还失去了与厄运进行抗争，让先烈们得以慰藉的力量。他们只学会了“演讲”和“谈判”，而不去进行战斗。年轻的议员们很快就会感受到这是种无需冒险的职责，只是用雄辩的口才来做“精神”武器在议会里阐述世界观，比那些需要付出生命、毫无出路、没有任何收获的战斗要美妙的多。

只是在议会里就那么一坐，外面的追随者就开始期望并等待奇迹的发生，当然这根本就不会发生，也不能够发生。因为从自己议会代表那里所听到的和选民所期待的完全不一样，人们因此很快就会失去耐心。

这很容易得到解释，因为这也许就是敌对新闻要阻止泛德意志运动的代表把真实的运动景象展示给民众而产生的作用。

年轻的人民代表越对这种在议院和议会里“革命”斗争的温柔方式感兴趣，那么他们就越不会去向广大民众做更带有危险性的宣讲工作。

唯一真正具有效果、可以直接亲自制造影响、并由此获得广大民众支持的群众集会因此也就被弃之一旁了。

而一旦把群众会场里的啤酒桌换成了议会里的宣讲台，不再向民众进行演讲，反而还对那些所谓的“选民”的头头们投其所好，这就终止了作为一场群众运动的泛德意志运动，并且严格地说来或多或少很快就可以和学院式的俱乐部混为一谈了。

因此尽管新闻报道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也不要通过亲自去参加群众集会来进行纠正，免得最后这个“泛德意志”的字眼对广大民众来说听起来都会变得非常让人生厌。

所以，特别是今天就让所有那些文坛上的勇士和公子哥们去说吧：世界上最伟大的变革不是靠鹅毛笔来领导的！不是的，只有等着鹅毛笔去创造理论。

但是无论是在宗教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都起到巨大历史作用的统治阶级自古以来就是对所说的话施以魔力。

特别是广大的民众总是屈服于言论的暴力之下。所有伟大的运动都是群众运动，其火山般的爆发要么是体现人类在苦难中奋斗的激情，要么是表达心底言语情感的火花，而绝不是唯美文体的甜言蜜语和沙龙名流的长篇大论。

人民的命运会成为狂热激情的风暴，而只有来自他们内心深处的激情才可以被唤醒。

这种激情本身还赋予了适合于自己的人们以打动人心、激动心扉的词句。

谁要是拒绝激情并且沉溺寡言，上天就不会选择他作为其意志的代言人。

因此，每个作者都是坐在书桌旁来从事“理论”创作的，他虽具有足够的水平和能力，但还不足以作为或推举为领袖。

所以具有宏伟目标的政治运动必须小心从事，不要失去和广大民众的联系。

首先要从这一点出发去考虑问题，并按照这个方向去做出决定。

还要避免政治运动对民众的影响力变小或变弱，但不要出于“蛊惑人心”的目的，不要，而是要清楚地认识到，没有民众的强大力量是无法实现伟大理想的，尽管这个理想显得及其伟大和非常崇高。

严峻的现实就决定了达到目标道路的艰险；不愿意走崎岖的道路，也就意味着要常常放弃目标，但这也可能是人们所不情愿的。

因此，一旦泛德意志运动按照议员的观点将其工作重点从民众转向议会，那么就失去了未来而只取得了眼前那微乎其微的成就。

他们选择了轻松的战斗，但最后的胜利却毫无意义可言。

我在维也纳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刻地思索，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没有认识到让负有使命感的德国人来领导这场政治运动。

显然，泛德意志运动犯下了这两个主要错误，这是两个彼此有联系的错误。对其内部巨大变革驱动力缺乏了解导致了没有足够重视广大民众的重要性；而这样的结果就忽视了社会问题，缺少和没有足够地获得底层民众的理解和支持，而只为了去讨好议会。

要是能自始至终地认识到民众所产生的阻碍革命的巨大力量，那么在社会工作和宣传工作方面就会采取不同的方法了。也就不会把运动的重点放在议会里，而是要在工厂里和大街上。

第三个错误最为核心的所在就是因为缺乏对民众重要价值的认识，民众是经过深思熟虑才会朝着一个确定的方向投身到政治运动中去的，然后就像一个飞轮似地增强战斗力，同时还具有坚忍不拔的毅力。

泛德意志运动与天主教会进行的艰苦斗争只能解释为不过是迎合了民众精神方面的要求而没有充分地加以理解。

新组建的政党对罗马教廷的猛烈攻击，其原因是哈布斯堡王室最后决定将奥地利改造成为斯拉夫化的国家，显然还要不择手段无论如何也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这个丧尽天良的王室甚至还肆无忌惮地利用宗教机构来为新的“国家理念”进行服务。

委派捷克神甫和牧师就是多种手段中的一种，其目的就是要使奥地利成为斯拉夫化的国家。

这样的做法所造成的结果就是通过向纯粹德国人的聚居区派遣捷克神甫，然后慢慢地，而且肯定会以捷克民族的利益来替代教区的利益，这也就是消除德意志运动的核心。

可惜德国的神职人员对所发生的事情几乎完全没有反应。不仅如此，他们自己觉得为德意志而战基本上没有用处，即使受到别人的攻击，也不要进行必要的反抗。就这样，德意志民族一方面是因为宗教信仰的错误而走了弯路，另一方面又缺乏足够的自我保护而不断地受到压制。

从小的范围上看是这样的，从大的范围上来看，情况也没有什么不同。

即便是哈布斯堡王朝，尤其是那些高级教士反德意志的尝试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反击，尽管这样做的本意是完全代表德意志利益本身。

天主教神职人员损害德国权益给人留下的印象不会和实际上的有什么不同。

所以，这就显得教会本来就不同情德意志民族，而且还因此以不合法的方式站到了敌对的一方。其不幸的根源在于，施尼勒先生的意见也认为，天主教会的领导机构没有设立在德国，因此从民族利益出发而产生出敌视态度。

就像当时奥地利各地所发生的那样，所谓文化上的因素几乎变得无足轻重。泛德意志运动对天主教会的态度很少由他们对于科学等等的立场来决定，而起决定作用的更多是因为他们不足以代表德国的权益，而且相反，尤其还代表了斯拉夫人一再提出的狂妄和贪婪的要求。

施尼勒先生是个做事从不半途而废的人。他相信只有和教会进行斗

争才能拯救德意志民族。“脱离罗马教会运动”仿佛是最强有力的，当然也是最艰难的反击方式，势必要摧毁敌人的堡垒。要是能够成功的话，那么德国不幸的宗教分裂便可以消除了。德意志帝国内部的力量和人民可以通过这样的胜利赢得最大的利益。

但是斗争的前提和结论都是不正确的。

毫无疑问在所有涉及德国的问题上，德意志天主教会神职人员的民族反抗力量不如非德意志人的强大，尤其是不如捷克兄弟会的力量。

就连一个傻瓜也都能看得出德国的教士们几乎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要主动去代表德国的利益。

没有受到蒙蔽的人们就只得承认这首先就是我们所有德国人都应该以最大的痛苦来忍受的实际情况，和其他民族一样，这也就是我们民族所应承担的客观现实。

正如捷克的神职人员是以主观思想来面对他们的民族，以客观的态度来对待教会，德国的牧师则主观地面向教会，客观地对待德国民族。有一点不同的就是这样就可以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一眼就能看出我们自己的不幸。

这绝不只是天主教的特殊传承，而是一个在短时间内几乎吞噬着我们每个人，特别是我们的国家机构和精神思想的东西。

比较一下我们国家的官员对民族复兴的尝试所采取的态度和在这种情况下别的国家官员所采取的态度。难道你会相信全世界的所有官员都以类似的方法用“国家尊严”这句空话来排斥民族利益，就像五年来在我们这里习以为常的那样，而且竟然还被视作赞赏可嘉？比如今天在犹太人问题上就不要把两种宗教信仰看作成即不符合民族利益，也不是宗教的真正意愿？在所有只关系到犹太民族同样意义的问题中，比较一下犹太经师的立场和我们绝大多数的神职人员的观点，两者都很危险！我们总觉得那是代表了抽象意识本身。国家尊严、“民主”、“和平主义”、“国际主义大团结”等等这些概念令我们张口结舌，结果却让我们只按照这些纯粹的学术概念对民族生存的必要性来进行判断。

很不幸的是，以这样带有某种成见的视角出发来审视所有民族利益的方式扼杀了对某一件事进行客观深思的可能，而主观上又违背自己的信条，所以结果就导致方法和目的的完全颠倒。为了推翻腐败罪恶的统治而进行民族振兴的尝试违背了“国家尊严”，所以人们就会反对，因为“国家尊严”并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在追求客观主义的狂热分子眼中更多地被看作是目的，因而足以让他为此度过他那可怜的一生。所以人们愤怒地抵制独裁统治，不管其代表人物是原来的弗里德里希一世，还是现在议会里大多数的治国行家们，都是些无能的小人和没用的东西，对于这些固执的人来说，以民主为准则似乎要比民族利益还要神圣。所以残害人民最为暴虐的统治受到了庇护，因为其自身也要体现出“国家尊严”，而其它造福人民的政府却拒绝这样做，尽管“民主”也不符合他们的主张。

我们德国的和平主义分子正好也变成了这种统治国家的血腥暴力分子，他们的出发点就是要使用最为残酷的暴力，当时局有所变化，受到抵抗的时候就悄无声息，而当形势与和平组织的愿望背道而驰的时候就使用暴力。但在德国具有国际主义思想的社会主义者却只是为了求得和别人的团结合作，总是报以兄弟般的情谊而不考虑报复和最起码的保护，结果反倒输得个精光，究其原因就只是因为他们是德国人。尽管这很可悲，但要想改变一件事情，则必须要先了解它。

让一部分教士来代表德国民族利益所表现的软弱无能就是同样的情况。

这并不是因为用心本身不够险恶，也不是受到某种限制，就像我们所说的要取决于“上面”的命令，而是我们缺乏对民族坚毅果敢精神的景仰，结果对年轻人就缺乏树立德国民族精神的教育，而反倒是不断地听从于偶像人物的观点。

推行国际化社会主义、和平主义等等的民主主义教育是非常呆板僵化、独断专行的宣教，因此从对它们的观察来看也是纯粹的主观主义。所以人们普遍的世界观也受到这种基本观点的影响，同时对德国民族的立场从年轻人开始就是非常客观的了。那么那些和平主义者倒是从主观

上顺从自己的主张,这样的主张还常常出于客观权益的理由受到民众无理和严重的威胁(只要他还是德国人)而从不出于自我保护的意愿站在自己一伙人的立场上来共同进行战斗。

怎样适用于每种宗教信仰的需要应根据以下情况:新教教会从自身来说能够比较好地体现德意志民族的利益,这在其诞生的背景和以后的传统中就能看得出来;目前之所以表示拒绝,只是因为捍卫德意志民族的利益在其想象的世界里和传统发展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般原则中要么缺少这样的背景,要么由于某种原因对此完全进行否定。

所以,只要是涉及到教会自身的纯洁性或是加深民族情感,以及要保护德意志民族的特性、语言和自由的东西,新教教会总是会支持德意志民族的所有利益要求的,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和教会本身紧密相关的;因此它会和一切怀有敌意的企图进行斗争,将德意志民族从最恶毒敌人的围攻中解救出来,它对犹太人的观点立场或多或少都还是基于教义出发的。那么现在就要反过来看这个问题:没有教会的帮助,其它一切想要德意志民族重生或振兴的尝试都完全没有意义和不可能吗?

我在维也纳期间有足够闲暇的时间和机会对这个问题毫无成见地进行了考察,而且还在日常的交往过程中,从多个方面确认了这种观点的正确性。

在这个不同民族都关心的焦点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清楚的只有德国的和平主义者才总是试图从主观上关注自己民族的利益,而犹太人却从未顾及到犹太民族的意愿;所以只有德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家才从“国际主义”的意义上阻止了为自己民族的合法生存通过苦苦哀求和嚎啕大哭向国际上的同志们进行乞求,尤其不要向捷克人和波兰人等去乞求,我当时就已经认清,这样的不幸一部分是由于这种理论本身,另一部分是因为我们的民众根本就没有受到足够的教育以及缺乏由此所产生出的极其有限的献身精神。

所以泛德意志运动针对天主教会进行的攻击缺乏真正的理论基础。

德国人从小所受到的教育就是要非常肯定自己的民族权益，并且不用我们对“客观”存在的诅咒和维护自我的理由来玷污孩子们的心灵，所以很快就可以看出（即使是一个激进的国家政府）就如同在爱尔兰、波兰或者是法国一样，就算是在德国，天主教会总还都是些德国人。

为了最后一次捍卫我们民族的生存所要进行的生死之战，随时都要在历史的审判面前拿出最有力的证据。

只要当时缺乏自上而下的领导，那么人们就应该尽最大的努力来履行义务和职责。不论是新教的牧师还是天主教的神甫，为了维护我们的抵抗力量他们双方都要一起来承担责任，不仅在前线，在家里更是如此。那些年里，尤其是在最开始的阶段，这两个教派都要为一个神圣的德意志帝国的存在和未来一起祈求上天。

对于在奥地利的泛德意志运动必须提出一个问题：在奥地利信奉天主教的德国人还能不能存在下去？如果能够存在下去的话，那么政治党派就不要干涉宗教或信仰方面的事情了，如果不能存在下去话，那就必须要进行宗教改革并且不需要政党的参与。

谁要是相信政治组织可以间接地进行宗教改革的话，这只表明他缺少对宗教信仰或者教义以及在其影响下所形成的心灵感应。

这对那两位先生来讲真的没有帮助。同时我认为这种宗教的形成或消亡比一个国家的建立或毁灭的意义更为重大，更别提是一个政党了。

人们没有说出来的是所提到的攻击只是针对另一方的攻击所表现出的自卫行动罢了！当然不管什么时候那些没有良心的家伙都不会在乎把宗教当成他们手中的政治工具（对于这些家伙来说差不多总是这样，并且还一贯如此）；让宗教或信仰来为一部分流氓无赖负责那肯定是错误的，他们往往滥用宗教信仰，兴许还想方设法为他们的低能弱智来服务。

能有机会事后对其政治舞弊行为进行辩护，对于议会的废物和懒蛋

来说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更合适做的了。因为一旦让宗教或信仰为其个人的罪行来承担责任并因此而对其进行指责的话，那么这个谎话连篇的家伙就会大呼小叫地让全世界的人来给他作证，看他的行为是多么的合情合理，看他对宗教和教会对他个人和他的能言善辩的解救是怎样感恩戴德。由于他的大呼小叫，愚蠢而又健忘的世人们也大多不会真正认识整个斗争的发动者并且也不会再想起他来了，这时这个无赖也就达到他的目的了。

像这样一只狡猾的狐狸很清楚地知道这和宗教完全没有关系，同时他那诚实的、但却不是那么精明的对手在争斗中失败的时候，他就会在暗中越发地幸灾乐祸起来，为的是有朝一日在对人类的忠诚和信任感到绝望时彻底退出争斗。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像这样的宗教或教会本身去为某一个人的过失来承担责任也是不合理的。如果将眼前可见的政府机构的规模大小和一般情况下人类的缺点错误相比较，那么就应该承认好人和坏人之间的关系比任何地方的其它东西大概都要好得多。在神甫当中肯定也有把职权当成其实现政治野心工具的这类人物，是的，他们在政治斗争中与其说是经常地、倒不如说是很遗憾地忘记了他们应该是真理的维护者，而不是谎言和诽谤的代言人，即使是碰到像一个这样不称职的，那也会再涌现出更多正直的、忠于职守的神甫，即使是在当今充满了谎言和堕落的时代里，他们也会像沼泽里的岛屿一样突显出来。

当一个穿着神甫长袍的坏家伙以卑劣的手段干些伤风败俗的事情，像这样的教会我的谴责是那么地少，而当许多人中间有一个人玷污和背叛了他的民族，并且还一贯如此，我的谴责也是那么地少。今天特别不应该忘记的是我们会遇到上千个像厄菲阿尔忒斯一样的政治家，他们会以同样的悲悯之心同情民族的苦难，也同样像我们民族的精英那样渴望着上天再一次向我们微笑的那一刻。

谁要是能对不涉及到日常生活中的小问题，而完全对关系到原则上的真实性或者是教义内容的问题给出答案，那就该用另一个问题来做结

论：要是你相信能从命运中看出真理，那就去做；但要有点勇气不要和一个政党有所牵连，这会是一种舞弊行为；而是要从现在起不干坏事，为了将来去做好事。

要是没有胆量，或者不清楚什么是好事，那就不要插手；尽量不要试图去做连自己都不敢公开去做的事情，绕着弯子去诈取一场政治运动。

只要宗教问题不是异端的，不危及到自己民族的审美和道德规范，那就和政党没有什么关系，就像宗教和政党的不法行为没有联系一样。

当高贵的教会代表人物利用宗教机构和教义来损害其民族利益，那就不要再跟随他们，而要拿起同样的武器进行战斗。

对于政党的领导人来说，民众信奉的宗教教义以及宗教机构是不可侵犯的，否则他就不应当是个政治家，而是一个改革者，如果他还明白这一点的话！而其它的观点是要导致灾难的，特别是在德国。

通过对泛德意志运动及其针对罗马教廷的斗争所进行的研究使我在当时，并且在以后的几年里相信这场运动对社会问题的意义认识不足所付出代价的是真正善于战斗的民众；进入议会夺去了这场运动强劲的动力，尤其还向议会机构暴露了自己的弱点；针对天主教会的斗争使得这场运动在许多中、小地区无法开展，并且因此还失去了大量的、在这个国家完全可以称得上优秀的人物。

在奥地利所进行文化斗争的实际成果几乎为零。

或许只是成功地从教会的手中争取到了成百上千的教徒而已，教会也不过只是遭受一点额外的损失罢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不需要用眼泪去缅怀那些迷失的“羔羊”；因为所失去的本来在很长时间内就再也完全不属于它了。这就是新式改革和以往情况的不同之处：以前是最好的信徒出于内心的宗教信仰来归顺教会，而现在却变得像雪崩似地去追随政治人物的“思想”了。

也正是从政治观点出发，这样的结果既可笑，又可悲。

一场看似能够成功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的政治运动又一次灭亡了，不



是因为没有必要的、严格的、冷静的领导，而是力量的分散导致了失败。

因为有一点肯定是真实的：如果泛德意志运动对广大民众的心理不缺乏了解的话，就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应该告诉领导人为了要完全取得胜利，出于心理方面的考虑，千万不要向民众指出两个或更多的对手，否则这样会把战斗力完全分散开来，因此泛德意志运动的攻击方向应该只针对一个敌人。对于一个政党来说，要是像个样样都在行的万事通似地到处插手，什么都想要，结果却收获甚微，再也没有比这样的决定更危险的了。

即使真地要对某一种信仰进行指责，那么作为一个政党所不应该忘记的事实就是根据现有的历史经验还没有那个纯粹的政党在类似的情况下取得宗教改革的成功。要是只为了记住或者相信历史的理论学说，即使有实际的用处，人们也不会去学习历史，所以要从另外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不要再去奉行那经久不变的真理，而要从历史中学到对现实有用的东西。谁要是做不到这一点，那他就学不会如何成为一个政治家；事实上他也只能是一个肤浅的、常常也是个有教养的笨蛋，所有一切美好的愿望都无法成为他实际上无能的托辞。所以事实上历史上伟大的民族领袖其领导艺术首先是要分散民众的注意力，而要集中精力针对一个敌人。民众的战斗意志越集中地得到利用，那么运动的磁性吸引力就会越大，其打击的力量也就越猛烈。能把分散的敌人分门别类地归拢起来这本身就是伟大领袖的聪明才智，因为由于生性懦弱和缺乏信心的特性对各种不同敌人的认识容易导致对自己的权益开始产生疑惑。

摇摆不定的民众在反对众多敌人的战斗中会认识到，要立刻找准一个客观对象，同时也提出一个问题：难道真的所有其他的人都不对，而只有自己的民众或自己的运动才是合理吗？

所以就表现出了自己力量的软弱无力。因此要团结内部不同的反对派，要使得在广大追随者看来只针对一个敌人来进行战斗。这会加强对自己权益的信任并增加反对攻击自己权益的气概。

泛德意志运动此前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所赔偿的东西就是成功。

运动的目标看起来很正确，愿望是纯洁的，但选定的路线则是错误的。好比一个登山的人，眼见他将要到达顶峰，并以极大的决心和力量继续攀登着，只是自己没有注意到只盯着目标，而不管攀登的状况，也不对登山条件进行勘察，最终的结果就是失败。

反过来与最大的竞争对手基督教社会党的关系看起来也是如此。他们选定的路线很聪明，也很正确，但就是对目标缺乏认识。

基督教社会党提出的利益要求，其观点大都很明确、计划周密，这也正是泛德意志运动的不足之处。

基督教社会党对于民众的重要性有一些必要的了解，所以一开始就通过公开地强调其社会特性以确保吸引一部分民众。其中主要赢得了社会底层的中产阶级和手工业者，这样就获得了永久忠实且有牺牲精神的追随者。它避免和任何宗教团体发生冲突，从而确保得到了就像教会所说的那样一个如此强大组织的支持。它因此也只有一个主要对手。它知道大规模宣传的重要意义，并且是个能够对广大追随者产生心理影响的高手。

期望通过这个政党来拯救奥地利没有得以实现，主要因为其路线上的两个失误以及其目标本身的模糊性。

这场新兴运动的反犹主义思想不是以对民族的认识为基础的，而是建立在宗教意识基础之上的。

出现这种错误的原因正好也就是导致第二个错误的诱因。

基督教社会党要想拯救奥地利，按照其创始人的观点，那它就不应该以种族政策为基本观点，否则这个国家很快就会解体。按照这个政党领袖的看法，特别是在维也纳的情形急需消除所有分裂的因素，要拥护所有取得一致的观点。

尤其是大量的捷克人充斥着当时的维也纳，所以对于一切种族问题都只抱以极其宽容的态度并且还要让一个从一开始就不是反对德意志

的政党坚持这样的观点。想要拯救奥地利的話，那么就不要放弃这样的人。尤其是在维也纳通过反对曼彻斯特自由派的斗争试图争取到大量的捷克小业主，同时相信找到了一个可以消除旧奥地利一切民族分歧，以宗教为基本原则反对犹太人的战斗号令。

按照这样的原则反对犹太人的斗争所产生有限的担忧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是最糟糕的情形下，一捧圣水总还是可以解救他们的生意和他们的人民的。

用这种表面上的理由是绝对无法严肃而科学地处理全部问题的，想必也不会理解反犹太主义思想的本质，因此对大部分问题表现出厌恶的态度。如果不是想从纯粹感情出发真正去理解的话，那么这样的观念所积聚的力量差不多只和精神方面有限的领域有关联。智慧才智则基本上处于被拒绝的地步。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多地把这个事件描绘成皈依犹太教的企图或者是某种因竞争而产生的嫉恨。因此这样的战斗就失去了内在和更高一级的庄重而显得没有道德而卑鄙下流了，这还不用说那些最坏的事情。没有人相信这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生存问题，而问题的答案自然也会涉及到除德国人之外的所有民族。

基督教社会党反犹太主义思想的价值就这样半途而废了。

而一种貌似反犹太主义的思想则比完全没有还更加糟糕；因为这样肯定会麻痹人们去相信敌人的言论，而实际上却是被人牵着鼻子走。

可犹太人却在短时间内适应了反犹太主义思想的特点，以至于他们不会想到要消灭他们，而不过是对他们的生存进行限制罢了。

这就肯定给这个多民族的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牺牲，而德意志民族自身则付出得更多。

人们不应当是以“民族主义”来划分的，因为他们自己不愿意在维也纳失去立足之地。人们期望温柔地绕过这个问题来解救哈布斯堡王朝，却反而使其陷入不幸。这场运动也就因此失去了一个政党本来可以持续以内部的动力来进行补充的主要力量来源。和其他政党的情况一样，基督教社会运动也正好通过这样的方式组建起自己的政党。

我从前注意观察这两场政治运动，一个是发自内心的活力，而另一个则是源自对一个非凡的人的高度赞赏，而当时我就认为这个人整个好像就是一个在奥地利的德意志民族的悲惨象征。

当这位死去的市长庞大的送葬队伍途径议会大厦走在环形大道上的时候，我也是成千上万名注视着这场葬礼其中的一个。激动的内心让我感觉到这个人的事业想必也随着这个国家注定要走向没落的趋势而付之东流。要是吕格博士生活在德国的话，那他一定是我们民族的伟人之一；而他却在毫无前途的奥地利当市长，这既是他事业的不幸，也是他本人的不幸。

当他去世的时候，巴尔干的星星之火就已经每时每刻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了，兴许是命运的恩赐不忍让他看到他相信还能够掩盖的东西。一方面我试图从运动的失控并且在另一方面从运动的失败中找出原因，而且还相信除去不可能的因素之外，过去的奥地利还存在着巩固这个国家的力量，这两个政党所犯的错误是：泛德意志运动在关于民族复兴的目的方面其原则上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但所选择的路线却很糟糕。它具有民族主义色彩，可惜在社会上却没有赢得民众的充分支持。但是其反犹太主义思想是建立在对种族问题重要意义正确认识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在宗教意念上的。所以这种针对某种信念的斗争实际上和策略方向相反却是错误的。

基督教社会运动对于德意志民族复兴的目标是含混不清的，但作为政党却懂得并有幸找到了自己的路线。他们能够认清社会问题的重要意义，但错误的是在反对犹太人的斗争中不了解民族意识的力量。

如果基督教社会党能够和泛德意志运动一样明智地理解广大民众并且对种族问题的重要性有正确认识的话，而其自己本身归根结底也是民族主义的；或者说如果泛德意志运动能够正确认识到犹太人的问题和民族意识的重要性以及基督教社会党的正确决策，尤其是采纳其对社会主义的设想的话，正如我当时所认为的那样，那么每一场运动都会取得能够影响德意志命运的成功。

之所以不是这样，那么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奥地利这个国家的本质。

因为我知道没有一个其它的政党可以取得成功，所以在以后的时间里我也就决定不参加什么组织或是和他们一起进行活动。要在最大程度上和最大范围内进行德意志民族的复兴，我认为这是所有政治运动都无法做到的。

我心里对哈布斯堡这个王朝的厌恶在不断地增加。

特别是对其对外政策方面的问题进行越多地了解，就越强烈地感到这个国家只会给德意志民族带来不幸。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德意志民族的命运不能由这样的人来决定，而要由德意志帝国自己本身来决定。这不是只针对一般的政治问题，而是至少要涉及到全部所有的文化领域。

奥地利真正在文化和艺术领域所展示的是衰落的特征，至少对于德意志民族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尤其在建筑方面，因此奥地利的近代建筑没有什么特别的成就，至少在维也纳环形大道两旁的建筑要是和德国欣欣向荣的建设计划相比可就微不足道了。

所以我的生活就越发陷入两难的境地，从理智和现实上奥地利对我来说是一个痛苦的，但却又是一个大有益处的学校，可我的心却在远方游荡。

我当时越是清楚地认识到这个国家的空泛无力，就越会感到有一种郁闷和不满的情绪，同时还非常肯定地认为这个国家简直就是无可救药了，并且整个国家就只会给德意志民族带来灾难。

我相信，这个国家只能压抑和阻碍真正伟大的德国人，就像它反过来要求别的非德意志人所做的那样。让我反感的还有维也纳的人种庞杂，我讨厌捷克人、波兰人、匈牙利人、鲁提尼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等等杂居一处，其中除了那些人类的细菌犹太人，还是犹太人。

对我来说这个大都市就像个乱伦的躯体。

我小时候讲的德语是下巴伐利亚地区的方言，我不会忘记它，也不会去学维也纳的地方话。我在这里呆的时间越长，就越发憎恨这种民族杂居，这种开始腐蚀原有德意志文化的东西。

那些认为这个国家还能长期存在的想法在我看来简直可笑。当时的奥地利就像一幅陈旧的马赛克拼图，粘接一个个小石块的油灰都已变旧、变脆；只要没人去碰它，兴许还能装模作样地继续存在，一旦受到撞击就会支离破碎。问题是这样的撞击什么时候来到。因为我的心从来就不会为奥地利君主制，而是为德意志帝国在跳动，这个国家崩溃的时刻就是德意志民族解放的开始。

出于这样的原因会愈发产生出让我最终奔赴故乡的强烈渴望，那里吸引我的是从童年时代起对故乡的祝愿和眷恋。

我希望将来成为一个著名的建筑师，不管成名与否，都要证明我有责任用我的一生去服务于我的民族。

最终我能有幸参加并从事很久以前就让我心潮澎湃的事业：把我的家乡和我们共同的祖国 - 德意志帝国 - 合并而成为一个国家。

许多人到现在还不能理解这种渴望的伟大之处，就是这种渴望让我竭尽全力，为了国家的命运要么拒绝幸福，要么就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去重新获取幸福；就是这种渴望让我竭尽全力去脱离故乡，为神圣的语言而战斗，追求忠于祖国的精神并历经磨难，就是这种渴望让我心痛欲绝地盼望着一颗赤子之心现在回到母亲身边时刻的到来；就是这种渴望让我竭尽全力并且我知道他们会理解我的！谁要是自己亲身感觉到作为一个德国人不能属于自己的祖国意味着什么，就能够判断出这种在和祖国分离的孩子心中一直燃烧着的深深的渴望。这种渴望之情长期折磨着这些孩子，让他们无法获得满足和幸福，直到祖国向他们敞开了大门，在自己的国家里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同胞、和平和安宁。

对我来说维也纳是最艰难的，但又是我一生中最全面的学校。我到这个城市来的时候还是个半大小子，而离开这里的时候已经长成了一个冷峻严肃的人。从大的方面来看，我在这里得到了一个世界观的思想基础；从小的方面来看则是学会了一种从政治角度观察事物的方法，对此

在我今后的日子里还要进行补充，但它们也从来没有离开我。当时学习期间那些有价值的东西直到今天我都还是津津乐道。

所以，我对这个时期的事情描写得比较详细，这段时间里对我的那些问题都给予了解答，而这就是我们政党的思想基础，这个政党从一个很小的规模开始，是为了近五年后发展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而准备的。要是我没有在很早的时候由于生活的压力和通过自学而形成我个人立场观点的最根本认识的话，那我还真不知道我对犹太人、社会民主党，或者对整个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问题等等的观点态度到今天是个什么样子呢。

毕竟，即使祖国的不幸能够千万次地激起对其崩溃内在原因的思索，那么也绝不会得出全面和较为深刻的结论来告知那个几年来自己不断进行奋斗的命运的主宰。



第四章 慕尼黑

1912年春天，我终于来到了慕尼黑。这个城市对我来说真是太熟悉了，就好像我多年在她的城墙边徜徉。我在上学的时候就认为，这里是德国艺术的中心。要是不知道慕尼黑，那就等于没有见过德国，要这样说，那就应该说，要是没有见过慕尼黑，就完全不知道德国艺术。

在大战前的这段时间，绝对是我一生中最幸福和最满意的时光。尽管我挣的钱依旧那么微薄，我不是为了画画而活着，而是为了能够确保我的生活，更确切地讲是为了能够继续学习下去而画画。我相信，我心中隐藏的目标将来一定会实现。这一点就足以让我轻松而无忧地忍受所有日常生活中那些繁琐小事了。

还有，我来到这个城市的第一刻就感到那发自内心的爱，没有一个我熟悉的地方可以与之相比。这可是一座德国城市啊！一座和维也纳多么不一样的德国城市啊！而当我回想到维也纳民族混杂的情形，心里就觉得很愉快。另外这里的方言特别接近我在下巴伐利亚地区时所使用的语言，让我回想起年轻时代。还有好多让我从心里感到亲密和可爱的地方。尤其吸引我的是那纯朴自然的魅力和精美艺术氛围的绝妙结合，不论从啤酒馆到歌剧院，还是从十月节到绘画陈列馆等等。比起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我之所以今天更加眷恋这个城市还因为事实上她和我的一生紧密相连，不可分离；我有幸真正从内心所感到的满足只能用魔力来形容，也许就像神奇的维特尔斯巴赫城堡一样不仅以其魅力使得每个人都会细心地观赏，而且还赋予他们情感丰富的气质。

除了工作上的原因，在这里吸引我的仍然是对日常政治事件的研究，其中特别是关于对外政策方面的内容。最先涉及到的是我在奥地利

的时候就认为是走了冤枉路而完全错误的德国的同盟政策。毕竟在维也纳的时候这个自欺欺人帝国的整个轮廓对我来说还不是那么清晰。当然说起来也算是一种歉意，可能在柏林的人都已经知道了，我当时就倾向于可以接受的这种同盟关系实际上是多么的脆弱和不可信，兴许或多或少是因为什么说不出来的原因保留这种看法，为了支持这项此前俾斯麦自己建立的同盟政策；而当这个同盟不像所期望的那样突然间可能中断才让那些不怀好意的国家不至于大惊失色或者让国内的密探们平静下来。

当然人们自己谈论此事让我很快吃惊地看到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令我惊讶的是我到处看到对于哈布斯堡君主制自身的本质即使是在很公开的场合里大家基本上都一无所知。那种认为可以把同盟国看作是在紧急情况下立即投入兵力的妄想恰恰在民众中间有很大的影响作用。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个君主制王朝仍然是一个“德意志”国家或者相信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人们认为这里也像德国一样有数以百万计的兵力，但是却完全忘记了，首先奥地利已经长时间地终止了成为一个德意志化的国家；其次这个帝国的内部已经随时走向瓦解。

我当时对这个国家的认识要比那些所谓官方的“外交家”们更加透彻，这些人大都是些瞎子，正跌跌撞撞地走向灾难；大众的舆论就像是自上而下公众观点的出口。而上面又像崇拜金钱一样过分地崇拜“盟友”。人们也许希望用和蔼可亲来替代正直坦率的缺陷。对此人们还真的信以为真。

当我注意到政治家的言论和维也纳新闻报道的内容偶尔出现的不同时，我感到很愤怒。这时的维也纳至少在表面上还像个德国城市。但当你离开维也纳或者最好是离开德意志的奥地利到帝国的斯拉夫省份去的话，那么就该有多么的不一样！你只需要手里拿着布拉格的报纸，就能知道如何对三国同盟的高超把戏所进行评价。那就不会有什么“政治家的杰作”之类的话，而完全就是讥讽和嘲笑了。当两位皇帝彼此在脑门儿上留下友好的亲吻时，人们非常平静、毫不隐讳地相信同盟在这一天已经完成了，就像把尼伯龙根梦想的灵光移到了现实世界上一样。

几年后对这个同盟最后进行考验的时刻到来了，意大利退出三国同盟而把剩下的两个盟友扯在一起使得他们最后成了敌人，人们是多么地兴奋！人们直到最后一分钟也完全不敢相信这样的意外结果，那就是意大利会和奥地利打起仗来了，这对于任何受打击的一方来说如果不带有外交上的盲目性的话那简直都是无法理解的。这样的事在奥地利也没有丝毫的不同。

同盟计划的支持者在奥地利只剩下哈布斯堡的皇室和德国人了。哈布斯堡的皇室出于自己的盘算和迫不得已，德国人则是出于轻信和政治上的愚蠢。出于轻信的原因，他们以为通过建立三国同盟非常有利于德意志帝国的强大和安全；出于政治上愚蠢的原因，因为第一点不合实际，而相反却帮助了把这个帝国和开始腐烂变质的国家拴在了一起并且一定会被拖向粉身碎骨的深渊，尤其通过这样的同盟就会使自己慢慢地陷入去德意志化的境地。因为哈布斯堡王朝这一方面相信通过和德意志帝国建立同盟反而会使得民族融合安全和有利，这样可以在执行其排斥德意志民族的内部政策上更加轻松和没有风险。不仅完全不用害怕来自政府方面因为众所周知的“客观现实”而受到指责，而且还可以拿同盟为幌子让那些在奥地利吵吵嚷嚷反对自己时时刻刻都在以非常卑鄙的手段进行斯拉夫化的德国人立刻闭嘴。

如果德意志帝国的德国人向哈布斯堡政府表达出赞誉和信任，那么在奥地利的德国人该如何是好呢？为了在所有公众场合给德国人留下反叛者的印记，他应该起来反抗吗？难道就是他吗，这个几个世纪以来为了他的民族曾做出了巨大牺牲的人？如果只是让德意志民族从哈布斯堡君主王朝中彻底消失，那么这个同盟还有什么价值？对于德国来说难道不是为了维护德意志民族在奥地利的优势地位才是三国同盟的价值所在吗？或者真的能够和一个斯拉夫化的哈布斯堡帝国在一个同盟中共同相处在一起吗？德国官方的外交立场以及对奥地利国内民族问题的看法已经不再是愚蠢的，而且简直就是在发病！建立一个同盟，将七千万人民的未来和安全置于其上，并且还在观望，看看年复一年这个同盟唯一的基础是怎样被盟友按部就班、坚持不懈地给毁掉的。总有一天和维也纳外交政策的“合约”就会变得多余，帝国对同盟的援助也会

毫无希望。

意大利从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

假如我们在德国对历史进行较为细致地研究并且了解民众心理的话，兴许不会相信罗马的奎里纳尔帝国和维也纳的哈布斯堡王朝会有在同一个战壕里共同作战的时刻。哪怕有一届意大利政府胆敢为其所痛恨的哈布斯堡王朝往战场上派出一名意大利士兵，除非是与敌作战，那意大利恐怕早就变成一座火山了。在维也纳我不只一次地看到意大利和奥地利的“所作所为”，心中极为蔑视并且燃起无比的忿恨。几个世纪以来哈布斯堡王朝对意大利争取自由和独立所犯下的深重罪孽，意大利实在是想忘都不可能忘掉的。不管是意大利人民，还是意大利政府都不会忘掉的。所以对意大利来说与奥地利的合作只有两种可能：要么结盟，要么战争。

意大利选择了前者，但也在悄悄地准备着后者。

特别是自奥地利和俄国的关系越来越趋于战争状态，而德意志的同盟政策不仅毫无意义而且非常危险的时刻。

这可真是一个经典的时刻，它展示出宏观和正确思路的匮乏。

到底为什么决定要进行结盟呢？难道只是为了能更好地保障帝国的未来，就好像从前自己能够建立起来的那样吗。帝国的未来不就是维护德意志民族生存的问题吗？

因此，这个问题也就是：如何在不久的将来建立起德意志民族的生存之道，以及如何能够在一般欧洲势力关系的状态下为其发展所必要的基本条件和必需的安全性进行保障？通过对德国治国政策的外交政治活动的环境条件进行较为细致的观察后就会相信：德国每年要增加近九十万的人口。因此每年对新增人口给养的困难就会越来越大，如果找不到办法和出路，那么遭受一次自然灾害就会一下子都给饿死，所以因饥饿而陷入贫困的危险要及时进行防范。



为了避免今后造成这种可怕的结果，有四条出路：

第一：可以参照法国的例子人为地限制人口出生的增长从而来应对人口过剩。

由于极度的贫困或恶劣的气候条件以及土地歉收的原因，大自然自身因此在一些国家和民族当中限制人口数量的增加；当然这是明智得近乎无情的办法。它不去阻止生殖能力本身和对所出生人口的抚养，而是对他们施以磨难和贫困，这样那些稍微强壮和健康的孩子就会重新回到母亲的怀抱。他们还要经受得住千百次的生存考验，要适合艰苦和舒适的生活，以证明他们是完美优秀的，而且还要接着开始新的考验。在对每个人进行的严酷考验的同时，一旦他没有在生活的暴风雨中成长，它还会重新召唤他回来，它得到的是强壮的人种和强壮的特性，它最终取得了最大的成就。

因此，人口数量的减少得到的却是人类的强壮，最终是人类强健的特性。

而当人类要准备限制自己的数量时，那就是另外的情况了。他不是木头做的，而是有血有肉的“人”。他比任何冰冷无情的智慧都更能通情达理。他不会阻止每个人的继续生存，而要限制过多的繁殖本身。他总是只顾自己，从来不管同类，这对他来说比起与之相反的做法则更符合人性，也更公道。只可惜的是结果却是相反的：当大自然给予繁衍生息自由的时候，还要让继续生存去经受磨难，而从中挑选出大量最有生存价值的优秀个体，并按照自己的方式让这些优秀的个体继续生存下去，如果限制人类生育，那就要拼命地不计任何代价去抚养生下来的每一个孩子。这种调整是上帝的意愿，对上帝和人类都是再次超越自然的聪明做法，是的，这证明了大自然的不足之处。实际上对人类数量的限制则贬低了每个人的生命价值，当然这恐怕连那些可爱的猴子都不愿意看到和听到的。

因为有那么一次对生育进行限制而使得出生数量降低，那些得以存活下来的最强壮的和最健康的人自然就会为生存而进行战斗，这是理所当然的欲望，要是连那些身体虚弱和疾病缠身的人也要不惜任何代价去进行“拯救”的话，那他们后代的生存则要更加悲惨，这是大自然的嘲

弄，也是大自然的意愿。

对这样的人，其结果只能是有一天结束他们的生存，因为违背了维护生存意愿的永恒法则，迟早也会遭到报应。一个强者会赶走一个弱者，这是由于生存的欲望最终会打破所有对人性所谓可笑的束缚，并代之以自然的人性，即消灭弱者来为强者提供空间。

谁要是想通过采取限制人口增长的办法来保障德意志民族生存的话，那就等于夺去了他们的未来。

第二：第二条出路是我们今天常常一再建议并听到赞许的：进行国内垦殖。这项建议本来是很好的主张，但只考虑到由此会造成极大的损失而常常被误解。

无可置疑的是土地的收成总是会达到某个极限。但只会是达到某个极限而不会无休止地提高。在某个阶段德意志民族的增长和土地利用的增加达到平衡而没有饥饿的危险存在。与另一个事实相悖的是，对物质生活需求的增长通常要快于同期人口数量的增加。人们对食物和穿着的需求年年变得越来越大，这和百年前我们前辈的需求已经无法可比了。那些认为可以通过提高生产产量来实现人类增长所需生活条件的观点是错误的：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只能在某种程度上才能实现，同时为满足人类不断提高的物质需求土地所增加产量的部分则被消耗掉了。一方面是大规模地限制人口，另一方面是人类对土地生长所花费的勤奋努力也还是会受到一定限制的。尽管付出了所有的努力，也不会让它长出更多的东西来，结果甚至有时候还会因为时间的推迟而遭遇灾难。如果出现歉收等灾害，那么饥荒接下来会随时再次到来。这在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会经常出现，而只有当罕见的好年景储备充足的情况下才不会发生饥荒。最后再也无法满足因为贫困而产生的需求，并且饥饿伴随民众的时刻渐渐临近了。现在又得让大自然帮助想办法来解救它自己选定的生命；或者是人类自身来帮助自己，看看由此对民族和人类特性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说要采取人为的方法阻止人口的增加。

无论如何，人类的未来都即将来临，因此每一个民族当然都逃不过灾难，人们要对此有所担忧。

第一眼就能够轻而易举地看出来这是正确的。但还要想到的是：因为土地的收成不可能长久地和持续增长的人口数量相对称，要么让大自然去决定对人口增加进行调整，但如果可能的话还应该自己解决，当然要有比今天更好的办法才行，所以到了一定的时候整个人类就被迫去完成必要的平衡。本来整个人类都应该做到这一点，而不只是像那些现在不再有足够的力量和实力来确保自己所需土地而遭遇到贫困的民族。这是因为在这个地球上现在总还是有着广袤的土地等待着去得到利用和开垦。世界上的土地本来就不是为了某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将来等在那里的，而是为了有能力去占有、使用、勤奋耕种的人们所准备的。

大自然是没有政治意义上的边境线的。它先将生命置放在地球上然后旁观着人类的自由搏击。对那些勇敢和勤奋的人们就好像对它最为宠爱的孩子那样而允诺获得生存权力。

当一个民族局限在国内垦殖上被迫实行自我人口限制政策，而另一些民族则自己呆在不断扩大的土地上不断地增加人口。那么总会出现一次一个民族现有的生存空间会越来越小，而且还会提早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可惜还常常是优秀的民族，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唯独真正的文明民族，所有人类进步的代表并受到和平主义的迷惑后才会决定放弃获得新的土地，而满足于进行国家内的垦殖；而劣等民族却知道确保在地球上占有广大的生活领域，因而这样的结果是：文化程度较好，只是有点粗暴的民族会在一定时间内因为土地的限制控制人口的增长，而文化水平较低，但天性野蛮的民族正因为其生活领域的广大则能够毫无节制地增加人口。换一种说法就是：总有一天这个世界将被文化上劣等的而体格上优越的人所占据。

那么在一个还有点遥远的将来就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我们这个世界由时髦的民主主义思想所统治，被那些数量上占优势的民族来发号施令，要么这个世界按照自然的实力法则来进行统治，那么取得胜利的总归还是那些残暴的民族，而不再是自我约束的民族。

没有人会怀疑，将来这个世界还要为人类的生存而进行极为残酷的战斗。最后胜利的永远是人类自我生存的渴望。这种渴望可以使人性中所谓的愚昧、胆怯、目中无人、自以为是像白雪一样在三月里的阳光下融化。长久地战斗使人类成长，长期的和平让人类消亡。

因此，对于我们德国人来说，这个“国内垦殖”的口号已经被认为是 不祥之兆，因为在我们中间立即强化了一种似乎是找到了一种方法的观点，也就是按照和平主义的观点在柔和的昏昏欲睡中就能够“获得”生存。我们要严肃地对待这种观点，这意味着为保留住这个世界上自己应有的一席之地而停止努力奋斗。就连德国的普通老百姓都相信通过这样的途径可以确保生存和未来，从而终结了每次为德意志生存的必要性所进行的主动尝试。可是实际上每一项有益的外交政策都会因为民众这样的观点而被葬送，与之同时葬送的还有德意志民族的未来。

绝非偶然的是，首先知道这样结果的总是犹太人，他们懂得并企图将这种致命的思路植入到我们民族的头脑中。犹太人非常了解德国人的性格特点，但却不知道德国人成为牺牲品认为会感激愚弄了他们说自己找到了宝藏的西班牙人，谎称找到了让大自然失算而使得人类为生存而进行艰苦无情的战斗成为多余的途径，取而代之则是通过劳动，有时经常是无所事事而只是通过“欺骗”就能一跃而成为地球的主人了。

德国每一块垦殖的土地首先有利于消除社会弊端，特别是不再有土地的投机行为了，但是没有新的国土和不能保护自己的国土对于一个国家的未来是永远不够的。这不需要对此进行特别地强调了。

换一种说法，我们将在短时间内不仅消耗掉我们的国土，还有我们的实力。

接着需要明确指出的是：在国内某一特定的小范围垦殖地区内实行的人口限制政策以及对人口生育繁殖实行控制会产生相同的结果，这样会导致对这个国家极为不利的军事政治局势。

一个民族聚居地的大小本身就已经具有一种确立其外部安全的本

质因素。一个民族所拥有的空间越大，那么对其天然的保护也就越大；因为针对地域狭小的国家可以以一种更快、更容易，尤其是效果更加显著和更加全面的方式来采取军事行动，相反对国土面积广大的国家就不可能采取这样的做法。一个国家的广大地域对草率的军事进攻总会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的，但需要进行长期艰苦的战斗才能取得胜利，因此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是不会为贸然袭击去进行冒险的。所以国土的广阔本身就说明了能够轻易地维护民族的自由和独立的原因，相反国土面积的狭小就会招致被侵占的可能。

事实上，为实现使不断上升的人口数量和所谓帝国范围内固定不变的国土面积之间达到平衡的最初的两种可能性已经被否决。持这种观点的原因当然和以上的看法不同：对限制人口出生采取反对的态度首先是出于某种道德情感的原因；拒绝进行国内垦殖则是出于愤怒，因为在这种愤怒的情感中可以察觉到对占据土地的攻击和完全可以看得到对私有财产进行斗争的开始。特别是其表现形式就像救世说中所告诫的那样，人们对此也很快表示了赞同。

通常来看，防御大规模的进攻不会很灵活，并且丝毫无法触及到问题的本质。

那么就还只有两条出路来为不断增加的人口数量确保工作和面包：

第三：要么把多余的百万大众驱赶到新获得的土地上，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民族继续在自给自足的条件下生存；第四：要么通过工业和贸易来满足新增的需求，用增加的收益来承担生活开支。

也就是说：要么开拓领土，要么实施殖民和贸易政策。

对于这两条出路都要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去进行观察、审核、建议和辩论，直到最终方案的形成。

两条出路比较起来，当然是第一条较为周全些。

可将新增居民迁移到新开拓的领土上，尤其是当我们不仅看到以前，而且在看到将来的时候，则具有很多优点。

作为整个国家的基础要尽可能地维护农民健康的生存，但这从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我们今天的许多不幸都只是由于农村和城市人口之间不正常的关系而产生的。中小阶层农民的充实粮仓在任何时候都是目前世界上抵抗社会动荡的最好保证。为了能够获得每天的面包，这也是一个国家国内经济活动所能找到的唯一的解决办法。所以工业和贸易由于其不利地位而退居其后，并且一般把它们列入国家日用品经济和调节经济的范围内。这两种都不再是国家食品经济的基础行业，而是作为辅助性经济。此外，它们的任务更多地是要保持自身生产和各个方面需求的平衡，要是整个国家的食品供给或多或少都不再依靠外国，同时，尤其在困难时期，要帮助和确保国家自由和民族独立。

当然，这样的国土政策不能到像喀麦隆那样的国家去实施，而是特别要在欧洲进行。当然这不可能是上天的意愿，但与其它国家相比，它却给了这个国家五十倍之多的人口，对此我们要保持冷静和客观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让政治意义上的边境线来改变边境线所具备的永恒权利。如果这个地球真地拥有给所有人的生存空间，那么也应该给我们必不可少的土地。

人们当然不愿意这样做。因为这样自我生存权利就会产生作用；拒绝给予善意，则代之以拳头。要是我们的前辈以前所做的决定和现在的和平主义者那些胡思乱想有联系的话，恐怕就只能有目前三分之一的土地才能据为己有了；那么德意志民族在欧洲兴许就几乎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去担忧的了。没有了，帝国东部拓展的两片区域以及我们至今还能够坚守的国家实力和广大的领土理所当然就要归功于自我生存而战的坚定信念。

即使出于其它的原因，这样的解决办法也是正确的：目前许多欧洲国家就像倒置着的金字塔一样。比起他们在殖民地、对外贸易等方面所能承受的负担来说，他们在欧洲的国土面积简直是小得可笑。可以这样说：塔尖在欧洲，塔底则在全世界；与美国所不同的是，它的根基还在自己的陆地上，而触角则伸到地球的其它地方去了。所以这个国家的内在实力非常雄厚，而欧洲大部分的殖民地宗主国则十分衰弱。就连英

国也不能作为反证，只是因为人们面对大不列颠帝国而轻易地忘记了盎格鲁撒克逊的世界竟是同样的情况。由于英国和美国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共同性而与欧洲的其他各国不能相提并论。

当时对于德国来说实施国土政策的唯一可能就只能是在欧洲获得新的领土。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殖民地似乎不适宜迁移大量的欧洲人而得不到长期的利用。而在十九世纪以和平的方式去获得殖民地已不再可能了。所以，这样的殖民地政策只能通过艰苦的战斗才能实施，其目的不是为了谋取欧洲以外的土地，而更多地是为了自己本国领土而奋斗。

这样的决策当然需要一致的献身精神。半途而废、拖拖拉拉的表现是不行的，而要鼓足勇气、竭尽全力才行。这就要求整个帝国的政治活动全部贡献给这样一个目标；除了这项工作和责任之外，不允许有什么其它方面的考虑。要想尽一切办法弄清楚只有通过战斗才能够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即使不得不拿起武器也要平静地去面对。

所以要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去审视整个联盟国家并且还要评估其利用价值。想要在欧洲得到国土和耕地，大概只能向俄国索取，那么新帝国就必须让从前的骑士军团再次出征，用德意志的剑为德意志的犁去获得土地，为德意志民族去获得每天的面包。

为了这样的政策，在欧洲只有唯一的盟国：英国。

只有和英国结盟，我们才能防备自己的背后不受攻击，重新开动德国战车。我们的权力并不比我们前辈的要少。没有一个和平主义者会拒绝享用来自东方的面包，尽管是以用“剑”来替代耕作的犁！要得到英国的好感，不应做出太大的牺牲，即便是放弃殖民地和海上霸权，并且避免与英国工业进行竞争。

只有观点明确才可以去实现目标。放弃国际贸易和殖民地，放弃德国战舰，集中所有精力去建设国家的陆军。

其结果固然在近期很受约束，但却是个伟大和强盛的未来。

有一段时期英国对此很好商量。因为或许可以理解为德国由于人口的增加，对此要么和英国一起在欧洲，要么不靠英国在全世界找到一个

解决的办法。

首先还应该知道的是，在世纪之交的时候，伦敦自己也曾试图和德国亲近。在近几年里我们当时第一次表现出非常吃惊地看待这件事情。惶惶不安地认为我们会为英国火中取栗；就好像双方的结盟完全是建立在另一个基础上，而不是出于双方共同的利益。和英国也许可以作这样的交易。英国的外交政策总是十分的狡猾，要知道无以报答就不会取得成就。

试想一下，如果德国能像1904年的日本那样采取灵活的外交政策，那么将无法估计德国将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那就不会爆发“世界大战”了。

那就可以避免1914年至1918年十倍于1904年的所付出的鲜血。那德国将在这个世界上处于何等的地位！归根结底，和奥地利的联盟简直就是胡闹。

因为和这种干尸一般的国家联盟不是为了进行战斗，而是为了维护通过使用狡猾的策略慢慢地，但要稳妥地把德国人从君主制王朝中清除掉的方式来得到永久的和平。

所以这样的联盟是不具备任何可能性的，因为长期以来对这个国家都无法期待代表德意志民族利益的明显表现，也不准备停止使用其力量和决心来进行毫无节制的去德意志化进程。如果德国没有这么多的民族情感并且会毫无顾忌地从无能的哈布斯堡王朝手中夺回上千万同胞的生命，那就兴许真的不需要期待去伸手要这种高瞻远瞩和大胆冒险的计划了。旧帝国对奥地利问题的立场是对整个民族命运之战所采取态度的试金石。

无论如何也没有注意到，德意志民族是怎样一年又一年不断地遭受到压制的，因为这样的联盟唯独只能让奥地利来决定德意志特性的存在。

只是人们还没有完全走上这样的道路。

再也没有比战争更让人害怕的东西了，只不过到后来是在最为不利的时刻被逼无奈罢了。

人们的生命随时光流逝，却被时光夺去了生命。人们梦想着维护世界和平，而结果却是世界大战。

这就是创造德意志未来的第三条出路为什么没有被完全重视的主要原因。我们知道只有在东方才能获得新的国土，战争是必要的，但也愿意不计任何代价得到和平；而德国外交上的口号已经很长时间不再是：尽一切所能维护德意志民族，用各种手段维护世界和平。怎样去得到，那是显而易见的了。

我还要特别回到这一点上来。

那就是第四种可能性：发展工业和世界贸易，扩张海上霸权和殖民地。

实现这样的发展计划肯定比较容易并且兴许还要快一些。向一个地区进行移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许会持续上百年；是的，这正是国力强盛的体现，这不是一种突然的闪现，而是一种逐渐的、全面的和持续的发展，而工业发展有所不同，它可以在几年时间里迅速膨胀，就像肥皂泡一样而不是真正地具有实力。一艘军舰当然可以很快地建造完成，而修建一座农庄并且安置农民则要通过顽强的奋斗才能实现；只是，摧毁前者比后者也要快得多。

如果德国走上这条道路，那么至少要明白，这样的发展总有一天会因战争而结束。只是可以通过友好和文明的行为以及不断地强调和平观念就可以避免让孩子们拿起武器，在像人们已经一本正经地吹嘘的那种在“人类和平竞争”中得到自己想要的香蕉。

不，如果我们走上了这条道路，那么总有一天英国会成为我们的敌人。而更使人愤怒的是（当然这完全出于我们的善意），总有一天英国会以自私自利的粗暴来抗击我们的和平意愿。

但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要在欧洲实行国土政策只有联合英国来反对俄国，而相反要实施殖民和国际贸易政策则要考虑联合俄国来反对英国。因此要当机立断，尤其要尽快放弃奥地利。

从各个方面考虑在世纪之交的时刻与奥地利结成同盟简直就是在发疯。

就是完全没有想到和俄国联合来反对英国的话，或者至少要和英国联合来反对俄国，这两种情况都可以结束战争，而为了阻止战争的发生，人们才决定实行贸易和工业政策。他们采用“经济和平”来征服世界的策略势必就毁掉了他们此前的强权政策。有时候也许人们还不是完全肯定，特别是从英国不时地传来许多非常明显威胁的时候，他们就决定建造海军舰队；当然其目的不是要攻击和消灭英国，而是为了“保护”所谓的“世界和平”以及“和平”地去征服世界。所以军舰的规模在各个部分都要稍微小一些，这不仅体现在数量上，而且在吨位上和装备上，为的是最后还能够看得出是出于“和平”的目的。

那种用“经济和平”来征服世界的空话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但竟然还被抬高到国家政策主导原则的地步。更加可笑的是竟然无所顾忌地把英国称作是由此取得成功的主要证明。我们的历史教材和历史理论研究对此共同犯下的错误已无法得到纠正了，这也足以证明有多少人“学习”了历史，但却并没有领悟或者完全没有理解，而恰恰就是在英国对这种理论的驳斥却得到了证实，还没有那个民族像英国人那样通过极其残忍的手段用利剑给经济征服做了更好的准备并在以后肆无忌惮地去进行保护的。从政治力量中汲取经济利益并且以经济上的优势再去加强政治权力，难道这不正是英国国家策略的标志吗？那种认为英国自己很怯懦，不敢为保障其经济政策而去流血的观点也是完全错误的！英国没有“国家军队”也不足以来作为反证；因为这不取决于当时的国防军的军事形式，而更多地要决定于所具备的意志和决心。英国总是拥有其所需的军备。要想取得成果，就要拿起武器进行战斗。只要有雇佣兵，那就使用雇佣兵去打仗；有时候整个国家都要付出鲜血，但付出这样的牺牲就得取得胜利；战斗决心和意志顽强以及肆意妄为都是同等重要的。

在德国，通过学校教育、新闻报道和漫画刊物这类渠道使人们对英国人的特性以及大英帝国的本质形成了一种极其恶劣的自欺欺人的印

象，这样的错觉慢慢地到处传播，其结果就是贬低英国人，可这样做只会招致严厉的报复。这样的假象让大家深信不疑地认为英国人都是些唯利是图、胆小怯懦的生意人。要知道一个世界级的大英帝国是不可能只靠伪善和欺骗来建立的，只可惜我们那些崇高的学术科学却不明白这一点。就连一点警示也都没有听到或者是闭口不谈。我还记得当我们在弗兰德斯和英国人相遇的时候我那战友惊奇的表情。开战的头几天就渐渐地意识到这些苏格兰人真的不像那些漫画刊物和报告中所刻画的那样。

当时，头一次让我就注意到宣传形式的实用性。

制造谎言当然有利于散播谎言的人；可以用即使是错误的例证来证实经济征服世界的正确性。英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也会做得到，因为还要考虑到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诚实可靠，而这也是那“阴险狡诈”的英国人所缺少的。人们期望，尤其是对小国的示好就可以轻松地赢得大国的信赖。

我们诚实可靠的性格还可以让其他人的内心感到恐惧，这是我们所没有想到的，因为我们完全认真相信的，而其他则完全看作是一种狡诈欺骗的表现，也许完全感到震惊的是直到对我们那些“正直”观念的无比愚蠢有了深刻的认识后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

仅仅从“以经济和平来征服世界”这类谎话中就可以清楚和明白地看出三国同盟是毫无意义的。那还能和哪些国家进行结盟呢？和奥地利联盟就不能在欧洲用战争的方式来进行征服。正是因为如此，从第一天起联盟就存在着内在的弱点。俾斯麦可以容许这样的权宜之计，但以后的蠢货就不能长久这样下去了，至少在一定时间内，因为俾斯麦时期联盟的基本条件就已经长期不存在了，那就是俾斯麦当时还相信奥地利是一个德意志国家。随着选举权的逐渐实施使奥地利成为议会统治的国家，去德意志化的喧闹开始了。

和奥地利联盟对种族政策来说简直就是有害的。人们耐心地等待着早晚会有那么一个演变成为全新的斯拉夫化大国在帝国的边境旁边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来进攻德国，比如说俄国。同时联盟内部本身也年年变得空虚和软弱，就内部的相互关系中联盟思想的唯一支持者，在君主制王朝中失去影响力并被排挤出权威性的地位。

在世纪之交和奥地利进行联盟就已经陷入了奥地利与意大利进行联盟同样的境地。

对此也有两种可能：要么和哈布斯堡君主制联合，要么抗议排挤德意志民族。如果开始这样做了，那么其结果常常就会是公开的斗争。

从心理上看，三国同盟的意义是微不足道的，因为越是局限于维护联盟的存在，其稳定性反而会被削弱。相反如果每个缔约国越是希望通过同盟来达到一定的、明确的扩张目标，那么这个同盟就越强大。在这里，就如同别的地方一样，其强大不在于防卫，而体现在进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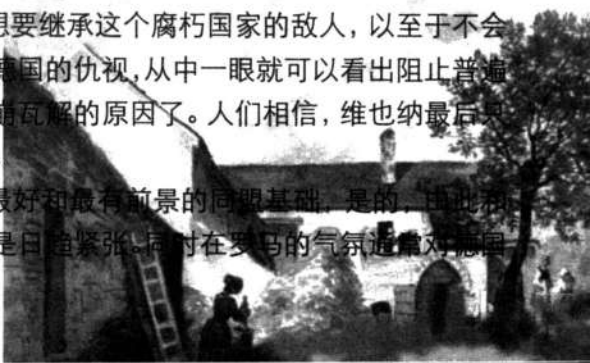
这一点还可以从各个方面得到认识，只可惜那些所谓的“专家们”竟然会不知道。特别是当时参谋总部的鲁登道夫上校在他1912年的备忘录中就指出了这样的弱点。当然这样的事情对于那些“政治家”来说是没有任何价值和重要性可言的，只要涉及到“外交家”，为什么完全明智的东西反倒看起来是普通的、死气沉沉的呢？

德国真是走运，1914年的战争间接因奥地利而爆发，哈布斯堡王朝不得不参战，但要是情况与之相反，那么就只有德国孤军奋战了。哈布斯堡王朝本来就不能够或者说也不愿意自己参加由德国而引起的战斗。就像以后谴责意大利那样，应该早点指向奥地利：人们更愿意保持“中立”，为的是至少在一次革命开始之前来拯救这个国家。奥地利的斯拉夫人则更希望在1914年瓜分君主制王朝，要是这样的话倒是给德国帮了一个忙。

但是和这个多瑙河畔的君主制王朝结成同盟带来了多么大的危险和困难恐怕当时认识得很少。

首先，奥地利有太多的想要继承这个腐朽国家的敌人，以至于不会在一段时间里产生出某种对德国的仇视，从中一眼就可以看出阻止普遍都期望和盼望君主制王朝土崩瓦解的原因了。人们相信，维也纳最后只有通过柏林才可以达到目的。

其次，德国因此失去了最好和最有前景的同盟基础。是的，因此和俄国和意大利的关系反而总是日益紧张。同时在罗马的气氛通常对德国



还是很友好的，意大利人对奥地利的敌意蕴藏在心里，但偶尔也会爆发出来。

因为现在大家一时看好贸易和工业政策，因此就连一点点对俄国的不满也都没有了。这两个国家的敌人还能享有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事实上首先是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分子通过各种手段煽动和挑拨这两个国家走向战争的。

最后就是第三点，这个同盟对于德国来说隐藏着无比的危险，因为对于一个在俾斯麦时代就处于敌对状态的大国来说会很轻易地动员起一长串的国家做好针对德国的战争准备，同时还能够用奥地利结盟国的不义之财向他们许诺所需的花销。

整个欧洲东部发生了反对多瑙河君主制的暴动，特别是在俄国和意大利。如果奥地利刚好不是德国的结盟国拥有这样一份诱人遗产的话，那么自从爱德华国王开创建立的国际联盟恐怕就无法实现。只有这样才能让这么多国家带着各自不同的愿望和目标出现在同一个战线上。每个国家都期待着只要共同对德国采取行动，自己就可以从奥地利那里得到不义之财。而把土耳其看作是属于这个倒霉的同盟里暗藏的参战方就更增加了这种危险的不幸程度。

犹太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来的国际金融体系则需要这样的诱饵，为的是实施那祈盼已久的、能够消灭还没有适应正常国际金融经济监管体系的德国的计划。只有这样才共同打造出一支坚强、勇敢、拥有百万士兵的联合军队，同时也激怒了受骗的西格弗里德。

我在维也纳的时候就对和哈布斯堡王朝所建立的同盟感到厌恶，并开始变成内心长期受到折磨的根源，这让我在以后的日子里更加坚定了我那业已形成的观点。

在我所交往的小圈子里，我毫不隐讳地认为，如果人们还不及时间然醒悟必须脱离这个联盟的话，那么这个和一个走向没落的国家达成的合约将把德国引向灾难性的崩溃，我对此坚信不疑。当世界大战的风暴扫除了理性的思索并代之以狂热的陶醉时，我一刻也不想耽搁对现实进

行冷峻地观察。即使我自己在前线的时候，当谈及这方面问题的时候，我也发表我的意见，对于德意志民族来说这个同盟最好是尽早中断，如果德国通过这样可以限制住对方，那么抛弃哈布斯堡王朝完全不会有什么牺牲；因为要用上百万士兵来维护这个纵情放荡的王朝，还不如用他们去解救德意志民族。

战争前好像至少在一个兵营里就出现了对所执行的联盟政策稍稍有些怀疑的迹象。德国的保守人士逐渐地开始警告这种过于轻信的做法，仅此一点就非常明智，但也只当作了耳旁风。人们相信走上了“征服”世界的正确道路，取得的成果是丰硕的，而付出的牺牲则等于零。

对于那些著名的“草包”来说，除了默默地观望外而没有别的办法。那些“专家”不管怎样都会径直走向毁灭，就像哈墨恩的捕鼠者一样诱导着可爱的人们趋之若鹜地跟在他后面。

更深层地去理解的原因可能还在于把“经济征服”作为实际上政治出路的荒唐之处，以及把维护“世界和平”确立为全人类的政治目标，这就是我们这个政治思想的通病所在。

德国的工业技术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以及德国贸易蒸蒸日上的成果总会令人们忘掉一件事，那就是这一切只有在国家强盛的条件才成为可能的。相反，有些人则过分地认为，国家自身的存在首先多亏了有那么一个经济机构才得以体现出来，这个机构要能够按照经济利益进行管理并且还要能够根据国家的生存与经济相关的状况来审查和评价出最为健康和正常的经济。

国家和某种特定的经济理论或经济发展毫无关系。

国家并不是一个在有限生存空间内为满足经济活动的经济组织的总和，而是一个由肉体和精神结合起来类似生命一样的社会组织，为的是更好地继续维护人类的特性并且实现上天所指定的目标。只有这些才是国家的目的和意义所在。经济只是实现目标所必需的辅助措施之一。只要国家不是从一开始就建立在错误或者是非正常的基础之上，经济从来就不是国家的根源和目的。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得通，国家是不需要什

么边境线来作为其存在的先决条件的。这只对想要确保养育同胞的那些民族有用，也就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准备为自己的生存而战。而像寄生虫一样侵入到别人身上的民族，尽管为自己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也无法建立起自己的、具有一定生活空间的国家。这就首先涉及到过着寄生生活的民族，尤其是让全人类受苦受难的民族：犹太民族。

犹太人的国家在空间上从来就没有界限，甚至在宇宙中也无边无际，但却限制在种族观念上。所以这样的一个民族总是在某一个国家内自成一体而形成一个国家。以“宗教”作为先导，利用雅利安人对宗教信仰所赞许的宽容作为保证，这可真是最有创意的花招了。因为摩西教实际上和维护犹太人的教义发明没有和什么不同。这以后还涵盖了几乎所有的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学科，在此就不过多地进行叙述了。

人类社会的建立其首要原因就是一种维护自身特性的驱动。因此国家就是一个人类组织的结合体，而不是经济的组织。这是有很大区别的，而对此特别是现在所谓的“政治家”还总是无法理解。这些人还相信国家可以通过经济来建立，同时国家实际上永远只是出于本性和种族生存意愿实现其特性的结果。这些都是英雄般的美德而不带有类似小商小贩那样的自私自利，因为维护一个种族的生存是要以舍己为人的精神为前提的。就像一句诗里所表达的那样“没有投入，怎能有所收获”，就是说个人的献身精神是维护种族的必要保证。因此建立和维护一个国家最根本的前提条件就是要有一种特定的同宗同族的归属感和乐于奉献一切的精神。这样，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民族就会形成一种英雄般的美德，可如果按照各种不同的国家形式作为其存在的先决条件而无法对其特性进行证实的话，那么过着寄生虫般生活的人就会产生出虚伪欺诈和阴险残暴的本性。在建立一个国家时，至少在最初的时期，那么在自我保护的过程中投入这种精神情感的民族就会被打败，也就是说会遭受到奴役，因为在双方彼此的战斗中只有极少数的人才具有英雄般的美德，或者说还没有滋生出敌对方寄生虫般的狡诈欺骗，那么这样的民族早晚会陷入亡国灭种的境地。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也不能把这归咎于缺少智慧，而更多地应该怪罪于缺少那种总是想要隐藏在人们思想背后的

决心和勇气。

国家的建立和国家的维护在本质上与经济只有极少的关系，最为明显的事实就是国家国力的强盛只有在极少的情况下才和所谓的经济繁荣一起崩溃，而大量例证显示经济的繁荣似乎表明国家几乎已经坍塌。建立一个国家果真首先要归功于经济实力或动力的话，那么高速的经济发展也同时意味着国家的军事实力的强大，而相反则不成立。

相信建立国家和维护国家是靠经济力量这类的想法特别让人感到无法理解，尤其在这个国家竟然还有一定的影响，而在历史上恰恰清楚而透彻地表明与此相反。普鲁士正好可以最明显地证明，不是物质上的特性，而只靠思想上的美德就能够建立起国家。就是在他们的保护下经济才一直保持着蓬勃的发展，但也随着国家力量的崩溃而消亡，这个过程直到现在我们还非常伤心地关注着。人类的物质利益能够极好地滋生繁衍，而英雄的美德却总躲在阴影里，以至于当它试图进入生存的范围时却破坏了自我存在的基本条件。

当德国在强权政治方面开始崛起的时候，总是伴随着经济的飞跃，而当经济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各个方面的内容时，道德也随之被扼杀了，接踵而至的是国家的衰亡，当然同时还有经济本身的破碎。

如果提出这个问题，什么是建设国家或仅仅是维护国家的真正力量呢？那只能总结出一点：为全体去牺牲个人的才智和意愿。这种美德尽管和经济毫无关系，但却真正地认识到了人们为什么要做出牺牲，也就是说：人们不是为了商业而死，而只为了理想。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英国人在了解人民比鼓动他们理解参战时更具有心理优势。我们为了面包而奋斗，英国人则为了“自由”，而且还不是为了自己，不，而是为了弱小民族。而我们则对这样的无耻行径表示嘲笑，或是感到愤怒，这也正说明了战前德国所谓的国家策略是多么的愚蠢和无知。可以说根本就不知道人们甘愿牺牲的意志和决心所能产生力量的本质。

1914年的时候德国人还相信为理想而战可立于不败之地；而一旦明白了是为了面包而战的时候，他们反到宁愿放弃战争了。

我们那些充满智慧的“政治家”却对这样的思想转变感到惊奇。他

们从来就不明白，人们从现在起要为经济利益而奋斗，以尽可能地避免死亡，因为这样才会永远享受其奋斗所带来的乐趣。他们担心拯救自己的孩子会让最为体弱的母亲成为了英雄，并且维护民族生存、保护自己的安乐窝或者说是保卫自己的国家的战斗历来只会把男人们推向敌人的刺刀。我们可以把下面的话当成永远的真理：一个国家从来就不是以和平的经济建立起来的，而是靠维护自己民族的天性，这只能源自英雄的美德或者阴险狡诈，前者成为了雅利安人的劳动文明国家，而后者则形成犹太人寄生虫的殖民地。而一旦这样的本能在一个国家或民族内开始蔓延，就会成为受奴役和受压迫的诱因。

战前那种以和平手段通过贸易和殖民政策就能为德意志民族开发和征服世界的想法，实际上是典型的建立和维护国家美德的失败标志，并由此认识到意志的力量和行动的决心；而直接导致的结果当然就是世界大战。

对于没有进行深入研究的人来说，他们会认为德国人真的比一般人好，而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团是：难道德国恰恰就是一个来自纯粹强权政治绝好的例证吗，以前的普鲁士帝国是这个帝国的萌芽吗，是靠光辉灿烂的英勇气概而不是靠金融政策或商业贸易形成的吗，这个帝国本身就是对强权政治和勇于牺牲精神极好的报答吗。德意志民族怎么能有这样病态的政治天性？因为这里涉及的不是某个单独的现象，而是衰亡的特征，就像无数的、令人恐惧的点点鬼火在闪动，在上上下下叮咬着人们的身体，或者像是到处腐蚀着民族的病毒。其表现就像是一种持久的毒素，在一种神秘力量的驱使下进入英雄身体表面的血管里，为了让健康的、只是想自我保护本能的理智渐渐地瘫痪。

限于我对德国联盟政策和帝国经济政策的观点，同时我在 1912 至 1914 年期间将所有问题进行无数地思索，认为这个谜团的谜底就只能是一种力量，就像我以前在维也纳的时候从其它方面的观点所认识到的那样：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和世界观，以及其组织方面的影响力。

这是我一生中第二次钻研这种具有破坏性的理论，当然不会受到我日常生活环境压力和影响的左右，而是通过对日常政治生活过程的观察加以引导。同时我又重新专心致力于最新出版的理论文献之中，并且试图理解其意义，还与现实中政治、文化以及经济生活中真正发生的事件和现象进行比较。

我第一次认真地尝试去战胜这种世界性瘟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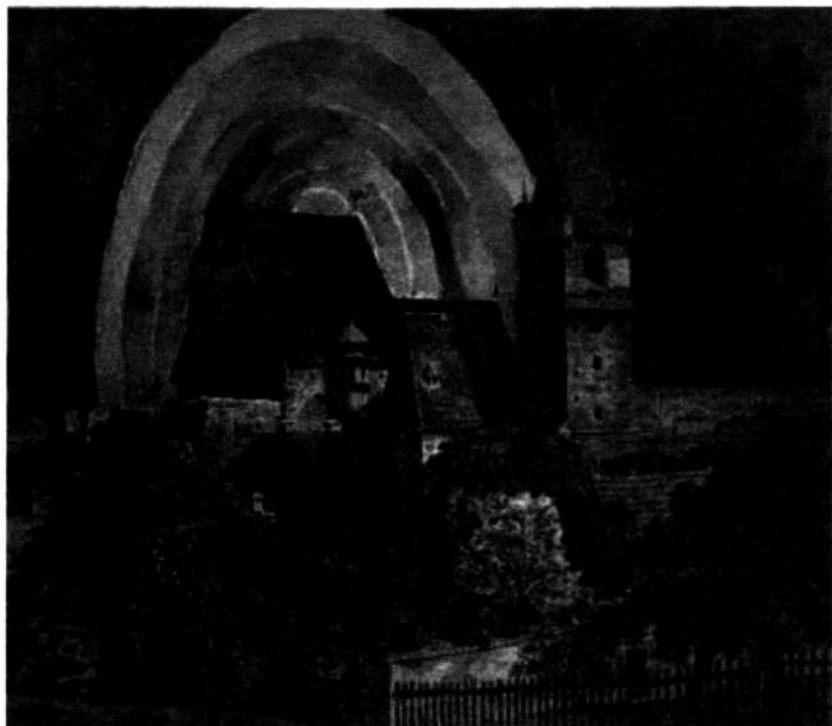
我专门去钻研俾斯麦的《非常法案》、《战斗与成功》。渐渐地为我的信念获得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以至于从此不得不对这样的问题进行了从来没有过的内心世界观的转变。也就是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犹太教义的关系继续进行全面地考查。

从前在维也纳的时候，尤其对于我来说德国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巨人，现在则开始感到有些惴惴不安。同时我自己暗地里也和我的熟人埋怨德国的外交政策以及如何对待我认为是不可信的、轻浮的民族，对待当时德国最主要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我真的不能理解，人们怎么可以对这样一种危险视而不见，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也难以置信。当时我就向周围的人，就像现在我向大多数人一样对这种给所有胆小鬼的安抚空话“这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给予了警告。一种精神瘟疫已经把一个大帝国给摧毁了。难道德国自己也同样像其它所有国家一样不应该屈从于这样的理论吗？

1913至1914年期间，我曾第一次在不同的场合表达出我的信念，其中部分人是忠心于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我确信德意志民族今后的问题就是要消灭马克思主义。

从这个倒霉的德国联盟政策中我看到由这个理论的破坏性所导致的后果之一；因为其可怕之处就在于这种毒害在看不见的情况下把一个健康的经济和国家理论体系几乎全部给破坏掉了，而遭受侵袭的人们自己往往还全然不知，无论怎样去进行交谈和争吵，都已经是这种最应遭到严厉拒绝的世界观所造成的结果了。

德意志民族的内部衰落当时就已经开始很久了，只是活着的人还不清楚谁是其生存的毁灭者。有时人们会进行治疗，但总把病症和病源混为一谈。因为人们对此不能够或者是不愿意去了解，所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就只有江湖郎中空谈的价值了。



第五章 世界大战

我在顽皮的孩童时代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快活的，我出生的年代正好处在更多地只是为商人和国家公务员树碑立传的时候。历史重大事件的波澜看起来已经平息，实际上只有“国家的和平竞争”，也就是说在彼此双方都解除武装的情况下悠然自得地相互进行欺骗，似乎这样就可以拥有未来。各个国家都开始同时拥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来相互倾轧土地，争夺客户和合同，并且还企图用各种手段相互欺诈，而这一切都处在巨大的但却是无所伤害的舞台喧闹声中。这样的发展似乎看起来没有得到制止，反而应该有朝一日（按照大家的推荐）把整个世界都改造成一个大型的百货商场，在其前厅里摆放着最狡猾投机商和最和善管理员的半身塑像。商人让英国人来当，管理员让德国人来当，而老板想来只能让犹太人来勉为其难了，因为他们承认从来没有赚到钱，而总是在“付钱”，并且还会讲许多种语言。

那到底为什么不早生一百年呢？即使是没有“生意”可做，也许在解放战争的时候这种人还真的有些价值？！

对于我很晚才踏上人生游历之路这件事，正如所发生的那样，我常常感到很生气，并且把即将到来的“安静和秩序”的时刻看作是人生命中不应有的可耻行径。我在很小的时候就不是个“和平主义者”，而所有这方面宣教性的企图都给堵死了。

布尔人的战争对我来说就像一道闪光。我天天都埋在报纸里贪婪地读着每条新闻、每篇报道，并至少有幸成为那远方英勇战斗的见证人。

我基本上已经可以更成熟，更仔细地观察俄国和日本的交战了。对此我已经更多地出于国家民族的原因在袒护日本，并在调解争论的时候

也立刻站到了日本这一边。我认为俄国人会失败，就像看到奥地利的斯拉夫人也会失败一样。

多少年过去了，从前我好像是一个体弱多病的小孩，而现在不想要安宁，宁愿要面对暴风雨的来临。我在维也纳的时候，巴尔干就处在预示着飓风来临的灰暗的紧张气氛当中，偶尔也会出现耀眼的闪光，而后又再次消失在无尽的黑暗之中。随后发生的巴尔干战争像一阵风第一次掠过变得焦躁不安的欧洲。以后的日子就像梦魇一样压在人们身上，就像受到热带炙热的煎熬，以至于出于长期的惶恐不安而感到灾难将日益临近，最终渴望：上天终于能够让无法阻止的命运任其自然地发展下去。而且对人类的第一次暴力闪击已经出现：暴风雨突然来临，天空的雷声中还掺杂着世界大战隆隆的炮声。

当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被刺的消息传到慕尼黑的时候（当时我正在家里坐着，隐约地听到了事件的发生），我还担心那颗子弹也许是从出于对这个王位继承人不断地进行斯拉夫化的行为表示愤慨，想从这心中的敌人手中解救德意志民族的德国学生的枪中射出的。因此人们可以马上设想一下所产生的结果：新一轮公开的“有充分理由的”和“有根有据的”抓捕行动。而当我随后听到凶手的名子并确定是一个塞尔维亚人时，开始渐渐地命运不可测的报应感到恐惧。

最伟大的斯拉夫人的朋友倒在了斯拉夫民族狂热分子的枪下。

谁要是有机会对近几年来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之间的关系进行观察的话，那根本就不会有任何怀疑事情竟然发展到了如此无法收拾的地步。

现在对维也纳政府发出的最后通牒的方式和内容进行谴责是不公平的。世界上还没有那一个国家在同样的情况下会采取别的什么做法。奥地利在南部边境有了一个不共戴天的死敌，他在最近时期经常向君主制王朝进行挑衅，而且从未放弃过，现在可是能够摧毁这个帝国的大好时机终于到来了。人们有理由担心最晚到老皇帝的死去这个帝国想必会衰亡，也许到那个时候这个君主制王朝就完全不会再有能力进行真正的

抵抗了。近年来整个国家都在注视着弗朗茨·约瑟夫，以至于大部分人从一开始就感到这个帝国形骸的死去和帝国自身的灭亡一样。是的，这就需要精明的治国策略，特别是斯拉夫化政策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反正奥地利国家的存在应该更多地只归功于君主整个完美的、独到的策略，至少是一个让皇室舒服地觉得真的符合皇帝功绩的阿谀奉承。人们不想去寻找掩饰在这些溢美之言中的怨恨。人们不看或者不想看也许是再也看不到了这个君主制王朝越是期待杰出的治国良策，就像人们常常说的那样是历来“最明智的君主制”，那么其处境就越糟糕，就只等着有一天命运之神会来敲门索要他的盘缠。

奥地利没有了这个老皇帝还可以想象吗？从前玛丽亚·特雷莎的悲剧难道不会重演吗？不会的，那些对维也纳政府促使本来可以避免的战争的指责确实很不公正。这场战争无法避免，而至多只能延缓一至两年而已。不仅是德国的，也是奥地利的外交政策该受到诅咒，他们还总是试图延缓不可避免的报复，而直到最后才被迫在最为不利的时刻做出决定。人们相信，只要在做一次努力就可以挽救和平，在更加不利的时刻才让战争爆发。

不，谁不想要战争，就得有勇气承担后果。这一点奥地利应该能够经受得住牺牲的考验。这场战争的到来并不只是一次所有人针对我们的战斗，也是摧毁哈布斯堡君主制的一种方式。对此要下定决心，要么一起战斗，要么袖手旁观顺其自然。

那些今天对战争爆发多半进行诅咒和自作聪明地进行评价的人，正好是最危险的在进行推波助澜，为的是在战争中进行操控的人。

社会民主党几十年来都在进行针对俄国的最卑鄙的战争煽动，而中央党出于宗教方面的观点则是为了把奥地利变成德国政治的关键和转折点。现在该为这个错误来承担后果了。该来的总会到来，没有必要躲来躲去。德国政府的失误在于为了得到和平而错过了做出决定的大好时机，纠缠于在同盟国内部去维护世界和平还是最终舍弃国际联盟，而追求维护世界和平和决定进行战争本身就是背道而驰的。

即使是维也纳政府当时是通过另外一种较为温和的方式发出最后通牒的话，也再不会对形势有什么改变，顶多是自己从民众的愤怒中被抹去。因为在大多数民众的眼里最后通牒的语气还太过于小心谨慎，没有什么过分或粗暴的地方。谁要是否定这一点，那他要么是个健忘的笨蛋，要么是个头脑完全清醒会撒谎的家伙。

万能的上帝呀，1914年的这场战争并不是强加给大家的，而是全体人民自己迫切要求的。

人们大体上要消除不确定因素。只是要知道为了这场艰苦的搏斗要让二百多万德国的男人和小伙子心甘情愿地站在国旗下，并准备为捍卫它而流尽最后一滴鲜血。

当时的情景对我来说就像是年轻人愤怒的心情中得到了解脱。就是今天我也会毫无愧疚地说我被暴风雨般的激情所感动，跪下来由衷地感谢上天让我有幸活在这个时刻。

这场争取自由的战争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爆发了；而战争的灾难也随之开始了，大多数人们也渐渐地意识到，这一次不是为了塞尔维亚或是奥地利的命运而战，而是为了德意志民族的存亡。

多年来人们最终看清了自己的未来。伴随着大规模战争开始时奔放激情的陶醉还出现了不可缺少的真正的弦外之音：那就是认识到了要更多地进行民族振兴，而不只是短暂的热情。这种认真的态度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当时已经爆发的战争其可能的持久性并没有让人们对此产生最起码的想象。人们幻想着到冬天的时候就又可以可以在家里接着悠闲地干活了。

人们想要的就是他们所期望和信仰的东西。绝大多数国家对不安定的状况都感到厌倦，也就完全不会相信对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之间的冲突进行和平调解了，反而更加期待最终的破裂，这是可以理解。我也属于这千百万人中的一个。

刺杀的消息在慕尼黑还没有传开，我的脑子里立刻就闪出两个念

头：一个是战争最终无法避免，另一个是哈布斯堡王朝被迫要保住同盟，我最为担心的也就是德国在某一天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同盟有可能陷入冲突，而奥地利由于国内政治因素无力下定决心提出直接的理由来援助同盟国。这个帝国大多数的斯拉夫人会立刻开始破坏这样的意图而宁愿粉碎整个帝国，也不愿意给予同盟国以必需的帮助。现在这样的危险消除了。无论是否愿意，这个没落的帝国都将战斗到底。

对于这场冲突我个人的立场简单明了，我认为并不是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为了赔偿而争吵，而是为了德意志的生存，为了德意志民族的存亡，为了自由和未来而战。现在要开创俾斯麦的事业了，从前先辈们用英雄的鲜血在从维桑布尔到色当直至巴黎的战役中所取得的胜利，年轻的德意志理所当然要赢得新的胜利。如果这场战争获得胜利，那么德意志民族将立于伟大民族和强国的行列之中，那德意志帝国才能又一次证明自己是强大的和平卫士，也不用为了可爱的和平让她的人民省吃俭用了。

当我以前还年轻的时候曾常常有这样的愿望，至少能用行动来证实一下民族激情不是一种空泛的妄想。我常常觉得喊出万岁是一种罪过，也许对此在内心上也没有什么正当的理由，可要是没有试过，当一切无聊的事情都结束了，命运之神无情的手开始敢于让人们去面对真理和思想的存在，那有谁才能用这个字眼呢？我也和千百万人一样从心中流露出骄傲的喜悦，因为终于能够把我从这种苦闷的情绪中解救出来了。我经常唱“德意志高于一切”的歌，并且还高呼万岁，这对于我就好像是格外开恩，现在终于可以允许做为证人在上帝面前表达出真实的信念。从第一时刻起我就确认我也无一例外地处在战争的形势之下，只有马上投笔从戎了。我还知道我内心的呼唤在指引着我去我该去的地方。

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我首先要离开奥地利，而更加显而易见的就是我现在要准备战斗，就要为信念而战！我不愿意为哈布斯堡王朝而战，而是准备着为我的民族和这个民族所代表的帝国去献出生命。

8月3日，我直接向国王路德维希三世陛下提出呈文请求加入巴伐利亚军团。内阁总理府在那些日子里肯定是不会没有事做的；收到我的申请批文的时候我非常高兴。当我用颤抖的手打开信函，读着我的申请

的批文要求我到巴伐利亚军团报到的时候，只能用欢呼和无限的感激来表达。几天后，我就穿上了直到六年后才脱掉的军装。

就这样，我和每个德国人一样开始了人生中最难忘和最伟大的时刻。和这样最为激烈的战斗相比过去的一切都变得无聊乏味了。今年正好是这个暴力事件发生十周年，当我回想起最初的几个星期里我们的人民所进行的英勇战斗，而仁慈的上天也允许我参加这场战斗的时候，我感到悲喜交加。

这一幅又一幅的画面仿佛就像在昨天一样，我和我亲爱的战友们一起穿上了统一的军装。第一次行军、操练等等，直到出征那一天的到来。

这个时候的唯一担忧折磨着我，同时也折磨着其他的人，我们是不是上前线太晚了。这让我越来越无法得到平静。对英雄行为的胜利欢呼也带有一丝苦楚，就好像每一次胜利都增加了我们无法上前线的危险。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我们离开了慕尼黑启程去完成我们的使命。我第一次看到了莱茵河，我们沿着它静静的河水一直向西挺进，为了保护这条德国的母亲河免遭敌人贪婪的侵袭。当第一缕和煦的阳光透过薄薄的晨雾使得德意志帝国纪念塑像朝着我们闪烁时，这位莱茵河的守护神让整个长得见不到尾的行军队伍沸腾了，我也感到心中汹涌澎湃。

随后在弗兰德斯是一个潮湿、阴冷的夜晚，我们悄然无声地行进，当第二天雾气散开，天已大亮的时候，突然从我们的头顶传来金属哨声，然后就是子弹刺耳清脆地射向我们的队伍，我们踩着泥泞的地面像一小团云雾一样地散开，从二百多人的嗓子里传出的第一个呼喊像是死亡的征兆。然后才开始传出哒哒的子弹声和隆隆的炮声，像唱歌，也像嚎叫，大家目不转睛地向前方推进，越来越快，直到突然在萝卜地和灌木丛那边发生了交战，是人与人的交战。从远方有一首歌的声音传到我们的耳朵了，越来越近，越过一个连队又一个连队，刚才就像是死亡降临到我们的队伍，而现在则是歌声传到我们这里，我们接着唱到：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高于世界上的一切！四天后我们返回。只是步伐和现在的不同了。一个十七岁的少年看着就像是些大老爷们。

军团的志愿兵也许没有及时真正学会怎样去作战，到像老兵一样知

道怎样去牺牲。

刚开始就是这样的。



战争就这样持续了一年又一年，战地的浪漫情绪被恐惧所替代。激情渐渐平息了，热情奔放的欢呼则被死亡的恐惧所扼杀。在这个时候每个人都在为自我保护的驱动和履行义务的告诫而进行战斗。对于我来说这样的战斗也是不可避免的。当感到死亡逼近时总试着去用一种不确切的的东西来抵消它，把虚弱的身体想象成健康的，只有胆怯才会企图在这样的伪装下把各种东西缠绕在一起。而剩下的只有一点点良知所起到的决定作用才让这种痛苦的磨练和告诫得以继续下去。越是要提醒自己小心谨慎，越要大声地强烈呼喊出来，就越要严厉地压制下去，直到内心斗争后责任感最终取得胜利。在1915年底至1916年初的冬季这种在我心里的斗争特别明显。最后我的意志终于获得了胜利。在最初的日子里我就能够兴高采烈地冲锋陷阵，而平时则冷静、坚定。这种方法是经久不变的。现在即使命运要进行最后的拼搏，也不会神经错乱或者失去理智。

这样就从一个年青的志愿兵成长为一名老战士。

整个部队都在发生这样的转变。这是经过了长期的战斗以后而变得沉着而老练、勇敢而坚强，经受不住风暴的打击当然就会被击垮。

两三年后经过一场又一场的战斗，在敌人数量和武器占优势的情况下仍然战斗到底，忍受饥饿和供给的匮乏，这才是检验部队的时刻。这样才能对部队做出评判。

也许几百年过去后人们就从不议论或谈起英勇无畏的精神，也不会想起战争期间的德国士兵了。但透过那过去时光的雾霭我们依稀可以看到那坚固阵地上灰色的钢盔，那毫不动摇和绝不屈服的士兵都将成为永垂不朽的纪念碑。只要德意志人还活着，就要纪念他们过去曾是我们民族的儿女。

我当时是个士兵，不想从事什么政治活动。真的还没有到时候。我现在仍然认为，就连那赶车的车夫对祖国所做的贡献都要比那些我们称

之为“国会议员”的人要多得多。比起诚实的、能讲出些东西来的、冲着敌人的脸喊叫的、或者呆在家里闭上他那能说会道的嘴巴安安静静地在什么地方可以做一些事情的人来，我尤其在这个时候讨厌这些说大话的人。是的，我当时讨厌所有这样的“政治家”，恨不得想立刻组建一个国会团队，让他们自己在那里彼此可以随心所欲地大谈而特谈，省得让正直和诚实的人们生闷气和受伤害。

那时我不想了解什么政治，但也不得不对关系到这个国家，特别是我们军人的某些现象发表我的看法。

当时有两件事情让我内心感到气愤并且认为是危险的。

当战斗的捷报开始传来的时候，也许是出于暂时还不了解的原因，某些新闻报道就已经开始慢慢地往大众的激情中加些败兴的苦艾酒了。他们这样做总还是打着某种友好和善意的，有的甚至是出于关心的幌子。人们对如此狂热地庆祝胜利表示疑虑。人们担心这样的行为是对一个伟大民族不尊敬和不适宜的做法。说什么德国士兵的勇敢无畏和英勇精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也不可以对此这样不假思索地把喜悦如此不由自主地表达出来，就算是外国人想要这样，更应该以一种安静平和受人尊敬的方式来表达喜悦的心情，不要这样诸如此类地大呼小叫的。毕竟我们德国人不要忘记这场战争并不是我们的意愿，但因此也不必感到羞愧，要像个男子汉似地公开承认，我们随时要为和解而做出我们的贡献。因此心灵活动的纯洁被狂呼乱喊给玷污了是不聪明的，因为其它国家对这样的行为举止缺乏了解。再也没有什么比矜持更能让人感到钦佩的了，一个真正的英雄应该具备默默而静静地忘掉他英雄业绩的品德，因为这也决定了整个民族的行为。

现在对待这样的家伙除了要揪住他的耳朵，还要把他带到一个木桩前，然后用绳子吊起来，好让欢庆的人们别再伤害了文人墨客的美感，接受劝告以“不适宜”的方式真正开始欢呼胜利。

他们一点都不明白这样的激情要是被打断就再也无法唤醒。要保持一种如痴如醉的状态。要是没有这种激情的魔力怎么能经得住对民族精

神很可能有最大限度的战争考验呢？我非常了解大家的心情，以至不知道在这里不用“美”的高雅来煽风点火，不知道有必要让激情保持一定的温度。能够让激情达到了顶点，可人们却无所事事，还要减弱现有的欢乐气氛，这让我绝对无法理解，在我眼里他们简直是疯了。

第二个让我感到气愤的是人们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标准，还认为这才是正确的方式方法。我认为这只能证明他们对这种瘟疫的一无所知。人们好像还非常认真地相信现在再也不用去了解其它政党就可以保证理解马克思主义并且还会变得谨慎克制。

这里完全不关政党什么事，而是关于一种导致全人类毁灭的理论，人们对此了解得很少，更何况不听那些犹太化的大学里所讲的东西，否则怎么会有这么多，特别是我们那些养成了令人生厌的狂妄自大脾气的高层官员们都认为没有必要化力气找一本书去学点什么学校教科书上所没有的东西。暴力革命这类东西经过这些人的“脑袋”而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国家机构大部分还跟不上一个人步伐的原因。天哪，这些人就像谚语里所说的那样：他不吃农民所不知道的东西。只靠规则是很少能够证实例外的。

1914年8月期间竟然把德国工人与马克思主义等同起来可真是荒唐之极。德国工人在当时由于感染了这种有毒的瘟疫而松懈了自己，否则他们从来就不会去参加什么斗争。人们或许愚蠢到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具有民族性”的，是一个突发奇想，而这只能够表明多年来所任命的国家领导人中没有一个认为有必要化力气去研究这个理论的本质，否则这种胡说八道的东西就难以四下蔓延了。

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消灭所有非犹太人的民族国家，令人吃惊的是在1914年7月期间，被这个主义所迷惑的德国工人阶级居然觉悟了，并且还开始急不可待地要为祖国效力了。在几天的时间里所有这些欺骗人民的无耻谎言都烟消云散了，那些犹太人的头头们忽然间被孤单地遗忘在那里，就好像六十年来给人们灌输的荒唐疯狂的东西丝毫没有留下任何一点痕迹一样。对于欺骗德国工人阶级的人来说这实在是个倒霉的时刻。尤其是那些认识到这种危险威胁的头头们，在这种形势

下很快地隐藏起来，并且还恬不知耻地假装是为民族振兴而战斗。

现在是针对整个毒害人民的犹太欺骗团伙采取行动的时候了，这个时刻终于来到了。现在对他们要采取果断的措施，不能有那么一点点体谅和抱怨的声音。1914年8月国际联盟的含混其词一下子就从德国工人阶级的头脑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几个星期以后美国人兄弟般祝愿的子弹射向了行军队伍的钢盔。这是一个忧国忧民政府的职责，而现在德国的工人又重新找到了自己的道路，那就是要无情地铲除对自己民族进行挑唆煽动的人。

前线优秀的士兵倒下了，那在后方的人们至少可以在家里杀杀害虫。

而皇帝陛下却偷偷地向那些罪犯施以援手，给阴险的刺客加以庇护和内心的安宁。

现在这条毒蛇又开始出洞了，比原来更加小心翼翼，因而也更加危险。当正直的人们梦想着城堡和平的时候，撒谎的罪犯却在组织着革命。

那时人们以这种可怕的动摇不定的态度所做出的决定总让我心中越来越感到不满，但当时我还不可能认为这样的结果也将是可怕的。

现在该做些什么呢？这场运动的领导人都应该立即关到牢房里去，对他们加以审判并让他们离开这个国家。必须毫不留情地使用一切军事手段来消除这个瘟疫。解散这些党派，如果有必要的话也可以用刺刀来让德意志帝国议会的头脑清醒清醒。最好是解散议会，就像现在的共和国可以解散政党一样，所以就更有理由采取这样的手段。整个国家的生死存亡就在此一搏！可以使用凶残的暴力来对抗“世界观”吗？对这个问题我当时已经不止一次地提了出来。

对于类似的情况，特别是对于历史上具有宗教背景的这类情况进行深思熟虑后得出以下的基本认识：以现在看来也许是错误的，也许是正确的某种思想为基础的设想和观念以及政治运动在其发展变化的某个时期则是可以被具有可操作性的统治工具所战胜的，尤其是当这种统治

工具同时也代表着一个新兴的、振奋人心的观点、思想或世界观的时候。

没有思想基础为动力作为先决条件，而仅仅依靠使用暴力是绝不会根除一种思想以及思想传播的，除非对思想及其代表人物和传播途径采取完全铲除和彻底破坏的方式。这就意味着要不断地，有时也要永远地从强权政治的意义上剔除这种政治团体，根据经验这种血腥的屠杀会涉及到大部分的民众，因为没有思想前提所进行的迫害在道德方面显得不合理，也恰恰容易激起品德更加高尚的那部分民众的抗议，这样反而造成了让不合理的政治运动获取思想内含的结果。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事情仅仅是因为反对派出于情绪而试图对某种思想进行血腥暴力镇压而发生的。

由此随着迫害的增加，其心灵上的追随者的数量也在增长。因此不断地消灭新的理论只有采取大规模的和不断地进行彻底根除的办法，这样最终就会完全避免让人民和国家付出宝贵的鲜血。但这样在开始进行所谓“内心”清洗的时候，通常也会造成软弱无能的恶果。因此在所要反对的理论学说逾越出某一小范围时才开始进行清除就是徒劳的。

那么这也就好像所有人的成长过程一样，在孩童时期，或者还要更早的时候就要避免消亡的可能性，随着年龄的增长抵抗力也在增加，但随着日渐临近的衰老又要屈从于新生的年轻一代，无论是以什么形式或出于什么原因。

但事实上几乎所有通过使用没有思想基础的暴力来清除某种理论及其组织的尝试都会导致失败，经常出现与所期待的正好相反的结果原因如下：首先是使用武器作为赤裸裸的暴力斗争形式的先决条件是要做到持之以恒。也就是说，只有不断地、有规律地使用这样的手段来镇压某种理论学说才有图谋成功的可能。一旦在这点上变成使用带有宽容色彩的暴力，那不只是被镇压的理论学说会不断地高涨，而且甚至还由于遭到迫害吸取新的利用价值能够在这样的压力浪潮过后，忍受痛苦所产生的愤慨就会把新的追随者引到原来的学说那里去，而这些人就会带着比以往更大的抵抗情绪和更深的仇恨心理来追随它，并试图在危险消除后让分裂出去的背信弃义的人再次回到原来的观点上来。其次坚持使用

暴力本身是取得胜利的先决条件。这种持之以恒的做法就是一种特有的思想信念。任何一种不是来自坚定思想的暴力都是动摇不定的和不保险的。它缺乏一个只有靠某种狂热的世界观才能够安静下来的稳定性。这是每个人的力量和勇敢的流露，也是人性及其本性与力量之间的转变。

还会有另外的情况：每一种世界观（也许更多地带有宗教色彩或政治特点，有时是很难确定其界限的），很少是为了敌对思想的相对否定，而更多地是为了自我理论的绝对肯定而奋斗的。因此这样的斗争方式很少进行防卫，而更多则采取进攻的方式。所以确定目标就是首要的，因为目标的确定就意味着思想观念本身的胜利，但如果反过来很难确定目标的话，那么针对敌对思想的相对否定什么时候才可以看作为是目标的达到和胜利的保证呢。尽管世界观的进攻计划周密，但也要比防卫更加暴力，那么到底怎样来决定采取进攻，而不是防卫呢。只要这把利剑本身不是新兴理论思想的代表、宣讲人和传播者，那么使用暴力这样的手段和思想所进行战斗就只是防卫而已。

可以做出如下总结：只要斗争不是为了新的思想观念而采取进攻的方式，那么每一次使用暴力手段和世界观进行斗争的尝试最终就会失败。只有两种世界观的相互斗争才能够导致使用残酷的暴力作为武器，而且还要坚定不移地、毫不留情地、选择有理论支持的一方。

正是因为如此，直到现在针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才总是失败。

这也正是为什么俾斯麦的《反社会主义非常法》最终受到大家反对而失效的原因。它缺乏的是一种为了新的世界观发展的战斗而战的基本出发点。毕竟也只有高高在上的部长老爷们那众所周知的聪明智慧才会自以为那些所谓的“国家尊严”或者“安宁与秩序”的胡说八道还能够作为一个为生死而战的精神动力的合适基础。

因为这场斗争缺乏一种真正的精神思想，连俾斯麦在执行《反社会主义非常法》时都得听任本身已经是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怪胎机构的判断和意愿。这位铁血宰相与马克思主义分子斗争的遭遇给了资产阶级民主以好感，反倒让他自己遭了殃。

这一切都只是由于缺乏基本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带有强烈征服意识的世界观所不可避免的结果。

所以俾斯麦斗争的结果只是一个极大的失望。

在世界大战期间或者在开始阶段的形势因此而有什么不同吗？可惜没有。

当时我对政府把社会民主党暂时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表现形式这样的观点有必要进行改变的想法越是更多地进行思考，就越清楚地认识到对这个理论缺乏必要的补充。我们到底想要给广大民众些什么呢，如果要给的话，假定是这样，社会民主党被挫败了？不是的，这是一场人们可以期待把大批现在或多或少还没有领导人的工人们成功地吸引在一起的运动。认为从阶级政党分离出来的国际主义狂热分子现在暂时加入到资产阶级政党，也就说加入到一个新的阶级组织当中去了是荒唐的，更是愚蠢的。这样也许会使得各种不同的组织感到不快，不可否认的是，对于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来说，划分阶级只要在政治上还没有对其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况下，那么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完全理解的。

否认这个事实，不仅证明说谎者的无耻，同样也证明他的愚蠢。

应该完全防止那种认为广大民众比他们自己要愚蠢的看法。在政治活动中很少是用情感代替理智来做出更为正确的决定的。那种认为民众情感的非理性充分说明了其愚蠢的国际主义立场的看法就可以立刻通过最为简单的提示再次彻底地表明和平主义式的民主主义至少不是毫无理性的，因为其代表人物几乎只来自资产阶级阵营。只要每天早晨还有成千上万的市民虔诚地祈求犹太民主主义分子的新闻报道，或者是取笑“同志们”的愚蠢行为，这对统治者来说都是极为不利的，因为即便是报道的篇幅有所不同，但彼此也会纠缠不清，最后都会陷入同样糟糕的境地。而这两种情况的制造者就是犹太人自己。

或许还应该防止否认既成事实。就好像特别要在选举前总要进行欺

骗愚弄一番那样，在阶级问题上不仅仅只涉及到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这样一个事实是否认不了的。尤其像手工业者对自己过低的评价一样，我们大部分民众的优越感看起来并不是来自夜游症的幻想。

但这却表明了，完全忽视我们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贫乏的思考能力恰恰就是在这方面没有能够领会去对马克思主义瘟疫已经迅速蔓延开来的状况进行阻止，而现在则再也没有能力去赢回所失去的东西了。

“资产阶级”政党，就像他们所标榜的那样，从来就没有能够把“无产阶级”的民众圈在自己的阵营里，因为这是两个对立的世界，一边是符合人类天性的，另一边则是人为臆造的，他们相互之间的所采取的行动只能是斗争。而赢得胜利的则只能是新生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

实际上 1914 年针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就很值得去思索，但就这种斗争情况在缺乏各种实际后备力量的条件下还能够坚持这么长时间是很值得怀疑的。

这里存在一个很大的漏洞。

在战争前的很长时间里我就有这样的看法，所以，因此很难决定去加入现有政党中的哪一个。正是由于这场运动缺乏后盾力量，使得它更像是由“议会式”的政党所进行的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无情斗争，而在世界大战进行的过程中，通过这些可见的不确定因素更加坚定了我的这种看法。

对此，我向我亲密的同事开诚布公地说了出来。

另外，我第一次有了今后从事政治活动的想法。

这也正是我那为数不多的朋友们常常确信我在战后除了自己的工作外要当一名演说家的原因。

我想这对我来说是严肃认真的。

第六章 战争宣传

在我对所有政治事件进行细心观察的过程中总是对宣传工作有着极大的兴趣。我认为这正是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懂得用高超技巧去掌握并得以应用的一种工具。我很早就已经知道正确地使用宣传是一门真正的艺术，而这对于资产阶级政党来说几乎是闻所未闻。只有在基督教社会党活动期间，特别是在吕格博士任职时期，把这种手段变成了精湛技法而且多亏了这样做才获得了成功。

人们在战争期间才能看到正确进行宣传会产生怎样一种巨大的效果。可惜这里的一切都要从另一面去研究，毕竟我们这边的宣传活动进行得很糟糕。尤其在德国这边的宣传鼓动工作完全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这是每个士兵都看得到的，对于我来说单就这一点就是要非常迫切地进行宣传工作的原因。

有足够的时间对此进行思索，敌人也给我们做了示范，只可惜他们还做得挺好的。

因为我们这方面的疏忽，敌人却以闻所未闻的机智灵敏和真正天才般的计划赶了上来。我从敌方的战争鼓动工作中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总之时间不会在那些最早接受教训的人的脑袋里留下痕迹，一些人自以为聪明地认为可以接受教训，而另一些人则是缺乏真诚的意愿。

我们这里有什么宣传鼓动的活动吗？可惜我只能用“没有”来回答。所有这方面真正的工作从一开始就是很不充分和错误的，至少是毫无用处，有时反而还造成危害。

在形式上的准备不够充分，其本质就是在心理方面也是错误的，这

就是仔细观察后对德国战争宣传工作所做出的结论。

就算是对第一个问题人们也不见得很清楚，那就是：宣传工作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宣传工作是一种手段，那也要从对目的的看法来进行判断，其形式因此也要服务于目的，符合目的的要求，是实现目的的一种支持。很明显，目的的重要性从普遍需求的观点出发是各种各样的，因此这也就决定了宣传工作的本质也是各不相同的。这会使人想起战争中为之而战的目的是最为崇高和最为暴力的：那就是为了我们民族的自由和独立、未来生存的保证以及国家的荣誉，但这些尽管和今天的观点相对立的东西还依然存在或者说还应该更加美好，因为恰恰就是没有荣誉感的民族通常早晚会上失去自由和独立，也就是更高的公正性，而没有荣誉感的无赖民族是不该享有自由的。可谁要是想成为胆怯的奴隶，那就不能够或完全不需要荣誉，这反而会让他很短的时间里遭到蔑视。

德意志民族为了人类的生存而战斗，要支持战争就要宣传战争，要赢得胜利就要宣传战争，这才是目的所在。

但是当人类为了生存在这个星球上进行战斗的时候，也日渐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所有对博爱和唯美的思考也同时一起毁灭，因为所有这些想象都不浮现在人世间，而是来自人类的幻想并与人类同在。这些概念离开了这个世界也就烟消云散了，因为大自然不知道这些。只有很少的民族或种族才会拥有这样的字眼儿，并且这来自他们自己的情感世界。博爱和唯美甚至要从这个人类居住的世界上消失，还要失去创造和代表这些概念的民族。

因此当人们为了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而战的时候，所有这些概念只具有次要的意义，但只要这些概念还能够麻痹为自我生存而战的民族的战斗力，那就会对战争形式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唯一可以看得见的结果。

至于博爱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就像毛奇所说的那样，战争越是要即

将结束，就越是要使用最残酷的手段。

当人们试图接近类似于博爱等等这样胡说八道的东西时，对此只能给出一个答案：在事关一个民族为生死存亡而战的意义上是没有任何维护美的责任的。人类生活中最丑恶和残留下来的东西就是对奴隶的迫害。难道施瓦本人的没落会感觉到德意志民族今天的命运是“唯美”的吗？对此和那些自以为是这种现代文化气氛发明者的犹太人就真的不必去谈论了。上帝真正的存在就是亲自下凡抗议圣像之美。

但如果这些博爱和唯美的观点对战争来说不予考虑的话，那也不能当作衡量宣传工作的标准。

战争的宣传工作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这是为了德意志民族生存而进行的战斗，所以宣传工作也要从这个行之有效的基本原则出发。最惨绝人寰的武器如果可以以尽快取得胜利为前提条件的话，那也是人道的，也会确保我们民族自由的尊严。

针对这样一场为了生死而战的战争宣传问题，这是唯一有用的观点。

要是对这些所谓关键的观点都清楚了，那就不会对武器的形式和运用有所担忧了，因为这只是一件武器，是一件落在行家手里真正可怕的武器。

第二个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是：宣传工作是针对谁的？是针对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还是很少受过教育的广大民众？对知识分子，现在可惜还常常这么称呼他们，是不需要进行什么宣传的，而要的是科学的理论学说。宣传工作就其内容来看很少有什么科学性的东西，其本身有点像艺术海报的表现形式。海报的艺术水平取决于创造者的能力，通过其表现手法和绘图颜色认真地进行大量的制作。艺术展览用的海报只为说明艺术展览，海报越成功，说明其艺术水平越高。海报应该向大家介绍展览的意义，而绝不再需要做什么补充说明。谁要是想从事艺术方面的工作，就必须更多地去研究海报。而只在展览会上“闲逛”是不够的。要

期待他在全面地参观以后深入到某一幅作品中去，然后再慢慢地给予公正的评判。

同样这也与我们现在怎样描述宣传工作这个概念有关系。

宣传工作的任务不是去对某个人进行科学教育，而是应该让广大群众对某一特定的事件、发展过程、必要性等等的重要意义引起注意。

这也是首先需要去做的，关键就在于一种信念通常来自事件的真实性、过程的必要性、必要性的正确性等等。这不但是，也不能是必要性本身，因为宣传任务就好像海报那样要吸引大量的注意力而不是对反正都有经验的人进行科学教导或是追求知识和观点，所以宣传的作用是要更多地针对情感并要以所谓的理智为条件。

每项宣传工作必须是大众化的，其思想水平的确定应考虑到极其有限的接受能力往往要低于所想要达到的水平。所以宣传工作的思想水平制定得越低，大众所应该理解的部分就越多。就像宣传要坚持战斗那样，就要考虑到把全体民众都吸引到宣传工作影响的范围内，那就完全可以不必过多地担心以过高的思想水平为前提条件了。

学术方面的赘述越是简单，就越能更多地体察广大群众的心情，也就能取得决定性的成果。这是对宣传工作正确与否的最好的一个验证，而不是去迎合几位学者或风雅少年的满意。

宣传工作的技巧就正好在于要把握住广大群众的情感愿望，以正确的方式找到让广大群众从专心致志到全身心投入的方法。我们那些自以为聪明的家伙连这一点都不理解就只能证明是不动脑筋和自负傲

懂得了对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技巧认识的必要性，就会得出以下的结论：越要把科学课程的丰富多彩赋予宣传工作是错误的。

广大群众的接受能力是非常有限的，理解能力很差，反倒还极为健康。因此这些实际地宣传了那么有效的宣传工作就应该只限于某几个

关键点上，而要用标语的形式来做宣传，那就得让最后一个人人都得明白每个字的含义。如果抛弃这个原则而要想多样化，那宣传工作的效果就会消失，因为大量的内容既无法得到领悟，也无法承担其费用。因此这样的结果不仅是削弱了，而且是失去了宣传的作用。

所描述的路线方针越伟大，从心里就觉得越正确，并确立为行动策略。

比如说就像奥地利和德国的滑稽报刊所进行的取笑敌人的宣传就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个人要是真地碰上敌人就会让他立刻得到完全另外的一种概念，而最为可怕的是他所遭到的报应是因为德国士兵从敌人抵抗的直接印象中感觉受到了现有宣传的欺骗，对其战斗意志和坚定决心起到了适得其反的作用。他反而失去了勇气。

与此相反的是，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战争宣传工作在心理上是正确的。他们向自己的人民把德国人描绘成是野蛮人和匈奴人，让每一个战士对战争恐怖有心理上的准备，这样有助于防备失望和沮丧。他所面对的最可怕的武器只不过是证明了他所听到的是正确的，因而增强了他对其政府立场观点正确性的信念，同时另一方面也增加对无耻的敌人的愤怒和仇恨。因为他自己所见到的敌人武器最为残酷的效果已经渐渐地向他证明了敌人那种野蛮的“匈奴人”的残暴，也不容他有片刻的思索，他也许会，甚至是很有可能让他的武器去发挥更加残暴的作用。

所以特别是英国士兵从不感觉在国内听到的是不真实的，可惜德国士兵到最后却把所有他听到的都当成了“说谎”和“垃圾”加以拒绝。纯粹就是因为人们相信派任何一头驴（或者自己“一般”为聪明的人）都能够搞宣传工作，而不理解刚好在这方面最富天才的拯救人类灵魂的行家里手才是最合适的。

所以德国的战争宣传是以卓越超群的教材和教科书得到了一个与之相反的结果，就是因为所进行的“宣传”工作完全缺乏正确的心理方面的考虑。

那些四年半以来在敌人宣传的冲击下睁大了眼睛、凭借着灵敏的直觉自我领会的人们需要从敌人那里学习很多的东西。

最糟糕的就是人们认为宣传工作的先决条件完全是：原则上客观存在的单方面的观点与宣传工作所探讨的问题相同。在这个方面存在过失的方式就是自战争开始人们有理由自上而下地去怀疑难道这么多胡说八道的东西真的就只能归咎于愚蠢吗。

比如人们在对另外一种肥皂叫“好”的同时，又该对一张称赞新近出品肥皂的海报说些什么呢？恐怕也只有摇摇头罢了。

对政治性宣传广告也是同样的情况。

宣传工作的任务不是对各种各样的公平道理进行斟酌，而主要是通过宣传来强调其所代表的公平。从主观上看宣传工作，只要还有利于其他人，是不必去研究什么真实性的，好让群众把宣传看作是空谈家的表白，而是要不断地为自己服务。

认为不只是德国对这场灾难的爆发负有责任，而以为即使不太符合事实的经过和实际上所发生的也要把责任完全加在敌人身上的做法是正确的，那么在探讨战争责任的时候如果持有这样的观点可就是完全错误的。

这样动摇不定的结果是什么呢？一个国家的人民并不都是由外交家或是国家法学教官组成的，也不都真地具有理性的判断能力，而是一些在怀疑和不确定之间摇摆不定的人们。当自己国家的宣传刚好出现那么一点点公正的起色，另一方面也已经承认对自己有理产生怀疑的原因了。广大民众无法分辨出外国人的无理到什么地步，自己的有理该从哪里开始。特别是当敌人不再制造同样的蠢事，而是从自己一边把罪责加在敌对的一方时，民众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没有把握和多疑。到最后连自己的人民都不相信自己国家的宣传，反倒更加相信日益完整和统一的敌人的宣传时，这又该做何解释呢？还有哪个民族像德意志民族能够如此

地忍受着那些客观上的古怪想法吗！因为对于德国人来说，每个人都只是在尽力不去冤枉敌人，自己反倒处于最危险的境地，这是在消灭自己的民族和国家。

就连这么至关重要的地方都没有想到，那民众当然就还没有完全觉醒。

大多数的民众就像女人一样生性柔弱，意志力差，以至于很少能够冷静地进行思考，而更多的则是以情感来支配他们的思想和行动。这种情感并不复杂，而是很单纯和封闭的。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只是积极或消极，爱或恨，真理或谎言，但从来就不会是半遮半掩，模棱两可的。

而对于这一切，特别是英国的宣传工作真正对此理解和考虑得最为出色。实际上在英国没有什么模棱两可和能够引起人们怀疑的东西的。

民众情感幼稚的明显特征就表现在合乎时事的煽动性宣传鼓动当中，采取既肆无忌惮又美妙绝伦的方式来确保前线的道德标准，即使在遭受事实上惨败的时候，也要断然指出德国是敌人，是唯一引发战争的责任方：这只不过是一个绝对的、可耻的、片面的、固执己见的、大肆鼓吹的、极富情感的，而且还总是考虑到这个伟大民族过激观点的谎言。

这样的宣传方法起到怎样的作用，一个很有力的事实就可以证明，那就是这样的宣传在四年以后不只是还强有力地支持着敌人，而且还在开始侵蚀着我们民族。

那我们的宣传工作之所以没有取得成就也就不必感到惊奇了。而宣传工作失效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内心里的模棱两可。终于从宣传内容里看出了一点点的确唤起了广大民众必要的意识的东西。指望着要靠和平主义分子这种淡而无味的论调就能让人们痴迷于冒死献身的話，那恐怕只有我们那些没头脑的“政治家”才能干得出来。

所以这样愚昧的结果是毫无用处的，并且甚至还是有害的。

但同时如果不去认真考虑基本原则的话，那么所有出色的宣传工作也不会取得成就。宣传工作不应受到限制，并且要反复进行。就像许多其它工作一样，坚持不懈才是宣传工作取得成功的首要 and 重要的前提条件。

而就在宣传工作领域内，绝不可以让唯美主义者和骄傲自大的人来进行领导：因为其一，否则的话其宣传从内容形式到表达方式上很快就不再适合广大民众，反而更加朝着文学茶话会的方向发展了，其二是因为人们会对此小心谨慎地提防，因为缺少新鲜感的人们总要去寻找新的刺激。很快所有这一切就会让这些人感到厌倦，他们期待着花样翻新的东西，而从不懂得设身处地地为他们那些还没有如此冷漠同胞们的要求着想或着去完全理解他们。而如果宣传工作或更为确切地说宣传内容对于他们就显得过于传统、非常陈旧、太过时了，他们往往就是第一轮的批评家。他们总想要新的东西，寻找花样翻新，并且由此成为政治上能够有效赢得广大民众的真正死敌。因为一旦政党组织和宣传内容开始取决于他们的需要，就会失去决定果敢的精神并且因此会完全涣散。

宣传工作不是让那些自负的家伙不断地得到有趣的东西去进行消遣，而是要说服他们，特别是要能够说服广大民众。这就需要在他们懒洋洋的时候某个特定的时间段里，在他们想要了解一件事情之前，向他们的脑子里无数次地、重复着去灌输一个最为简单的概念。

每一次花样翻新绝不可以改变所要宣传的内容，而是要最终说出同样的结果。所以标语口号必须从多方面来加以说明，使每个新的解释结果总和标语口号本身的寓意相同。只有这样才能够并且会使宣传工作达到完整统一的效果。

绝不可以偏离这条重要的方针路线，同时还要始终如一和坚持不懈地强调使得最终的成果渐渐成熟起来。人们会惊讶地发现，这种坚定不移的精神产生了多么巨大和不可思量的效果。

任何一个广告，无论是用于商业，还是用于政治，都是要通过长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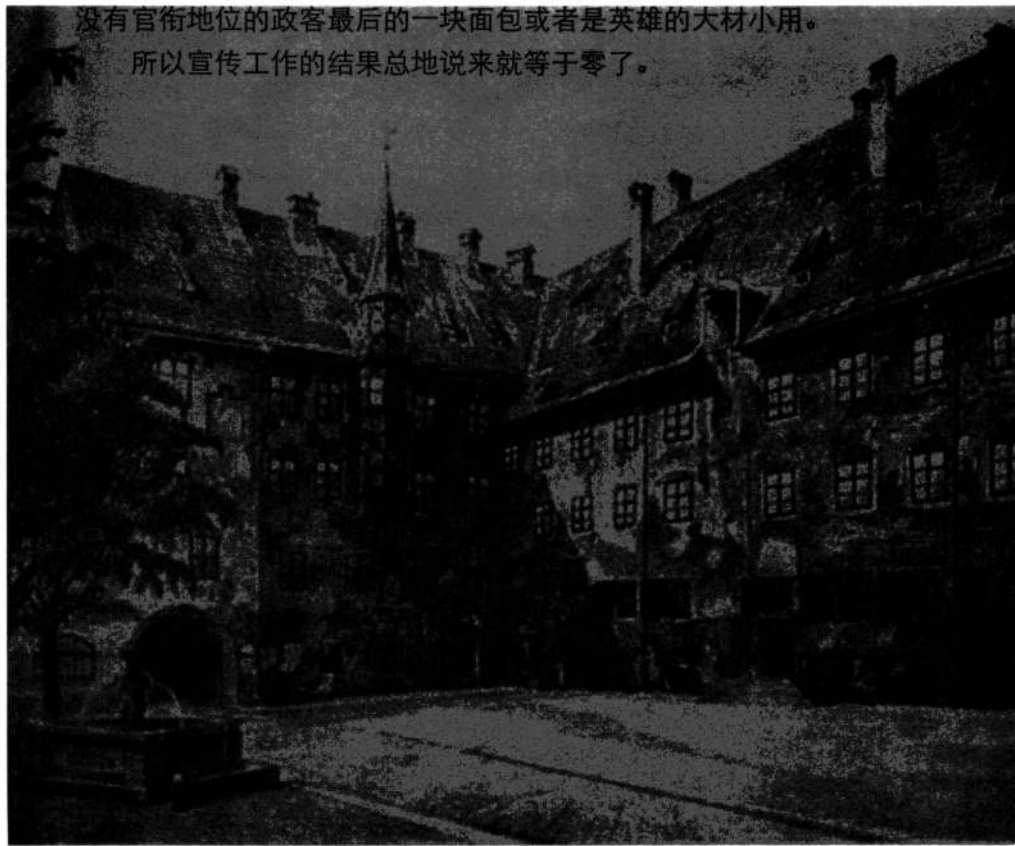
不断的一贯性和统一性才获得成功的。

比如在此方面，敌人的战争宣传就起到了榜样的作用。他们只限于几个着眼点，主要考虑的是广大民众，以持久的顽强精神进行着宣传工作。在整个战争期间都在使用一旦认为是正确的基本观念和表现方式，就没有进行哪怕是丝毫的改变。开始的时候人们还断言这些宣传是发疯了，接着又感到有些不快，而最终则深信不疑。四年半后德国爆发了革命，而革命的口号则来自敌人战争宣传的内容。

在英国，人们还知道思想武器只有在广大民众中得到运用才可能获得成功，而这个成果可真是太够本了。

宣传工作在他们那里成了第一流的武器，可在我们这里却被看作是没有官衔地位的政客最后的一块面包或者是英雄的大材小用。

所以宣传工作的结果总地说来就等于零了。



第七章 革命

1915年敌方的宣传攻势向我们袭来，自1916年起就越来越猛烈，而到了1918年底则开始如潮水般地涌来。现在已经到处可以看到这种摄魂钩魄的效果了。士兵开始学着进行思考，敌人到底想要干什么。

而德国的反攻却完全发挥不了作用。

军方当时负责思想教育工作的领导人也打算并且有决心就此大干一场，只是苦于缺乏必要的手段。尽管心里觉得不对劲，但还得让军队自己去进行宣传工作。宣传工作如果想要收到成效的话，应该从国内开始进行。想要取得成功就得指望那些最终要为家乡实现他那将近四年来都无法实现的具有不朽英雄气概行为的男子汉们。

可是，国内都在干些什么呢？就只是和那些愚蠢或者罪恶的行为抗争吗？1918年盛夏时节从马恩河南岸撤离后，尤其是德国新闻界的举动就已经表现得非常的不明智，是的，简直就是愚蠢的罪行，这使得我天天都怒火中烧而不由得产生出一个问题，是否就真的没有一个人准备去阻止对我们军队英勇气概践踏的行为吗。

当我们在1914年以前所未有的胜利攻势横扫法国的时候，这个国家发生了什么呢？在伊松佐河战线崩溃的那几天，意大利人又在干些什么呢？当德国军团的进攻仿佛彻底改变了局势并且远程重型大炮那伸长的手臂开始叩击巴黎大门的时候，1918年初的法国又在干什么呢？在那里沸腾激昂的民族热情又是怎样打在慌忙撤退军队的脸上的！为了还要再一次地让取得最终胜利的信念在前方失守的时候深入人心，宣传工作是怎样进行的并且如何巧妙地对广大群众施加影响的呢！而在我们

这里发生了什么呢？什么都没有发生甚至比这还要更糟！当我拿起报纸并且看到如此这般心灵上的大屠杀的消息时，会常常会感到无比地愤怒。

要是上天能让我来代替那些从事宣传工作的无能的、罪恶的废物的话，恐怕战争的命运早就该另当别论了，这个念头常常不只一次地困扰着我。

当我在前线的某个地方偶然和黑人士兵并肩作战的时候，当我在其它地方为祖国效力的时候，几个月以来我第一次感觉到命运中隐藏着的危机！毕竟这也是我当时就已经有胆量相信的事情。

可我只是一个无名小卒，八百万人中的一员！所以还是最好把嘴闭上，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吧。

1915年的夏天，敌人的传单从空中落到了我们的手里。

从内容上看几乎和以前一样，只是形式上看起来有些变化，不外乎就是些：德国的苦难在日益深重；战争遥遥无期，同时赢得胜利的前景渐渐黯淡；国内的人民盼望着和平，只是“军国主义”和“皇帝”不允许这样；全世界 - 恐怕大家都知道了 - 所进行的战争不是针对德意志民族的，而主要更多地是针对唯一的战争罪人，即德国皇帝的；所以要是不把人类和平的敌人消灭掉，战争是不会停止的；一旦确认“普鲁士军国主义”被消灭，自由和民主的国家将在战争结束后接纳德意志民族加入世界永久和平的联盟。

这种观点更好的表达方式就是那并不陌生的“家乡来信”，其内容看来就是为了证明这些论断。

通常人们对这样的企图只是一笑置之。飞机撒下来的传单也有人看，但随后就交到上边去了，大部分都给忘记了，直到一阵风再次把一

些东西从上面投到战壕里去，也就是飞机把传单带来了。

这样的宣传方式中有一点不久就引起了注意，那就是在前线凡是有巴伐利亚士兵的地方总是特别坚定地攻击普鲁士的防线，这肯定不是因为一方面说普鲁士是整个战争的罪魁祸首，而另一方面攻击巴伐利亚士兵尤其也不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敌意；因为他们毕竟还在伙同普鲁士军国主义为他们火中取栗，当然这对他们也帮不了什么忙。

这种影响自 1915 年就已经开始取得明显的效果了。军队人中反对普鲁士的情绪明显有所增加，但是上边却没有一次对此进行过干预。这简直就是一种无端的放任自流，这样做早晚会遭到厄运的报复，而且不是完全针对“普鲁士”，也是针对德意志民族，就是不包括谁也包括巴伐利亚人自己。

从 1916 年起敌人这方面的宣传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而直接来自家乡痛苦绝望的信件也早就起到了相同的作用。现在完全都不特别需要敌人到前线来撒传单了。而对此除了一些傻得出奇的“政府方面”的心理“提示”外，什么都没有做。前线被这样的毒害给淹没了，那些在家里没有主见的女人们当然不会懂得她们所写的信件竟成了增强敌人胜利信心最有效的良方，同时也加深和加剧了她们在前线作战亲人们的痛苦。这些德国妇女毫无意义的来信结果会葬送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在 1916 年就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值得思考的现象。前线的士兵开始责骂和“消沉”，对许多事情感到不满有时发发火也是合理合情的。当前线的士兵忍饥挨饿，他们家里的亲人处在痛苦之中，而别的地方则是丰衣足食和大肆挥霍。是的，甚至在前线这方面也并非全都是很正常的。

当时危机已经在悄悄地临近，可是，这总是关于“国内”的事情。那个当初还在责骂和抱怨的士兵很快就不声不响干他的事去了，好像这是很理所当然的。而那个开始还表示不满的部队也蜷缩在能保护自己的

战壕里，就好像德国的命运全都维系在这几百米长的泥坑上一样。这还是我们原来伟大英勇军队的前线！这里和家乡的区别我一眼就该看得出来。

1916年9月底我们这个部队开拔去参加索姆河战役。对于我们来说这是迄今为止第一次大规模的重型装备战，也留下了难以形容的印象，与其说是战争，倒不如说是地狱。

几个星期的疯狂扫射和狂轰烂炸，德国的防线依然坚守着，时而后移，时而向前推进，但从未退却。

1916年10月7日我负伤了。

我幸运地撤向后方乘车返回德国。

两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一直都没有见到我的故乡，在这样的情形下就好像是一段遥遥无期的日子。我几乎无法想象德国人不穿军装是个什么样子。我躺在埃尔米的野战医院的时候，当一个德国女护士的声音在我身旁突然响起，我着实吓了一跳。

两年来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声音！把我们带往家乡的火车离国境线越近，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就越发地不平静。我们这些年轻的士兵两年前曾驶过的地方现在都一掠而过：布鲁塞尔、鲁汶、列日，最终认出了带有高高山墙和美丽护窗板的德国风格的房子。

祖国！1914年10月跨越国境线的时候我们心潮澎湃，现在却是沉默和激动。每个人都是幸运的，上天让我们每个人看到我们用生命捍卫的她；我们每个人都羞于让别人直视自己的眼睛。

差不多就在我出征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我来到了位于柏林附近必里茨的野战医院。

多么大的转变呀！从索姆河战场到医院里洁白的病床上！开始的时候竟然都不敢躺下去。不过慢慢地也就习惯了这个新的环境。

可惜，在另一方面这里也有些新的东西。

前线士兵的精神在这里是不受欢迎的。我在这里第一次听到了在前线所不知道事情：有人竟然把自己的怯懦来进行夸耀。因为在外面的能够听到责骂和“消沉”的话从来就不会当作是对玩忽职守的要求或是对胆小鬼的称赞。不是的！胆小鬼就是胆小鬼，否则他什么都不是；对他的轻视是很普通的行为，就像人们对真正的英雄表现出的钦佩一样。但在野战医院有的地方几乎已经是相反的：思想意识不决定挑拨离间的人说大话并且企图使用各种糟糕的讲话方式来取笑正直士兵的概念，并把胆小鬼的意志薄弱当成榜样。几个无耻的家伙还表示赞同。其中的一个手被铁丝网划伤也到野战医院来治疗，好像因为这可笑的划伤要在这里无限期地呆下去了，就像他完全是通过撒谎才回到德国一样。这个恶毒的家伙竟把自己胆小怯懦的行为无耻地当成士兵英勇的牺牲精神。大多数都静静地听着，有的离开了，还有几个表示同意。

我对此表示非常地厌恶，可是这个说大话的家伙还在这里静静地疗养。人们该做些什么呢？他是谁，是干什么的，上级领导得知道这些，或许已经知道了。但到底还是什么都没有发生。

当我又可以正常走路的时候，他们允许我坐车去柏林。

到处都可以看得到痛苦和贫困。这个百万人的大都市忍受着饥饿，处在极度的不满之中。在几家不同的士兵疗养院里的论调竟然和野战医院的基本相似。给人的印象是那个家伙好像专门找这样的地方来散布他的观点似地。

还有更让人气愤的情形是在慕尼黑！我痊愈后就离开了野战医院被派到后备役部队，我想我几乎都再也不认识这个城市了。无论是什么地方都是愤怒、厌倦和诅咒！后备役部队中也都是批评的声音。那些年老的教官连一时一刻都就没在战场上呆过，正因如此他们只能部分地理解从前线归来的士兵，所以这些教官对待这样的士兵则采取一种很不适宜的方式。前方服役士兵的某些特点对于后备役部队的教官则是完全不可

理解的，这必须得要靠前线归来的教官对此做些解释才行，而他们自己的脾气当然也和后方部队指挥官的完全不一样。但完全被忽视的是这里的气氛简直糟糕透了；逃避责任已经被看作是聪明的表现，而忠于职守反而被认为是内心软弱和目光短浅的迹象。总理府办公厅里到处都是些犹太人。差不多每个书记员都是犹太人，而每个犹太人也都是书记员。令我感到吃惊的是这么多优秀民族的斗士竟然无法和在前线的少数几个代表人物相提并论。

而在经济方面还有更糟糕的事情。犹太人实际上是“不服兵役的”。这种蜘蛛就开始慢慢地从民众的身上吸血。通过战争环境条件间接地找到了能够渐渐毁掉国家经济和自由经济的方法。

这就是强调绝对中央集权的必要性。

而实际上在 1916 至 1917 年几乎所有的经济生产都在犹太财团的控制之下。

现在该把民族的仇恨指向谁？我当时就惊恐地看到终究要发生的，而且此刻无法逃避的灾难正在渐渐临近。

在犹太人盗取整个国家财富并将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的时候，人们却在煽动反对“普鲁士”。不论在前线还是在后方针对这种有害的宣传上边都没有任何举动。人们好像还完全不知道普鲁士的崩溃会带来巴伐利亚的动荡，是的，恰恰相反的是每一方的垮台都会无法挽回地把另一方一块儿推入深渊。

这样的行为举止让我感到非常地遗憾。我在其中只能看到犹太人要把一般人的注意力从自己引向别处的诡计。当巴伐利亚人和普鲁士人争吵的时候，（看看那个勇敢的小裁缝）他会把两边的人拉开；当有人在巴伐利亚辱骂普鲁士人的时候，犹太人就组织革命把普鲁士人和巴伐利亚人同时打垮。

我再也无法忍受在德意志民族中有这种该死的无能，并且很高兴再



次到前线去，所以我在到达慕尼黑后就立即又提出申请上前线去。

1917年3月初我终于又回到了部队。

将近1917年底部队沮丧气氛的低潮看起来好像可以克服了。俄国崩溃后让整个军队重新又获得了新的希望和新的勇气。部队开始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这场战争将以德国的胜利而结束。人们又能听见唱歌了，倒霉鬼也少多了。人们又相信祖国的未来了。

特别是1917年秋天意大利的溃败起到了最为神奇的作用；人们认识到这次胜利证明了突破其侧翼俄国战场防线的可能性。美好的信念再次让百万士兵激动起来并使得他们愉快地期待着1918年春天的到来。敌人则明显地消沉。这个冬天比平时异常地安静。就像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就在前线进行着永远结束战争最后的准备工作，不断地向西线运送兵力和物资，部队在进行大规模进攻训练的时候，在德国却突然发生了整个战争过程中最严重的流氓事件。

德国真的不该胜利吗：恐怕就在胜利已经贴在德国国旗上的最关键时刻，使出了看起来很适用的把德国春季进攻一下子就扼杀在萌芽中的一个手段，而使得德国不可能取得胜利：组织兵工厂罢工。

如果罢工获得成功，那德军的防线就必然崩溃，就能让这次贴在德国国旗上的胜利和“勇往直前”的愿望无法实现。由于缺乏弹药前方阵地在几星期内就会被冲破；进攻因此被阻止了，协约国得救了；给德国的国际资金却让马克思主义的弥天大谎在国内成为了现实。

破坏国家经济以及确立国际资本的统治地位就是目标，一方面这多亏了愚蠢和轻信，另一方面则是世上少有的胆怯所致。

为了让前线断绝武器所进行的兵工厂罢工当然不是所希望的最终目标：罢工提前解散结果并没有造成像原计划那样的武器匮乏和军队消亡。但更可怕的是所造成的精神上的伤害！首先：如果连国内都不想要

胜利了，那么军队还为什么而战斗呢？为谁去做这样巨大的牺牲和遭受苦难呢？士兵们为了胜利而战，而后方竟用罢工来当作回报？还有第二：罢工对敌人起到什么影响？1917年底至1918年初的冬天协约国的上空第一次被阴云所笼罩。近四年来他们都在冲击着德国勇士，但都未能撞倒；只见这位勇士一手持着盾牌进行防护，另一只手挥舞着战剑一会儿砍向东方，一会儿又向南杀去。现在他背后的威胁终于消除了。多少鲜血才取得了最终消灭敌人的胜利。现在这支战剑将要指向西线的盾牌，如果不能成功地突破防御，那他自己就要受到攻击。

人们害怕受到攻击，担心无法取得胜利。

在伦敦和巴黎则是一次又一个地商议。敌人的宣传工作已经很困难地，再也无法轻易地去证实德国取得胜利的无望了。

在前线也是如此，一切都沉寂得让人直打瞌睡，协约国部队也是这样。罢工这种无耻的行径突然让这样的情形消失了。甚至在协约国士兵的心中还慢慢升起一种令人可怕的念头。现在他们心中对德国士兵的观点有所改变。现在他们就想把德国士兵看成是肯定能够消灭的蠢货；只不过现在德国士兵面临的是要消灭俄国军队。德军东线的进攻由于受到武器弹药的限制现在看起来更要采用高超的战术策略。三年来德国士兵一直在攻击俄国阵地，开始的时候看起来没有什么效果。人们还讥笑这样毫无意义的开端，因为最后肯定是俄国壮汉以他优势的兵力取得胜利，德国则遭受惨重的牺牲而被击败。现实似乎也证明了这样的预期。

自1914年9月，就开始首次有大批的俄国战俘从战场上通过公路和铁路被源源不断地运到德国，可是每击溃和消灭一支部队则就会有新的部队冲上来。这个庞大帝国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会接连不断地让新的士兵成为战争新的牺牲品。德国还能跟着跑多久呢？难道说不消灭完最后一个俄国士兵德国最后胜利的那一天就真的不会来到吗？那以后又该怎样呢？估计俄国的胜利恐怕要给排除掉了，但俄国一定要取得胜利。

现在所有这样期望都结束了：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奉献出最大牺牲的协约国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后精疲力竭地倒下了。恐惧惊慌开始向茫然不知所措的士兵心头袭来。大家都惧怕春天的到来。因为直到现在都不能战胜部分在西线作战的德国人的话，那当这个英勇的国家似乎要集结所有的兵力向西线进攻的时候，又怎么还能想到获得胜利呢？南部蒂罗尔山的阴影遮盖了胜利的幻想；直到在佛兰德的雾霭中依稀可见战败的卡多纳将军阴郁的面孔时，由于担心即将到来的失败，胜利的信念消退了。就在那个寒冷的夜晚，人们相信已经听到了德国军队在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并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注视着即将发生的一切，突然间从德国闪出一道耀眼的红色光芒一直投射到离敌人前线最近的弹坑边上：正当德军军团在为大举进攻做最后准备的关键时刻，国内的总罢工爆发了。

接下来整个世界都默不作声。敌人的宣传机构因此则在最后一刻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而终于得到了解脱。他们一下子就找到了再次增加协约国士兵日益消沉的那极大可能取得胜利的信心和把对未来的担忧也转变成坚定信念的办法。现在人们可以让等待着进行有史以来最大战役进攻的德国军队相信，不是德军大胆的进攻决定战争的结束，而是靠协约国防守的毅力。现在德国人还想要尽最大努力取得胜利，可在国内爆发的革命迎接的将是返回的士兵，而不是胜利凯旋的军队。

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各大报刊开始让读者们深信，同时又通过巧妙的宣传来鼓动前线的军队。“德国爆发了革命！协约国必胜！”对于动摇中的英法士兵这些无异于帮助他们站稳的最佳良药。现在步枪和机枪还能再次开火，但不再造成惊恐逃窜，而只是无谓的抵抗罢了。

这就是兵工厂罢工的结果。这就增强了敌人胜利的信心，消除了协约国前线士兵沮丧绝望的情绪，结果却让成千上万名德国士兵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而煽动这次卑鄙无耻行径的竟然是趁德国革命之机想要爬上政府最高职位的人。

也许接下来在德军这一方对于这种行为所造成显然是适得其反的后果似乎还能够克服掉，但在敌人一方结果却依然没有变化。一支对一切都不抱希望的军队由于没有了作战目标也就失去了抵抗能力，取而代

之的则是要为胜利而战的忿忿不平。

因为整个西线在德军的攻势下也只能坚持几个月，所以按照人们的估计胜利会到来的。协约国的国会也认识到今后可能所采取的措施并同意使用各种手段继续进行瓦解德国的宣传。

我有幸参加了最初两次和最后一次的进攻。

这给我留下了一生中最非同寻常的印象，其特殊就在于类似 1914 年的战争特征一样，由防守转为进攻。在敌人的地狱里坚守了三年多，复仇的一天终于到来了，德国军队可以在战壕和坑道里轻松地喘一口气了。最后把那象征不朽的月桂花环悬挂在胜利的旗帜上，获胜的军队欢呼着。欢呼吧，歌颂祖国的歌声从长长的行军队伍中传出直冲云霄，最后为上天对他那感激不尽的孩子们露出仁慈的微笑而欢呼吧。

1918 年的盛夏整个前线异常的闷热。国内在争论不休。争论的是什么呢？前线部队的各级将领都在议论。现在好像战争的前景黯淡，只有傻瓜才会相信胜利。德国人民不再有兴趣坚持下去了，而只有资本家和君主制王朝才希望战争，这就是国内传来的消息，而在前线对此也议论纷纷。

前线的士兵对此反应很小。我们和普遍选举权有什么关系？我们四年来就是为了这个而战斗的吗？这是一种无耻的流氓行为，还要借此从死亡将士那里剽窃奋斗目标。从前在弗兰德斯我们那年轻的士兵并不是叫喊着“普选和秘密选举万岁”英勇牺牲的，而是高呼着“德意志高于一切”。一个小小的，但却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差别。呼喊着要选举权的人他们大部分都不是在想要获得选举权的地方活动。前线的士兵并不认识这些政治党派的流氓。在人们看来这些议员先生们只不过是四肢能够动弹的正直德国人的一部分而已。

相对于新的战争目标毕竟原来前线的状况是让爱伯特、沙伊德曼、巴特、李卜克内西等等这些人难以接受的。人们无法理解的是像这些不干正事的人怎么会一下子有理由自以为能够对国家军队指手画脚。

从一开始我个人就坚信：我对这些流氓无赖、欺骗人民的党徒深恶痛绝。我很清楚地知道，这些坏蛋并不真地去考虑民族的利益，而只是想中饱私囊。现在他们准备好为此而牺牲全体人民，如果有必要的话甚至可以毁灭德国，在我看来真该吊死这些人。只为了考虑他们自己的愿望而不惜牺牲劳动人民的利益来取悦一小撮盗贼，只要满足这个要求，甚至都准备好放弃德国。

绝大部分的作战部队还都是这样想的。只是从国内送来的军需补给变得急剧恶化，这不仅没有增强，反而意味着削弱部队的战斗力。尤其是那些新兵大部分都没有什么用。简直是难以置信，怎么能让祖国的儿女把青春投入到伊普尔战役上。

尽管敌人在 8 月和 9 月的进攻强度和我们防守的激烈程度无法相比，但溃败的迹象在迅速增加。与此相比，索姆河战役和弗兰德斯战役的可怕景象已经成为了过去。

9 月底，我们的部队第三次到达了当初作为年轻的志愿兵团曾经冲锋陷阵的地方。

还记得吗！那是在 1914 年 10 月和 11 月我们初次战斗的地方。我们这些年轻的士兵怀着对祖国的爱，唱着歌就像去参加舞会一样投入了战斗。为了保卫祖国独立和自由的信念甘愿奉献出我们的热血。

1917 年 7 月我们第二次踏上了我们神圣的土地。那些差不多还是孩子的战士刚才还打着瞌睡，现在则睁大双眼看着这个他们所珍爱并誓死捍卫的祖国。

而我们这些从前随着部队出征的老兵则以敬重的心情站在这里宣誓“誓死忠诚和服从”。

三年前我们的军队曾经冲锋陷阵的这片土地现在则更应该为此而浴血奋战。

三个星期的猛烈炮火说明英国人要在弗兰德斯发起进攻了。就好像已经死去的灵魂又复活了；士兵们趴在肮脏的泥泞中，死死地守住每个坑道和掩体，不退缩，不动摇，阵地好像一下了变小了，防线变薄弱了，直到1917年7月31日英国人终于发动了进攻。

8月初的几天我们开始换防。

整个军团变成了几个连：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浑身沾满泥浆、更像是鬼的士兵回去了。可是除了几百米长的弹坑外英国人得到的只有死亡。

现在是1918年的秋天，我们第三次站在1914年时的阵地上。从前我们那宁静的小城科明斯现在变成了战场。当然，随着战场的转变人们也在发生着变化，现在军队里也有“政治活动”了。像在别的地方一样，从国内传来的流毒在军队中也产生了影响。新入伍的士兵完全不听命令，因为他们是从国内来的。

10月13日至14日的夜晚英国人开始向伊普尔南部前线投放毒气弹；使用的是芥子气，当时我们还不清楚它的作用，那就只好用自己的身体来证实了。我也在那天晚上亲自体验了这种东西。10月13晚上我们在威尔维克南边的一座小山上遭受了几个小时毒气弹的猛烈轰击，整个夜晚都时断时续地越来越猛烈地进行着炮击。将近半夜的时候，我们中的一部分士兵撤了下去，其中有些人永远也回不来了。快到清晨的时候我每时每刻都感到疼痛难忍，将近七点钟的时候我感觉双眼像火烧火燎一般，便跌跌撞撞摇摇晃晃地撤了下去，甚至还带着一份参战登记表。

几小时后我的两眼变得像烧红的煤炭一样，我感到周围一片黑暗。

于是我被送到了在波美拉尼亚的帕泽瓦尔克野战医院，在那里我得经历一场人生根本性的转变。

空气中弥漫着一些不确定的、但又很令人讨厌的东西。人们议论着下个星期将要“开始行动”，我无法想象该如何去理解这个意思。我先是想到是一次就像今年春天发生的罢工。坏消息不断地从正在酝酿此事

的海军那里传来。可是这些传言在我看来似乎更像是一些年轻人的幻想，而不是集体事件。在野战医院里人人都期待着战争早早结束，但却没有一个人会想到“立即”结束。我还不能看报纸。

11月份紧张的气氛在增加。

随后有一天灾难突然在我们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发生了。海军士兵乘着卡车号召革命，为了我们民族生存的“自由、美好和尊严”而奋斗的“领袖”竟然是几个年轻的犹太人。而他们中却没有一个是上过前线的。还间接地通过所谓的“淋病野战医院”把三个来自后方的东方人送回国内去了。而现在他们却扯着一块红色的抹布。

最近一段时间我感觉好多了。刺眼的疼痛消退了，所以我又能够慢慢地学着去分清我周围环境大致的轮廓。我仍抱有希望，至少还可以又能看见东西了，这样以后还能找一份工作。当然什么时候还能画画我不敢再想了。在我渐渐得到康复的时候，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我首先希望的还是这种卖国行径只不过是一个局部事件。我还试着以这样的思路去鼓励我的战友。特别是在野战医院里来自巴伐利亚的战友更容易理解。这里的气氛不像是“革命的”。我真无法想象在慕尼黑也发生了这种疯狂的事情。我对维特尔斯巴赫王朝的忠诚总要比一些犹太人的意愿要坚定得多。所以我唯独相信的是这次海军暴乱几天后就会被镇压下去的。

可以确信接下来的几天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日子。谣言越来越令人窒息。我原以为是地方性事件，而现在已经成为一场普遍的革命了。同时还从前线传来了耻辱的消息。说他们愿意投降。是这样的，这样的事情完全是可能的吗？11月10日有一位老牧师到野战医院作了简短的讲话，我们知道了一切。

牧师讲话的时候我也在场，我被深深地感动了。这位可敬的老先生颤颤巍巍地告诉我们霍亨索伦王朝已经不再享有德意志的皇冠了，我们的祖国已经成为了“共和国”，在这个转变的时刻我们要祈求上帝的恩赐，愿上帝今后与我们的民族同在。他还得对皇帝赞美了几句，称赞他

在波美拉尼亚、在普鲁士，不对，应该是在整个德意志的功绩。除此之外，他也没有做其它的什么，并且开始轻声地抽泣起来。就在这样一个小小的礼堂里沮丧消沉深深地笼罩着所有人的心，我想此刻没有人能够忍住眼泪。这位老先生试着接着往下讲，并且告诉大家我们必须结束长期的战争，是的，因为战争的失败我们要靠胜利者的怜悯过日子，我们的祖国在将来会遭受到沉重地压迫，停战是对我们目前敌人宽容的信任；此时此刻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已经无法再呆下去了。我的眼前阵阵发黑，用手摸着踉踉跄跄地回到了寝室，一下子跌倒在床上，把隐隐作痛的头埋进了被子和枕头里。

自从母亲的葬礼后，我再也没有哭过。命运无情地对待我的童年，让我变得倔犟。在长期的战争中死亡夺走了部队里我亲爱的战友的生命，对我就像是一种罪孽的申诉，他们是为了德意志而牺牲的！而当我自己在最近的几天里和慢慢浸入的毒气做着可怕的搏斗时，我感到它开始在侵蚀我的双眼，害怕自己会永远失明，一度曾非常地沮丧，但良知的心声震耳欲聋般地告诉我：你这可怜的胆小鬼，有成千上万的人比你还要惨痛，而你还要哭。所以我就默默地忍受着我的痛苦。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办法。现在我刚刚才能看见东西，自己却要面对祖国的不幸而陷入无比的痛苦之中。

所以一切都是徒劳的。我们所有的勇敢牺牲和艰苦卓绝的奋斗成为了徒劳，我们几个月忍饥挨饿成为了徒劳，在死亡的恐惧中我们仍然履行着所应尽的责任是徒劳的，为此两百万战士的牺牲也是徒劳的。想必成千上万人的牺牲不是要说明他们曾怀着对祖国的信念出征为的是不再返回自己的家乡吧？那安详的、浑身泥泞和鲜血的、被当作复仇亡灵的英雄送回了家乡，这个人为他的民族做出了世上最大的牺牲，想必这也不是为了要表明要受到如此恶意地欺骗吧？难道1914年8月和9月的那些战士是为了志愿兵团在同年秋天时所增援的老战士而牺牲的吗？那些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们就是为此而长眠于弗兰德斯地下的吗？当初德国的母亲是以何等慈爱之心来抚育她们可爱的孩子们为的是再

也见不到他们，难道这就是德国母亲奉献给祖国所做出牺牲的意义所在吗？而所有这一切的发生都是因为一群无耻的叛徒妄想要谋杀自己的祖国吗？难道我们德国的战士在夏日的骄阳下和冬天的暴风雪中忍饥挨饿受冻，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听着那些永无结尾的童话所坚守的结果就是这样的吗？他就是为了这个结果才投入到地狱般猛烈的炮火中和炙热的毒气战中，毫不退却，总是想着自己的责任来保卫自己的祖国而免遭敌人入侵的吗？的确，这些英雄将会得到一块石碑，上面写到：你是一位徒步来到德国的人，你忠于祖国尽职尽责，告诉家人我们长眠于此。为了祖国吗？这是我们唯一想到可以去做的牺牲吗？过去的德国就不值得去做出牺牲吗？我们的历史难道就没有任何的责任吗？我们还有必要提起以往的荣耀吗？这样的行径在今后该做怎样合理的解释呢？这些无耻和堕落的叛徒！我越想要对这个事件了解得清楚，就越发地感到羞愧和耻辱。对于这个不幸我眼睛的疼痛又算得了什么？接下来所发生的就是痛苦和愤怒的日日夜夜，我知道一切都完了。期待敌人的怜悯只有最大的傻瓜，或者说谎的人和叛徒才能干得出来的事。这天夜里增加了我对这种行径发起人的憎恨。

以后的几天里我清楚地知道了自己的命运。对于自己最近还苦苦忧虑的未来的信念我得开怀大笑。难道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下去不值得可笑吗？我终于明白了这只是一个我常常感到害怕的想法，只是在情感上不相信罢了。

威廉二世皇帝是第一位向马克思主义的领袖们伸出和解之手的德意志皇帝，但他不知道的是这些无赖毫无信义。当他们握着皇帝的手时，另一只手已经在寻找着匕首。

跟犹太人没有什么可商量的，而只能是严厉的是或不是的选择。

而我则决定要成为一名政治家。

第八章 政治活动的开始

就在1918年11月底的时候我回到了慕尼黑。我又回到了原来的但现在掌握在“军人委员会”手里的预备役部队。整个环境让我很厌恶，所以我立即决定要是有可能的话就离开这里。我和一位忠实可信的战友施密特·恩斯特一同去了特劳斯坦因，在那里一直呆到营地的解散。

1919年3月我们又回到了慕尼黑。

当时的形势已无法控制并且不可避免地朝着继续革命的趋势发展。库特·艾斯纳的去世正好加速这个发展进程以至于最终形成了苏维埃独裁，或者更确切地说：形成了过渡性的犹太人统治，就像当初革命的始作俑者把这个作为目标一样仍然浮现在眼前。

这段时间里我脑子里不断地涌现出许多计划。我整天都在思考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可是在认真思考后冷静地断定我本来是一个无名小卒，没有任何一点按计划实施行动的条件。那我当时为什么不决定去参加一个现有的政党呢，对其中的原因还可以谈谈。

接下来发生苏维埃革命的时候我第一次的行动就引起了中央委员会的反感。1919年4月27日清晨我差一点儿被捕，那三个年轻人面对着我举起的卡宾枪失去了勇气退了下去，就像他们冲上来的那样。

几天以后慕尼黑的戒严令解除了，我奉命去了第二步兵团的调查委员会去说明事件的经过。

至少可以说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政治行动。

几个星期后我得到命令去参加为国防军成员举办的一次“培训”。



在这里士兵将要学到一些成为国家公民的基本理论。而这次培训对于我的重要性就在于使我能够结识一些和我思想相同的同志，以便我们对当前的局势进行全面地讨论。我们大家基本上都确信要靠十一月暴乱的政党或是德国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从岌岌可危的崩溃中是无法拯救德国的，即使是所谓“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政党虽然他们有很好的愿望，但从来就不懂得处理好所发生的事情。对此缺乏一系列的条件，而没有这些条件工作是不会取得成功的。随后的时间里对我们当时的观点给予了有理的肯定。

在我们这个小圈子里还讨论了建立新的政党组织的问题。我们眼前所浮现的基本想法和后来实际上成立的“德国工人党”相同。新组织起来运动的名称从一开始就要有可能贴近广大民众；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特点，那所有的工作都将是徒劳和多余的。所以我们想到了“社会革命党”这个名字，因为新创立的社会观念实际上就意味着革命。

更深一层的原因还在于：正因为我早期致力于经济问题的研究，所以或多或少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问题总还是有一些观察。以后这方面的观察还扩展到对德国联盟政策的审视。这个政策大部分是由于对经济的错误估计和对今后德国食物供给基本情况的不了解所造成的结果。所有这样的观点都是基于一种假设，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把资本只看作是劳动的结果，因此对劳动的自身调整就可以决定要么是促进要么是限制人类活动的所有因素。所以资本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也就在于此，即资本本身完全依赖于国家的疆域、自由和权利，当然还有民族，从资本方面来看，出于最基本的维护自我生存和继续繁衍的本能，这种依赖关系就足以促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了。资本对独立自由国家的依赖还可以迫使其本身去支持民族的自由、权利和强大等等。

所以，国家的任务对于资本来说是十分简单明了的：国家只需要注意资本仅仅服务于国家，而不能操纵国家。这种观点有两个方面的限制：一方面维持着国家独立经济的活力，另一方面确保劳动者的社会权益。

对于纯粹由创造性的劳动而产生的资本和其形式和本质是靠投机

而获得的资本的区别，我以前并不了解。这个问题并没有激发起我的兴趣。

现在这个问题则由培训时的许多报告人中的一位先生给予了全面的讲解，这个人就是古德弗里德·费德先生。

我生平第一次听说国际交易所资本和借贷资本之间还有本质上的不同。

当我第一次仔细听了费德先生的演讲以后，脑海中立刻就产生了一个想法，找到了组建一个新的政党基本条件的方向。

我认为费德先生的贡献就在于他果断地判定出交易所资本和借贷资本所具有的投机性以及国民经济的特点，揭示出利息产生的真正条件。他对基本原则性问题的论述都很正确，批评他的人从一开始就很少对其理论观点的正确性展开争论，而更多地只是怀疑其理论的实际可行性方面的问题。在别人眼里费德先生所表现出的懦弱，在我眼中则体现出他的坚强。

纲领制定者所要做的不是去确定实施某一件事可行性的各个阶段，而是要把这件事情讲述清楚：也就是说他不需要去管什么方法如何，而是目标。在此起决定作用的是思想的正确性原则，而不是贯彻性的困难程度。正如纲领制定者试图考虑用所谓的“实用性”和“现实性”来替代绝对的真理，停止探索人性指路明灯的工作，而要想成为救世的灵丹妙药。一场运动的纲领制定者确定行动目标，政治家则努力争取去实现目标。所以一个是由其思想中永恒的真理来决定，而另一个则是更多地由其行动中现实的实际情况所决定。其伟大之处就在于一个来自于其思想绝对抽象的正确性，另一个则是对所提供事实 and 实际使用的正确设想，同时也有助于他作为纲领制定者的行动指南。当人们把政治家计划和行动的成功，也就是说把成为现实本身当作其重要性的试金石的时候，那么政治家就无法实现最终的意愿，这大概因为人们的思想掌握了真理，确立了清晰的目标，只是由于不断地满足人类自身的不足和缺陷

而失败。所以一旦一种思想依赖于人类本身，那么这种思想越是抽象上的正确，因而也就越加强大，也就越不可能完全实现。所以纲领制定者的重要性本身就不能以目标的实现来衡量，而要根据其本身的重要性和对人类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来决定。要是这和宗教的创始人考虑到世上大多数人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宗教的伦理道德观念也就不会完全或者尽量地得到遵守。善意的宗教本身就其所起到的作用而言也只不过是其创始人崇高意愿微弱余辉的表现，可是其意义就恰恰在于试图将宗教纳入人类普遍的文化、伦理和道德的发展进程中。

为什么找不到纲领制定者和政治家二者集于一身的人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各自事业的大相庭径。这尤其对那些所谓“成功”的政治家来说，其活动的重要性大部分正如俾斯麦对这种政治活动简单称谓的那样只是实际上“万能的本领”。我们常常可以清楚地看到，像这样一位“政治家”离开伟大的思想越远，他就越容易和更快地取得成功。当然他们也同样要面临人生的转瞬即逝，有的甚至还活不过他们的父辈。类似这样政治家的事业差不多对于后世是没有意义的，他们现在所取得的成就只是为了防止出现重大问题和杜绝产生深刻的思想，而这一切对后代则是极有价值的东西。

要实现那种为了在遥远的将来才有价值和有意义的目标对于捍卫理想的人来说大都不太值得而且也很少得到广大民众的理解，因为他们对减免征收啤酒税和牛奶税的公告要比那些以后才实施和对后世才有好处的放眼未来的计划要更加明白易懂一些。

为了不失去现有大多数人的好感，大部分政治家都出于某种和愚昧实属相同的自负对未来的确难以实现的蓝图避而远之。所以这种政治家的成就和重要性只取决于当代而不会着眼于将来。这也并不令小人物难堪，因为他们往往满足于现状。

而纲领制定者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他们的重要性往往体现在未来，因为他们很少不是像人们所用的一个“与世隔绝”的词来形容的那样。当政治家的本领真的可以看作是“万能的本领”的话，那么纲领制定者

就属于那些被称为当他们要求和想要不可能的东西的时候才去取悦上帝欢心的人。如果他们的思想是不朽的话，那么他们差不多总是要放弃当代的认可，为此而获得来世的荣誉。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也会出现一次政治家和纲领制定者相互的结合。这样的融合越紧密，政治家所面对的阻力就会越大。他不再为了让某个市侩能够明白的需要，而是为了极少数人才能理解的目标而从事政治活动。因此他的日常生活被爱和恨撕扯着。当代对他不理解的异议在为他争取着后世可以得到的认可。

一个人的事业对将来越是伟大，就越难为当代所理解，斗争也就会更加艰苦，也就很少能够取得成功。他在这个世纪里的昙花一现也许是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一点点来世荣耀的闪亮可以让他光芒四射。当然这些伟大的人物就像历史上的马拉松长跑者那样，当代的月桂花环只会献给已故的英雄。

这些人当中还有世界上伟大的斗士，他们为思想和观念奋战到底的行为不为当代的人们所理解。他们大部分曾经是和民众最为贴心的人，现在就好像每个人都感到有责任来弥补过去对他们所犯的错误。他们的生活和成就受到动人的赞许而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昏暗的日子里那破碎的心灵和受人怀疑的精神。

这里不仅包括真正伟大的政治家，而且还有著名的改革家。除了弗里德里希一世外，还有马丁·路德和理查德·瓦格纳。

当我第一次听古德弗里德·费德先生关于“利息算法”的演讲时，就立刻明白在理论上这是一条真理，对于德意志民族的前途有着无法估量的重要意义。从国民经济中清晰地划分出交易所资本让我们有抵抗德国经济国际化的可能，同时又不至于威胁到民族独立生存的基础。我已经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了德国的发展方向，而我以前所不知道的则是这场必须奋战到底的艰苦斗争不再是针对敌对国家的人民，而是国际资本（国际银行）。我感到费德先生的演讲有如是今后战斗强有力的口号。

后来的发展也证明了我们当时的想法是多么的正确。今天我们不再让那些狡猾的资产阶级政客所嘲笑了；他们说什么国际交易所资本不只是煽动了战争，而且正是因为战争的结束才没有放弃让和平成为地狱，今天倒要让他们自己看看他们是怎样说谎的。

反对国际金融资本和借贷资本的斗争成为了德意志民族争取经济独立和自由斗争中最重要的一点。

关于那些所谓有经验的人们所提出的反对意见可以作如下的回答：所有对实施“利息计算法”会带来可怕的经济结果的担心都是多余的，首先因为是迄今为止的经济措施让德意志民族得到了对有关维护自我生存问题上一个很不好的观点，这反倒让我们回想起过去类似于听取专家的意见，比如说就像引进铁路的问题去听取医学委员会的意见一样。大家都知道这些机构所有的担心在以后都没有出现，乘坐“蒸汽机火车”旅行的人们也没有感到头昏脑胀，看见火车的人也没有生病，人们也放弃了用木栅栏把这个新设备遮盖起来的想法，只是这种所谓“专家”档在眼前的隔断却留给了后人。

其次所要提请注意的是：一种思想，即使是最好的思想，如果它只想象为目的本身，而在现实中则只表现是为目的而目的的手段的话则会是很危险的，而在我看来所有真正的民族社会主义分子就只有一个主义：民族和祖国。

我们为什么而奋斗呢，是为了我们民族的生存安全和我们种族的繁衍，是为了养育我们的后代和保持我们血统的纯净，是为了祖国的独立和自由，是为了让我们的民族日渐成熟地完成宇宙创造者给他们安排的使命。

每一种思想和观念，每一种学说和所有的知识都要服务于这样的目的。从这个观点出发去审视一切并且遵循这个原则去决定取舍。这样的话理论就不会变成极端僵化的教义，因为所有的一切都赋予了生命。

所以，认识古德弗里德·费德先生是让我全面致力于对于我还缺乏了解的领域进行认真研究的起因。

我又重新开始学习并且对犹太人卡尔·马克思理论的内容和毕生所致力的心愿有了相当深刻的理解。我现在才真正地懂得了他的《资本论》，也懂得了社会民主党之所以反对国民经济政策实际上是为国际金融和国际交易所资本的统治地位打下基础。

这次培训还从在另一方面对我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有一天我请求发言。一个参加会议的人认为应该为犹太人做些辩护，为此还长篇大论地袒护犹太人。这就激起了我的反驳。在场参加培训的人大多数人都支持我的观点。结果是几天后决定让我在慕尼黑军团里担任所谓的“教官”。

当时军队的纪律性很差，主要是受到军人委员会时期的影响。只有非常缓慢地、小心地才能在这个库特·艾斯纳习惯形容为猪圈的地方从“自愿”的服从过渡到使用军纪和绝对的服从。军队应该学会感到和想到自己的民族和祖国。这也是我所从事新的工作的两项主要内容。

我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一下子给了我面对许多听众的机会，我从不知道以前总是发自内心的情感表达现在证实了：我能“演讲”。而且讲话的嗓音也比原来好多了，所以我可以至少让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能明白地听到我的声音。

再也没有比这项工作更让我开心的了，因为这可以让我在退伍前在这里做些有用的事情，在我无比热爱的地方：军队。

可以说我已经有了些成就：我让好几百名，也许是上千名的战友在听了我的演讲后重新回到了祖国和民众身边。我让军队“民族化”了，并通过这个方法加强了大家共同遵守的纪律性。

我又结识了许多和我有相同观点的战友，并把他们造就成为日后新兴运动的基本骨干。





第九章 德国工人党

一天，我接到上司的命令，让我去查看一下有个明显带有政治色彩取名为“德国工人党”的团体，他们要在几天后召开会议，而且古德弗雷德·费德先生也要前去做演说，所以我得去看看这个组织并且还得写出报告。

当时军队方面迎合一些政党的好奇心多少是可以理解的。这场革命给了军人从事政治活动的权力，而恰恰都还是些最底层的军人才利用这样的权力。可就在此时此刻德国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自己才不得不遗憾地认识到许多革命政党开始远离对士兵的同情而转向了民族运动和民族振兴方面来了，所以就要取消军人的选举权并禁止军人参加政治活动。

德国中央党和马克思主义采取这样的措施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要是不削弱“资产阶级权益”，就像革命以后人们号称军人政治权力平等那样，那么几年后就不会有十一月革命的国家，也就不再有让人感到丢脸和耻辱的事情发生了。当时军队正处在能够摆脱协约国在德国的吸血鬼及其帮凶的最佳位置上。到现在对十一月叛乱分子观念的改变而激动不已的所谓“民族主义”政党赞同和支持不损害民族振兴的行动就再次表明了要把那最仁慈的好心人的教义学说引向何方。这些真的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资产阶级非常严肃地认为军队要恢复像以前的样子，也就是要成为德国国防的守护人，但同时德国中央党和马克思主义却只想要拔掉这颗危害国家的毒牙，可是没有自卫能力的军队是不能够和敌人作战的，那就永远成了只能维持治安的警察而已，以后的事情就充分地证实了这一点。

或者那些我们“国家的政治家”还认为军队的发展应该与国家的发展有所不同？恐怕也只有这些无耻的先生们才做得出来这种事，那就是在战争期间不去当兵而去当空谈家，也就是什么国会议员，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当男子汉们想到那曾经强盛的过去和曾经作为世界第一流士兵时的心中是怎样地心潮澎湃。

所以我决定去参加他们的聚会，尽管对这个政党还不完全了解。

当我晚上来到原来的慕尼黑斯特奈克啤酒馆而日后成为了对我们有历史意义的“诞生地”时，看见在座的有 20 至 25 个人，主要是来自社会下层的人们。

费德先生的演讲在培训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所以我就把注意力放在对周围的观察上。

这里给我的印象不好也不坏，新成立的政党和别的政党有很多相似之处。当时的情况就是每个人都有种责任感去组建一个政党，而又对其发展不很满意并且还不信任已有的政党。所以只是无缘无故地冒出许多组织，然后又无声无息地消失。而那些创始人大部分也都不知道这些组织该叫什么，是成立一个政党还是搞一场运动。所以这样组建起来的组织几乎总是由于可笑的庸俗性而自生自灭了。

近两个小时的听讲后我对“德国工人党”也没有做出什么判断。费德先生的演讲终于结束了，我当时感到很高兴。我已经看得够多了并在想要离开的时候，正好宣布说大家都可以发言倒让我又留了下来。可一切也都进行得没有什么意思，直到有一位“教授”突然要发言，他先是对费德先生的论点表示怀疑，但在费德先生做了很好的答复后他又突然要“根据事实”不但没有向这个新近成立的政党建议最为迫切需要做什么事情，反而认为主要的工作重点是要进行把巴伐利亚从“普鲁士”中

“脱离”的斗争。这个人竟厚着脸皮胡说什么现在尤其是要让德国和奥地利跟巴伐利亚合并，这样才有利于和平以及其它类似胡说八道的东西。针对这位学识渊博的先生的观点我只有请求发言来阐述我的看法，结果就是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他就狼狈不堪地离开了。在我发言的时候人们都带着惊异的表情认真地听着，而当我说今天晚上的聚会很好准备离开的时候，从后面跑过来一个人向我做了自我介绍（可惜我连名字都没有完全听清楚）并把一本小册子塞到了我的手里，这显然是一本政治宣传册，他还嘱咐我一定要读一读。

我感到很快活，因为我想也许可以用很简单的方法就能够结识这个无聊的组织，还不必接着参加这样有趣的聚会了。另外这个看起来像个工人的人给了我很好的印象。随后我就走了。

我当时还住在第二步兵军团兵营里的一个小房间里，这里也明显地带有革命的痕迹。白天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去第41步兵团或是去参加会议，或者是其它部队的讲座等等。只是到晚上才睡在我的住处。我现在已经习惯了每天早晨5点钟起床，还常常为房间里嬉戏的小老鼠把一些硬面包屑和面包皮放在地上看着这些滑稽可爱的小动物为了这么几块美食相互追逐着。我已经经历了许多生活中的苦难，所以能够从我挨饿的情景来想象这些小生灵的快乐。

参加聚会后的第二天早晨5点钟我就醒了，躺在床上看着老鼠蹿来跳去地忙个不停。反正我再也睡不着了，忽然想起昨天晚上的事情，想到了那个工人给我的小册子。我开始读了起来。这本册子的作者描写了一个工人是怎样从马克思主义和工会组织的胡言乱语中走出来获得了爱国主义思想的过程，题目就叫“我的政治觉醒”。刚开始我就有兴趣读了下去，对照他的经历我在这十二年里也有着相似的亲身经历。我自己的成长过程不由自主地又浮现在眼前。我整天都在反复地思索着这些事情，后来当已经想要躺下来休息的时候，让我惊讶的是连一个星期都不到的时候就收到了一张明信片，说是已经批准我加入“德国工人

党”了，并且让我去参加下个星期三召开的党小组会议。

对这种“招募”党员的办法真让我感到吃惊，不知道对此该生气还是觉得可笑。我从没有想到去加入一个现有的政党，而想要组建自己的政党。这样无理的要求我是完全不会接受的。

就算是我要给这些先生们写书面的答复，可好奇心倒让我决定在这一天亲自到现场去口头陈述我的理由。

到了星期三。通知要举行会议的那家旅店原来是在海恩大街上的“玫瑰浴场”，是个非常简陋的地方，要去那里好像随时都会有人迷路的。在1919年即便是大一点饭店的菜单都是很简单的，接待顾客也是很寒酸的，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我对这里的招待情况则完全一无所知。

我穿过灯光很暗的客厅，那里没有人，便找到通往旁边房间的门，然后就看到了“会议”的指示牌。借着一盏破旧的气灯模模糊糊地看见有四个人坐在桌子旁边，其中一个就是那本小册子的作者，他立刻向我打招呼，并欢迎我成为“德国工人党”的新成员。

这倒让我有点目瞪口呆了。因为原本告诉我的是“党主席”要来，而我还等着要说明我的意见。他终于来了。他就是在斯特奈克啤酒馆里主持会议和费德先生演讲的那个人。

这时我反倒感到十分地好奇了，看看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情。现在我至少已经知道了每个人的姓名。这个“党组织”全国的主席是哈勒先生，慕尼黑的党主席是安东·德莱克斯勒。

会上先是宣读上一次会议的记录，还对秘书的记录表示谢意。然后谈的是财务报告，这才发现当时这个组织的经费只有7马克50芬尼，这个财务出纳怎么来获得大家的信任呢。把这个也给记录了下来。然后是宣读全国的主席给一封来自基尔、一封来自杜塞尔多夫和一封来自柏林信件的回复，他都表示同意。现在又告诉大家来信的情况：一封来自柏林、一封来自杜塞尔多夫还有一封来自基尔，大家好像对来信表示很满意。人们认为来信的增多是“德国工人党”名声广泛传播的最好和明显的标志，然后又开始长时间地讨论如何进行回复。

可怕，真是太可怕了！这是最让人生气的会议形式了。我应该加入这样的俱乐部吗？接着开始讨论吸纳新党员的问题，也就是说：讨论关于我入党的问题。

现在我开始提问题，可除了几条指导性原则外就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没有党纲、没有宣传册、没有任何打印的东西、没有党员登记表、就连一枚最起码的图章也都没有，看得出来的恐怕只有信任和良好的意愿了。

我脸上的微笑再次消失了，难道这和迄今所有的政党及其党纲、思想和行动的完全茫然不知所措和彻底失去勇气信心的典型表现有什么不同吗？是什么让这几个年轻人凑在一起干一些看起来如此可笑的事情呢，难道只是他们内心的感觉，也许更多地是情感上而非理性上认为这个政党看起来不再适合于德意志民族的振兴，而是适合治愈内心的伤痛的结果吗。我很快读完了由打字机打出来的几条原则性纲领，看得出这些内容更多的是一种探求，是一无所知。很多地方都是含混不清或者说就是不甚了了，有些地方还漏洞百出，可就是没有能够看作是清楚明了的只言片语。

我也认识到他们所意识到的是什么：就是渴望着一场至少比政党在字面上的含义要多得多新的运动。

当我晚上再次往兵营走的时候，就已经对这个组织有了一个判断。

我也许面对着一个我有生以来最难的问题：我应该加入这个党还是拒绝呢？理智劝告者我应该拒绝，而情感又让我难以平静，眼前越是想着这个俱乐部式的组织，情感就越常常占上风。

随后的几天里我坐立不安。

我反反复复地思索着。我已经决定了要从事政治，只是我清楚这次要发生的是一场新的运动，只是缺乏行动的动力。我不是那种今天开始明天就束手无策的话又去干另一件新事情上的人。正是由于相

信这一点，才是我之所以为什么对这一次新的开始难以做出决定的主要原因，它要么将成为我今后的一切，要么就适可而止。我知道这对我来说将是一个永远的决定，对此不再有什么“后路”的。这不再是短暂的儿戏，而是极其严肃认真的决定。当时我就对那种一切都准备就绪而又什么都不做的人有一种本能的反感。我讨厌这类什么事情都想插手的万事通。这种人的行为比那些什么都不做的人还要糟糕。

现在命运仿佛在指引着我。我似乎不应该加入现有的一个什么大的政党，对此我将进一步说明原因。光是招收几名成员的可笑做法在我看来倒是得到了一个优先权，因为这样还没有形成一个僵化的“组织”，因此就有可能任凭每个人去实际发挥了。运动的规模越小，就越有可能以正确的方式加以引导，这就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这就需要对其运动的内容、目的和方法进行指导，而这些工作在各大现有的政党中从一开始就给忘得一干二净了。

我对此考虑的时间越长，就越相信恰恰是这样一场小规模的运动将预示着民族振兴的大事，而肯定不是那些依靠旧有的观念和利用新军团的议会政党。因为必须告诉大家的是一个新的世界观，并不是一个新的选举口号。

总之，要想把一个想法变成现实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

对这样的使命我自己到底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呢？我对自己的贫穷看来还可以轻易地忍受，但困难的是我一下子被当成偶然地让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或者是迫于生计进行呼喊而对自己周围所处的世界全然不知的几百万人中的一个无名小卒了。另外还有的困难就是我缺乏在学校里应受到的教育。

所谓的“知识分子”本来就总是以高人一等的姿态小看那些没有受到过应有的学校教育和没有灌输到所需知识的人。但从来就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这个人能做什么，而只是问：他学了什么？这种用各式各样的学历证书包裹起来的“学者”比起一个没有这些高贵包装的聪明少

年来看才是真正的笨蛋。所以我能很容易地想象得到这些“学者”该怎样来反对我的，同时也把我给搞糊涂了，可惜我当时还以为这些人比起客观实际上的大部分人来说还很不错呢。当然就像别的事情一样个别例外的人总是光彩照人，他们也是如此。但我却学会了如何分辨出永远的学生和真正的能人。

经过两天的苦思冥想我终于决定必须迈出这一步。

这是我一生中至关重要的决定。

这时候不能也不可以退缩了。

所以我在“德国工人党”登记成为其成员，我得到的临时党证的号码是：7号。



第十章 帝国崩溃的原因

任何一个人身体衰落的严重程度可以从他现在和原来身体状况的差别看得出来。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衰落也是如此。所以从前的地位或者说是高度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只是平常所能达到的最大高度也可能会猛然降低和下跌。德意志帝国的崩溃对于每个有头脑和情感的人来说都是非常沉重和痛苦的，面对现在受侮辱的苦难程度这样的骤变几乎是无法想象的。

早在建立帝国的时候就已经被实现民族振兴的魔力所缠绕着。在取得一系列空前的胜利后，作为对不朽英勇气概的报答，终于给子孙后代带来了一个德意志帝国。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反正都一样，德国人都感觉到这个帝国是不会靠议会政党的欺骗而存在的，本来这种建立帝国的突出方式就已经超出了其它国家的容忍限度，因为上从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的所有德国人都决定将来要建立德意志帝国并且还要把皇冠作为新帝国的标志大加称颂，而且这种可喜可贺意愿的表达行为不是在议会里喋喋不休的论战中，而是在合围巴黎作战前线隆隆作响的轰鸣声中进行的。俾斯麦式国家的建立不是靠暗杀、不是靠逃兵和逃避工作，而是靠前线的军队。

这种独一无二的诞生方式和火一般的战争洗礼就已经让这个庞大帝国笼罩在连最古老的国家都很少享有的历史荣耀的光环之中了。

这是一次何等的飞跃！对外扩张的自由给了国内人民每天的面包。我们国家将拥有大量的人口和地球上丰富的资源。国家的荣誉和享有这份荣誉的人民得到了和以往联邦军队明显不同的德意志军队的守卫和保护。

我们德意志帝国和民族遭受了如此沉重的灾难，就像是一阵昏厥，先是失去了感觉和意识，面对着今天的苦难连过去的伟大和辉煌都想不起来了。

所以，让这样的变故搞得头昏目眩而忘记了去找出想必肯定曾经存在的引起这场巨大灾难的征兆也是可以说得过去的。

当然对于那些把德国纯粹当作是一个赚钱和花钱的地方的人们来说，只有他们才感觉到如今的情景真是一场灾难，而另一些人则把这看成是他们长期以来可望而不可求愿望的实现。

这种征兆是明显存在的，只不过是少数人没有从中吸取教训罢了。而现在则比过去更有必要去找出原因。

如果知道病因就可以治愈疾病，这同样也适用于治疗政治弊端。当然人们总是去治疗眼睛所能看得到的、能轻易发现的疾病，而不是其内部的病因。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的人完全无法摆脱对表面作用的认识并且还往往和病因加以混淆，更有甚者还试图去完全否认病因的存在了。在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把德意志帝国的崩溃首先只看作是一般的经济困境和由此而产生的后果而已。所以几乎每个人都要承担这样不幸的结果，这可真是给每个人的一个无可辩驳的理由。但是大部分的人却很少看到这场灾难的原因还与政治、文化、伦理道德有着很大的关系。而大多数人从情感上和理智上却都对此完全予以否认。

如果是广大民众这样认为倒还说过得去，可就连知识分子阶层也把德意志帝国的崩溃首先看作是“经济灾难”，所以因此而期待着对经济的治理，这也就是直到现在还无法完全恢复的原因之一。人们首先要懂得经济只能是起到了第二甚至是第三层次上的作用，而政治、伦理道德以及血统方面的因素才是第一位的，这样才能明白目前不幸的原因，才能找到解救的方法和出路。

因此，德意志帝国崩溃原因的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对于一场以战胜失败为目的的政治运动来说。

即使是对过去进行研究也要防止把眼睛更容易看得到的表面现象和不易发觉的原因相互混淆。

对于所造成今天的不幸最容易为大多数人所公认的原因是因为战争的失败，所以这也就是现在不幸的原因。

想必有很多人都是非常相信这样胡说八道的话，还有更多的人从他们的嘴里说出的理由只能是谎言和睁眼说的瞎话。像这样的人今天最适合养在政府机构的牲口棚里。难道不正是因为这些从前叫喊着革命的人总是一再热心地告诫人们无论战争怎样结束对于广大民众来讲结果都是一样的吗？相反难道不是他们极其认真地保证过过多是“大资本家”才对这场大规模战争的胜利结束感兴趣，而不是德国人民自己或者是德国的工人阶级？是的，这不正好是那些宣讲世界要进行和解的人却完全相反地说德国的战败仅仅是消灭了“军国主义”的解释吗，难道德国人民还要庆祝其伟大的复活吗？在这个方面难道没有称赞协约国不把血腥战争的全部责任推给德国的好意吗？要是没有这种军事上的失败不会对这个国家产生严重后果的解释的话，那这和大家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整个这场革命不是靠什么革命阻止德国战旗的胜利才会迎来德国人民心中伟大的自由的空话来美化的吗？难道不是这样的吗，你们这些卑鄙虚伪的家伙？现在把德意志崩溃的责任都推到军事方面的失败上这纯属是犹太人的无耻，而在国内这些叛徒的总部就是柏林的《前进报》还写到这一次恐怕德国人再也不会带着自己的旗帜凯旋而归了！难道这些就是我们帝国崩溃的原因吗？当然和这种健忘的说谎的人去争辩是毫无意义的，我不愿意因此去浪费我的一个字，要是没有这么多愚蠢的人跟着这种胡说八道去鹦鹉学舌的话，也就不会引起恶毒的攻击和肆意的诽谤了。在此方面的研究探讨还应该帮助我们的勇士去进行争辩，尤其在人们习惯常常讲出已经歪曲了的话的时候则很有必要。

所以，那种让战争的失败来承担德意志帝国崩溃责任的断言还得出

了如下的结论：总之战争的失败对我们祖国的未来是个可怕的兆头，可是战争的失败并不是原因，而是原因的结果。这场生死存亡战争的不幸结局导致了失败的后果对每个明智的和没有恶意的人们是完全清楚的。只可惜的是好像还有一些人在关键的时刻缺乏这种明智的头脑，或者与他们自己更好的学问相违背因而才否认和抛弃这条真理的。他们大部分是些在实现了自己隐藏的意愿以后一下子对他们自己一同酿成的灾难有了明智了解的人。他们这些人才是德意志帝国崩溃的罪魁祸首，而不是失败的战争，正如他们自己突然讲出来和所知道的那样。因为战争失败只是他们行动的结果，而不是像他们现在所断言的是由于“糟糕”的领导人的结果。即使是敌人也并不都是懦夫，他们也知道为国家而牺牲，从战争的第一天开始敌人的兵力人数就超过德国的军队，而且全世界的军械装备给他们做后盾，因此这四年来德国投入了全部的英勇精神以及整个“国家机构”与全世界所进行的战斗而取得的胜利只能归功于运筹帷幄的领导机构，这个事实是不容否认的。德国军队的领导机构是迄今世界上所能见到的最强有力的，但缺少的只是对人类有足够的普遍认识罢了。

军队的溃败并不是我们今天不幸的原因，而只是其他人叛变的结果，而这个结果本身才又显而易见地开始导致了接下来的德意志帝国崩溃。

这样的结果有以下的原因：军事上的失败必然会接连导致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崩溃吗？人民和战争的失败有关吗，并且会因此而毁灭吗？答案很简单：只有当这个民族因为他们自身内部的腐败、怯懦、意志薄弱，总之是没有了尊严来偿付军事失败的后果时就和人民有关系了。但当军事上的失败反而推动了民族更大规模的发展，而不是作为民族墓碑的时候，那情况也就不同了。

历史上可以举出无数的实例来证明这个观点的正确性。

只可惜德意志民族在军事上遭受的失败不是一场不应得的灾难，而

是一个应得的进行永远复仇的开始。这次失败我们是应得的。这次失败无非是一系列帝国内部衰亡征兆的最大外部表现而已，只不过在大多数人的眼中也许没有引起注意或者人们按照鸵鸟方式不愿意看到罢了。

人们该注意一下德国人民接受战争失败的表现。人们不是在许多场合以最可耻的方式对祖国的不幸直接表达出喜悦了吗？要是他们不真的应该受到惩罚的话，谁又会这样去做呢？是的，还不马上炫耀一下自己终于从前线撤退了？而且这些还都不是敌人做的，不，不是，这些耻辱是德国人自己给戴到头上的！

他们遭受到的不幸难道不合理吗？什么时候开始人们把战争的罪责归咎到自己身上的呢？而且还是违背心愿和有违良知的呢！

不对，就是不对：通过德国人民接受战争失败的形式和方法就能让人们很清楚地认识到德意志帝国崩溃的真正原因完全要到别的地方去找，而不只纯粹是由于几处前沿阵地的陷落或是某一次进攻的失败，因为即使前线真地遭受了这样的失败并由此不幸地招致了祖国的厄运的话，那么德国人民也要对战争的失败采取不同的态度。那么人们就要咬紧牙关忍受接下来的不幸或者满腹悲伤地去控诉，那么人们就要义愤填膺地去面对那些靠偶尔施展一下阴谋诡计或者靠上天的意愿才成为胜利者的敌人，那么这个民族才会像过去为了古罗马的元老院那样去战胜敌人，而祖国也会感激你们所做出的牺牲并请求你们不要对德意志帝国失去信心。即使是投降也要在对未来的繁荣而怦然心动的时候在理智的条件下签字。

这样才是接受只归咎于厄运失败的态度。人们不会去喜笑颜开和手舞足蹈，不会去炫耀自己的胆怯和赞颂失败，不会去嘲笑英勇奋战的军队，也不会给军旗和徽章抹黑，尤其特别的是：不再发生像英国军官约平顿上校轻蔑地提到的“三个德国人中就有一个叛徒”那种可怕的事情。不，这种瘟疫五年来肯定不会上涨形成就连世界最后一点对我们的关注都要淹没掉的令人窒息的潮水的。

这里就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战争的失败是德意志崩溃的原因的欺骗性言论。不，军事上的溃败只不过是一系列病症表现的结果，而病原体

在和平时期就已经在侵蚀着德意志民族。而这首先就是多年以来开始破坏我们民族和德意志帝国根基的对伦理道德的毒害、对自我生存本能和生存条件的削弱的灾难性后果。

另外，还有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战斗组织那简直是闻所未闻的欺骗性，他们妄图把德意志帝国崩溃的罪责加在一个人的身上，而恰恰就是这个人才是唯一的一个试图用超人的意志和能力去防止他所预见的灾难以避免我们民族受到深重压迫和耻辱的人，他们称鲁登道夫应为战争的失败负责是要从这个唯一的一个站起来反对祖国叛徒的危险控诉人的手中夺走道德权益的武器而已。人们从非常正确的基本原则出发认为谎言中的大部分总还是有可信的价值成分的，这是因为广大民众其内心深处比起有意和故意变坏来说更加容易堕落，所以相对于小小的谎言来说一个真正弥天大谎言纯朴的情感更容易让他们成为牺牲品，虽然他们羞于说谎，但自己有时也难免撒一点小谎。像这样的谎言广大民众是完全无法理解的，即使是别人进行无耻歪曲的卑鄙行为他们是有可能不去相信的，而要对此进行澄清则表现出长时间的怀疑和动摇，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就把假的当成真的去接受了，那些世界上最可耻的撒谎团伙对此却了如指掌，因此也就对这种下流的做法运用自如了。

在任何时候真正能够进行欺骗和诽谤的行家就是犹太人，而且他们的存在本身整个就是建立在一个巨大的谎言之上的，也就是在他们宗教团体的谎言之上的，同时也就是在他们这个民族的谎言之上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啊。一位人类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对这样的人用了一个永远正确的、说明了一个基本道理的句子清楚地形容他们是“伟大的谎言大师”。谁要是没有认识到或者不愿意相信这一点的话，那他在这个世界上就永远无助于真理的胜利。

这场可怕的灾难突然缩短了德意志民族的慢性病，这几乎可以看作是一种民族的大幸，因为在别的情况下这个民族就会慢慢地，但肯定是要走向灭亡的。而这种慢性病至少在德意志帝国以剧烈方式土崩瓦解的时候让大多数人清楚和明白地认识到了。比起肺结核病来说人类不是偶然更轻易地战胜黑死病的。一个是来势汹汹，让人心惊肉跳，而另一个

则缓慢滋长；一个是令人恐惧，而另一个则会渐渐让人疏忽。结果就是人类遇到黑死病的时候则全力以赴地去抗击，而遇到肺结核的时候反而只是试着用简单的方法去防治。所以人类战胜了黑死病自己反而受到肺结核的困扰。

人类患病的情况也是如此的。如果没有表现出灾难性的症状，人类就开始去适应病症，而最终还是因疾病而走向毁灭，虽然在一段时间以后比原来更明白一些了。如果上天决定干预这种缓慢的腐败变化过程，并且突然一下子把疾病的灭亡展示给受疾病控制的人的话，这当然是一个痛苦的幸福。那么这样的灾难将会不止一次地而是会时常地发生。也就很容易成为非常坚决果敢地去进行治疗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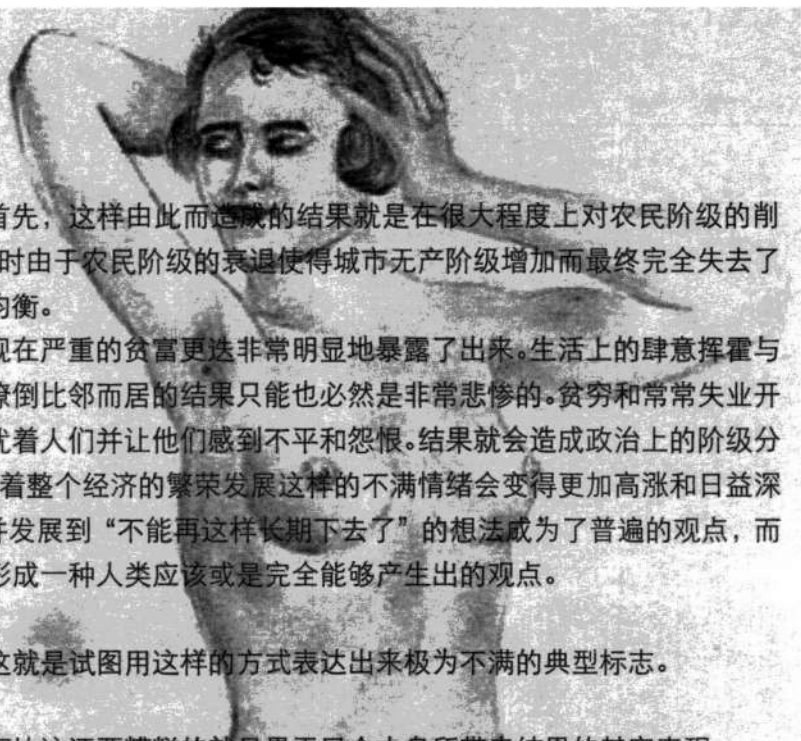
但出现这种情况的前提条件是对导致疾病产生的内部原因的认识。

最为重要的是要从疾病所导致的症状中区分出疾病的根源所在。病毒在人类中间存在的时间越长，就会有更多的附属成分存在，就会更难进行区别。因为在一定时间里很容易会出现将有害的毒素当作本体来看待或者故意忍受疾病的情况，以至于对病原体的寻找被认为是不必要的。

在战争之前很长的和平时期内大概也出现过某些病症表现，尽管人们对疾病的根源本身还从来没有这么好地关心过，除了个别情况外还是被识别了出来。和其它许多领域的情况相比，首先这里的个别现象又指的是经济生活中能让每个人都能更加强烈地意识到的现象。

有许多征兆都能够引起人们严肃地深思。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可以作以下说明：战争前德国人口激增使得每天所需面包的供给问题越来越尖锐地成为了所有政治和经济思想和行动的前提。可惜的是人们没有决心以正确的方法去解决问题，而是相信用简便的方法就可以达到目的。放弃领土扩张政策而取而代之以经济征服的妄想必然导致毫无节制和有害无利的工业化结局。



首先，这样由此而造成结果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对农民阶级的削弱。同时由于农民阶级的衰退使得城市无产阶级增加而最终完全失去了社会均衡。

现在严重的贫富更迭非常明显地暴露了出来。生活上的肆意挥霍与贫困潦倒比邻而居的结果只能也必然是非常悲惨的。贫穷和常常失业开始困扰着人们并让他们感到不平和怨恨。结果就会造成政治上的阶级分裂。随着整个经济的繁荣发展这样的不满情绪会变得更加高涨和日益深重，并发展到“不能再这样长期下去了”的想法成为了普遍的观点，而没有形成一种人类应该或是完全能够产生出的观点。

这就是试图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出来极为不满的典型标志。

而比这还要糟糕的就是愚弄民众本身所带来结果的其它表现。

当经济上升成为国家决定性主宰地位的时候，金钱就成了上帝，所有一切都服务于金钱，人人都对金钱毕恭毕敬。上帝越来越被认为是过时和陈旧而被丢到一边置之不理，取而代之则是沉浸在金钱崇拜的迷雾之中。一场真正严重的蜕化堕落开始了，之所以严重是因为它正好发生在德意志民族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至高无上的英雄主义精神的时候。德国准备着总有一天要用利剑来确保为了每天的面包而进行的“和平的经济工作”的尝试。

可惜金钱的统治地位通常只有在如下的反对意见的情况下才会得到认可：特别是当皇帝陛下把贵族们也置于金融资本的魔力影响之下的做法是很不利的。当然人们对他还是情有可原的，可惜在这方面就连俾斯麦也都没有认识到这种即将出现的险情。因此思想道德事实上已经排在金钱价值之后，所以很清楚的就是不久就会让金融新贵领先于佩剑贵族。金钱交易比战场厮杀更容易取得成功。所以就不再真正需要那些引人入胜的英雄或是政治家了，而这方面最好就是利用犹太银行家，他们是真正值得称赞的人，不对所授予的那些微不足道的勋章感兴趣，而是会心存感激地进行谢绝。但要是从纯粹情感的角度去观察此事的发展就

会深深地感到悲伤：贵族阶级一再失去其自身的生存条件，而大部分则更多地称其为“非贵族”而更为恰当些。

一种严重的经济衰败现象就是渐渐地剥夺个人财产所有权并且整个经济逐步地过渡到股份公司所有。

所以，首要的工作就是减少那些丧尽天良的投机小贩的投机行为，使个人财产与不断增加的工人财产脱离开来。交易所开始大获全胜并且准备慢慢地、但肯定要把民众的生活置于其保护和监控之下。

战争前通过发行股票使得德国经济的国际化。当然有一部分德国工业还试图坚守避免遭受这样的命运。但是最终还是成为了贪婪的金融资本共同攻击的牺牲品，这些金融资本在这场战斗中还特别得到了其最为忠实的战友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帮助。

针对德国“重工业”持续不断的打击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德国经济国际化明显的开始，总之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在这场革命中取得的胜利才能将国际化完全进行到底的。当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对帝国铁路的总攻终于获得了胜利而使其落到了国际金融资本的手中。所以“国际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又实现了其主要目标中的一个。

这种对德国民众的“愚弄”到底取得了多大的成果最明显的恐怕就是要从战争结束后德国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中的一位所表明观点中看得出来，他认为只靠经济就能够再次建立德意志。目前这种胡言乱语在四处散布着，因为法国学校里的课程首先是以人文主义思想为基础的，是为了防止产生类似于国家和民族能够继续存在并不归功于永恒的精神价值，而是依靠经济这样的错误。当时一个叫施廷内思对外发表的这个言论造成了最无法估量的困惑，但却立刻引起人们的注意并令人惊讶地迅速成了江湖骗子和空谈家们的座右铭，而这些自革命以来称为“政治家”的家伙则对德意志的命运放任自流。

最糟糕的衰败表现之一就是在战前不断增加的处处动摇不定，人人

精神萎靡。这就是对某一件事缺乏一些自信以及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所造成胆怯的结果。而促成这种病症的还有我们的教育工作。

战争之前的德国教育存在很多的不足之处。教育工作非常片面地只重视纯粹的“灌输知识”而很少培养“实际能力”。对于个性的培养则更加不重视，尽管这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事情，对责任感方面的要求很少，至于对意志力和判断力的培养就完全没有了。所以实际结果就是没有强悍的勇士，而只有顺从的“博学家”，在战争之前我们德国人就是被人看作和评价成这样的。人们之所以喜欢德国人就是因为他们能够很好地为人所用，只是人们没有注意到的是他们意志上的弱点。就是这个缘故因此在所有的人当中他们是最容易失去民族和祖国的人了。有一句谚语“手里拿着帽子可以通行无阻”就说明了这一切。

而恰恰就是这种社会风气才决定了这种倒霉的只允许迎合君主意愿的社交方式。这种方式要求：不许有任何反对意见，而要屈尊对陛下的所有一切都要表示赞同。而恰恰就在这一点上自由之人的尊严是最为必不可少的，总有一天这样的卑躬屈膝、唯唯诺诺，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会让君主制走向灭亡！并且只有一向对至高无上的王位感到欣慰的人才把那些可恶的阿谀奉承和溜须拍马的人，简而言之就是所有颓废堕落的人看作是正直、诚实和可信的，并把这些行为仅仅看作是和头戴王冠的人进行交往的一种方式而已！这些“最低三下四”的走狗在主人和东家面前总是非常毕恭毕敬的，对其他人则一向非常地粗暴，而最为粗暴的是当他们厚颜无耻地向其他人介绍自己是唯一“君主制王朝的人”的时候，这可真是恬不知耻，而只有那些得到了或者还没有得到封侯的小人才这样干得出来！因为这些人实际上总还曾经是君主制，特别是君主制观念的掘墓人。一个时刻准备着去捍卫某种观念的人是不会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伪君子或是一个意志不坚定阿谀奉承之人的，这也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如果维护和支持某种制度的确是很重要的话，那么这个人的心就会与这种制度息息相关，并且完全不能容忍这种制度中显露出一些弊端。当然他也不会像那些民主的“朋友们”对君主制王朝所做的那样以骗人的形式在公共场合下四处呼喊，他很可能会最严厉地警告那位戴着

王冠的陛下并试图让他自己本人去决定该怎么去做。同时他不会也不能让陛下自由地去按照他的意愿去行动，即使这样会并且必然会导致灾难，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要保护君主制度以防止君主们的破坏，而且是不惜一切地去做的。如果每个君主都重视君主制度，那么这就会是一种最糟糕的制度了，让我们想一想，其原因就是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君主才会是受人爱戴的富于智慧和理智以及品格的优秀人物。只有专门阿谀奉承和唯唯诺诺的人才会相信这些，而真正对国家有用的人对这样的代表愚蠢的人只会感到厌恶。对于他们来说只知道历史就是历史，真理就是真理，虽然这里也涉及到君主。不是这样的，因为民众很少会有幸能够得到作为一个伟人的伟大君主，即便是上天出于恶意没有预见到这最严重的失策，民众至少也应当感到满意。

所以君主制观念的价值和意义不取决于君主本人，除非是上天决定要把王冠戴在英勇的弗里德里希大帝或是明智的威廉一世的头上。这可是几百年才有那么一次而并不会时常发生的事情。不然的话君主制观念出现在君主面前的同时，君主制的意义就蕴含在其制度本身当中了。因此君主本身也深陷在周而复始的制度当中。就算是君主自己也像个制度体系当中转动的轮子一样并为这个制度负责。他自己也要顺从这个最高的目标，这样也就不再是“君主”了，谁让这个戴王冠的人自己默默地犯罪，就有谁来制止这些。要是君主制观念中没有这个意义的话，而是不计任何代价地依附在“被神化”的个人身上，那就连有明显精神病的亲王们也都无法废黜了。

现在很有必要终止这些行为，让更多的真相从最近一段时期被扭曲的事实中显露出来，至少要说明君主制的垮台并不是像那种所歪曲的可耻的观点所说的那样。现在人们又以一种幼稚的粗鲁态度来谈论“他们”的国王了，在几年前危急的日子里还把国王看成是最可耻的不中用的东西，而现在又开始把每个不愿意赞成他们那些骗人的空谈大论的人称作是可恶的德国人。而事实上他们才是在1918年的时候在红袖标面前四散奔逃、上蹿下跳、把他们的国王奉为国王、赶紧把刀枪换成手杖、带上中间派的领巾、装成温和的“市民”悄然消失的胆小鬼！这些国王的

骑士们，他们都是一下子就没了的，这还要感谢别人的行动，在革命的风暴过后他们又出现了，又能够响彻云天地高呼“国王万岁，万岁！”了，这些王冠的“仆人和顾问”又小心翼翼地冒了出来。现在他们又都在那里眷恋着那朝思暮想的安逸生活了，再也无法保持对国王的忠诚和对事业的紧迫感了，也许有一天红袖标再一次出现才会重新让这些君主制的既得利益者们魂飞魄散，就像老鼠见到猫那样！难道君主们自己对此没有一点责任，不管现在是不是他们的拥护者，人们对此都表示深切地遗憾。人们肯定会相信依靠这样的骑士只会失去，而不会赢得王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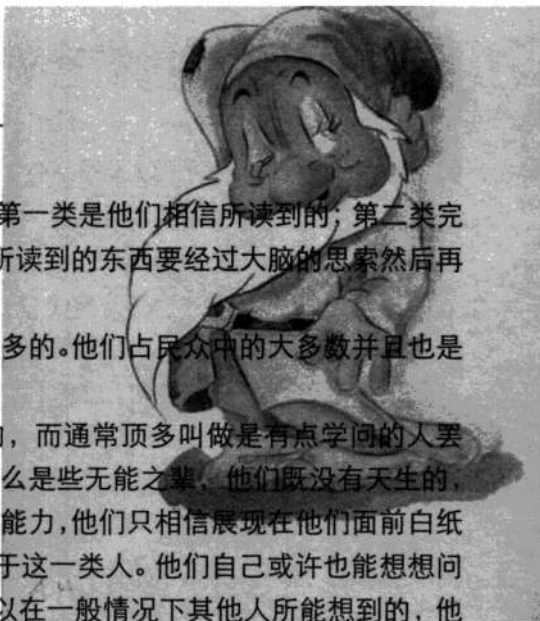
造成这种阿谀奉承的结果是我们整个教育工作的一项失误，尤其在这一点上会遭到惨痛地报应的。因为其结果会让所有的宫廷皇室都效仿这种可耻的行为表现并且逐渐损害君主制的根基。当这个大厦最后摇摇欲坠的时候，他们这些人也会随即消失的。但很自然的是：阿谀奉承和溜须拍马的人是不会为了他们的主子去送死的。君主们从来都不知道，而且基本上也学不会去知道就是这些人才是他们的不幸。

这种错误教育方式的结果还表现在对承担责任的胆怯并由此产生出缺乏对自己生活中重大问题的处理能力。

这种疾病的开端肯定大部分都发生在我们的议会里，就是在那里才培养出了地地道道的缺乏责任心的人。只可惜的是这种疾病正慢慢地进入到我们整个的生活里面，尤其最严重的是国家的生活中。人们开始处处回避责任并且因此而最喜欢事事敷衍搪塞，看起来他们每个人责任心的水平常常是降到最低程度了。

人们只注意到政府的立场观点，却没有看到公共生活中一系列真正有害的现象并且轻视这种普遍存在的在责任面前胆怯和动摇的可怕影响。

我仅从大量的例证中挑出几件事来：人们习惯乐于把新闻界也看作是国家的一种“强势”。而事实上新闻的重要作用也真的是很大的。不要完全低估了新闻的作用，其真正的意义则体现在日后的教育方面。



人们可以把读者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他们相信所读到的；第二类完全不相信所读到的；第三类是对所读到的东西要经过大脑的思索然后再进行判断。

第一类读者从数量上看是最多的。他们占民众中的大多数并且也是人群中头脑最为简单的人。

他们不能被称为是职业性的，而通常顶多叫做是有点学问的人罢了。他们要么是些无用之人，要么是些无能之辈，他们既没有天生的，也没有以后培养出来的独立思考能力，他们只相信展现在他们面前白纸黑字的东西，所有这样的人都属于这一类人。他们自己或许也能想想问题，但仅仅是由于他们懒惰，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其他人所能想到的，他们则要化很大的气力才能做得到，就连那些懒蛋也属于这一类货色。对于这样一大群人来说新闻的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他们这些人不能也不愿意对呈现在他们面前的东西进行审查，因此他们对在日常生中所遇到的问题所采取的整个立场观点表面上基本完全都是受到其他人的影响。如果这样的新闻宣传是严肃而真实的话，那会带来好处，但如果这是由那些流氓无赖和说谎的人所为，就会带来灾祸。

第二类读者在数量上明显地要少很多。他们有一部分是第一类读者当中在长期痛苦的失望以后而走向其反面的，所以只要是眼前报纸上的东西就完全什么都不再相信了。他们讨厌每一种报纸，要么什么报纸都不看，要么对其中的内容非常气愤，因为报纸上的观点与谎言以及欺骗形成一体。这些人很难和他们相处，因为他们还常常以怀疑的态度与真理作对。因此任何一种积极的努力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徒劳的。

最后，第三类读者一定是最少的，他们在精神上具有真正明智的头脑，天资和教育让他们学会了独立思考，他们试图自己对一切进行判断并且对所读到的一切再次进行一次检验和进一步观察。不能引起思索的报纸他们是不看的，所以作者也很难说服他们。新闻记者很喜欢这种持观望态度的读者。

当然对于这第三类读者来说，一种报纸所编制的谎言或许有那么一点点危险或者只不过是意味深长。在生活中他们大部分反正都已经习惯

把新闻记者基本上看成只是偶尔才说些真相的骗子。可惜的是这些杰出人物的重要性只在于他们的聪明才智，而不取决于他们的数量，这是一个不注重智慧而只注重数量的不幸年代！今天，民众的选票决定了一切，决定意义的价值取决于数量众多的读者，而首先这是一群头脑简单和容易轻信的人们。

防止民众落入品德恶劣、无知或是心怀恶意宣教者的手中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头等利益所在。因此国家有责任对教育工作进行监督，并且防止违法行为。特别必须要严密监督新闻界的一举一动，因为新闻对人们的影响最强烈和最深刻，况且还不是暂时的，而是持续性的。其难以置信的重要性就在于其有规律地和永远不断地重复着的教育作用。不论在什么地方，这个国家都不能忘记要使用一切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国家不要受到什么所谓的“新闻出版自由”的迷惑和诱导而疏忽自己的职责，忽略民众的需求以及有利于民众的作为。这个国家必须以坚定的决心来确保这种教育人民的方法并且以此为国家和民族服务。

战争之前的德国新闻界给人们展示的是些什么东西呢？难道不是一些想象出来的最令人愤慨的有害的东西吗？就在其它国家正准备慢慢地，但肯定是要遏制德国的时候，难道不正是在这段时间里给德国人民的心中里灌输了最糟糕的和平主义思想吗？难道不是新闻界在和平时期就已经让民众的头脑中引起对自己国家权益的怀疑，以便这样从一开始在选举中就限制捍卫自己权益的手段吗？难道不是德国的新闻界让我们的人民有兴趣去了解“西方民主”的胡言乱语，直到他们最后被那些欢欣鼓舞的空话所感染甚至还相信了可以把国家的未来托付给一个什么国际联盟的吗？难道新闻界没有帮着把我们的民众教唆成这样可恶的伤风败俗的样子吗？难道不是新闻界把伦理道德可笑地弄成了陈腐而庸俗的，最后让我们的民众“时髦”起来的吗？难道不是新闻界一直都在不断地破坏着国家尊严的根基，直到最后一击把这个国家击垮的吗？难道新闻界从来就没有通过各种手段反对国家所应该赋予的意志，就没有通过不断地批判来贬低军队、破坏普遍兵役义务、要求拒绝

军事方面的信贷业务等等，直到最后再也无法取得胜利的吗？所谓自由主义的新闻工作就是在葬送德意志民族和德意志帝国。对于马克思主义那些欺骗性的报刊人们完全可以置之不理，它们把造谣当成是生活所必需的一件事，就像猫要吃老鼠一样，它们唯一的任务就是要把国家和民族搞垮，并且等待时机成熟让民众成为国际资本和犹太主人的奴隶。

但是国家针对这种毒害民众的行为采取了什么措施吗？没有，完全没有！只不过是几张可笑的公告，有几次对这些卑鄙下流行径严厉的惩处罢了，也不过如此而已。但是人们还是希望通过恭维谄媚、通过认识新闻界的“价值所在”、“意义”和“教育使命”以及更多类似的蠢话来取悦迎合这种毒害人民的行为，而对此犹太人则已经微笑着表示接受并狡黠地报以感激。

对于这种可耻的国家失策的原因与其说是没有认识到危险的存在，还不如说是由于众所周知的胆怯心情和由此产生的对所有决定和措施的动摇态度。没有人有勇气采取极其有力的措施，反而到处招摇撞骗；不去下定决心，结果却打草惊蛇，不但没有能够维持原状，相反却使得应该受到打击的组织机构的力量日益壮大起来。

当时德国政府针对这种慢慢腐蚀民众的新闻界，主要还是针对来自犹太人的报道的防御斗争没有方针路线，没有坚定的决心，尤其是没有明确的目标。对此议会内阁完全失策，就像对这场斗争意义的评价以及在选举中方法和计划的确定的失策一样。没有计划却还要四处给人看病，有时如果没有挨蛇咬的话，就把新闻报道这条毒蛇先关上他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好像这样的蛇笼倒是可以让人安心了。

当然，这一方面是犹太人无休止的狡猾策略的结果，而另一方面也确实确实是议会内阁的无知和幼稚。犹太人非常聪明地让他们整个新闻界都发动同样的攻击。确实不然，他们一部分人是在为另一部分做掩护。当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报纸采取极其庸俗的形式和人类神圣不可侵犯的所有一切做斗争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和政府却以无耻的方式攻击和唆使大部分民众相互进行攻击，对资产阶级民主的犹太报刊表示理解，装

作十分客观的样子十分仔细地回避所有犀利的字眼，他们清楚地知道所有笨蛋是靠外表来判断出来的，从来就不需要什么本领，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一种东西的价值所在是靠外观来衡量的，而不是其内容，这就是人类的弱点，幸亏他自己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对于这些人来说《法兰克福报》是所有诚实正直的完美化身。因为它从来没有使用过粗俗的词句，拒绝登载肉体上暴力的内容，总是呼吁使用“精神”武器来进行战斗，但很奇怪的是恰恰就是这种武器却是最为愚昧的人才常常惦记的东西。而这正是我们那脱离了人类自然本性的半截子教育的一个结果，它只给人们灌输某些无法让他们理解的知识，在这方面仅靠勤奋的努力和美好的愿望是没有用的，重要的是理解能力，而且还要是天赋聪慧般的理解能力。最终能够对事物进行理解源自于人类的本能，就像这种自以为是的半截子教育所讲的那样，人类从来就不会陷入迷茫，也就是相信人类终将会慢慢地成为大自然的主人，而且还要必须理解和掌握控制自然的基本必要性，正如人类为了自我生存也要遵循上天永远战斗的法则那样。在这个行星围绕着太阳，月亮吸引着行星的世界里力量一向就是弱者的主宰并且迫使或者摧毁弱者使其成为温顺的奴仆，而对人类来说就不能够当作是行之有效的特别法则。即使是对于人类永恒的准则最终是智慧占统治地位，人类试图掌握知识以摆脱困扰，但人类却从未能够做到。

而犹太人写的那些所谓聪明的报道才正好迎合了我们那些自以为是的家伙。为此他们创办了《法兰克福报》和《柏林日报》，确定其论调并借题发挥。尽管表面上显然是小心翼翼地回避粗鲁表达的方式，但还是把毒素灌输给了读者们。靠着优美论调的废话和空话去麻痹读者，使他们相信好像真正的科学或者纯粹的道德才是行为动机，而实际上这只不过完全是通过这种手段从对手的手中窃取新闻武器的狡猾伎俩罢了。因为一些新闻报道是规规矩矩的，同时正如人们对欺骗人民和毒害人民的罪恶行径认为是不受惩罚的那样，所有的傻瓜则更愿意相信另一些不会导致损害新闻自由严重后果的、只不过有些轻微弊病的新闻报

道。所以人们害怕面对这些强盗行径，害怕这种情况下有“正当”新闻的出现，即使这种恐惧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只要有人试图去反对此类无耻报刊中的一种，那么这个党派的其它所有报刊就会立刻抓住时机，但绝不是去赞赏这种斗争方式，上帝呀，而是只去保护所涉及到的新闻自由和公众意志自由。对此，就连最为强势的人都会软弱下来，而这些都来自“正当”报刊的叫嚣。

病毒就是这样轻易地进入了我们民族的血液当中并且还在吞噬着我们的身体，国家却没有力量来控制这样的病症。而对此所采取可笑的不求彻底的办法就已经表现出了威胁帝国衰落的迹象。因为如果一个国家不下决心使用所有武器来保护自己的话实际上就是投降。每一种动摇不定的做法都是国家内部衰落的明显标志，而其结果早晚就必将和必然导致外部的崩溃。

我认为今天的一代人会受到正确的引导去轻易地控制这种危险的发展。这一代人有着各种各样不会惊慌失措，反而会增强自制的经历。如果今后着手控制其报业老巢，结束报纸上胡说八道的言论，同时让国家掌握这种宣教手段，而不是让它落到异族和敌人的手中，那犹太人肯定还会在他们的报刊上大肆叫喊的。所以我认为和我们的父辈相比首先这样对我们年轻人的影响要小得多。一发 30 公分炮弹的呼啸总会胜过上千份犹太报纸的喧闹，那么就让它呼啸而过吧！

战争前德国在民族存亡重大问题的宣传导向方面所表现出的动摇和软弱还有许多：多年来民众在政治、伦理道德方面受到感染的同时在身体方面也同样受到可怕的毒害。大城市里梅毒在不断地蔓延，同时肺结核也基本上还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制造死亡。

尽管以上两种情况给民众造成了可怕的后果，但人们对此却没有做出坚决的反击。

特别可以和梅毒相提并论的就只能是被人们称为彻底投降的国家领导人的行径了。疾病的严格防治要比实际发生的范围要大得多。找到靠不住的应对措施及其商业上的应用对于疾病来说也不会有太多的帮

助。就算这种方法可以根本解决问题，而不只是消除表面现象，但是根本原因首先却是我们那可爱的出卖灵魂的行为，虽然其结果也不会造成可怕的疾病，也不会给民众造成深重的灾难，但却足以造成道德上的伤害，并导致蜕变堕落，肯定让民众慢慢地走向毁灭。这种对我们心灵犹太化的感召和本能上的拜金主义早晚会毁掉我们整个的下一代，因为替代天性健壮的孩子只会是更多可恶的金钱上唯利是图的行为。这也越来越多地成为了我们婚姻的基础和前提，而爱情则到别处游荡去了。

当然人们可以在某一段时间里去嘲笑大自然，只是大自然的报复并不是没有到来，只不过是在晚些时候才会出现罢了，或者说：人们常常很晚才会认识到这一点。

对大自然不断地轻视会给我们的婚姻带来多么可怕的后果，摸摸自己的良心也许就知道了。而由其所衍生出的结果一方面是来自社会上的束缚，另一方面则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这就导致了一个让我们的身体完全衰弱的结果，另一个就是对我们血液的毒害，因为每个开商店的犹太人都适合，也都期待着让他们的子孙后代来充斥到我们的社会中。而这两种情况所造成的后就是全面的退化。

现在我们的民众正努力地走向这样两条道路，而结果都会是同样的下场。

人们试图用冷漠来回避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就好像这样的事情本来就不可能发生似地。不，在大城市里人们的爱情生活中越来越多的卖淫行为和由此陷入梅毒疾病之中的事实是无法简单地去进行否定的，是确实存在的。这种大众疾病显而易见的结果一方面可以在精神病院里看到，可惜另一方面却表现在我们的孩子们身上。特别是对我们性生活不断加重的污染所造成的可悲的畸形结果，很明显孩子们的疾病都是由于父母性生活的恶习所引起的。要想容忍这些不愉快的，但又很可怕的事实有很多种办法：一种就是完全不想，或者确切地说完全视而不见，当

然这是最简单和最轻易的“态度”。另一种就是躲在不仅可笑而且还是骗人的羞涩的道袍里面，只讲这只是一种深重的罪孽，并在每个能遇到的罪人面前特别要表达出其内心最深处的愤慨，为的是面对这种邪恶的疾病闭上他那虔诚般厌恶的眼睛，祈求上帝希望如果有可能的话在他死后对整个罪孽降下灾难，以便为可耻的人类再次重新塑造出一个可信奉的榜样。第三种终于可以看到兴许是这种疾病所带来的可怕的结果，那就是很无奈地认为没有什么可以阻挡这样的危险发生，那就只得让其任意发展了。

当然，这些都是简单和容易的做法，只是不可忘记的是，如此的散漫懒惰将会导致一个国家的灭亡。那种别的国家的人民也并不比我们好多少的借口当然也毕竟能够通过这样的方法在感情方面从自己的没落看到别人的不幸，好让许多人减轻自己的痛苦。但问题却是哪个民族是第一个和唯一的一个能够自己控制这种瘟疫并且又是哪个国家因此而毁灭的呢。对此最后会有答案的。这也是对一个民族价值的试金石，一个民族要是经不住考验就会死亡给较为健壮的或者更加坚强的和具有抵抗力的民族让出空间。毕竟这个问题首先涉及到我们的下一代，归结到父辈罪孽的报应直至到第十代的血统和秉性中仍有犯罪痕迹的可怕理由。

这种违背血统和秉性的罪孽就是这个世界的原罪，也是人类屈服的结果。

可战争前德国对这样的问题所持的立场真的是非常的可悲。为了制止这种对我们大城市中青少年的污染有什么行动吗？是什么纠缠于疾病流行和我们爱情生活中的拜金主义之间？是什么在和这种由此而产生的人们身体上的梅毒疾病在做斗争？通过所发生的事情就可以轻易地给出答案了。

对这个问题人们不要掉以轻心，要必须懂得解决这个问题将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幸福或不幸，是的，倘若不是必然，那可能对我们民族的整

个未来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认识到这一点对坚定的手段和措施是具有责任的。全面考虑到未来会使人相信关注整个国家的岌岌可危让每个人从内心里懂得这场斗争的意义。如果不让每个人认识到紧迫性和必要性的话，人们真的会把重大的、有时是难以承受责任的重担当成一般的行为来执行。因为大规模的宣传教育也属于清除所有误导作用的日常问题中的一项内容。

对于所有明显无法实现的要求或任务的情况，就必须把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该问题的解决办法好像真地会关系到人们的生存或死亡上来。只有这样才会让一个民族愿意并且能够真正去做出重大的贡献和努力。

只要一个人想要达到目的，那么这个原则就适用于他。无论是分阶段去实现，还是为完成某一项特定的任务而付出了全部的努力，但只要他这样去做，就会完成任务，并且还会重新划分出新目标的实现阶段。谁要是斗争过程不进行阶段划分，然后按计划全力以赴地分阶段去进行实施，是不会取得成功的，那只会半途而废或偏离方向。这种致力于实现目标的做法是一种手段并要竭尽全力一步一步地去完成。

那么人类发展进程中如此艰难的阶段性战斗所急需的首要条件就是要赢得对广大民众中恰恰是现在要获得的，或者更确切地说要努力争取的那部分人的领导权。树立起唯一的、可以引起人们注意的、能够征服一切的目标。大部分民众反正是无法看清整个过程的，也不知疲乏，并且从不怀疑所要完成的任务。他们只能看到目标的某一个部分和整个过程的某一个阶段，就像一个徒步旅行的人，他也许知道和了解他旅行的目的地，当他把漫漫长路一段一段地划分好，并且一步一步地走完以后，他会轻易地完成这次旅行，仿佛他早已经就看到了目标，他不气馁，只是向前。

所以，人们必须要利用所有的宣传工具把与梅毒的战斗当成是一项国家的重任，而不只是一项任务。为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利用所有辅助手段广泛地让人们牢记梅毒的危害是最可怕的灾难，直到整个国家都相

信解决这个问题的至关重要性是关系到国家未来和民族衰亡。

只有经过这种必要的几年的准备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并且因此而唤起整个民族的决心去采取艰难的具有牺牲精神的措施，而不会有什么也许不被人所理解或者突然出于民众的意愿而所置之不理的危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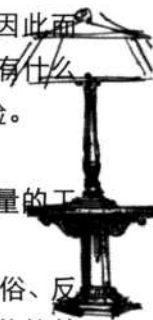
因为要想真的消灭这种疾病就要付出极大的牺牲和投入大量的工作。

针对梅毒的斗争要求我们要反对卖淫、反对偏见、反对旧习俗、反对现有的妄想、反对空泛的观点，尤其要反对的是某些领域中虚伪的羞涩。

而要反对这一切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只能是依靠道德法则来让我们下一代有可能早点结婚。因为只要人们愿意就可以搪塞人类那些不光彩的事情，所以晚婚本身就需要强制性地保留一个适合于人们愿意简单地看作是上帝“模样”的人类本性非常糟糕的地方。

卖淫现象是人类的耻辱，仅仅依靠道德说教和虔诚的愿望之类的东西是无法克服的，而要限制并最终消灭这种现象则需要大量的准备工作做为前提条件。那么首先就是要是符合人类天性的早婚成为可能，尤其是对于男人，毕竟女人在此方面总之还只是附属的部分。

可现在有些人真的已经变得无法让人理解，也许是因为常常听到母亲和那些所谓的“闺蜜好友们”谈论什么要感谢上帝给她的孩子找到一个“使她成熟”的男人之类的话，这是多么的糊涂。而与此相反常常会稍微缺少那么一点东西，这位可怜的姑娘有幸会找到一个像西格弗里德那样不成熟的男人，并且生下的孩子就是这段美好婚姻看得见的结果。要是我们想一想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可以大规模地限制生育，阻止大自然进行优胜劣汰的选择，那么我们每个人也就必然得到些低劣的本性，因此就会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还有这种婚姻制度，它应该有哪些用途呢？它究竟和卖淫本身有什么不同之处吗？对下一代所应履行的责任就起



不到什么作用吗？也许人们还不知道在天赋人权和自然法则的保护下这种罪恶愚蠢的行为会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带来什么样的不幸？这会使得文明民族退化并渐渐衰亡。

而婚姻并不是目的本身，是要服务于一个更加伟大的目标，那就是要繁殖和维护人类的物种和血统。只有这样才是婚姻的意义和任务。

婚姻的正确性只有根据其完成任务形式这样的前提条件来进行评价。所以早婚是正确的，只有这样才能赋予新婚以创造健康和具有抵抗力的下一代的力量。要想使其成为可能当然需要一系列的社会条件，没有这些早婚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因此没有考虑到社会方面决定性的措施就连这样小的问题都无法开始进行解决。这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人们可以在一段时间里就会明白，因为所谓“社会公益性的”共和国光是在解决住房问题上的无能就妨碍了无数婚姻的建立并且这样也就助长了卖淫行为。

我们那种很少考虑家庭和生活问题的工资分配形式的不合理也是不可能早婚的一个因素。

只有社会环境的根本改变才会使现在只是非常泛泛的早婚成为可能，也才能开始抵抗卖淫活动。这才是解决问题的首要条件。

其次就是教育工作要彻底清除人们完全漠不关心的一系列弊端。特别要让思想教育方面和身体训练方面的课程有所均衡。现在的中学简直就是对希腊体育的嘲笑。在教育方面人们完全忘记了健康的思想只能够长期地存在于健康的身体里。特别是当人们关心到广大民众的时候这句话绝对有效，当然也有例外。

在战争前的德国有一个时期人们对这个事实不再关心了。人们简直就是损害自己的身体并且错误地认为单单“精神”方面的教导就是我们伟大民族的有力保障。这种错误所导致的报应来得比人们想象的要快。由于饥饿和长期的营养不良，一些地方如德国中部、萨克森州和鲁尔地区的人民羸弱不堪，而布尔什维克的浪潮再也找不到比那里更容易进行侵袭的地方了，这并不是偶然的。在这些地方所谓的知识分子几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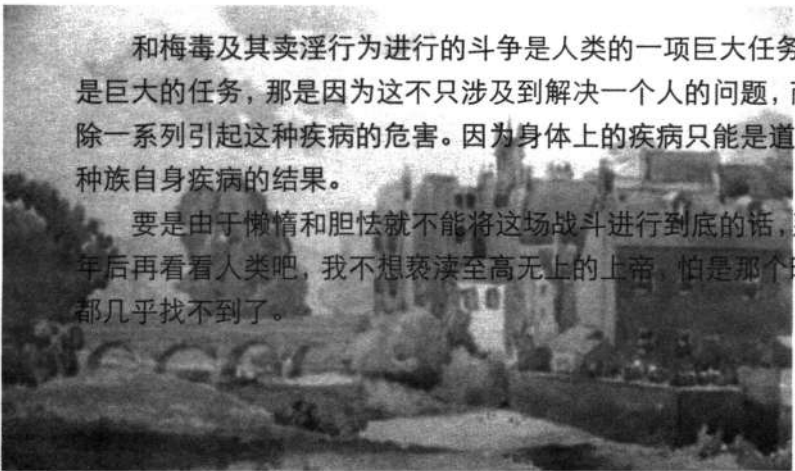
对犹太瘟疫不再进行有力的抗击，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知识分子自己的身体也完全垮掉了，与其说是由于饥荒倒不如说是因为教育。在不靠精神而靠拳头说话的年代里，我们国家的上层人士对教育工作的特殊态度让这些知识分子无能为力，他们也只好独善其身，更不用说是有所作为了。个人胆怯的主要原因很少取决于身体的虚弱。

过多地强调纯粹思想方面的教育而忽略身体方面的训练促使许多年轻人过早地产生性幻觉。一个受过体育锻炼的年轻人很少会像一个完全用精神食粮所灌输的书呆子那样去满足什么感性上的需求，而会去注重理性的教育。此外还要注意的是女人对一个健康的年轻男子和一个过早地就身体衰弱的病秧子所寄予的期待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整个教育工作要着眼于让孩子们业余时间用于锻炼身体。他们不适合在大街上和电影院里无所事事地闲逛，而要在日常课程结束后去锻炼身体，以便在日后的生活中不至于感到身体虚弱。要为此打开局面并要贯彻执行，还要加以引导和指引，这才是对年轻人进行教育的任务，而不仅仅是灌输什么所谓的知识。他们应该摒弃那种锻炼身体好像是个人自己事情的观念。贻害子孙后代并且因此而危害民族的事情是绝不应该做的。

在锻炼身体的同时还要进行针对精神毒害的斗争。我们整个的公众生活好像就是性幻想和性诱惑的温室。人们只要注意看看电影院、剧场和戏院的节目单恐怕就无法否认这些都不是正当的内容，尤其不适合年轻人。为了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商店橱窗里的陈列品和广告柱上的广告内容都制作粗俗。这一切都必然会对年轻人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这对于每一个能够设身处地着想的人来说都是可以理解的。年轻人是完全无法理解这种淫秽环境所导致的幻想和刺激的。这种教育方式对我们年轻人所产生的结果是人们不可以持乐观的态度去进行研究的。这样使年轻人早熟却又未老先衰。有时从法庭公开透露出的事件则反映出我们那些14和15岁大小的孩子们可怕的精神生活。在这个年龄阶段里就已经成了梅毒的牺牲品难道不让人感到震惊吗？看到有些身体虚弱精神堕落

的年轻人靠大城市里的妓女走进了婚姻难道不是一种痛苦吗？不，要想指责这种卖淫现象，首先就要帮助消灭其存在的精神基础。必须要清除我们大城市“文化”中精神污染的垃圾，并且要毫不留情地、决不动摇地大声疾呼和高声指责，要充分地放手去这样做。如果我们不把年轻人从当今这种环境的泥潭中拉出来，那他们就会沉没其中。谁要是不愿意关注，那就是在支持这些现象，并因此而成为将来慢慢让我们年轻的一代去卖淫的帮凶。纯化我们的文化要涉及到几乎所有的领域。戏剧、艺术、文学、电影、新闻、海报和橱窗中所有堕落的东西都要清理并且使其为国家道德和精神文化所服务。公共生活要远离现代色情那令人窒息的香气，就像远离不是男子汉般的拘谨和虚伪一样。而这一切目的和方法都要以注重维护民众身体和精神的健康为宗旨。个人自由的权力要让位于维护民族的责任。只有这些措施的贯彻执行才能够使针对疾病的医疗处理朝着成功的方向进行下去。对此不能心慈手软，而必须要做出重大和深刻的决定。让无法治愈的病人对其他健康人的影响只能是半途而废。这倒符合一种为了不让一个人不幸而不惜毁灭上百人的幸福的人类特征。要求有缺陷的人不能生育有缺陷的下一代是最为理智的，也意味着在履行人道行为。这样可以让上百万人免除了不应得的痛苦，而结果却带来了与日俱增的健康。这种果敢精神也给性病的蔓延筑起了一道防护堤。如果有必要应该毫不留情地将无法治愈的病人施行隔离，这对遭遇不幸的人兴许是野蛮的办法，但却造福当代，赐福后代。一个世纪暂时的疼痛会解除千百年的痛苦。



和梅毒及其卖淫行为进行的斗争是人类的一项巨大任务，之所以说是巨大的任务，那是因为这不只涉及到解决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为了消除一系列引起这种疾病的危害。因为身体上的疾病只能是道德、社会和种族自身疾病的结果。

要是由于懒惰和胆怯就不能将这场战斗进行到底的话，那就等500年后再看看人类吧，我不想亵渎至高无上的上帝，怕是那个时候连圣像都几乎找不到了。

过去在德国人们是怎样试图去摆脱这种疾病的呢？通过冷静的思索得出了一个真正使人伤心的答案。即使人们完全没有考虑到后果，那么在政府方面对这种疾病所造成的可怕灾难是有所了解的，可是在与疾病斗争的过程中人们完全放弃去进行有力的变革，而宁愿采取怯懦的办法。人们有病乱投医并且还因果不分。人们让每个妓女去进行身体检查，尽量去照管她们，确诊后还把她们安置在军队医院里，在表面上得到痊愈后又从那里像换了个人似的出院了。

当然，人们还引用了一条关于不完全健康或没有痊愈的人避免进行性行为，否则就执行予以处罚的“保护条例”。这项措施本身的确是正确的，只是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则完全没有起到作用。首先在大多数情况下女人在遭遇不幸的时候会拒绝对伤害其健康的可耻行为去当证人，这与其说是我们的倒不如说是出于她们的教养，另外尴尬的情况就是她们不愿意牵扯到法院。正是由于她们很少通过法律来解决问题，所以她们常常总是忍气吞声，而她们遭受缺乏关爱的蔑视则更加糟糕，好像这些都是男人造成的。要是这种疾病是由她们自己的丈夫带给她们的，想一想她们的处境吧！她应该去告发吗？或者她应该做什么呢？而对于男人来说情况则有所不同，他们常常只是在饮酒后才会接触到这种疾病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少能够去判断其“美人”的好坏，而这一点就连带病的妓女都很清楚，因此在这种极好的情况下反而会促使她去着力诱引男人了。而结果就是以后感到愧疚和勤于思索的人也无法想起他那可怜的幸福人了，而这种事情在柏林和慕尼黑这样的城市里并不会令人感到惊奇。另外还会有其它地方来的人，他们则全然被大城市的魅力所吸引而变得不知所措了。

结果就是：谁能知道他是有病还是健康的呢？一个好像是痊愈的人又再次得病而无法治愈，而他自己却对此一无所知，这样的情况难道不是很多吗？所以通过法律来处罚这种罪恶的传染行为的保护条例实际上的作用为零。而对妓女的照管，即使是最后治愈了的在今天看来也还是不确定的和值得怀疑的。有一点是肯定的：尽管用了各种办法，但这

种疾病还在蔓延。这就充分说明了措施本身的不得力。

毕竟所发生的这一切并不可笑。人们精神上的淫乱意念得不到控制，那就无法阻止其淫乱的行为。

要是研究一下这种瘟疫扩散的统计资料，比较一下近百年来的增长情况，思考一下其以后的发展状况，如果他不感到不寒而栗的话，那想必他就蠢得像头驴，谁会对这一切掉以轻心！过去德国所表现出可怕的软弱和动摇的立场，足以视为是明显的民族衰亡的征兆。如果连为自己健康而战的力量都不存在，那在这个世界上也就失去了为生存而战的权力。这种力量属于强有力的“整个民众”，而不是软弱的“一小撮”。

德意志帝国衰亡的明显表现还体现在文化程度的普遍缓慢的下降，这里文化的意思就是今天所说的文明这个词。与此相反则表现为实际意义上的精神水平和生活水平。

早在世纪末之后，我们的艺术中就开始被可以说是完全外来的和陌生的东西所入侵。开始有时候还认为是兴趣爱好的差别，因为这种情形更多地以为是艺术家的无拘无束，我们的下一代至少会还赞赏其有某些历史价值，完全不会认为是艺术家的，而是精神堕落甚至是疯狂的结果。当然以后在其中就明显从艺术上表现出政治方面的衰落。

布尔什维克主义（颓废）的艺术完全就是一种唯一可以表达布尔什维克式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思想的艺术形式。

谁要是感到奇怪，那只需看看那些有幸成为布尔什维克国家的艺术，你会惊奇地发现，那些自上个世纪末我们认为精神错乱和思想颓废的人所创造的，并归结为立体派和达达派的畸形病态的东西，在他们那里竟公然成为了大家所赞赏的艺术。即使在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建立的短暂时期，这种表现就已经显而易见了。人们可以看到那些官方的海报、报纸上的宣传画等等，不仅在政治上，而且还在艺术上带有怎样的衰亡特征。

大概在 60 年前，还不像今天一样在这么大程度上显现出政治方面

的衰落，在艺术方面也不像自 1900 年以来那些未来派和立体派的作品所开始表现的那样多。60 年前所谓达达派“作品”的展出简直就是不可能的，连举办人也会给送到疯人院去的，而今天甚至可以作为艺术协会的代表。这种疾病之所以在当时没有出现，一方面是因为公众言论对此无法容忍，另一方面国家也没有袖手旁观。因为这是政府防止民众精神错乱的事情。这样事态的发展必须在某一天结束，也就是在艺术形式真正能适合普遍观点、人类发生重大转变的那一天，要是人类的大脑开始萎缩，其结果恐怕是无法想象的。

出于这个原因，只要人们回想起最近 25 年来我们文化生活的变化，就会吃惊地发现我们是怎样地退化和迟钝了。到处都能够碰到开始引发疾病蔓延的诱因，而这早晚会展灭我们的文明。在这些原因中我们会认识到这个慢慢腐败世界的崩溃表现。看看这些连这种疾病都无法控制的人们吧！像这样的疾病人们几乎可以在德国艺术文化的各个领域中得到。所有的一切都已经超过了最大限度，并快速走向衰落。戏剧方面很明显地下落得更快，作为文化因素当时也许都已经给剔除出去了，至少还有宫廷剧院是反对文化中的淫乱现象的。这其中也能看到一些值得称赞的事例，那就是还有一些适合于民众但却禁止观看的戏剧演出。不让青少年去大多数的所谓“艺术场所”是国家一种可悲的现象。还不知羞耻地公开用指示牌警告“青少年禁止入内！”人们采取这样谨慎的办法首先应该是为了教育青少年，而不是让自命不凡的成年人去尽情享受。历史上伟大的戏剧家们有权对造成这种状况的起因进行责备吗？席勒会是多么地愤怒，歌德会是多么地气愤！

当然与德国新诗艺术的精英们相比，席勒、歌德或是莎士比亚又算是什么呢！他们无非是些老朽的、过时的和被遗忘的，不，应该是被抛弃的代表。因为他们是时代的代表：一个自己不炮制污秽作品的时代，这样会玷污过去真正的伟大。他们是人们关注那个时代的代表。一个时代的作品和当时的人越是下流和卑鄙，就越憎恨以往伟大高贵和尊严的见证人。他们更愿意把人们对过去的记忆完全抹掉，并通过这种较为可能进行消除的办法把自己拙劣的东西也伪装成“艺术”。因此越是粗略

和蹩脚的制度，就越想要清除过去的痕迹，同时任何一项人类真正有价值的创新也无所谓非要和前辈的成就有什么联系，而常常要尽力去使其发挥作用。这种创新不必担心对过去的淡忘，因为这也是人类文化宝库中一个有价值的贡献，而正是由于得到极大的赞扬才对过去的成就有所怀念，为的是确保新的贡献完全得到当代的理解。只是谁要是不能给这个世界带来有价值的东西，但好像试图要给上帝做点什么的话，那他就会憎恨已经存在的一切并想要否定或完全消灭这一切。

这绝不只涉及到一般文化领域的现象，而且还涉及到政治。新的革命运动越是讨厌旧有的形式，其本身也就越低劣。由此可以看出人们对那些使自己拙劣的东西而显得声名显赫所导致对过去的优秀作品产生盲目憎恨的现象是怎样地忧虑。比如只要对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历史记忆不消失，那么弗里德里希·爱伯特就只能在一定条件下才会得到世人的瞩目。这位无忧宫的主人和当时不莱梅的酒馆老板相比就像太阳和月亮，而只有当太阳的光芒黯淡了，月亮才能闪光。因此可以把人类的这种仇视行为理解为所有新月都敌视恒星一样。而这样的小人在政治活动中通常在命运暂时让他们掌握了统治权力时不仅要毫不遗余力地去玷污和丑化过去，而且还要使用各种手段不容许有一点点的批评。比如德意志新帝国的共和国保护法就是如此。

无论是一种新的思想、理论、新的世界观或者是政治的以及经济的运动要想否定整个过去，想要把过去弄成是罪恶的和毫无价值的，那么人们就得要非常小心谨慎并且还要表示怀疑。大多数情况下形成这种憎恨的原因要么只是自卑的表现，要么本身就是一个恶劣的意图。一个真正造福于人类的创新总是并且永远都是在前人未完成的良好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运用已经存在的知识不应该有什么惭愧的。难道整个人类文明甚至是人类自身不都是一个经过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添砖加瓦长期发展的结果。变革的意义和目的并不是要摧毁整个文明大厦，而只是要清除掉糟糕和不相称的部分，然后在所清除的地方再继续进行修建。

只有这样才能够谈得上和可以说是人类的进步，否则世界将永远无法从混乱中得以解脱。因此任何对以往正当性进行否认的做法都可以视



为对过去成就的破坏。

我们的整个文明在战争前最糟糕的状况并不是艺术家和一般创造力的无能，而是出于要玷污和抹杀伟大过去记忆的仇视。几乎在所有艺术领域，特别是自上个世纪末以来在戏剧和文学方面，德国就很少创作出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而更多地去贬低过去最辉煌的年代，把它说成是无用和腐朽的，就好像那是最让人感到羞耻的时代而要完全消除掉一样。而且还力图不让现在的人看到过去，那就很明显和很清楚地说明这是出于那些信仰未来信徒的险恶用意。对此人们还应该认识到这并不是关于什么新的、或是错误的文化方面的见解，而完全是关于对文明基础的破坏过程，是关于对健康艺术情感而变得痴迷，是关于带有政治色彩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思想传播。如果伯里克利时代是通过帕特农神庙来得以体现的话，那么现代布尔什维克主义就只有依靠立体画派的假面具了。

与此相关还必须再次指出的就是众所周知的我们当中部分人反对文明耻辱的胆怯，我们的教育工作和所采取的立场要对此负责。由于非常害怕布尔什维克艺术信徒们对每个不想了解这种伟大创作的人进行最猛烈的攻击并指责他们为守旧的庸人的叫喊，因此而真地放弃所有反抗并且就如同所发生的那样去忍受不可避免的事情。人们真的害怕这些蠢货和骗子反倒认为自己没有理解能力，就好像无法理解这些精神变态或是狡猾骗子的作品是一种耻辱一样。当然这些文化方面的年轻人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让他们这些胡扯荒唐的东西成为强有力的东西，他们会把这些难以理解的和明显是荒诞的东西说成是所谓人类令人惊叹的内心活动，用如此简单的办法就让大部分人一开始就接受了这种表达方式。因为如果这真是一个人的内心活动的话，那是完全不用去怀疑的，但真正值得怀疑的是能否允许向我们健康的世界吹捧这些神经病人或者是罪犯的幻想。一个傻子和一个呆子的作品也是内心活动的结果，而天才的艺术家自己和一个小丑的作品却是不一样的。

同时，还更应该仔细探究一下我们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可怜的胆怯

表现，针对我们民众健康心灵进行毒害的行为他们避免采取有力的抵抗，并且还任凭人们去容忍这些荒唐无理的东西。为了不被当作是不懂艺术，人们容忍对艺术的讥笑，为的是最后对此真地去进行毫无把握的好与坏的评判。总地说来这是一个时代变得糟糕的迹象。

值得思索的还有以下现象：在 19 世纪我们的大城市就开始逐渐失去文化场所的特色而退化为纯粹的人口聚集区。我们今天大城市里的无产阶级和他们所生活的地方只有少许的亲密关系就是因为他们实际上只把这里当作是一个人偶尔停留的地方，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了。这一方面是和由于社会环境的限制时常变换居住地点有关，使得人们无暇和所居住的城市产生亲密的联系，另一方面则要从我们城市中普遍的文化生活的匮乏和简陋中去找原因。

还在解放战争期间，德国的城市不仅数量少，而且规模也不大。少数的几个真正意义的大城市也都是首府城市，还具有一定的文化上的重要性，并且大多数还都是某一位艺术家的象征。一些人口超过五万人居住的地方和今天相同人口的城市一样具有科学和文化上的重要价值。比如像今天有六万人口的慕尼黑就已经开始成为德国第一流的文化中心之一了，而今天几乎每一个工业区都超过了这个人口数量，就算没有几倍的数量，但有的地方本身的实际意义也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只是纯粹的人口聚集的地方，没有什么别的特殊的。这种毫无意义的地方怎么能产生出特有的亲密联系倒真是一个谜了。没有人会对一个一无是处的城市有所牵挂，相比之下其它没有个性的，所有艺术的或看上去类似的东西都没有的城市也是如此。

而不足之处还在于，大城市在实际人口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真正的艺术作品却十分的贫乏。这些作品看起来平淡无奇，而且无论是在大城市，还是在贫困的工业区都总是以一种面孔出现。最近一个时期对大城市文化内容的补充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所有的大城市是靠过去的声望和财富来维持的。要是把慕尼黑的路德维希一世所完成的全部作品都拿走的话，那么人们就会惊奇地发现，自那个时候起知名艺术家的作品是少得多么的可怜。柏林和许多其它的大城市也是如此。

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不管怎么说我们今天的大城市都没有可以作为一个时代标志的、体现整个城市风貌的纪念碑。而在古代的每一个城市几乎都有特别值得骄傲的纪念碑。古代城市的特点并不体现在私人建筑方面，而一般是由那些不是为了只顾眼前而是为了永远的纪念碑来体现的，因为这不是在炫耀某个人的财富，而是应该要体现出城市的伟大和意义。于是就产生出了兴许适合每个居民与其城市以某种有时连我们自己在今天都还几乎无法理解的方式连接起来的纪念碑。因为在我们眼前所展示的并不是那些寒酸的住房，而是整个城市辉煌的建筑。相比之下，住房实际上已经降为并不重要的次要地位了。

要是把古代华丽的建筑和同时代的民房进行比较的话，那才会懂得公共建筑所赋予的首要地位这一原则的巨大感染力和威慑力。我们今天在古代世界的废墟和遗址中所敬慕的少许依然还能伫立的巨型雕塑并不是什么商业大厦，而是庙宇和公共建筑，也就是这些公共建筑主人的杰作。即使是罗马帝国晚期的辉煌建筑也并不是以市民的别墅和宫殿为主，而是神庙、公共浴场、运动场、竞技场、高架水管桥、大教堂等等的公共和民用设施。

甚至在日耳曼的中世纪时代，在艺术观点上也同样秉承着这种相同的主导原则。在古代雅典卫城或者帕特农神庙中所要表达出的精神，现在则通过哥特式的大教堂得以体现出来。可这些巨大的雄伟建筑所呈现的并不是中世纪城市建筑骨架结构、木结构或者砖结构的集合体，至今仍然是标志性的建筑，而除了这些同时影响城市特点和形象的居民区也在扩大。大教堂、市政厅和钢架谷物市场以及碉堡都是最终能够适合反映古代时期建筑风格的显著标志。

而今天的城市和私人建筑状况是多么的悲惨！要是罗马的灾难降临到柏林头上，那我们的后代就真的能够满足于几个犹太人的商店和几个旅馆作为最伟大的建筑作品来反映我们时代的文化了。要是把帝国时代柏林的建筑与当时的财政和商业进行比较的话，人们会发现那是多么的



不称。

光是用在公共建筑方面的款项常常就十分荒唐和少得可怜。所以就不会造出什么传世之作，而大部分只是满足于眼前的需要。同时完全没有什么深思熟虑。当时的柏林宫在建造的时候是别有用途的，而今天却被当作了图书馆。宁愿建造一艘价值六个亿的战列舰，也不同意那怕是只用一半的钱去建造显示帝国华丽永恒的帝国议会大厦。当涉及到内部装饰问题时则反对用石材而命令用石膏来涂墙，这一回议员们说的倒真的格外地有理，像这样石膏脑袋一样的笨蛋怎么会懂得什么叫真材实料呢。

所以我们现在的城市缺少标志性建筑，因而在你们所在的城市里看不到标志性的建筑也就不足为奇了。当今大城市居民这种对其所居住城市命运完全不关心必然会引起建筑方面的凋敝。

这也是我们文明水平日益下降和帝国走向崩溃的普遍表现，对此时间不是起决定作用的，确切地说是金钱在发挥着作用。当神灵不再垂青于英雄主义的时候，人们也不必感到惊奇。昨天的播种才决定今天的收成。

所有这些衰败的现象最终只是缺乏一种决定性的、普遍得到认可的世界观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对现实重大问题判断和立场观点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结果。所以开始的时候表现在教育方面，对一切都动摇不定、半途而废、羞于承担责任，而最后则失败于自己已经认识到的胆怯的容忍当中。这种懦弱屈服于弊端陋习的愚钝人性还变得时髦起来，而这样只为保护一个人，却在今后牺牲掉上百万的人。

看看战争前的宗教情况就知道这种普遍存在的矛盾心理是多么的严重。我们国家的大多数人已经长期失去了统一的、有效的世界观方面的信仰。对此全然的漠不关心比教会公开地失去信徒的后果还要糟糕。在亚洲和非洲进行传教是为了吸引新的追随者，特别是针对穆斯林信仰的传播所取得的成果而采取的行动，但同时却在欧洲失去了数以百万计

的信徒，他们对宗教活动要么全然不知，要么各行其是。这样的结果尤其从道德方面来考虑是很不利的。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宗教教义的基础理论所进行的斗争日趋激烈，而没有了宗教对于地球上实际存在的有着某种信仰的人类来说简直是无法想象的。广大民众并不是由哲学家组成的，而恰恰是某种信仰才常常是广大民众道德观念的唯一的基礎。各种各样替代宗教的办法是无法获得成功的，即使人们能够在其中看到了一种宗教信仰有效的解脱。要是广大民众真的能够领会宗教的教义和信条，那么信仰内涵的绝对威信就是现实世界的基础。那么什么才是日常生活的生活方式呢，即使没有它，成千上万身居高位的人也会生活得合理和正常，但对于上百万的其他人却不是如此，这就是对于国家来说是国家的基本法则，对于宗教来说就是教义。只有这样才把动摇不定的，没完没了地进行诠释的、纯粹的精神思想进行分类和统一，不这样的话就永远成不了信条。否则的话这种思想就会成为形而上学式的观点，也就是说是无法产生出哲学观点的。对教义进行攻击本身因此和普遍攻击国家基本法律相同，其结果就会造成全面的无政府状态和宗教上毫无价值的虚无主义。

对于政治家来说要清除一种宗教的存在价值很少取决于宗教本身所附带的缺陷，而更多地取决于替代思想的优势。只要替代价值观念明显缺少这种优势，那么现有的思想就会被傻瓜或罪犯所破坏。

那些用非常纯粹世俗的东西赋予宗教观念以及借助于所谓极其精确科学概念常常引起完全不必要的冲突，人们当然不会对这种很不令人感到愉快的宗教状况承担最起码的责任。那么在这一点上即使是经过艰苦卓绝但最后却总是失败的斗争之后所取得的胜利就会对在所有那些连很浅薄的知识都无法掌握的人们眼中的宗教造成严重的损害。

最令人气愤的就是滥用宗教信仰来达到政治目的所导致的破坏。人们真的没有完全足够严厉地站出来反对那些希望在宗教活动中找到一种利于他们在政治方面，更确切地说是在商业方面使用卑劣手段的投机商们。这些撒谎的无耻之徒还用极高的嗓门，当然好让其他的坏蛋也能

听见，向所有人大声地讲着他们的信仰，只不过不是为此去送命，可如果有必要的话也可以这样做，但却是为了要能够更好地活下去。对于他们而言为了那么一次仅有的政治投机行为，整个信仰的意义所在都是可以用相应的价值来换取的，为了十个议会席位他们可以同马克思主义的死敌宗教来进行结合，为了一个部长的职位他们也许会同魔鬼联姻，只要他们这些人还没有丧失掉最后一点尊严。

对大多数人来说，战争之前在德国的宗教活动都带有让人感到很不舒服的味道，其原因就在于一方面是所谓的“基督教”党派对基督教教义的滥用所致以及无耻地想要把天主教信仰和某一政党混为一谈。

而这种偷梁换柱的做法所导致的灾难就是议会中大量的饭桶给教会带来的损失。

可这样的后果却让整个国家和民族来承担，还正好在这个时期因此造成了宗教活动的松懈，开始导致对一切都采取退让、动摇的态度，甚至还威胁到了传统的社会道德思想基础。

这就是我们民族自身的伤痛和思想变化，只要没有产生必然会导致灾难的特殊因素就不会存在危险，但是在发生较大事件的时候，国家内部团结问题就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如果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没有什么变革或者变化的话，同样在政治领域范围内细心的人们都会察觉到可以视为德意志帝国将要同必然崩溃前兆的存在。德国内政外交的盲目性是每个不愿意故意眼睛的人都能看得到的。经济妥协政策看起来大多是符合俾斯麦“政治是成为一切可能的手段”的主张。可是俾斯麦和以后的德国首相相比现在倒有一些小小的不同，其区别就在于可以让第一位首相对政治的本质进行如此的表述，而以后的继任者们嘴里虽然讲的是同样的话，但却肯定有完全其它的意思。毕竟俾斯麦只想通过这句话说明的是要想达到某一个政治目的可以利用各种可能，或者说行使各种可能；可他的继任者们却把这种表达看作不管是政治观念还是目标达到的必要性的完全脱离。而政治目标在这个时候对于德意志帝国真的就不再有指引作用了，因此也就完全缺

乏某种世界观的必要基础以及对国内政治活动发展原则的明确性。

有不少人都看到了这种黯淡的前景并且指责帝国政策缺乏计划和没有主张，认识到帝国政策的软弱和空虚，但他们只不过是政治活动的局外人；官方机构则按照一名叫做休斯敦·斯图尔特·张伯伦的观点对此漠不关心，而到今天还依然如此。这些人蠢到连自己都不会去想一想从别人那里学一点有用的东西，即学习永恒的真理，正如奥克森斯迪纳所宣扬的那样：“这个世界是由少数精英所统治的”，当然每个司长几乎就可以体现为精英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自从德国施行共和制以来，就不再适合相信或者谈论此种观点，因此也就通过共和国保护法加以禁止。对于奥克森斯迪纳来说能够活在当时而不是活在今天这个理智的共和国时代真是走运。

被认为最为软弱的就是战争前应该体现国家强盛的各种机构：国会和帝国议会。胆怯和不负责任在这里以更加完美的形式相伴而行。

现在人们常常会听说国会制度在德国“自从革命以来”就起不到作用了，这实在是无稽之谈。但由此却轻易地给人们造成了国会制度在革命前好像是不一样的印象。而实际上国会制度的建立和其所起到的破坏作用也完全没有不同，议会随时都在进行着破坏，只不过大多数人还蒙着眼睛看不见或者不想看见罢了。因为德意志帝国的崩溃，国会制度不能只承担很少的责任，这样的灾难没有提早到来，不能是帝国议会的功劳，而是要归功于德意志民族和德意志帝国还在和平年代对掘墓人的行为所进行的抵抗。

对于议会直接或间接造成无数次巨大的损害，我所能指出这就是从本质上一向不负责任的机构所造成灾难的具体表现：可怕的半途而废和德意志帝国的内政外交方面在政治领导方面的软弱，而这首先要归罪于帝国议会所起到的作用并成为德意志帝国在政治上崩溃的主要原因。

人们只要注意观察就可以看到凡是国会所干涉的事情，都是半途而废的。



德意志帝国的对外联盟政策也是半途百废和软弱的，人们想借此维护和平，但却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战争。

对波兰的政策也是半途而废的，人们只是挑起了事端，但却从来没有去认真地去解决问题。结果就是德国人没有取得胜利，又无法和波兰人和解，倒和俄国人结了仇。

还有对阿尔萨斯洛林问题的处理也是半途而废的。既不用重拳去一下子打碎法国佬的脑袋，又没有承认阿尔萨斯地区居民的平等权力，这两样都没有做。人们也许并不知道在当时许多政党中也有大卖国贼，比如中央党的维特列先生。

当这种普遍存在的半途而废的现象还没有最后让与德意志帝国的生死存亡息息相关的力量：军队做出牺牲的时候，人们还可以忍受这一切。

所谓“德意志帝国国会”在此所犯下的错误，光是德国民众对其的诅咒就足以说明一切了。由于这些可悲的原因，这些议会里的政治流氓把维护国家生死存亡和保护民族自由独立的武器从人们的手中偷走了并且打碎了。要是我们今天打开弗兰德斯战场墓穴的话，从里面就会站进来血淋淋的控诉人，他们就是那些参军后让议会里没良心的罪犯们通过恶劣和不完备训练后去送死的成千上万的德国年轻人，他们这些人以及数以百万的牺牲或者残疾了的德国成年人失去了祖国，而仅仅是为了让几百个向民众撒谎的人来实现其政治投机、敲诈行径或是背诵一些教条主义的理论。

当犹太人通过其马克思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新闻机构向全世界制造德国“军国主义”的谎言，并使用各种手段看着德国承受不幸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和民主主义政党都拒绝对德国民众进行全面的教育。对此，通过观察人们就会立刻明白，这种做法就是最大的犯罪，这样会使得在今后发生战争的时候让整个民族拿起武器，用所谓自己的“国民代表”卑鄙的清廉行径把数以百万的受到恶劣和不完整训练的德国人驱赶到敌人的面前。但如果人们完全没有考虑到议会里的那些草包残忍和粗暴地丧尽天良所造成的后果的话，缺乏训练的士兵在战争一开始就很容易

造成战争的失败，而这一点也在世界大战中得到了可怕的印证。

为了德意志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进行斗争的失败，是由于和平时期对保卫祖国的民众进行教育的动摇和软弱所导致的结果。

如果在国内很少对新兵进行训练，那不论是去当海军还是陆军都是不尽人意的，这就使得维护民族生存的武器或多或少地失去了利用价值。可惜海军的主导精神就被这种半途而废的思想所传染了。建造舰艇的规模总比同期英国的要小得多，因此所缺乏的不仅是远见卓识，同时还有才能智慧。恰恰就是海军舰队和可能的对手相比从一开始在单纯的数量上就没能达到相同的水平，那么就必须力求每一艘战舰用超人的战斗力来弥补数量上的不足。这就取决于优势的战斗力，而不是传说中“善意”的优势。事实上当代如此先进的技术以及各个文明国家之间的广泛合作不可能在每个国家舰船吨位相同的情况下将更加强大的战斗力赋予舰船本身的威力了。考虑的更少的还有如何将舰船低排水量增加到大排水量的问题。

实际上，那种德国小吨位舰船可以在提高速度和增加装备上取得优势的空话是人们想要为和平时期极度缺乏逻辑思维的决策机构的辩护。他们解释说德国的火炮装备和英国相比有明显的优势，因为 28 公分口径的德国火炮毫不逊色于 30.5 公分口径的英国火炮的发射威力!! 要是负责心的话，现在就应该转向制造 30.5 公分口径的火炮，因为目的不在于要达到同样的射程，而在于必须要具备战斗力的优势。否则军队提供 42 公分的迫击炮就是多余的了，因为德国 21 公分的迫击炮比当时法国的高射炮都更具有优势，但要攻克要塞的话还是应该使用 30.5 公分口径的火炮。只是陆军领导人的考虑是正确的，可惜海军的不是。

忽视先进的炮兵作用以及速度优势，完全出于错误的所谓“冒险理论”。海军通过扩建战舰的方法放弃了进攻，并且从一开始就必然转向防御。因此也就放弃了只有通过进攻，也只能是通过进攻才能最后赢得的胜利。

一艘速度慢装备差的战舰大都会让速度更快装备优良的对在猛

烈的远程射击中被击沉。我们一些巡洋舰应该对此有痛苦的感受。只要是发动攻击的战役就得要对旧有军舰进行改装和对新型军舰进行优良装备，这就可以说明那些海军领导人的和平理念是多么的错误。在斯卡格拉克海峡的海战中，如果德国战舰和英国战舰有同样的吨位、同样的装备和同样的速度的话，那么命中率高和威力无比的德国 38 公分狂风暴雨般的榴弹炮就会让英国战舰沉入海底。

日本推行的则是另外一种战舰策略，其根本重点就是针对不久将来的对手要使每一艘战舰具备战斗力上的优势。因此这样就适合于让战舰的攻击成为可能。

当德国陆军的领导人基本上还没有受到错误思路控制的时候，可惜海军却已经输给了议会的精神，海军成了“议会”更好的代表。德国海军是靠这种动摇不定的观点组建起来的，并且以后也就会按照这样的观点投入战斗的。所以德国海军要想赢得不朽声誉的话，那只能更多地归功于优秀的德国国防军以及每个军官和全体士兵的作战能力以及无与伦比的英雄气概。要是以前的海军最高领导人聪明的话，就不会有无谓的牺牲了。

所以，也许正是由于和平时期议会的聪明才智控制着海军的领导人所导致的不幸才使得在其组建过程中，可惜纯粹的军事议会观念同时也开始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议会所特有的那种动摇不定和软弱无能以及缺乏逻辑思考也影响着海军的领导人。

正如已经强调的那样，德国陆军则对这种原则上错误的思路持观望和克制的态度，尤其是当时参谋总部的鲁登道夫上校针对这种半途而废和软弱无能的犯罪行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而国会面对国民生活问题也采取这样的态度并且通常对此表示反对。如果当时军官们坚持斗争是徒劳的话，那么议会就应该承担一半的责任，而另一半要由当时的总理贝特曼·霍尔维克的可耻立场和软弱无能来承担。恰恰在今天而且还在不小的程度上这样就阻止了那些对德意志帝国崩溃负有责任的人把责任

推卸给好像是唯一的一个反对损害国家利益的人，对于这些天生的投机分子来说或多或少只不过从来就不由一个谎话来决定。

谁会想到由于这种不可饶恕的极不负责任的轻率态度使得国家民族所做出的牺牲，谁会想到眼睁睁地看着数以百万健壮的士兵无谓地死去以及我们所遭遇的无尽耻辱和羞愧和无法估量的痛苦，有谁知道这一切的发生只是为了让一群追名逐利之人能够顺利地谋取部长的官位，要知道对这样卑鄙的家伙只能用流氓、无赖、骗子和罪犯来形容，否则用其它词语来表达就无法使人理解了。因为这些叛徒对于国家民族来说只能是寄生虫，而不是正直的人。

奇怪的是，当国家的内部团结必将遭受到破坏的时候，以往那些德国所有的阴暗面都真实地暴露了出来。是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令人感到不安的东西也直接向广大民众喊了出来，而平时人们对许多东西则尽量避而不谈，有的还矢口否认。这就是当通过公开地对问题进行处理或许能够出现好转时出现的情况。而政府的决策机构对宣传的作用和价值一点都不了解。通过明智和不断地宣传能够愚弄民众把天堂说成地狱，或者相反地把苦难的生活说成是天堂，每个犹太人都知道这些并且运用自如，而德国人，更确切地说是德国政府对此却一无所知。

最糟糕的就是在战争中所受到的报应。

尽管在战争前德国人的生活中被指出存在无数的弊端，但与此相反还有许多的优点。经历一次公正的考验人们甚至承认大部分我们所缺乏的东西也正是其它国家和人民所拥有的，有些是让我们非常相形见绌的东西，而他们也没有具备我们的长处。

其中最大的优点就是与其他几乎所有的欧洲人相比德意志民族是最具有保护其国家经济特点的民族，并且尽管有些不利的征兆，但至少还受到国际金融资本的监督。可这却是一个成为日后世界大战最大病原的危险的优点。

从这一点以及其它许多事例中人们可以看出从德意志民族大量健

康力量的源泉中可以提取出三种其性格特点中堪称楷模和无人可以超越的因素。

首先就是近来在德国所实行的国家政体及其表现形式。

人们确实不可以忽略的是君主本身作为一个人通常都会具有会让地球和子孙遭殃的弱点，对此人们不要掉以轻心，否则就必然会对现实感到疑惑：难道他们就是当代统治代表的人性化身，也许还是精神和道德最为谦逊的体现，而人们对这些要经过长期思索后才能想象得到。谁要是拿德国革命的“意义”同那些自1918年11月以来赋予德意志民族以革命的大人物的价值相提并论的话，那他对于后人的评判就得羞于遮面了，因为用保护法等等措施再也无法封住他们的嘴了，并且他们还会因此说出我们今天就已经认识到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新德国领导人的智慧与美德和他们的言谈与恶习恰好相反。

君主制肯定会疏远许多人，尤其就是脱离广大的民众。而这样的结果就像我们所说的那样君主周围的人并不总都是些最聪明和最正直的家伙。有些君主反倒更喜欢阿谀奉承的人，也不愿意正直的人给他们“上课”。当这个世界处在许多旧有观念经历重大转变时期所造成的非常严重的伤害当然不会由于一些宫廷传统的论断所停止。

所以在上世纪末，一个普通人和大多数人一样都不再羡慕穿着制服骑马从面前经过的公主了。在人们眼中仪仗队好像完全起不到正确的作用，否则就不会有不幸的事件发生了。即使不是完全由于这些人天生的愚笨，这样的结果与其说是为了使人注目，倒不如说是叫人生厌。比如说某位公主赏光品尝了老百姓的食物所引起的轰动，这在以前或许完全可以看作是件好事，但在当时却适得其反。应该承认的是，这些王公贵族们所品尝到的食物只是和平常食物的做法稍稍有一些不同而已，只不过大家都知道这种事情罢了。

所以最好的意愿如果不能吸引人的话就有可能是很可笑的。

可要是总在讲述大家都熟悉的君主们如何知足、早起，彬彬有礼，而且还一直要讲到深夜，还要讲到常常威胁他的营养不良，这就很会让人对此表示怀疑。并没有完全要求人们知道君主们会吃些什么和吃多少，人们赏赐给他的已经是“丰盛”的一顿饭了，人们也并不认为有必要拒绝他再睡上一会儿，如果他只不过是作为具有名称、性别、特点的普通人来让他的国家得到尊严以尽到作为君主的义务人们就会满足了。光讲讲童话是没有什么用的，但这样的结果所造成的伤害会更大。

像这样以及类似的情况不过是些小事情。只可惜更糟糕的是大部分民众会更加相信人们反正都要靠上面来统治，而每一个人则没有什么要去关心的了。只要政府是好的或者说政府想要成为最好的，那就还过得去。可要是善意的旧有政府被一个不太正直的新政府所代替的话，那么意志薄弱的顺从和天真无邪的观念就会造成值得人们思考的最为严重的不幸。

但所有这些以及其它方面的软弱表现都具有无可争辩的意义所在。

君主制国家政体取决于全体政府领导机构的稳定并且要从野心勃勃政治家乌七八糟的投机活动中最终落实政府人选。其它还涉及到国家机构自身的声誉和由此所奠定的威信，还有全体官员的升迁，尤其要提高超越了政治职责意义之上的军队的地位。另外还有的就是君主本人做为国家元首的化身所具有的优点以及负责的榜样，他比那些临时凑在一起的议会多数派要更加有责任心，众所周知的德国政府的清廉首先要归功于他。君主制的文化价值最终可以弥补德意志民族主要和其它方面的缺陷。德国首脑们的官邸依旧是在我们这个物质追求的年代恐怕要逐渐灭绝的艺术思想的避难所。德国王室在 19 世纪为艺术和科学所做的一切堪称典范，是当今无法与之相比的。

作为在此期间对我们整个德意志民族开始并逐渐扩大瓦解的主要对象就是军队。它是德意志民族了不起的学校，并不只是为了去仇恨所有反对保护民族生存和自由的敌人。它被所有的坏人诽谤过、仇视过、攻击过，当然也害怕过，正因为有这个事实，所以它不会被赋予庄严的

纪念碑。首先凡尔赛的国际盗贼对德意志军队所产生的愤怒让它最先被认为是我们人民自由针对交易所势力的保护地。要是没有这个警示力量的话，那凡尔赛对我们民族的企图恐怕早就已经开始了。让我们总结出一句话来表达德国民众对军队的感激之情，那就是：倾其所有。

军队培养的是绝对的责任感，因为这样的素质在一段时间里已经变得很难得了并且对日常行为准则构成压力，这来自不负责任的议会所起到的作用；军队还培养出一个时代日益受到滋生蔓延的胆怯所威胁的个人勇敢精神，以及培养出为了人类幸福而牺牲的精神，这些几乎被人看作是愚蠢的，而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则只知道保护和帮助“自我”；军队是一所学校，它还让每一个德国人知道国家的幸福是无法在黑人、德国人、中国人、法国人、英国人等等之间结成国际联盟的骗人的空话中去寻找的，而要靠自己的民族团结的力量。

军队培养的是坚定果断，而在其他人的生活中彷徨和忧虑则已经开始左右他们的行为。也可以说在自以为是的家伙们到处散布维护原则的时候，命令总是高于一切的。如果不是军队以及它所进行的训练对人类原始力量所进行的不断创新，那么这唯一的基本原则所包含的不朽的、坚强的健康内容早就被其他人所丢掉了。人们所看到的当今我们德意志帝国领袖那可怕的犹豫不定是不会有行动结果的，但除了强迫去签订掠夺条约；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要拒绝承担任何责任，并且用宫廷固定笔法签字，同意所有别人说的有利条款，因为这个时候倒是很容易做出决定：他是被迫签字的。

军队所教育的是理想主义和为了祖国及其领土的献身精神，而其他的人则追求的是贪婪和唯物主义。它还教育自己的民众反对阶级分化并且指出军队唯一的错误就是一年制义务兵役制度。之所以错误是因为这样就破坏了绝对平等原则并再次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拒之门外，可如果采取相反的做法则会更好一些。让整个世界都感到非常陌生的德国上流社会越来越远离自己的民众，而正好军队能够起到有益的作用至少避免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脱离军队的行列。人们没有这样做是一个错误，只不过世界上有哪个政府不犯错的呢？而这个政府总是优点多，所以缺点通常也在人类缺点的平均值之下。

最大的功绩应该归于以前的帝国军队，因为在普遍注重多数的情况下，军队则重视个人，当然是多数的个人。军队反对犹太人的民主主义思想对数量的盲目崇拜而注重个人品质。军队也教导我们新时代最为急切需要的是：男子汉。在歌舞升平、娇生惯养的年代里每年能够从军队里选拔出三十五万名矫健的年轻人，他们经过两年的训练失去的是年轻人的柔弱，却得到了钢铁般的体魄。在这段时间里他们练习如何服从，也知道了什么叫命令。从他们的步伐就能看得出他们是训练有素的军人。

军队是德意志民族的高等学校，而不是仅仅去关注对那些出于忌妒和贪婪想让德意志帝国变得软弱无能并希望德意志民族失去抵抗能力的人的愤恨。许多德国人不愿意在困惑中或者在糟糕的情况下所看到的东西却得到了其他人的承认：德国军队是服务于德意志民族自由和养育后代的最强大武器。

与国家政体和军队密切相连的第三点就是以往无可比拟的德意志帝国的全体官员。

德国是世界上组织和管理得最好的国家。虽然有人背后议论说德国官员官僚守旧，然而其它国家的官员也好不了哪儿去，有的反而更糟。但其它国家所没有的却是这部国家机器的稳定坚固以及具有廉洁正直观念的国家官员。就像今天时常可以看到的那样，虽然思想开明和时髦，但却品格恶劣、无知也无能，那还不如忠实可靠为好，尽管有些过时。因为如果人们愿意现在这样做的话，兴许就好像战争前德国的管理就是纯粹官僚主义的，可对商业则很糟，对此可以作如下的答复：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像德国国家铁路系统一样有更好的商业化组织和运作的呢？只有革命才有资格去摧毁这个系统，直到最终整个系统看起来非常的完备，才根据共和国缔造者的意愿从大众的手中转而实现了国有化，也就是说服务于作为德国革命的委托人，即国际交易所资本。

那么该特别称赞全体德国官员和管理机构的就是其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性，政府的政治思想观念无法对德国官员产生影响。但自革命以来

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有能力和有才干的职位都由政党进行聘任，使得独立、自主的特性不但没有得到促进，反而受到了阻碍。

以往德意志帝国的强大是以其国家政体、军队和全体官员来奠定的。首先这正是现在的国家所缺少特点的原因：国家尊严！因为这并不是建立在议会或是州议会空话连篇基础之上的，也不是在于提供保护的条款或是吓唬无耻骗子的法院判决等等之上的，而是建立在可能和能够对国家领导以及管理普遍信任的基础之上的。这种信任又是来自对国家大公无私、诚实正直的领导管理的信赖和带有普遍道德观念情感对法律赞同的结果。因为要长期维护国家的统治机构不是靠暴力压制，而是靠对其善意的信任以及代表和促进民族利益诚意的信赖。

战争前某些不利因素也严重地威胁、侵蚀和伤害国家内部的实力，这样可以使人们不要忘记大部分同样情况下的其它国家还要比德国遭受更多的苦难，可尽管如此，在危险到来的关键时刻也不至于瘫痪和毁灭。但是如果人们想一想战争前德国所存在的不足与其强大相比，那德意志帝国崩溃的真正原因就可能也必须另有缘由，而实际也正是如此。

以往德意志帝国衰落最为深层意义上和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没有认识到种族问题及其对人类历史发展的意义所在。因为所有人类的活动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出于自我生存的渴望以及自身和种族的繁衍所应遵循自然的过程，即使有时人类本身对其行为的内在原因还无法了解。



第十一章 民族和种族

有些事实是随处可见的，而正因为如此所以普通百姓才看不见或者至少是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人们对这种人人皆知的事情往往视而不见，而当有人发现时，则对想必是大家知道的东西表示出异常的惊奇。哥伦布的鸡蛋到处都是，只不过没有让哥伦布遇到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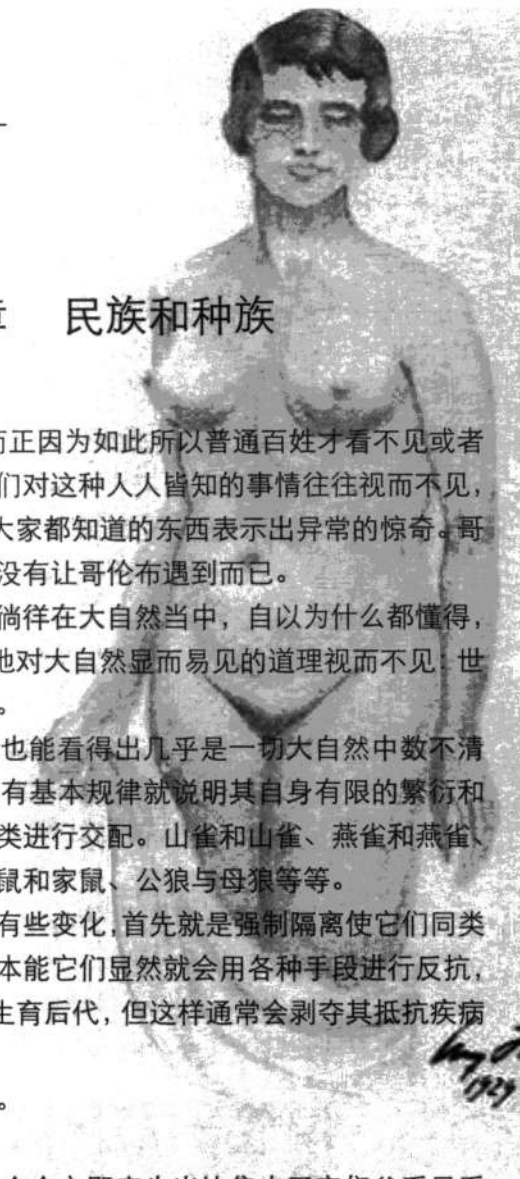
所以人类也就无一例外地徜徉在大自然当中，自以为什么都懂得，什么都知道，但却都少有例外地对大自然显而易见的道理视而不见：世界上所有生物种类的内在联系。

即使是通过表面上的观察也能看得出几乎是一切大自然中数不清的生命求生愿望表达形式的固有基本规律就说明其自身有限的繁衍和生殖方式。每一种动物只和同类进行交配。山雀和山雀、燕雀和燕雀、鹤鹑和鹤鹑、田鼠和田鼠、家鼠和家鼠、公狼与母狼等等。

只有在特殊的条件下才能有些变化，首先就是强制隔离使它们同类之间无法进行交配。其次出于本能它们显然就会用各种手段进行反抗，要么拒绝进行杂交，要么限制生育后代，但这样通常会剥夺其抵抗疾病和外来攻击的能力。

这样做只是太自然不过了。

两种动物之间的杂交不完全会立即产生出比集中了它们父系母系优点更加优秀的后代。这也就是说：这个孩子也许会比父系母系中较矮一方的个子要高，但不会高过较高的一方。所以也就是在以后与较高的一方较量过程中失败了。因此这样的交配就完全违背了自然界生物择优生育的意愿。其前提条件不在于优势和劣势的结合，而完全取决于优等的一方。较为强势的一方有权控制并且不和较弱的一方结合而损害自己



Long Han
1929

的优势。只有天生的病秧子才认为这是无情的，而正因为如此他才是个软弱和愚蠢的人，因为如果这个规则无法进行控制的话，那么对所有生命的延续将是不可想象的。

这种自然界普遍通用的种族纯化本能的结果，并不只是单一种族对其它种族的严格限制，也对自身的特性起到同样的作用。狐狸总归还是狐狸、鹅总归还是鹅、老虎总归还是老虎，以此类推，它们之间的不同顶多在单一种类上力量、强壮、聪明、机敏、耐力的不同程度的表现。恐怕从来就找不到一只有点人类的思想意识而又像只鹅缓步而行的狐狸，就像不会有对老鼠表示友好的猫一样。

所以，人类彼此间发生的争斗在很少的情况下是出于内心厌恶，而多数则是由于饥肠辘辘和相互吸引。对于这两种情况大自然只是静静地、但却是很满意地注视着一切。为了每天的面包所进行的争斗使所有体弱多病、缺乏果敢精神的人败下阵来，而男人为了女人的争斗只给予更为健康的以生育的权力或者说是可能性。这样的争斗还常常是一种促进种族健康和抵抗力的方法以及自身延续的原因。

要是这个过程是另外一个样子，那么生命的延续和进化就会停止并且会出现相反的情况。因为当劣势一方在数量上超过优势一方时，那么在同等生存和生殖条件下，劣势一方则会繁衍得更快，以至于优势一方最后不得不被迫退到次要地位。所以要进行有利于优势一方的调整。这倒引起了大自然的担心，是她让弱势的一方承受如此艰难的生存条件，尽管她也在限制其数量，最终还是别无选择地允许余下的部分进行繁殖，但要按照体力和健康重新进行无情的选择。

她多么地不希望劣等种族同优等种族交配，也多么地不愿意让上等种族和下等种族进行结合，要不然的话她千百年来为了繁衍所付出的辛勤劳作兴许顷刻间就又会毁于一旦。

对此历史经验提供的大量例证非常明确地表明，雅利安民族和其它劣等民族混血杂交的结果就是文明个体的灭亡。北美洲大部分人都具有日耳曼民族的特点，他们很少和劣等的有色的人种杂交，这样就表现出

和中美洲及南美洲不同的特征和文化，而在中美洲和南美洲主要是罗马语族移民则在很大程度上与原住民混居。从这样一个事例中人们就已经能够清楚地认识到种族混合的后果。美洲大陆上血统纯正和保持不和其它种族结合的日耳曼人因此而成为美洲的主人，而且只要他们不与其它种族通婚，就一直是那里的主人。

种族杂交的结果简短地说就是如下：（一）降低优等民族的标准；（二）开始也许是缓慢的体力和智力方面的退化，但肯定是不断地加重并且久治不愈。

造成这样的结果，没有别的原因，那只能是违背永恒的造物主意愿的罪孽所导致的。

即使这样的行为是罪孽的，那也是值得的。

因为人类试图抗拒大自然不可动摇的规律却陷入了与连他自己作为人类都要为生存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的对抗。所以针对大自然的行为必然导致人类的没落。

当然这里还真的有很像犹太人那样可耻的，同样也是愚蠢的当代和平主义者的言论：“人类会战胜自然！”数以百万计的人们连想都不想就跟着犹太人的胡说八道喋喋不休地也说不停，并且最后也真的想要自己成为一个大自然的征服者，而他们除了以一种思想观念以外没有任何武器可以使用，可悲的是按照这种思想观念是无法来想象这个世界的。

只是完全忽视的是，人类还没有战胜过大自然的什么，而顶多不过只是刚刚拈起并试图想要掀起大自然那巨大无比且永远神秘面纱的一角而已，人类也没有发现什么真理，也仅仅只是才发觉到人类是无法控制大自然的，只不过是某个自然法则以及成为其它生物主人秘密的认识有所提高而其它生物对此一无所知罢了，也就是完全忽视了一种思想是无法战胜人类的演变和生存条件的，况且这种思想本身还只和人类有某种联系。没有人类大自然就不会在这个世界上产生人的思想，因此人类思想也就总归以人的存在为前提的，所以一切法则要去实现人类的生

存条件。

而且还不止是这些！特定的思想甚至还和特定的人有关。在许多情况下这恰恰是针对的不是某种具体科学理论的思想内容，而是情感世界中的思想根源，就像人们现在常说的那样是“内心世界”的表现。所有这种和冷静逻辑本身毫无关系，而只是纯粹情感表达、伦理假设等等的思想都和人类的生存纠缠在一起，而人类自己思想的则要感谢人类生存的精神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存在。所以维护特定的种族和人种恰恰就是维护某种思想的前提。比如说谁要是想真正衷心地祝愿和平主义的思想在这个世界上取得成功的话，那他就采取各种手段来利用德国人去征服世界，可是如果相反的话，那就很容易会让和平主义者和德国人同归于尽，因为很可惜其他人是不会像我们德意志民族那样如此发自内心地去轻信这类违背自然和理智的胡言乱语的。为了赞同和平主义思想，人们不得不以愉快或者厌恶的心情通过冷静地思考来决定进行战争。这样也就无异于和来自美国的世界救星威尔逊所打算的那样，至少也和我们德国人中那些痴心妄想的人所相信的那样来实现其目标了。

实际上，只要优等民族先前完全征服了世界并成为世界唯一主宰的话，那么人类和平主义思想兴许是完全正确的。而且这种思想缺少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很少并且最终也不可能出现的有害作用的可能性。所以就要先进行斗争，然后再谈和平主义。否则的话，人类超越了其发展的巅峰，而结果却不是某种伦理道德思想的统治，却是野蛮的统治，接着就会发生混乱。当然也许会有人对此要进行嘲笑，而这个星球在没有人类存在的情况下已经在太空中运行了上百万年了，但如果人类忘记了其至高无上的生存并不是靠几个狂妄者的思想家来维持的，而是要依靠去认识和运用亘古不变的自然法则的话，那么这个星球就不会再像从前那样运行下去了。

今天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所值得称赞的一切科学、艺术、技术和发明只是少数人和源自某一个种族所创造的产物。由此决定了整个文明的存在。人类文明的毁灭也就葬送了地球的美丽。

比如说土地也时常影响着人类，根据不同的种族，所产生影响的结

果也就各不相同。收成少的土地一方面促使人们付出最大的劳作，另一方面也是贫穷的原因以及最终导致营养不良的结果。人们的天性决定了其对外部影响所采取的应对方式。天灾对有的人会导致饥荒，而对另一些人则会让他们努力地劳动。

以往所有伟大的文明只会走向毁灭，因为原来具有创造力的民族消亡于血液的毒害。这种衰落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忘记了所有人类文明都和人类息息相关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也就是说为了要保护某种文明，那就必须要维护创造文明的人类。而这种维护还需要与必须以最优等和最强壮民族胜者为王的铁打不动的法则相互联系在一起。

谁要想生存，那他就要进行战斗；谁要是不愿意在世界上长期地进行搏斗，那他就不配活在人间。尽管这样很艰难，但也得如此！这肯定是每个相信能够战胜大自然并且因此而受到嘲笑的人所遭受的最艰难的命运。痛苦、不幸和疾病就是大自然所给予的回敬！忽视并且对种族法则有错误认识的人真的会失去本应属于它的幸福。他阻碍了优等种族的胜利并且因此也同样阻碍人类的所有进步。结果就是他承受着人类情感的压力而落入无助的动物的行列中去了。

要是用人类所有的语言开始去争论哪个或者哪些种族是人类文明最初的代表和真正的缔造者这样的问题是多余的。而现在提出这样的问题并给予简单明了的答复则较为容易一些。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人类文明、艺术成果、科学技术几乎都是雅利安人所创造的。仅此事实就可以得出不无根据的推论，雅利安人就是人类高度文明的真正缔造者，也就是我们所理解的“人类”文明的始祖。他就是人类的普罗米修斯，从他那明亮的前额迸发出天才般智慧的火花，重新点燃了揭示神秘大自然奥秘和引领人类成为地球上其它生灵主宰之火。要是熄灭这火焰，那么地球将陷入几个世纪的黑暗，人类的文明将会消失，世界将变得荒芜。

要是我们把人类分为三种类型：即文明的缔造者、文明的代表和文

明的破坏者，那么作为文明的代表雅利安人也许是首选。人类文明大厦的所有基础和构架都是由雅利安人建造起来的，只是外墙的形式和颜色才在某种情况下由具有其它性格特点的民族来完成的。雅利安人提供了巨大的建筑材料并且首先对人类的进步进行了规划，而规划的实施也符合每个种族的特性。比如整个位于东方的亚洲在几十年内就会像我们这里一样最终把古希腊精神和德意志技术相结合所形成的文明当作自己的文明。只不过其外部形式，至少有一部分还带有亚洲的特点。这并不是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日本将欧洲的技术运用到其文明中去，而是欧洲的科学和技术用日本的特色做了些点缀。尽管本质决定生活的色彩，虽然也有内在的差别，但对于欧洲人来说外表的东西会更多地映入眼帘，实际上日常生活的本质已不再特别具有日本文化特点了，而是欧洲和美国强大的科学技术，也就是雅利安民族所产生的作用。只有取得这样成就的东方人才能赶得上人类进步的步伐。这样才会有了每天的面包而奋斗的基础，才会生产出武器和为此所需的工具，只不过在表面形式上会渐渐地更加适合日本的特点罢了。

要是从现在开始雅利安对日本的影响没有了，假定欧洲和美国都毁灭了，那么在短时间内日本科学技术的发展就会停滞不前；可用不了几年具有日本特征的本土文化就会占上风，但却又对新生文化产生僵化作用并使其重又陷入到昏睡的状态中去，而正是在70年前日本才从这种昏睡中被雅利安文明所惊醒的。所以正如现在日本的发展一样，其日常生活也要感谢雅利安文明源泉的功劳，即使在迷茫的过去也是外来思想和文化的影响唤醒了当时的日本文明。以后的停滞和完全的僵化这一事实本身就提供了最为有力的证据。这种情况只有在当一个民族在文明最初的发展时期起到推动作用和做出贡献的、原来具有创造力的核心人物消失了或者是缺乏今后向外发展的时候才会发生。但是应当肯定的是，要是一个民族的文明最主要的元素是从其它民族那里获得的，然后加以吸收、加工，为的是不再受外界的影响而趋于僵化，像这样的民族只能称为“承载了文明”，而不能说是“创造了文明”。

从这个观点出发对每个民族进行审视的话，就会总结出一个事实，那就是毫不例外地不仅会关系到原有的文明缔造者，而且还几乎涉及到文明的代表。

他们的发展总是呈现出如下的场景：雅利安人的祖先还真的去征服那些人口数量少得可笑的外族异邦来进行发展，而在新的疆域内特殊的生活环境（如收成和气候条件等等）也激励着他们。并且通过使用大量劣等民族的劳动力还增强了他们在智力和体力上潜在的能力。他们常常要经过几千年，几百年才能创造出原本完全代表其内心本质特性的文化，一种适合于上面所提到的土地以及被征服者特性的文化。随着时间的流逝征服者们最后违背了当初所遵守的保持血统纯洁的原则开始和被征服的当地居民通婚，因此也就结束了其自我生存的生活方式，因为在天堂里所犯下了原罪接下来的就是被驱赶出伊甸园。

一千多年以后那些曾经的统治民族最后依稀可见的痕迹才会从他们留给被征服民族身体里的血液而产生出较为浅淡的肤色上以及做为最初缔造者所遗留下的文明中呈现出来。因为正如事实上和精神上的征服者在被征服者血统上的消失一样，他们同样也失去了燃烧人类文明进步之火的动力！就像肤色还能够保留过去征服者血统一丝记忆的碎片一样，文明世界的黑夜也会慢慢地让以前光明使者所遗留的创造力给照亮。这种创造力还透射出所有重现的野蛮行径并且提醒现在毫无主见的旁观者要经常注意仔细观察每一个民族，这样可以同时反映出他们的过去。

一个民族的历史如果受到过去传播文明民族的影响，就会一再地，也许还会多次地发生对以前所经历的事情无法进行追忆的事情。以往征服者血统的残余部分在不知不觉中有了新的表现，并且只有进行强制，才有可能实现本民族自己的意愿。一次新的文明浪潮会阻止本民族意愿的进入并且持续到其文明的代表再一次由于外族血统的渗入而走向没落。

今后文明史和世界史的任务就是要在在此方面进行研究，而不要钻到对表面事物的描述上去，可惜我们现在历史学科却常常是这样的情况。

从“文明代表”的民族大致发展轨迹中就已经可以看出这个世界上真正文明缔造者，即雅利安人自己的成长、创造和消逝。

正如在日常生活中那些所谓的天才需要一个特殊的理由，甚至常常是需要一个公开的诱因来发挥其聪明才智，那么在公众生活中则需要具有创造力的民族。在单调的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人物也常常会显得无足轻重，而且几乎还无法超出周围人们的平均水平；可一旦形势有利，在其他人在沮丧和迷茫的时候，他们就会从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很一般的孩子表现出明显的天才秉性，这让那些至今仍生活在普通市民狭小圈子里的人们感到吃惊也并没有什么稀奇的，毕竟自己国家的预言家基本上也很少有所成就的。想要对此进行观察的话再好不过是在战争期间。当危机来临的时刻，在其他人在垂头丧气的时候，突然从一群看起来善良的孩子们中间涌现出坚强不屈英勇果敢的英雄。要是这样考验的时刻没有到来的话，也许就没有人知道像这样一个毛头小伙子竟然还可以成为一个少年英雄。差不多这总还是需要一种动力来召唤天才出场的。这就是命运的锤打，一下子落到地上，一下子又突然敲在砧板上，同时把世间的地狱击碎，在众人惊异的目光面前这个至今还藏而不露的小伙子终于站了出来。这让大家都毛骨悚然并且都不敢相信这个平时和大家显然都差不多的人突然一下子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而像这样的事情对每个优秀的孩子来说都会再次遇到的。

例如一个发明家即使在他发明的那一天就奠定了他的声誉，但要是认为是智慧本身在那一时刻落到了他的头上就是错误的了，天才的火花是自他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存在在他那具有真正创造才能的大脑里了。真正的天才都是天生的，是从来不可能培养或者完全可以教育出来的。

就像前面所强调的那样，这不仅针对一个人，而且也针对一个民族。凡是具有创造力的民族历来并且从根本上就赋有创造的才能，即使是只能看到表面现象而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就算有可能对所取得的成就经常只做表面上的赞许，那是因为其他人是无法识别出智慧本身的，他们只

能从可见的表面形式如发明、探索、建筑、绘画等等才能看得出来，但要让他们最终能够了解到这些话则常常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正如一个优秀人才在生活中其聪明或者特殊的天赋要通过特有的时机得到激励，要尽力使其天赋成为现实，而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要想真正利用其创造能力和本领的话，则要具备一定的先决条件。

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过去和现在人类文明发展的代表民族都是雅利安人就非常清楚了。一旦命运把他们指向特殊的境遇，他们所具有的能力总会立刻得以发挥并且还极具自己的特色。在这种情况下所缔造的文明受到现有的土地、当地的气候以及被征服者的影响。而最后一项才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实现文明的技术条件越原始，就越需要现有的劳动力，这里主要指的是人的体力劳动来替代机器的力量。没有使用劣等民族的可能性，雅利安人就无法迈出创建日后文明的第一步，也就是说，如果他没有所驯养牲畜相应的帮助，就不会得到不需要牲畜的技术。可惜人们常说的：“黑人有罪，黑人滚蛋”是有其深刻含义的。千百年来马给人类提供服务并且还帮助人类去奠定让机动车去使马本身变得多余的发展基础。用不了几年人类所从事的工作因为得不到以前的协作也许会处于艰苦的境地，就像现在一样。

所以要建立较为先进的文明，现有劣等民族是一个最为重要的条件，他们可以作为缺乏技术辅助工具的替代品，而没有这些想要进行发展是不可想象的。人类最初的文明肯定很少依靠所驯养的牲畜，而更多地是使用劣等民族的劳力。

正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只有在对被征服民族进行奴役后才开始让他们遭受到和牲畜一样的厄运，而不是相反的情形。因为开始是被征服者拉犁耕地，后来才使用马。只有和平主义的傻瓜才又把这种事情看作是人类道德败坏的表现，而没有搞清楚文明的发展只得这样开始才能让今天那些和平使者得到四处散布高谈阔论的机会。

人类的进步就像攀登永无止尽的梯子，没有下面的阶梯就无法继续向上。这就是雅利安人所走的道路，他们注重现实，而不像当代那些和

平主义者那样从幻想出发。然而现实中的道路却是艰苦而困难的，这样最终会导致人类幻想去走另一条道路，结果不仅没有接近现实，反而脱离了现实。

所以，最初的文明就产生于在雅利安人遇到劣等民族并且征服他们使其顺从的地方就不是什么偶然的了。他们就是未来文明所使用的原始技术工具。

这就清楚地描绘出了雅利安人所走的道路。作为征服者，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和目标使劣等民族屈服，并在实际劳动中服从他的命令。同时他不单单只给被征服者应该干的、甚至是艰苦的工作，不仅保护其生命，而且甚至还给予他们一种或许比他们以前所谓的“自由”要好得多的待遇。只要他严格地保持主人的地位，那他不仅只是真正的主人，而且还是文明的维护者和传播者。因为这不仅要以其能力为基础，而且还要以自身的维护为前提。即使被征服者开始提高自身的地位，也许在言语上也与征服者接近，那也会在主人和奴仆之间有严格的区别。雅利安人放弃了其血统的纯正并且因此也就失去了自己所创造的养尊处优的机会。他们因通婚而堕落，逐渐失去更多的创造文明的能力，直到最后比起他们的先辈来不仅在智力上，而且在体力上也开始和被征服的土著人更加相像了。在一段时间里他们还可以依靠文明的财富生存，但以后他们会变得呆滞，最后终被世人所遗忘。

文明和帝国就这样崩溃了，为的是给新的物种让出地方。

由于通婚以及由此所必然导致的种族的堕落是一切衰落的主要原因。因为人类不是因为战争的失败，而是因为丧失了只存在于自己纯正血统中的抵抗能力才衰落的。

世界上那些劣等种族就是人类的糟粕。

世界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种族维护自我生存本能的好或者坏的意义上的不同表达而已。

雅利安民族极其重要作用的内在原因不要只看其较强地维护自我生存的本能方面，而更多地要在其特殊的表现方式上去寻找答案。从主观上看，生存的愿望处处都是相同的、强烈的，而实际效果却只在形式上各有所不同。

对于最为原始的生物来说，其生存的本能不会超出关心自我的范畴。自私，或者叫欲望则超越了一切，甚至要自己掌控时间，让每时每刻占据了一切，以至于都不愿意给未来留出一点点空间。动物就是这样为了自己生活的，它们只为一时的饥饿去寻找食物，只为自己的存活去进行争斗。而一旦以这种方式表现出维护生存的本能，则丧失了建立群体的基础，而这本身就是家庭的最初形式。即使男女从纯粹交配的意愿出发而结合在一起促使了维护自我生存本能的延伸扩展，也就是说光关心自己和只为自己去争斗也会有其它方面的表现，有时男人会为女人寻找食物，而通常男人和女人会一起为孩子寻找食物。一方面为了自我保护，而另一方面则表现出了最初的极为寻常的自我牺牲精神。这种精神突破了家庭观念的狭隘界限，展现出建立广大组织以及最终建立国家的前提条件。

对于世界上的劣等民族而言，其品质特征只具备很少的内涵，所以组建家庭常常不会有什么结果。越是愿意乐于助人、甘愿放弃个人利益，就越有能力组建团结一致的群体。

这种在劳动中舍己为人，必要时为别人奉献生命的精神主要是由雅利安人所培养出来的。雅利安人不仅在精神品质上是最伟大的，而且在乐于助人、奉献社会方面的能力也是最伟大的。在维护自我生存本能方面雅利安人的表现形式最为高贵，同时他自愿地将自我的利益至于全体利益之下，如果有必要也甘愿做出牺牲。

雅利安人并不是出于智力才能方面的原因具备建立和构筑文明的能力。如果单单只有这一点的话，那恐怕也总会带有破坏作用的，但绝对不能是组织性的，因为每个组织最为内在的本质都是建立在每个人都要放弃个人观点和利益并且要在有利于大多数人的情况下去牺牲个人

的观点和利益。首先是大多数，然后才是个人得到自己的利益。比如在工作中个人不再是直接地为了自己，而是把自己的劳动融汇在全体的劳动之中，不仅为了有益于个人，而且还有益大家。这种观点最为绝妙的解释就是用了“劳动”这个字，这样就使得劳动不再被看作是为了个人生存，而只是为了不违背全体利益的一种创造。其它情况下的人类活动，尽管是出于维护自我生存的本能但却没有顾及到世人的幸福，那么就会被看作是偷窃、剥削、抢劫、盗取等等行为。这种将个人的自我利益让位于维护全体利益的观点才是真正实现人类文明的前提条件。只有这样才能诞生出一切人类的伟大杰作，文明的缔造者得到极少的酬劳，但却给后世带来了无比丰厚的福祉。是的，以后的人们才能懂得有多少人如何能够忍受着贫穷的生活，带给他们自己的是穷困和简朴，却保证了全体人民的基本生存条件。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农民、每一个发明家、官员等等，只要他劳动了，虽然自己没有能够得到幸福和安逸，但他却是这种高尚精神的代表，即使他行动更深层次的含义还隐藏在他的心中。

劳动对于人类生存的基础以及整个人类所取得的进步意味着什么，在很大程度上还可以认为这是为了保护人类和人类文明。为了全体的生存而奉献出自己的生命就是牺牲精神的伟大体现。只有通过这种精神才可以阻止人类亲手所创建的文明再次被人类自己推翻或者被大自然毁灭。

在我们德国的语言中恰好有一个词来以最好的方式来描述这种行为：履行义务，也就是说，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是要服务于全体。

这种行为所产生出的基本观念是我们称之为有别于自私自利和利己主义的理想主义。对此我们所理解的就是为了全体、为了同胞而自我牺牲的本领。

能够再次认识到理想主义不是一种多余的感情流露是多么的有必要，因为这的确是我们称之为人类文明存在的前提条件，是的，只有理想主义才创造出“人类”的概念。雅利安人在这个世界上所取得的地位要感谢这种思想观念，这个世界上人类的存在也要感谢这种思想观念，

因为这种观念从其纯粹的精神中塑造出铁拳和智慧相结合的创造力来建造起人类文明的丰碑。

没有这种理想主义观念，那么所有的一切就都不会成为创造力，即使最为一流的精神力量也不过只是精神本身毫无内在价值的外部表现而已。

但同时真正的理想主义不再是全体中的个人生命和存在的附属品，而是建立各种形式的组织的前提，这在精神上符合大自然的最终意愿。理想主义引导人类自觉地认识到力量和权力的优势并且使其成为塑造和构成整个宇宙规则的细小微粒。

纯粹的理想主义无意之间与人类最为深刻的认识相符合。

就像人们区别天真的孩子与健康的小伙子那样，真正的理想主义是怎样地符合实际，并且与随随便便的空幻梦想没有什么关联马上就能够分辨出来。同样一个无法理解“崇高”的和平主义者长篇大论并对此表示拒绝的年轻人会准备着为了人类的理想而奉献出年轻的生命。

这就无意间顺从了认识到应该更加强烈地维护自我生存的本能，如有必要则要以牺牲个人为代价，并且还要抗议实际上经过美化的、但却是违反自然发展规律的、胆怯的自私鬼的和平主义的胡言乱语的空想，因为这是以有益于全体而牺牲个人的精神为前提的，而不是根据自以为是胆小鬼和天生的批评家的病态的假设。

正是在理想主义的观念恐怕要消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很快地认识到大家所建立起来的为了创造文明先决条件的力量的下降。而一旦利己主义主宰了人类的思想，社会秩序就会变得毫无拘束，人人都只是唯利是图，这时的人类可真要从天堂堕入到地狱里去了。

是的，我们的后人会忘记那些只为自己谋求利益的人，而会赞颂放弃自我享乐的英雄。

雅利安人最大的对立面就是犹太人。世界上几乎还没有那个民族维护自我生存的本能像他们那样甚至发展得比那些所谓优秀的民族还要

强大。仅就他们这个民族还存在着这一简单的事实就是最好的证明了。世界上有哪个民族像犹太民族那样在近二千年来其内心的天赋等等性格特征很少有变化的吗？世界上又有哪个民族最终会像他们一样经历过巨大的变革并且还总是能从最为惨痛的浩劫中展现出其原始特性的？这种为了生存和维护民族特性的坚强决心从这些事实中得到了怎样地体现！犹太人的聪明才智千百年来得到了锻炼。他们现在被看作是“聪明”的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将会一直如此。但是他们的智力并不是其自身发展的结果，而是由于其它民族教育的影响。即使是人类的思想也不能够突然一下子就达到顶峰的，它需要在过去的基础上掌握以往的知识并且要一步一步地向前发展，就像一般的文明所表现的那样。所有的思想只有很少部分是来自自己的认识，大部分是建立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的。人们通常都没有注意到每个人都能够达到一定的文明程度，在此基础上人们自己会很容易地继续取得进步。比如今天的年轻人是在上个世纪技术成果大量积累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所以很多在一百年前对于许多伟大的思想家们还是不解之谜的东西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则理所当然不足为奇的了，尽管研究和理解人类所涉及领域的进步对于他们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要是一位上个世纪二十岁聪明的年轻人现在离开坟墓的话，那么以他的思维方式在今天这个时代就会感到困惑的，就像现在一个十五岁小孩子的一般的智力水平那样。因为对于他来说缺乏所有当代人在其生长过程中从普通的文化中不知不觉所汲取的基础知识。

而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犹太人从来就没有自己的文明，其精神思想的基础也基本上来自其它民族。他们的聪明才智一直以来也都是因为周围国家的文明所发展起来的。

可犹太人却从来没有为别的民族有所贡献。

因为即使犹太人的生存本能不是很弱，甚至还要比其它民族强盛，即使其思维能力很容易得到启发，那他们在智力方面的才能也会和其它民族没有什么两样，这是因为他们完全缺乏一个文明民族最为重要的前提，即理想主义思想。

可是自我牺牲精神并没有在犹太人中间从他们那种赤裸裸维护个人自我生存的本能中涌现出来。就像地球上的其它生物一样，很显然是非常密切的群体关系造就了最为原始的群体生存本能。值得注意的是事实上这种群体生存本能始终只是导致了长时间的相互帮助，而没有故意或者不可避免地形成一种危险的整体。就像群狼那样，它们就是要共同突然发起攻击，把注意力再次转移到唯一的猎物上去，好让饥饿的感觉有所减轻。这也就像马一样，它们围成一团来抵抗攻击，以便在战胜危险后又四散逃离。

与此相似的就是犹太人的举止行为。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只是徒有其表。只有当个人生存迫切需要自我牺牲精神的时候，它才会出现。而一旦共同的敌人被战胜，所有威胁性的危险消除了，抢劫看不见了，表面上犹太人彼此间的和睦结束了，并且原本存在的本性就又表现出来了。要么被迫面对共同的危难，要么被同一块鱼饵所吸引，只有在这两种情况下犹太人才会团结，所以，除了以上两种情况，他们性格的主要特征就是极其自私自利的，因此转眼间他们这些人就会变成一群拼死相争的老鼠。

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犹太人自己的话，只要是完全缺乏自我牺牲精神的胆怯还不把这场争斗当成儿戏，那他们同样也会在龌龊和垃圾中相互之间试图为了欺诈和彻底消灭对方而进行争斗。

犹太人在战斗中与其说是并肩团结，还不如说是相互洗劫，而由此得出他们还具有一些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结论的话，那可就完全错误了。

这只能说明犹太人是赤裸裸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而不是别的什么。

因此一个起到维护和繁衍民族作用的犹太国家在领土疆域上也是完全没有边际的。因为一个有着固定边界的国家总是要以其民族所具备的理想主义精神为存在的前提，特别是对劳动这个概念的正确理解。如果在这个方面缺乏这种认识的话，那就会动摇建立和保护国家的任何尝试。因此也就失去了能够产生文明的基础。

因此犹太民族尽管表面上具有聪明智慧的特性，然而却没有真正的文明，尤其是没有自己的文明。因为犹太人现在手中所掌握的虚假文明大都是其它民族已经腐烂的东西。

对于判断犹太民族在人类文明中地位的问题应该向人们说明的最为本质的特征就是从来就没有什么犹太民族的艺术，不仅在过去，即使现在也没有，特别是在所有艺术中最为辉煌的两个方面，建筑和音乐方面更没有什么东西值得要感谢犹太人的了。而在艺术方面所做的除了弄巧成拙就是剽窃知识。因此犹太人是一个缺乏创造力和文明天赋特性的民族。

犹太人很喜欢仿效，甚至堕落到接受外来文化，结果就产生出他们通常至少也是按照自己的感觉认为是艺术的表演艺术。而实际上他们也不过是“杂耍艺人”，或者是些耍猴儿的，因此他们自己没有真正闻名的成功之作，他们本身也不是天才的艺术塑造者，不过是表面上的模仿者而已，况且同时所用的一切花招和窍门也无法掩饰其内心的呆滞。对此只有犹太人的新闻机构倒是可以以最体贴的方式帮一些忙，他们对每一个，那怕也不过是很一般的半瓶子醋，但只要他是犹太人就热烈地给予欢呼，好让其他人最后真地会误以为这是一位艺术家，而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一个可怜的骗子罢了。

不，犹太人是没有任何一种艺术创造力的，因为没有理想主义就没有真正的人类进步，而犹太人不仅过去，而且现在也都从来就没有过理想主义。所以犹太人的智力从来就没有创造的作用，而只有破坏的作用，顶多只有在极少情况下也许会受到些鼓励，因为这总会成为“恶所欲，善所为”力量的原型。不是因为有了犹太人人类才无法取得进步，而正是因为有了他们。

由于犹太人从来就没有一个有固定疆域的国家，所以也就从来没有自己的文明，这就产生出一种假象，好像可以把他们算作游牧民族。但这却是一个严重和危险的错误。游牧民族也许没有固定的生活空间，

他们不仅不像定居的农民那样进行耕种，而且是靠他们游历范围内大家所获得的收成生活。表面上的原因是土地收成少得简直无法允许定居。但更深层的原因却是一个时代或者是一个民族的技术文明与生活环境的自然贫困之间的不相协调。在有些地区雅利安人只通过自己千百年来所发展的技术能够在广袤的土地上成为整个聚居区域的主人并且还能够让土地来满足自己的生活所需。如果雅利安人不掌握技术，那么他们就非得要么离开这个地方，要么就像游牧民族那样忍受长期迁徙生活的煎熬，但前提是千百年来所受到的教育和习惯没有让他们对这种生活显得简直无法忍受。要知道在开发美洲大陆的时候也有无数的雅利安人为了自己的生计干一些挖陷阱、捕猎等等的事情，有时还经常带着老婆孩子到处搬家，其实他们的生活和游牧民族也没有什么完全的不同。一旦他们人口数量增加并且具备了更加完备的生活手段可以去开垦荒地和抵御原著居民，那么他们就会在此地迅速扩大定居人数。

起初雅利安人大概也都是游牧民族，以后才慢慢定居下来，但仅此这一点上看他们也绝不是犹太人！不，犹太人不是游牧民族，因为即使是游牧民族，那么他们也会对“劳动”这个概念持有一定的立场，只要具备必要的精神条件，这就可以作为日后发展的基础。而理想主义的根本观念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淡漠的，因此他们的本性在雅利安人看来也许会感到陌生，但也并不是没有好感。而与此相反的是犹太人却完全不这样认为，所以他们也就不是游牧民族，而只是依靠其它民族生活的寄生虫。犹太人从客居他乡遭受蹂躏的人们那里渐渐地得知，他们有时之所以离开至今所生活的地方并不是完全出于自己的本意，而是被驱逐的结果。犹太人自己流落四方就是典型的寄生虫的表现，他们总是在寻找自己民族生长的温床。

因此，这些现象和游牧民族没有什么关系，因为犹太人根本就不会想到要再次离开他们所占据的地方，而只是呆在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并且还赖在一个地方甚至连使用武力都难以驱赶。他们总是向新的地方不断地扩散蔓延是因为在当地提供了某种适宜他们生存的条件，就像游牧民族那样没有受到在现有居住地区那样的阻碍。他们永远就是寄生虫，

一个由舒适的温床润育着的、不断地传播着有害病菌的寄生虫。他们的存在作用就像是寄生虫那样，在他们出现的地方，迟早会让原住民灭绝。

犹太人就这样一直生活在其它民族的国家里，并且还在那里建起了国中之国，虽然常常总是披着“宗教团体”的外衣，可是从表面上看却完全无法揭示其本质。他们十分确信，为了时常要想到受到保护，他们就总是躲在面纱的后面，所以犹太人就一下子突然变成了连许多人从前都不愿意相信和不愿意看到的样子。

犹太人在其它国家和民族中间寄生虫般生存的一个特征就像是叔本华以前已经道出的缘由那样：犹太人是撒谎的行家。他们要生存就得撒谎，而且还要不断地撒谎，就像北方人不得不需要暖和的衣物那样。

犹太人之所以能够继续生活在其它民族中间，只是因为能够让别人认为他们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种特别的“宗教团体”。

但这是一个极大的谎言。

犹太人为了能够作为寄生虫生存下去，就不得不违背其内心的本性。每个犹太人越聪明，那么这种欺骗就越奏效。是的，这最终可以让大部分原住民确切地相信只要他们没有什么特殊的宗教信仰，犹太人就真的是一个法国人或是英国人、一个德国人或是意大利人。特别是一些好像被历史的某个时期得到启发的政府部门就很容易成为这种无耻欺骗的牺牲品。这种独特的思想在一定范围内有时真的可以视为一种违背神圣繁育的罪行，比如一个巴伐利亚政府部门如果直到今天还不知道犹太人是一个民族，而不是一个“宗教团体”的话，尽管只要看一些犹太人的报刊就会让这些最为纯洁的心灵立刻明白这一切，那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这些“犹太人的回应”还不是官方文章，因为像这样政府权贵的理解是起不到什么决定作用的。

犹太民族一直就是一个带有一定种族特征的民族并且从来就不是一种宗教，只不过他们的繁衍则让他们提前去寻找一种他们四处分散而不情愿受到注意的办法。还有什么样的办法会比安插在宗教团体中更实用同时也更无耻的呢？因为犹太人缺乏任何一种形式的理想主义意识

并且因此也就完全不会相信来世了，所以也就可以从其自己的本意来讲不用有什么宗教机构，也就可以进行挪用，更确切地说是盗用所有的东西了。按照雅利安人的观点对于任何一种缺少信仰死后继续存在的宗教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犹太法典也不是一本宣扬前生来世的书，而只是在宣扬现世世界里普通实际生活的书。

首先，犹太教义是一种纯化犹太民族血统以及犹太人彼此之间，更多地还有和其他人，也就是非犹太人进行交往规则的指导性说明。但是它绝不涉及伦理方面的问题，而只是特别简单的经济方面的内容。关于犹太教义的道德价值观过去和现在一直都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但不是犹太人所进行的，犹太人自己对此的胡说八道当然就很适用），按照雅利安人的理解像这样的宗教看起来简直就太可怕了。这种宗教传播结果最好的标志就是犹太人自己本身。他们（犹太人）的精神对于这个世界和真正的基督教信仰来说在心灵上是难以接受的，他们的生活环境以及他们的本性依旧和两千年前宗教创始人时期一样。当然宗教创始人不会向犹太人隐瞒他的观点，必要的时候甚至还拿着鞭子将在那个时候就把宗教只看作是一种经商手段的这些人类的敌人赶出了圣殿。耶稣就是因此而被钉在了十字架上的。而我们今天信奉基督教的政党在选举的时候却屈尊迁就乞求犹太人的选票并且以后和那些不信奉上帝的犹太政党寻求联合搞政治投机，而反对的却是自己的人民。

犹太人不是民族而是一种宗教是第一个，也是最大的谎言，但不可避免地还要继续制造谎言。其中就有涉及到犹太语言的谎言。犹太人的语言不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而是用来掩饰他们自己的手段。他们在讲法语的时候，用的是犹太人的思维方式，他们在推敲德文诗句的同时，完全展现的倒是犹太人的本性。

只要犹太人还没有成为其它民族的主人，他们好歹还得讲别人的语言，而一旦其它民族成为他们的奴隶，那么所有人都要学着讲同一种世界性的语言，（比如世界语！），通过这种手段犹太人能够很容易地统治其他人！正如这个民族的存在是建立在连续不断的谎言之上一样，再也没有东西比起《锡安长老会纪要》更让犹太人显示出无比仇恨的了。这

些应该都是伪造的，却一再让《法兰克福日报》向全世界透露了出来：对此最好的证据就是这些纪要是真的。许多犹太人无意间做的事情，在这里却故意给讲明了。重要的是不论这些东西是从哪一个犹太人的脑袋里冒出来的，结果都会是一样的，关键起决定作用的是，这正好用可怕的保证揭开了犹太人的本质和行径，并且阐明了他们的内在联系和最终目标。对此进行的评判是真实的。谁要是能从这本书的立场观点出发去审视近百年来历史发展进程，那么他就会立刻明白犹太人的新闻里所极力鼓吹的那些东西了。因为只有当这本书成为广大民众共同的精神财富，犹太人的危害才会不攻自破。

想要了解犹太人最好是研究他们在其它民族中间生活了几百年的经历。为了得到充分的认识，这样足可以只作为一个方面的事例来进行追寻。因为犹太人的成长过程总是并且一直和他们所吞噬民族的情形相同，所以很适合在对其发展过程进行观察的时候为简单起见分阶段来做描述。

首批犹太人是在日耳曼人向罗马人大举进攻之后到来的，而且一向都是作为商人出现的。在移民的浪潮中显然他们又再次地消失了，所以，这就可以把当初日耳曼人建立国家的时期看作是中欧和北欧新一轮并且是保留至今犹太化的开端。而其发展的开始则总是或差不多是在某个地方当犹太人向雅利安人发起攻击的时候。

(一) 随着最初固定居住区的建立犹太人突然“出现”了。开始他们是作为商人而来并且也没有刻意要掩饰自己。他们还是犹太人，也许一部分就是这样，因为他们和当地居民表面上的种族差别太大了，他们的语言方面的知识还很少，当地居民的封闭性还很强烈，所以他们斗胆想要装出不同于外来商人的其它样子。而对于当地居民的适应能力和孤陋寡闻来说，他们作为犹太人保留自己的特点并不意味着就是缺点，而更多地倒是一个优点，人们对于外来民族还是友好相待的。

(二) 渐渐地他们开始逐步从事经济活动，但不是作为制造者，而

是专门作为中间商。千百年来他们都精明地进行着商业活动但却还是那么地迟钝，尤其不像最诚实的雅利安人那样思维开阔，以至于其商业垄断地位不久就会受到威胁。

他们开始发放贷款，而且还都是高利贷。实际上他们也是借此赚钱。这种新的行当的危险性暂时没有得到认识，甚至还因为眼前的利益而受到欢迎。

(三) 犹太人完全定居了下来，就是说他们居住在城镇或是居民区里慢慢形成国中之国。他们肆无忌惮地利用自己的优势来经商和现金交易。

(四) 经商和现金交易逐步被他们所垄断。他们的高利贷最终令人反感，他们不断增长的狂妄激起愤恨，他们的财富受到妒忌。当他们把耕地和地皮也划入到商业买卖的范围里，并且使其贬低到可以进行买卖或者说可以交易的商品时则就做得太过分了。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种过地，而只是把土地看作是一种可以诈取油水的商品，可依靠土地生活的农民本来是很幸福的，只是因为受到现在这位主人痛苦的剥削才让农民对他们从厌恶变成公开的仇恨。他们吸血鬼般的残暴直至引起反对犹太人的骚乱。人们开始仔细观察这些外来的陌生人，并且总能从这些人身上发现新的令人生厌的特性和本质，直到彼此间的鸿沟再也无法填平。

愤怒终于在最为艰苦的时候爆发了，为了忍受上帝的惩罚，这些一贫如洗、面临毁灭的人们采取了自我救助的行动。几百年来人们终于认清了犹太人，并认为他们的存在就如同瘟疫一样危险。

(五) 现在犹太人开始揭示他们真实的本质了。他们通过令人作呕的阿谀奉承去接近政府官员，让金钱去发挥作用，并通过这种方式确保能够再次去劫掠别人的特权。即使有时人们反对这些没完没了地吸血的蚂蟥的怒火熊熊燃烧着，却对这些犹太人没有丝毫的阻碍，几年后他们又会在几乎快要离开的地方重新出现，又会重新开始原来的生活。没有什么可以迫使他们改掉剥削人的习性，没有什么可以赶走他们，在发生

一些事件之后不久他们就又会回来，而且还是老样子。

为了至少能够避免最让人愤怒事情的发生，人们开始把土地从这些高利贷商人手中收回，同时使他们不可能合法地购买土地。

（六）在亲王们的权力开始增加的时候，犹太人则蜂拥而至。他们愿意从那些总是身处财政困难的老爷们那里花钱得到所乞求的“特权”和“优惠”。几年后再把他们所花的钱连本带息、利上加利地收回来。他们可真是一群附着在不幸的人民身上并且还无法去掉的吸血的蚂蟥，直到亲王们自己又需要钱的时候，犹太人自己亲自把从人民身上所吸的血再放出去。

这样的把戏一再重演，而在这其中那些所谓的“德意志帝国的亲王们”和犹太人本身所扮演的角色同样卑鄙可耻。他们才是上帝派来真正惩罚人民的老爷，而现在各种政府机构的部长大人们就和他们是一样的。

德意志民族还没有能够最终摆脱犹太人的威胁，这要感谢那些德意志帝国的亲王们。很可惜这样的情况在以后也没有什么改变，因为正是他们从犹太人赚取的上千倍的利润那里分到了用来赎回从前对德意志民族所犯下罪行的酬金。他们与魔鬼结盟并与其相伴。

（七）就这样对亲王们的笼络导致了他们的堕落。他们渐渐地，但是肯定会松懈于支持民众的立场并且停止为民族利益而尽心尽责，取而代之的则是成为了只想着从其臣民那里捞到好处。犹太人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们的目的所在并且寻找一切可能加快进行实施。犹太人会资助亲王们时常所遇到的财政困难而让他们一再疏远自己真正的职责，用最恶心的方式在亲王们的周围溜须拍马、阿谀奉承、勾引他们坏事做尽，并且还越来越由此使自己成为不可缺少的人物。犹太人的精明强干，特别是在所有现金交易方面肆无忌惮的做法让人明白了要不断地从已经被洗劫一空的、不久就会即将离开人世的臣民那里进行榨取，是的，牟取新的钱财。所以在每个宫廷里都会有人们称之为怪物的、让人民痛苦地感到失望并让亲王们感到永远快乐的“宫廷犹太人”。这些人面兽心的家

伙最后连外表也都装扮起来并且最后还飞黄腾达到可以世袭贵族地位的程度，这样不仅会受到嘲笑，而且甚至还会遭到毒害，而谁又会对此感到惊奇呢？现在他们能够理所当然地利用自己的地位来做些有利于其种族繁衍的事情了。

为了有可能和有权利能够自己拥有孩子，他们最终接受进行洗礼。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取悦于教会，而是为了得到孩子，为了犹太民族，为了进行欺骗。

（八）犹太人开始进行迁徙。他们至今是犹太人，也就是说人们没有注意到他们有什么其它表现，并且无法认识到给人如此印象深刻的种族特征的两面性。早在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没有人会想到把犹太人看成是“外来”民族，而且歌德还对今后在法律上应该不再禁止基督徒和犹太人之间婚姻的想法感到吃惊。上帝啊！歌德可不是落后的，也完全不是宗教狂热分子，他所说的无异于天性和理智所发出的声音。所以不管宫廷里的行为多么的无耻，人们仍然会本能地看出犹太人是寄生在他们身上的异物，并且也是这样看待他们的。

但现在却是另外一种情形。千百年来犹太人学会了掌握其它民族的语言，并且相信能够敢于在今后要少一点突出其犹太民族的本性，而要更多地表现出其“德意志民族”的特点，这显得多么的可笑和滑稽，他们竟然放肆到要变成“日尔曼人”，也就是“德意志人”。因此就会使人想到这是一种无耻的欺骗。因为犹太人确实没有什么德意志民族的特点，比如说艺术，他们讲话也很糟糕，总是磕磕巴巴的，另外光是靠语言来体现整个德意志民族的特点也绝不会有人和他们混为一谈的。种族的特点不是在语言里，而主要是在血液中，没有人能够像犹太人那样清楚地知道这些，所以他们在维护自己语言的纯洁上不会花很大气力，而是把精力投在保持血统的纯正方面。一个人可以在不改变其它条件的情况下改变自己的语言，也就是说他可以利用这种变化，只不过他在使用新的语言来表达他原有的想法，他的内在本质却没有变化。这一点在犹太人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可以讲上千种语言而本身始终还是一个犹太人。他们的本质特征因此保留了下来，所以他们能够在两千年前作

为谷物商人讲东罗马的语言，就像现在作为面粉投机商还会讲犹太德语一样。但他们同样都是犹太人。像这样显而易见的事情现在竟连那些部里面的处长或是更高一级的警官都不了解，所以今天这些反应迟钝和愚昧无知的人则难以作为服务于我们国家尊严的榜样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为什么犹太人忽然决定要成为“德国人”的原因是很明显的。就像亲王们的权力日益陷入动摇不定的境地一样，犹太人因此要提前寻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但随着犹太人在整个经济中资金控制方面的不断壮大，没有获得应有“公民”权益他们就无法继续支撑起整个庞大的经济实体，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开始增加对他们的干扰。而这两点他们都希望得到，因为他们爬得越高，他们原来的、以前曾经昭示过他们的目标就会从过去的面纱后越发诱人地显露出来，他们聪明的大脑极其贪婪地看到了近在咫尺的统治世界的梦想。唯一所要争取就是要完全拥有“公民”权利。

这就是要从犹太人居住区里解放出来的原因。

(九) 就这样他们从宫廷犹太人慢慢地变成了犹太民族，这当然也就是说：犹太人和以前一样是高贵主人身边的人，是的，他们还试图让更多的人进入到这个圈子里，同时他们还有一部分人在讨好可爱的当地居民。要是人们想起几百年来犹太人所犯下怎样的罪行，是如何不断残酷地进行剥削和榨取的，要是人们还能想到人们是怎样地开始逐渐地对他们产生仇恨，结果把他们的存在真地视为上天对其它民族的惩罚，那么人们就会理解这种转变对于犹太人来说想必是多么的困难。是的，把剥了皮的祭品一下子要说成是“人类的朋友”的确是一件不好干的活儿。

犹太人还需要要把他们对人们所干的坏事重新装扮成好事。他们开始变成为了人类中“乐善好施”的人。因为他们新的好意是有自己真正原因的，他们也不能按照圣经上所说的那样去做：当你施舍的时候，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而且好歹他们还要勉强让许多人都知道他们是如何感觉到人们的苦难并且他们自己对此做出了怎样的牺牲。以犹太人天生所具备的谦逊和质朴，他们向别人大肆鼓吹他们的功绩，直到其他

人真地开始相信。谁要是不相信，就被视为是极不公正的。不久他们就已经开始歪曲事实，就好像直到现在只有犹太人才总是遭到了不公而不是相反。尤其是那些蠢货们相信并且也就只能同情这些可怜的“不幸的人”了。

另外还值得注意的是犹太人自己当然不会因为这些乐于牺牲的精神而变穷的。他们已经懂得进行合理分配，是的，有时他们的善举事实上只不过像不是出于爱心才撒在田里的肥料一样，而是为了日后收获的喜悦。但绝对会在相当短的时间里让所有人知道犹太人变成了“善人和人类的朋友”。多么奇特的变化！对其他人多多少少所起到的明显作用就是让人吃惊地感到许多人称赞的东西在犹太人看来则不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许多在犹太人高度评价的行为也不过是人类普遍的特性而已。

另外还有：犹太人想要一下子自由并且开始向往人类必然的进步。慢慢地犹太人自己就成了新时代的代言人。

当然犹太人还会更加全面地破坏国民经济真正的基础。通过股份的形式犹太人进入了国民经济生产体系中，并使其成为商业性的，确切地说是可以买卖的唯利是图的交易，并因此而盗取企业中个人持有的原始资产。这样才发生了雇主和雇员之间的疏远，并由此导致了以后的阶级分裂。

但最后犹太人在经济利益方面所施加的影响如今在交易所方面迅速增长。他们成为了国家劳动力的所有者或者是监督员。

为了增强政治方面的安全感，犹太人还试图打破处处制约他们的种族和公民限制。要达到这个目的犹太人以自己的坚忍不拔为宗教宽容而抗争，并且他们完全失败的共济会组织总会有捍卫和达到他们目的绝好办法。市民阶层中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当权者和高级人士在不需要知情的情况下受到共济会的操纵。

只有当民众形成或者超越了思想清晰并且能够自己为权益和自由而战的阶层才不足以算作是较为低级和普通的社会阶层。这一点比其它所有的一切都是不可缺少的，因为犹太人感到要提升统治地位只有当他们前面有一个他们以为能够是在市民阶层中，而且还是在最普通的大众阶层里认识的“开路先锋”才成为可能。但是共济会不会只简单地去网

罗做手套的和织亚麻布的工人，而对此要使用一些更加残忍，至少不是不强烈的手段。所以共济会有了第二件服务犹太人的武器：新闻界。他们以其所有的坚忍不拔和精明强干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事业中。他们渐渐开始纠缠着、迷惑着、引导着和左右着整个公众生活，因为他们能够做到去制造和操纵每一项人们现在比几十年前更清楚地认识到被称为“公众舆论”的权力。

同时他们总把自己装成非常渴望知识的样子，称赞每一项人类的进步，当然大部分是称赞使别人堕落的进步，因为犹太人对知识和人类进步总是只按照能否推动犹太民族的标准来进行判断的，如果缺少这一点的话，那他们就是天才无情的死敌，就是真正艺术的仇人。所以犹太人利用一切他们在别人学校里学到的知识来为自己的民族服务。

犹太人以前从未隐瞒过这一特点。当犹太人耳边充满了“启蒙”、“进步”、“自由”、“人性”等等观念的时候，他们自己却实行严格的种族隔离政策。也许犹太妇女有时会 and 信仰基督教的男士有些交往，犹太人却总是基本上保持男性家族的纯洁。他们毒害其它民族的血液，却保持自己血统的纯正。犹太人男人几乎不和信奉基督教的女人结婚，而往往总是男性基督徒和犹太女人结婚。这些杂种（混血儿）因此就偏向犹太人一边。尤其是一部分上层贵族也完全堕落了。犹太人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并且因此有计划地推行这种“瓦解”他们民族敌人的领导阶层精神思想的做法。为了掩饰其行为和麻痹受害人，他们总是大谈特谈什么人类的平等，不要考虑什么种族和肤色。那些愚蠢的人们则开始相信了他们。

由于犹太人的整个性格特征总是和外来民族自身的声誉密切相关的，而且尤其是当广大民众不再相信他们所编造的荒诞故事时，他们就通过新闻界塑造出一个很少符合事实但相反却有利于其所追寻目标的形象。在漫画刊物中人们特别想把犹太人描绘成一个善良的民族，一个和其它民族一样有特点的民族，也许他们的行为举止让人感到有些陌生，可能还有些令人奇怪的表现，但总还是有诚实和善良的心灵的。人们是多么地想要让犹太人尽量显得无足轻重，而不是危险可怕的。

他们在这个阶段的最终目的是取得民主的胜利，正如他们所理解

的：议会制的统治地位。这非常符合他们的需要，这可以隐藏起他们的个性，用愚蠢的、无能的、而最根本还是胆怯的大多数来取而代之。

结果就是迟早都要发生的君主制的垮台。

（十）经济上的快速发展导致社会阶层的变化。这使得小手工制作业逐渐消亡并且工人获得独立生存的可能性也变得越来越少，很快就成为了无产阶级。这样就产生出了工业化所制造的“产业工人”，而实际上是他们在今后几乎无法自谋生路。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一无所有，他们的晚年将痛苦不堪并且几乎谈不上有什么生活而言。

以前也曾经有过类似迫切需要，并且的确也找到了解决办法的情形。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还逐渐变成了国家官员和政府雇员。虽然他们还是真正意义上的一无所有。由于这种不良状况的原因国家最终找出了一项补救措施，即国家对无法保障晚年生活的国家公职人员承担抚养费用并实行退休金和养老金制度。许多私有企业也逐渐地实行这样的办法，以致今天几乎每个正式公职人员都可以领取到养老金，只要这个企业已经达到或者超出一定的规模。而且对国家官员养老制度的保障才能够进行大公无私的忠于职守的教育，而这正是战争前德国官员最为高尚的特点。

所以，一个一无所有的社会阶层会巧妙地摆脱社会贫困而融入到全体人民当中去了。

而现在这样的情形又再次出现，并且这次以更大的规模向我们国家和民族逼近。不断有新的、数以百万计的人群从农村移居到大城市，为的是在新建的工厂里当一名产业工人以谋生路。而这些人工作和生活状况极其悲惨。仅仅通过机械来替代手工业者或者农民以往的工作方式或多或少就和新的生产方式很不相称。这个人或是那个人以前所从事的工作已经无法和现在的一个工业化所制造的产业工人所承受的紧张劳动相提并论了。时间对于从前的手工业来说也许不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新型的工作方式上则起到更加关键的作用。采用过去的工作时间方式对于现在的大型工业企业来说则是灾难性的，由于缺乏现在高效的工作方式所以过去的工作效率很低。如果人们还能够忍受从前每天十四或十

五小时工作时间的話，那他肯定无法忍受像这样每时每刻都被完全榨取的一天。而实际上将过去的工作时间挪用到现代新型工业的作息上是毫无意义的，而且其结果也会在两个方面造成不幸：健康将被毁掉，对权益的信仰也将破灭。而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是少得可怜的工钱，但另一方面与此相对照的则是雇主明显优越的地位。

在农村还不能形成社会问题，因为主人和奴仆干着同样的活儿，尤其还吃着一锅饭。但这也在起着变化。

涉及到生活各个方面的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分离现在看起来已经发生了。与此同时我们民族内部的犹太化发展到了何等的地步，从人们对手工业很少重视，或许已经是轻视的程度上就能够看得出来。而在德国还不是这样。首先是我们的生活开始变得罗曼国家化，而实际上这就是犹太化以某种对体力劳动的蔑视完全改变了从前对手工业的尊重。

所以，实际上就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很少受到注意的社会阶层。总有一天必然会出现一个问题，我们国家是否有能力让这个新兴阶层自己重新融入到普通社会中去，还是把阶层间的差别扩大为阶级式的鸿沟。

有一点是肯定的：新兴阶层在其队伍中没有坏分子，相反绝对有最为精力充沛的人。所谓文化的纯洁还没有在此起到分解和破坏作用。在广大民众中这个阶层还没有让和平主义怯懦的流毒所感染，而且还依旧健壮，在必要的时候也是残酷的。

当市民阶层对如此重大的问题完全漠不关心，而是任由事态发展的时候，犹太人却抓住了这无法估量、大有前途的时机，他们一方面通过资本主义的方式进行彻底的剥削，一面又巴结受他们的精神和支配所毒害的人，并在短期内就已经成为了针对自身斗争的领导人了。当然这也就是形象的比喻为“针对自身”，因为对于撒谎的行家则应该理解为总让自己表现得是无辜的样子，而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由于他们无耻地诱导广大民众而无法使人想到这是有史以来最卑鄙的谎言。

事实本来就是如此。

而新兴的阶层几乎无法在众所周知的经济变革中有所发展，犹太人就已经清晰而明了地看到了为他们自己繁衍出新的开路先锋。犹太人先

是利用市民阶层反对封建贵族去冲锋陷阵，现在则利用工人去反抗市民阶层。从前他们知道隐藏在市民阶层中去骗取市民的权利，而现在他们则希望在与工人的斗争中为了自己的生存去寻找自己进行统治的出路。

从现在起工人则多出了一项为了犹太民族的未来而奋斗的任务。工人们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服务于自己误以为应当反对的政权。表面上是让他们去和资本做斗争并且还是很轻易地让他们只为资本去做斗争。人们开始反对国际资本而实际上针对的却是国民经济。而摧毁了国民经济才能够在其废墟上取得建立国际交易所的胜利。

犹太人所采取行动的过程是这样的：他们讨好工人，假装同情工人的命运或对工人贫困的不幸表示愤怒，借此来赢得工人们的信赖。他们努力地去研究实际存在的或者想象中的工人生活的所有内容，从而唤起改变生活状况的愿望。犹太人用一种极为巧妙的手段把雅利安人心中所蕴藏的对社会公平的要求提升为针对受到幸运眷顾之人的仇恨并且还赋予消除社会不良行为的斗争以世界观式的特征。于是犹太人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犹太人把所有一系列的社会合理要求和马克思主义学说混为一谈，他们推动其学说的传播就如同反而要求去憎恶正当的人性那样，就其形式以及相关的表现来看要遵守这样的要求从一开始就是不合理的，也是无法实现的。

因为，在其纯粹社会合理要求外衣的庇护下隐藏的却是恶魔般的伎俩，是的，而且竟然还恬不知耻地公之于众。这个学说将人性的理智和癫狂相互混淆，但却总要把疯狂，而不是理性变为现实。断然否定人性，进而否定民族和种族的内涵则摧毁了整个与此相关的人类文明的基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真正的核心所在，如果人们还把这种罪恶思想的怪物称其为“世界观”的话。对人性和种族的毁灭则失去了劣等民族，也就是犹太民族统治最为关键的障碍。

正是在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的荒谬才是这个学说的本意。因为如此荒谬的学说阻碍了真正的有识之士去行使他们的职责，而同时让那些智力低下、经济状况糟糕、缺乏教养的人急忙公开地站了出来。犹太人为了运动将知识分子从自己的行列里给“舍弃”掉了，尽管这场运动也需

要知识分子参加。

所以就形成了由犹太人领导的纯粹手工业者的运动，表面上是出于要改善工人的处境，可实际上却是有意要奴役和消灭非犹太民族的人民。

共济会在所谓知识分子阶层对维护国家生存本能方面所起到的和平主义麻痹作用，如今则一再通过犹太新闻大规模的活动向广大民众，尤其是市民阶层在进行传播。除了这两种分化瓦解的武器外，第三件武器则是最为可怕的暴力组织。前面两种武器所起到的消耗作用就已经准备好最后要让马克思主义作为进攻和冲锋部队来发挥其摧毁性的效力。

而与此相对应的恰恰是那些或多或少总还是很愿意作为传说中代表国家尊严的组织机构反而会常常发挥不了作用的时候，那实际上才是一场相当出色的默契配合，所以人们也就真的不必感到惊奇了。在我们国家高级和最高层官员中犹太人已经找到了随时（除了少数例外）都愿意服从其分化瓦解活动的人。卑躬屈膝低三下四地向“上”和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地向“下”刻划出这些官员们同样是出于一种有时远远超出极为傲慢的“令人发指的头脑狭隘目光短浅”。

而这正是犹太人所需要和所喜欢的我们政府机构所应有的特性。

现在所进行斗争的实际经过大致是这样的：犹太人斗争的最终目标并不只消耗在征服世界经济方面，而且还要求在政治上去进行奴役，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学说的组织构成分为看似彼此分离，而实际上却又组成不可分离的整体的两个部分：政治运动和工会运动。

工会运动是可以进行宣传推广的。它可以向处在艰苦的、由于许多雇主的贪婪和短见所导致的生存斗争环境中的工人提供帮助和保护并且因此去争取更加美好生活条件的可能。当一个有组织的民族共和体，也就是国家对工人却毫不关心，还要受不仅是一部分缺乏责任心盲目专横的，而且还常常是一些冷酷无情之人的摆布，那么工人想要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利，就必须把捍卫自己的这种权利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现在国内那些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让金钱给迷惑得神魂颠倒而对工人为生存所进行的斗争多方设置阻碍，所有为缩短不人道的工作时间、废止使用童工、保障和保护妇女权益、改善工厂和住房的卫生条件

所进行的尝试他们不但反对，并且实际上还经常进行破坏，而那些更为狡猾的犹太人却尽力照顾这些被压迫的人们。就这样犹太人渐渐成为了工会运动的领导人，而这样比起他们不在真正意义上消除社会不良行为来说，则更加轻易地去造就一支盲目服从犹太人的、从经济上能够摧毁独立的国民经济的战斗队。因为要继续保持对一项健康的社会福利政策的领导要坚持两项原则，即一方面要维护民众的健康成长，另一方面要保障国民经济的独立性，而对于犹太人来说不仅只是不包括，而且他们斗争的目的是要消除这两方面的原则。他们并不期待去维护，而是要消除独立的国民经济。正因为如此犹太人作为工会运动的领导人提出制定更高目标的要求，而且实际上要么是不可能完成的目标，要么是意味着去毁灭国民经济的目标，这样才丝毫不会受到良心上的谴责。犹太人想要的不是健康的、能讲话的民族，而是一群腐朽的、能够被奴役的乌合之众。这样的愿望让犹太人一再地提出最毫无意义的、实际上连他们自己也知道不可能实现的、因而也是完全无法改变的要求却在最大程度上造成了广大民众的精神混乱。这就是他们所要做的事情，而不是真正和实际上去改善他们的社会地位。

所以，犹太人在工会事务方面的领导工作是没有开创性的，因为没有作为一项大规模的启蒙工作对广大民众产生影响，但却改变了原以为永远都无法结束痛苦的看法，要不然就是国家战胜了犹太人完成了使命。因为只要广大民众的理解力依然像现在一样低，而国家还像今天这样冷漠无情，那么在经济事务方面民众将永远是由于可耻的失言而被出卖的第一个人。而犹太人对此则是行家，他们所有的行为从来就不受道德观念的约束。

所以，在此领域里犹太人必然会在短期内将任何一个竞争者给赶出去。出于内心贪婪残酷的本性，犹太人在进行工会运动的同时，也做好了使用暴力的准备。谁要是识破了犹太人的骗局，那么他的对抗和认识都会受到恐怖的打击，而这样的行动还是极为有效的。

事实上，犹太人是借助于对于国家如同赐福一般的工会组织来破坏国民经济的基础。

而政治组织也同样有所发展。

政治组织之所以配合工会运动是因为广大民众把工会组织当作是为政治组织而准备的，是的，他们就是被迫给赶进来的。另外工会组织还是一个向政治组织这个庞大机构提供给养的财政来源。它是每一项政治活动的监督机构，还承担着所有政治性大型示威游行活动的驱散工作。最后工会组织完全不再体现经济利益，而作为广大民众为了推行政治主张停止工作而进行罢工和总罢工的主要战斗工具来使用了。

通过创办一种内容至少要符合受过教育的人的思想水平的新闻刊物使得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终于获得了宣传鼓动机构，通过它能够让最底层的民众甘心去做最为大胆鲁莽的事情。它的任务不是把人类从低级的思想泥潭中拉出来并且推向更高的境界，而是去迎合其低级的本能。因此一种类似投机赢利性的生意在同样思想懒惰、有时骄横狂妄的人群中间出现了。

在完全狂热的诽谤声中，这样的新闻刊物尤其要摧毁所有能够撑起民族独立、文明高度、经济自主的一切。

这种新闻刊物特别要针对所有不愿屈服于犹太人统治或者其智力好像已经对犹太人自身构成威胁的人们进行攻击。因为受到了犹太人的仇视就和他们去斗争是没有必要的，而仅仅是出于对其他人要么忽然一下子有了进行斗争的想法，要么是由于其天才般的智力在力量和规模上又多出了一个犹太民族敌人的怀疑就足够了。

犹太人在这方面着实可靠的特性让他们能够觉察到每个人的内心世界，并且让那些本不具备属于他们所敌视思想的人们感到安慰。因为不是犹太人受到攻击，而是他们就是攻击者，在他们看来，他们的敌人不仅会进攻，而且还会对他们进行反抗。但他们的手段竟如此地大胆妄为要试图去击碎诚实正直的心灵，这不是正当的斗争，而只能称之为撒谎和诬蔑。

但犹太人却丝毫没有对此感到害怕并且还在进行下流行径的过程中变得强大起来，所以如果我们的民众把活生生的犹太人形象当作是一切罪恶象征之魔鬼的化身的话，也就不会有人感到吃惊了。

广大民众并不了解犹太人的内心本质，而我们上流社会天生的无能和狭隘让我们的民众很容易地就成了犹太人说谎伎俩的牺牲品。当上流

社会因为与生俱来的怯懦疏远犹太人用谎言和诽谤来攻击的别人的时候，通常情况下广大民众由于愚昧和幼稚则对这一切表示相信。而国家行政机关要么对此保持沉默，要么在大部分情况下为了消除犹太人新闻报道的攻击反而去迫害无辜受到犹太人攻击的人，在这些当官儿的蠢驴们看来这好像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尊严和确保安宁和秩序。

对犹太人利用马克思主义的武器所感到的恐惧就会像恶魔一样渐渐地笼罩在那些老实人的头脑和心灵之中。

人们开始在这个可怕的敌人面前发抖并且最终成为其牺牲品。

(十一) 犹太人在国家的统治地位已经显得非常地稳固，以至于他们现在不可以只被称作为犹太人，而且还要恬不知耻地承认他们民族和政治近来的思想发展过程。一部分犹太人已经很公开地承认自己是外来民族，对此他们并没有再次说谎。因为就在犹太复国主义试图欺骗别人说什么犹太民族自决就是要在巴勒斯坦建立国家才得到满足的时候，犹太人也在十分狡猾地欺骗着其它非犹太民族。他们完全不想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以色列）来进行定居，而只是期待着建立起一个具有自我主权的、摆脱其它国家干涉的国际诈骗中心和一所培养骗子的高等学府。

而在一个时期狂妄和公开地一方面要假装欺骗德国人、法国人或是英国人，另一方面还要表明自己是犹太民族，这不只是信心的增长，而且也是安全感的增加。

从犹太人所采取的和其它民族的交往方式上来看可见他们是多么地想看到已经近在眼前的胜利。

黑头发的犹太少年脸上泛出恶魔般的喜悦，长时间地注视着他要用来血液去侵害的那天真无邪的姑娘，并且通过这位姑娘去对其民族进行掠夺。犹太人想尽一切办法试图去腐化受奴役民族的种族根基。所以就象犹太人有计划地使女人和姑娘堕落一样，因此他们并不害怕自己去大范围地打破针对其它民族的血缘限制。犹太人在过去和现在都是那些把黑鬼带到莱茵河地区的人，他们一贯以同样的阴谋和明确的目标，通过必然发生的杂交去毁掉他们所痛恨的白种人，这样就使得白种人从政治和

文明的高度上跌落下来，犹太人自己则跃然成为了他们的主人。

因为一个认识到自己血统的民族是绝不能让犹太人去进行奴役的。他们在这个地球上永远是这群杂种的主人。

所以犹太人就试图有计划地通过对每一个人不断地进行毒害来降低其它民族的人种水平。

因此，从政治上犹太人就开始用无产阶级专政来替代民主观念。

在马克思主义有组织的广大民众之中犹太人找到了使人民没有民主，取而代之则是专政的血腥铁拳去奴役和统治人民的武器。

犹太人按部就班地同时在两个方面进行革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

针对犹太人的攻击进行顽强抵抗的人们，犹太人则借助于国际影响网罗一大批敌人来挑起战争，并在最后必要的时候在战场上竖起革命的旗帜。

在经济上犹太人使没有盈利的社会福利机构非国有化并且使其隶属于他们的财政控制来动摇整个国家。

在政治上犹太人拒绝其它国家为维护其生存所采取的措施，损害其它民族捍卫和保护自我的基础，损毁对领导人的信仰，对其它民族的历史和过去进行诽谤并且败坏所有真正伟人的声誉。

在文化上犹太人对艺术、文学、戏剧散布流毒，痴迷于直觉而推翻一切美好和高贵、善良与崇高的理念，并且因此把人们强行地拖进了他们自己低劣本性的魔爪之中。

犹太人一直把宗教视为是可笑的，认为习俗和道德是过时的，直到这个世界上的民族在为生存而战的斗争中失去最后的支撑为止。

(十二) 现在，伟大的革命终于爆发了。在这场革命中犹太人赢得了政治权力，他们自己就脱掉了还穿在身上那最起码的伪装。从讲民主的犹太人变成了残忍的犹太人和人民的暴君。在不到几年的时间里犹太人就试图要彻底消灭知识界的民族代表人物并且在他们剥夺了其它民族原有的精神领袖的同时欺骗人民去接受永远受到压迫的奴隶命运。

这种事情最可怕的例证发生在俄国，在那里他们把近三千万人口中的一部分以极其野蛮的方式杀死或在非人道的痛苦中饿死，以保证一群

犹太文人墨客和交易所的强盗对广大民众所进行的统治。

这样的结果不只是犹太人压迫人民之自由的结束，而且也是民族寄生虫自身的末日，蒙难者的牺牲早晚都会让吸血鬼死掉的。

当我们把德意志帝国崩溃的所有原因展示在眼前的时候，那么剩下最根本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种族问题的不了解，特别是没有认识到犹太人的险恶。

1918年8月如同儿戏般地在战场上认输简直无法让人忍受。这和我们民族的胜利毫无关系。不是他们打败了我们，而是我们让某种准备投降的势力所击败，这种势力几十年来就一直计划着要谋取我们民族有能力和有权利维护生存的政治意志和道德力量。

同时旧帝国轻易地忽视了维护我们国家民族基本特征的问题，也不重视我们在地球上唯一的生存权力。进行杂交和被杂交的民族是在损害永恒天意的意愿，并且通过一个更加强大的民族所造成的没落也不是上天所赐予的不幸，而只能是上天公正的重现。如果一个民族把上天所赐予给他们的和根植在他们血液中的本质特征不想再进行重视的话，那么也就没有权力去抱怨他们在世界上生存所遭受的损失了。

地球上所有的事物都会变好的。失败是成功之母。每一场失败的战争都将成为日后鼓舞士气的理由，每一个困难都孕育着人类的能量，每一次压迫都能够产生出精神再生的力量，只要我们的血液还保持着纯洁。

失去了血统的纯正就永远地摧毁了我们内心的幸福，会让人们永远沉沦，而且这样的结果将永远无法从肉体和精神上清除掉。

如果把生活中所有其它的问题与这个问题进行审视和比较的话，那么人们就会看出其它问题小到多么可笑的地步。所有这些问题都会受到时间的限制，而只要有人类，那么就会存在是否要保持血统纯正的问题。

战争前所有衰败现象的真正主要原因归根结底就是种族问题。

或许这些涉及到一般的权益问题或是涉及到经济生活方面的弊端，

涉及到文化的衰败表现或者事关政治堕落，涉及到错误的学校教育或是新闻报道对成年人的影响等等问题的最深层的原因就是忽视自己国家的民族利益或是对外来民族所具有的危险性视而不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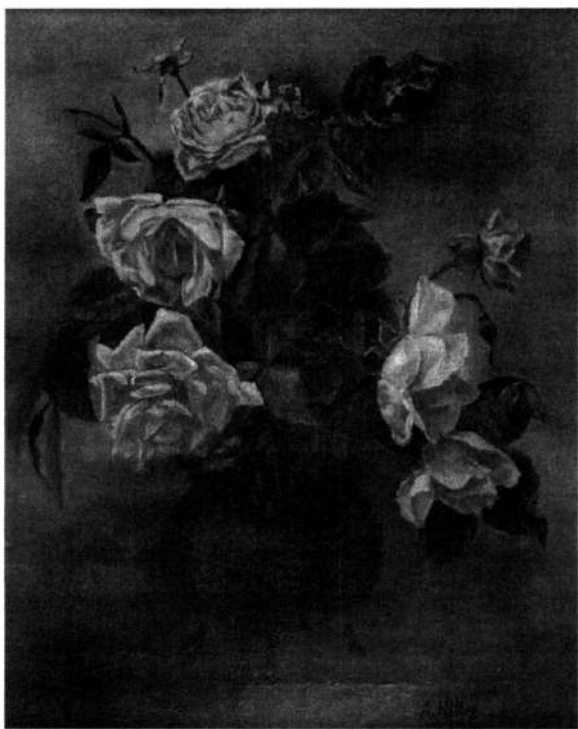
因此，所有改革的尝试、所有的社会救济机构和所有政治上的努力、所有的经济增长和每一项聪明才智的进步及其成果都是无关紧要的。能够在世界上维护民族及其生存的组织机构，即国家不仅其内部变得越来越不健康，反而日见衰败。所有旧帝国表面上的繁荣无法掩饰其内在的衰弱，并且每一次的确要振兴帝国的尝试都因一再错过重大问题而告失败。


要是相信那些对德国人指指点点、说三道四的各种不同政治党派的追随者，他们各自的领导人自己本来就是道德败坏或者是心怀恶意的话，那可就是大错特错了。他们的行动之所以毫无成果而受到指责是因为他们在极为有利的情况下最大程度上注意到了我们普遍存在病症的表现形式并且还试图去与之进行斗争，但却盲目地忽视了真正病源之所在。谁能够认真仔细地密切注视旧帝国政治的发展轨迹，就必然会认识到早在德意志统一的时候，也就是德意志民族振兴的时候其内部的衰落就已经全然有所表现了，尽管好像是取得了政治上的成功和经济上的繁荣，但整个形势则一年比一年变得糟糕。光是在议会选举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分子的赞同就表现出日益临近的、由里向外的崩溃的迹象。所有资产阶级政党所谓的成就毫无价值可言，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所谓的资产阶级选举胜利的情况下无法阻挡马克思主义分子在数量上汹涌澎湃的增长，而是因为他们吞下了分化瓦解的苦果。资产阶级并不知道他们自己的体内已经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毒害，其抵抗能力也常常更多地是出于对有竞争力的、野心勃勃的领导人的嫉妒，但不是原则上针对意志坚定的对手去进行一场苦战。而唯一能够长期以来毫不动摇地坚持到底的人就是犹太人。他们的大卫王之星永远高高地升起，而我们民族的自我生存意志则悄然消失了。

因此 1914 年 8 月不仅是在战场上毫无战斗意志民族的溃败，而且

是民族自我生存意识在和平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对我们民族机体不断进行麻痹情况下最后的一次闪现。因为在这决定命运的日子里人们没有能够认清内部的敌人，也就使得表面上的抵抗变得徒劳无谓，而上天并没有对胜利之剑进行奖赏，而是遵循着永恒的复仇法则。

从内心的认识出发，我们应当对今后的运动重新制定出只符合我们信念的，不仅是阻止德意志民族的衰落，而且还要建立一个将来能够让国家存在下去的坚实基础，不是表现异族机械唯物论的经济利益和需要，而是维护民族自身的指导原则以及行动纲领：建立一个德意志民族的日耳曼国家。





第十二章 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最初发展

当我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来叙述我们运动的初期发展并且探讨一系列与此有关问题的时候，并不是要写出一篇关于运动思想目标之类的论文。关于运动的目标和任务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恐怕要用单独一本书里才能描述得清楚。所以我将下一书册里面尽量详细地来论述运动的基本纲领，描绘出一幅我们对于“国家”这个概念所想象出的画面。我这里所说的“我们”其实是指所有成千上万人们心中有同感但却没有找到一词来形容浮现在眼前情景的人们。对所有重大变革中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开始的时候都只有一个勇敢的捍卫者，但他代表着亿万民众。变革的目标常常几个世纪以来就已经是蕴藏在成千上万人们心中的渴望了，直到有一个人把这普遍的意愿大声地喊了出来，并成为把原来的渴望成功地变成了新思想的先驱。

千百万民众对当今形势发自内心进行根本改变的愿望证明了他们内心深处对所遭受痛苦的极为不满。他们的表达方式也是千差万别的，一方面是沮丧和失望，另一方面则是厌倦、恼怒和气愤，有的人漠不关心，而有的人则暴跳如雷。人们内心的不满通过他们对选举的厌倦以及左派倾向与极端的狂热就可以作为证明。

而这样的现象对于一场新兴运动来说首先是应该避免的。不应该由满足于现状而沾沾自喜的人所组成，而应当是那些与不幸和不满有些关联的受苦受难和被流放的人们，尤其是他们不应该在群众团体中出头露面，而是要扎根其中。

从纯粹政治的角度出发，1918年呈现出如下的景象：一个民族被强行分成两个部分。很小的一部分是不从事体力劳动的国家知识分子阶层。他们表面上是爱国的，不过这个字眼比起那些非常平庸怯弱的所谓国家利益的代表来说，有时好像和忠于王朝制度一样会有些别的意味。他们试图用本来表面上就有缺陷的、面对敌人对自己的残暴就已经放弃了的思想武器将他们的观念和目标坚持贯彻到底。仅仅就那么重重地一击这个不久前还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就认输投降了，并且还战战兢兢地忍受着来自无情胜利者的任何羞辱。

与他们相对立的第二个阶级就是从事手工业劳动的广大民众。他们多多少少都受到了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影响，坚定地主张通过暴力去击毁任何精神上的抵抗。他们不愿意表现出是爱国的，甚至有意拒绝国家利益的每一项要求，就好像他们反而助长外族的压迫一样。他们在数量上是比较强大的，但国家民族中要是不包括他们的话，那么民族的振兴也是不可想象和无法实现的。

所以，在1918年人们应该清楚地知道：每一次德意志民族的振兴都会导致外部势力的入侵。但其先决条件并不像我们那些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们经常所胡说八道的那样是因为他们有武器，而是出于意志的力量。从前我们德国人有的是武器。但因为缺乏民族生存本能和意志的力量，所以就无法保证自由。一旦丧失了自愿的、发自内心的、坚定的精神意志来使用武器，那么再好的装备都是毫无价值的废物。德国之所以没有能力自卫并不是缺少武器，而是缺乏拿起武器捍卫民族生存的意志。

当人们今天特别要竭力地指出我们那些左派的政治家们把没有武器当作他们缺乏意志、顺从迁就表现的必然原因，而实际上却是对外叛变政策的时候，那么只能告诉他们一个答案：不对，与此相反才是正确的。通过你们的政策你们已经拿起武器去执行危害国家民族利益的犯罪行径去了。而现在你们又试图把缺少武器当作是你们无耻怯懦的根本原因。就像你们的所作所为一样，这些都是欺骗和谎言。

而且这些指责也同样击中了右派的政治家。正是由于他们的怯懦才

使得在 1918 年让那些占统治地位的犹太流氓偷窃我们国家的武器。即使是没有理由和权利在今天因而就把没有武器来对其聪明谨慎（应该说是“胆怯”）施加压力，但他们胆怯的结果却是丧失了自卫的能力。

因此，要想重新获得德国武装力量的问题不应该是，比如：我们怎样制造武器？而是我们如何产生出让一个民族拿起武器的精神？如果大家有了这样的精神，那么就会找到利用武器来解决问题的千百种办法！要是给一个胆小鬼十把枪，那他在战斗中也不会开一枪。这些枪对于他来说是没有用的，就像给一位勇士一把光滑的手杖一样。

因而是否可以重新获得我们国家政权的问题，首先已经是能否可以让我们国家维护自我生存本能得到痊愈的问题，因为根据经验来看，一项对外政策的制定以及对一个国家的评判都不会以现有的武器数量为基准，而更多地要根据所能够认识到或者说所能预计到一个民族士气上的抵抗能力。一个民族能够进行结盟的能力也很少是由拥有杀人武器的多少来决定的，而明显地取决于一个民族激昂的自我生存意愿和英勇的牺牲精神。因为这不是和武器结盟，而是和人。因此就像英国人被看作是世界上最值得结交的同盟伙伴一样，那是因为在其军事指挥和广大民众的精神里都体现出了坚定果敢的残暴和坚韧，他们的战斗一经开始便从不考虑什么时间和牺牲，并通过各种手段去进行奋斗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而同时应该注意的还有他们目前的军事装备已经是其它国家都无法与之匹敌的了。

要知道德意志民族的振兴是要重新在政治上获得维护自我生存意志的问题，因此仅仅是按照要获得民族基本特点的愿望本身是不够的，而是只有通过故意反民族主义的人们进行民族化改造才是再明白不过的了。

所以，一场以重新建立德意志主权国家为目标的新兴运动就要坚持不懈地为获得广大民众的拥护而奋斗。而在一般情况下我们那些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之所以如此地软弱无力，如此地缺少足够的民族观念，很明显地就是因为他们以前没有真正地想到要反对国家强力推行的内政

和外交政策。仅仅是出于众所周知的目光短浅和思想狭隘的原因，德国的资产阶级正像他们从前对待俾斯麦那样在即将获得自由解放之际应该坚持采取消极抵抗的方式那样，那么对其无可争辩尽人皆知的自由所采取的积极反对行动也是从不会感到恐惧的。

但是，我们那些着眼于国际主义的同胞们则表现得有所不同。他们不仅在原始本性上更加倾向于暴力观念，而且他们的犹太领导人也更加的野蛮和无情。他们压制任何一次德意志民族的兴起，就像以前诋毁他们的德国主人那样。特别是：这些犹太人在议会制国家里借助于其在议会多数的优势不仅妨碍国家外交政策的实施，而且还排斥对德国国力的高度评价和结盟的资格。我们正处在衰弱的时期，在我们当中有一千五百万马克思主义者、民主党人士、和平主义分子和中央党党员，我们不仅还不知道，而且其它国家则更多地认识到和我们国家进行结盟考虑到这样的负担将会失去意义。人家是不会和一个其大多数民众坚定地，至少是消极地反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国家进行结盟的。

另外还有一个事实说明，这些民族败类政党的领导人针对出于维护自我生存意志的民族振兴必然和将要采取敌视的态度。再让德意志民族重新接受从前所处的地位，从历史的观点出发这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事情，而且也没有考虑到这就是让我们国家遭受到闻所未闻的崩溃之原因所在。因为后人将会对 1918 年 11 月的事件做出公正的审判，这不仅是大逆不道，而且是叛国行径。

所以，首先是对外要重新获得德意志民族的独立自主的地位，与此相关的是对内要重新获得我们民族的坚强意志。

仅从纯粹技术操作方面上看，只要广大民众还没有把自由的观念付诸于行动，那么德意志民族对外获得自由解放的想法就似乎是毫无意义的。从纯粹军事方面上看，尤其要让每一个军官都要考虑到对外进行战争并不是只靠指挥一支士官生部队就能够进行的，我们不仅需要人们的大脑，还需要他们的拳头。同时人们还必须注意的是一场需要所谓的知识界支持的保卫国家的战争真的会造成无法估量的财产损失。那些在

1914年秋天作为志愿兵团参加战争并在佛兰德斯战场上牺牲的年轻的德国知识分子日后愈发地让人感到心酸。他们才是国家所拥有的最好的财富，而在战争中失去了他们就再也无法弥补了。如果在冲锋陷阵的队伍中不仅没有大批的工人，而且在准备工作的技术操作方面也没有凝聚起全体民众的意志，那么这样的战斗本身也是无法进行的。恰恰是我们这些在凡尔赛和平条约众目睽睽的监视下被解除了武装并不得不过着清贫日子的民众，只有当天生就意志薄弱会为了大家都知道的那三十个银币可以向别人背叛一切和出卖任何人的内奸把军队被搞得七零八落的时候，才可以开始以某种方式准备为人类的自由和独立进行斗争。靠这些人那可就没蛋了。只要他们敌对的原因，也就是出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国际主义思想没有受到打击并且没有从他们的头脑和意识中清除掉的话，那些成千上万持有反对民族振兴政治观点的人们相反倒好像是无法战胜的。

同样，无论人们出自怎样的观点来看待我们国家和民族重新获得独立的可能性，不管是从外交方面的准备工作上，还是从技术装备方面以及从战争本身上来看，但首先要让我们的广大民众获得自己民族独立的思想观念和以往的前提条件是相同的。

不再要求对外政策的自由就意味着每一项国内的改革政策本身就就像一块殖民地一样充其量只是土地收成上的增加，而每一次所谓经济上增长的结余只对国际监督人有利，每一项社会福利的好转也不过是他们工作的成就罢了。文明的进步完全没有让德意志民族得到幸福，这和一个民族的政治独立和尊严密切相关。

如果对德国的未来有利的解决办法取决于广大民众的民族观念的话，那么这就必然成为一切运动的最高和最为重大的使命，其活动不仅仅只满足于当前的需要，而且其所作所为还要得到将来成果的检验。

所以，在1919年期间我们就已经明白了新运动最高的目标就是必须对广大民众进行民族主义改造。

新运动步骤上的一系列要求如下：

(一) 为了得到进行民族振兴的民众，不做出社会福利方面的牺牲是很难的。

为了经济方面的妥协，现在对我们工人的所作所为没有一点儿是站在赢得全体人民支持的立场上的，而反倒使这个最为广泛的阶级失去民族特性。只有目光短浅思想狭隘的人才会错误地认为，如果我们民族内部无法实现团结，那么经济就不会持续地增长，因此也就不会给他们在经济上带来更大的利益，很可惜的是，我们国内的企业家们常常会这样认为。

要是德国的工会组织在战争期间尽最大努力去保护工人阶级利益的话，要是他们自己在战争期间通过多次罢工迫使唯利是图的资本家接受他们所代表的工人的要求，要是他们也狂热地维护德意志民族捍卫国家利益的话，要是他们以同样严厉粗暴的方式来对待国家的残暴无情的话，那么这场战争就不会失败了。在经济方面所做出的一切巨大的妥协让步与赢得战争的伟大意义相比是多么的可笑！所以一场目标明确的运动是要让德国工人重新回归到德国民众当中去，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只要维护国民经济的存在和国民经济的独立没有受到他们的威胁，那么很明显的就是经济方面所做出的牺牲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二) 只有通过提高社会福利才可以开始对广大民众进行国民教育，同时还要专门通过教育来创造基本的经济条件，并使其能够融入到民族文明的宝库当中去。

(三) 对广大民众的民族主义化改造决不能通过稀里糊涂地强调客观原因而半途而废，而要毫不留情地、集中全部力量、狂热地去实现所追求的目标。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按照当今资产阶级的意愿使民众成为“民族的”，并且还带有很多的限定条件，而只能完全彻底地让他们民族主义化。毒药会被解药所破坏，而资产阶级的软弱本性才是通往天堂之路的分隔线。

广大民众并不是由教授或外交官所组成的。他们很少掌握抽象的知

识表明他们则更多地靠情感来感觉这个世界，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好或坏的判断。他们只凭感觉在这两个方面表达他们的观点，而从来就没有介于两者之间含混不清的态度。他们从情感出发所产生的观点同时也表现出他们所特有的坚定性。和知识相比信仰则比较难以动摇，和尊重相比爱情则很少输给喜新厌旧，和厌恶相比仇恨则更加持久，并且在这个世界上最伟大变革的动力永远都是很少来自于群众所掌握的科学知识，而是发自一种他们所赋予生命力的狂热，有时还是源自他们自己所驱使的歇斯底里。

谁要想赢得广大民众的拥护，就必须知道开启心灵之门的秘诀。这并不是客观和软弱，而是意志和力量。

（四）要想赢得民众情感上的支持除了积极战斗之外还要为了自己的目的去消灭敌人才能获得成功。

民众要永远把对敌人毫不留情的进攻看作是自己权利的表现，并且认为放弃消灭对方是无法保证自己权益的，如果不把这当作自己过失表现的话。

广大民众也只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并且他们从情感上是无法理解和持相反观点的敌人去握手言和的。他们所期待的就是消灭弱者或者是使其无条件臣服的强者的胜利。

只有在为我们民族心灵而战的整个过程中彻底消除了国际主义的流毒才能取得对广大民众进行民族主义化改造的成功。

（五）当代所有重大的问题都是眼前的问题并且所产生的后果都有其特定的原因。但所有原因中的根本原因却只有一个，那就是维护具有种族特性的民族生存的问题。单单从血缘上来看这不仅造就出了强壮的人，同样也产生出了体弱的人。那些种族基本特性的重要性没有受到认可和重视的民族就如同人们想把哈巴狗训练出具有赛狗的特性一样，但他们所不了解的是赛狗的速度是接受训练的长卷毛狗所无法模仿的，那是它们的本性所决定的。放弃保持种族特性的纯洁也就因此而放弃了他们表达情感的一致性。而性格特点的分裂是血缘分裂的必然结果，并且

智力和创造力的改变只能是种族基本特点改变所产生的效果。

谁要想把德意志民族从当今违背其本意的表现和恶习中解放出来，那就得从这种表现和恶习的外来病原体中解脱出来。

没有对种族问题及随之而来的犹太问题进行清晰地认识了解，那么德意志民族的再次振兴就不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种族问题不仅是开启世界历史之门的钥匙，而且也同样是了解人类文明的秘诀。

（六）把处在当今国际阵营中的我国广大民众划分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并不意味着要放弃维护社会权益。社会地位和职业利益的分道扬镳并不和阶级分裂的意义相同，而是我们经济活动所产生的理所当然的结果。职业化分工绝不是真地和民族共同体相抵触，因为这都发生是在一个民族的整体中，涉及的也不过是民族本身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已。

但是要把已经形成阶级的某个社会阶层列入到民族共同体当中或是国家体系之中的话，那就不能通过降低上等阶级的地位，而是要通过提高下等阶级的地位来进行。这个执行过程的代表也绝不会来自上等阶级，而是来自为了争取平等权利的下层阶级。现在的资产阶级并不是依靠贵族的帮助取得政府中一席之地的，而是依靠他们自己领导下的力量。

德国工人当然不用去搞什么无聊的结拜弟兄那种事情来进入德国的民族共同体，而是有意地通过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文明程度来进行，直到严重的社会差别得以弥补。以这样的发展为目标的运动首先要从工人阵营中获取其追随者。而只有在所追寻的目标已经完全得到掌握的情况下，才可以利用知识分子。这种变革和亲善过程不会在十年或二十年间就能完成的，根据经验来看而是要经过几代人才能完成的。

要让现在的工人去亲近爱国的民族共同体的最大障碍并不是阶级利益的代表人物，而是国际上那些仇视民族和祖国的领导人以及他们的立场。而那些带有狂热的民族主义思想的、代表政治和民众利益的工会组织让上百万的工人成为了民众中间最有价值的组成部分，但却没有顾及到所进行的每场战斗应该具有的纯粹经济方面的利益要求。

一场以正当的方式让德国工人回归到民众中间并且想要把他们从国际主义的胡思乱想中得以解脱出来的运动就必须最强烈地反对尤其是资产阶级所认为的把民族共同体看作是资本家对工人无法拒绝的经济施舍的观点，并且他们还想要看到工人在试图捍卫自己所拥有的经济利益时对民族共同体所进行的攻击。这种观点代表了一种刻意的谎言，即民族共同体不仅代表一方的利益，同时也代表另一方的利益。

所以，当工人不再顾及到公共福利以及维护国民经济而是依靠其势力来横加勒索的时候，那他肯定也就会犯下了违背民族共同体意志的罪行，这也正如那些通过非人的剥削手段蹂躏工人并依靠千百万人的血汗过着寄生虫生活的资本家破坏民族共同体是一样的。像这样的工人就没有权力标榜自己是爱国的，就没有权力代表民族共同体来讲话，而他只是个利用社会的不满来挑起日后必然危害国家争斗的自私自利的无赖。

这场新兴的运动首先应该从广大的工人中间来吸收追随者。这样就可以使他们从国际主义的胡思乱想中摆脱出来，从社会贫困中解放出来，从精神的苦难中解脱出来，而成为意志坚定的、品质高贵的、具有爱国情感的并且也是国家所希望那样的民族共同体中的一员。

要是能在爱国的知识分子中间找到对自己的民族和祖国的未来怀有热忱之心和对为了民众的心灵而战的意义充满深刻领会的人们，那么他们将会在这场运动的行列中被当作高贵的精神支柱而受到热烈欢迎的。光是为了获得市民选举的人头数量绝不是这场运动的目标。这场运动是要让那些在这种形势下出于本性对广大民众阶层宣传力度陷于松懈状态的人们起到鼓动作用。因为尽管要使广大的下层和上层民众团结在一起的观点在理论上的尽善尽美已经包含在运动范围里，但事实却与之相反，人们通过在群众集会过程中对广大市民心理上的影响会制造出一种舆论来传播某种观点，但在本世纪形成和兴起的群众运动说得好听一点的话并不包含消除不道德因素的特点。对经济利益问题所涉及到双方的文化水平以及彼此目前的立场观点现在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而对群众集会的痴迷一旦过去，那么这种差别就会立即表现出阻碍的作用。

但目的并不是对我们的民族阵营重新进行组合，而是要争取那些反对民族主义分子。

这个观点对确定整个运动的策略是至关重要的。

(七) 必须要在运动的宣传工作中表达出这种单方面的、但却是鲜明的立场观点，并且在另一个方面，这也是由于宣传的原因所要求的。

宣传工作能否应该对运动产生作用只得从单方面来看，因为在另一种情况下则是由于对于双方阵营的人们思想教育方面所存在的差异，所以要么使得有一方无法理解，要么另一方则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并因此而毫无兴趣地加以拒绝。

单从表达方式和语音语调来讲就对于这两个如此截然不同的阶层所产生的效果也都是不一样的。如果宣传工作丢掉了表达方式本来所固有的作用，那么就无法找到了解广大民众的方法。相反要是使用广大民众认为并表明是下流的字眼和手势的话，那么就会因为所谓的那些知识分子认为是粗鲁和俗气而遭到拒绝。恐怕在上百个演说家中不会有十个能够在今天面对一群扫大街的、钳工、清扫烟囱的等等人们的面前进行演讲，而明天又面对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进行同样思想观点内容的学术性报告。恐怕在一千个演说家里面也许会有那么一个以同样的形式面对钳工师傅和大学教授结束演讲后，两种听众所得出的观点看法不仅仅是相互吻合，而且同样受到感染甚至还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值得注意的是伟大的理论中最精彩的观点大部分情况下是通过最不知名的小人物才得到普及的。这不取决于天才的思想家创造了什么，而取决于把这种思想以什么形式向广大民众进行传播并能够获得何等的效果。

社会民主党，即整个马克思主义运动强有力的宣传力量大部分都根据他们所针对听众的一致性和片面性来进行投入的。越是显得头脑简单，其思路也就越狭隘短浅，这些人也就更容易为民众所接受并根据其思想标准和要求进行改造。

因此，对于这场新兴运动来说就得出了一个简单明了的路线：宣传工作在内容和方式上都要考虑到广大民众的需要，并且其正确与否要根据所取得的成就来进行衡量。在群众集会上最好的不是在精神上最接近于在场的知识分子的演说家，而是能够征服民众心灵的人。

一位参加群众集会的知识分子尽管面对演说家对所应征服的下层

群众所产生的明显效果却仍然从思想高度上对演说进行挑剔，这对于新兴运动来说完全证明了其思想上的无能和其个人价值的无用。对运动的任务和目标已经充分地理解和掌握，对宣传工作学会了如何去判断其成效，而不是依照给他留下的印象，像这样的知识分子才适合参加运动。宣传工作不是来让有民族意识的人们去进行消遣，而是要去争取我们民族的敌人，只要他们身上还流着和我们一样的鲜血。

一般对于新兴的运动来说其思路应该是根据宣传工作的特点和执行来决定和判断，我在讲述战争宣传工作的时候就已经对此做了简短的总结。

所取得的成就证明这是正确的。

(八)一场政治改革的目标绝不会通过宣传工作或对统治势力施加影响就可以实现的，而只能是通过夺取政权。每一种影响世界的思想并不只在于其合理性，而且还取决于其保证实施方法的责任和实现其思想的可能性。获得成功是世人唯一的评判，但对于其开始时的功与过并不是只是对1918年夺取政权的结果所理解的那样，而是要看其结果本身是否能够造福于民族。所以一个国家的政变是否成功并不像那些愚蠢的德国检察官们现在所认为的那样只是看革命者取得了政权，与以往的统治相比而应当要看其革命行动的意图和目标是否更多地考虑到民族的幸福。而像1918年秋天暴徒政变式的德国革命则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但是，如果把夺取政权作为实现改革意图的先决条件，那么从第一天开始就应该把具有改革目的的运动当作是一场群众性的运动，而不是什么文人墨客们的茶话会或者是小市民的保龄球俱乐部。

(九)这场新兴的运动在本质上和组织机构方面是反对议会制度的，也就是说其本身的内部结构通常是拒绝服从多数原则的，如果要按照服从多数原则，那么领导人不过只是其他人愿望和意见的执行人而已，这样也就降低了领导人的地位。这场运动无论在任何大情小事方面都要体现出领导人的绝对权威，与此相匹配的还有最高的职责。

按照这个基本原则所得出的实际结果就是：地方组织的第一主席将

由其直接下属接替作为地方组织的领导人来进行负责。整个委员会隶属于他的领导，而不是相反他服从委员会的领导。没有什么表决委员会，而只有常务委员会。工作事务由责任领导人，即第一主席来进行分配。这样的方法也同样对直接下级组织有效，如市区、郊县或是组织的分部。而领导人则总是由上边指定并同时具有无限的全权和威望。考虑到团结统一的因素只有全党的领导人才通过全体党员大会进行选举。同时他也是运动的领导人。整个委员会隶属于他的领导，而不是他服从委员会的领导。他决定一切并对此承担责任。对于这场运动的追随者来说可以自由地通过新的选举来讨论让他负责某项事务，或是解除他的职务，只要他违反运动的基本原则或者没有很好地代表其利益。新接替他职务的将是一位更加能干的人，当然也就享有同样的威信并担负同样的责任。

这场运动的最高职责之一就是这一原则并不只限制在自己的组织当中，而要推广到整个国家的体系中去。

谁要是想当领导人，那么在拥有最高的、不可动摇的威望的同时，也要最终承担最大的责任。

谁要是不能或者害怕承担其行为的后果，那就不适合当领导者，顶多只能称得上是个英雄好汉。

人类的进步和人类的文明并不是多数人的创造，而是建立在个人的才智和能力之上的。

这种个性的培育以及在其权益中的体现，是我们民族再次获得强盛的先决条件之一。

因此，这场运动是反对议会制度的，即使是加入到议会机构中也要起到消除这个我们已经认识到最为严重的人性衰败现象的议会机构的作用。

(十) 毫无疑问这场运动要坚定地拒绝任何一种要么属于其政治活动范围之外的，要么是对于运动本身原则意义上无关紧要的立场观点。这场运动的任务不是进行宗教改革，而是我们民族在政治意义上的重新组合。这场运动同时在两种宗教的信念中看到了对我们民族生存非常有



价值的依托，并因此和那些想要把巩固全体民众宗教习俗和道德基础的行为鄙视为攫取利益工具的政党进行斗争。

最终这场运动认识到其任务并不是要重新创建什么国家形式，也不是和另一种国家形式去进行斗争，而是要建立起原则性基础，没有这样的基础，不管是共和制还是君主制都无法长期存在。其使命也不是建立君主制或是共和制，而是要建立一个日耳曼国家。

关于这个国家庆典活动的问题，也就是加冕典礼的问题并没有根本的重要性，而实际上，重要的在于是否符合实际目的的要求。

对于一个刚刚才懂得了维护自己生存是重大问题和使命的民族来说，外在形式的问题是不会引起内部争斗的。

（十一）这场运动组织内部的问题要看其是否符合目的的需要，而不是原则上的问题。

最好的组织结构并不是在运动领导层和每个追随者之间设立一个庞大的，而是一个尽量小规模调解机构。因为组织机构的任务是为了传播一种特定的、先是来源于某一个人的头脑、而后又面向大多数人的某种意见观点，并且还要监督促使其成为现实。

因此，组织机构对每个人来说也就成为了一种无法避免的烦恼，从好的方面来看这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从坏的方面看则是为了目的而目的的弊端。

由于这个世界创造出了比思想更多的是人为的东西，所以组织机构这种形式通常也就比思想本身要更加容易建立起来。

要实现所追求的思想，特别是具有改革特征的思想过程大致如下：有一种天才般的观念从一个人的大脑中产生出来，他感到有责任要将他所认识到的告诉其他的人，他宣讲他的观点并且逐渐形成了一定追随者的团体。这种由一个人亲自直接向别人传播思想是最理想和最自然的方式。随着对新思想学说追随者数量的不断增加，对于思想的创始人来说就不可能再亲自面对无数的追随者去直接地进行影响、指引和领导。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追随者的增加而无法进行直接的和快速的交流，因此

就有必要建立起具有联系作用的分部机构：理想的状态结束了，取而代之的则是这种组织机构无法避免的烦恼。这样就建立起了小规模基层组织，而这些基层组织就像人体细胞一样在政治运动中将成为今后组织机构的地方分部。

为了不让思想学说失去一致性，只有当思想奠基人和由其所造就学派的威信无条件地得到认同的时候，这种基层组织才可以开始进行活动。所以不可以轻视运动活动中心的地缘政治意义。只有存在像麦加或罗马那样对周边地区所产生的神奇魅力才会不断地给予运动以源自于体现高度统一而建立起来的组织内部的一致认同的力量。

所以，在建立最初的基层组织的时候就绝不能忽视不仅只是维护思想原始发源地的重要性，而且还要把它提高到显著的地位。这种对运动基本初衷和指导思想在精神和道德方面以及实际重大意义的提高要通过无数的基层组织以新的组织形式要求团结一致的情况下才开始进行。

正是因为追随者数量的增加以及无法和他们继续进行直接交流才建立起基层组织一样，所以最终就不得不让大量增加的各种形式的基层组织又重新和更高一级的组织进行合并，这也就是人们大概能够提到的那些分部或者是区级联合会这一类的政治组织。

因此，要保持中央组织机构对下属地方组织机构原有的威信也许要容易一些，而困难的则是对于现在所形成的高一级组织机构如何才能够保得住自己级别的地位。而这才是一场运动达到团结统一并因此使思想得以贯彻执行的前提条件。

即使最终这些中间环节的组织机构以新的组织形式“合并”了，那么对于这些新的组织机构本身来说要确立原始思想学说发源地及其学派等等主导特性的困难也在继续增加。

因此，这种机械的组织形式只有当中央机构在精神思想上的威信无条件地得到保障的时候才进行扩大。对于政治组织来说这样的保证常常只能通过实际权力得到体现。

所以，对于这场运动的内部组织建设就形成了如下的原则：

1) 将所有的工作先集中在一个地方：慕尼黑。从绝对可靠的追随

者中培养出一批亲信，并且组成一个为以后传播精神思想的学校。通过在这样的地方尽可能地获得非常显著的成功，为今后争取赢得必要的威信。

为了宣传这场运动及其领导人有必要在一个地方让大家看到不仅要动摇马克思主义思想不可战胜的信念，而且还要证明能够发起一场与之抗争运动的可能性。

2) 当慕尼黑作为中央机构的威信得到了绝对认可之后才能够开始建立地方组织。

3) 建立区级、分部或者州级联合组织不要只按照自身的需要，而且还要考虑到保证对中央机构的绝对认同。

另外组织形式的建立还要考虑到现有的、今后将要成为领导人的人员。

对此有两种方法：

1) 运动组织使用必要的经济手段来培养和训练有能力的人员作为日后的领导人。同时有计划地按照策略和目标来使用所获得的资源。

这种方法比较容易、快捷，但这需要大量的资金，因为这些领导人都只是些领到薪水才能够为组织工作的人。

2) 因为缺乏资金而无法任用官员来担任运动组织领导人，而只能让他们担任名义上的职务。

这种方法比较缓慢而且更加困难。

只要从追随者中间还没有挑选出一名有能力接替领导工作并且愿意在某一地区开展领导工作的人，那么运动领导人就只得暂且停止在这个地区的活动。

在一个大的区域里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人，而相反在某个小地方却有两个甚至三个差不多很有能力的人是完全有可能的。在运动发展过程中这样的困难是很大的，并且只有经过几年后才能够得到克服。

建立组织的前提条件本来并且始终就是要具备有领导能力的人。

一支军队要是在各级指挥系统中没有军官就是毫无意义的，一个政治组织没有相应的领导人也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缺少具有领导才能和勇往直前性格的人，宁愿暂且停止建立地方组织也总要比组织工作失败要好。

领导人所具备的不仅仅是只有意志，而且还要有才能，并且意志力和创造力比起天才本身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最有价值的则是能力、决策力和坚忍不拔的相互结合。

(十二) 运动的前途取决于其追随者的狂热，也就是不包容性，他们把这场运动看作是唯一正确的并且彻底反对其它类似的组织。

如果相信一场运动的优势是通过和其它类似运动的联合而得到加强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种方式的联合从外部规模上看首先当然意味着扩大，因此在那些只看到表面现象的人的眼里也是权力的增加，但实际上却是播下了日后对运动内部起衰落作用的种子。

因为人们所能够谈论两种运动的相同之处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实际上没有两种运动，而只是一种。但无论如何所谓的不同只是由于领导人能力的差别所导致的，这是的确存在的。但是按照一切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是不适宜将两个本来就不同的组织撮合在一起的，而是较强一方所取得的胜利与胜利者通过斗争而得到升华的力量和优势的结合。

通过两个近似的政党组织的联合可以形成暂时的优势，但以这种方式所取得的成就经过一段时间后却成了今后出现内部衰落的起因。

一场运动的伟大就在于通过其内部力量的不断发展并由此不断壮大来保证取得超过所有对手的最终胜利。

是的，只要运动组织将斗争原则视为是运动发展的前提条件，那么就可以说其优势及其存在的合理性的增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并且在其力量超越顶点的时候，全面的胜利就会垂青于他们这一方。

因此，不只是去追求时间上短暂的成就，而是要追求通过绝对的不包容性所赋予的长期持久的战斗以及持久的发展所取得的胜利才对运动有利。

只通过和类似的组织进行所谓的联合而得到发展的运动所取得的优势无非就是妥协的结果，就像温室里的花朵。看似强大，但缺乏历经

百年和抵抗暴风骤雨的力量。

作为世界上任何一种思想化身的强悍组织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其针对其它一切的不包容性以及只陶醉于自我权益的宗教狂热。如果某个思想本身是正确的并且以此武装起来去进行战斗的话，那它在这个世界上将是不可战胜的，而且任何一种精神迫害都只能增强其内在的优势。

基督教的伟大并不在于其试图和古典时期类似的哲学观点进行调和，而在于对自己教义本身进行不懈地、狂热地传播和维护。

通过联合而取得表面上的优势地位则通过那些为自身的学说和组织奋战到底的独立力量的不断增加而得到了充分地补充。

(十三)运动组织在原则上教导其成员要在战斗中不要只注意那些随随便便教出来的东西，而要关注那些应该去自我追求的东西。因此他们不害怕敌人的仇视，反而把这看作是自我生存权益的条件。他们并不畏惧敌人对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世界观的仇恨以及敌人的表达方式，而且还盼望着这些东西的出现。这种仇视的表达方式当然也包括谎言和诽谤。

谁要是没有受到犹太报纸的攻击、诽谤和诬蔑的话，那他就不是地道的德国人，也就不是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者。要衡量一种思想的价值、一个信念是否正确以及意志是否坚定最好的标准就是要看对我们民族的死敌所表现出的仇恨态度。

必须要一再告诫运动的追随者以及在更大意义上的全体民众，犹太报纸是一贯撒谎的，即使有那么一次是真实的事实，那也肯定只是为了掩盖一个更大的谎言，并且这样本身就又成为其所想要的假话了。犹太人是撒谎的行家，并且谎言和欺骗是他们的战斗武器。

任何一次犹太人所进行的诽谤和欺骗都是我们斗士身上光荣的伤疤。谁受到他们的诬蔑最多，谁就更加支持我们，谁遭到他们痛恨，谁就是我们的朋友。

谁要是拿起明天的犹太报纸没看到上面有诽谤的内容，那说明在过去的一天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值得编造的，否则的话他就要遭到犹太人

的迫害、诬蔑、诽谤、攻击和污辱。而且只要有谁最有力地反对我们民族以及雅利安人及其文明的死敌，那他就会看到这个民族，也包括他本人遭到的诽谤和攻击。

如果这个道理深入到追随者的肉体 and 心灵当中，那么这场运动就是不可动摇和无法战胜的。

(十四) 应该要求这场运动要想尽办法尊重个人，绝对不要忘记的是个人的价值体现出所有人类的价值，每一种思想和每一项成就都是某一个人创造力的结果，对其伟大的赞誉并不只是表示感激之情，而且也是对致谢者的绶带。

人是无法替代的。尤其是当他不是机械的，而是创造文明的化身的时候则更无法替代了。著名的艺术大师是很少可以替代的，并且很少让另一个人来完美无缺地去继续完成他遗留下来的未能完成的绘画作品。伟大的诗人和思想家，伟大的政治家和统帅也是很少能够替代的。因为他们所从事的活动都是涉及到艺术领域的，他们不是机械地培养出来的，而是上天的恩赐所赋予的。

世界上伟大的变革及其所取得的成就、伟大的文明业绩、在民族艺术方面不朽的作为等等永远都是和个人的名字紧密相连而不可分离的，并且因此而体现出其个人的价值所在。丢弃对伟大精神的崇敬就意味着失去了来自所有伟人的名字所涌现出的巨大力量。

对此犹太人知道得最清楚。他们之所以伟大就在于正是他们毁坏了人类和人类文明的伟大，而只赞美犹太人他们自己所崇拜的偶像。犹太人则企图把民众只崇敬他们自己的思想家的行为当作是毫无价值的并给他们加以“个人崇拜”的印记。

只要人们还如此地惧怕屈服于犹太人的狂妄和放肆，那么就会放弃他们所具有的强大力量，因为这种力量不是来自对民众的尊敬，而是来自对天才的崇敬以及赞颂和升华。

当人们的心灵破碎并且精神绝望的时候，伟大的征服者就会透过那昔日的晨曦从贫困和忧虑、屈辱与不幸、精神上没有自由而肉体却遭受束缚的境况中俯视他们，并且向沮丧的、死气沉沉的人们伸出他那永恒之手！不幸的人们呀，他们感到了惭愧！在运动初期发展阶段我们再也没有比遭受到由于我们的声誉无关紧要和默默无闻而产生如此巨大的损失了。因为常常只找到六七八个人去仔细听演说家的讲话，所以在开始的时候最困难的就是在很小的范围内才唤起和得到对运动美好未来的信念。

有人只想通过这么六七个人，而且还都是些可怜的无名小卒凑在一起就有了个组织运动的主意，将来就能够获得就连那些迄今具有实力的大型群众政党想要重建德意志帝国日益增强的实力和辉煌而告失败的成功。即使对我们进行攻击，是的，即使对我们进行嘲笑，我们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很开心。因此我们发现只要是神情沮丧的人就完全不受尊重，而我当时大部分时间都受到冷落。

当我进入这区区几个人的小圈子时，这根本就谈不上是什么政党或是运动组织。我第一次和这个小团体相遇的印象在前面已经描述过了。在那以后的几个星期里有时间和机会先研究一下这个所谓政党糟糕的表现。上帝呀，给我的印象是压抑沮丧的。他们什么都没有，简直就是完全什么都没有。一个政党的名称及其所作出的决定实际上是代表全体党员的，不管怎样他们要试图争取建立一个小规模议会。即使在这里也要通过表决来决定，在真的议会里至少还为重大问题而扯破嗓子争吵不休，那在这么一个小团体里就已经在对谁该负责处理一封来信而没完没了地进行讨论了！当然公众对此一点也不知道。除了几个追随者和几个熟人之外，在慕尼黑竟没有人知道这个政党的名称。

每个星期三在慕尼黑的一个咖啡馆里召开一次所谓的委员会会议，即每星期一次的演讲晚会。因为“运动”组织的全部成员就是委员会成员，当然人员总是相同的。现在必须讨论要扩充这个小团体去吸收新的成员，特别要不惜任何代价对外公布运动组织的名称了。

对此我们要进行如下行动：每个月，以后是每十四天要尽量召开一次“组织大会”。会议的邀请信要用打字机进行打印或者是部分用手书写，并且是第一次由我们自己来进行分发或者分送。每个人都要通过熟人关系鼓动一个或几个人来参加会议。

而结果却是很糟糕。

我还能记得我第一次亲自是怎样将八十份邀请信分发出去的，并且那天晚上我们是怎样地盼望着应该有大批群众的到来。

都已经晚了一个小时了，“主席”最后不得不宣布“大会”开始，我们还是只有七个人，原来的那七个人。

我们忽略了邀请信在慕尼黑的文具商店用打字机进行打印后进行复写。这样的结果就是在下一次的大会上多来了几个听众。就这样听众的人数慢慢地从 11 名增加到 13 名，最后从 17 到 23、24 名。

通过我们几个可怜虫进行小范围的募捐，我们终于有钱在当时慕尼黑的独立报刊《慕尼黑观察家报》上为大会刊登广告。而这一次的结果则是惊人的成功。我们把大会安排在慕尼黑的老凯勒啤酒馆（不要和慕尼黑节日啤酒馆混淆）一间能容纳近 130 人的大会堂里。我看这是个很大的大厅，我们每个人还担心能否会成功，因为怕当天晚上要来这么多的人会使这座“雄伟”的大厦倒塌。

七点钟的时候来了 111 人，于是就宣布开会。

一位慕尼黑的教授做了主要的专题报告，我是第二个又是第一次在大家面前讲话。

对于当时该党的第一主席哈勒先生来说这件事情是一次很大的冒险。这位明显善于演讲的先生确信我也许有所不同，但只是不会演讲。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也没有改变这个看法。

可事情却是另外一个样子。在大会上第一次允许我在大家面前进行 20 分钟的演讲。

而我演讲了 30 分钟，就像我从前一无所知，但心里总能感觉得到



那样，现在用事实得到了证明：我能够演讲！30 分钟后这间屋子里的人们就像触了电一样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在我对牺牲精神的呼吁下竟使他们捐助了 300 马克。这样就为我们解除了很大的忧虑。当时由于资金上的限制我们连印制党纲或者发放宣传小册子都无法做到。现在有了这样一小笔捐款作为最初的基金至少可以让我们支付急需和必要的费用了。

仅从另外的角度来看，这也是第一次较为大型会议所取得的有意义的成就。

当时我就开始要为这个委员会输入一些新鲜的年轻力量。在我长期的部队生涯里我结识了大批忠实的战友，而他们现在就在我的劝说下开始渐渐地参加了运动组织。而他们都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人，他们服从组织原则，在服役期间就伴随着这样一条准则：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只要愿意就能得到一切。

我自己在接下来几个星期的工作中就认识到了这样输入新鲜血液具有何等的必要性。

当时这个政党的主席哈勒先生原本是一位新闻记者并且肯定也是接受过全面教育的。但是要作为政党的领导人就会非常困难了：他不是群众演说家。在某种程度上他在工作上是认真严谨的，可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他才缺少演讲的天赋，也就没有更大的激情。而当时慕尼黑地方组织的主席德莱克斯勒先生原来是个普通工人，作为演说家本来就没有多大名气，而且也不是军人。他从来没有在军队服过役，在战争期间没有当过兵，他整个人的性格本身就很优柔寡断，还缺乏把他从这种天生就软弱的性格中打造成真正男子汉的锻炼机会。所以他们两个人不仅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还都无法让运动必胜的狂热信念深入人心，即便想要以不可动摇的意志力，如有必要还极其地冷酷无情地消除妨碍新思想精神发展的任何抵抗。而只有军人的品质已成为自身精神和肉体的特性才与此相称，正如人们所描述的那样：像赛狗一样敏捷，像皮革

那样柔韧，像克虏伯钢铁一般坚硬。

我当时自己还是个军人。我的外表和内心经过近六年的磨练已使得我在这个团体里让人感到陌生。即使我已经不太会说什么：这个不行或者这个还可以，不要冒险，这样太危险等等之类的话了。

因为这种事情当然很危险。1920年在德国的很多地方竟敢向广大民众呼吁并公开邀请他们参加国民大会简直是不可能的。参加会议的人往往被四下驱散，打得头破血流。通常这种所谓的群众大会在十几个共产主义分子面前像兔子见到狗一样就四散奔逃了，当然还有许多人不知所措。的确只有很少的赤色分子会注意到这些聊天俱乐部的，他们比这些俱乐部的成员自己还要更加了解俱乐部里的人们都是心地善良，因此本身也就没有什么危险的。所以他们就要坚决地利用各种手段来结束那些看起来对他们似乎有危险的群众运动，因而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历来最为有效的手段就是恐吓，就是暴力。

最让马克思主义的骗子们所憎恨的想必就是一场宣称要争取获得迄今只效力于国际马克思主义犹太政党和证券交易所党派的广大民众为目标的群众运动了。这个“德国工人党”的称号本身就已经起到了煽动的作用。这样可以很容易地让人们想到当初在恰当的时机开始和当时还陶醉在信仰马克思主义胜利喜悦中的工人们去进行辩论。

在当时小规模群众运动中人们对于这样的争斗还感到某种恐惧。出于害怕或怕挨打，人们想尽可能地少在公众场合露面。人们看到第一次大型的集会驱散，心想群众运动也许就永远完蛋了。我在艰难的处境中认为人们不要逃避战斗，而要坚持斗争并且还要武装起来以抵抗暴力。人们并不只靠精神，而且还要用恐怖来战胜恐怖。第一次大会所取得的成就在此方面坚定了我的立场。人们对第二次大会的勇气也已经有一些增加了。

大概在1919年10月在爱伯尔啤酒馆里召开了第二次更大规模的大会。会议议题是：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和凡尔赛和约。有四位先

生做了演讲。我自己讲了将近一个小时，并且成果远大于第一次的演讲。参加会议的人数上升到了 130 人。有人企图打断我的演讲就立即被我的战友给制止了。捣乱分子垂头丧气地沿着楼梯走了下去。

过了十四天在这同一个会场又接着召开了一次大会。参加会议的人数上升到了 170 人，会场得到了充分地利用。我又进行了演讲而且效果比以往大会上所取得的还要大。

我渴望有更大的会场。终于我们在这个城市的另一端的达豪大街上的“德意志帝国大厦”找到了这样的地方。在这个新会场举行的第一次大会参加的人数比上次要少：将近 140 人。委员会开始失望了并且他们总是相信参加会议人数不多的原因必定是因为我们的“大会”过于频繁地召开了。这就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而我所代表的观点则是在这个有 70 万居民的城市里不仅只是每十四天召开一次大会，而且每个星期必须召开十次这样的大会，这样才会让人们在受到反击的时候不会感到迷茫，才会走上正确的道路，始终坚持不懈迟早就会取得成就。1919 年至 1920 年整个冬天的时间里我们完全只为了要增强新的群众运动必胜的信念而战斗，并且要达到信念能够移山的狂热程度。

接下来在相同的地方召开的大会已经再次证明我的观点的正确。参加会议的人数达到了 200 人，而显而易见的还有资金方面的丰硕成果。

我极力鼓动立即召开下一次的大会。不到十四天所召开的大会上参加人数达到了 270 人。

十四天后我们第七次把这场新兴群众运动的追随者和同志们召集在了一起，这个会场几乎难以容纳这么多人，这次有 400 人参加会议。

在此期间这个新兴的群众运动才在内部组织结构上有了一定的规模。同时在小范围上有时或多或少地产生了激烈的分歧。和现在一样，当时就已经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对把这个刚刚兴起的群众运动的名称作为政党的名称进行百般挑剔了。我始终把这样的观点看作是这些人实际



上的无能和思想上的狭隘。过去和现在总会有那么一些人，他们的内心从外表上无法进行分辨，并且他们还企图把一场群众运动的重要性尽可能地贬低成听起来就是华而不实的名称，而且尤其不幸的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祖先留下的文字宝库还不得不要受到指责。

当时很难让人们理解的是任何一场群众运动只要没有取得思想上的胜利并且达到运动的目标，一个政党也是如此，即使是另外起上万个名字。

任何一个人，不论当他想要把一个大胆的、看起来好像是有利于实现民族利益的想法实际上去进行实施的时候，那他首先就要寻找准备支持其观点的追随者。并且如果这个观点经受住了消除现有政党特征和结束四分五裂状况的考验，那么这些观点的代表和决定的宣传者本身就是一个政党，只要目标没有实现，它就存在下去。无论是那一个梳着个小辫子的、而他实际所取得的成就与他的智慧正好相反的民族理论家，想要通过名称的变动来改变新兴群众运动成为政党所应有的特征的话，那无非就是咬文嚼字和蛊惑人心。

相反。如果不是什么具有民族特征的东西，那么随随便便使用这种特别的古代日耳曼式的表达方式既不适合当今时代，也没有什么特定的含义，而只能导致把一场群众运动的重要性轻易地看成是表面上在玩文字游戏。这简直就是今天人们无数次所看到的胡闹。

我在当时和以后的时间里就已经一再告诫人们必须要警惕那个德意志民族的流浪学者，他值得称道的功绩永远为零，可他的胡思乱想却几乎是无人能够超越的。在过去和现在都必须提防让那些将唯一的重任大部分写在其宣言中说他们已经为这个同样的思想已经进行了30年甚至是40年战斗的人们加入到这场新兴的群众运动中来。但是谁又能支持一种本身连一点成就都无法获得的所谓思想长达40年呢，恐怕无法阻挡对手的胜利倒是自己在40年里的无所事事的真正证据了。特别危险的不是在于这些人作为成员去适应群众运动，而是那些领导人胡扯地说从原来的活动中就能够看到适合今后工作状况的东西。要是让这些

人加入到一场新兴的群众运动当中去该是多么的不幸！恐怕没有几个商人会在 40 年的经商活动中不断地毁掉一桩大买卖，而去当什么适合新兴生意的创建人，也没有那一个民族的玛土撒拉老祖宗去破坏一种现今伟大的思想并使其僵化而适合于领导一场新兴的、年轻的群众运动的！另外像所有这些人只会成为新兴群众运动中的一小部分，为了有助于他们自己和利用新学说的精神思想，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要借助于新学说精神思想的保护和所提供的可能再一次用他们自己的思想使人类受难。但那是什么样的思想则很难说清楚。

这些人的典型特征就是他们整天如痴如醉地谈论着古代日耳曼的英雄们，谈论着那遥远的史前时代的石斧、投枪和盾牌，而实际上他们却是人们所能想象得到的最大的胆小鬼。因为同样是这些人为了以防万一还挥舞着仿造的古代德意志的铁剑，披着人造的熊皮，带着公牛的犄角，但还是满脸胡须地总是以精神武器进行着斗争说教，可在共产主义分子的胶皮警棍面前却又慌慌张张地仓惶逃窜了。我们的后代恐怕没有什么理由写一部新的史诗去赞美这个大胡子的英雄事迹了。

这样的人我太熟悉了，以至于在他们可耻的表演面前都感觉不到深深的厌恶了。他们给广大群众造成的影响是十分可笑的，并且犹太人完全有理由保护这些民族的伪君子，甚至还把他们当成未来德意志国家真正的捍卫者了。同时这些人还过于的自以为是，尽管一切都完全证明了他们的无能，但却总想着什么都懂得很多，而且这样对于那些他们的英雄气概不仅在过去受到崇敬，还尽力以自己的行为给后人留下同样的形象。

要从这些人当中判断出谁是生性的愚蠢或无能以及谁是因为某种原因才这样去做的常常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对于那些按照古代日耳曼标准来衡量的所谓的宗教改革家我总有他们仿佛是不希望我们民族再次兴旺的力量所派来的感觉。他们的活动就是让人们离开针对我们共同的敌人犹太人而共同进行战斗的，为的是让人们把力量都消耗在无谓的也是不幸的宗教内部纷争之中。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才有必要建立起领导群众运动绝对权威意义的、强有力的最高权力。只有这样才能阻止那些腐

败堕落的卑劣行径。总之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才要找出这场统一地、严格地领导和指引的群众运动的最大敌人，即使是在永远流浪的民族当中。他们因此而憎恨群众运动中控制其胡作非为的权力。

这场新兴的群众运动曾经在一项专门的议程中决定不使用“民族”这个词不是没有理由的。正是由于民族这个概念的广义性才不可能作为一场群众运动的基础以及其成员资格的衡量标准。越是实际上难以定义的概念，就越会被赋予更多的和更广泛的含义，就更增加了被人引用的可能。要是把这样一个没有固定含义而且还有多种寓意的概念用在政治斗争方面就会导致团结紧密的战斗组织的分化，因为这并不代表人们对信仰和意愿本身所进行的判断。

现在不管什么都用“民族的”一词来招摇撞骗也是可耻的，而人们对这个概念又有多少自己的认识呢。一位来自巴伐利亚的教授，同时也是一位以思想作为武器并且富于进军柏林行动意识的著名斗士将民族的概念和君主制等同起来。当然这个有学问的脑袋瓜忘记了过去我们德意志的君主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并不十分的一致。我也担心这位先生恐怕也难以理解这一点。因为用非民族性的东西来体现德意志君主制国家的主要形象是完全无法想象的。要是别的东西就不会消失了，或者其消失本身就证明了这个民族世界观的不正确。

所以，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解释这个概念。而对于政治斗争运动将不会考虑把这种多样性的观点作为其思想理论基础的。

同时我完全预见到了人们对这个世界的陌生以及对二十世纪接受约翰洗礼人们心灵的无知。这些全然被左派所操纵的可笑的东西所掩盖了。人们任意他们胡说八道并且对他们进行取笑。

谁要是在这个世界上无法做到让对手去憎恨，那对我来说作为朋友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并且这类人的友情对于我们年轻的群众运动来说不仅是没有意义，而且总是有害的。这也就是首先为什么我们之所以要选择“政党”这个名称，我们期望我们这样可以这一群民族的梦游者

感到畏惧，其二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用了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这个名称的原因。

首先，这个名称给我们带来了全身心对古代的梦幻，让我们成为讲信用的人，以及表面上还是所谓“国家意识”的格言家。其次还把我们拿着“精神之剑”的骑士拥护者那里和所有实际上把“思想武器”当作保护其胆怯的挡箭牌的胆小鬼那里解放了出来。

那在接下来的时候，尤其是最近阶段我们将会受到最猛烈的攻击，当然不会是动手打人，而只是会遭到口诛笔伐，正如那个民族的笔杆子没有什么别的可以期待的那样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了。当然对此我们的原则本身也是有点令人毛骨悚然的，那就是“谁要用暴力对付我们，我们也要用暴力予以抗击”。他们不仅用胶皮警棍向我们粗暴地表示崇敬，而且还最强烈地指责我们思想中所存在的缺陷。在一个群众集会上能够让一个像狄摩西尼的演说家保持沉默只需要 50 个想不让他讲话的傻瓜用他们那能说会道的嘴和拳头就可以了，根本一点儿也用不着这样一个江湖骗子。那种天生的胆怯绝不会让他陷入如此危险的境地。因为他工作是不会“吵吵闹闹”和“纠缠不休”的，而是“安安静静”的。

我今天还要不厌其烦地告诫我们这场群众运动要警惕别上那些“安静的工人”的当。他们不只是胆小鬼，并且还是无能和无所事事的人。一个明白事理、认识到处境危险、知道补救可能的人对他所应尽的义务和责任是不会“安静”地去完成的，而是要公开地反对和消除这种社会弊端。如要不这样做，那他就是一个逃避责任的人、一个可耻的意志薄弱的人，这要么是出于胆怯，要么是出于懒惰和无能。但是大部分这种“安静的工人”在多数情况下做起事来都好像知道上帝会看到他们的所作所为似的。他们都是些无能之辈，却还要企图用他们的伎俩来欺骗整个世界；他们好逸恶劳，却还要用他们所声称的“安静”的工作给人留下一个进行非常勤奋活动的印象。总而言之，他们是骗子，是政治上的投机份子，他们真正的工作就是仇视别人的工作。只要像这样的民族夜游神还在引用“安静”的意义所在，那就可以一千比一地打赌，他并不

是自己在进行创作，而是在偷窃，从别人的工作成果中进行偷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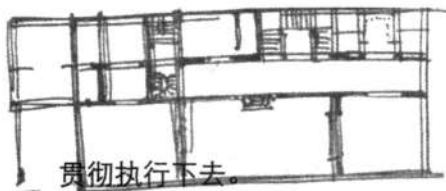
另外，这些人傲慢、自负和狂妄，而实际上则是些游手好闲、鬼鬼祟祟的流氓无赖，他们只会指责别人的工作，试图从头到脚地挑出毛病，而这样的真正结果却是在帮助我们民族的死敌。

任何一个有勇气做宣传鼓动工作的人，都会站在饭馆的桌子上像个男子汉一般公开地面对敌人捍卫它的观点，这比那些虚伪的、阴险的胆小怕事的人所做的事情要多出上千倍。他肯定会让这个人或另外一个人改变看法，并且为群众运动赢得支持者。人们将对他的成绩进行考核，就会判断出其工作的成果了。只有胆小的骗子才会“安静”地赞赏自己的工作并把自己以让人生厌的匿名方式隐藏起来，这是毫无用处的，而实际作用只会对我们民族振兴产生威胁。

1920年初，我极力主张首次召开大型的群众集会，因而出现了意见分歧。几个重要的党员认为这样做还为时过早，并且因此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赤色的宣传机构也开始和我们合作，而且我们真的非常幸运地逐渐得到了他们的仇视。我们开始以讨论的方式参加其它集会。当然我们每个人都立即被别人的声音给压了下去。但效果还是有的。人们知道了我们，并在某种程度上随着对我们的厌恶和恼怒的增加，对我们的认识也在加深。所以，期望在第一次大型的群众集会上会有大批来自赤色阵营的朋友来参加会议。

我很清楚被驱散的可能性的确是很大的，但这场斗争还必须要进行下去，就算不是现在，那么就几个月以后也要进行。在第一天就盲目地、无所顾忌地做出将群众运动持久进行下去的保证完全由我们来决定。我尤其了解赤色党派追随者内心活动的特点，以至于都不知道当矛盾在表面上还没有显露出来之前也要争取追随者。

当时这个政党的第一主席哈勒先生认为，不能赞同我选定时机的观点并且因此像一个诚实正直的人那样辞退了运动领导的职务。他的职位由安东·德莱克斯勒先生接替。我自己则担任宣传组织工作并要坚定地



贯彻执行下去。

就这样第一次大型的、当时还不太出名的群众运动集会定于1920年2月24日举行。

我亲自安排准备工作。准备工作时间很短。整个部门都要完全能够适应快速的决定。有关群众集会的日常工作问题要在24小时内做出决定。并通过海报和传单开始进行宣布，我在有关宣传工作的文章里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制止了那种按照每个人的观点来进行决定的倾向。宣传工作要对广大群众产生影响，要集中重点，要不断地重复相同的内容，文章要以无可辩驳的论断和自信、有把握的措辞的形式来传播最为坚强的意志并且还要耐心地等待所达到的效果。

对于颜色我们基本上选定红色，因为这种颜色具有明显的鼓动作用，想必一般会激怒和刺激我们的敌人，反正这样就可以让他们认识和记住我们。

接下来在巴伐利亚最明显让人担忧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央党之间联姻而形成的政党，这样其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巴伐利亚人民党的作用就会削弱我们的宣传海报对广大赤色工人的影响，并且以后还会试图禁止我们的影响。警察也对此无法进行干预，最后也不得不以“考虑到交通问题”为借口，直到最终在一个所谓德意志民族的人民党所提供的帮助下为了讨好这位国内的、安静的、赤色的盟友才彻底地禁止这些受到国际煽动和诱骗的工人们再次送给德国民众的十万张宣传海报。这些海报曾作为这本书的第一和第二版的附页，能够最好地证明这场新兴的群众运动在这段时间里所进行的奋力搏斗。它们也同样可以作为我们信念和意志的正确性以及所谓国家机关禁止让他们感到不惬意的民族主义化和重新获得广大民众支持的专制行为的证据呈现在后人面前。

这些海报也有助于搅乱那种在巴伐利亚自己好像有个国民政府似的看法，并且在后人面前还证明这个国家的巴伐利亚在1919、1920、1921、1922和1923年并不是什么国民政府的成果，而只是不得被

迫地顾及到渐渐感到民族情感的民众。

政府自己为了制止和阻挠这样的民族振兴过程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

在此只有两个人必须除外：当时的警察局长恩斯特·伯尼尔和他的忠实顾问奥伯阿姆兹曼·弗里克，他们当时是唯一有勇气先做德国人再当官的国家高级官员。在责任重大的职位上恩斯特·伯尼尔是唯一的一个不是为了讨民众的欢心，而是感到要向民众负责并且准备为了他所热爱而胜过一切的德意志民族的再次崛起将所有的一切都会孤注一掷的，如果需要的话甚至可以奉献出个人生命的人。因此他也总是让那些可收买的、不顾民族利益和争取自由的必要，而是服从主人命令和商业法则的规定、不顾委托给他们的民族财富繁荣兴旺的官员走狗们所生厌的眼中钉。

他尤其属于那种有别于大部分不惧怕民族和国家叛徒的仇视，而且还把这种仇视当作是一个正直的人理所当然的财富的所谓守护国家尊严的人。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分子的憎恨、他们充满谎言和诽谤的争斗对于他来说则是我们民族不幸中之大幸。

一个坚定而正直、具有古典纯朴和德国人的率真的人是会把“宁死不做奴隶”当成空话的，而是把这句话当成塑造其人格的座右铭。

只有他和他的同事弗里克先生在大部分人的眼里才是唯一在国家官员里面有理由作为一个国家的巴伐利亚的共同缔造者。现在想要举办我们首次群众集会的工作取得进展，就不仅必须准备好必要的宣传材料，而且还要必须把纲领性的文件印制出来。

我特别还要把所草拟的纲领性政策方针在第二卷里进行最清晰地拓展。在此我决定要完成这项工作，并不只是提出新兴群众运动的形式和内容，而且还有要得到广大民众理解和支持的目标。

从所谓的知识界则有人对此进行讥讽和嘲笑并且还企图进行批评。当时我们观点的正确性就表明了我们的纲领的有效性。

这些年来我看到有许多新兴群众运动得以重新建立起来，并且又再次消失得无影无踪烟消云散了。而只有一个留了下来：即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并且今天我更加相信他们可以消灭这个党，能够企图让这个党瘫痪，一个小小的部长就能够禁止我们演讲和讲话，但他们永远阻挡不了我们信念的胜利。

如果现在整个国家的立场观点以及他们的代表连名字都想不起来的话，那么国家社会主义纲领的基本理论就将作为未来国家的理论基础。

1920年前这四个月的集会活动倒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需要印制第一批传单、海报和章程的小办法。

当我把这场首次举办的群众集会当作这卷书的结尾时，因为通过群众集会，这个政党就会突破小团体的狭小范围，接下来取而代之的就会第一次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最重要因素，即公众舆论起到决定性的影响。

我自己当时只有一些担心：会场会挤满听众，或者我们对着空荡荡的大厅讲话？我坚信人们来参加会议的那一天想必就是这场新兴群众运动获得成功的那一刻。那天晚上我就是这样忧虑的。

七点半应该开始开会了。在七点十五分的时候我走进了慕尼黑广场旁边啤酒馆的大厅，我简直高兴得心都要跳出来了。当时我觉得这么大的一个地方里面挤满了人，可以说是人头攒动，有将近二千人。并且大都是为我们而来的。大厅里多半都是共产主义分子和一些无党派人士。我们第一次的大型集会将很快由他们来决定了。

不过所发生的却不一样。在第一个人演讲结束以后，接下来就该我演讲了。几分钟以后就有人不断地打断我的讲话，会场里发生了争吵。几个最忠实的战友和追随者与这些捣乱分子争斗了起来并渐渐恢复了平静。我又可以继续演讲了。半小时之后掌声已开始慢慢地压倒了喧嚣和吵闹的声音。

并且现在抓住这个时机开始对纲领进行讲解。

每隔十五分钟吵闹声就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喝彩声所遏制。当我最后把25个标题逐字逐条地向群众阐述完毕后他们则请求自己对结论进

行讨论,同时他们现在一个接一个地高声喝彩,不断地表示一致地赞成,而当这些论点最终找到了通向群众心灵之路的时候,会场里站满了群众,在我面前他们已经以新的信念、新的信仰和新的意志团结了起来。

将近四个小时后人们才开始从会场离去,当人头攒动的人群潮水般向出口处缓慢地涌动着、推搡着、拥挤着的时候,我知道现在这场群众运动的基本思想已经传播给了德国人民,并且使他们对此难以忘怀了。

火焰已经燃起,从炽热的火焰中必将会铸造出能够再次赋予日耳曼英雄西格弗里德以自由、赋予德意志民族以生命的利剑。

除了即将到来的民族振兴,我感到上帝会毫不留情地对 1918 年 11 月 9 日的叛变行为开始进行复仇的。

会场大厅就这样渐渐地空了。

这场群众运动仍在继续发展着。



下卷

国家社会主义运动



第一章 世界观及政党

1920年2月24日，我们第一次公开地举行了这场新兴运动的群众集会。在慕尼黑一家啤酒馆的大厅里，我们就新成立政党的25条党纲向近两千人进行了陈述，并且对每一条都以掌声表示了赞同。

因此，为了进行战斗而首先制定了清除过去那些杂乱无章的意见和观点，即清除了模糊和有害条款的纲领性文件和指导方针。在腐朽而胆怯的资产阶级的势力范围里，以及在马克思主义征服一切的胜利凯旋中，为了在最后的关键时刻阻止灾难的继续发生，一股新兴的力量出现了。

一场新兴的群众运动为进行艰巨的战斗，而希望拥有不可缺少的重要性和必要的优势，但愿从第一天起就能够在其追随者的心中唤起崇高的信念，不是强迫人们在其政治活动中接受某一个新的选举口号，而是应该以具有重要原则为前提的新的世界观，那么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人们必须考虑到这些所谓的“党纲”是从怎样糟糕的观点中随意粗制滥造出来，并且时而还进行补充和修改的。为了对这个纲领性怪物的含义进行必要的理解，人们必须特别要认真注意资产阶级“纲领委员会”的动机。

通常政党都会要么重新制定党纲，要么对现有的党纲进行修改，而唯一让他们所担心就是能否在下届选举中胜出。甚至连那些可爱的民众又要造反，并且想要挣脱原来政党羁绊这样的消息通常也会慢慢地传到议会中那些具有政治手腕的人们的脑袋里，所以他们就经常给驾驭民众的车辕重新刷刷漆。然后就会产生出会看星象的和为政党去占星卜卦的

人，他们往往都是些所谓“有经验的”和“老练的”，大部分还都是些年长的，在他们丰富的政治生涯里对类似的情况还能够记忆犹新的议员们。由于他们失去了对民众的耐心，而且还同样感到了危险的临近，所以他们就采取原来的办法，成立一个“委员会”，到处打听动向，刺探消息，还慢慢地嗅觉出什么是广大民众所想要的、所憎恨的和所期待的东西。每个专业团体，每个专职机构都非常详尽地学习和研究民众最为隐蔽的愿望所在。即使是针对危险的反对党那些“令人厌恶的标语”的审查也突然变得成熟起来，让原来那些政党的创建者和传播者们大为吃惊的是这些标语反而理所当然地出现在了这些政党的历史文献当中了。

所以，这些委员会就会聚集起来“修正”原来的党纲，并且制定出每一项都是由自己提出的新纲领（统治者转换立场就像战场上的士兵换件衬衫一样，也就是说只要原来的衬衫长了虱子那就该换了！）。农民得到了农业方面的保护，工业产品要受到保护，消费者购买商品要受到保护，教师的工资要提高，官员的养老金要改善，孤寡老人要由国家在最大限度内予以照顾，要促进交通的发展，公共事业的收费甚至税收要有所降低，如果不能完全废除的话，那至少也要有相当程度的降低。当然有时也会发生忘记了某个阶层或者没有听到有关在民众当中所流传的需求。那么就要在相应的地方予以补救，只要是人们出于善意希望让这些普通的小市民和他们的老婆能够再次平静下来，并且看到他们还非常地满意就行。这样人们才能够既信仰上帝又以有选举权市民毫不动摇的愚蠢开始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为了帝国的“新的面貌”而战斗了。

选举结束后，议员们就可以在为期五年的时间里主持召开国民议会，为了使自己摆脱只对平民百姓进行严加训斥，而开始去完成更加高尚和惬意的职责，他们又解散了纲领委员会，并且这种重新呈现出的斗争形式就是争取每天所需的面包：这也称作是议员们所领取的津贴。

每天上午这些议员先生们都前往议会大厦，即使不进去，至少也要到前厅有签到簿的地方去一下。为了开始为民众服务，他们要在那里先签上名，领到应得的报酬作为对他们不断消耗掉的精力所给予的小小的补偿。

四年以后或者是在其它某个解散议会的关键性时刻开始越来越临近的时候，会有一种按捺不住的紧迫感突然向这些议员大人们袭来。就像金龟子的幼虫不会变成别的而只能变成金龟子一样，这些议会里的毛虫才会离开大家共同生活的玩具小屋，扇着翅膀朝着可爱的民众翩翩地飞去。他们又去和选民们交谈了，向他们讲述自己繁重的工作以及别人可恶的顽固不化，可是从愚昧的民众那里没有得到想象中的掌声，却是粗鲁、敌视话语的迎头痛击。当民众这种不堪想象的情形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么就只能通过唯一的手段来进行解决：政党的光辉必须要再次引人注目，党纲需要进行修改，委员会又重新进入人们的生活当中，那些骗子们又开始重操旧业了。在人类非常顽固的愚昧面前就别想着还要取得什么成就。在新闻报道的引导下，在新党纲的诱惑下，这些“资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的选民们又回到了一起，并且选出的还是原来的那些骗子。

因此那些获得议席的国民代表和候选人又变成了议会里的毛虫，并且还匍匐在国家事务这棵大树上，接着吃得又肥又胖，以便自己在四年后再变成五彩缤纷的蝴蝶。

再也没有什么事情比总是一再地看到不断出现谎言这样的客观事实令人沮丧的了。从这样的精神温床上，人们在资产阶级的阵营里当然是无法汲取与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势力战斗到底的力量的。

而统治阶级也从来就没有仔细地考虑过这个问题。由于其它种种的狭隘性和议会里白种人巫师精神上的自卑感，他们自己本身就无法严肃认真地想到要通过西方式的民主道路来与这一种新的理论学说做斗争，民主以及与其相关的各种因素到底是为了什么，最好的情况就是找到一个人人们在使用过程中既能把敌人搞残废，又能使自己活蹦乱跳，还要能达到目的的方法。因此如果现在一部分马克思主义思想也非常聪明地和民主主义的基本原则企图假装进行紧密联合的话，那么请不要忘记在这关键的时刻统治阶级就要按照西方民主的观念关注一下多数决定原则这件事了！就在这几天，当资产阶级的议员们看到保护帝国安危的人竟然绝大多数都是极其目光短浅、头脑简单的时候，而同时马克思主义思

想则伙同街上的流浪汉、逃兵、政客、犹太文人毫不留情地以一种冒烟的毛瑟枪发出响声的民主方式在进行夺权。因此，就连那些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魔术师深信不疑的人们也错误地认为，现在或是将来仅仅用西方议会制这道咒语就能祛除那世界瘟疫的代表以及信徒们那冷酷的决心。

马克思主义思想会和民主主义思想一同前进直到取得胜利，为了其罪恶的目标甚至还会间接地得到曾经想要消灭的民族精神力量的支持。它现在似乎也相信在我们议会的混乱嘈杂中间突然冒出个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纠缠在一起的多数派，并且还是合理合法的大多数，这样就立刻使得议会里那些骗人的把戏结束了。这些赤色共产国际的先驱不去呼吁民主的良知，反而急切地号召无产阶级民众，并且他们的战斗也一下子从弥漫着腐臭气味的议会大厅里转移到了工厂和大街上。民主就这样立刻完结了，议会里那些人们所崇拜的信徒们敏捷的思想也告失败了，那只有受到煽动的无产阶级民众的铁棍和铁锤才在1918年的秋天闪电般地取得了胜利：这的确给资产阶级一个教训，告诉他们自以为可以借助西方民主来抵抗犹太人征服世界的行为是多么的荒唐。

就像前面所讲的那样，那些对此深信不疑的人们也和这样的赌徒一样，他们都总是遵循着欺骗和个人利益的原则，一旦不再符合其利益要求，就立即予以抛弃。

事实上，对于一切具有资产阶级立场观点的政党来说，他们所有的政治斗争实际上是为了议会里的席位而争来斗去，至于什么立场观点以及基本原则，那是要根据目的的需要，就像船的压舱物一样随时都是可以扔掉的，当然这也要按照党纲的要求，并且还要符合自己的实际能力。但他们缺少一种具备重要观点的、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具有非常说服力信念的、与狂热的战斗勇气相伴的、总能吸引广大民众紧随其后的巨大魔力来为其提供保障。

但是在一段时间里，当有一方千百次用罪恶的世界观作为武器来对

现有的社会秩序发起猛烈进攻的时候，那另一方就永远只能用勇敢无情进攻的战斗呼声去替代软弱胆怯防卫的口号，对我们来说就是要以新的政治信念来进行抵抗。因此现在特别是在那些来自所谓民族资产阶级的部长们，也许就是巴伐利亚的中央党对我们的群众运动冷嘲热讽般地进行指责说这是在争取“变革”的时候，那人们对这种搞政治的小东西就只能有一个答复：是的，我们试图在对由于你们可恶的愚蠢所遗漏的东西进行弥补。你们通过议会所干的那些肮脏交易只会把我们的国家推向毁灭，而我们则采取进攻的形式，建立起新的世界观和狂热地、毫不动摇地捍卫自己的原则为我们的民族建立起通往自由殿堂，有朝一日能够重新飞黄腾达的阶梯。

所以，在我们群众运动组建时期第一件值得担心的事情，就是为了一个崇高的信仰必须要防备从一个战斗组织变成一个支持议会利益的团体。

第一项预防措施就是要完成一部符合目标发展的、能够体现出伟大内涵的、让我们今天政客们那狭隘弱智的思想相形见绌的党纲。

我们对于党纲应具有鲜明目标特征必要性的观点是何等的正确，可以从最终导致德国崩溃的灾难性衰败现象极其明显地表现出来。

出于这样的认识就必须塑造出一种新的国家观念，同时其本身也是一种新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在上卷书里就对“民族”这个词就进行了深入细致地分析，所以我确定这个概念在理解上可以是不着边际的，尤其是要想建立一个完整的战斗队伍方面上也是如此。在主要看法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那么在“民族”这个词的掩盖下，现在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都会出现。在谈到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使命和目标之前，我想就“民族”这个概念以及与此相关的政党运动做出个明确的说明。

“民族”这个概念显得没有什么明确的范畴，却又可以得到多方面的解释，而在实际应用上就像“宗教”这个词一样没有什么限制。所以不论是在含义的理解上，还是在实际应用上，人们很难对这个概念精确

地进行定义。而目前“宗教”这个概念反而容易得到理解大概就和其实际应用有很大的关系。要是把人类的本性比作是“内心深处的宗教”，那是一种容易让人理解和美妙的说法。也许没有几个像这样通过非常一般的比喻会让人们自己感到满意的概念，是的，这是一种确切的、或多或少能够表达精神状态清晰轮廓的比喻。因为大部分的民众既不是哲学家，也不是圣徒，那么像这种完全普通的宗教观念通常对于每个人来说也只是意味着其个人思想和行为的表达，而暂时不会从内心里真地产生出宗教的渴望，因为从纯粹形而上学那漫无边际的精神领域里才会形成有明确定义的信念。当然这不是目的本身，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这也肯定不是能够达到目的的绝对必要的手段。而这个目的并不只是精神上的，而归根到底也是一个非常实际的目的。正如人们必须清楚的是再崇高的理想也总是和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一样，再高尚的美德最终也只是源自于符合逻辑的合理性。

但是，信念则帮助人类超越类似动物一般的生存标准，实际上这是有助于巩固和保证人类生存的。通过排除宗教方面的教育和与其同等价值的东西，人们就能够从今天的人类本性中看出那些借助于教育、适合宗教信仰而实际意义却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并且人们是在其生存基础急剧动荡的时候得出这个结论的。人们由此大概会断定出人活着并不只是为了供奉某个更加崇高的理想，而且这种崇高的理想反过来还会给予人类以生存的前提。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当然一般概念上的“宗教”也存在个人的基本观念或信念，比如灵魂不灭、灵魂永生、上帝的存在等等。只不过所有这些能够使个人如此信服的观念也要长期经受每个人的批评，以及在赞成和否定之间摇摆不定的考验，直到这种不带情感色彩的概念或者认识接受这个无可争辩的观念具有合法的力量。尤其这就是一种为承认宗教基本世界观而打开突破口和开辟自由之路的战斗特性。

没有清晰定义的信念会使人类生活中模糊的、各式各样的虔诚不只是毫无意义，而且也许还会有助于形成精神上的错觉。

就像“宗教”这个概念一样，“民族”这个词也在表述方面有类似的情况。每个人对此的基本理解都已经寓意其中了。即使这两者都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但从其形式上看也很难确定，而当它们被纳入了一个政党的基本理念范畴中的时候，才会自以为或多或少地比其所得到的观点的价值要高明。因为世界观意义上的理想以及由此所衍生出的各种要求很少是只靠人类纯粹的感情或内心的愿望本身来实现的，就像争取自由是不能光靠普遍对自由的渴望去进行是一样的。不是的，只有在军事统治形式下去争取独立的伟大理想具有战斗组织的时候，民族的迫切愿望才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实现。

任何一种世界观，即使是万般的正确和多么地有益于人类，只要是对人民生活的提高没有实际意义，就不能成为由一场群众运动而形成政党的战斗口号的基本准则，就不能圆满地起到思想胜利的作用，其党纲也就不能成为民族共同体国家的基本准则。

如果一种思想上的假设在一般形式上想要作为未来发展基础的话，那么其首要条件就是要务必对其思想假设的本质、特点和范畴进行清晰的定义，因为只有这才是由共同信念所形成的战斗所需力量的群众运动的基础。一种假设要形成一个党纲，一个世界观一般都要形成特定的政治信念。而这实际上应该是可以实现的目标，不只是为了思想本身的需要，而是必须还要考虑到取得思想胜利现有的和可以利用的斗争方式。一种由创始人所宣扬的抽象意义上正确的思想假设必须要和政治家的实际认识相结合，所以作为人类指路明灯不朽的思想就不得不要考虑到人类的弱点，以便从一开始就不被人类自身的缺陷所击败。而对于探究真理的人则应该和懂得民众心理的人相结合，以便把人类可能会死亡的这件小事从那永远正确和理想的王国里透露出来并还原其本来的面目。

从一个普通的、具有世界观性质和最切合实际的理想转变成为一个特定的、严格组织的、精神和意志统一的、带有政治色彩的信仰团体和战斗组织是最有意义的成就，因为思想取得胜利的可能性与其顺利的解决方法密切相关。这就常常是从极少数多少还清楚和确切地知道，而大

部分也许还能够理解真相的上百万人群中突显出一位能够以其无法抗拒的力量从广大民众摇摆不定的思绪当中塑造出坚定不移的基本准则，并且还要为捍卫这唯一的正确性而继续战斗，直到从自由思想的波涛中呈现出信念与意志统一结合起来的坚强磐石。

这种行为的普遍要求源自个人权益取得成功的必要性。

如果我们试图对“民族”这个词的内在含义进行剖析的话，就会得出如下结论：今天我们国内政治运动的世界观一般是建立在文化创造与文明形成的动力都来自国家本身这种假设之上的，但是国家却根本不是以民族为前提而存在的，而是经济的必然的产物，充其量也不过只是政治上追求权力欲望结果而已的看法。这种基本观点导致了在逻辑判断上形成了不只是对种族形成原始动力方面的误解，而且也是对个人价值的贬低。因为否定每个民族文明创造力的多样性，就必然要强制性地把这种错误的观点运用到对个人的判断方面。同意民族同质性这种观点也就同意所有民族以及每个人的思维方式都是相同的。因此具有国际主义特性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只不过就是通过那个叫马克思的犹太人把实际上早已存在的类似于世界观的立场观点以一种特有的政治信仰的形式进行了传播。没有这种已经普遍存在的流毒的基础，那么这个学说也就不可能在政治上取得如此惊人的成果。卡尔·马克思也只不过是千百万人中能够在这个渐渐堕落的人世间以预言家准确的眼光认识到了最为根本的毒害，并且还像个变戏法的一样取出这种毒物把它专门用到尽快地消灭这个地球上自由民族独立生存的手段之中的那个人。而他这样所做的一切只是有利于他的那个民族的利益而已。

就这样，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的简明摘要就成为了现今普遍流行的世界观了。正因为如此我们那些所谓的资产阶级想要反对其学说的斗争才成为不可能，是的，真是可笑，因为即使资产阶级也非常清楚地看透了这种毒害并且也崇拜这种一般只不过是通过划分阶级和人就可以区别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当资产阶级相信某一特定群体（资产阶级）

可能成为统治阶级，同时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力争让这个世界有计划地落入到犹太人手中的时候，那么资产阶级也就变成马克思主义的了。

与此相反，民族主义世界观却认识到了人类种族基本要素的重点所在。

民族主义世界观原则上认为国家是实现目标的一种手段，并且其目标就是为了维护人类种族的生存。因此民族主义世界观决不会相信种族的一致性，而且承认其多样性和高低贵贱，并且还认为有责任遵照统治宇宙永恒的意志以支持优等民族和强者赢得胜利而使劣等民族和弱者屈服。所以，民族主义世界观原则上遵从贵族式统治的基本观念，并且相信这个原则也适用于每个人。民族主义世界观不仅认识到了每个种族各自不同的意义所在，同样也认识到了每个人各个不同的价值所在。从群体中显露出了个人的重要性，由此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杂乱无章则更具有组织性。民族主义世界观相信人类实现理想的必要性，并且从中又重新看到了人类生存的前提。而且民族主义世界观也不承认对拥有崇高伦理道德种族生存的构成危险的思想存在，因为在一个混乱和狭小的世界里这样恐怕就会永远失去人类所有美好和崇高的精神思想以及人类实现未来理想的一切憧憬。

在这个世界上，人类的文化和文明是和雅利安民族的存在密不可分的。雅利安民族的消亡或衰退将会使地球重新蒙上野蛮时代的黑色面纱。

在民族主义世界观看来，通过消灭人类文明的代表来破坏人类文明的存在简直就是可恶的犯罪。谁要是胆敢谋害上帝，那他就是对仁慈的万能造物主的犯罪，就会被逐出天堂。

因此，民族主义世界观最能反映出人类内心的愿望，恢复了促进人类相互之间不断发展的自由竞争，直到最终为这个世界所拥有的最优秀的人们提供有的可以超越，有的则只有退出进行竞争的自由之路。

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不久的将来只能有一个最为高尚的民族才有资格作为统治者，借助于全世界的一切手段和可能来掌控所有涉及到人类的问题。

对民族主义世界观主要内容的一般定义出现各种各样的解释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我们也几乎找不到一个新近成立的政治组织不是以这个民族主义世界观来作为其理论依据的。与其他许多人相比正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存在来证明其观点的与众不同。所以结果就是面对敌人团结一致的阵线，在思想意识方面已经没有什么能够给人们留下印象的各种各样观点的大杂烩去抵抗高度统一的最高机构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用如此匮乏的武器怎么能够取得胜利！因此只有当一个同样是统一组织领导的民族主义世界观去抵抗政治上由马克思主义思想组织领导的国际主义世界观，那么在同等战斗条件下胜利才会站在永恒的真理一边。

对一种世界观有组织地进行理解和掌握只能在明确表明自己的立场观点的基础上才开始进行，而且对于建立起来的政党来说其所信仰的理论学说就是这个政党的基本原则。

所以，民族主义世界观要必须成为一种具有战斗能力的手段，就好像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为国际主义思想所提供的可能那样。

这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所要追求的目标。

这种通过政党来确立民族主义观念的方式是民族主义世界观取得胜利的前提条件，这也是通过敌人自己建立政党、至少是间接地所提供的事实所得到的充分证明。正是这些不知疲倦的人们强调民族主义世界观绝不是什么某一个人所享有的“世袭权力”，天知道那就是蕴藏或者是“活在”千百万人们的心中的，因此这就表明这种观点普遍存在的事实至少是无法阻挡敌人那已经是体现正统政党世界观的胜利了。要是另外一种情况的话，那么德意志民族在今天就会早已经取得伟大的胜利并且也不会处在毁灭的边缘了。是什么让国际主义世界观取得的胜利，是一个代表其思想在政治上组织起来能够冲锋陷阵的政党；是什么让敌对

方的世界观屈服，是因为其本身至今还没有塑造出一个统一的思想代表。并不是对一种观点漫无边际地肆意进行宣扬，而是以一个在特定范围内和团结一致的政治组织形式才能够与一种世界观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

所以，我尤其认为我自己的任务就是从有关世界观这些大量的、原始的材料中剖析出其核心思想，并且多少要把它重新打造成为一种具有明确含义的、能够使人感到有责任团结一致的理论。也就是说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就是要从一般民族主义世界观的基本思路中采纳基本特征，要考虑到实际的真实情况、时间和现有人员的因素以及其弱点，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种能够让紧密组织起来的广大民众为这种世界观取得胜利的先决条件而奋斗到底的政治信仰。





第三章 国家

早在 1920 至 1921 年期间，今天得以有幸活下来的资产阶级就对我们新兴的群众运动不断地进行指责，说我们的立场观点对于现在的国家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因为这样会使那些派别政党的强盗行径合法化，所以就可以使用一切手段对这种刚刚出现且不合时宜的新世界观的传播进行遏制。也许人们当然会忘记这样一种看法，那就是现在的资产阶级自己对国家这个概念就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也无法给出一个完整的定义。而通常的讲解人也不过是国立高等院校里的那些法学教师罢了，他们这些人最崇高的任务无非就是给赏赐他们面包的人多少也要找到些说法和解释而已。一个国家越是不可能取得成就，那么其存在必要性的含义就越不明确，就越矫揉造作和无法理解。比如说一位大学教授如何去描写在同一片土地上皇帝时代和国王时期也许是历来最大怪胎化身的国家的意义和目的呢？对于今天实际上在国家重大事务方面很少承担责任的老师来说相反却还要和某一个特定的目的联系起来，要是想一想这的确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国家存在的目的就是要不惜任何代价去维护适合于人类社会体制，现在称其为国家的这个庞然大物的存在。要是为了在“伦理”、“习俗”、“道德”以及其它思想价值观的大杂烩里掺入责任和目的这类东西而尽量回避真实想法的话，那么当人们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时也就不会感到惊讶了。

通常完全可以按照以下三种见解来进行区分：

一) 这些人简单地把国家看成是政府统治下人们或多或少自愿结合起来的結果。

这部分人是大多数。这其中尤其还有我们今天合法性原则的拥护

者，在他们的眼中人类的意志在整个事件中根本就不起什么作用，而实际上一个国家的存在对他们本身来说就是一件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事情。为了保护人们头脑中这些胡思乱想，因此正好就需要卑躬屈膝地崇拜所谓的国家尊严。所以在这些人的脑子里一下子就把手段当成了最终的目标。为了服务于人类，国家就不复存在，而人类的存在则是为了崇拜专门庇护官僚的国家尊严。因而这种无声的、痴迷的崇敬不会出现不稳定的状况，所以国家尊严本身也就只有去维护安定与秩序了。即使现在也不再有什么目的和手段。国家尊严所担心的无非是安定和秩序，而反过来安定和秩序也又实现了国家尊严的存在。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在巴伐利亚代表这种观点的首先是那些巴伐利亚中央党，即“巴伐利亚人民党”的政客们，在奥地利则是黑黄联盟分子，可惜就是在国内常常被称为保守分子的那些人对国家持有这样的观点。

二) 第二种人在数量上要略少一些，因为至少要把和国家存在的几个条件相关的人算做是这样的人。他们所期望的不只是同样的统治，甚至在可能的情况下还希望同样的语言，尽管这也不只是出于一般统治手段方面的原因。国家尊严不再是国家本身唯一和最终的目的，而是还要考虑到提高国民的福利待遇。尽管大部分情况下都被误解的“自由”的概念也归属到国家观念这个范畴内。政府形象通过其本身存在的事实也不再显得是不可侵犯的，反而要对其目的的实用性进行审视。往日的荣耀抵挡不了今天的指责。另外还有一种观点就是国家特别期待从实用主义观点出发并按照一般经济上唯利是图的观点来评价的个人经济生活中的有利表现。这种观点最主要的代表人物通常就是我们德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自由民主党。三) 第三种人在数量上是最少的。

他们把国家看作是实现一个大部分人都还搞不很清楚的、在语言上独特和统一的民族国家强权政治的工具。对于使用统一的官方语言的意愿不仅表达出了为增强国家实力而提供一个坚实基础的期望，而且这也至少不失为一种使民族主义化进程能够朝着一个特定方向发展的看法，但顺便说一下，这基本上是错误的。

必须要看到近百年来一个不幸就是看看这些人是怎样玩弄“日耳

曼化”这个词的，而有时这还认为这是最好的信仰。我自己还能回想得起来在我少年时代恰恰就是这个词是怎样完全意想不到地产生误导的。以前在德国就曾经听说对于在奥地利的德国人来说在奥地利的斯拉夫人的日耳曼化兴许在政府的帮助下能够成功，而同时人们至少还不清楚的是日耳曼化进程只是在土地上进行的，而从来没有涉及到个人。因为人们一般对这个词所理解的在表面上只不过是强制性地接受语言。但这几乎是理解方式上的错误，就像我们所说的可以相信一个黑鬼或者一个中国佬都可以变成德国人一样，而只是因为他学过德语，而且还准备将来讲德语并且还还为德国某个政党投票。而我们国家的资产阶级对此从来就弄不清楚，像这样的日耳曼化实际上是非日耳曼化。因为如果今天要是通过强制推行一种语言就可以克服并且最终消除各种各样不同民族之间迄今为止明显差别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一种退化的开始，因此在我们看来这并不是日耳曼化，而是在毁掉日耳曼的特征。尽管对于外来民族来说征服者的统治手段强迫被征服者接受他们的语言而取得了成功，但是一千百年后他们的语言却被另外一个民族所使用，所以胜利者反倒变成了失败者，像这样的情景历史上是常常发生的。

因为民族或者种族的差别并不在于语言，而是在于血统，所以要说到日耳曼化的时候就只有在改变了被征服者的血统以后才能够称得上是成功的。但这是不可能的。除非通过民族融合才会发生血统的改变，而这样就意味着高贵种族品质的下降。而这样发展的最终结果也就是正好消除了从前征服者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的民族特征。通过和劣等民族的结合尤其会丧失文明的特征，即使是所生出的杂种千百年来还都讲着原来优等民族的语言。而且还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发生不同精神思想之间的某些较量，这或许是因为不断沉沦的民族出于某种程度上的最后奋争而显露出令人惊讶的文明价值所在。这种只有优等民族才具有的个性特征或许杂种也会有，这在第一代杂种身上优秀民族的血统还会显露出来，还能取得成效，但杂交的最后结果却不会永远是这样的。在他们身上显现出来的则总是文明退化的现象。

约瑟夫二世打算停止这种日耳曼化进程在今天看来应该算作是一

种成功。或许其成功之处就在于维护了奥地利这个国家，尽管由于语言相同的原因也导致了德意志民族整体水平的降低。在近百年的过程中兴许是逐渐形成了群体意识，但群体本身却变得低级了。也许这样会诞生出一个国家民族，但一个文明的民族却消失了。

对于德意志民族来说停止这种民族融合会更好一些，即使不是因为出于什么高见，而是由于哈布斯堡王朝的目光短浅和头脑狭隘的原因所致。要是不这样的话，那么今天的德意志民族就更谈不上有什么文明特征了。

并不只是在奥地利，就是在德国国内过去和现在都是在所谓民族主义错误思路的范围里兜圈子。许多人支持考虑到东方日耳曼化的波兰政策可惜到头来也是出自于同样荒谬的结果。甚至还有人相信通过纯粹语言上的德意志化就能够实现带有波兰特色的日耳曼化。这样也就导致了一个很不幸的结果：一个讲德语的异族表达他们自己的想法，这使我们民族的高贵与尊严由于他们本身的低劣而名誉扫地。

那些讲得磕磕巴巴德语的犹太人在踏上美国的土地时，由于不认识美国人把什么都算到了德国人的头上，像今天这样间接地让我们德意志民族所遭受的损失该是多么的可怕呀！那些大部分来自东部的通常还讲着德语，身上还长着虱子的流浪民族发现了他们的德国身世和籍贯，难道就没有人想到这表面上就能看得出来的事实吗。

历史上日耳曼化进程所带来的好处就是我们的祖先用利剑所获得的并且让德国的农民定居下来的土地。但只要他们还给民族的躯体内存入异族的鲜血，那么他们就会造成那种可惜甚至还大加赞赏的表现为我们德国人极度个人主义的，使我们民族本质特征分裂的不幸后果。

即使是对第三种人来说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也只不过是目的本身，维护国家的存在因此也就是人类生存的最高职责。

总的来说可以肯定的是：所有这些观念都有其根深蒂固的原因，但

却没有认识到文明及价值观的力量基本上是来自种族的因素，正因为如此，所以国家的最高职责就是要注重维护和提高作为所有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前提的民族自身的生存。

从那个叫作是马克思的犹太人关于国家本质和目的的错误观点和看法所得出的推断就是：是资产阶级把国家这个概念从民族所应负有的责任中分离出去的，而没有能够用其它某种近似公认的词语来进行表达，所以他们自己为否定国家本身的理论铺平了道路。

所以，在这个方面资产阶级针对马克思国际主义思想的斗争就完全地失败了。资产阶级自己早就把支撑他们自己思想观念所真正必需的基础奉献出去了。他们狡猾的对手已经认识到了资产阶级自身的弱点，并且利用资产阶级自己本身虽然是不情愿所提供的武器，向资产阶级发起了攻击。

因此，对于一个建立在民族主义世界观基础上的新兴的群众运动首先就有责任为对国家的本质及其存在目的而取得一致明确的认识而感到忧虑。

所以，原则上应该认识到国家并非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国家也许是建立人类更高文明的前提条件，尽管这不是原因所在。这更多地取决于有能力创造文明的民族的存在。世界上能够存在上百个完美的国家，而由于雅利安文明的消亡而使得适合于当今时代高尚民族精神的高度文明不复存在了。我们可以进一步地说，只要是因为缺少民族主义思想的支持者而失去了人类卓越的思考能力和灵活性，那么人类建立国家这个实际情形至少不排除人类灭亡的可能性。

比如说现在由于地球表面构造的原因而产生不稳定的结果并使海洋的浪潮冲出一个新的喜马拉雅山，那么这场唯一能够灭绝人类的灾难也毁灭了人类文明。不会再有国家存在了，一切制度的约束都解除了，千百年来人类发展的文献都毁掉了，世界变成了一个水患泛滥泥泞四溢的巨大停尸场。如果从这场可怕的灾难中仅仅只有少数具有一定文明创造能力的民族存活了下来，那么也要在一千年以后地球才会在其平静后

重新获得人类创造力的见证。只有最终消灭具有创造文明能力的民族或者他们的代表人物才会最后使地球变得荒芜。与此相反我们自己也看到了在国家形成的初期阶段由于缺少民族主义思想天才的代表人物而无法使国家免于遭受衰亡。所以正如史前时代许多大型动物不得不退让于其它物种并且还消失得无影无踪一样，如果人类缺少能够让他们找到维护其生存武器的特定的思考能力的话，那么他们也不得不屈服。

不是国家本身创造了特有的高度的文明，而是国家维护了创造文明的民族。也就是说国家可以像这样继续存在上百年，同时由于国家不阻止民族之间的融合而使得一个民族的文明创造力和与此相关的普通生活状况也长期遭受到剧烈的动荡。比如说今天的国家作为一种组织机构形式反正在很大程度上兴许长期是在伪装其存在，即对我们民族躯体所进行的毒害造成了现在就让人感到惊奇的文明衰退。

所以，更加伟大人类文明存在的前提不在于国家的存在，而是取决于有创造文明能力的民族的存在。

这种创造力基本上总是存在的，而且还得通过起到一定实际作用的外部条件来予以启发。即使是当目前外部不利的环境条件不允许具有文明及其创造力的优秀国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民族施展他们的才能，但他们仍然具有隐含着创造的可能性。因此把史前时代的日耳曼人说成是“不文明的”野蛮人则是非常荒谬的。他们从来就不是这样的。北欧地区严峻的生存环境束缚了我们的祖先创造力的发展。要是没有什么古代文明，我们的祖先也会来到南部这水草丰美的地方，也会把劣等民族当作能够获得的原始工具来使用的话，那么他们所蕴藏的文明创造力也会像希腊人那样绽放出耀眼的光芒。只不过他们这种创造文明的动力本身与北方的气候条件很不适宜。就像来到南方的北欧爱斯基摩人一样也很少会发挥创造文明的作用。不，不论是蕴藏在他们自己心中，还是他们自己所拥有的或者是他们给予了正在觉醒的人们，不管是有利的环境条件所允许还是贫瘠的自然条件所阻止，这种崇高的创造力恰恰赋予给了雅利安民族。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国家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国家的目的是维护和促进肉体和精神生命体的存在。而维护生命本身则主要包括民族生存并且由此允许所有这种蕴藏创造力的民族自由发展。这其中首要部分则是要有利于维护生命的存在，其它部分才是促进精神的发展。实际上是前者为后者制造了前提条件。

不是服务于此目的的国家是错误的，是怪胎。这种国家存在的实际结果和将海盗团伙的掠夺行径合法化没有什么两样。

我们作为国家社会主义者只能是新世界观的捍卫者，而决不站在那个著名的“以事实为依据”的一边，因为那是错误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再是伟大的新思想的捍卫者了，而成了当今世界上谎言的苦力。我们非常深刻地认识到国家就像一个罐子，而民族就是里面装的东西。这只罐子只有一个用途，那就是维护和保护里面装的东西，其它则毫无价值了。

所以，民族国家的最高目标就是要维护民族成员的基本生存，他们才是高贵的人类文明、美德、尊严的创造者。而我们雅利安民族就只能是国家里一个并不只保证维护民族生存，而且还通过其精神思想的创造力得到最大自由的民族活生生的生命体现。

是什么让我们在今天不禁想起有关国家这些事情，就是因为人类把巨大的痛苦当作后果而误入歧途所产生的结果。

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知道我们作为革命者持这种观点并且还遭到了指责。而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决不应该被一时的赞许或者反对所左右，而是取决于对我们所认同的真理所应承担的责任。所以我们才能够确信我们的后代不仅理解我们现在的行为，并且还要认为这是合理的并加以推崇。

这对于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来说就形成了对国家评价的标准。这种出于每个民族观点的评价是相对的，但绝对是出于人性本身的。也就是

说：国家的好坏不能按照这个国家在这个世界上的文明程度或者政权的重要性，而是要根据这个政权机构对待相应国家人民的好坏程度来进行评价。

一个国家之所以称其为典范，那不仅是因为这个国家符合其所代表民族的生存条件，而且这个民族还恰好在其自我生存的实际生活过程中能够得到不论是那一种都适合这个国家情况的文明的意义之所在。因为国家的职责本身就不是去制造什么能力，而只是为现有的力量创造自由发挥的可能。而反过来说尽管一个国家具有很高的文明程度却反而使其民族的文明面临毁灭，那么这样一个国家就是不好的。因为毕竟这样的国家实际上也就破坏了不是国家所创造的，而是通过实际存在的国家理念所保护的民族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得以继续维护文明存在的前提。国家本来就不是一种实物，而只是一种形式。这并不是把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民族高度发展的文明来当作衡量一个国家好坏的标准。很容易理解的是一个具有创造文明天赋的民族就会比一个黑人部落更能成为一流的榜样，尽管其最初的国家机构就其目的来说比黑人部落要糟糕得多。虽然最好的国家和最好的国家形式无法从民众那里得到本来就缺少甚至从来就不存在的文明创造力，那么不好的国家接下来就肯定能够通过其所允许或者所需要的对民族文明的毁灭来消除其所具有的原始的文明创造力。

因此，对一个国家好与坏的评价首先只能由其所给予人民的相对利益来决定，而不取决于其本身在这个世界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这种相对的判断是可以快速和正确地得出的，但对于其绝对重要意义的判断却很难做到，因为绝对的判断根本就不再由国家来进行，而更多地取决于某个民族的好坏和文明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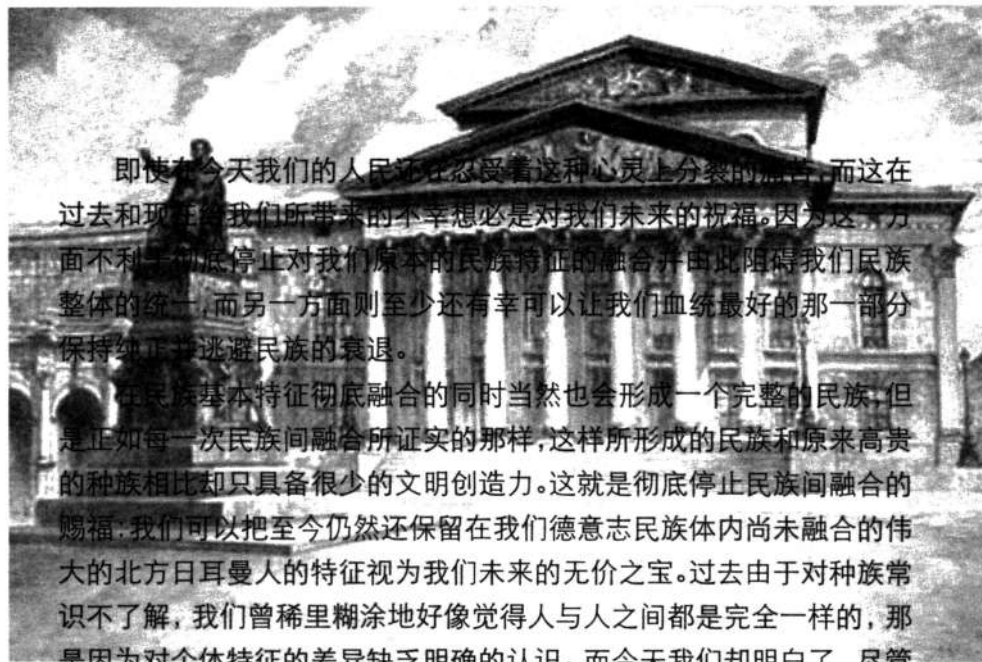
如果人们在谈及到国家的主要职责时，那么不要忘记的是其主要的职责在本质上就是要考虑到人民，国家只是要通过现有的国家权力来为人民的自由发展提供可能的条件。

如果我们要问国家应怎样做到我们德国人所需要的这些，那么我们

首先必须清楚的是德国都有些什么样的人和要达到什么目的。

可惜我们德国人不是来自于一个统一的民族。各种不同民族之间的融合过程还没有完全停止，因此人们可以说这还是一个新形成的民族。与此相反，对我们民族躯体血统上的侵害早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就已经发生了，这并不是对我们血统的破坏，并且也是对我们灵魂的摧残。我们祖国尚未划定的边界，非日耳曼异族长期聚居在边境地区，特别是外来民族的血液不断地注入到我们帝国的体内，由于不断地进行更新而使得真正的民族融合没有时间进行。而这样制造出来的不再是一个新的种族，而只是些残缺不全的碎片，其结果，尤其在历史的紧要关头通常是要把他们聚集起来的时候，那么德意志民族就随风四处飘散了。不只是在地域方面民族的基本成员有不同的分布，而且即使是每个人在相同的地区情况也有所不同。一个北欧人的隔壁住着个来自欧洲东部的人，一个东欧人的旁边生活着一个迪纳拉族人，而他们两个的邻居却是欧洲西部的人，大家就这么混杂在一起。这在某一方面有很大的缺陷：这对于我们德意志民族来说则缺乏某种特殊的、来源于同一血缘的、特别是在受到威胁的时候保卫国家免遭毁灭的、而特别在这一点上像这样的民族通常会克服所有无关紧要的内部分歧而团结一致形成统一战线来抵御共同敌人的群体意识。与各种不同形式与我们民族不相融合的基本特征并存的就是我们称之为极度个人主义的东西。它在和平时期有时或许还能起到好的作用，总的说来还让我们得以统治世界。要是德意志民族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能够团结一致的话，就像有利于其它民族那样，那么德意志帝国或许今天兴许就是地球的主人了。那世界历史的进程就会是另外一种情形，而且也不会有人来决定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像今天这么多受蒙蔽的和平主义分子用恳求和恸哭所期望能够乞求到的：和平，这不是靠带有和平主义怨妇眼泪的棕榈枝，而是要靠以高度文明服务整个世界的民族胜利之剑来建立起来的。

这种在血统上不统一的实际情况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痛苦。这让德国众多大大小小的权贵割据一方，却剥夺了德意志民族自主的权利。



即使在今天我们的人民还在忍受着这种心灵上分裂的痛苦，而这在过去和现在给我们所带来的不幸想必是对我们未来的祝福。因为这一方面不利于彻底停止对我们原本的民族特征的融合并由此阻碍我们民族整体的统一，而另一方面则至少还有幸可以让我们血统最好的那一部分保持纯正并逃避民族的衰退。

在民族基本特征彻底融合的同时当然也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民族，但是正如每一次民族间融合所证实的那样，这样所形成的民族和原来高贵的种族相比却只具备很少的文明创造力。这就是彻底停止民族间融合的赐福。我们可以把至今仍然还保留在我们德意志民族体内尚未融合的伟大的北方日耳曼人的特征视为我们未来的无价之宝。过去由于对种族常识不了解，我们曾稀里糊涂地好像觉得人与人之间都是完全一样的，那是因为对个体特征的差异缺乏明确的认识。而今天我们却明白了，尽管我们民族特征和其它民族进行彻底融合所形成的团结统一兴许是给了我们表面上的权力，但人类最崇高的目标却无法实现了，而正因如此上天为了圆满实现这个目标显而易见地选中的这个唯一的文明民族在统一民族的大杂烩里才会走向灭亡。

出于我们现在所领悟到的观点，我们今天应该对不靠我们的帮助而是依靠上天来进行阻止的东西重新进行审视和估量。

谁要是谈到德意志民族在地球上的使命，那他就必须要知道，这个使命就是要能够建立起一个其最高职责，即维护和促进我们高贵的民族特征完好无损地保留下的，让整个类都会看到的国家。

因此，国家第一次就有自己的崇高目标。与那些要确保安宁与秩序而实则是为了相互间和平地进行欺诈的可笑的口号相比，这种维护和促进上天赐予这个世界的人类的职责才是一件真正伟大的使命。

从一个要求只为自己的意愿、死气沉沉的组织机构应该塑造出一个富有生命力的体制并且只有一个目的：为一个崇高的理想服务。

德意志帝国应该是一个包括所有德意志民族的国家，其职责就是不

只是要保持和维护这个民族中有价值的原有的民族特征，而且还要使之逐步上升到统治的地位。

所以，为此就出现了基本上处于僵持状态的斗争阶段。人们常说“停滞就会生锈”的话仍然有它的道理并且在这个世界上仍然行之有效，也就是说只有进攻才能赢得胜利。我们面前的目标越是伟大，广大民众对此的了解和支持反而暂时会越少，可根据世界历史的经验来看，只要能够正确地把握住方向目标并且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地将斗争进行下去，那么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取得成就的意义则会更加不同寻常。

而维持现状总比进行战斗当然会让我们今天许多所委任的国家领导人感到心安理得。他们很简单地把国家看作是一部只是单单维持他们生存的机器，正如他们一再常说的那样就连他们的生命也都是“属于国家的”。就好像对于其他人而言源自民族特性的东西理所当然本来就可以当作是民族特性来看待，或者说人类对其它不同的物种所产生的作用同样也可以影响到人类自己。这样自然就会很容易地把国家威望看作是表面上的组织机构，而不是这个世界上为了维护民族自我生存主权的化身。因为一方面对于那些软弱无能的人来说不仅是国家而且还有国家威望已经就是目标本身，另一方面这也不过仅仅是一种为了伟大而永恒的自我生存而战的有力武器，一种人人都必须服从的，形式上不是机械的，而是为了自我生存共同意愿的表达。

因此，在为符合原有精神思想的新立场观点而奋斗的过程中，我们要尽量少在那些不只是体力上而且可惜常常还在思想上都很陈腐的众人当中去寻找我们的战友。但唯一的例外就是要选出仍然有颗年轻的心和富有朝气精神的年长者加入到我们的队伍里来，而不需要只把维持现状看作是生命中头等大事的那种人。

我们所面对的与其说是怀有恶意的坏人，倒不如说是思想懒惰漠然冷淡而只知道维持现状的那种人。光是针对这种显而易见的毫无主见所进行的斗争就奠定了我们职责的伟大和赢得胜利的机会。而从一开始就把那些渺小的思想家吓跑或者使他们泄气的战斗召唤同样也是招集真正战友的号角。人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从民众当中把一部分具有

充沛体力和精力的人们团结在同一个目标之下并且因此最终让广大群众摆脱掉懒惰的习性，那么这小一部分人将会跃然成为大多数人的领袖人物。世界历史是由少数人所创造的，并通过这些少数人来体现出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决心。

所以，现在对许多人显得很难理解的东西实际上倒是我们取得胜利的前提条件。而恰恰就是因为我们使命的伟大和艰巨，我们才有可能在战斗中找到最好的勇士。他们才是我们取得成功的精兵良将。

一般来说大自然常常会对地球上的生物物种的纯洁性进行一定程度上的优胜劣汰。大自然不太喜欢杂交的品种。尤其是那些通过第一代杂交后，而在第三、第四、第五代身上才遭受痛苦的杂种。对于它们来说并不只是意味着原有高贵特征的混合，而是由于缺少物种的统一因而也完全丧失了生存的毅力和决心。在所有艰难的情况下，同样物种的生物会采取正确的、甚至还是一致的行动，而分裂的、不确定的物种则会半途而废。相对于物种的统一这不仅意味着物种分裂的某种弱势，而且实际上也是更快地走向衰亡的可能。在许多情况下能够经受得住考验的物种就能够战胜混杂的物种。其中也包括大自然的优胜劣汰。而且大自然往往还进行得更加彻底。大自然会限制继续繁衍的可能。因此也就会阻止物种之间继续杂交融合并且完全消灭所制造出来的结果。

比如说由于某种原因某个特定种族与一个低劣的种族相结合，相对于没有进行混合杂交的种族来说，那么接下来的后果就是这个种族自身水平的下降，还有就会生出虚弱的后代。完全阻止从高贵种族继续补充血液就会使得种族双方不断交合所产生的杂种要么因为大自然的明智减少其抵抗力而使其消失，要么在几千年的过程中形成新的混血儿，在他们身上原有的个体特征在千百次的融合后已经彻底地浑然一体而无法进行分辨了。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具有某种群体抵抗力的新民族，也就是说相对于第一代杂交时高贵种族在精神文明方面的功能明显地减少了。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未经融合的高贵种族作为一方仍然存在，那么在双方为生存而战的斗争中混血儿就会失败。所有具有群体意识的、经过千百年来所形成的新民族内部的团结一致由于种族水平的整体

下降以及由此所引起的思想灵活性和创造力的降低,是不足以在与一个团结一致的、在精神和文明程度上都占优势的民族进行战斗的时候经得起胜利的考验的。

因而人们可以确信:只要在物种融合的过程中某种纯洁的特征以某种方式依然存在的话,那么物种之间的杂交早晚都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杂种的衰亡。杂种所面对的这种危险只有当最后那一点点高贵物种纯正特征都融合掉的时候才会得到消除。

即使也有大自然新陈代谢缓慢进程的原因,而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只要物种纯正特征的基础还存在,并且不再继续进行物种之间的杂交,那么对物种的毒害就会再次渐渐地消除掉了。

对于有着强烈物种本能的生物只有在特殊的情况或者在某种特别的强迫之下才会脱离正常的纯化物种的繁衍方向。只要这种特殊的强迫情况结束了,那么剩余下来的那部分纯正物种就会立即又表现出与同类进行交配的欲望,从而制止了继续混合杂交的情况。不同物种之间杂交的结果因此而自动处于次要的地位,除非他们在数量上已经增加到所剩余的纯正的物种特征无法真正形成反抗力量的时候。

人类一旦变得没有了天性并且错误地看待危难时刻所应承担的职责,那么当人类无法明显地认识到要通过必要的改邪归正去弥补已失去的天性的时候,通常也就不要指望大自然的优胜劣汰了。这种因为人类的一时迷茫而一再破坏的种族间交合的界限而最终失去其最为优秀特性的危险性却很大。然后实际上就只剩下一个人类当作理想呈现给那些了不起的想要改造世界的人们眼前的那种统一的大杂烩,这反倒很快地把人类的理想从这个世界上给赶走了。当然一群乌合之众可以像人们训练一群动物那样调教出来,但作为文明的代表或者是文明的缔造者和文明的创造者的人类是无法通过这种杂交的方式产生出来的。因为这样的话人类的使命也就终结了。

谁要是不愿意面对这个现实,那就必须要改变观念,这尤其是日耳曼国家的使命,并且首先要基本上考虑到终止继续进行种族之间的融

合。

很显然我们今天的一代病秧子们肯定会立即振臂高呼表示反对，并且还会对侵犯最神圣的人权进行痛诉和抱怨。不，只有一项神圣的人权，并且这个权利同时也是一项神圣的职责，也就是说：要考虑到维护血统的纯正，为的是通过对最优秀民族的保护给予他们以优先发展的可能。

因此，一个民族国家首先就要把婚姻从不断给民族丢脸的境遇中提高到能够赋予其神圣的职责，并向上帝保证不要生出人和猴子的怪胎。

出于所谓人道因素的反对意见尤其是不合时宜的，因为一方面给腐化堕落提供了繁衍的可能，其结果本身也给当代带来了极其痛苦的负担，同时另一方面又可以让每个药店甚至连街上的小商贩都向健康的父母兜售避孕药物。在今天这个秩序井然的国家里，在其勇敢的代表人物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的眼中就连阻止梅毒、肺结核、遗传性疾病患者以及残疾和白痴的生育都是一种犯罪，而反过来对上百万的精英实施节育却认为不算什么坏事，也不认为这是触犯了貌似神圣的良好的社会道德，而更多只会有利于那些目光短浅没有头脑的人。要不然他们至少还得为如何给曾经是我们民族健康的代表人物提供养育和生存条件以及应该让后代也担负起同样的使命而绞尽脑汁了。

而整个社会制度又是多么极其的不理想和不完善！人们不再忙着为后世去培育优秀的人才，大都得过且过、随波逐流。同时我们的教会也对上帝犯下了罪行，教会的意义在绝大部分情况下还是得到肯定的，但就其今天所起到的作用来看完全就在于谈论灵魂和受难者本身而让人们蜕变成为堕落的无产者。然后当然也就带着痛苦的表情对天主教信仰在国内微不足道的作用表示惊讶，对在肉体上受到摧残当然也在精神上腐化堕落的无赖那可怕的“无神论”表示赞赏，为此还像对待霍屯督族人和祖卢卡菲尔族人所取得的成就那样用教会的祝福去寻求安慰。当我们欧洲人在精神和肉体都处在病入膏肓的时候，天哪，那些虔诚的传教士却游荡到非洲中部去向黑人布道，直到我们“高贵的文明”在那些健壮的、即使是原始落后和未开化的孩子们中间弄出个懒散的杂种为止。

如果我们两大天主教教会不去为本来就对此既不愿意也不理解的黑人去传教而向我们欧洲人进行善意真诚教诲的话，这样就可以从不健康的父母那里得到一个让上帝略微感到满意的杰作，帮助把一个健康、可怜、年幼的孤儿交还给他的父亲和母亲，而不是让一个生病的、只会给自己和其他人带来不幸和痛苦的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那就更加合乎这个世界高贵至上的精神。

特别是在这个方面所耽搁的事情，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现在就应当进行弥补。民族国家所有生活的中心任务就是种族事务。她要保持其民族的纯洁性。孩子是一个民族最为宝贵的财富。民族国家就是要负责只让健康的人们生儿育女，要是自己有病或者有缺陷而生了孩子就应该认为是一种耻辱，而如果他们这些人放弃生育则应该就是一种崇高的荣耀。反过来要是不给国家生育健康的孩子，那就应该看作是一种卑鄙的行为。对此国家应该作为千年远景的保护者，与此相比，个人的利益和愿望就显得无足轻重并且要服从这个大局了。国家应该具备并且掌握最先进的医疗设施。无论怎样明显的病症和遗传疾病并且因此还在继续起着危害的作用，国家就应宣布其不宜生育的理由，并且实际上能够得以实施。相反国家还要考虑到不要让给多子多孙的父母造成麻烦的政府糟糕的经济财政来限制健康妇女的生育。国家必须要消除掉那种懒惰的、如同犯罪一般的、在今天就是这样对待多子多孙家庭的漠不关心的社会氛围，而取而代之的则是作为一个最高保护人要感到这是给一个国家珍贵的赐福。和成年人相比国家要更多地照顾儿童。

谁要是在肉体和精神上都不健康并且也没有什么使用价值了，那就不准把他的痛苦遗留给他的孩子身上。对此民族国家要承担起巨大的教育职责。教育工作曾经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就像在今天资本主义时代取得战争的胜利一样。国家通过教育工作来培养每一个人，使他们明白体弱多病并不可耻，那只不过是一件值得同情的倒霉的事情，而要是因为自己的自私自利而玷污了不幸，同时还殃及到无辜的人们，那就是犯罪，是一件丢人的事情；与之相反是一个无辜的患者放弃生育自己的孩

子，并且把他的慈爱和柔情给予一个毫不相识的、穷苦的、新生的婴儿，这个孩子健康地成长起来并将成为一个强健民族中健壮的一员，这样就是崇高思想品质的表现，是值得赞赏的人格。对此方面的教育工作国家要做一些实际行动上的精神鼓励。在这方面国家必须要严格掌握人们对此的理解或不理解以及同意或反对的情况。

对身体有缺陷和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在生育能力和生育机会方面进行六百年的限制不仅可以让人类摆脱掉无法估量的痛苦，而且还能得到在今天看来都几乎无法得到的健康状况。如果能够实现这种明智的、有计划的健康人口生育的话，那么所造就出来的民族最起码就已经排除了我们今天在体力和精力方面堕落的基因了。

因为只有当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走上了这样的道路，才会把注意力放在一个民族最有价值的核心问题上，才会提高生育率，最终让整个民族来分享上天对所培育出优等民族的赐福。

因此，一个国家对新开垦土地的安置工作就不是偶然的举措，并且要形成特别的惯例。自己组建起来的移民委员会要给每个人开具移民证书，这也是维护某个种族纯洁的一项工作内容。这样就能够在周边地区建立许多的殖民地，那里的居民同样也是高贵种族血统的代表人物，并且因此具有高贵种族的优良品质。所以他们也就是整个民族宝贵的国家宝藏，他们不断地壮大对我们民族的每一个人来说都充满了骄傲和信心，这其中就包含着我们民族未来发展的根基，也就是人类发展的萌芽。

民族主义世界观最终只能在民族国家里得以实现，这会带来一个人们并不只注意到对狗、马和猫进行关心照料，而且还会关注对人类自身的蓬勃发展的辉煌时代，这同时也是一个一方面意识到要默默地放弃，另一方面乐于牺牲和付出的时代。

不可否认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们会自愿地过着独居的生活，他们无需承担什么责任，就像受到某种教会戒律的限制一样。

如果设身处地地告诫他要最终阻止对民族不断进行毒害的罪恶行径，并且要奉献出如万能的上帝自己所创造出的人性，难道他就不应该有可能放弃生育权力吗？当然我们今天那些庸俗的市民对此是永远都无法明白的。他们会对此进行嘲笑或者无奈地耸耸肩并且还会借口叹息道：“这种事情本身很好，但还是不要这样做吧！”。和你们这样的人当然不会有什么作为，你们的情况不适合做这样的事！你们只知道关心你们自己的生活和上帝：那就是你们的钱！所以我们就不会把精力放在你们这些人身上，而要关注穷苦的广大民众，把关注他们的生活视为全世界最大的幸福，关注那些并不把君主的存在只看作是金银财宝，而且还要相信其它上帝的人们。我们要特别关注德国的青少年这支庞大的队伍。他们成长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历史转折时期。由于其父辈们的懒惰涣散和漠不关心而导致的失误迫使他们要自己进行奋斗。德国的青少年要么是一个民族国家新的主人，要么就是全然崩溃的见证人并且还要亲身经历资产阶级末日的来临。

因为当一代人遭受到他们所认识到的，甚至是他们所认同的错误所造成的苦难，可他们反而就像当今的资产阶级所做的那样仅仅满足于某种空洞的解释而对此采取无所事事的态度，那么这样的一个社会阶层就会走向衰亡。而今天我们资产阶级的本性恰恰就是完全无法遮掩自己的缺陷。他们必然会变得十分的腐朽和衰败，可他们却无法下定决心来对抗这些恶习，把六千万或者七千万人民坚不可摧的力量团结起来去阻止危险的发生。相反，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别的什么地方，尚且可以用些无聊乏味艰涩难懂的话来做说明，人们至少可以作为旁观者试着用理论上的不可操作性来给予论证，并且还可以解释为一种无法预期的结果。对此没有足够的理由幼稚到不支持自己的目光短浅及其思想观点。比如当整个国家最终向酗酒宣战，为的是把民众从这种可怕恶习的约束中解救出来，而我们欧洲的资产阶级除了傻呆呆地无话可说和摇头表示反对之外就只剩下轻蔑的微笑了，而这才是这个最可笑的阶级所特有的模样。但如果一切都无济于事而那些无论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貌似庄重不可侵犯的陈规旧俗仍然遭到反对却完全没有取得成功，那就得像人们所说的那样至少要对这种东西表示怀疑和进行贬斥，同时毫不畏惧地投入

到反对世俗道德观点和与极其不道德的东西寻求决裂的战斗之中去。

不，对此我们大家不应该感到失落：对于人类伟大的使命来说，当时我国的资产阶级已经毫无价值可言，很简单，因为他们不够格，甚至道德败坏；并且糟糕的是，至少在我看来，比起他们难以置信的冷漠无情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来说，他们更多地是有意而为之。因此那些称之为“资产阶级政党”的政治俱乐部也不过是某些行业集团和社会阶层的利益团体，并且其最为重要的使命就只是要尽最大的可能来代表他们的自私自利。显然像这样一类政治化了的“资产阶级”协会组织更适合去进行战斗；尤其是当他们的对手不是由谨小慎微的富人，而是由那些在受到极度的蛊惑和煽动下才最后下定决心的广大的无产者所组成的情况下。

如果我们认识到国家的首要职责就是为了服务于人民造福于人民来维护、照料和发展优等民族，那么理所当然的就是不仅要认真地延续这个优等民族儿童的生育，而且还要把儿童培养成为一个对今后民族繁衍有用的人。

并且，一般情况下决定思维能力的条件取决于现有人类的素质水平，因此，必须要首先关注和支持民众身体健康方面的教育；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健康强健的智慧只有在同样健康强健的身体里才能找得到。而那种天才有时在身体健康方面欠佳甚至是有病的事实是不足以挂齿的。按常理来说这也不过是个例外罢了。如果一个民族的大部分成员都是些体力虚弱的人，那么从这种烂泥塘里是很难会出现真正伟大的思想家的。他就是取得了成就也绝对不会有影响。那些堕落的流氓无赖要么对他完全无法理解，要么就是虚弱到再也无力去追随他的鸿鹄之志了。

民族国家认识到了这一点那么首先就应该把教育工作不只是放在灌输知识方面，而且还要放在培育健壮的身体方面。其次才是对思维能力的培养。这方面主要是培养个性的发展，特别是促进意志和毅力方面

的发展,这和责任心方面的教育紧密相连,而最后才是知识方面的教育。

同时民族国家必须要认识到尽管一个人没有受到太多知识方面的教育,但只要他身体健康,具有良好的、坚定的个性,富于自信心和意志力,那么他对于民众来说就比聪明的病秧子要更有价值。一个有教养的民族如果在体力上衰竭了,那么就会意志薄弱,就只是些胆小的和平主义分子,是不会赢得上天的支持,也就无法保证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在与命运艰难的搏击中知识少的人则很少失败,而往往反倒是那些最不善于从知识中吸取经验教训并且还自以为聪明地采取行动的人才会失败。这方面最终必须要取得某种协调才行。一个病入膏肓的人至少不会因为具有某种伟大的思想而更加富于什么美感,是的,当思想的代表同时也是个身体虚弱、患有残疾,意志薄弱、摇摆不定、胆小怕事的人,那么高尚的思想教育就完全没有任何的说服力。是什么让希腊之美成为不朽的典范,是那健美的体魄和伟大的思想以及高贵的灵魂最为完美的结合。

如果毛奇所说的:“幸运终究只会眷顾有本事的人”有道理的话,那么就正好说明了身体和思想之间的关系,那怕是健康的思想通常也要长期地留在健康的身体里面的。

锻炼身体并不是民族国家中某一个人的事情,也不首先是让父母所关心的问题以及别人所感兴趣的事情,而是一项通过国家所体现和激励民众维护自我生存的要求。所以,正如国家在涉及到纯粹知识方面的教育工作在今天则牵扯到个人自主权利的问题以及与此相对代表集体权益的问题,对此国家则不管父母愿意或者不愿意都应该要求孩子们遵守学校的规定,而且在维护民族生存的问题上要在很大程度上无论个人的无知和不理解,民族国家都要表现出自己曾经拥有的威严。国家要在教育工作方面有意安排青年人在最初的孩提时代就进行锻炼并为今后的生活练就出一幅好的身板。国家要特别注意不要培养出一代书呆子。

年轻的母亲早就已经承担起对孩子们的照料和教育工作。所以就有

可能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认真仔细地力争做到在孩子出生的时候保证清洁不受感染，并且尽量防止产褥热的发生，所以就有可能而且必须通过对护士和产妇自身的培训让孩子们在一开始就接受非常利于今后成长的锻炼。

对于锻炼身体，民族国家的学校应该不限时间地自由进行。这并不只是一件关于往稚嫩的脑袋瓜儿里填充东西的事情，从经验来看他们只会保留下一小部分，而剩下的常常还都是些无关紧要的次要的、反而不是主要的东西，因为年幼的孩子们还完全不能够对灌输给他们的东西进行理智的筛选。而当现在中学的教学大纲里只考虑到每星期有不到两小时的体育课，并且告知大家上体育课还不是必修课程的时候，那么与知识方面的课时相比就是很明显的失调。至少对于年轻人来说不可以一天没有体育锻炼，应该在上午和下午各有一小时的体育锻炼，并且要进行各种各样的运动和游戏。在此不应该忘记有一种恰恰在很多“民众”的眼里认为是粗野和有失身份的体育活动：那就是拳击运动。在这些“有教养”的人们当中对此有这样错误的想法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一位年轻人学习格斗，练习击剑就可以得到理解并受到尊重，而当他进行拳击就认为是粗鲁的！为什么。还没有一种像拳击这样的体育运动能够激发出如此的进攻意识、要求有快速的决断力和磨练出灵活的身体。比起用锋利的刀剑，两个年轻人因意见分歧而拳脚相加也不会就是更加野蛮。而当一个人受到攻击则用拳头回敬那个攻击者也不比那个受到攻击跑开去叫警察的人有多么的高尚。特别是健壮的年轻人要学会忍受打击。这在今天我们那些文人墨客看来显得有点野蛮。一个民族国家的使命肯定不是在殖民地去培养温柔的唯美主义者和体衰力竭的人。在正派的市侩或者规矩的老处女当中是看不到人类典范的，而是要体现在英勇无畏的男子汉气概和生育男子汉的妇女当中。

所以，体育完全不只是让一个人强壮、机敏和勇敢起来，而且他还要应该受到磨练和教导去忍受环境的不适所产生的痛苦。

要是我们整个有教养的上流社会在过去不受到如此温文尔雅礼仪

方面的教育而取而代之学习拳击的话，那么一场由掳客、逃兵以及类似流氓无赖所操纵的德国革命就完全不可能发生；因为这样的结果不是勇敢无畏的革命者的所作所为，而是那些领导国家和应该为国家所负责的、胆怯和无耻的动摇的行为。只不过我们全体有教养的领导人则更加“有教养”而必须毫无反抗能力地面对敌人不用有教养的武器而使用棍棒所采取的行动。这一切只有在我国的高等教育原则上不去培养男子汉而更多地只知道造就一些国家官员、工程师、技术员、化学家、法官、文学家以及不让知识消亡的教授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

我们知识方面的教育工作总是极其出色的，而我们意志方面的教育则常常遭到群起而攻之。

当然通过教育也不可能把一个本来就天性胆怯的人变成一个勇敢的人，所以非常肯定的就是，即使如果一个本身就不是胆小的人由于缺乏体力和敏捷方面的训练从一开始就不如别人的话，那么其性格表现上也就会失去活力。个人的勇气在体力方面出色的表现是如何使人信服的，也就是说是怎样唤起攻击意识的，人们最好通过军队来进行判断。这里面本来也没有什么真正的英雄，而只不过是些普通的老百姓。光是在和平时期对德国士兵所进行的大部分教育就给整个国家灌输了某种强烈的信念，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自己的优势不可能抗拒敌人。因为就是在1914年从盛夏到秋季的这几个月时间里，勇往直前的德国军人对永恒的进攻意识和攻击勇气所做出贡献的结果就是从长期和平年代里经常表现为虚弱的身体里迸发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激情以及面对巨大战场的恐惧也没有失去自信。

恰恰就是我们今天还跟着别人一起称颂帝国崩溃的德意志民族就需要这种源于自信的强大力量。这种自信必须得从孩童时期到年轻的国民逐步地培养起来。国家的整个教育和训练工作应该建立在能够超越他人的自信的基础之上。国家必须再次让全体人民相信其体力和机敏是不可战胜的。因为德国军队曾经所取得的胜利就是每个人对自己以及全体人民对国家自信的总和。德意志民族再次表示赞赏的应该是能够重新获



得自由的信念。这种信念只能是百万民众每个人共同意愿同时表达的

即使我们面临民族巨大的灾难以及为了总有一天结束这种困苦所必须付出同样艰辛的努力我们也不要陷入迷茫。谁要是相信我们的民族能够从目前资产阶级为了维护稳定和秩序的教育工作中获得力量并总有一天会打破今天这个意味着我们走向没落的世界秩序还要把奴役我们的锁链扔到敌人的脸上的话，那他就完全搞错了。只有充沛的民族意志的力量、对自由的渴望和高昂的激情才能弥补我们以往所缺少的不足。

而且我们青少年的服装都应该适合于这种目的的要求。看到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已经被奇装异服所征服真是感到痛苦，这恰恰助长了与“人靠衣装”的说法恰好相反的堕落。

特别是青年人的服装必须适应教育工作。一个在夏天穿着长裤、上身裹着严严实实的年轻人对于体育锻炼来说服装就已经失去了作用。因为平心而论即使是应当培养一定程度的虚荣心，但不要对不是人人都能买得到的漂亮服装产生虚荣心，而要羡慕人人都能够练就出的美丽、健壮的体魄。

即使是对今后强壮的身体也是有用的。一个姑娘应该和勇士交往。要不是身体的美在今天完全因为我们那些纨绔子弟花花公子而退居到次要地位的话，那么那些令人生厌的长着弓形腿的犹太人的私生子也完全不可能去诱骗我们成千上万的姑娘。结识有着强健体魄的人有助于给我们的民族注入新的活力，这也是我们的国家利益所在。

由于缺乏军事训练因此这唯一的一项训练内容也被取消了，虽然在和平时期至少还恢复了一些，所以在这一方面所耽误的东西在今天看来就成了最有必要的了。在这方面训练的结果并不只单方面体现在个人身上，而且还会影响到男女之间的关系。和普通人相比年轻的姑娘更愿意结识军人。

民族国家不仅要在正式学年期间的体育锻炼进行实施和监管，而且在放学以后也要对此进行组织，只要青少年的身体还处在发育阶段，那

就应该受到国家的重视。那种在放学后国家就立即不用对青少年进行照管并在服役期间再进行管理的看法是荒谬的。国家对青少年的监护是一种权力，也是一项职责，同时还是一贯制的。如今不顾人民健康的国家也肆无忌惮地无视这项职责。这样的国家任由年轻人游手好闲腐化堕落，而不对他们进行管理和锻炼身体，直到有一天让他们成长为健康的姑娘和小伙子。

一个国家以什么样的形式进行教育在今天看来并不重要，可根本的问题在于它要真地开始进行这项工作并且还要寻找有效的方法。一个民族国家必须要把放学后的体育锻炼视为和知识课程一样重要的国家职责，还要通过国家机构去进行组织实施。同时这项活动才能在很大程度上作为日后部队服役的准备工作。在部队里也并不像训练新兵那样只是再教一教年轻人简单的操练，而是要更多地体力方面把年轻人训练成为一名优秀的士兵。

民族国家的部队里并不是只教每个人齐步走和立定，这里应当是年轻人接受最后和最高国家教育的地方。一名年轻的新兵应该在部队里接受必要的武器方面的训练，同时他也应该为今后的生活继续接受教育。在以前的军队里，军事训练的最高目的就是要立下头等战功：在这所学校里小伙子们要成为男子汉，在学校里不仅要学会服从，而且还要掌握今后服从命令的前提条件。他应该学会保持沉默，不只是当他受到合理指责的时候，更有必要学会当他受到无理责备的时候也能够默默地承受。

他还要通过对自己力量的自信、通过领悟军队团体精神的优点而变得更加坚强，以获得我们这个民族不可战胜的信念。

在部队服役后他会得到两份证书：一份是允许他从事公共事务的公民证书，一份则是证明他身体健康允许其结婚的健康证书。

和对小伙子的教育工作一样，民族国家也应该同样重视对女孩子们的教育工作。在这方面首先也是放在体育锻炼上，然后是放在心灵情感方面，最后才注重知识方面的内容。对妇女进行教育的目的无疑就是要把她们的培养成为未来的母亲。

其次民族国家才要求以各种方式进行个性方面的培养。

当然每个人最本质的特性基本上都是可以预先进行训练的：自私的秉性总是会有一些的，就像理想主义者的本质永远都是唯心主义的那样。只是各种不断地交织在一起的特性所塑造出成千上万人的性格就显得模糊不清了。一个天生的罪犯就是一个罪犯并且永远都是如此；但是大多数仅仅只有某种犯罪倾向的人还可以通过正当的教育使他们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一员；相反要是通过不良教育则使他们从摇摆不定的性格中真地就长成个坏蛋了。

在战争期间不是常常有人抱怨说我们这个民族很少能够保持沉默的吗！因此要是不让敌人知道我们的重要机密该是多么的困难！只是有一个问题：要让人人都能守口如瓶，德国的教育工作在战争之前都做了些什么呢？可惜与保守秘密的同胞相比有时那些告密的小人在学校里是不是更讨人喜欢呢？是不是在过去和现在告密的行为都是值得称赞的“诚实”，而保守秘密则被看作是可耻的固执呢？难道人们没有把保守秘密当作是男子汉高贵的道德品质加以赞扬吗？没有，因为我们今天学校的教育工作认为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却让我们的国家把数不清的巨额费用化在了打官司上面，因为有关名誉伤害以及类似的起诉百分之九十九的原因都是缺乏保守秘密。不负责任地发表意见本来就是在轻率地背后进行议论，我们的国民经济由于不断地轻易放弃重要的生产制造工艺而蒙受损失，甚至就连我们的国防备战工作也只能悄悄地以模拟的方式进行，这些都是因为我们的民众不会保守秘密，而在到处议论散布消息。而在战争期间，这种嘴巴不牢的癖好就会导致战役上的失败，并从根本上使战争走向不幸的结局。我们应当知道，人们在年轻的时候不养成好的习惯，到老的时候也就无能为力了。比如说老师基本上就不会从年轻人的恶作剧当中去寻求获得知识并受到令人厌恶的告密行为的感染。年轻人对于他们的国家是有利的，和成年人比起来他们和国家总是有某种紧密的休戚相关的联系，这一点是很明白的。十几岁的孩子与其同龄人的交往比起和成年人来说则更加自然和广泛。一个告发了自己同志的年轻人就是叛徒，其行为的性质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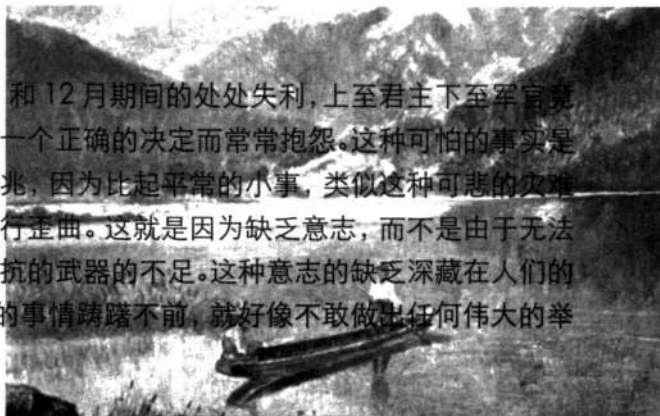
果夸大其词地说就和卖国贼一样。像这样的年轻人就不会被看作是“勇敢的、正派的”，而只能是缺少高贵品质的人。对于老师来说为了维护其尊严可以毫不费事地纵容这种不道德的行为，只是这样在某种意义上就会在这个年轻人的心里埋下日后引发灾难的种子。这样就从一个告密的小人变成了一个骗子！这不过是众多实例中的一个例子。今天在学校里美德方面的培育工作几乎为零。因此必须要完全转变工作重点。忠诚、牺牲精神和恪守秘密是伟大的民族所必备的美德，而这方面的培养和造诣则要比现在学校里的教学大纲中的任何内容都更加重要。即使是哭诉、痛哭之类的事情也属于此例。如果教育工作已经忘记了也让孩子们默默地忍受痛苦和不公正，那么以后在关键的时刻，比如当这个不过是服务于整个运送相互间怜悯和哀求信件往来的人站在前线的时候，那么教育机构就不要为此感到惊奇了。如果向我们国家学校里的年轻人少灌输一些知识并且增加一些自我克制方面的教育，那么这样就会对1915年至1918年这段时间有很大的益处了。

所以，民族国家的教育工作除了重视体育锻炼方面就应该侧重于性格方面的培养。现在我们民族道德方面的缺陷已经非常严重了，而通过这样的教育工作即使没有完全起到消除的作用，也起到了减弱的效果。

最重要的是对意志和毅力的培养以及对责任心的关怀。

如果说军队的基本准则就是命令胜过一切，那么对于年轻人来说就是：做出答复则是胜过一切。由于担心说错话而不给予答复比一个不正确的回答还要可耻。从这个最基本的原则出发应该培养年轻人要鼓起勇气。

人们对1918年11和12月期间的处处失利，上至君主下至军官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而常常抱怨。这种可怕的事实是我们教育工作的一个凶兆，因为比起平常的小事，类似这种可悲的灾难就会让人们去极度地进行歪曲。这就是因为缺乏意志，而不是由于无法让我们现在进行正规抵抗的武器的不足。这种意志的缺乏深藏在人们的心中，使人们对有风险的事情踌躇不前，就好像不敢做出任何伟大的举



动似的。人们也许不知道这种倒霉的优柔寡断，一位德国将军发明了一个经典的公式：“如果有百分之五十一成功的可能我才采取行动”。而就在这“百分之五十一”当中则隐含着德意志帝国崩溃悲剧的原因：谁要是要求命运让资产阶级取得胜利的话，那他自己因此就得放弃具有历史意义的举动。因为原因就在于在确认了某种导致死亡危险性的情况下而迈出了也许会走向成功的步伐。一个癌症患者不会去考虑只有百分之五十一的把握才敢去做手术，否则的话他就必死无疑了。并且即使只有一半恢复健康可能的时候，一个勇敢的人也会去冒险，要不然他也不会为了活命而呻吟了。

当今流行的意志薄弱和动摇不定的瘟疫总的来说首先就是因为对青少年所进行的基本上错误的教育，而其可怕的影响在他们今后的生活中还会产生作用，这一点我们在政治家们由于缺乏勇气的优柔寡断的决策中以及最后的加冕典礼上就可以略见一斑了。

同时当今还流行害怕承担责任。即便这是因为青少年教育方面的失误，那也表现在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且最后在政府的议会机构里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

可惜在学校里人们就更多地去关注年轻人做“忏悔”和“发誓悔过”，而不重视一个人坦率地进行表白。到了最后现在的国民教育工作者有些甚至成了一种为了挽救不可救药的道德堕落最为明显的工具，因此而难以置信的是对于有些年轻人来说绞刑架因其具有预言不可估量价值的特性反而成为了整个民族的共同财富。

正如民族国家以前曾非常重视意志和毅力方面的教育工作一样，那么在从小就培养年轻人勇于承担责任和敢于承认错误方面也早已深受他们的爱戴了。只有当国家认识到教育工作意义的必要性，才会最终在几十年以后获得对民众进行不再像造成我们今天不幸衰落软弱而屈服的教育成果。

专业化的学校教育，也就是整个国家的教育工作只需由民族国家进

行很小的改变。这些改变可分为三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青少年的大脑里一般不要再装入那些百分之九十五都是些不需要的，并且以后反正也都要遗忘的东西。特别是今天公立学校和普通中学的教学大纲就是这两种学校的混合教材。在大多数情况下每个学生让所学的东西填得满满的，而结果就只有一小部分才会留在脑子里，并且也就只有一小部分才会得到应用，同时这些对于在某一专业领域工作并以此为生的人却又不夠用。例如一个毕业于文科或是理科中学的普通的国家公务员在他三十五或四十岁的时候对其努力才塞到脑子里那些学校所学的知识再进行考试。那么当初所灌输的东西几乎就所剩无几了！当然人们也只能说：“是啊，原来所学的东西本来就不只是为了以后获得更多的知识，而是为了培养学习知识的能力和思维方式以及记忆能力。”这在某些方面是正确的。但这其中会存在一种危险，那就是在年轻人的头脑中充斥着像潮水般涌来的而只有在极少情况下才能够记得住的知识，并且他们也不懂得去对其每一项内容是否重要进行认识和判断，同时还不是那些无足轻重的东西，反而是把主要的内容给忘记和丢掉的。因此这种兼学多样的主要目的也就毫无意义了；因为用大量的教材是无法做到让大脑本身具备学习能力的，而让那些必要的宝贵知识跟随者他们，并通过他们再让普通民众受益。可这样的做法却是徒劳的，因为如果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就强迫他接受过多的东西，那么他以后要么就会什么都没有得到，要么早就把其中主要的东西给忘掉了。比如让人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成千上万的人几年里学了两到三门的外语，而只有很少一部分才得到应用并且大部分都完全忘掉了，那是因为有十万个学生学了法语，而只有两千人才在以后真正用到了所学的语言，而剩下的九万八千个学生则在以后的生活中无法将所学的东西得到实际运用。这些人在年轻的时候把上千个小时的时间化在了以后毫无价值和没有意义的东西上面。即使反对的意见也认为这些教材属于基础教育是不正确的，因为这只代表了认为人们在其一生中都要拥有所学知识的观点。所以就是为了这两千名以后可以有机会运用语言的学生而去让那九万八千个学生也白白地跟着受苦并且浪费宝贵的时光。

同时这种情况则涉及到不是人们所说的那种像拉丁语所能够起到

训练敏捷逻辑思维作用的语言。如果只是给年轻的学生粗略地或者说是大概地介绍一下这种语言的突出特点或许还要解释一下例句的语法、发音、句式结构等等的话，那就基本上达到目的了。这样就满足了一般的要求，并且正是因为如此才会比较容易地掌握和记住，所以就比今天灌到脑子里并且还真的掌握了但以后又忘掉的所有语言都有更大的意义，同时也避免了从过多的知识中只会偶尔有一些不连贯的只言片语存在记忆当中的危险，因为年轻人只学到了一些特别引人注意的东西，同时还在进行有用或没用的筛选。

对基础知识大体上进行一般性的介绍对大部分人来说，即使是为了今后生活中的应用都已经是足够了，同时对于其他那些实际上真正需要的人来说也提供了再次进修的基础和让他们对所学的东西基本上进行自由地选择。

因此，在教学大纲里对锻炼身体以及前面所提到的增强体力方面的要求应该安排出所需的时间来。

对目前历史课的教学方法尤其要加以改进。也许几乎不再会有那么一个民族像德意志民族那样学习历史的，也几乎不会有一个民族像我们的民族那样把历史搞得那么糟糕的。如果政治是变化的历史，那么我们的历史教学就是以政治操纵的方式进行的。即使这并不是对我们政治功绩倒霉的结果发牢骚，那人们也没有为了政治而考虑出一种更好的教学方法。我们今天历史教学的结果百分之九十九都该受到指责。人们通常只关注历史人物的姓名和出生年代，其它的资料很少，同时还完全缺乏一条主要的、清晰的要领。而所有根本的、重要的东西却完全没有教，而只是让个别极有天赋的学生从大量的资料当中、在历史事件发生的顺序里面或多或少找到一些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反对这种痛心的结论，因为人们只是仔细看到了某一次会议过程中我们的议员先生们对政治问题，大概是外交政策方面的内容所发表的讲演，他们会想到，至少在阐述观点的方式上，这些人都是德意志民族的精英，并且肯定他们的大部分还都上过中学，有的甚至还上过大学，但却能够从中察觉到这些人的历史方面所接受的教育是何等的不足。就算

他们根本没有研究过历史，而只要天性善良并对我们国家有很大的益处，那基本上就会更好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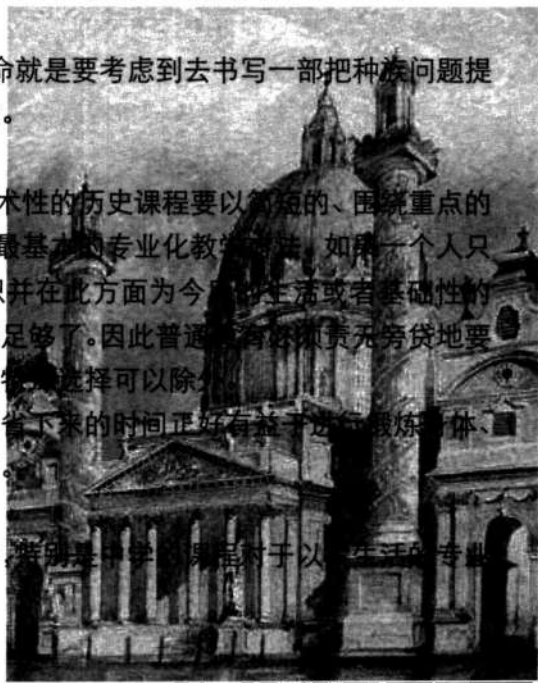
历史课教学恰恰就是缺少教材。主要原因就在于对重大历史发展方向的认识上。在上课时越是对此进行限制，那么就越期待个别的学生能够从所学的知识当中脱颖而出并且让所积累的知识也有益于大家。因为人们学习历史不只是为了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为了将来和为了自己民族的继续生存从中去汲取经验教训。这才是历史课的目的和达到目的的方法，可现在有了达到目的的方法，而目的却不存在了。人们不是说历史学科本来就是要求去从事所有这些具体资料的研究，因为只有从中才可以开始去确定历史发展的主要方向。这就确定了专业学科研究的任务。通常来说一般的人是当不了历史教授的。对于他来说历史首先就是要在对历史有了一定程度上的了解后再去解释历史，并有必要对其民族的政治事务形成自己的见解。谁想要成为历史教授，那么就要在这方面进行最基本的研究。当然他还要对所有的历史资料包括非常细节的内容进行研究。而在这方面我们今天的历史教学是不够格的，毕竟这方面的工作对于一般的人来说是太多了，而对专业的学者又太少了。

另外，一个民族国家的使命就是要考虑到去书写一部把种族问题提升到主要明显地位的世界历史。

总之：民族国家对一般学术性的历史课程要以简短的、围绕重点的形式进行，由此就有可能形成最基本的专业化教学方法。如果一个人只是大体上获得一般的基础知识并在此方面为今后生活或者基础性的专业教育和个人修养的话那就足够了。因此普通教育必须责无旁贷地要涉及到所有学科，只是个人的特殊选择可以除外。

而由此从教学大纲中所节省下来的时间正好有益于进行锻炼身体、培养刚强的性格、意志和毅力。

我们今天学校的教学内容，特别是中学课程对于以实际生活为专业



需求是何等的无关紧要，学生从三种完全不同形式的学校以相同的学历资格毕业的事实就是最好的证明。而实际上起决定作用的只不过是普通教育，并不在于所灌输的特殊知识。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需要特殊知识的地方自然在我们现今的教学大纲里是无法得到的。

因此，民族国家以后应当清除这种半途而废的做法。

专业化教学大纲中的第二个改变对于民族国家来说就是：由于我们当今是物质化的时代，所以专业化教学也要更加集中到很现实的专业上来，也就是数学、物理、化学等等。这些课程对于这个技术和化学工业所支配的、并且在日常生活中也凸显其特征的时代是必需的，但要是一个国家的普通教学只集中在这些方面的话也是很危险的。而理想的教育工作则与之相反。教育工作应该更多地侧重人文学科并只为能够今后进行专业学科的发展提供基础方面的教学。否则的话就放弃了比所有技术和其它技能更加重要的维护国家生存的力量。特别不能减少古代历史方面的课程。正确和全面地了解罗马历史不但是现在，而且永远都会从中吸取教训。即使是古希腊文明对我们始终是完美的典范。人们不该由于各个民族间的差异而破坏更大的民族共同体。今天所进行的翻天覆地的斗争完全都是为了一个目标：为了千百年来相互联系、由希腊民族和日耳曼民族共同维系的文明的存在而进行的斗争。

普通教育和特殊的专业研究之间应该有明显的区别。而正因为特殊专业研究恐怕一再降低到成了为金钱而服务的牺牲品，那么至少普通教育就必须在其所处的较为理想的地位上来与之抗衡。这里也要毫不动摇地铭记这样一个原则，那就是只要一个具有美好理想的民族共同体提供所需的前提条件，那么工业和技术、商业和手工业才能够不断地繁荣发展。而这个前提条件并不是来自只顾物质利益的自私自利，而是来自乐于放弃、勇于牺牲的精神之中。

我们今天对青少年所进行的教育本身的首要目的大致就是给他们灌输今后的生活中他们自我发展所需要的知识。所以人们说：“青年因

此应当要成为人类社会有用的一员。”但是人们就理解为他们的能力就仅限于可以规规矩矩地维持生活而已。这样就连最起码的、而且还是不重要的国民教育从一开始就没有稳固的基础。因为国家本身也不过是个形式，并很难对青年进行教育或者约束。而这种形式也极易被打破。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国家”这个概念在今天并不具有明确的内含。所以作为常见的“爱国主义”教育也并不存在。在以前的德国其重点是放在去对那些不太明智的，通常还是很平庸的大大小的权贵们进行崇拜，而这些权贵们从一开始就强迫大家放弃对我们民族真正之伟大表示敬仰。因此这样的结果就是我们的广大民众对德意志的历史了解得非常不够。而对此缺少的就是重要的原则。

很明显，这样的方式是无法取得真正的爱国热情的。我们的教育工作缺乏教学方面的艺术，从我们民族历史的变迁中总可以找到一些人的名字，并可以把它们当成全体德意志民族的共同财富，为的是以同样的知识和激情以及同样可以连接起来的纽带把我们整个民族团结起来。人们不可理解的是让我们民族真正重要的人物在当今人们的眼中成为伟大的英雄，受到大家的关注并且因此而得到一致的赞同。人们无法从各种各样不同的教材里把民族的光荣提高到专业描述的水平并且通过这些耀眼的事例燃起民族骄傲的激情。当时还把这些行为看作是人们不太喜欢的大国沙文主义。那种幼稚的忠君式的爱国主义比起汹涌澎湃民族骄傲的激情来说还比较受欢迎和容易接受。忠君式的爱国主义是时刻准备着伺候别人，而民族骄傲的激情却总有一天会成为主人。忠君式的爱国主义终止于让民族骄傲的激情挡路的老兵协会。这种激情就像脱缰的种马。真是奇怪，人们竟然愿意让这种危险的情绪所控制！要是有一天战争的猛烈炮火和硝烟对爱国主义思想的坚定性进行基本考验的话，却好像没有人能够顶得住了。而当战争来临，缺乏高尚的爱国激情则会遭到最可怕的报复。为了皇帝和国王而献身人们不会太感兴趣，而“国家”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则是陌生的。

自德国进行革命以来，忠君式的爱国主义观念也自行消失了，历史课程的目的实际上也只是为了获取知识而已。国家无法利用这种想要而

又得不到的爱国主义热情。因为就连这还有最后一点抵抗能力的忠君式的爱国主义也在这期间无法存在下去了，那么按照国籍的原则，对共和国的热忱也就要少得多了。毕竟不容置疑的是，在“为了共和国”的号召下德意志民族没有在战场上坚持四年半的时间，但在这四年半的时间里所创造的光辉形象至少还保留了下来。

而事实上，共和国未受袭扰的状况只能归功于各方准备自愿接受缴纳贡品的保证和割让土地的签字。这样做共和国就赢得了别人的好感；比起一个粗壮的人来说，一个病秧子会让需要他的人感到更舒适。当然敌人的同情正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形式以及全面否定的批评本身。人们之所以喜欢德意志共和国并使其存在下去，那是完全因为再也找不到一个更好的奴役我们民族的帮凶了。这个伟大的共和国之所以能够存在真地要感谢这样一个事实了。所以这样实际上就可以放弃爱国主义教育，并且当那些高呼“万岁”的德意志帝国的英雄们用他们的鲜血来捍卫帝国旗帜的时候，其他人则像兔子一样溜掉了。

民族国家应该为其生存而战。而靠道威斯先生的签字是无法得到的，也是无法保卫民族国家生存的。要维护和保卫其生存就恰恰需要世人认为所要抛弃的东西。并且国家的形式和内含越是与众不同越是宝贵，那么敌人的嫉妒和仇视就越强烈。最好的保护并不是武器，而是民众，不是城堡的壁垒，而是充满了对祖国高尚的挚爱和狂热的民族激情的男人和女人。

因此，作为专业化教学的第三点应当注意的是：民族国家也要认识到科学也是一种增强民族自豪感的辅助手段。从这个观点出发，不只是世界史，整个文明史都要进行讲授。一个发明家不仅只作为发明家而显得伟大，而是还要因为他是我们的同胞而显得更加伟大。对他们的丰功伟绩所进行的赞扬要重新塑造成对我们民族中的一员所创造出成就的自豪感。要从德国历史中无数的伟大人物的名字中间挑选出最伟大的人物，并向青少年进行有力地宣传，使他们成为我们民族情感中不可动摇的精神支柱。

按照这种观点有计划地编制教材，有计划地进行教学工作，是年轻人在离开学校的时候不会是个半拉子的和平主义者、民主主义分子或者其它什么东西，而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德国人。

因此，这种民族情感从一开始就是真挚的，而不是空洞的。一条铁的纪律要敲打在受教育的青少年的头脑之中：谁热爱他的民族，唯独只能通过随时准备做出牺牲来对此进行证明。出于利益而产生出的民族情感是不存在的。只包含阶级的民族主义是极少的。高呼万岁证明不了什么，如果不是充满爱心地去支持维护一个健康民族的生存，那么也就没有理由称之为爱国了。如果人们不再需要为身份地位而感到羞耻的话，那么对他的民族感到骄傲自豪的基础才会存在。要是有一个民族有一半的人都是贫困、憔悴或者完全堕落了，那么这样一幅景象是不会有人对此感到骄傲的。只有当一个民族的所有成员在身体和心灵上都是健康的，那么属于他们并有权让每个人都振奋精神的喜悦我们则称之为民族自豪感。只有认识到民族的伟大，才能感受到这种高贵的民族自豪感。

民族主义和社会正义感的紧密结合已经埋入了青年人的心中。因此就会重新从国家公民中诞生出一个相互间紧密团结、通过共同的挚爱和共同的自豪感一起打造出来的、永远也不可动摇和不可战胜的民族。

对大国沙文主义的恐惧是我们这个时代无能的表现。因为这个时代不仅缺乏奔放的力量，而且令人感到不快的是，甚至就连上帝都不会挑这个时候进行巨大的变革。因为只有当世界上发生伟大变革的驱动力不是狂热的，甚至是歇斯底里式的激情，而只是被资产阶级为了稳定和秩序的道德观念所取代的时候才是人们所没有预料到的。

当然这个世界迎接了这场巨大的变革。那么现在就只有一个问题：这场变革是为了拯救雅利安民族，还是永远有利于犹太人。所以，民族国家必须考虑通过对青少年进行适当的教育来为这个地球做出最后和重大的决策以留下优秀的人种。哪个民族抢先走上这条道路就会取得胜利。

民族国家的整个教育和培训工作，必须要在对相信和理解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的青少年的内心和头脑进行启发的过程中感到荣耀。那些没有最终认为血统纯正的本质和必要性的小伙子和姑娘们是不应该离开学校的。这样才能完成维护我们民族特性的根基并以此来保证以后文明继续发展基础的前提条件。

因为所有体力和智力方面的培训如果无益于准备和决定进行自我及其特性的维护，那么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毫无意义的。

另外一种情况就会像我们现在大部分德国人所抱怨的那样，不然的话也许就无法理解迄今为止整个悲剧式不幸的全部：我们在今后也只不过是文明的肥料，这不只是按照我们今天资产阶级观点短浅的认识所表达出的，在每个迷惘的同胞中只看到了不知所措的国家公民，而且最为惨痛的认识意味着令我们所有的知识和才能感到迷惑的是我们的血统肯定在退化。而与此同时我们还总是不断地和其它民族进行婚配，在我们也许把其它民族的文明水平提高的同时，我们自己的文明高度却一再地在下降。

另外，按照这种种族观念的教育工作最终也在服兵役过程中有了圆满的结果。作为普通教育的结束，服役期对于一般的德国人来说究竟应该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在民族国家体力和智力教育方式的重要意义和为国家选拔人才本身是一样重要的。一般地来说，社会地位高、经济条件好的父母的孩子会去接受高等教育而受到人们的尊重。而天赋的问题只起到次要的作用。对他们自身天赋的评价常常只是相对的。一个农民的孩子即使他的一般知识水平还不如一个城里人家的孩子也可以比一个世代地位显赫家庭里的孩子有更多的天赋。他们大部分知识本身多少和天赋完全没有关系，而本来就是从这个孩子所受到多方面的教育和其丰富的生活阅历不断留给他大量的感性认识中所获得的。要是具有天赋的农民的孩

子从小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长大的话，那他的智力则完全就是另外一个样子。至今也许只有唯一一个领域很少取决于人的出身，而是由其天生的才华来决定的：就是艺术领域。在这里，人们不只是一要“学习”，而是所有的一切想必都已经是天生的，只是后来受到固有天资智慧般地启发或多或少健康地成长起来的，而几乎不会考虑父母提供的金钱和财富的作用。天才和高贵的社会地位或者财富没有关系也能够对此做出最好的说明。伟大的艺术家出身寒门也并不少见，并且有些地位低贱的农家子弟也会成为多才多艺的大师。

这不是在谈论当今那些对整个精神生活毫无用处的伟大而深奥的思想观念。人们认为在艺术领域无法去否定的东西同样也不适合那些所谓切合实际的科学。不容置疑的是可以教会人们一些机械性的技能，就像一位熟练的驯兽师完全可以教会一只长毛狗做一些难以使人相信的表演一样。只不过对于这位驯兽师来说无法让这些动物自己去理解训练一样，人类也是如此。人们可以不考虑天赋的因素也能够教会人类某些专业的表演动作，但这个训练过程也是呆板和没有感情的，就像对待动物一样。人们可以通过智力训练甚至给一个普通的人灌输进超凡的学识，但只不过这些都是些毫无生气的，根本原因还是些无用的知识。这样的结果就是尽管有些人也许学识渊博，但可惜在特殊情况下和生活中关键的时刻却不起作用，这些人可以按照每一项，即使是最简单的要求进行训练，相反却不能对人类的继续发展做出一点点的贡献。像这样通过机械训练而获得的知识顶多对我们这个时代官员的任职有用。

当然在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能在全体民众当中找到天才般的人物。而由天才相应地赋予了生气的无用的知识当然也就更有价值。创造性的成就本身完全只有在能力和知识相互结合的情况下才会产生。

当今人类在这方面犯下无尽无休的错误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德国那些平庸的市民们常常不断地在杂志上看到这里和那里的一个黑人首次成为了律师、教师，甚至是牧师，还有男高音之类的。而当愚蠢的市民们对这些奇异的驯兽演出节目感到惊奇而对今天教育方式的绝妙成果充满崇敬的时候，犹太人却借机非常狡猾地从中认识到其民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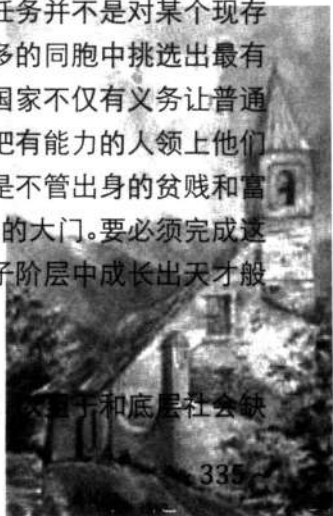
存在正当性的新证据,并建立起可以灌输给他们民族的人类平等的理论学说。而腐朽的资产阶级则没有意识到这是对理性的亵渎;把一个生来就是半人半猿的东西驯化得直到人们能够相信这是一个律师,同时还得让成千上万高贵文明民族的成员完全保持有失体面的姿态,这就是疯狂的犯罪;如果让千百万极有天赋的人们在今天无产阶级的泥潭中沉沦,同时又把霍屯督族人和祖鲁族人驯化得可以做人的工作,这是对永恒上帝意愿的亵渎。因为这只是一次驯兽表演,就像长毛狗的表演一样,而不是专业的“培训”。要是对富有理智的民族也同样费力和用心地进行训练的话,那他们每个人都能取得上千倍的成就。

但此时此刻如果这种情况更多地是个例外的话,那该多么地让人难以接受,在今天没有才能和天赋的人选择接受高等教育的状况是多么地难以叫人忍受。是的,一想到每年有成百上千完全没有才能的人接受了高等教育而得到重视,同时另外还有成百上千具有天赋的人却无法接受高等教育就叫人无法忍受。而一个国家因此而遭受到的损失则是无法估量的。在最近几十年来特别是在北美洲由于重大的发明而创造的财富在急剧地增加,这也就是主要因为在那里有更多的来自底层社会具有才能的人找到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在欧洲却不是这种情况。

要想发明创造光靠所灌输的知识是不够的,而是只来自天赋使之有活力的知识。但今天我们却不重视这一点,而只看重分数的多少。

即使民族国家也曾经插手过教育工作。但其任务并不是对某个现存的阶层施加什么决定性的影响,而是有责任从众多的同胞中挑选出最有能力的人,并让他们担任职务和受到尊重。民族国家不仅有义务让普通的人在国立学校里接受一定的教育,而且有责任把有能力的人领上他们应该走上的道路。特别要注意的是其最高使命就是不管出身的贫贱和富贵则都要向每一个有天赋的人打开接受高等教育的大门。要必须完成这个使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从死气沉沉的知识分子阶层中成长出天才般的国家领导人。

特别是德国的知识阶层是如此的封闭和固执,以至于和底层社会缺



乏真正的联系，这方面也应当是国家所应该考虑的。这会造成两个方面的伤害：首先他们因此缺乏对广大民众的理解和同情。这种联系已经失去很长时间了，以至于连最起码对人民心理上的理解他们都没有。他们变得对人民感到生疏了。其次上层社会也缺少必要的意志力。因为他们在封闭的知识分子阶层里总比在最底层的民众中要软弱得多。感谢上帝我们德国人并不缺乏专业化的教育，而更多的是缺乏意志和毅力。比如说我们的政治家越是“知识丰富”，其真正的成就常常越小。所以，要进行一场世界大战不管从政治动员还是到武器装备都是不充分的，这不是因为领导我国人民的都是些很少接受教育的人，而更多的是因为他们的脑子里过多地塞满了知识和思想，反而没有了健康的天性、力量和勇气。让我们的民族在为国家的生存所进行的斗争中听从一位缺乏深思熟虑病秧子式的帝国宰相的指挥真是一场灾难。要是取而代之让贝特曼·霍尔维格这样一位强健的人作为领袖的话，那么全体士兵的鲜血也不会白流。同样对我们领导人纯粹精神方面过度地培训反倒让他们成了十一月革命流氓无赖的同盟者。同时像这样的才智是如何以可耻的方式来对待委托给他们的国家财富的，而他们却完全没有看出，他们是在制造让敌人取得成功的条件。

对此天主教会就是最好的例证。由于牧师的声名狼藉所以就不得不从民间，而不是在教会内部选取继任者。而恰恰就是牧师们所遵循的独身主义才让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也正是深藏在这个古老教会机构中令人无法相信的顽强生命力的原因所在。正是因为如此，这个庞大的宗教组织才会不断地从底层民众中得到补充，这样教会不仅得到了和民众情感世界本能上的联系，而且也确保了只有长期在广大民众中才会有力量和动力。所以这个庞大的组织就会产生出令人惊奇的朝气，那就是柔顺的智慧和坚强的意志。

一个民族国家的使命就是要在教育方面考虑到对现有知识分子阶层通过输送新鲜血液来使其得到不断地更新。国家有责任要非常仔细和准确地从全体民众中把明显具有才能的人挑选出来并让他们为广大民

众服务。因为国家和政治家并不是为了把每个阶层的人都安顿好，而是要完成交给他们的任务。那么对于他们来说最根本的就是要培养出有能力和毅力的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完成任务。这里也体现出一个民族的伟大，正是这个原因才会在适合他们的领域里培养出有才能的人来为全体民众服务。如果有两个都具有天赋的民族相互竞争的话，那么最有天赋的人来代表整个知识分子领导阶层的那个民族就会赢得胜利，而领导人只为某个阶层或阶级放好一个大饭桶却不关注民众天生所具有的能力的那个民族就会失败。

当然这对我们当今这个世界来说还不困难。人们会立即指出，比如说一个高级官员的宝贝儿子是不会指望他成为一个工匠的，因为另外一个父母都是工匠的人其能力显然要强得多。这也许符合现在手工业的看法。因此民族国家对于劳动这个概念原则上必须有另外一种观点。国家必须有必要自己通过上百年的教育来打破轻视体力劳动的愚蠢观念。原则上对每个人来说国家不是按照他劳动的方式，而是根据其劳动的形式和质量来进行评价的。这样也许在一段时间里让人完全难以接受，难道一个愚昧无知的文书就因为他是用笔工作的就该比一个聪明绝顶的精密机械师要重要。这种错误的看法并不是出于人的本性，而是人为制造的，以前也没有这样的东西。现在这种反常的情况都是由于我们这个商品化时代病态的一般表现形式而已。

每种劳动基本上都有两种价值：一种是纯粹物质上的和一种是精神上的。物质方面的价值就在于其意义，并且劳动物质上的意义就体现在整个生活的全部。我们的民众从某一项完成的劳动中获得的利益越多，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地，那就说明其物质方面的价值就越大。这种价值的体现人们可以通过每个人为劳动所获得的物质报酬很明白地看到。与这种纯粹物质方面的价值相对的是精神价值。劳动的精神价值的意义所在则不能以所承担劳动以物质形式来进行估量，而是要取决于其自身的必要性。所以一项发明的物质利益肯定要比一般的帮工要伟大得多，在全体民众看来最低微的工作和最伟大的劳动同样都很重要。这样就使每

个人的工作对全体民众是否有益的评价可以以物质的形式予以区分，并且能够通过相应的报酬得以体现，但在精神方面必须要确定人人平等的原则，在这个时候每个人都要努力争取，并且常常还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得最好。所以这也是评价一个人的基础，而不是根据其所得的报酬。

因为在一个理智的国家里应该考虑向每个人分派与其能力相当的工作，或者说培训有能力的人从事所分派的工作，但是原则上个人能力是无法培训的，而是天生的，是上天赐予的，而不是人类的功绩，所以一般市民对劳动的评价也就不取决于认真安排给每个人的工作了。因为工作是根据人的天赋以及从全体民众那里所接受的教育来安排的。对人的评价必须要根据全体民众所委任给他的使命来决定。因为安排给每个人的工作并不是使其生存的目的，而是维持生存的手段。作为一个人应该继续接受教育并使自己日臻完美，而这只能在一个以文明为基础的国家范围内来进行。为了维护这样一个基础，一个人要做出自己的贡献，所作贡献的方式则应该由其所具有的天性所决定，并以努力勤奋和诚实负责来报答大家所给予他的一切。谁这样做了，谁就会得到最高的评价和最高的敬意。物质上的报酬会给予其工作成就为全体民众带来利益、具有上天所赐予的力量和全体民众对他的培育并以自己的辛劳奉献给国家的人。所以一个人成为好的工匠并没有什么丢脸的，而作为一个无能的官员来混日子，还从善良的人们那里偷取面包也许就是可耻的了。所以一个人没有得到从一开始就无法应付所分配的工作就可以理解了。

另外，这样的行为也同样给了普通市民对所从事的合理工作以衡量其公正性的标准。

现今这个时代在不断地退化；由于采用了普选法，就空谈什么权利平等，但却又找不到相应的理由。在他们看来物质报酬是一个人价值的体现并因此而破坏了神圣的人人平等这个唯一原则的基础。因为平等并不是建立也无法建立在个人成就的基础之上，而是取决于其是否有可能履行其特殊的职责。只有这样上天才会绝非偶然地断定出某个人的价值

所在，并使得每一个人发挥其自己的作用。

现今时代整个人类群体都知道按照报酬来相互进行评价，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人们对此并不理解。对于我们来说这样不是让我们放弃自己的立场观点的理由。相反：谁要想拯救这个病态和腐败的时代，就要有勇气弄清楚这种病痛的原因所在。这也应该就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所要做的：要超越一切庸俗的东西，从我们的民众当中把能够为新的世界观充当先锋的力量聚集和组织起来。

肯定会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通常很难对物质价值以精神价值来进行估量，是的，对体力劳动的贬低正好就是通过对其支付较少的报酬来体现出来的。这种较少的报酬本身就是对每个人参与创造国家文明财富的一种限制的原因所在。这也就使人注意到一个人的精神文明与其所从事的工作本身没有关联。对体力劳动感到羞愧首先就是因为报酬差，并强制把工匠的文明水平降低，所以由此认为对其较低的评价一般也是合理的。

这也出于许多真实的原因。正因为如此才必须要在将来防止工资酬劳有过分差别现象的出现。不应该说这样就不考虑工作成就了。如果说精神方面的成就来自更高报酬驱动的话，那将是一个时代堕落的可悲的标志。如果这样的观点至今还在这个世界上是唯一决定性的话，那么人类绝不会创造出如此伟大的科学和文明的财富。因为伟大的发明、伟大的探索、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研究、人类文明壮丽的丰碑都不是在金钱的驱使下出现的，相反它们的出现常常不也正好意味着并没有放弃对世界财富的眷顾。

也许在今天君主所特有的生活方式就是追逐金钱，但有一天又会尊崇上帝。今天许多人只把他们的生存归功于金钱和财富的赐福，也许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认为是因为没有得到金钱和财富的赐福才让人类变得贫穷。

即使这也是我们群众运动的一项任务，那就可以宣布我们可以给每

个人他们生活所需要的东西,但同时也要注意人并不是只局限于物质享受才活着的道理。将来有一天应该无论如何都要让这位最诚实可靠的劳动者有可能作为正式的同胞和真正的人通过精心制定的工资报酬清单表达出来。

人们不要以为这不过是个现实世界没有欺骗他而实际上又绝不会实现的一个理想状态。

即使我们不是那么天真幼稚地相信会成功地创造出一个完美的时代,但也不要放弃与病态的缺点进行斗争、克服弱点和追求理想的责任。而苦涩的现实本身也会带来许多阻碍。正因为如此,人类才试图为了达到最后的目标而不会因为挫折而改变其初衷,就像不是因为司法有错误就放弃它,不是因为药品也会带来疾病而拒绝吃药一样。

要防止过低地估计理想的力量。谁要是在此方面变得胆怯,要是他从前是个士兵倒让我回想起那个英雄气概是理想动机最强有力表白的时代。因为那个时候人们的牺牲并不是为了每天所需的面包,而是为了对祖国的爱,对伟大祖国的信仰,对国家荣誉朴实的情感。而当德国人远离了这个理想,只是为了跟随现在革命的许诺,反倒连什么是武器和背包都分不清楚,那么接下来发生的就不是天堂般的生活,而是炼狱般的唾弃和非同一般的苦难。

所以本港有必要让现在共和国的算命先生来看看对理想帝国的信



第三章 国民和公民

一般人们错误地认为今天称之为国家的这个产物里有两种人：公民和外国人。公民是指要么因为出生或者以后加入国籍而获得公民权的所有人；而外国人虽然他们享有公民权，但却是在其它国家。而鉴于两者之间的叫无国籍人员。这些人有名有姓，但不是现有国家的成员，所以也就没有公民权。

公民权在今天首先通过在国境内的出生来获得，就像上面所说的那样。种族和国籍对此完全不起作用。一个黑人，要是他以前生活在德国的殖民地，现在的居住地也在德国，那他所生的孩子就是“德国公民”。这样犹太人或者波兰人、非洲人或者亚洲人的孩子都无疑可以称自己为德国公民。

除了通过出生来加入国籍外还有在以后申请加入国籍的可能。这要取决于各种不同的条件，比如准备要当候选人的话，只要他不是罪犯或者是拉皮条的，那么从政是没有问题的，也就是说一位和善的政治白痴最终不是其新国籍所在地的负担，当然这里指的是当今财政方面的负担。是的，这甚至可以作为一个必需的劝告，为了尽快获得国籍，要把自己当作今后可能是一个良好的纳税人。

这并不考虑种族方面的因素。

整个加入国籍的过程和加入汽车俱乐部也没有什么区别。一个人提出申请，然后接受审查并给予评价，有一天他就会收到一张卡片，通知他已经成为德国人了，而这时这个人还穿着滑稽可笑的衣服。人们告诉

这位疑惑满腹的祖鲁族人：“您已经成为德国人了！”这个戏法是总统变的。连上帝都无法办到的事情，而像西奥弗拉斯塔和巴拉塞尔苏斯这样的官员转眼之间就办到了。只需要简单地动动笔，那么一个蒙古人突然就变成了一个正宗的“德国人”了。

而且还不只是不考虑这种新公民的种族，就连他的身体是否健康也不注意。也许一个家伙患了严重的梅毒，就像他所期待的那样他被今天这个国家当作公民而受到热烈地欢迎，而且在财政上也不会成为负担并在政治上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所以，每年这个被称为国家的产物就在不断地接受着自己无法克服的毒素。

国家公民本身和外国人的区别就在于他可以担任一切正式的官职，在可能的情况下还要服兵役，参加选举投票表示赞成或反对。区别基本上大概就是这些。外国人毕竟不是很少反而更多地享有个人权益和个人自由方面的保护。这当然也符合这个共和国现在的实际情况。

我知道人们是不愿意听到这些不过是些漫不经心的事情；是的，很难有比我国现有的国家公民权益更伤脑筋的事情了。现在至少有一个还能意识到要考虑一个更好的办法的国家。当然我们德意志共和国并不是这个榜样，而美利坚合众国才是。在那里人们尽力，至少是一部分人在做出理智的建议。同时美利坚合众国基本上拒绝不健康的人入境，对某些种族的人则不允许加入他们的国籍，他们从一开始就已经清楚地表明自己对国家这个概念的观点。

民族国家将其居民分为三类：公民、国民和外国人。人一出生基本上只获得国籍，但有国籍还没有权力成为正式的官员，在政治上也没有获准参加选举，不管是持赞成或反对的意见。每个人的民族和国籍原则上都是注定的。对于每个国民来说可以自由地随时放弃其国籍而成为符合其民族身份的公民。而外国人和国民的区别就在于其国籍仍然是其它国家的。

有德国国籍的年轻人则有责任接受德国式的教育。通过教育他要使自己成为具有民族和国家意识的德国同胞。以后他还要按照国家规定进行体育锻炼并且最终还要参军。军队里的训练则是基础性的；一般每个德国人都要掌握，而且还要对其体力和智力尽可能地按照军事方法进行训练。于是这位品行端正健康的年轻人在他完成了服役后就会以最隆重的形式授予其国家公民的权利。这是他一生中最为珍贵的证书。他同时也享有国家公民的所有权益和优先权。因为一个国家必须要让作为国家存在的理由和体现其伟大的同胞有明显的不同之处，并且这些不同之处将成为这些人生活在这个国家里“理应得到的”部分。

颁发国家公民证书要和向民族共同体也就是向国家庄严地进行宣誓联系在一起。在这份证书里必须有一条消除所有分歧而共同缔结的纽带。这份证书必须是一项最高的荣誉，那怕在帝国里是一个扫大街的市民，也要像在异国当国王一般地荣耀。

和外国人相比，国家公民则是享有特权的。他们是国家的主人。这种高贵的尊严是负有责任的。那些寡廉鲜耻的人、意志动摇的人、罪犯和背叛祖国的人等等都应该随时被剥夺这样的尊严。而他因此而再次成为了国民。

作为国民的德国姑娘只有在结婚以后才可以成为公民。而只有从事职业拥有国籍的德国妇女才可以获得公民权。





第四章 个人品质与民族国家理念

如果民族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其主要使命就是培育和保护人民，那么仅仅是繁殖、培育并最终在其生活中塑造出民族特性是不够的，而必须让国家组织机构与这项使命保持一致。

将人的价值按照其种族属性来进行衡量就是胡说八道，而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使是在还没有最终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人类就向人类宣战了。而

承认血统重要性的最终结论，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种族学说才意味着对个人进行评价理论的传播。正如一般我对民族的种族归属所做的不同评价那样，那么一个民族共同体内的每个人也是不同的。那种断定民族与民族不同的观点给生活在民族共同体里的每个人这样一种想法，即人与人是不同的，因为即使是我们有血有肉的身体组成部分大致相同，但每个人却是有着千差万别细微的不同。

我想说的是这种认识的第一个结果就如同在民族共同体里，也就是说试图去重点繁殖较为强壮的、认为特别有价值的物种并对其繁衍进行特殊的照料。

因此，粗略地来看这项任务是机械性的，是可以完成的。比较困难的则是要从全体民众当中了解到真正在精神和思想上最有价值的人，并且不仅要对这些具有思考能力的人才自身施加影响，而且特别还要对整个民族有益。这种按照能力和才干对人进行筛选的办法不仅是机械的，而且这样做还要考虑到日常生活中无休无止的争斗。

一种世界观要力求在遭到广大民众的民主观念拒绝的情况下给精

英阶层，也就是上等人留有余地，也就必须顺理成章地在这些人当中再次遵循同样的贵族制原则，并且在所涉及的人当中确保精英式领导和最高的声望。所以这种世界观并不是建立在大多数人的观念之上，而是建立在个人观念之上的。

谁要是现在还相信一个民族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只不过是纯粹机械地通过经济生活方面有比较优越的组织机构而有别于其它国家的话，也就是通过更好地进行贫富均衡、通过在经济事务中让广大群众有更多的决定权，或者通过更加合理的报酬、通过消除过高的工资差别，那么他就陷入了最肤浅的境地，并对什么是我们所说的世界观一无所知。所有上面所描述的表面现象对民族的继续生存没有一点保障，并且也没有提出过高的要求。要是民族真的仅限于这些表面肤浅改革的话，那么就会因此在民族间的竞争中连最起码获胜的保障都无法得到。

一场只认为通过一般的方法进行调和并且肯定也会取得相应进展而当作其使命的群众运动实际上并不是强大和真正的运动，因为对现有状况不进行深入地变革，那么其整个行动归根结底也就停留在表面的形式上，这也正是我要说的，也就没有让民众做好让他们最终肯定必然会战胜我们今天所遭受的意志薄弱的心理准备。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道理，也许有必要再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人类文明发展的起因上面。

人类在外表上明显地脱离动物的第一步就是人类的感知。而感知本身最初则是由于人类发现了什么是狡诈和欺骗，为了生存通过这种方法则可以轻易便捷地和其它生物去进行斗争。人类还不足以表现出这种最原始的感知，因为这些都是后来或者今天人们通过观察而作为普遍现象才自然而然地意识到的东西。比如某些人类能够在动物身上观察到的诡计和狡猾的行为，人们只是笼统地看在眼里，而并没有能力去确定其原因或者去进行研究，只是简单地把这些行为暂时认定为是“本能的”。

而这些字眼却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因为谁要是相信生物的进化，那他就会认同生存的渴望和为生存而战的表达方式总会有一个开端，也就

开始形成一个自我行为主体，而这样的过程就会不断地重复，不断地扩展，直到这个行为过程几乎被所有人都以某种方式演变成下意识的行为，这才作为本能表现出来。

人类自己对此会更加容易理解和相信。人类与其它动物进行斗争采取的第一个聪明的举措肯定就是这种特殊的行为主体行动的原因所在。而个人也绝对曾经是做出决定和进行实施的起因，并在以后很自然地被全体人类所接受。正如无论那一种军事方面的常识，在我看来今天都已经成了某种战略理论的东西，而在当初要归功于某一位创立它的人，只是过了很长时间，甚至也许是上千年才完全得到人们完全的理解。

人类用第二项感知对第一项的内容进行了补充：他学会了为自身的生存来利用其它的东西和生物，并由此开始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人类的发明创造活动。物质方面的发明创造从利用石块作为武器开始到驯养动物，人工取火以及到我们今天各个方面令人惊叹的发明创造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人类才是这些奇迹的代表，而每一项发明离我们当今时代越近，那么其意义就更加重大，影响就更加深刻。我们当然知道我们所看到的物质方面的发明创造都是每个人创造力和能力的成就，而所有这些发明创造归根结底都不断地使人类升华并超越出动物世界的水平而最终脱离了它们。因此从更深层上看这些发明创造在不断地使我们变成了高贵的人。过去原始森林里猎人们所使用的再简单不过的花招技巧本身就减轻了为生存而战的艰苦，这当然也可以在认识科学方面再次帮助当今时代的人们去减轻人类为生存而战的负担，并为将来的战斗打造武器。所有人类的思索和发明最终的作用首先就是要为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生存所进行的战斗而服务，即使某项发明或者探索或者某个深奥的科学观点在本质上所谓的实际应用目前还看不出来。同时所有的发明创造都不断地共同去帮助人类超越其周围的生物，巩固和加强其地位，并使其成长为地球上居统治地位的生命体。

所有的发明都是某一个人的创造成果。而所有这些人不论他是否愿意或多或少都是人类伟大的行善者。他们的善行给了成千上万的人，那以后成千上万人的手中就掌握了为生存而战减轻负担的工具。

如果我们今天把物质文明看作是某些个人发明创造的话，那么这种文明本身也会相互补充，彼此促进，因为其应用和实施的正好就是发明家所想出来和所发现的东西。而这个生产过程本身毕竟也和发明创造一样和个人有关。就算纯粹的理论思想所进行的劳动对每个人来说也是完全无法估量的，但这却是接下来物质创造的前提，那么就可以看作是某个人所特有的成果了。并不是广大民众进行的发明创造，也不是大多数人进行的组织和思想，而只能由某个人来进行，也就是由个人来进行的。

人类社会只有当其文明创造力以尽可能乐于助人的方式来减轻人们的劳动强度，并为全体民众谋取福利才算是组织完善的社会。对于发明本身最为宝贵的东西也许是来自物质或者思想，但首先是作为个人的发明者。而使个人成为对全体民众有用的人才是民族共同体这个组织机构首要和最高的使命。是的，这个组织机构本身就只是去执行这项基本原则的。这样才会摆脱机械论观点的诅咒并且自己也会富有活力。它本身必须成为努力奋斗的化身，从广大民众中挑选出有用的人才再让他们来管理民众。

所以，这个组织机构不仅不要阻止从广大民众中间挑选有用的人才，而且相反必须要在最大程度上通过自己的方式使其成为可能并且还要简单化。因此从这个原则出发就不要指望广大民众，而是要祝福具有创造力的个人，因为实际上他们才是人类的造福者。确保他们决定性的影响力并且减轻他们的劳动强度是全体民众的利益。而要是让那些没有头脑和没有才能的人，更不要说那些减刑赦免的人来进行统治的话，民族的利益肯定是无法得到满足并且也是毫无益处的，而唯独只有让天生就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来进行领导。

就像前面所讲到的那样，挑选出这样的人尤其会对艰难的生存斗争本身有所帮助，有许多人失败或者消亡，但这并不说明最终就只能如此，而且还是少数人最后是可以脱颖而出的。在思想领域、艺术创作领域以及经济领域内现在已经开始进行人才的挑选，而特别在经济领域的人

才挑选最为费力。对国家的管理以及通过有组织的国防力量而展示出的国力同样都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个人及其威望的观念因此也在民众中间深入人心，同时责任感也成为上层人士的普遍看法。今天只有政治生活才完全脱离了这种最为自然的准则。在确认整个人类文明是个人创造力成果的同时，在整个民族共同体中，特别是最高层领导人当中又出现了起决定作用的多数人原则并且开始由此逐渐地对整个人类生活进行毒害，也就是说是实际上的：破坏。犹太人在别的国家进行活动的破坏作用根本就归咎于企图在别国民众中间损害个人的作用，并在民众中间取代其相应的位置。因此就用犹太人的破坏作用来取代雅利安民族的组织原则。他们通过把民族和种族不断地进行“分化瓦解”来继续对人类文明进行破坏。

而马克思主义思想就是把犹太人的企图用纯粹文明的方式所进行的表达，并在所有人类生活范围内否定个人的作用并以广大民众的大多数来取而代之。这在政治上很适合议会制的政府形式，我们可以从最小的地区到整个帝国的最高领导阶层都可以看到其不幸的结果，并且在经济方面则有利于工会运动，而这实际上不仅是帮助了工人阶级，而且最后还有利于国际上犹太人的破坏意图。取消个人原则的经济并取而代之以广大民众的影响和作用则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有利于全体民众的最为宝贵的创造力，并且就会慢慢地出现人类的退化。而本来代表工人和职员利益的整个企业工会委员会试图对生产本身施加影响也同样产生了破坏的作用。这样不仅损害了整个领导阶层，实际上也同样损害了个人。因为要满足民族国家成员的利益要求并不总是理论上的空话，而更多的则是要通过分摊到每个人日常生活的财物以及由此最终所产生的一个民族共同体对每个人的利益所做的全部工作来得以保证。

不管马克思主义思想出于其群众理论是否有能力接管现有的经济并且继续进行控制并不重要。对其理论原则批评的正确与否也并不取决于其对未来掌控能力的证明，而只能是通过其能否创建一种文明而定。马克思主义思想可以千百次地接管今天的经济并且在其领导下使其继续运行下去，而这样所做所得到的结果甚至无法证明这样一个使用其理

论原则却不能管理好目前所接管的东西的事实。

而马克思主义思想实际上所证明的不仅是自己无法建立起一种文明或者是经济，事实上也无法按照其理论原则使现有的经济继续运行下去，并且不久以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就不得不对个人原则的基本理念做出妥协，就像其组织本身也无法缺少这项原则一样。

所以，民族主义世界观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不仅承认民族的价值，而且还承认个人的意义并将此确认为国家的栋梁。这就是其世界观的重点所在。

要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连这个基本观点的重要意义都无法理解的话，并且非但如此还对现在的国家说三道四，或者把群众的意见当成自己的想法，那么实际上就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和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竞争的政党了；也就没有具备称之为世界观的权力了。如果这场群众运动的纲领只坚持排除个人而以群众取而代之的话，那么国家社会主义本身也就已经和其它资产阶级政党一样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毒害。

民族国家要考虑到人民的福利，同时还特别要承认个人价值的意义所在，并且要在最大程度上投入到个人也在最大程度上参与的创造性的工作当中去。

并且民族国家还因此要让整个政治活动，特别是最高层的政府工作毫无保留地脱离这种议会制的大多数原则，也就是群众决定的原则，并且毋庸置疑地确保以个人权利取而代之。

所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如下：最好的国家宪法和国家政体尽最大努力确保让国家中最优秀的人才成为领导人并且具备权威性的影响力。

但是在经济生活中有才能的人却不是由上面来指定的，而是他们自己下定决心和从小本经营到大型企业不断地学习锻炼所给予的并且还在生活中得到了考验的，所以政治方面的优秀人才当然也就不会突然“被发现”的。特殊的天才是不能和普通人相提并论的。

国家的组织机构，从最小的地区部门到整个帝国最高的领导阶层必

须要确立个人原则。

大多数人所做出的决定是不存在的，而只存在有责任心的人所做的决定，并且要恢复“建议”这个字原有的意义。每个人都可以提出建议，而做出最后的决定却只能是一个人。

这项把普鲁士军队变成当时德意志民族最完美武器的基本原则的重要意义也是建立我们整个国家宪法的基本原则：对下要保持领袖的尊严，对上要承担责任。

议会本身是必要的，因为它毕竟还可以让有才能的人逐步高升并在以后委任他们以重任。

因此就会出现这样一幅景象：民族国家从地方机构到帝国领导阶层都没有由大多数人所决定的代表人物，而只是一些站在选举出来的领导人周围并由其安排任务的顾问，为的是让他们按照某些专业领域本身的特殊需要来承担责任，大致就像团体组织里的领导人或者主席自己所应该承担的责任那样。

民族国家根本就不会容忍让那些其所接受的教育和所从事的工作对专业性的问题，比如说涉及到经济领域利益所提出的建议和决定由一无所知的人来提出问题的。因此国家从一开始就会将其代表人物从政治和职业方面按等级组成众议院。

为了保证这双方之间的合作，国家又将他们中间的优秀人才组成参议院。

而在任何时候众议院和参议院都不进行表决。它们是职能性质的机构，而不是表决机器。每个议员只有建议权而没有决定权。而只有执行主席才有最终的决定权。

这项把绝对的责任和绝对的尊严相互绝对地结合起来的基本原则会逐渐培养出领袖式的精英人物，而这对于现今这个时代不负责任的议会制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因此，国家的宪法将是一部人民所赞成的法律，而这还要归功于其

文明和经济领域的伟大人物。

关于实施这项认识的可行性方面我请大家不要忘记的是，由大多数民主决定的议会制原则是绝对无法长期统治人类的，相反历史上只有当国家和民族走向衰亡的很短暂的阶段里人们才会发现这种现象。

无论如何人们都不应该相信可以通过纯粹理论上的方法就可以自上而下地带来变革，所以可想而知变革也不会通过国家的宪法而一下子就停止，而要深入到整个立法过程中，贯穿到普通市民的生活里才能实现。所以这样的变革只能并且只有通过一场靠这样的思想武装起来，并且未来的国家本身也坚持这种观念的群众运动来进行。

所以，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就应该在今天不遗余力地去适应这种观念，而且还要在自己的组织内进行实施，这样不仅给国家指明了路线方针，而且还提供了可以使用的人才。



第五章 世界观与组织

我大致想要描述的民族国家的景象不过仅仅是通过对它的认识所进行的，而这种认识是国家所需要的，还没有实现的。可是光知道民族国家是个什么样子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一个民族国家。我们不能期待今天仍然还在攫取国家利益的政党自己来进行变革，自己去转变他们的立场。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实际上这些政党的主要领导人除了犹太人，还是犹太人。我们目前所取得的进展会顺利地持续下去，终将有一天会遭到所有犹太人的反对，因为他们的预言就是要吞噬地球上所有的人而成为地球的主宰。

与成千上万大部分由于伴随着冷漠和愚蠢的胆怯还沉浸在腐朽堕落之中的德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所不同的是，犹太人则充分地明确了自己的目标并且毅然决然地追寻着自己的道路。一个由犹太人所领导的政党是不会把别人的利益当作自己的利益来进行维护的，当然也就不会把雅利安民族的利益当作是共同的利益了。

如果人们想要把民族国家的理想景象描绘得更加真实一些的话，那就要必须脱离现有公众生活的影响去寻求一种甘愿为理想而奋斗的新的力量。而这里的奋斗所涉及到的不仅是首要任务：建立起民族国家的观念，而是特别需要：消除现有的犹太人思想。历史上经常会发生的就是最大的困难不是新体制的形式，而是给新体制让出位子。固有的观念和利益形成了一道严密的防线并且还试图使用各种手段去阻止一个不利于他们的胜利或者一种对他们产生威胁的思想。

所以，就会迫使一个为新的理想而战的勇士在得到大家正面肯定的情况下首先要进行消除不利因素的斗争。

一个具有重大和原则性意义的新学说必须把进行最尖锐的批评当作首要的武器，这大概对某些人来说也许是不愿意接受的。

当今天受到那些所谓的民族国家一再重视，而在历史的进程中却又很少通过深刻的认识得以证实来确信这些民族国家绝对没有想到去进行否定性的批评，而只是从事创造性的劳动，这不过是把小孩子的胡闹当作是真正“民族国家”的闲言碎语罢了，同时也证明了就连当代历史也都从这些人的头脑里悄然离去。即使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是有目的的，并且也是知道什么是创造性的劳动（这里所指的不过是建立犹太人对国际金融的垄断！）；并且事先还进行了不止七十年的批评，甚至还是毁灭和瓦解性的指责，直到原有的国家长期受到这种腐蚀性的攻击而变得脆弱而最后崩溃。然后才开始进行所谓的“创造性”劳动。那么这种劳动当然也就是正当的和顺理成章的。一个现有的意识形态仅仅靠对未来理论学说的赞同，并以此来取而代之是无法消除的。因为仅仅靠确立理论学说的必要性就进行观念的转变并且就去支持新的理论学说，这让现有意识形态的追随者或者是受益者是无法认同的。相反却很容易造成这样一种情景，那就是两种意识形态并存，而所谓政党的世界观也不会超出这样一个范畴。因为世界观是不容置疑的，其本身不仅足以起到“排斥其它政党”的作用，而且还会独断专行地要求只许认同自己的观念，并且还要求整个公共生活按照自己的观念进行全面的转变。所以原有的意识形态也不会容许它继续同时存在下去的。

宗教也是如此。

即使是基督教也并不满足于只建立自己的圣坛，而且同时必须还要强行毁掉异教徒的祭坛。仅仅出于这种狂热的排他性也可以建立起使人确信无疑的宗教信仰，甚至这种排他性也是这种信仰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

也许人们会指出这种历史上所出现的观念常常不过是犹太人的特殊思维方式；是的，这种排他性和宗教狂热恰恰就代表了犹太人的本质

特性。这的确如此，对这样的事实人们也许只能表示深深地遗憾，并且有理由把这种在人类历史上出现的令人不快的情形当作是迄今为止是陌生的，但却无法对今天的状况有丝毫的改变。那些想要让我们德意志民族摆脱掉现状的人们不要绞尽脑汁地去妄想要是这个或那个不是这种情况该有多好，而要必须确定该如何把现有的状况消除掉。一种充满恶魔般排他性的世界观只能被一种以同样的精神所驱动的、以同样顽强的意志所捍卫的，并且同时其本身也是纯粹和完全真实思想的世界观摧毁掉。

今天我们每个人也许要痛心地承认，在很久以前那较为宽松自由的古代社会里随着基督教的产生就首次出现了精神上的恐怖，这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自此这个世界就为暴力所胁迫、所统治，人们也只能一再地采取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方式。而只有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才是具有创造性的。

政党习惯进行妥协而世界观却从不这样做。政党自己和对手讨价还价，世界观则是公然表明自己的无比正确。

即便是政党，其原本的意图大部分也都是要实行专制的，一个世界观的内在含义里也几乎都隐藏着这种小小的本意。党纲的局限性则盗走了世界观所要求的英雄主义气概。其妥协的意愿带给他们的就是些目光短浅和意志薄弱的思想家，靠这样的人是组成不了十字军的。所以他们大部分早就陷入了自己那可悲的狭隘之中。因此也就放弃了为世界观而战斗，并且还企图取而代之以所谓的“积极合作”来尽可能迅速地在现有的机构中占据一个吃饭的地方，而且还要尽可能长期地呆在那里。这就是他们的全部追求。要是通过有些残酷的竞争手段应该把一个吃饭的同伴赶走的话，那么他们的打算和做法就只能是，不管是使用暴力还是阴谋，在仍然还挨饿的人群中往前挤，以便最后能品尝到他们那神圣信仰的味道，并从这喜爱的食物中能够振作起来。多么险恶的政治手段！

因为一种世界观从来就不准备和另一种世界观共存，因此也就不准备与其所批评的现有的社会形态去进行合作，而是去完成其与这种社会

形态以及整个敌对的精神世界通过各种手段去进行斗争的职责，也就是说准备去摧毁它们。

无论是这种特别让对手立即就意识到危险并且会共同联合起来进行反击的带有纯粹摧毁作用的战斗，还是积极主动地去实现其新的精神世界，都需要意志坚定的勇士。所以如果把这个时代和这个民族中勇敢和精力充沛的人们团结到他们的队伍中，并且组成坚强的战斗组织，那么这种世界观就可以使其精神思想取得胜利。另外考虑到这些人的状况，还应该让他们从对世界一般的认识中形成一种看起来是很准确的、标语口号式的、简单明了的固定看法，并作为信仰来为新的人类社会服务。如果一个政党的纲领可以作为下一届选举获胜的计划，那么则意味着这个带有世界观性质的党纲完全就是一份向现有的社会制度、现有的意识形态，总之就是向现有的世界观进行战斗的宣战书。

同时则没有必要让为这个世界观而战斗的每个人完全地了解 and 明确地知道这场群众运动的领导人最终的观念和思路。而更有必要的是只让他们明白一些简单大概的意思，并且要念念不忘，牢牢记住重要的基本原则，以便使他们完全彻底地确信其理论学说和群众运动取得胜利的必要性。

即使对每个战士也不要透露上级的战略思路。正如他更多地是以严明的纪律、对自己力量和权利狂热的信念以及对此明确的立场所培养出来的那样，所以，对于一场具有伟大前程和伟大志向的群众运动的每个追随者来说在很大程度上也应该如此。

所以，对于军队来说很少适合让每个士兵直接去当将军，即使不管他们的教养和阅历如何，那么对于一场体现世界观的政治运动来说也不适合只是让那些“思想活跃”的人来参加。是不适合，这也需要那些思想单纯的士兵，否则的话精神方面的约束也就无法发挥作用了。

一个组织只有当大部分都是感情用事的广大民众去服从于一个最高精神领袖的时候才可以存在下去，那就取决于这个组织的本质如何了。一个两百名有相同智力水平士兵的部队会比一个一百九十名智力水平略低和十名受过高等教育士兵的部队更难以教他们服从纪律。

因为这个实际情况的存就曾经让社会民主党得到了很大的利益。他们拥有我们民族中许多从部队退伍并在那里就已经接受过纪律训练的广大民众来让他们接受严格的党组织的纪律。所以他们的组织也就是个军官和士兵组成的军队。从部队中退伍的德国工匠成了士兵，而犹太知识分子则成了军官。同时德国的工会官员则可视为是下级军官。我们的资产阶级无可奈何地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只有那些称为没有教养的民众才是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而实际上这才是其取得胜利的前提。因为就在资产阶级政党单凭自己的才智组建一个没有用处、没有纪律的团体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却用不太聪明的人们组建成了一个就像原来服从德国军官而现在却盲目地服从这位犹太人指挥家的党员士兵的军队。本身就有十分突出的，但基本上却从未治疗过的心理问题的德国资产阶级却没有感到有必要对此进行反思，以便从这个事实当中认识到更深层的含义和存在的危险。相反人们却相信，一场由“知识分子”阶层参加的政治运动，从这个理由出发就更有意义，更加合理，比起没有教养的民众来说，其本身就更有把握向政府进行申诉。可人们从来就不明白，一个政党的强大绝不会取决于其成员的多少和本身的智力水平，而更多地要决定于对纪律的服从，依靠对纪律的服从才可以使其成员服从领导。关键就在于领导本身。当两军对垒的时候，每个士兵都接受过最高战略方面培训的一方是不会获胜的，而只有在头脑最冷静的领导下同时又纪律最严明、最服从指挥和训练最好的军队才会获胜。

这是在我们审视把世界观转变成实际行动可能性的时候所必须要关注的基本常识。

因此，如果我们要让世界能够取得胜利，就得使其成为战斗行动，就必须理所当然地在运动的纲领中考虑到所需使用人员的问题，其最终目标和主导思想必须是坚定不移的，招募条例中涉及到思想方面就要规定只招募聪明和精神正常的人，而没有他们的帮助即使是再美好的思想也只能永远是一种思想而已。

如果能让民族主义思想从今天迷茫的意愿转变为显著成功的话，那



么就要从其广阔的精神世界中找出符合其本质和内含的指导原则，让更多的民众自己承担起责任，而且是让那些能够保证为这种具有世界观性质的思想而战的民众。这就是德国的工人阶级。

因此，这场运动的纲领就一共总结出了二十五条指导性原则。这些指导原则首先可以给人们对运动的意图有一个粗略的了解。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可以是一项政治纲领，一方面可以对运动进行宣传，另一方面则适合通过共同认可的责任联系和团结接受响应的人们。

同时我们不要摒弃以下的观点：由于这个所谓运动纲领的最终目标也许是绝对正确的，但也要考虑到心理方面的因素，那么在执行过程中完全可以有理由相信会出现某个人对指导原则有其它方面的理解，所以就必须对此进行更加准确地规范。而这样做的任何尝试通常都会导致灾难的发生。这是因为由于听任一下子所引出的对某个类似信仰方面带有教条性质定义的观点所进行的讨论使本应该是确信无疑的内容不仅没有产生出新的、更好的、尤其是统一的结论，反而更多地会导致无休止的辩论并且造成普遍的混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要仔细斟酌怎样做会更好：是对运动内部造成意见分歧的定义进行新的、更好的规范，还是肯定一个虽然目前也许不是最好的，但却会使组织内部本身团结、坚定、统一的定义呢。任何考虑的结果都会认为最后一种情形会更好。因为在对定义进行修改的同时也会带来外部的变化，并会一再出现尽可能地或者值得去进行修正的情况。最终对于那些认识肤浅的人们来说就存在只把纲领中纯粹表面上的描述看成是运动的主要使命的危险性。因此为思想而奋斗到底的意志和力量就会消退，而本来应该对外所采取的行动则消耗在自己内部纲领性的争斗之中。

对于实际上基本正确的理论学说来讲虽然其本身与现实并不太相符，但能够保留住其文本的内容和形式总比想要修改而对至今牢不可破的运动的基本原则去进行讨论所得出的最糟糕的结论危害要少得多。特别是当这场运动自己在为胜利而战的时候就更不应该了。因为如果不断地对理论内容进行修改而使得其整个形式结构都发生改变会使人感到动摇和怀疑的话，那么这样怎样才能让人们相信其理论的正确性呢？

理论学说的本质从来就无法从外在的形式上，而永远只能在其内含中去寻找。而这种内含是不会改变的；并且从其本身的利益出发，人们最后只能期待这场运动通过防止所有由于分裂和动摇所引起事件的发生来获得其所应当承担责任的的力量。

在此人们可以从天主教会学到一些东西。尽管其教义的某些观点和科学研究发生冲突，甚至有些内容完全都是多余的和不必要的，但毕竟没有准备为此去舍弃教义中的一个字。教会方面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其反抗的力量并不是来自于多少应该去附和科学研究，实际上往往还是犹豫不决的结果，而更多地是来自一旦写下来就经久不变的教义，只有这样才能给整个教义赋予了宗教信仰的特征。所以教会的地位也就比以往更加稳固了。可以预言的是在这种一味回避的表面现象之下，作为主心骨的教会反而一再更多地获得了盲目的忠诚。

因此，谁要是真正地并且确实希望民族主义的世界观赢得胜利的话，那他就必须要认识到第一不仅要通过富有战斗力的政治运动才能取得胜利，并且第二这场政治运动本身只有建立在对其党纲毫不动摇地坚信的基础上才能经受得住考验。这种世界观不仅要敢于在修改党纲内容方面不和当时的思想潮流进行妥协，而且还要必须保留住一经认为是正确的党纲文本形式，无论如何都要坚持到最后取得胜利为止。任何对党纲进行修改的企图都会提前造成对党纲目的性这种或那种观点上的意见分歧，并在这种由追随者参加的内部讨论的情况下，对运动的决心和战斗力造成分裂。这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在今天对党纲所进行的“修改”不可能在明天就因为听取了批评意见而焕然一新，并在后天就找到了一种更好的内容来进行替代。这就像一个人一下子冲出了樊篱走上了一条自由的大道，但只知道开始，结果却迷失在漫无边际的穷途末路之上。

这一重要的认识必须要引起新兴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视。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要以这二十五条指导原则的党纲为坚定的基础。我们这场政治运动现在和将来追随者的任务不是以批评的观点去修改这

些指导原则，而是有责任去坚持这些指导原则。否则的话，下一代的追随者就会从其自身的权利出发再次浪费他们的精力在党内进行对党纲内容的修改工作，而不去为这场运动输送新的追随者和新生力量。对于这些运动的追随者来说运动的本质特征很少体现在指导原则的字里行间，而更多地则是体现在我们所赋予给这些指导原则的意义之中。

这场新兴的运动应该把这种认识归结于其所使用的名称，按照这个名称所总结出的党纲奠定了其特性得以继续推广的基础。为了促使民族主义思想取得胜利，必须要建立民族主义政党，建立一个不仅有知识分子参加的，而且还由产业工人所组成的政党！

任何一个没有这样强有力的政党组织而要想实现民族主义思想的尝试在过去，在今天，并且在将来都是不会成功的。因此这场政治运动不仅有权力，而且有义务把自己当作是这种思想的先驱和代表。并且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应该是非常民族主义的，同样民族主义的思想也应该是非常国家社会主义的。如果要期望国家社会主义能够取得胜利，那么就必须绝对地和一贯地拥护这种思想。因此国家社会主义不仅有权力，而且有义务最为明确地强调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除了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以外，其它企图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可能代表民族主义思想，那无非是些欺骗谎言罢了。

如果有人现在对这场运动进行指责，说这是“独占”民族主义思想的话，那么对此只能有一个答复：我们不仅要据为己有，而且还要付诸实施。

因为至今为止民族主义这个概念所具有的寓意并不合适对我们民族的命运产生那怕是一点点的影响，原因就是在这个思想中缺少一个明确的、统一的定义。而通常涉及到的只是些单一的、毫不相关的、或多或少大致上是正确的、常常自相矛盾但又绝对没有彼此间内在联系的认识。如果这些情况本身都存在的话，那么由于这些弱点就绝对不足以在此基础上去建立和组织政治运动。

而只有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才可以完成这些工作。

如果现在所有的协会团体、组织机构以及“各大政党”本身都在使用“民族主义”这个词的话，那的确就是受到了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影响的结果。没有这样的努力那些组织和政党也不会想到，也不会说出“民族主义”这个词的，他们这些人，尤其是他们的领导人完全没有想到他们会和这个词毫无关联。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努力才赋予这个词以深刻的内含，现在竟然到了大家都在使用的程度了；特别是在他们自己的宣传活动中就显示出了民族主义思想的力量，并且也证明了即使是出于自己的利益也会迫使其它政党至少在观念上同样会有类似的意愿。

正如这些政党和组织为他们小里小气的选举投机行为上所使用的一切手段那样，民族主义这个词对他们来说也成了完全表面上的、空泛的标语口号，而他们则可以企图利用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招徕人心的力量为他们吸收成员来出力。因为只是出于对他们自己处境的担心以及对我们用一种新的世界观所武装起来运动的蓬勃发展感到恐惧，他们终于知道了其广泛的重要性及危险的特殊性，这些人嘴里所说的口号八年前他们还对此一无所知，七年前还在进行嘲笑，六年前则看作是胡说八道，五年前则极力反对，四年前表示憎恨，三年前就开始追随，最终在两年前自己就霸占着并且还混同他们自己其它的一些词汇在斗争中摇旗呐喊了。

而今天我们必须要一再指出的就是所有这些政党并不知道是什么给德意志民族造成的苦难。最有力的证明就是尽管他们嘴里喊着“民族主义”，但这只是表面现象！

同时，那些在我们身边吵吵闹闹装模作样的民族主义者也不是没有一点危险的，他们可以打造出完美的宏图，但通常却对任何一个可能还是正确的固定的思想观点没有一点帮助，而正是由于他们的封闭狭隘才对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的战斗团体毫无意义，而且也绝不适合去建立一个这样的组织。这些一边从自己的观点中，一边又从读到的书本中去编写党纲的人常常比那些民族主义思想公开的敌人还要危险。他们在和平

时期是些毫无建树的理论家，但常常却是些令人厌恶的喜欢夸夸其谈的家伙，并且很少相信用卷毛大胡子和古日耳曼式的装腔作势就可以遮掩住其行为和才能在精神上的空洞和思想上的匮乏。

相反，针对这些一无是处的企图，因而当人们回想起新兴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开始战斗的时期则是非常有好处的。





第六章 初期的战斗——演讲的作用

1920年2月24日在慕尼黑啤酒馆大厅里举行的第一次全体大会还没有让我们平静下来，进行下一次大会的准备工作就已经开始了。同时原来认为像在慕尼黑这样的大城市里每个月或者甚至是每隔十四天举行一次小型的集会，而现在则认为应该每隔八天，也就是说每个星期都要举行一次大型的集会了。当时我自己就坚信只要人们会来参加集会，那么他们就会留下来并且认真地听我们的演讲，所以我不需要对唯一总是折磨我们的担心做什么保证了：人们会来吗，他们会听我们演讲吗？

那个时候慕尼黑啤酒馆的大厅对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来说几乎就意味着是个神圣的地方。每星期一次的集会几乎都在这个大厅里，而且每次大厅里的人都比以前多，人们也更加聚精会神了！从当时还没有人关心的“战争责任”到《凡尔赛和约》，大家几乎谈到了不论是以宣传鼓动为目的还是思想教育所必需的所有话题。当时尤其关注的是《凡尔赛和约》的问题。这场新兴的运动当时一再向人们所预言的东西现在几乎都应验了。今天人们可以很轻松地谈论或者写下这些事情。但在当时在一个不仅有庸俗的市民，而且还有受到煽动的无产者参加的公开的群众集会上讨论有关《凡尔赛和约》的话题则是对共和国的攻击和激进思想，即使不是，那起码也是君主制观念的标志。刚刚有人对《凡尔赛和约》提出批评，就会被打断，并且还会用老一套的方式进行反击道：“还有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呢？”“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又是怎么回事呢？”人们不断地大喊大叫，直到大家都慷慨激昂或者认为演讲的人最终会放弃去进行演讲的尝试为止。谁要是怀疑是否会有这样的

人真该拿他的脑袋去撞墙！他们难道就没有听说，也不知道《凡尔赛和约》是我们的奇耻大辱，不仅是这些，还有那《凡尔赛和约》的苛刻条件则意味着我们民族空前的分裂。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破坏和敌人宣传的毒害作用使这些人失去了理智。对此我们不要抱怨。因为这正好说明对方的罪恶该是多么的无法估量！可资产阶级为阻止这场可怕的分裂又做了什么呢，是对此进行抵制还是为更好地去澄清事实而铺平道路？什么都没有，完全没有！我当时根本就没有看出他们今天倒全部都成了民族主义思想的伟大信徒。也许这些人在妇女茶话会的茶桌边上或者和在志趣相同的社交圈子里谈谈民族主义，但是在必须对此要谈论的地方，在豺狼般的敌人面前，除了赶快找个机会溜走他们则不敢说出一句话来。

但在当时我自己很清楚，建立民族主义运动的基础首先必须要澄清战争责任问题，而且还要以历史的事实来进行澄清。我们向广大民众介绍《凡尔赛和约》的内容就是我们的运动将来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当资产阶级还把《凡尔赛和约》看成是民主的胜利的时候，人们当时就应该对此表示反对，并且把这个和约当作是敌人永远印刻在人们的脑海里，这样在以后当那个曾经骗人且华而不实的和约赤裸裸仇恨的、真正的丑恶嘴脸毫不掩饰地暴露无遗的时候，就可以回想起当时我们的立场观点并以此来赢得他们对我们的信任。

在当时我就认为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整个公共舆论都采取了一种错误的姿态而没有考虑到大众的心理、仇恨或者所应该进行的抗争。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则不应该是公共舆论的奴仆，而应当是主宰。不要做民众的奴隶，而要做他们的主人！

在面对强大对手通过诱惑的手段企图让人们做出愚蠢的决定或者采取错误行动的时候，特别是对还十分弱小的政治运动来说当然也有可能一起行动，一起叫喊，尤其是当一些原因，即使是表面上和这场新兴运动自己的观点相符而受到拥护的时候。同时人类的胆怯也会去努力地去寻找这些原因并且总会找到一些表面上称之为权利的理由，因此也会出于“自己的观点”一起去做这种违法的事情。

我经历过好几次这样的情形，这需要花很大的气力去做的就是不让运动的航船陷入或者说迫使它驶入人为所激起的风浪之中。最后一次就是当我国那该死的新闻界到底把南蒂罗尔地区的归属问题极力夸张到了事关德意志民族生死存亡地步的时候，像这样的新闻界简直就是我们德意志民族的赫卡柏。他们根本就没有考虑该去帮助谁，可惜就有许多所谓“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人们、政党和团体出于对由犹太人所导演出来的公共舆论的胆怯参加了公众游行，并且还毫无意义地帮助了支持反对我们德国人恰恰在今天这样的处境下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依然还感到唯一一线希望的一种社会制度的斗争。当那个具有国际主义思想的属于全世界的犹太人渐渐地但很准确地卡住了我们喉咙的时候，我们那些所谓的爱国主义者至少在世界的某个地方敢于脱离犹太人共济会的束缚，用民族主义思想去反对国际主义思想在世界范围的毒害，愤怒地责骂这个人那个制度。对于意志薄弱的人们随波逐流和屈服于公共舆论的叫喊也是很诱人的。可这就是投降！即使人们出于内心的虚伪和卑劣不愿意承认，或许还不止一次地针对自己，但事实上却只是胆怯和害怕通过犹太人引起的暴乱所造成的公共舆论才是让他们同流合污的原因所在。其它的理由都是这些自知有罪的可耻小人无端的借口而已。

所以就有必要用铁拳来扭转这场运动的局面，为的是在其堕落之前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下去。在这个由所有力量所激起的公共舆论就像一团巨大的火焰只向着一个方向燃烧的时候，要试图去转变这种状况是很不受欢迎的，尤其是对于那个大胆的人来说甚至还有死亡的危险。历史上也有不少这样的人也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做出了这样的举动而让众人用石头砸死的，可正因为如此后人才以各种理由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一场政治运动也要对此进行思考，而不只是听到眼前的掌声。在这场关键的时刻，这样做也许会让某个人感到害怕，但是不要忘记的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之后就会一下子得到解脱，并且这是一场不仅有利于现在，而且还有利于将来的要让整个世界焕然一新的政治运动。

同时人们还可以看到这常常是历史上最伟大和意义最为深远的成

就，而在当初却很少得到理解和支持，因为他们和普通民众的观点不论是在认识上还是在意愿上都是针锋相对的。

这些情况可以在我们第一次公开亮相的时候就知道了。我们的确不仅要“讨民众的欢心”，而且也在反对他们的愚昧。这些年来我参加群众集会几乎到处都常常会发生人们所相信的和我要说的正好相反，而我相信的和他们所想要的也正好相反的情况。那么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在两个小时里把两千到三千人从他们现有的观念中拖出来，再一个接一个地把他们现有观念的基础毁掉，并且紧接着把他们引到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世界观的出发点上来。

当时我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学到了一些重要的东西，那就是要立即把反抗的武器从敌人的手里夺下来。人们不久就会发现我们的对手，特别是他们以辩论演说家的形象，以整个特定的总是不断地指责我们的观点的“保留节目”出现的时候，那就表明了这同样就是一次目的明确的完整的培训过程。而实际上本来也就是如此。在此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的对手那难以置信的宣传工作的纪律性，并且我至今仍然很骄傲的就是发现了不仅使其宣传工作失效，而且最终还可以去攻击他们的方法。两年以后我自己也就成了这方面的行家了。

在每次演说之前都要对演讲的内容以及对预料之中的对方提出不同看法的形式大致上有所了解，然后在自己的演说中逐条进行反驳。同时很有必要经常引用可能出现的反对意见本身的内容并且立即证明这些是毫无根据的观点，那么这些听众，这些耳朵里塞满了也是听来的反对意见的听众反而出于真心更加容易地就清除掉原先在他们记忆中所形成的看法。那些死记硬背的论据也就会自相矛盾，并且他们的注意力就会更多地被吸引到我们所做的讲演上来。

这也正是之所以我还在部队里担任所谓“教官”的时候第一次做了关于《凡尔赛和约》的演讲之后把题目改成了现在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与凡尔赛和约”的原因。因为在第一次演讲后不久，也就是在对我的演讲进行讨论的过程中我就断定人们实际上完全不了解《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的内容，这也正是那些政党通过狡猾的宣传把

这个条约说成了是世界上最可耻的暴行。广大民众对这个谎言的坚信不疑常常表现为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把《凡尔赛和约》更多地看作是我们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所犯下罪行而理所应得的报应，所以就认为任何反对《凡尔赛和约》的斗争都是不合理的，并且有时还会激起真正道义上的愤怒。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既可耻又可怕的“赔偿”这个词能够在德国流行起来的原因了。而这最具有欺诈性的伪善行为对于我们成千上万受到煽动的同胞来说实际上倒成了伸张什么崇高的正义。而这才是可怕的。对此最好的结果就是我针对《凡尔赛和约》所作的宣讲，以及事先对《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的解释工作。我们把这两个合约一条一条地相互进行对比，把实际上什么是真正非常人道的内容和什么是非人道的东西展示给大家，这样取得了决定性的效果。关于这个问题当时我在两千人的大会上进行了演说，这其中常常就有三千六百个带有敌意的目光向我投来。而在三个小时以后我面前则是人潮涌动，大家都群情激昂怒火满腔。这又再一次地把说了上千次的弥天大谎从人们的心中和脑海里给清除掉了并同时埋下了真理的种子。

这两次关于“世界大战的真正起因”和“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与凡尔赛和约”的演讲我认为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以至于我多次一再不断地以新的文本形式对此进行重复性的演讲，直到至少要让这些内容在人们当中取得准确的、清晰的和统一的认识，而这些人正是政治运动最初的成员。

这种群众大会对我自己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我慢慢地变成了群众大会的演说家了，这需要我能够在容纳上千人的大型会场里具备所必需的激情和举止。

正如前面已经强调的那样，除了在小范围里我在当时还没有看到有政党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解释，而今天他们满嘴里却都在谈论并且还做出好像是因为公众舆论才导致他们有所转变似的。但如果有那么一位民族主义的政治家不论在什么地方对此发表演说的话，那怕是在小范围内，这本身常常也可以代表他自己的观点，并且发表演说则是对自己观点的

最大支持。但这种情况不仅没有发生，反而那些进行讲解和宣传工作的人们出于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和看法站到了敌对的立场上去了。

我们还为宣讲工作印制了传单。早在部队的时候我就编写了对《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与《凡尔赛和约》发表不同意见的传单并且得到了很好的传播。以后我又把这个方法用在了建立党组织的工作上同样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最初几次的集会通过放在桌子上各种各样的传单、报纸和宣传小册子等等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它们的内容受到了极大的重视。这样做实际上能够带来巨大的转变，而且还是广大民众心理上普遍的转变。

我在上卷书里就阐明了凡是能够改变世界的重大事件是不会靠大喊大叫，而是因为讲出来的话所决定的。与此相关的还有部分新闻刊物对此进行长期的讨论，当然特别是指我们那些资产阶级的滑头们对我们的看法所发表的激烈言论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是为什么对此表示怀疑的人会提出反对意见。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所以反对这种观念仅仅是因为他们自己缺乏通过所发表的言论对广大民众施以影响的力量和能力，同时人们则更多地投入到纯粹写作方面的工作中，而实际上也就放弃了进行宣传鼓动的演讲。这样的习惯就慢慢地迫使我们今天的资产阶级已经表明他们已失去了对广大民众在心理上产生作用和施加影响的能力。

一个演讲的人可以面对他的听众不断地对讲演的内容进行修正，同时还可以根据听众的面部表情就能够估计听众对他的演讲理解到什么程度，他的话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是否给他们留下了印象，而一个作家却根本完全不认识他的读者。所以作家从一开始不仅要脱离眼前某个特定的人群，而且他的作品还要完全大众化。这样他就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心理上的细心，结果也就失去了思维上的敏捷。所以通常一个卓越的演说家在写作方面的本领要比一个优秀的作家去演讲的能力要高得多，除非他在此方面不断地进行练习。另外还有由于民众自身的懒惰，喜欢墨守成规的原因，并且如果所写出来的东西和他们自己所相信

的不符或者无法带给他们所期待的内容的话，他们自己本身也是不愿意接受的。所以一部带有一定倾向性的作品常常只会由进行这方面思考的人去阅读，而一份传单或一张宣传海报以其简单明了也会引起持不同政见者的注意。各式各样的宣传图片则具有更大的前景，直至可以通过电影来进行宣传。这样的话人们就更不用动脑筋了，只需要看一看就足够了，顶多是读一读简短的文字说明，而人们则更多地准备用图片说明来替代较长的文字说明。我想要说的是宣传图片会在更短的时间里一下子就可以向人们说明情况，而写出来的东西则要让人们费时费力地去阅读才行。

而最主要的是一部作品从来就不知道将会落到谁的手里，还得保留住自己特有的内容形式。一般地来说一部作品的影响越大，其内容就越符合人们的智力水平和本质特征，而这些人才能成为它的读者。比起一本专门给高级知识分子阶层的书来说，一本为广大民众所写的书从一开始就要尝试在写作风格和智力水平上要进行不同方式的创作。

只有具备这种适应能力特征所写的东西才能够接近所讲出的内容。我认为演说家也能够像一本书那样对同样的一个问题进行论述，如果他是一位伟大的天才演说家的话，他就可以用同样的题材和材料以同样的方式几乎不用重复地进行演讲。他演讲所使用的字眼恰好是其情感的流露，也正好说出了听众的心里话，那他就总会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要是轻微的口误也会自己去进行纠正。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他可以根据听众的面部表情首先察觉到他们是否理解了他的讲话，其次看他们是否全都同意，并且第三点还要看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相信其演讲内容的正确性。如果他首先看到他们没有理解，那么他的讲解就会简单明了并让每个人都会懂懂；要是其次他感觉到他们不赞同他的观点，他就会仔细地 and 耐心地说明其看法，直到听众中就连最弱智的人都不会落后为止；而针对第三点来说一旦他知道了听众们好像不太相信其演讲内容的正确性，那么就立即用其它例证再次进行说明，对于那些他察觉到没有说出口的反对意见他就自己讲出来并且要进行反驳和痛击，直到所形成的反对派团伙在所引证的论据面前通过他们的行为和表情能够向他屈服为止。

同时这不仅很少涉及到那些为了克服偏见而不可理喻的人们，他们大部分都是无意识地靠情感来支撑的。要克服这种本能上的厌恶、直觉上的仇视和带有偏见的拒绝的阻碍比纠正一个不完善和错误的科学方面的见解还要困难上千倍。错误的概念和有害的知识可以通过教育和劝导去消除。但感情方面的障碍却是无法这样去排除的。唯一对于这种神秘力量具有号召力的不可能是作家，而几乎都只能是演说家。

尽管由资产阶级所开办的新闻刊物常常都非常精明，其惊人的发行量足以证明可以把我们的民众都吞噬掉，但却恰恰无法阻止广大民众成为资产阶级最强大的敌人。由知识分子一年又一年所炮制的全部报刊和所有书籍虽然像潮水般地涌来，但对成千上万的底层民众来说却毫无用处，就像是水流过擦了油的皮革一样。这只能证明两样东西：要么我们的资产阶级全部作品的内容都不正确，要么就是通过这些作品还不可能打动广大民众的心。特别肯定的是这些作品本身在这种情形下极少具有心理上的说服力。

无法否认的是（这也是一种在柏林的德意志民族报所尝试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身恰恰就是通过他写的东西，尤其是通过卡尔·马克思的著作对其思想主张来进行基本论证的。表面上看人们还没有支持这种错误的观点。可这种惊人的力量通过广大民众所给予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绝不是把犹太人的思想通过书面形式而形成的一部著作，更多的则是一种巨大的、演说家式的、多年来侵袭着广大民众的宣传浪潮。在十万个德国工人当中平均还不到一百人知道这部著作，而比起这场政治运动那些大部分来自底层民众真正的追随者来说，这部著作更多地是由知识分子特别是犹太人进行了上千次的研究。这部著作本来也完全不是为大众写的，而是为了犹太人统治世界机器的有才干的领导人所写的，而所用的燃料则是另外一种东西：新闻刊物。而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刊物和资产阶级的新闻刊物的区别所在。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刊物是由煽动家们所写的，而资产阶级的新闻刊物只愿意通过作家去进行煽动。没有第二个人会像那些常常总是从会场到编辑部并躲在角落里的社会民

主党的编辑们知道民众的脾气秉性了。可那些走出书房来到民众面前的资产阶级拙劣的作家们却被民众身上的臭气给熏得生了病，他们所写的东西对民众也没有帮助。

上百万的工人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所赢得的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教父的写作风格，更多的则是坚持不懈的、真正强有力的、由上万名孜孜不倦的，起初是那些最大的信徒，然后到下层小小的工会主管，到工会干部，再到讨论会上的发言人的煽动家们所进行的宣传鼓动工作，而这也就是上万次的群众集会，有的还是站在烟雾弥漫的小酒馆的桌子上进行的，这些教育民众的演说家知道怎样巧妙地去了解民众，这才真正地把他们置于了选择针对公共舆论堡垒采取最有效进攻所使用武器的境地。而接下来的就是大规模的群众游行，就是十万人游行队伍，这让那些卑微可怜的人们感到了无比的自豪，就好像一只小毛虫变成了一条巨龙，在这种热烈的气氛下把曾经所仇视的资产阶级烧得精光，并且还要欢庆无产阶级专政所取得的最后胜利。

在这种宣传的鼓动下，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去读有关社会民主党的新闻，并且不仅是相关的新闻报道，而且还读有关这方面的讨论文章。当资产阶级阵营里各种各样的教授、犹太学者、理论家和作家只是偶尔去尝试进行演说的时候，马克思主义阵营里的演说家则偶尔会尝试进行写作了。并且还要特别注意犹太人，通常出于其极具欺骗性的精明和灵活的狡辩能力，即使当一名作家也要是一个比作家更具有煽动能力的演说家。

这也正是为什么资产阶级的刊物（完全忽略的是其中很大部分已经犹太化了，并且因此也就没有兴趣对广大民众进行真正的宣传了）对广大民众的立场观点没有丝毫影响的原因。

要消除情感化的偏见、情绪和感觉并且用其它的东西来替代是多么的困难，为了成功该取决于多少无法预料的影响和条件，而一个细心的演说家就可以估计到这些，演讲的时间就可能对于演讲的效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同样的演说内容、同样的演说家、同样的题目会因为演讲时间的不同，比如上午十点钟、下午三点钟或是在晚上而产生截然不同

的效果。最初我在演讲的时候常把时间安排在上午，我还特别记得在慕尼黑啤酒馆为了抗议“对德国领土的侵占”而举行的一次集会。这是当时慕尼黑最大的会场，所以风险就好像要大一些。为了让我们的追随者和所有参加集会的人到访更加方便一些，我把演讲时间定在星期天的上午十点钟。可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同时也得到了一条极好的教训：会场是里坐满了人，给人的印象的确很好，但气氛却很冷落；并且我自己作为演讲的人心里感到有些不妙，我和听众没有互动，连最起码的沟通都无法建立。我想我的演说并不比平时差，只是所得到的效果显得几乎为零。我就这样非常不满意地离开了会场，就算是多了一次教训。我以后又以同样的做法尝试了好几次，可结果都是相同的。

这并不令人感到惊奇。去剧院看演出要是在下午三点钟看一场戏并且在晚上八点钟看同一场戏的话，人们吃惊地感到会得到不同的效果和印象。细心的人们自己就能够明白这样的感觉并且会很容易地确认下午观看演出的印象没有晚上去观看的印象那么深刻。对于看电影来说也会得出同样的判断。关键是人们会说在剧院里演出的演员也许下午的时候没有晚上那么累。而电影无论是在下午还是在晚上九点钟则没有什么两样。时间本身在此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就像会场对我起到的作用一样。由于某些人们很难知道的原因，有的会场会很冷清，无论怎样去制造气氛都会遭到最强烈的反对。即使是人们现有习惯上的回忆和想象对于印象的产生也有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在拜罗伊特上演一部“帕西法尔”和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演出效果总会是不一样的。而剧院里对于古老的边陲之城的小山丘所产生的神奇魔力是无法用外景来替代或者弥补的。

这一切都是对人类自由意志的伤害，当然这里主要是指让人们自己去意见相反并且还要必须从中接受新的意愿的群众大会了。在早晨和白天的时间里，人们好像反抗那些强迫他们接受某种外来的意志和陌生的意见的力量还处于极强的状态。相反在晚上他们则容易屈服于某种坚定意志的控制力量。因为实际上每次群众大会都会出现这两种力量的对抗。具有控制能力的传教士出色的说道艺术能够比较容易成功地让人接受新的意愿是用最简单的方法让他们自己已经知道其抵抗能力的虚弱，

也就是当人们的智力和意志都完全处在松懈的状态下进行的。

而天主教堂里那些人为制造的但的确充满了神秘色彩的落日余晖以及那摇曳的烛光、袅袅的青烟、缭绕的香炉等等也同样达到了这样的目的。

在这场演说家与应该转变观念的对手之间的较量中，演说家渐渐敏锐地感到了宣传工作在心理方面的先决条件，而这几乎是那些作家永远都无法得到的。所以写出来的东西应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而通常会更多地对维护、巩固和加深一种业已存在的观念或者看法有所帮助。所有真正伟大的历史变革不仅是因写出来的文字而引起的，甚至还是伴随着这些文字而发生的。

人们无法相信的是法国大革命与其说是通过哲学理论的引导而发生的，还不如说是它找到了一支由煽动家所组成的最大的蛊惑民心的队伍并激发起了受苦受难民众的热情直至最终发生了那可怕的、让整个欧洲都吓得目瞪口呆的火山爆发。并且最近所发生的最具影响力的革命，即在俄国发生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不仅是通过列宁的著作，而且还通过这些无数的大大小的同仇敌忾的演讲活动所引起的。

那些连字都不认识的人们实际上是不会通过卡尔·马克思的教科书而受到共产主义革命的鼓舞的，而只能是通过肯定是服务于某种理论思想的成百上千的煽动家们所不断描绘的光辉灿烂的美好前景而受到激励的。

并且事情本来就是如此，而且是永远如此。

与此相反，那些顽固不化的、脱离实际的德国知识分子却认为作家的智力水平要超过演说家。这种观点通过前面所提到的《德意志民族报》以极其滑稽可笑的方式用图例说明的评论文章得到了证实，常常令人失望的是一位有名的大演说家的演讲内容突然一下子给登在报纸上了。我还记得在战争期间得到的另一篇评论文章，为了得出富有见解的结论，

他们对当时还是英国军需大臣的劳埃德·乔治的讲话吹毛求疵，认为这些讲话在思想和学术上都是毫无价值的，而且还是平庸乏味和不假思索的作品。后来我自己又得到一本有他几篇讲演的小册子，不得不对于这般平庸的德国文人墨客们无法理解这位对民众有影响力心理大师的杰作而放声大笑了。这些人对这些演讲所做出的判断只是根据出于他们自己的骄傲自大而留下的印象罢了，而这位英国的大演说家却把广大民众当成自己的听众，从广义上讲他是在尽可能大地影响到整个英国的底层民众。从这个观点来看这个英国人的讲演则有着最了不起的成就，因为这正好证明了这是对广大民众心灵令人赞叹般地了解的结果。而其所达到的实际效果也会是十分明显的。

对此，我们可以和束手无策连讲话都结结巴巴的贝特曼·霍尔维格来比较一下。他的讲话看起来当然更有见解，可实际上却只能表明他无法和广大民众进行沟通，而他自己也的确是如此。尽管德国式的专业高等教育培养出了一位像普通的麻雀一般智力水平的粗俗作家也可以凭借着按照其学术上的标准把以号召民众为目标的演讲所留给他认为是内心思想僵化的印象去对这位英国大臣的智慧进行评价，而且当然还和其他对他有影响的德国政治家充满智慧的废话去进行比较。劳埃德·乔治的天赋比起贝特曼·霍尔维格来说不仅是不相上下，而且还要超过他上千倍，这通过其演讲深入人心的形式和毫无保留地对民众意愿的表达就可以得到证实。而正是其演讲的朴实无华、表达方式的简单明了、举例说明浅显易懂才证明了这位英国人高超的政治才华。因为我从来就不按照一位大学教授对政治家向民众做的演讲所留下的印象去进行评价，而是要看演讲对民众所起到的影响。并且这也是对演说家天赋的衡量标准。

我们政治运动从几年前的无足轻重到今天的引人注目的令人赞叹的发展，尤其是对我们国内外敌人所进行最严厉的打击都要归功于对演讲的重视和运用。

关于这场政治运动的文献资料也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在我们今天的形势下这些资料对我们高层和基层的领导人进行相同和统一培训教育的重要性比我们赢得持反对意见的民众支持的意义更加重大。只有在极少的情下一个忠实的社会民主党人或者一个狂热的共产主义分子才会勉强地去买一本有关国家社会主义的小册子甚至是一本这类的书来阅读，并且从中获得对我们世界观的了解或者去研究这方面的评论文章。一种报纸如果没有从一开始就打上所属政党的印记也会很少有人去读的。而唯一完整的报纸页码也显得是那样的支离破碎并且还起到了四分五裂的作用，实则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毕竟仅靠一次阅读是不要期待对读者会产生什么影响的。人们不要也不应该指望连一分钱对他来说都十分重要的人仅仅是出于澄清客观事实的渴望就会去订阅观点不同的报刊。恐怕这在一万个人里面也不会有一个这样去做的。而当一个人理解和支持这场运动时才会不间断地阅读这个政党的机关刊物，也就是作为其政治运动的新闻机构连续出版的刊物。

但对于大家所“谈论”的传单则是完全另一种情形！尽管传单上的标题眼下已经成为人们所谈论的话题，尤其当这些传单还是可以免费得到的时候，那么对于这个或那个人来说他们宁愿把传单拿在手里，这样会更加地一目了然。在多多少少对传单进行了基本阅读后他也许会形成新的观点和看法，而这正是这场新兴的政治运动所要认真地去完成的。当然在极其顺利的情况下也会因此而出现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我们不能事事都要求完美无缺。因为就算是传单也只能起到一些启发或者指导作用，其效果只有在和接下来对读者进行的宣教和讲解工作联系起来后才能显示出来。而这就是并且总是由群众集会来完成的。

群众集会之所以是有必要的，那是因为每个将要成为这场新兴政治运动追随者的人自己去参加集会的时候不免会感到有些孤独和害怕，可当他第一次看到会场那团结热烈景象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因此而感到振奋和受到鼓舞的。而同样一个在部队或者营地的人，周围都是他的战友就比他自己去参加集会要更容易受到心灵上的感染。他在人群中会感到更加安全，即使实际上有上千个反对的理由。

大型群众集会的热烈气氛不仅让每个人都精神振奋，而且还有助于产生集体精神。当一个人作为一个企业或者工厂里新思想的代表而陷入困境的时候，他就需要来自坚定的、自信的支持而要成为一个强大的、团结的集体的成员和勇士。对这个集体的第一印象他只能通过和别人一起共同参加群众大会才可以得到。如果他是来自一个让他感觉自己相当渺小的小作坊或者是一个大企业第一次来参加这样的群众集会，并且周围都是数以千计志同道合的人们，如果他仅仅是试探性地来参加集会的话，那他也会被这三、四千人那诱人的气氛和激情所形成的巨大影响力所感染，当这显而易见的效果和上千人的赞同也使他认同了新的思想理论的正确性并且还让他第一次对其现有的信仰产生了怀疑的时候，那他自己就会完全被我们称之为集体诱惑力的神奇魔力所征服。上千人的意愿、渴望，当然还有力量都会聚集在每一个人的身上。这个怀着忐忑不安和犹豫不决的心情来参加集会的人，在离开会场的时候就会深信：他已经成为这个集体中的一员了。

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永远都不要忘记自己尤其不要受到那些好像什么都知道，其实是一无所知地认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要依靠其存在和统治的资产阶级的影响。是的，他们是很伟大，他们什么都能干，什么都懂，但就只有一件事他们不理解，那就是阻止德意志民族去反对马克思主义。因为他们是最卑鄙和最可耻的，他们的目空一切也只不过是狂傲自负而已，他们那出了名的自尊也总是和愚蠢形影相随。

如果今天这些人特别不重视我们的讲话，那么他们也只能这样做了，上帝呀，那是因为他们自己非常相信他们那些没有什么影响力的废话。



第七章 与红色阵线的较量

我在 1919 年到 1920 年期间，并且在 1921 年曾亲自参加过所谓资产阶级政党的集会。给我的印象总好像是小时候要听话吃鱼肝油的感觉。人应该吃好吃的东西，可那玩意儿实在难吃！要是把德国民众拿绳子捆着用暴力强迫他们去参加这种资产阶级的“集会”，而且还要封锁会场的出口，演讲没有结束就不允许一个人出去的话，恐怕只有这样也许会有些效果。当然我不得不承认也许生活不再让我感到欣慰，而且我也完全不再想成为德国人了。可是不能这样做的，上帝呀，所以当身体健康心灵纯洁的人们躲避这种“资产阶级集会”的时候，就像魔鬼要躲避圣水一样也就不要大惊小怪了。

我认识他们这些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预言家们，所以实际上也就并没有感到惊奇，而且还知道为什么他们对讲演不加重视的原因。我当时参加过德意志民族民主党、德国人民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即巴伐利亚中央党）的集会。立即会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听众们基本上都一样。几乎总是只有这些政党的党员才参加这些集会。整个集会过程也没有什么规定，与其说这是要进行伟大革命事业的群众大会，倒不如说更像一个懒散的纸牌俱乐部。

为了保持这种平和的气氛。演讲者自己也尽量顺其自然。他们谈论，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通常只是读一读报纸上风趣的文章或者是学术论文，尽量避免使用尖锐的词句，其间还不时地说些温文尔雅的笑话，直到主席台上那些令人尊敬的人们也开始会意地笑起来，就算不是很大声地，但也要诱人般地、装腔作势地和矜持地笑一下。

尤其就是主席台上的那些人！我在慕尼黑附近的一个机车厂的车间

里的群众集会上就看到一次；这是一次纪念莱比锡大会战胜利凯旋的群众大会。演讲的或者说是在朗读的人是位某大学令人尊敬的教授。而演讲台后面主席台上的人左边的一个戴着单片眼镜，右边的那位也戴着单片眼镜，就中间的没戴眼镜。三个人都穿着礼服，给人的印象好像要么是准备进行处决的法庭，要么更多地像是带有些宗教味道的小孩子洗礼的隆重仪式。而那所谓的演讲看起来很好只不过取得的效果简直就是糟糕透了。这样过了四十五分钟后大家都昏昏欲睡神智恍惚了，演讲还不时地被一个男的或女的走出会场和女招待的脚步声，还有越来越多的打呵欠声所打断。有三个工人也来参加集会，我正好站在他们后面，不知道是出于好奇还是在值勤他们互相之间不时用不怀好意的目光观望着并且最终还是彼此用胳膊肘碰撞着悄悄地离开了会场。人们看得出他们绝对是不想搅乱集会。不过这种事情在这种场合下的确没有必要发生。终于大会似乎快要结束了。在那个讲话声音越来越低的教授演讲完以后，坐在两个戴眼镜的人中间的会议主席站起来大声地对在座的德国的“兄弟”和“姐妹”们说道他对于这位教授以既喜闻乐见又思想深刻的形式所做的独特和优秀的讲演是如何地感激并且得到了怎样的感受，还指出讲演内容的真正含义是“内心的体验”，也就是“行动”。而他还想要在这样稀拉拉的场合下组织进行讨论，以便能够察觉到这次讲演给与会人员的感受如何，而大家反而要从座位上站起来准备一致高呼：“我们是统一民族的兄弟姐妹”等等口号，这真是对这庄严时刻的亵渎。最后他也只得要求大家一起来唱一支德国歌曲来作为集会的结束。

于是他们就唱了起来，并且我发现在唱到第二段的时候声音就低了下去而在重唱的时候又高了起来，在第三段的时候给人的这种感觉尤为强烈，所以我想他们根本完全就记不住歌词。

如果要以德意志民族所特有的发自内心的极大热情去高唱这样一首歌的话还算能沾点边儿！就这样，会议结束了，这样人人都争先恐后地赶紧往外跑，有的去喝啤酒，有的进咖啡馆，还有的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是呀，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只是想出去！这也是我现在唯一的

感觉。这有助于对成千上万的普鲁士人和德国人所进行的英勇奋斗的赞颂吗？真是见鬼，真是活见鬼！像这样的东西政府肯定喜欢。这当然也是一次“平和”的集会了。因为这样不必引起那些希望安宁和秩序的部长们害怕激情的波涛有可能突然会逾越正派市民的容忍程度，也不必害怕这些人突然会在激情的熏陶之下涌出会场大厅可并没有赶紧去咖啡馆或者小酒店，而是四个人一排以同样的步伐高呼着“德国万岁”走上城市的大街去游行，并且由此还引起了想要安静的警察们的烦恼。

是的，人们对这样的市民会感到满意的。

与此相反，国家社会主义政治运动的集会肯定不是“平和”的。因为这是两种不同世界观潮流的相互对抗，并且不仅不会以唱一首什么乏味的爱国歌曲作为集会的结尾，而是要激发出狂热的民族主义热情。

我们所组织的群众集会从一开始就要确立绝对服从的纪律和集会领导人的绝对威权，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所谈论的绝不是资产阶级“讲演人”所说的那些苍白无力的废话，而是我们演讲的形式和内容总会激起对手去进行反驳！我们的对手就在会场上！难道他们不是常常成群结队地来到我们的会场，还有个把煽动分子混在其中吗，从他们的脸上就能看得出：今天我们要和你们做个了结！是的，难道我们这些赤色朋友们不是常常带着事先明确指派的任务成群结队地来到我们的会场的吗，今天晚上我们就要把这些废物赶走并且要就此给历史一个了结！难道还不明白只有大会领导人那无情的力量和会场警卫粗暴的卤莽才能一再地使对手的阴谋破灭。

并且他们会有各种各样被激怒的理由了。

就是我们宣传海报上的红色吸引他们来到我们的会场的。而普通的市民则完全对此表示惊讶，把我们看成是赤色的布尔什维克分子，并且还认为这本身就是模棱两可的。德意志民族党的英才们总在窃窃私语地怀疑我们基本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变种，也许完全就是伪装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是社会主义者。因为这些人直到今天也没有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区别。特别是当人们发现在我们的集会上我们基本

上不用“女士们，先生们”进行问候，而改称“同志们”并且彼此也只称呼党员同志的时候，对我们的反对者来说就更加说明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幽灵的显现。资产阶级可怜的胆小鬼对于我们的来历、我们的观点和我们的目标富有见地的揣测常常会让我们笑得前仰后合。

在宣传海报中选择用红色我们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为的是吸引、激发和引诱左派人士来参加我们的集会，就算是为了把他们赶走，那我们也完全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和他们进行交谈。

这些年来，对我们的反对派在其总是摇摆不定的策略方面所表现出的不知所措和束手无策所进行的关注是很可笑的。而最终他们就要求其追随者们不要对我们的讲话做记录，并且也不准参加我们的集会。

通常他们也会遵命去这样做。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是有一些人来参加我们的集会，而且人数尽管很慢地但却是在不断地增加，并且他们对我们理论思想的印象也逐渐清晰了，这使得他们的领导人也渐渐感到烦躁不安而且还固执地认为不应该看到事态这样继续下去，并且还准备必须要使用暴力来进行阻止。

正是因为在这样的要求下现在那些“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才成群结队地来参加我们的集会，以便让他们代表无产阶级的拳头来打击我们进行“君主制式的反动煽动”。

当时在开会前的四十五分钟里会场上就已经坐满了工人。他们就像是一只随时都可以爆炸并且已经和点燃的导火索相连的火药桶。可事情的结果却是另外一回事。他们这些人进来的时候是我们的敌人，而离开会场的时候，即使还没有成为我们的追随者也会对他们自己理论思想的正确性去进行反思和批评性地审视。在我进行了三个小时的演讲后，不管是我们的追随者还是我们的反对派，他们渐渐地并且也将会融汇成了一个热情洋溢的整体。而任何一种想要离开表现都是徒劳的。此时那些反对派的领导人才会真地感到恐惧并且又赶紧说明从前就曾经对这种做法表示过反对，现在又用某种权利的假象来表明其原则上禁止工人去参加我们集会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

这时他们就不再或者很少参加我们的集会了。只不过不久后这种游戏又从头开始了。

人们也没有遵守这条禁令，同志们来得越来越多，并且最后要超过我们这些反动政策的追随者了。我们反倒要被赶走了。

要是在两三次或者八到十次集会后就证实了想要把我们赶走也只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话，那这样的结果则意味着把些这赤色的战斗部队分离出去的时候，就会突然出现另外一种口号：“无产者们，同志们！你们千万不要去参加国家社会主义煽动家的集会！”同样这种始终摇摆不定的政策还可以在赤色分子的报纸上看到。不久他们还想让我们保持沉默，为的是要确信这徒劳无功而结果还适得其反的企图还有一些作用。每天都会有人“说起”我们，而经常还是为了让工人们明白我们的存在绝对是荒唐可笑的才会提到我们。一段时间后他们却感到这样做不仅没有伤害到我们，反而还对我们有益，这时当然就会有很多人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既然我们的存在是荒唐可笑的，那还唠唠叨叨说这么多干什么呢。人们对此也很好奇。后来他们又改了主意突然开始说我们一直就是人类真正最大的罪犯。一篇又一篇的文章都在讲我们的罪行，并且还不时地蘸着手指头从头到尾逐一细数着用新的丑闻来加以证明，而且这些还都是顺便提到的。但是不久后他们从这种徒劳的攻击中好像也明白过来了，因为这样做基本上只会有助于引起大家对我们的注意。

当时我就采取这样的态度，不管怎样，无论他们是嘲笑我们还是对我们进行漫骂，不管他们把我们当作小丑或者罪犯，关键的是他们总会提到我们，他们总要不断地关注我们，而我们实际上在工人们的眼中却渐渐成为了目前还可以开始去进行争论的力量。我们真正是什么样的人和我们真正所想要的，我们总有一天会展示给在新闻界的犹太暴徒的。

为什么他们当时没有立刻从我们集会上离去的一个原因肯定也是因为我们那些反对派领导人那令人难以置信的胆怯。在这最为关键的时

刻他们把这些无赖派来想到的他们顶多也就是会被赶出会场的结果。

我们非常了解他们这些人的意图,不仅只是因为我们有意识让我们许多党员同志本身隐藏在赤色分子的行列中间,而且还因为这些幕后操纵的赤色分子自己也被看作是在这种情况下对我们倒是极为有利,并且很可惜在我们德国人身上也常常可以感觉得到的多嘴多舌的人。他们无法为所酝酿和计划的东西保密,并且通常都是还没有下蛋就开始嘎嘎地叫了。所以我们就得常常要做好最为全面的准备工作,为的只是不让这些赤色分子的指挥官们自己知道,距离把他们扔出会场已经不远了。

当时的情形迫使我们必须要自己来保护集会;而不要考虑官方的保护;相反根据我们的经验官方的保护还会有利那些捣乱分子。因为实际上官方的介入就是警察的介入,唯一的结果顶多就是解散集会,也就是终止集会。而且这也正是反对派捣乱分子的目的和意图。

在这方面警察并没有完全像人们所能够想象的那样受过训练把最能捣乱的看作是违法的。不管官方怎样感受到集会所存在发生暴力事件危险性的威胁,那么警察就不仅会拘捕肇事者,而且还会禁止其他无辜的人们参加集会,这样就把警察这种普通的观点极大地夸大成了他们的智慧,他们将其称作是一项“阻止违法行为的预防措施”。

而那些坚定的捣乱分子会随时轻易地让正派人的政治活动和行动出丑。在维护安宁和秩序的名义下,国家尊严也会屈服于这些暴徒,并且还要请求别人不要去激怒他们。如果国家社会主义者想要在指定的地点举行集会而工会组织则号召其成员对此表示反对的话,那么警察就绝对不会让这些受到鼓动的家伙去坐牢,而是禁止我们举行集会。是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法律机构还会恬不知耻地向我们发出无数的书面警告。

要想避免发生不测,就必须考虑到让这些捣乱事件的企图根本就不可能产生出来。

另外还要注意:靠警察来保护的集会在广大民众的眼里会降低会议主办人的威望。靠大批警察才能保证举行的集会是不会达到预期的效

果的，在这一点上能够赢得底层民众的前提条件，还是一种显而易见力量的存在。

就像一个勇敢的男子汉总会比一个胆小鬼更容易地征服一个女人的芳心一样，一场具有英雄气概的政治运动也会比一场靠警察的保护来维持其胆怯的运动更能获得民众的心声。

尤其是由于最后一个原因，一场新兴的政治运动才必须要考虑到要靠自己来体现其自身的存在，要自己保护自己，要靠自己去粉碎反对派的暴力。

保护集会的措施为：一，要靠精力和体力素质良好的集会领导人；二，要靠有组织的维护秩序的队伍。

当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举行集会的时候，我们就是主人，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并且我们还要不断地每时每刻地尽力强调我们作为主人的权力。我们的反对派完全清楚地知道当时谁要是捣乱，那就会被毫不留情地给扔出去的，而我们自己本身也只是这五百人中的十几个人而已。在当时的集会上，特别是在慕尼黑以外的地方举行的集会上常常是十五、十六、十七和十八名国家社会主义党员遇到五百、六百、七百到八百个反对派。只是我们并没有容忍这种挑衅行为，并且来参加集会的人们也清楚地知道我们宁愿被打死也不会屈服的。常常不止一次的是我们几个党员同志勇敢地去对付那些气势汹汹并且占绝对优势的赤色分子。

在这种情况下，这十五或二十个党员同志最后肯定会挨打，但是别人知道以前就是至少有成倍或者三倍的人挨打，他们也不愿意冒险去进行阻拦。

所以，我们试图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政党举行集会的技巧去进行学习，并且我们学到了。

马克思主义分子向来都是盲目服从纪律的，所以从资产阶级政党这一方至少不会产生出会从马克思主义分子的集会上被赶走的想法。而且



越来越多的赤色分子也相信这一看法。他们在这一领域里不仅把捣乱变成了一种特有的精湛技艺，而且最后还广泛扩散到帝国更大的范围里甚至把本身不是马克思主义分子的集会也说成是对无产阶级的挑衅，尤其是当那些幕后操纵的人察觉到在集会上有可能要公布那些暴露他们自己愚弄民众欺骗民众的卑鄙行径忏悔录的时候。而一旦有这样的集会召开，整个赤色分子的报刊新闻都会愤怒地叫喊着，同时这些基本上无视法律的人们还总是率先向当局提出急切和威胁性的请求，那就是要立即阻止这些“对无产阶级的挑衅”和“防止类似不愉快事件的发生”。他们根据这些愚蠢官员们职位的高低大小说出不同的话以达到其同样的目的。偶尔在这个职位上也会有真正的德国人，而不是什么当官的走狗，拒绝这可耻的无理要求，那么跟着这个无法容忍这种“对无产阶级挑衅”的公开要求之后的就是冒出和参加集会同样多的人来“用无产阶级那长着老茧的拳头来阻止资产阶级走狗可耻的罪恶行径”。

现在想必人们已经认识到资产阶级的集会了，并且也共同体验到了其集会领导人的绝望和胆怯！在受到威胁时常常就简单地取消集会。还总是因为太害怕以至于很少在八点钟开始，而是在九点三刻前或九点钟集会才开始。集会的领导人也尽量用九十九分的恭维向在场的“反对派的先生们”表明对这些还不支持其观点立场人们的到来，他和所有与会人员从内心是多么地高兴（简直就是撒谎！），因为只有通过双方的交谈（这他从一开始就立即郑重允诺了）才能使彼此的想法更加接近，才能增加相互的理解和建立起沟通的渠道。同时他还另外保证集会的意图绝对不是要否定人们现有的思想观点。肯定不是，每个人应该只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幸福地生活，但也得让别人幸福地生活，正因为如此，他才请求讲演者结束他那本来就不长的演讲，并且就不会让世人看见在集会上德国同胞之间内心仇恨的令人丢脸的表演了，等等。

左派的同胞通常对此肯定不会理解，而且在讲演者还没有开始之前他们就已经极为愤怒了，并且人们常常会得到这样一个印象，那就是他们对尽快地缩短这种折磨人的演讲过程好像还要感谢上天。在大吵大闹

的指责声中这些资产阶级的斗牛士们离开了斗兽场，只要他们还没有被打得头破血流跌下阶梯，而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当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第一次组织群众集会的时候，特别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进行组织的时候，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分子来说肯定是新奇的。他们也来到会场并且相信他们所惯用的伎俩当然也可以在我们这里重复使用。“今天我们要做个了结！”有一个人进入我们会场的时候没等把这句话叫喊完，而在他想第二次叫喊时就已经闪电般地坐在了会场入口的前面了。

首先，我们集会的领导人是不同的。是不会去乞求让我们的集会平安无事，也不会从一开始就没完没了地做什么保证，而是很快地就明确我们才是集会的主人，因此我们才有权下逐客令，不管是谁，那怕只是打断别人的讲话，都会毫不留情地把他从他进来的地方给扔出去的。而且我们对这样的家伙还拒绝承担任何责任；要是有时间或者我们方便的话还可以组织讨论，如果没有，那就不进行讨论，这完全由演讲人，也就是我们的党员同志来做最后的决定。

对此他们就已经感到惊讶了。

其次，我们的会场有组织严格的保卫。而在资产阶级政党的集会上会场保卫或者说是维护秩序通常大部分想必都是某些德高望重的长者，而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所煽动的民众是不管什么德高望重的长者的，所以资产阶级政党的会场保卫实际上可以说给取消了。

从我们大型群众集会活动一开始我就使用会场保卫，而不是维护秩序，他们基本上都是年轻的小伙子，而一部分还是我在部队时所结识的战友，其余的都是党员同志，从一开始就教育和培训他们暴力只能通过暴力才能打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勇敢和坚定的人才能永远获胜，我们是在为一个伟大和崇高到值得让我们用最后一滴鲜血去捍卫和保护的思想而奋战到底。他们的心中充满了这样的教诲，那就是当一旦理智沉寂而暴力说了算的时候，最好的防卫武器就是进攻，面对敌人的叫喊维持秩序的不是用辩论会，而应该是一个最坚强的战斗集体。

而这些年轻人怎么会不期待有这样的口令呢！在战场上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对资产阶级的意志薄弱曾经感到多么的讨厌和恶心！因为有一点是相当明确的就是像这样的革命实际上是多亏了有这可恶的资产阶级对我们民众的领导才可能会有这个样子的结果。虽然用来保护德意志民族的拳头当时还在，但只是缺少动动脑筋。当我向这些年轻人阐明其所应承担使命的必要性时，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他们反复证明在这个地球上的一切智慧在不使用武力对其进行遮掩和保护的情况下都会是枉然的，温柔的和平女神只会站在战神的一边，并且每一项伟大的和平事业总是需要武力的保护和帮助来与之相伴的，当时我的话是怎样地照亮了他们的眼睛的！并让他们心中真地油然产生出服兵役的想法！这不是那种陈旧的、思想僵化的政府官员们所固有的为那种死气沉沉国家的红色政权而效力的观念，而是真正地认识到了为了他们民族的生存，通过随时随地献出他们整个生命而应尽的义务。

并且他们以后就是这样做的！

于是他们就像一群黄蜂一样飞向在集会上的捣乱份子，不管敌众我寡也要占上风，也不顾伤痛和流血牺牲，心中只有一个伟大的信念，那就是为我们政治运动的神圣使命开辟出一条自由之路。

早在 1920 年的盛夏维持秩序的队伍渐渐就有些模样了，为的是在 1921 年的初春再把他们逐步分成每百人所组成的队伍。

并且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在此期间我们的集会活动在不断地增多。也许我们现在要经常到慕尼黑这座城市里最大的啤酒馆的大厅里来开会了。从 1920 年秋天到 1921 年的冬天在慕尼黑的市民礼堂和慕尼黑的金德会堂里总是举行大型的群众集会，并且会场上的条幅都是一样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大会，当时由于参加集会的人太多，所以会议开始之前警察常常就把路口都封锁了起来。

我们组织这样的队伍来维持会场的秩序则需要说明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党徽和党旗。缺乏这样的标志不仅对当时

不利，而且对将来也是难以接受的。其缺点还在于，特别是对于党员同志来说缺少一个整体上的外部识别标志，同时对于将来无法容忍的是使这场政治运动所具有的本质特征以及反对国际主义分子的斗争也缺少一个标志。

像这样一个标志所带来怎样重大的心理作用，我在年轻时就常常认识到并从情感上予以重视。战争后我曾在柏林的王宫和逍遥园前参加过一次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群众集会。估计有十二万人参加的集会完全是红色旗帜、红色飘带和红色鲜花的海洋，这从表面上就给人一种强烈的震撼。我自己就能感觉和认识到一个人怎样会轻易地就被这群人如此壮观场景的神奇魔力所感染的。

在政党政治方面完全没有或者不懂世界观的资产阶级则没有自己的党旗。这些由“爱国人士”所组成的政党还徘徊在帝国的旗帜之下。要是旗帜本身也具有某个世界观象征的话，那么人们也就可以明白国家的主人可以把这面旗帜视为其世界观的代表，因为他们的世界观是通过在国旗和帝国旗帜下所进行的活动来体现的。

而实际情况却不是如此。

帝国并不是由资产阶级建立的，国旗也不是从战争的硝烟中诞生的。因而这只不过是一面国旗而已，其本身并不具备某种世界观使命的特殊含义。

只有在德语地区还有这样的资产阶级的党旗，那就是在德语区的奥地利。在那里有一部分的民族资产阶级挑选出 1848 年革命时期的黑-红-黄色作为党旗的颜色，创造了即使是类似世界观却也没有什么意义，但在国家政治方面则带有革命意味的某种象征。而这面黑-红-黄颜色的旗帜最凶猛的敌人当时就是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社会党以及传教士们，这一点人们今天不应该忘记。当时恰恰就是他们在谩骂、诅咒和诬蔑这些颜色的旗帜，这和他们以后在 1918 年诽谤黑-白-红颜色的旗帜是一样的。当然黑-红-黄是 1848 年在奥地利帝国的德意志政党所使用的颜色，在那个时代还是了不起的，只不过对于最能代表德意志忠诚

灵魂的人来说则隐隐约约地看到其背后有犹太人在进行幕后操纵的影子。因此背叛祖国和出卖德意志民族和德国利益的可耻行径才让马克思主义分子和中央党对这面旗帜有如此的好感，以至于今天把过去曾经被他们所唾弃的国旗尊奉为最为神圣的并且可以用来保护自己的党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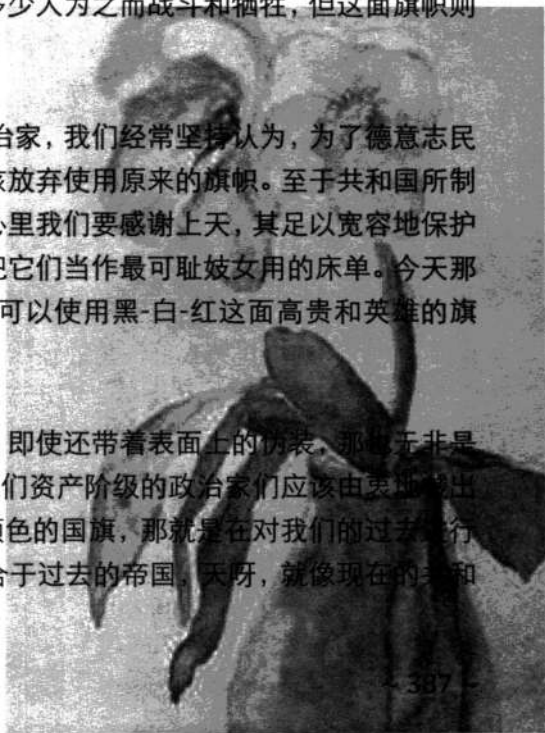
所以，直到1920年，实际上没有任何一面反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在世界观的认识方面体现出与之相反观点的旗帜。因为当德国的资产阶级在1918年以后不再愿意迁就那些现在突然把所发现的黑-红-黄帝国旗帜当作是自己象征的政党的时候，所以人们自己就对在新的发展情况下没有为未来提出自己的纲领表示反对，特别是针对没有提出对过去帝国进行重建的想法。

而这面旧帝国黑-白-红的旗帜多亏有了这样的想法才重新产生出我们那些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的党旗。

这种在不太值得称赞的情况下被马克思主义所击败状况的象征和这种同样又要消灭马克思主义却不太合适的标志是很明显的。这些旧帝国富于朝气的精美无比的色彩对于每一个正直的德国人来说想必都是神圣和珍贵的，它曾经目睹了多少人为了它而战斗和牺牲，但这面旗帜则不足以当作为未来而战的象征。

为了有别于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我们经常坚持认为，为了德意志民族真正的幸福，我们的运动应该放弃使用原来的旗帜。至于共和国所制作的国旗我们可以保留。从内心里我们要感谢上天，其足以宽容地保护了历史上最著名的战旗，以免把它们当作最可耻妓女用的床单。今天那出卖自己和民族的帝国是绝不可以使用黑-白-红这面高贵和英雄的旗帜的。

只要十一月的耻辱还存在，即使还带着表面上的伪装，那也无非是企图盗用过的好名声而已。我们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们应该由衷地叫出来谁要想让国家使用黑-白-红颜色的国旗，那就是在对我们的过去进行盗窃。以往的旗帜实际上只适合于过去的帝国。天呀，就像现在的共和国选择了其合适的国旗一样。



这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要是举起过去的旗帜就无法使人注意到我们自己行动的象征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了。因为我们不想把以往由于自己的过失而灭亡的帝国重新唤醒，而是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因此，今天为反对马克思主义而战的政治运动也要通过旗帜来体现出新国家的象征。

有关新旗帜的问题，也就是说其外观的问题，当时我们为此进行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从各个方面都提出了肯定比一般的看法要好得多的建议。因为新的旗帜无论如何必须是我们自己战斗的一个象征，另一方面还要在宣传方面能够产生很大的效果。谁要是自己和广大民众打交道的話，那么就要在大量的细节问题上认识到其重要性。一个有影响力的标志能够唤起成千上万的人们对一项政治运动产生兴趣。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必须拒绝一切类似于由很多人提出的我们的政治运动要通过使用一面白色的旗帜来区别于以前国家的或者更好地说，是有别于那些以恢复以往的旧体制为唯一政治目标的软弱的政党的建议。另外白色也是不引人注意的颜色。它很适合于羞羞答答的青年妇女联合会，而不是给一个革命时代的变革运动的。

还有人建议使用黑色：其颜色本身适合今天这个时代，但又无论如何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我们政治运动的意愿。最终这个颜色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白色和蓝色尽管带有极好的美感，但要单独作为德国这个国家和其政治立场可惜还不是有良好声誉的颜色的话，则反映出了带有地方割据性质的狭隘气量。另外从这里人们也很难找到我们政治运动的任何表示。这和黑色与白色的情况是一样的。

黑-红-黄颜色本身就不予以考虑了。

从上面所提到的原因来看，黑-白-红的颜色肯定不是目前所要的版本了。实际上这组颜色的确比其它所有的颜色组合都要庄重。这是目前所能有的最为耀眼的颜色组合了。

我自己则认为应该保留原有旗帜的颜色，并不只是因为这些颜色在我当兵的时候就认为是极为神圣的，而且还因为这些颜色从我的情感出发最适合发挥其美学的效果。尽管如此，我还得从当时这场运动的成员那里所得到的大部分都把带钩的十字画在原来国旗里面的大量的草图无一例外地给回绝了。作为领导人我本来不想立即把自己的草图公布出去，因为这样有可能让另外一些好的或者更好的设计出现。实际上一位来自施塔恩贝格的牙医也提供了一份和我的设想非常相似的很不错的草图，只是有一个缺点，那就是把带钩的十字和弯曲的十字合成在一个白色的圆圈里面了。

我自己在进行了无数次的尝试后最终确定的图形为：旗帜的底色为红色，上面有白色的圆圈，其中间是一个黑色的带钩的十字。又经过长时间的仔细研究后我才发现了旗子和圆圈大小之间适当的比例以及带钩十字的形式和粗细。

这样就固定下来了。

按照同样的道理我们立即给维持秩序的队伍设计出了袖章，也就是一条红色的袖带，上面有一个白色的带有黑色带钩十字的圆圈。

另外党徽也是根据同样的原则设计的：红色的底色上有一个白色的圆圈，中间有一个黑色的带钩的十字。一个叫福斯的慕尼黑首饰匠首次做出了模型并且沿用至今。

1920年的盛夏时节新的旗帜首次在公众面前出现。它很适合于我们这场新兴的政治运动。正如这场政治运动是新兴的一样，它的旗帜也是新颖的。以前没有人见过它，当时这面旗帜就像一把火炬。当一位忠诚的女党员同志第一次完成底样并把旗帜做好以后，我们感觉自己就像孩子般地高兴。几个月以后我们就有了六面这样的旗帜，并由越来越多的维持秩序的队员们举着来展示这场新兴政治运动的象征。

这可真是一种象征！不仅是通过唯一我们大家都热爱的、曾经赢得了德意志民族无比崇敬的颜色证实了我们对过去的敬畏，而且这也是我们这场政治运动意愿的最好体现。作为国家社会主义者我们在我们的旗

帜上看到了我们的纲领。我们把红色看作是政治运动的社会意识，白色代表国家社会主义，带钩的十字是为了雅利安民族的胜利而战的使命，并且同时还要用这个带钩的十字取得这项在过去和将来永远都是反对犹太民族的创造性使命的胜利。

两年后当从维持秩序的队伍已发展成了由数千人组成的冲锋队的时候，就显得有必要赋予这个为新兴的世界观而奋斗的自卫组织以独特的胜利的象征：那就是军旗。这也是我自己设计的然后再由一位年长的、忠诚的党员同志，首饰匠加尔制作完成的。自此以后这面军旗也就作为国家社会主义战斗的标志和象征了。

1920年期间随着群众集会活动的不断增加，最后我们有时只得在一星期内举行两次集会。在我们的宣传海报面前常常聚集很多人，这个城市最大的会场总是人头攒动，成千上万的那些被诱导的马克思主义分子也重新建立起了群众团体，并且要成为将来自由的德意志帝国的战士。慕尼黑的公众渐渐地了解了我们。他们在谈论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这个词有许多人都熟悉，并且还意味着是一种行动纲领。大批的追随者也开始不断地成为了党员，以至于我们从1920年到1921年就已经成为了慕尼黑的主要政党。

当时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外，尤其是还没有什么国家党派，像我们这样能够公开地举行群众集会。可以容纳五千人的慕尼黑的金德会堂常常爆满，只有唯一的一处我们还没有敢于去举行集会的地点那就是克罗纳剧场了。

1921年1月底对于德国来说沉重的负担又增加了。德国由于《巴黎和约》的原因要负责支付上千亿金马克的荒唐数目，伦敦所提出的苛刻条件要变成现实了。

出于这个原因，一个在慕尼黑成立了很长时间的称为民族联合会的劳动联合会想要邀请各界人士举行更大规模的集体抗议活动。时间很紧迫，并且由于总是对已经决定的事情在贯彻执行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犹豫

不决而让我自己也感到非常地紧张。起初人们说在国王广场举行集会，后来又因为害怕被赤色分子驱散改为在陆军司令部前举行抗议集会。但最后又放弃了这个主意并建议在慕尼黑的金德会堂举行全体大会。时间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了，这些主要的政党对这个可怕的事件竟然无动于衷，而这些劳工组织自己最终还无法确定举行集会的时间。

1921年2月1日星期二，我强烈地要求最终确定集会日期。他们敷衍我说星期三再进行决定。星期三的时候我又要求对是否和什么时候举行集会给予明确的答复。结果答复又是不确定和模棱两可的，据说人们“故意”要求劳动联合会在八天以后的星期三举行集会。

这让我忍无可忍，所以决定我们自己来举行抗议集会。星期三中午我口授了十分钟宣传海报的内容并同时为明天2月3日星期四的集会租下了克罗纳剧场。

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大的冒险。问题不仅是因为在这样大的剧场里能否有足够的听众，而且还有被驱赶的危险。

我们自己维持秩序的队伍对于这样大的会场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况且就连我自己对有可能出现的驱赶方式也无法进行具体的想象。我认为在一个圆形的会场比在一个一般的会场举行集会要困难得多，可随后所发生的则证实了正好与此相反。实际上在一个宽阔的会场里比在一个拥挤的地方更容易控制驱散队伍的捣乱行为。

当然有一点很明确的就是：任何一次失败对我们来说都需要很长时间去进行弥补。因为要是有一次成功的驱散行动就会一下子毁掉我们头顶上的光环，而且我们的对手还会鼓足勇气来企图不断地去获得成功。这样就会使他们对我们今后所有的集会活动都不断地进行攻击。数月以来经过艰苦斗争才消灭的破坏活动。

我们只有一天的时间张贴海报，也就是在星期四这一天。可惜这天从早晨就开始下雨，所以就有理由担心在这种情况下会不会有很多人更愿意呆在家里，也不想冒着雨雪赶着来参加集会。何况开会时还有可能

发生谋杀和斗殴。

特别是在星期四的上午我突然担心会场会不会坐满听众(如果这样的话我就会在劳动联合会面前出丑)，所以我快速地口授了几张传单的内容让人去进行打印，以便在下午就可以进行分发。这样当然也可以敦促人们来参加集会。

我又让人租了两辆卡车，尽可能用红布把它们围起来，还插上了我们的旗帜，并且在每辆车上都有十五到二十名党员同志，他们接到的命令就是沿街开着车散发传单，赶紧为当天晚上举行的群众集会做宣传。这还是第一次用插着旗帜的卡车行驶在大街上做宣传，这一点就连马克思主义分子都没有想到。市民们凝视着这些用红色装点的，并且还飘扬着带钩十字旗帜的卡车以及上面大喊大叫的人们，同时街道上也有无数的人高举着拳头，明显地表示出他们对最近“对无产阶级的挑衅”的愤怒。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分子才有权力为举行集会像这样开着卡车四处宣传。

晚上七点钟的时候剧场里还没有坐满人。有人每隔十分钟就打电话通知我会场的情况，我自己感到非常的不安，因为其它会场在七点钟或者七点一刻的时候通常已经差不多坐满人了。总之这些一会儿就可以见分晓了。我没有考虑到新会场的巨大空间：在慕尼黑啤酒馆大厅里有上千人就会坐得满满的，而在克罗纳剧院里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在会场里几乎看不出他们来。很快有了好消息，在七点三刻的时候会场就已经坐满了四分之三了，而且还有许多人排在售票处前面。为此我还责怪了他们。

八点过两分我来到了剧场前。仍然看到还有一些人在会场外面，有些人只是出于好奇，其中还有很多的反对派，他们想在外面等着有不寻常事件的发生。

当我走进这宽敞的会场大厅的时候，立即就感到像一年前在慕尼黑啤酒馆大厅里第一次举行集会时那样的喜悦。但当我挤过密密麻麻的人群走上高高的讲台后才看到这如此伟大成就的整个场景。我面前就像放着一个装着成千上万人的巨大贝壳。就连中间的表演场上都是黑压压的

人群。一共售出了超过五千六百张入场券，再算上一些失业的和穷学生以及我们那些维持秩序的人们在场的应该有近六千五百人。演讲的题目是“是走向未来还是走向灭亡”，我那激动的心使我相信未来就在眼前。

我开始演讲并且还讲了将近二个半小时，而且在头半个小时后我的感觉就告诉我这次集会将取得巨大的成功。通过演讲和这数千人中的每个人都建立起了沟通。一小时后不由自主爆发的掌声就总是打断我的讲话，而且这在两个小时后才平息下来，并且重新又进入了我在这个会场里所常常经历的、对每人也许都是难以忘怀的庄严的宁静时刻。会场里静得几乎听不到人们呼吸的声音，在我讲完最后一个字后突然爆发出以极大的热情唱出的“德国万岁”的歌曲作为集会的结束。

我还注视着这么大的会场是怎样变得空旷的和人群的海洋在近二十分钟长的时间里怎样穿过会场中间那宽敞的出口流出去的。然后我才极度兴奋地离开了我演讲的位置回家去了。

对在慕尼黑克罗纳剧场举行的首次集会还拍成了纪录片。这样就比文字报道能够更好地展示出这次集会的伟大胜利。资产阶级的报刊登载了图片和进行了报道，只是提到这次集会是一次“民族主义”性质的，而对集会的举办人却用其所惯用的简洁方法只字未提。

这样就第一次让我们从人们日常所谈及的政党中脱离了出去。现在人们不再理会我们了。为了不让这种情况现在就发生，为了不让这次集会所取得的成功仅仅只是短暂的，我立即就安排下个星期在克罗纳剧院里举行第二次集会，并且取得了同样的成功。会场再次爆满，所以我决定在下个星期以同样的方式举行第三次集会。并且这个大型的会场又第三次上上下下全都挤满了人。

从1921年首次举行这样的集会后，我不断地增加了在慕尼黑的集会活动。我们每星期的集会不只是一次，有时是两次，而且在盛夏和晚秋时节我们有时候还甚至每星期举行三次。我们总是在克罗纳剧院里举行集会，并且让我们非常满意的是每次集会都取得了同样的成功。

结果就是我们的追随者和党员人数增加了很多。

而这样的成功当然会让我们的反对派感到不安的。并且在他们认识到他们的策略总是摇摆不定一会儿是采取暴力一会儿又保持沉默以后，现在只能用这样或那样的手段来阻止正如他们所看到的我们政治运动的发展。所以他们决定尽量使用暴力来最终阻挠我们以后的集会活动。

作为这种行为最明显的证明就是极为秘密地对州议员艾哈德·奥尔进行的暗杀行动。据说艾哈德·奥尔是在晚上被人枪杀的。这也就是说实际上他不是无意，而是有意地被打死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极度的沉着镇静以及众所周知的勇敢，非但没有挫败这种违法的袭击，而且就连可耻的罪犯都没有吓得仓惶逃命。他们迅速和远远地溜掉了，后来就连警察都无法找到他们的踪迹。这次秘密的谋杀事件被社会民主党在慕尼黑的机构所利用，为的是用这种最为极端的方式来反对我们的政治运动，并以惯用的多嘴多舌暗示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这就要考虑到我们事业的大树不仅要向上生长，还会随时遭到无产阶级用拳头所进行的攻击。

几天以后攻击的日子就来到了。

最终，一次在慕尼黑啤酒馆大厅里举行还是由我到会进行演讲的集会成为了他们选择袭击的目标。

1921年11月4日晚上六点到七点钟的时候我就事先得到了确切的消息说集会将肯定会受到驱散，并且为了达到目的还特别故意地派了大量来自赤色组织的工人。

不幸的是我们没能早一点得到这样的消息。就在当天我们要把原来位于慕尼黑施特内克路租的旧办公地点退掉并搬到新的地方去，可还没有准备好，所以还不能搬进去。因为原来的电话机拆掉后新的又没有安装好，所以许多人试图想要打电话告诉我们故意捣乱的消息也就白费力气了。

结果集会只有少数势单力薄的人来维持秩序。当时从数量上看还不

到一百人，只有四十六名维持秩序的人员在场，警报系统还没有安装完毕，所以也就无法在一小时之内召集到充分的援兵。另外像这种需要报警的流言蜚语已经无数次地传到我们的耳朵里，所以这对我们来说也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意味了。过去常说的赤色分子宣布停止的革命行动到时候就会发生在我们的集会上着实得到了证实。

出于要以最粗暴的勇敢与捣乱行为做斗争的原因，也许才会让这一天可能发生的一切不再发生。

毕竟我们认为在慕尼黑啤酒馆大厅里发生的驱散行为是不可想象的，我们甚至还更担心在剧场里也会发生捣乱的事件。在这一点上，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倒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我们今后的所有问题，可以说就是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所得到的结论，尽管有些地方难以置信但却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我们要在组织上和策略上领导冲锋队的基本重要性。

当我在七点四十五分来到会场大厅前面的时候几乎无法相信眼前所看到的景象。会场爆满并且还有警察在进行警戒。提前到场的捣乱分子在会场里面，而支持我们的人却大部分在场外。一小部分冲锋队员在会场前厅等着我。我让他们关上通往大厅的门，并命令这四十五名或是四十六名冲锋队员列队站好。我告诉这些小伙子们今天也许就是他们必须第一次要不惜一切代价地捍卫自己对这场政治运动忠诚的时刻，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不许离开会场，除非他们是当作死人给抬出去的，我自己也要留在会场里，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你们会弃我而去，但我自己也要看出谁是胆小鬼，我就要亲自撕下他的袖标，拿走他的徽章。然后我就要求他们那怕是最细微的捣乱行为都要立即采取行动并且还要时刻牢记要尽量防备自己也会遭到攻击。

这次是以无比粗犷激昂的声音三次高呼万岁作为回答的。

然后我才走进会场并且亲眼目睹了会场里的情景。人们密密麻麻地坐在会场里并且用咄咄逼人的目光寻找着我。无数人的脸上带着愤怒的

仇恨看着我，同时其他人则带着幸灾乐祸的表情得意忘形地故意聚在一起。他们今天是和我们来“决一雌雄”的，我们要当心我们的五脏六腑了，他们要是最终堵住了我们的嘴巴，像这样优美的演讲方式哪里还会有呢。他们确信他们占上风，并且还很自命不凡。

毕竟集会还是要开始的，而且我也开始了进行演讲。我总是站在会场大厅的前排，我的讲台就是一张啤酒桌。我处在人们的中心位置。或许这种情形会有助于恰好在这个大厅里形成某种我在其它类似的地方从来没有感觉到的气氛。

在我的面前，尤其是左面坐着和站着大声喧哗的反对派。他们全都是些粗鲁的家伙，大部分来自玛菲的工厂、库斯特曼的公司或是伊萨利亚数码器的工厂等等，他们都是沿着大厅左边的墙壁一直坐到了我的桌子旁边，并且还一边收着啤酒杯，也就是说他们一直在喝着啤酒，还把空啤酒杯放在桌子下面。所有听众都是这样的人，今天的集会能有好的结果才真让我吃惊呢。

一个半小时后，尽管有人总是打断我，还是讲了这么长时间，好像我已经控制了局势。捣乱分子的头头显然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因为他们越来越焦躁不安起来，一会儿出去，一会儿又进来，就连跟他们自己人讲起话来都显得很烦躁。

在我开始回绝有人打断我的讲话时犯了一个小小的失误，但几乎还没有等我把话说出口就意识到这就是斗殴的信号了。随着一声怒吼有一个人突然跳上了椅子在会场里高喊着“自由！”这就是这些自由的斗士们开始行动的信号了。

几秒钟后会场里就挤满了这些愤怒和大喊大叫的人，在人们的头顶上就像发射榴弹炮弹似地飞着无数的啤酒杯，中间还夹杂着椅子腿被折断和啤酒杯被摔碎的声音以及人们的狂呼乱叫和惊恐的喊声。

这简直就是一场疯狂的骚动。

我仍站在原地注视着我们的年青人是如何全力以赴地履行其职责的。

这时我看到的好像是一场资产阶级政党的集会！没等开始争吵，我们的冲锋队员们就开始进攻了，冲锋队的名称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的。他们好像狼一样每八个或十个人一组不断地向敌人冲过去，并且逐步把这些捣乱分子真的从会场给打了出去。刚刚过了五分钟我就看见我们的冲锋队员没有一个不是血流满面的。有多少人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才认识他们的，最勇敢的要算是莫里斯了，还有我现在的私人秘书赫斯以及其他的党员同志，他们本身都负了重伤，但只要还能够站得起来就一直在进攻。这种地狱般的喧嚣持续了二十分钟，算起来有七、八百人的捣乱分子大部分都让我们还不到五十人的冲锋队员给打出了会场，赶下了台阶。只有在会场左边的角落里仍有一大群捣乱分子还在进行着顽强的抵抗。这时有人突然从会场的入口处朝讲台的方向开了两枪，并且开始了激烈的交火。这种重温过去战争经历的景象让我欣喜若狂。

已经分辨不出是谁开的枪了。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现在让我们这些浑身是血的小伙子们更加愤怒了，并且最终把剩下的捣乱分子强行赶出了会场。

大约过了二十五分钟会场就像是被炮弹击中了似的。支持我们的人有的正在进行包扎，有的已经离开，我们到底控制住了会场的局势。这时今晚集会的主席赫尔曼·伊塞尔宣布：“集会继续进行，请演讲人讲话”，于是我又重新进行演讲。

在我们自行结束集会以后，突然一个气愤的警察冲了进来，挥舞着手臂大声地喊道：“解散集会”。对这位姗姗来迟的人我不禁感到可笑，警察的行为真是重要，他们越是渺小，就越要显得自己很伟大似的。

那天晚上我们真地学到了许多东西，并且从我们的反对派那里得到了很多的教训，我们是不会忘记的。

一直到1923年的秋天，《慕尼黑邮报》对于无产阶级捣乱的事件就没有进行过报道。

第八章 强大的国家才是最有力量的

我在前面曾提到过德国劳动联合会的成立，并想在此对劳动联合会方面的问题进行简要的论述。

通常人们会把劳动联合会理解为在某种双边的关系中代表减轻其劳动强度一方的利益，以及在重大职权方面选择共同领导并且共同采取行动的组织。正因为如此，所涉及到的协会、联合会或者政党的行动目标和行动方式才不会有太大的分歧。可以说情况基本上是如此。对于普通市民来说，他们会很愉快和平静地听到诸如此类的联合会最终都会和这样的“劳动联合会”相聚在一起进行“共同联合”而“放弃分裂”。同时人们一般都会相信这样的联合会所产生的巨大力量，这样也会使弱小的团体一下子成为强大的组织。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完全错误的！在我看来要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是很值得注意和重要的，那就是要弄明白为什么要成立这些大家都确认追寻同一个目标的联合会、协会或者类似的组织。一个组织只会去捍卫一个目标，而不是许多组织来捍卫同一个目标，这本身也是符合逻辑的。毫无疑问的是某一个目标首先是由某个组织发现的。一个人在某个地方宣布发现了某个真理，呼吁要找到解决某个问题的办法，确定其目标并且组建起实现其理想的某项政治运动。

这样便建立起了按照其行动纲领，要么革除现有的社会弊端，要么实现未来新社会的一个协会或是一个政党。

而一旦这样的政治运动建立起来，实际上就有了某种优先权。所有和政治运动有着同样奋斗目标的人们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他们共同的事

业便投身到这场政治运动中去，这样也就增强了其运动本身的力量，本来这也应该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特别是每个思想活跃的人恰恰在投身在政治运动的过程中都必须感觉得到只有共同奋斗才能取得真正成功的前提条件。因此这也就理所当然地关系到对某个目标，也就是对某项政治运动所表现出的某种忠诚（这也就是我在今后所要指出的那种忠诚）。

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则归结为两种原因，一种就是我几乎可以称之为悲剧性的原因，而很不幸的是第二种原因则要在人类的弱点中寻找根源了。但我认为这两种原因最为根本的内因所在就是想要增强力量提高活力，并通过人类的创造力最终以实现解决问题为目的的愿望本身这样一个贴切的事实。

而为什么某项使命大都不会由某个协会组织来完成的悲剧性的原因所在就是：世界上每一项丰功伟绩通常都是为要实现千百万人长期以来所共同的宿愿和许多人所默默怀有的渴望。是的，要解决某一个具体问题完全有可能是几个世纪的期待，因为这是对不堪忍受社会现状，可实现这种普遍存在的期待又没有出现生机的叹息。生活在这种困境下而又完全无法勇敢地找到解决办法的人们我们可以称他们是无能为力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民族的生命力，以及通过这种生命力确实要活下去的本能就最使人信服地说明了，总有一天命运最终会把能够实现那祈盼已久的具有天赋的人派来使他们那心神不定而愈发感到不安的灵魂得到抚慰的，会把他们从巨大的束缚中解救出来或者来消除这苦难境遇的。

因为从根本上来说对于所谓重大的时事问题会有成百上千个自以为还能够胜任的人在寻找其解决的办法，是的，上天自己也给出了多种多样的选择而现在最终还是在场力量的自由竞争中把胜利给了更加强悍更有能力的人，并托付他去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也许几个世纪以来都对所崇拜的宗教偶像感到不满并渴望进行某种创新，出自这种心灵上的追求产生出一大批以及更多的人们按照他们

的观点和学识认为自己也同样负有使命要找到从宗教的痛苦中得以解脱的办法而成为一种新的理论学说的预言家或者至少是以反对现行理论学说斗士的面目出现的。

当然这里也是按照自然法则由强者决定去完成这项伟大使命的，只不过他会认识到自己是唯一负有使命的，而其他人士通常则很晚才会意识到这一点。相反其他这些人则认为大家都是平等的，都有资格去完成使命，但世人通常却很难能够分辨出他们中间的哪一位才是最才能的，最有资格获得他们拥护的。

所以几个世纪以来，甚至经常还在同一历史阶段会出现不同的人来发起政治运动，为既定目标而奋斗，他们至少在观点认识上是相同的或者在广大民众看来感觉他们是相同的。民众自己也都会怀有某些不明确的愿望，并且一般地都会认为自己对目标或者对自己愿望的本质特征或者甚至是实现其愿望的可能性并不十分清楚。而悲剧的所在就在于那些在不同的道路上追求着同一个目标的人们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出于对自己所肩负的使命最为纯粹的信任以认真负责的态度，而不会去考虑他人走上自己的道路的。

而这些政治运动、政党、宗教团体彼此之间完全没有关联，只是出于一时的意愿而兴起并为了一个共同的方向而行动的，至少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悲剧性的，因为人们太过于倾向性地认为走不同的道路会导致力量的分散，而联合起来走一条路则会更快捷和更保险地迈向成功。但情况却不是这样的。这是上天本身会遵循其逻辑方式来决定在各种不同的团体组织相互进行竞争的过程中让最为明确并且最为坚定地选择通向目标道路的政治运动取得胜利。

应该怎样从外表上来确定一条道路是否正确，那就要看是不是给各派势力的争斗能够从人类社会那些自以为是之人教条般的定义中寻找出正确的方向，并且为取得成功提供明显可靠的论据，最终总可以为行动的正确性给予正确的判断来创造条件！因此各种不同的团体组织在不同的道路上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所以他们一旦认识到现有各种追求

很接近的时候，就会对所走的道路进行审视，试图尽可能地抄近路并且尽最大的努力尽快达到目的。

所以，通过这场较量就会产生出勇士，并且人类还要时常为所取得的成功感谢从以往失败尝试的不幸中而得到的那些经验教训。

因而我们就会一眼就看得出来从这种一开始就不是因为故意的失误而导致的精力分散的悲剧性事实中认识到一种达到目的的最好的办法。

按照大多数人的看法，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为解决德国问题曾经认定了两条道路，其最主要的代表和支持者就是奥地利和普鲁士，哈布斯堡王朝和霍亨索伦王朝，这两条道路从一开始就不得不重叠起来，这样人们才会按照他们的观点对这两种联合起来的势力所选择的这条或那条道路表示赞同。然而当时要是走上了更具影响力的代表所选择的道路，那么奥地利的主张就从来不会左右德意志帝国了。

并且，现在最为强盛统一的德意志帝国恰恰就是产生于正是千百万德国人所痛心地感到是最后的并且也是最为可怕的兄弟之争：因为德意志帝国的皇冠实际上是在赫拉德茨克拉洛韦的战场上，但并不是在与巴黎的战斗中得到的，就像人们事后耿耿于怀所认为的那样。

所以，德意志帝国本身的建立并不是出于某种在共同的道路上的共同意愿，而更多的是有意的，有时也是无意的霸权争斗而最后是普鲁士作为胜利者脱颖而出的结果，并且谁要是在政党政治的蒙蔽下不放弃真理的话，那他就必须确认所谓人类的智慧从来就不会做出同样聪明的决定的，而那所赐予的智慧，也就是说各派势力自由竞争的智慧最终会将让他获得真理的。毕竟谁真地会相信 200 年前在德国人居住的大地上，从前的霍亨索伦家族的普鲁士人会成为新德意志帝国的雏形、缔造者和导师而不是哈布斯堡家族呢？！相反谁在今天还要否认命运会更好安排，是的，谁在今天还能完全想象得到承担着一个腐朽没落王朝准则的新的德意志帝国将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不，即使是要经过一个世纪的争斗，大自然最终也会把最优秀的人带到应该属于他们的地方的。

事情总是会这样的，并且因为如此将永远都会是这样的。

所以，当不同的人为了同样的目的走在同样道路上的时候，只有那些最强壮和最敏捷的人们才认识到这种方法并且成了胜利者的时候，也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

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关于现在为什么在普通民众的眼中看起来形式相同的政治运动还要寻找通过不同的途径去实现看起来是相同的目标。这个原因不仅是悲剧性的，而且甚至还是相当令人同情的。有时很可惜这是源自于人类把忌妒、嫉恨、贪婪以及幸灾乐祸的念头这类东西混合起来所形成的可悲的大杂烩。

而一旦有那么一个深知民族疾苦，并且现在当他十分清楚地了解症结所在的人出现以后，他还要认真地去尝试消除这些病症，当他确定了目标和选择了朝着目标前进的道路以后，立刻就会有一些渺小的和极其卑鄙的人物去留意，并且只会是嫉恨地盯住这位聚集在公众视线下方人物的所作所为。就像麻雀一样，表面上显得漫不经心，但实际上则是特别谨慎地不断地注视着一个发现了一小块面包渣的较为走运的同类，并要在它不经意的時候突然抢走这块面包渣，而这些人也正是如此。这只不过需要一个人走上新的道路上，那么那些游手好闲的人就会疑心重重和胡乱揣测某个有利可图的或许在这条道路的末端才会出现的伤口。而当他们一旦探听到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些什么，就会赶快奔上另一条尽可能快地达到目的的道路。

现在一项新兴的政治运动已经建立了起来并且还找到了其特有的行动纲领，那么这些人就会来坚持为其目标而奋斗，然而他们绝对不会真心诚意地加入到这场政治运动的行列当中并且承认其优先权，而是窃取其行动纲领并在此基础上组建起自己的政党。同时还恬不知耻地向毫无主见的世人们保证这正是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早就想要的东西，并且还常常因此使他们得到了极为有利的好感，而不是有理由遭到普遍地蔑视。难道把别人写在旗帜上的使命也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借用别人纲领

性的基本着眼点，然后还假装是自己完成选择出自己的道路不算是过于放肆吗？这种放肆的行为尤其还表现在一旦他们确信察觉到再也无法超越对手优势的时候，就按照经验把当初通过组建新党而引起分裂的那些因素绝大多数说成是团结统一的必要性。

这种事情要归结于所谓的“民族分裂”。

当然在 1918 年至 1919 年期间，一系列称之为民族主义团体和政党的建立，从其自然发展的结果来看并不完全都是他们创始人的过错。到了 1920 年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就已经作为一个胜利者渐渐地脱颖而出。每个创始人最基本的忠诚现在是无法用什么值得炫耀的东西来证明的，而是通过其牺牲自己那明显没有太大成功可能的政治运动或者是加入到更加强大的政治团体中，也就是说，通过的确令人钦佩地解散自己的政党或者是无条件地加入到更加强大的政党的决定来体现的。

尤其是当时在纽伦堡的德国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人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和德国社会主义党有着同样的奋斗目标，但彼此都是完全独立地形成的。德国社会主义党的主要先驱就是当时纽伦堡的一位教师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开始他也十分崇拜其政治运动的使命和前景。而当他一旦确切无疑地认识到了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具有更加强大的实力和更加强盛的发展的时候，就停止了德国社会主义党和工人联合会的活动，并要求其成员脱离目前双方的争斗而加入到胜利在望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行列中并且还要为共同的目标而继续奋斗。对于他个人来说这是一个与其说是非常困难倒不如说是基本上非常正确的决定。

政治运动的初期阶段也没有发生什么分裂，而是完全按照当时这些忠实的人们的忠诚愿望真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的。我们今天用“民族分裂”一词所证实的东西，正如我已经强调的那样，无不例外地归结于我所引证第二个原因的存在：以前从未有过自己的想法和目标的那些雄心勃勃的人们会在看到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取得成功日臻完美的那一刻而感觉到自己的“使命感”。

而突然却冒出来一些完全是照抄我们党纲内容的纲领，借用我们所

捍卫的精神思想的主张，确立我们多年来为之奋斗的目标，选取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长期以来所走的道理。人们企图要使用一切手段来论证，尽管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为什么还要强迫人们去组建新的政党，而越是强调其动机的高尚，就越说明其空想的不切实际。

实际上只有一个真正的原因：那就是创建人自己想要表现出其能够接受外来思想的伟大创举，而因为本人侏儒般的外貌实际上又无法做到，可这在普通市民生活中通常被称作是偷盗成性。

当时除了别人的想法和思想之外，也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值得让这类政治盗窃狂们在短时间里为其新的理论去进行什么收集工作的了。而干这种勾当的人正是那些以后眼泪汪汪地深切地责怪“民族分裂”，并且还滔滔不绝地谈论“团结必要性”的人们，他们静静地期待着终于可以去愚弄别人，甚至已经厌倦了无休止地指责漫骂的他们还要为至今所盗取的精神思想的实现所进行的政治运动给盗贼们草拟创造性的计划。

要是这样不行的话，那么就会认为这新兴的政治活动的价值所在并不像人们所承诺的那样，所以一般肯定就会处理得更加轻率一些，这还多亏了其领导人智力上的不足，而如果加入了一个所谓的劳动联合会还算是走运的了。

当时所有无法独立的团体组织都和这种劳动联合会联合起来，也许他们认为的就是八个瘸子手挽手站在一起就能战胜一个勇士。

而就在这八个瘸子里面还真有个健壮一点的，那他就要竭尽全力让另外的几个瘸子站稳，最终他自己也因此而倒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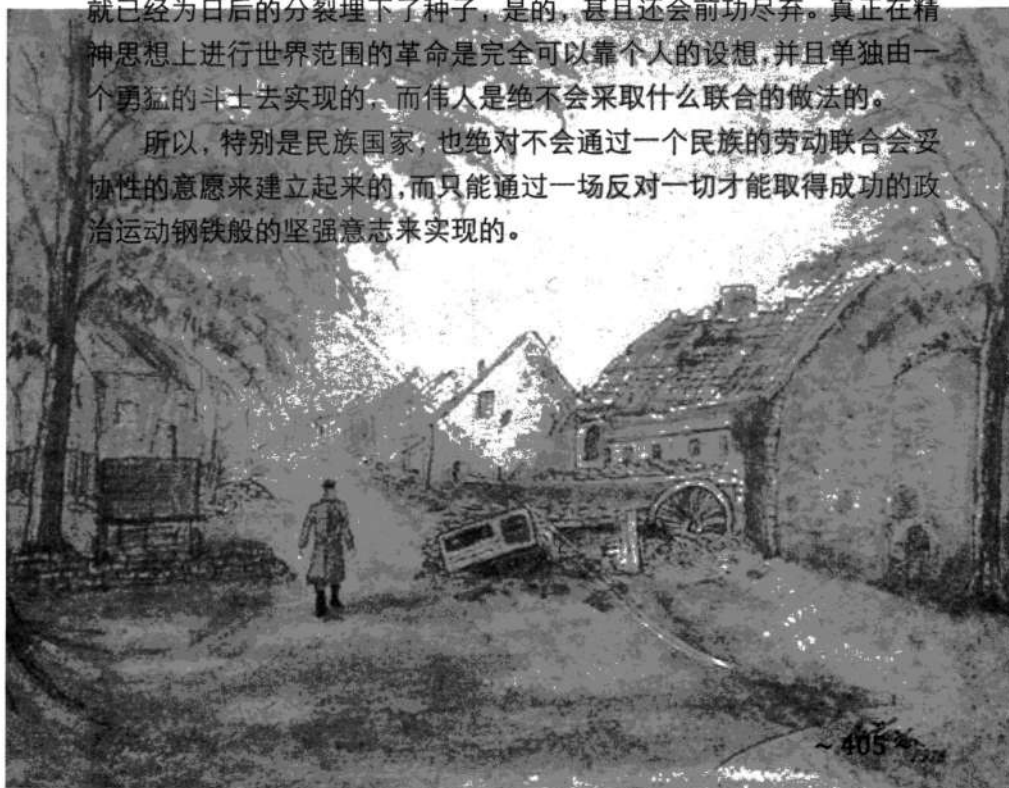
我们总把所谓劳动联合会的联合看作是策略上的问题，可同时我们还不要忽略以下基本的常识：通过建立劳动联合会绝不会让弱小的团体组织变得强大起来，兴许常常还会使一个强大的团体组织因此而变得弱小。那种认为弱小的组织团结起来就必定会形成力量源泉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因为根据经验，在一切条件下任何形式的大多数都将是愚蠢和胆怯的代表，所以这些大量的联合会只要是还受到那怕是通过自己选出的

多数人领导的指挥就只会产生出胆怯和懦弱。并且通过这样的联合还禁止了自由竞争，消除了选择精英的争斗以及因此永远阻止了更加健康和更加强壮的人取得必要的和最终的胜利。因此这样的联合也就与正常发展形成对立，因为这样常常会更多地阻止所应该支持，并为之而奋斗的问题的解决。

从纯粹策略方面的考虑，着眼于未来政治运动的最高领导机构可以和这类联合会在处理某些问题上短时间内进行合作，或许还会采取统一步调。但这种情况不会永远发生，政治运动自己不会因此而放弃其拯救世界的使命。因为毕竟只有最终让自己纠缠于这类联合会之中，才会失去合乎自然发展规律的，能够充分发挥自我才能的，也就是能够战胜对手并且作为胜利者去实现已经确立目标的可能和权利。

人们不要忘记的是，世界上一切丰功伟绩是不会靠联合去获得的，而永远都是胜利者个人所取得的成功。联合的结果通过各派结合的方式就已经为日后的分裂埋下了种子，是的，甚且还会前功尽弃。真正在精神思想上进行世界范围的革命是完全可以靠个人的设想，并且单独由一个勇猛的斗士去实现的，而伟人是绝不会采取什么联合的做法的。

所以，特别是民族国家，也绝对不会通过一个民族的劳动联合会妥协性的意愿来建立起来的，而只能通过一场反对一切才能取得成功的政治运动钢铁般的坚强意志来实现的。





第九章 对组建冲锋队意义的基本看法

以往国家强盛建立在三个支柱上：君主制政体、统治机构和军队。1918年的革命消除了君主制政体，解散了军队，却产生出了腐败政党的统治机构。因此所谓国家威严最根本的支撑被打破了。而国家威严则几乎常常就是建立在业已毁灭的三个国家威严的基本要素之上的。

建立国家威严的第一个基础，永远都是要得到民众的普遍拥护，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国家威严在表面上则是软弱的、不安全的和摇摆不定的。每个代表这种纯粹以民众拥护为基础的国家威严的人因此都必须致力于通过权力的建立来改善和保障国家威严的基础。这种权力，也就是暴力，我们视之为威严的第二个基础。而在本质上就比前一个基础要更加稳定、更加安全，因而也就更加强大。要是把得到民众的拥护和暴力结合起来的话，并且两者还要共同经历一段时间的考验，那么就会有一种威严在更加稳固的基础上产生出来：那就是传统的威信。如果群众的拥护、暴力传统的威信最终能够结合起来的话，那么这样的国家威严就可以视为是不可动摇的了。

而通过革命最后一种情况完全消失了。是的，传统的威信不再存在了。随着旧帝国的崩溃、旧有政治体制的消除、从前国家尊严标志和帝国象征的毁灭使得传统一下子被打破了。其结果就是对国家威严的最为严重的动摇。

支撑国家威严的第二个支柱暴力也不再存在了。为了能够让革命进行得完全彻底，就得迫使人们将国家暴力和权力组织的体现，即军队加以解散，是的，并且还要把已解散的军队作为革命的战斗成员来进行使

用。当前线解散的部队也陷入了这种无法统一的境地，那么他们就要渐渐远离在四年半里英勇战斗无上光荣的阵地，并渐渐被家乡混乱不堪的酸楚所吞噬，最后进入了也就是所谓自愿服从的混乱的士兵委员会的新时代。

而靠这些牢骚满腹，以八小时工作制一样服役所召集起来的士兵肯定是无法再用来支撑国家威严的。所以第二个要素，那些还对国家威严以礼相待的人们也就被消灭了，而且革命还拥有了最基本民众的拥护，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威信。而尤其恰恰就是这样的基础才是不安全的，也许革命可以通过一开始使用的暴力成功地击溃旧有的国家体制，只不过更深层的原因是因为通过战争已经把我们民族内部结构正常的平衡给打破了。

每一个民族都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层：最上等的是道德高尚，并且还赋有勇敢和牺牲精神的，最下等的人类渣滓是具有一切自私本性和恶习的。而在这两者之间的则是第三个阶层代表着那些既没有什么钢铁般的英雄气概，也没有最起码的犯罪意识的，人数最多的中间等级的人们。

当一个民族处在飞黄腾达的时期，就会表现为他们完全绝对只被最上等阶层来领导的。

一个民族处在一般的、平常的发展阶段或者处于稳定状态的时候则表现为他们是通过明显占优势地位以保持最上等和最劣等阶层之间平衡，并因此来突显自己地位的中间阶层来领导的。

一个民族的衰亡时期则肯定他们是由那些最劣等的人来领导的。

但同时要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中间阶层的广大民众只有当两个极端的阶层自己本身处在相互争斗的时候才显现出来，并且在一方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永远地服从于胜利者。当上等阶层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广大民众就顺从他们，当劣等阶层发迹的时候，广大民众至少对此也不表示反抗，因为中间阶层的民众是绝对不愿意自己去斗争的。

而这四年半血雨腥风的战争把这三个阶层本身内部的平衡给打破

了，当人们承认中间阶层的民众所做出的牺牲时，还要必须着重指出的是战争也几乎完全让人类的精英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因为在这四年半的时间里德意志民族所做出无法弥补的流血牺牲的确是巨大的。人们把所有这些成千上万的个人累计起来就会知道他们是：自愿上的前线、自愿当的巡逻兵、自愿当的传令兵、自愿当的通信兵、自愿去铺路架桥、自愿去潜艇服役、自愿当飞行员、自愿加入突击队等等，在这四年半的时间里不断会有成百上千个理由使他们成为志愿者。人们总是看到同样的情景：乳臭未干的少年和成熟的男子同样怀着对祖国炽热的爱，以极大的勇敢和崇高的责任心前来报名。而要是这种情景以成千上万次地发生着，那么这样的人就会越来越少。而没有战死的，要么被打成了残废，要么就是有极少数偷偷地逃走了。在1914年整个军队都是由这样的志愿者建立起来的，而多亏了我们议会里那些丧尽天良的饭桶，没有让他们接受过有效的训练，而把他们当成了毫无自卫能力的炮灰拱手送给了敌人。在弗兰德斯战役阵亡或者残废的四十万士兵是无以偿还的，而损失则要比单单几个数字要多得多。由于他们的死亡则加速了力量平衡的天平很少向好人的一边倾斜，而一下子偏重于从前那些卑鄙、下流和胆怯的，也就是劣等人群中的坏蛋。

而且另外还有一点：这四年半的时间里在战场上不只是民族中的优秀分子受到了巨大的伤亡，民族中间的坏分子在这种情况下反倒以最佳方式隐藏了下来。当然那些自愿参军的英雄们在他们英勇捐躯之后会踏上神圣灵堂的阶梯，而逃兵则小心翼翼地躲过了死亡，至少回到家乡后多多少少还有些用处。

所以，在战争结束后就出现了这样的场景：民族中间阶层的广大民众承担起了流血牺牲的义务，作为英勇气概榜样的民族中的优秀精英们也几乎全部阵亡，而民族中的劣等分子一方面依靠荒谬的法律的支持，另一方面又不参军而差不多都活了下来。

然后这些养尊处优的民族的糟粕就起来革命了，因为民族的精英们不再会进行反抗了：他们都没有活下来。因此，德国的革命从一开始就只是一件得到有限拥护的事情。不是德意志民族犯下了这不可饶恕的罪

行，而是那些鬼鬼祟祟的逃兵、懦夫等等的社会余孽。

前线的士兵欢迎这场血腥战争的结束，能够很幸运地再次回到家乡，再次见到老婆孩子。但是对于革命这件事来说，他他心里觉得跟他毫无关系，他不喜欢这场革命，而且还更不喜欢其发动者和组织机构。在这四年半艰苦的斗争中他已经忘记了这些党徒，对政党之间的勾心斗角他也感到十分陌生了。

这场革命只受到一小部分德国人的欢迎和支持，也就是那些把行军背包当作这个新国家一切荣誉公民识别标志的那个阶层的帮凶。他们喜欢进行革命并不是他们自己愿意，就像今天还有人错误地认为的那样，而是因为革命的结果。

只是靠这些马克思主义强盗的拥护很难真正地来维护国家的威严。然而这个年轻的共和国恰恰还要不惜一切代价来得到国家威严，却不愿意在短暂的混乱之后被我们民族精英们联合起来的复仇力量突然再次给吞噬掉。

当那些支持暴乱的人们处在纷乱的漩涡之中自己失去影响力的时候，突然又被拳头重重地一击，就像他们在这个时期一下子从民众的生活中冒了出来，被抓住以后又去发挥别的作用一样，他们当时就不再害怕了。而共和国却要不惜一切代价去巩固自己的地位。

所以，当时就强迫他们不再依靠这个根本就站不住脚的民众支持的摇摇晃晃的支柱而必须建立起暴力机构，为的是能够在此基础上树立起一个更加稳定的国家威严。

当这场革命的胜利者在1918年12月至1919年1月和2月期间感到其地位不稳定的时候，便去环顾四周寻找着准备通过军事暴力来巩固这个由民众的爱心所赋予的但也是站不住脚的地位的人们。“反对武力”的共和国需要的是士兵。而国家威严最初的和唯一的支持，也就是民众的支持只是根植于如懦夫、盗贼、罪犯、逃兵、懒汉等等这样一伙人当中，也就是我们称之为民族中最劣等的人之中，所以要想在这些人

当中招募到准备将自己的生命投身到新的理想的人则是白费力气。具有革命思想和进行革命的这些人们，他们不能也不愿意去保护士兵。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想要一个共和国体制的组织机构，而为了更好地满足其本性要使其瓦解。他们的口号并不是：维护和建立德意志共和国，而更多地应该是：将其洗劫一空。

因此，那些人民代表当时出于极度的恐惧而发出救援的呼声这些人却不予理睬，相反还要进行抵抗和消除烦恼。因为人们在一开始就会觉得这是与忠诚和信仰的决裂，还觉察到这不只是以其民众的支持为基础，而且还通过权力所支撑的国家威严的建立就是反对这场革命起到决定作用因素的开始：也就是反对那些越狱逃跑的、偷盗放荡的犯罪之徒以及砸开锁链的抢劫盗窃的乌合之众，也就是反对流氓无赖们的权利。

人民代表可以尽其所能去进行呼吁，也没有人去瞎捣乱，而且只有喊出的反对“叛徒”的声音才是民众代表们对此的观点。

当时就有无数的德国青年准备为他们所认为的“安宁与秩序”效力，他们又再次穿上军装，把卡宾枪和装备都扛上肩，戴上钢盔去抵抗对他们家乡的蹂躏。作为志愿兵他们加入了自由兵团，并且开始在无比憎恨这场革命的同时还要来保护革命并通过实际行动去巩固革命。

他们的行动完全是出自于他们美好的愿望。

而真正革命的组织者和幕后操纵者，也就是国际上的犹太人，他们当时正确地估计到了形势。他们知道德意志民族还没有成熟到像在俄国取得胜利的布尔什维克那样去进行浴血奋战的地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德国知识分子和德国手工业者之间日益加强的团结。知识分子本身不断地渗透到广大民众中去的现象在其它西欧国家里有之，而在俄国却完全不是这样。在那里的知识分子大部分都不是俄国人或者至少不是斯拉夫人。当时俄国上流社会中知识分子的稀少完全随时可以通过其缺乏和广大民众的联系而突显出来。而那里后者的精神和道德水平则低得可怕。

而一旦在俄国煽动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也就是广大民众中间

那些不能读也不能写的那伙人去反对和他们既毫不相干又没有关系的知识分子少得可怜的上层社会而取得成功的时候，这是上天选择了让这个国家的革命取得了成功，那么这个民族的文盲也就成了犹太人独裁者毫无反抗能力的奴隶，而他们还非常聪明地让“人民专政”的空话来替代独裁统治。

在德国还有另外一个现象：革命肯定是由于军队逐渐地被瓦解才成功的，真正的革命者和瓦解军队的人肯定不是前线的士兵，而多多少少是那些要么在国内的守卫部队里闲逛的，要么是作为“免服兵役”的在一个什么经济部门里供职的鬼鬼祟祟的流氓恶棍。这些人里还要加上那些成千上万不能承受前线风险的逃兵。真正的胆小鬼在任何时候害怕的不是别的，当然就是死亡。而在前线每天都会有数以千计的死亡发生在眼前。尽管如此，要是还想要让怯懦的、动摇的或者是胆小的家伙恪守职责的话就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必须让这个逃兵知道自己开小差会带来什么结果。在前线可能会牺牲，而逃兵则必须处死。只有通过这样严厉的恫吓才能不仅对某一个人，而是对所有人起到威慑的作用。

并且这才是士兵守则的意义和目的所在。

为了民族的生存而奋战到底只有建立在认识到其必要性，并且能够自愿地保持忠诚的基础上的才是一种美好的信仰。自愿地去尽职尽责总是决定着民族精英们的行为举止而不是那些普通人。正因为如此类似的法律才是有必要的，比如说针对偷盗的行为，因为这不是为诚实的人所制定的法律，而是给那些优柔寡断和怯弱胆小的人而制定的。像这样的法律应该通过威慑坏人来阻止反倒把诚实的人看成是蠢货，并且因此总会认为去参加盗窃总比两手空空袖手旁观或者甚至让别人去偷东西更加有利可图的情况继续发展下去。

所以，要是相信这场多年来为了人类的一切理想而进行的激烈战斗缺少可以展示几个世纪甚至是上千年以来能够强迫那些软弱和缺乏自信的人去履行职责的手段的话，那可就错了。

对于自愿参军的英雄们当然是不需要什么士兵守则的，这大概是留给那些在民族的危难时刻将自己的生命视为高于全体民众生命的胆小的自私鬼的。像这样没有骨气的病秧子只有通过使用最为严厉的惩罚才能阻止他们屈从于胆怯。当大家不断与死亡进行着搏斗，并且有时还在物资给养非常糟糕的情况下不得不在满是泥泞的弹坑里忐忑不安地坚守几个星期的时候，那么那个变得靠不住的家伙就不要用什么监狱或者是坐牢来吓唬了，而是要毫不留情地用死刑来进行惩罚。因为根据经验来说，在这样的时刻他会把监狱看作是比战场要舒适上千倍的地方，因为在监狱里至少还会让他那不可估量的生命不受威胁。而实际上在战争期间人们不得不废除死刑，也就实际上把士兵守则宣布无效了，而这样做的恶果却是可怕的。一伙逃兵在后方的家乡出现了，特别是在1918年，并且还帮忙建立起了那个我们在1918年11月7日以后看到的进行革命的庞大的犯罪组织。

本来前线和这种事情毫无关系。当然前线的士兵都只会感到对和平的渴望。而正因如此才对这场革命来说实际上是个极大的危险。因为就在德国军队放下武器以后开始回到家乡的时候，当时的革命者总是十分担心地问着同样一个问题：前线的部队该做些什么呢？这些穿着灰军装的人们能够容忍这些吗？在这几个星期里德国革命至少在表面上还不得不显得要温和些，如果不想冒着被德国的几个师突然闪电般快速地给消灭掉风险的话。因为当时假如某位师长做出决定和忠于他的部队扯下那块红色的破布并把那些“委员”都枪毙掉，用迫击炮和手榴弹击败可能发生的反抗的话，那么这个师就会在不到四个星期的时间里可以扩充为六十个师的军队。再也没有别的事情能让那些幕后操纵的犹太人吓得发抖的了。因而为了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人们就不得不让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显得温和些，所以这场革命就不会酿成布尔什维克主义那样的暴动，而要像原来一样伪装成“安宁与秩序”。然后就是无数巨大的让步妥协，向旧官员、向旧军官进行呼吁。因为人们至少还需要他们一段时间，而后就像是黑人奴仆做完了事以后才敢理所当然地把他们一脚踢开一样把共和国从原来国家公仆的手中接过来，并且露出了这些革命鹰犬



剥爪。

只有这样人们才会希望可以愚弄原来的将军和原来的国家官员，为的是通过表面上的和善以及柔和的新形势使他们从一开始就无法进行反抗。

事实可以证明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

而革命却不是由那些想要安宁与秩序的人所进行的，更多是那些暴乱分子所为，即偷盗和抢劫。并且革命的发展既不符合他们本身的愿望，而且从策略方面来看革命的进展也表明不能合乎他们的口味。

随着社会民主党的逐步发展，这个党则总是一再地失去其革命政党的暴力特征。不只是这个政党好像在思想上为了其它的目的，而不是为了效忠革命似的，或是这个政党的领袖有了其它的愿望，完全不是。但是最后留下来的还只是这种愿望以及和实现愿望本身不再相适应的组织。因此一个上千万人的政党却无法再发动一次革命。在这样一场政治运动中也不再会采取什么极端的行动，而只能是中间阶层广大民众这些懒蛋了。

犹太人还在战争期间就开始公开地制造社会民主党的分裂了，也就是说当很适合民众惰性的社会民主党像是保卫国家的累赘一样还挂在那里的時候，他们中间的那些激进分子就脱离了這個党而组建成了一个新的极有战斗力的攻击队伍。独立党和斯巴达克同盟就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锋队。他们所要面对的一个既成事实就是要承认十年来广大民众是为了社会民主党做好了准备的这样一个事实。同时马克思主义则正确地评价了胆怯的资产阶级，认为他们简直就是“乌合之众”。人们完全可以不必去重视他们，要知道已经退役的前任那可耻的卑躬屈膝的政治表现是绝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抵抗力量的。

可一旦革命取得了成功，原有国家的主要支柱遭到破坏，从前线返

回的军队就开始变成了非常可怕的斯芬克斯了，就不得不阻止革命的自然进程。社会民主党军队的主力占据了主导地位，而独立党和斯巴达克同盟则受到了排挤。

而这样的变化也并不是没有经过斗争的。

这并不只是因为激进的革命攻击队伍由于不满足现状而感觉受骗上当，而且从自身来说还想要继续战斗，况且他们难以控制的喧闹正是革命的幕后操纵者自己所希望的。毕竟颠覆活动基本上已经过去，这样很明显就形成了两大阵营，也就是希望维护安宁与秩序的政党和想要血腥暴力的团体。而现在当我们的资产阶级立即就飞快地进入了希望安宁与秩序政党的阵营就很自然吗？现在一下子给了这个最可耻的政治组织行动的可能，此刻他们也不必说些什么，毕竟在悄然之间他们已经又有了安全感，在某种程度上还能够和他们所仇视但又更加畏惧的政权保持一致。所以德国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就得到了很高的荣誉，并且还可以和那些流亡三次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人坐在一起商量如何来对付这帮布尔什维克分子了。

所以，就在1918年12月和1919年1月期间形成了以下的情景：由少数坏分子所制造的一场革命，随后立刻就得到了所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支持。这场革命本身明显带有温情脉脉的印记，而这正好引起了狂热的极端分子的仇视。手榴弹和机关枪的噼啪作响、占领国家机关就是对这场温和革命的威胁。为了祛除对这种事态继续发展下去的恐惧，不论是新政体的代表，还是旧体制的追随者都决定放下武器，为的是能够共同来对付这些极端分子了。其结果就是，共和国的敌人因此停止了反对共和国的战斗，并且来帮助本身和自己观点完全不同的人去战胜那些原本就是共和国的敌人。更进一步的结果还有就是因此最终好像是避开了旧帝国的追随者反对新国家的拥护者而进行战斗的危险。

人们对于这样一个事实完全不必常常牢记在心上。只是谁能够理解和明白一个十分之九的人们没有参加革命行动，十分之七的人们拒绝这场革命，十分之六的人们仇视这场革命的民族是怎么可能最终被这十分之一的人们强迫来接受这场革命的。



新新地，一边是斯巴达克同盟的街垒斗士和另一边的民族主义的狂热分子和理想主义者开始浴血奋战了，而当这两边的极端分子们相互争斗，双方都损失惨重的同时，胜利的总是中间阶层的广大民众。资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分子发现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共和国开始进行“巩固”了。那么接下来资产阶级政党所无法进行阻止的就是，尤其是在选举之前，还可以在一段时间里引用君主制的观念，以便能够用以往时代的智慧来召唤和重新捕捉到其追随者更加细微的精神思想。

可实际上却不是这样的。他们的内心早已和君主王朝决裂了，并且新社会体制的不正当性在资产阶级政党阵营里起到了诱骗的作用。这些习以为常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们觉得自己在共和国贪污腐化的泥潭里比以往帝国记忆中纯洁，但很艰难的生活要舒服得多。

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在摧毁了原有的军队以后，为了巩固国家威严，革命就被迫要创造出新的政权因素。而事情到底怎样，这只能从原本就持相反世界观的追随者那里得到。而他们才可以慢慢地形成一支表面上还要受到《凡尔赛和约》制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则必将会变成新国家观念工具的新军队。

那么面对为什么忽视了旧帝国的真正失误反而会成了革命行动的原因这样一个问题，人们会得出以下结论：一、由于我们对尽职尽责和服从命令的概念的茫然；二、因为我们那些所谓维护国家的胆怯政党的消极态度。

另外还要说的就是，我们对尽职尽责和服从命令概念茫然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完全没有民族性和不断得到纯化的国民教育，正因为如此的结果就是对手段和目的在认识上的错误。有责任感和尽职尽责以及服从命令并不是目的本身，就像国家也不是目的本身一样，而这些都是能够维护和保障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精神和肉体共同存在的手段。当一个民族明显崩溃了并且还亲眼目睹了所有最为惨重欺压的那一个时刻，还多亏了几个流氓恶棍的勾当，服从命令和尽职尽责对于他们来说就是

教条式的形式主义，是的，纯属就是空谈，同时另一方面还想通过拒绝服从命令和“尽职尽责”来挽救一个民族走向衰亡。按照我们当今资产阶级的国家观念，一个师长接到上级的命令不准开枪，因此出于职责就照此执行不开枪，因为对于资产阶级来说不动脑筋形式上的服从命令要比自己民族的生命更加重要。而按照国家社会主义的观点却是在这样的时刻则不会去服从愚蠢的长官的命令，而是要按照民族的意愿。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个人所承担的责任则表现出对整个民族的责任感。

像这样一个确实有用的观点，在我们的民族中，或者更准确地说在我们的政府中消失了，而取而代之的则是些纯粹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概念才是这场革命取得成功的原因。

关于第二点还有以下值得注意的就是：那些“维护国家”的政党所胆怯的深层原因就是特别害怕和我们民族中间那部分思想健康活跃，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人们脱离开。但却忽视了我们唯一可以称之为政治团体，而且还痴迷于以往帝国的资产阶级政党则相信只有他们的观点才可以体现出具有精神手段的思想方法，因为使用武力对于这个国家来说毕竟还是不合时宜的。人们不仅把这样的观点看作是会逐渐形成软弱堕落的标志，同时对于那个就连政敌都已经长期背弃了的观点，并且取而代之在公开场合下叫喊即使是通过暴力也要尽可能为其政治目的而奋斗的时代来说也是十分荒谬的。当时资产阶级民主政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出现的结果就是他们那些用“精神武器”进行战斗的呼吁终有一天也必将会遭到可怕报应的胡说八道。因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身所代表的观点就是要按照与目的相符的观点来使用武力，并且这一贯就是能够取得胜利的正当理由。

这样的观点是如何的正确，那么在1918年11月7日到11日这几天就可以得到证实了。当时马克思主义思想基本上就不管什么议会制和民主思想，而是通过愤怒和开枪的暴徒给了它们以致命的一击。而在那个时候资产阶级空谈家的组织机构毫无抵抗能力就很容易让人理解了。

这场革命之后资产阶级政党也改头换面突然又冒了出来，并且他们

那些勇敢的领导人也从藏身的阴暗的地下室里爬出来呼吸新鲜空气了，但和其它所有原来类似的政治组织一样，他们没有忘记过去的错误，但同时也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他们的政治纲领还停留在旧时代，只要他们从内心还没有和新形势言归于好，那么他们还有可能参与到新形势的政治目的也不过就是放下武器去空谈罢了。

即使是在这场革命之后，资产阶级政党也可怜兮兮地在大街上投降了。

当共和国国防法案应该得到表决通过的时候，却没有得到大多数的赞成。只是那 20 万示威游行的马克思主义分子就让这些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感到害怕了，因为他们违背了这些人的意愿要通过这项法案，他们的确很担心，要不然的话就会在离开议会的时候被愤怒的群众狠狠地揍一顿。只可惜的是依照这个样子所通过的法案还会有什么结果。所以新的共和国也就找到了好像完全没有反对派的发展道路了。

当时有勇气和有力量反对马克思主义以及受其煽动起来的群众的唯一组织就是自由兵团，后来还有些自救团、自卫队等等以及最后传统意义上的国防军。

那为什么在德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这些组织的存在没有造成什么显而易见的变革，原因如下：正如那些所谓的国家政党没有能够产生什么影响一样，是由于缺乏具有威慑力的政权，所以在大街上也就没有所谓的影响力，而且还缺乏政治思想，尤其真正缺乏的是政治目标。

而曾经让马克思主义获得成功的就是政治意愿和激进暴力的完美结合。实际上阻挠德意志民族发展的就是缺乏暴力与政治意愿的统一结合。

那“民族主义”政党的意愿都是什么样的呢，他们连最起码为其意愿而奋斗的能力都没有，至少在大街上是有的。

而自卫队则是有实力的，他们是城市和国家的主人，但他们却没有政治思想和政治目标，所以他们的力量对于民族主义的德国来说也就没

有什么，也不可能有什么用处了。在这两种情况下狡诈的犹太人则通过其聪明的劝解说服和增强信心的方法完成了一种刻板迂腐的永恒的真埋，但这却绝对导致了可怕灾难的不断加深。

可犹太人知道通过他们所控制的新闻界不断巧妙地向自卫队散布那些“非政治特性”的观念，就像他们在政治活动中总是赞美和要求斗争所具有的“纯粹精神”那样。成千上万德国的笨蛋还跟着这样的胡扯鹦鹉学舌，他们那里知道这样做实际上就是自己在解除武装并且向犹太人缴械投降。

对此当然还有一个很平常的解释。那就是缺乏伟大的新思想在任何时候都意味着对战斗力的束缚。

相信使用暴力手段的权力本身永远都是和一种狂热的，对在这个世界上进行新秩序的变革胜利必要性的信仰密切相关的。

因此，一场不为这种崇高的目标和理想而奋斗的政治运动是永远不会最后拿起武器的。

而一种伟大的新思想的产生才是法国大革命成功的秘诀所在，俄国革命的胜利也要归功于新思想的产生，并且法西斯主义思想也只能通过精神来获取力量使整个民族以最为完美的方式焕然一新来造福人类。

但资产阶级政党对此却无能为力。

这不仅仅是因为资产阶级政党是以复辟旧时代为其政治目标，而且还因为自卫队则完全没有政治目标的原因。以往军事联合和凯夫豪森的意图则在目标上显示得栩栩如生，而且还帮助把德国当时所拥有的最好的武器在政治上表现得麻木不仁并且还使其堕落成为奴役共和国的工具。同时他们自己还把这看作是最好的观点，特别还认为这是最好的信仰，却丝毫也改变不了当时整个事件中那招灾惹祸的胡思乱想。

而马克思主义则在巩固加强国防军的过程中逐步地得到了树立权威所必需的权力支持，并且开始坚持不懈地解散现在显得有些多余而且还似乎有些危险的自卫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唯一特别的就是那人们

不信任的鲁莽的领导人会在法庭面前瑟瑟发抖并且还会坐牢。但命运也向大家预示了他们自己是难咎其责的。

随着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建立，首次出现了一场新的其目标并不像资产阶级政党只是想机械性地复辟过去，而是取代现有荒谬的国家体制来建立一个活生生的民族国家而奋斗的政治运动。

同时这场新兴的政治运动从第一天起就要坚持这样的看法，那就是他们的思想要在精神上得以表现出来，如果有必要的话还要保护这种表现，即便是通过残暴的手段来进行保证。很显然忠实地信仰新的理论学说的重大意义就在于表明为了能够达到目的任何巨大的牺牲都是算不了什么的。

我已经指出的是，一场政治运动想要赢得民心之时就是要自己有责任防御敌人恐怖主义企图之际。从世界历史的经验来看也永远都是代表恐怖主义的世界观绝不会是被国家暴力所能够打垮的，而永远都是被另外一种新的、大胆的、坚定的和占有优势的世界观所能够战胜的。这一点国家官员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感觉得到，虽然有些不快，但这样的事实是无法抹杀的。当国家在本质上有自己主导的世界观，暴力分子会有罪犯的特点并且也不能被看作是与国家世界观极端对立思想的代表时，国家的暴力就只能是用来维护安宁和秩序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就能够在几百年里采取最有力的暴力措施来抵抗对其产生威胁的恐怖活动，最终使恐怖活动无法再来反对国家，而只有屈服。

德国正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最猛烈的冲击。尽管多年来让数以千计的人坐牢和蹲监狱以及采取最为严厉的措施来惩罚那些对国家构成威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无数的斗士，而在七十年来的斗争中，德国非但无法阻止这种世界观的胜利，反而被逼得几乎快要投降了。（这些资产阶级的国家领导人也想对此进行否认，当然要是没有这些事情他们也无法相信。）而这个在 1918 年 11 月 9 日无条件地向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十字架卑躬屈膝的国家没有突然在第二天作为其征服者而复活，相反：这些

坐在部长位置上的资产阶级的蠢货现在却已经在胡说不要去反对工人的必要性，同时当他们谈论“工人”的时候就对马克思主义浮想联翩了。因此他们已经把德国的工人阶级和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样的东西，所以不仅既胆怯又虚伪地伪造真理，而且他们还企图通过其行为动机将其自己的崩溃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组织机构面前掩饰起来。

基于这样一个这个国家不断地向马克思主义进行屈服的事实，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才有责任不仅在精神方面要获得其思想上的胜利，而且还要针对陶醉在胜利之中的国际主义分子所从事的恐怖活动进行自我保护。

我已经描述过我们是怎样在实践中逐步地在我们新兴的政治运动过程中建立起会场保卫工作的，并且由此渐渐地努力使其具备有组织的维护秩序部队的特征。

从表面上看这个逐渐形成的组织和自卫队有些相同之处，但对此没有什么可比性。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德国的自卫队组织没有自己明确的政治观念，他们实际上多多少少也不过是以训练和组织为目的的自我保护的联合会，所以他们本来也可以当作是合法的国家权力手段的非法补充。而自由兵团特点的形成则是因为其组建的方式和当时国家的形势，而绝不是由于为了一个自由的、自己的信念自愿组织起来战斗的这样一个头衔。尽管从每个领导人到整个联合会都具备所有反对派的行动特征，但他们毕竟还不反对共和国。因为要说到更高意义上的信念，那么只相信现有社会状况的不足是不够的，而是要让人们从对新形势的认识和了解以及内心的察觉中滋生出认定要把实现这样的目标看作是一种必需和一项使命。

这就是当时的国家社会主义政治运动维护秩序队伍和自卫队的区别所在，他们最起码不是或者不想是通过革命所造成的社会状况的仆从，他们更多的则是为德意志而战斗。

这种维持秩序的队伍当然在开始的时候只具有会场保卫的特征。他们最初的任务也不过就是：没有他们的话，受到反对派阻止的集会就不可能顺利地进行。当时他们就已经训练成为盲目地完成去进行进攻，但他们却不像那些愚蠢的德国人所胡说八道的那样把橡皮警棍尊奉为最高的精神所在，而是因为他们懂得要消除最伟大的精神就只能用橡皮警棍来打死其思想的代表人物，正如在历史上常常发生把那些重要人物像殴打最卑微的奴隶那样来结束他们的生命。他们并不把暴力当作目的，而是通过使用暴力来保护目的在于宣传精神思想的人们不受到胁迫。同时他们还知道他们不负责保卫一个连民众都无法保护的国家，而相反他们必须要保卫国家以免受到要消灭国家和民族那些人的威胁。

在慕尼黑啤酒馆集会的斗殴事件发生以后，为了能够常常回想起当时少数人奋不顾身的进攻行动，这些维持秩序的队伍第一次直至永远得到了冲锋队这样的称号。正如像这个称谓所表明的，他们因此就是这场政治运动的一个部门，就像是宣传、新闻和科学院以及政党的其它的组织机构那样，他们就是这场政治运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不仅在这次值得纪念的集会中可以看到建立冲锋队的必要性，而且还可以在我们将要要把这场政治运动从慕尼黑推广到德国的其它地区的尝试中看到。而一旦我们似乎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构成了威胁，那么他们就会利用一切机会要把国家社会主义运动集会的每一次尝试扼杀在萌芽的状态或者通过驱散的手段来阻止举行集会。同时各种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机构对这样的意图和事件不假思索地进行隐瞒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那么人们向那些自己就被马克思主义思想打倒了，在许多场合完全不敢让他们的演说家公开露面的，以一种无法理解的愚蠢式的满足，而对于我们来说则总是有些不利的迷茫来进行反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战斗的资产阶级政党该说些什么呢！他们是幸运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并没有受到资产阶级本身的强迫，相反更多的是连我们也无法击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胁迫这些资产阶级自己。那么人们对那些在外人看来像是“民族”的政治家，而实际上是思想意识不坚定的、

最不正派的、在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和所有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的意见分歧上为虎作伥的、最卑鄙可耻的国家官员、警察局长，当然还有那些部长们又该讲些什么呢！那么和那些其妄自菲薄走得如此之远的人们，以至于他们为了厚颜无耻的犹太人报纸上的溢美之辞便不假思索地去迫害其中还有一些是英勇地牺牲了他们自己生命的，几年前还没有事先被赤色暴徒把撕碎的尸体悬挂在路灯杆上的勇士去谈些什么呢！可悲的是他们这些人曾一度怎样地被一位虽然已经去世、但依旧无法使人忘怀、以其刚毅的直率去憎恨所有阿谀奉承之人、一个只有正直心肠的人才能够去憎恨的警察局长博尼那有力的名言所吸引：“我想在我的一生中首先要做个德国人，然后才是一个官员，除此之外则别无所求，而且我也绝不想和那些表面上是官员但却干着无耻勾当的走狗奴才混在一起”。同时更加令人可悲的是这些人渐渐变成了成千上万最为忠实和勇敢的德国的国家公仆，他们不仅处于暴力之下，而且还出于自己的无知慢慢地也受到了感染反而以极大的愤恨去迫害并且最终从其官职和地位出发去攻击正直的人们，同时他们还总以虚情假意的欺骗手法把自己装扮成“民族”英雄。

从这些人那里我们无法指望会得到什么支持，并且我们也几乎在很少的情况下才会得到他们的支持。只有组建起自己的防卫才能够确保我们的政治运动自我进行控制，当受到攻击的时候还可以进行自卫，同时还可以得到公众的普遍关注。

作为训练冲锋队的内部宗旨的主导意图，除了体格训练之外，就是要训练他们成为坚定地相信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代表，并且最终在最大程度上来加强其纪律性。他们本来和资产阶级的观念中的防卫组织没有丝毫的联系，当然也就和秘密组织没有关系了。

在那个时候我之所以非常竭力地反对把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冲锋队建组成一支自卫队的原因如下：事实上如果没有得到国家的巨大支持，组建国民自卫队是不能通过私人团体来进行的。任何其它的想法

法都是过分高估了自己的能力。那么就绝不可能通过所谓“自愿原则”建立起来的组织使其具备军事意义。因为其缺乏指挥权，也就是缺乏处罚权。大概在秋天或者是还在1919年初春的时候就有可能组建起所谓的“自由兵团”，只不过当时他们大部分还都是一些受过旧式军队训练而走向前线的士兵，而且他们每个人所应承担责任的的方式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还都是无条件地服从军事命令而已。

所以，现在自愿组建起来的“自卫队组织”就完全缺乏这种精神。其组织规模越大，其纪律性的意识也就越淡薄，而对他们每个人所提出的要求越少，那么像这样的士兵和老兵协会的全部特点就会被更多地得到接受。

教育人们自愿到军队进行服役如果没有绝对的指挥权来进行保证的话，那么在广大民众中间是无法实施的。因为常常只会少数人才甘愿将自由之躯受制于服从命令的境地，而这在军队里则被看作是理所当然和极为平常的事情。

另外实际上训练无法进行的原因就是所谓的自卫队为了达到目标可以使用的少得可笑的手段。最好的、最值得信赖的训练必然是一个培训机构的主要任务。自从战争开始以来已经有八年过去了，并且自从那个时候起就没有那一年再对德国的青少年进行有计划的训练了。在过去几年里已经进行了培训，而现在人们又无法立即统计出谁是在什么时候最后一个离开的，这绝不会又是自卫队的任务。在1918年没有能力作战的年轻士兵本身都在20岁上下，而且我们也都差不多在这个令人担忧稍纵即逝的年龄阶段。因此每一个所谓的自卫队组织都难免总要具备一些以往军队的特点。而这不可能是建立起通过其名称就竭力想要表达出的那些称之为士兵联合会或者防卫联合会的意义所在，因为这些组织不仅只是要把维护传统和维护原来士兵之间的联系看成是自己的使命，而且还要在培养防范意识并且要在实际上成为这种意识的代表，也就是要创造出具有自卫能力的个人。

这样一项任务就绝对要求那些至今仍未受到军事训练的人们去接

受训练，但在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在一个星期里进行一到两个小时的训练是无法真正地培养出一名士兵的。随着今天对每一个人服兵役的要求不断增加，在两年的服役期内把一个没有受到过训练的年轻人转变为一个训练有素的士兵也许刚好是合适的。我们大家在战场上都亲眼目睹过那些年轻的、甚至连基本的作战本领都没有受到训练的士兵所造成的可怕后果。经过 15 至 20 个星期以钢铁般的果敢坚毅和无比的献身精神所训练出来的志愿兵在前线上也只不过是炮灰。只有参加过军的老战士中稍微年轻一点的，接受四至六个月训练的新兵才能够作为一个军团的新生力量，他们由“老兵”来领导并且会慢慢熟悉他们的使命。

与此相反，没有明确的指挥权和总体的策略，只靠一个星期内一到两个小时的所谓训练就想建立起一支军队的企图该是多么的令人绝望！这样也许可以让老兵得到休整，但永远是不会把年轻人训练成为士兵的。

尤其还可以通过这样一个事实来进行证明这种行为举止的结果是多么的轻率和毫无价值，那就是同样的时期内在所谓自愿组建起来的自卫队组织里勉强强、费尽心血、绞尽脑汁培养出或者试图培养出几千名在防范意识方面表现良好的人们（而其它的则完全不予考虑），而国家本身却通过和平主义民主主义的教育方式剥夺了成千上万年轻人的天性，毒害了他们热爱祖国的信念并且把他们变成了一群面对专制独裁的温顺羔羊。

而与此相比自卫队想要介绍给德国年轻人的观点则是多么的可笑！但是总让我认为反对以下以自愿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带有军事防卫性质的所谓自卫队组织的尝试的观点好像还显得有点重要：假如，尽管存在前面所提到的那些困难，但毕竟还成功地建立起了自卫队，还可以每年把一定数量的德国人训练成具有防范意识的人，而且他们不仅在思想方面，同样也在体能上以及武器装备方面都得到了训练，但在一个道德败坏的领导人的国家里，这样做是和他内心的目标相违背的，所以这样的结果也就等于零了。

但不管怎样像这样的一个不仅自己就可以证明其国家军事力量的一无是处，而且特别还完全不愿意去号召建立军事力量，那怕是用来支撑其腐朽统治的政府是毫无价值的。

今天的形势就是如此。或者说几年前就无耻地先将八百五十万受过高等教育的士兵给葬送了，并不只是他们没有用了，而是多亏了他们的牺牲甚至还遭到普遍的指责，难道这个国家目前又在朦朦胧胧的早晨才悄悄地想起来对一支有几万名士兵的军队进行军事训练不是很可笑吗！难道训练士兵是为了一个对过去无上光荣的战士进行污辱和唾弃，从他们胸前扯掉勋章，撕掉帽徽，践踏旗帜并且还要蔑视其功绩的国家统治吗？或者说今天的这个国家在什么时候才做出恢复原来军队的名誉，让那些道德败坏和无端漫骂之人来承担责任的举措呢？可就连这最起码的一点都没有。相反：我们最终所看到的则是他们这些人反而位居高官。正如人们对莱比锡政府的评价那样：“公理就是权力。”因为现在共和国的权力则同样掌握在这些策划煽动革命的人手中，而这场革命则是最卑鄙的卖国行为，是的，在德国历史上这完全就是最可耻的叛变行径，所以实际上也就完全没有理由通过组建一支新型的军队来助长具有这种性质的国家权力。当然所有理智的人们也都会表示反对的。

而这个国家，即使是在 1918 年革命以后，对加强军事地位给予怎样的评价则会从其针对当时就建立起大规模自卫队的看法就很清晰明白了。只要他们还要出面来保护那些胆怯的参与革命的无耻之徒，那么他们就是不受欢迎的。但因为多亏了我们民族的道德正在渐渐地堕落，所以对他们的威胁也就消失了，而现在这些军队的存在则意味着对国家政治的巩固，所以他们就显得多余了，并且人们还要想尽一切办法去解除他们的武装，是的，如果可能的话，就把他们解散。

历史对君主们的感激之情寥寥无几，但对这些革命的暴徒、民族的败类、国家的叛徒的感激则是由新兴资产阶级的爱国者们完成的。所以面对这些问题我只得问自己是否还要组建自卫队，这其中还不包括训练

这些年轻人到底是为了谁，他们用于什么目的，并且时候召集他们？同时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就是自己行动的最好准则。

如果让现在的国家动用以这样的方式训练出来的军队的话，那么对外就绝不会表现出是国家利益的代表，或许有一天只会为了保护那些面对激起了被欺骗、被抛弃、被出卖民众的公愤而捍卫自己民族利益的人们。

正因如此，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冲锋队才和其它军事组织完全没有关系，而是国家社会主义政治运动的一种防卫和训练手段，并且其使命和所谓的自卫队组织的完全不同。

冲锋队也不应该是秘密组织。因为秘密组织的目的只能是违法的。因而也限定了这类组织本身的发展。特别还要考虑到德国人那种夸夸其谈的特性，所以就不可能建立起一定规模的组织，同时还要对外保守秘密或者只是对其目标进行遮掩。类似这样的企图往往总会遭到失败。不仅如此，我们今天的警察机关还会成为叛徒以及类似流氓无赖所利用的棍棒，他们这些人为了三十个银币就会对他们所能找到和捏造的东西去告密来出卖别人，所以就是这个组织的成员本身在这种情况下也不会有必要保持沉默。只有很小的团体组织才能通过长期的斟酌来真正接受秘密组织的特性。而就是这种小规模的组织特征国家社会主义政治运动才不认可其价值所在。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所需要的都不是一两百个鲁莽的阴谋策划者，而是成千上万能够为了我们的世界观而奋斗的战士。并且也不是以秘密结社的方式来进行工作的，而是以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的方式，也并不是通过使用匕首、毒药或者手枪来让政治运动得到发展，而是可以走上街头的。我们可以让马克思主义分子明白，国家社会主义者将是未来城市街道的主人，正如他们将来是国家的主人一样。

而秘密组织的危险性还在于其成员常常完全误解其使命的伟大意义，因此会形成一种国家的命运真的可以通过一次暗杀行动突然就轻易地决定下来的观点。像这样的看法是有历史依据的，也就是当一个民

族忍受着某个天才般压迫者独裁统治的时候，人们知道只有他那卓越超群的个人魅力才能保证内部的团结和抵御外部敌人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突然会从民众中间跳出一个自愿牺牲的人给这个令人憎恨的独裁者以致命一击，而只有那些自知有罪，具有共和情感的流氓无赖才会把这样的行为看作是可憎的，同时我们民族中间歌颂自由之伟大的人们则敢于对其“一部分”行为加以赞扬。

在1919年到1920年期间秘密结社的危险还在于其成员被伟大的使命所吸引，认识到祖国所遭受的无尽的不幸，并且尝试为了家乡所遭到的厄运而进行报复，相信这样就可以结束民族的危难。而这样的企图则是荒唐的，因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取到胜利并不是他们领袖个人的卓越才能和重要性，而更多地是因为资产阶级的怯懦无能。对德国资产阶级所进行最为严厉的批评就断定这场革命本身并没有让几个伟人中的某一位脱颖而出还要最终完全听命于他。要是向罗伯斯庇尔、丹东和马拉投降还可以理解，但要是匍伏于瘦瘦的谢德曼、胖胖的埃茨贝格和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以及那些数不清的政治小人的脚下则是毁灭性的。实际上在那些制造革命的天才人物中无法看到一个这样的人，反倒是看到了祖国的不幸，并且还有那些革命的臭虫、成群结队和零零星星背着背包的斯巴达克同盟分子。而要除掉他们中的某一位也是完全不重要的，顶多不过是会让其它同样大小和嗜血成性的吸血鬼取而代之罢了。

人们在这些年里没有能够以足够的严厉制止那些在历史上的确有原因和理由出现过的，但至少是不适合当前的小人当道年代的这样一类的观点。

即使是在消灭卖国贼这个问题上也同样是值得深思的。难道在处决一个告发了火炮位置的家伙，同时旁边坐着一位高官却出卖整个帝国，白白让两百万人送死而深感不安，但必须要为上百万残废军人来负责，而同时又心平气和地干着共和勾当的坏蛋不荒唐到可笑吗。在一个政府本身作为卖国贼逃脱了惩罚的国家里消除一般不起眼的卖国贼则没有

什么意义。因为有那么一天可能会发生为了国家想要除掉无耻的泄露武器秘密之人的正直的理想主义者却要更大的卖国贼来对此承担责任这样的事件。所以就会出现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像这样一个背叛祖国的无赖应该由一个流氓恶棍来消灭还是由一个理想主义者来执行？一种情况是虽然取得了成就，但却令人质疑，更何况卖国贼也几乎是安全的，另一种情况则是一个无耻的恶棍给消灭了，并且同时一个也许并不引人注目的理想主义者的生命则要承担风险。

另外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是要想放跑江洋大盗，就不应该处决小偷小摸，反而要像过去那样在德国的国家法庭上对成千上万名组织十一月叛国行径并且因此要承担责任的罪犯以及所有相关人员进行审判而且要把他们绞死。像这样的例子对于那些无耻的泄露武器机密的人总还算是个教训了。

这些都是我为了一再阻止冲锋队加入秘密组织以及防止其本身带有这类组织特征的一些考虑。在这几年里我让国家社会主义政治运动远离那些大部分都是由那些极富崇高理想信念的，其行动却只会导致他们自己牺牲的，同时其行为对祖国的命运无法能够进行丝毫改观的德国的年轻人所进行的大胆尝试。

如果冲锋队既不是军事组织，也不是秘密结社，那么就必然会得出如下结论：

（一）对冲锋队所进行的训练就不必根据军事条列，而是应该按照政党的要求来进行。

冲锋队员必须要锻炼身体，其主要意义并不是在于军事操练，而是更多地要在于体育运动。我认为拳击和柔道比只会是半途而废的射击训练要重要的得多。上天赐予了德意志民族六百万身体完美且训练有素、充满对祖国狂热的爱并以最强烈进攻意识所培养出来的人们，一个民族国家将从他们，如果有必要的话，用不了两年就会组建完成一支军队，至少他们也就是军队的雏形。照今天的形势来看，这种军队的雏形只会成为德国的国防军，而不是半途而废的自卫队。通过锻炼身体应该向

每个人灌输要相信自己的优势并且要永远意识到这种优势是源自于自己的力量，同时还要深信通过锻炼身体能够教会他可以当作武器来保卫这场政治运动的体育技能。

(二) 为了从一开始就避免冲锋队带有秘密组织的特征，除了那些人们马上就能识别的服装以外，其存在的伟大意义本身就必须指出对这场政治运动有利的众所周知的发展方向。他们不可以躲在暗中，而是要行进在光天化日之下，并且最终以明确的行动来粉碎“秘密组织”的传言。为了使他们从精神上摆脱一切通过可耻的阴谋诡计来满足其行为准则的企图，他们必须从一开始就要完全彻底地懂得这场政治运动的伟大精神之所在，并且还要完全彻底地训练他们去完成体现这种精神的使命，所以从一开始就要放开眼界，并且让每一个人都要看到他自己的使命并不是去消灭那些大大小小的流氓恶棍，而是要把自己投入到建立一个崭新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民族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去。正因如此，才可以把反对现有国家的战斗从可耻的实施复仇和策划阴谋的水平提高到以消灭马克思主义及其政党为指导思想的伟大战争的高度。

(三) 冲锋队的组织形式以及服装和装备大意上不会参照旧式军队的式样，而是根据其所执行任务的使用目的来决定。

我在 1920 年和 1921 年期间试图慢慢地灌输给这个年轻组织的观点取得了成效，所以我们直到 1922 年的盛夏就已经有了上百名正式成员的冲锋队了，并在 1922 年的秋末时节逐渐地有了特别容易识别的服装。冲锋队的不断发展还有三个非常重大的事件：

(一) 1922 年的夏末时节在慕尼黑的国王广场各爱国团体反对共和国国防法案所共同举行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

慕尼黑的爱国团体组织当时就发出呼吁要求举行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来抗议共和国国防法案的通过。国家社会主义组织也应该参加这样的活动。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游行队伍由六个慕尼黑当地的百人方阵队伍做先导，后面分别跟着是各个支部的成员。游行队伍中还有两个小型乐队，举着近 15 面旗帜。当国家社会主义成员的队伍来到已经站满一半人、也没有什么旗子的广场上的时候激起了意想不到的掌声。我

也有幸面对这六万人的群众来进行演说。

能够在具有民族主义意识的慕尼黑的大街上举行游行示威，特别是还受到各方赤色分子的威胁，这也就第一次证明了集会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企图想要通过暴力手段来阻止游行队伍的赤色共和分子在几分钟内就被冲锋队打得头破血流给赶跑了。国家社会主义政治运动当时第一次展示了其坚定勇敢，并且在今后也要为自己行使走上街头的权利，并借此从这些信奉国际主义思想的民族败类和祖国的敌人的手中夺回了他们的特权。

这一天的结果不只是证明了在心理上和组织方面进行攻击的正确性，同时也证明了我们组建冲锋队观点的正确性。

这种观点的正确性现在又成功地在所证实的基础上得到了实实在在的补充，几个星期以后就在慕尼黑组建起了成倍的百人队伍。

(二) 1922年10月游行队伍向科堡市进发。“民族主义”的团体组织要参加在科堡市举行的德国国庆活动。我自己本人也收到了邀请并且还注明希望我能够带些人一起去。我是在上午11点收到邀请的，对我来说这正是时候。一个小时以后参加“德国国庆”活动的准备工作就已经就绪了。作为“陪同人员”我决定派八百名冲锋队员分14组从慕尼黑乘坐专用列车赶赴已属于巴伐利亚州的这个城市。相应的命令也向其它地方在这期间组建起来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冲锋队发出了。

在德国这还是第一次有这样的专用列车。在沿途各站当冲锋队员登上火车的时候引起了许多人的羡慕。有很多人以前还没有见过我们的旗帜，因此这样的印象会更加深刻。

当我们乘坐火车到达科堡市火车站的时候，受到了筹备“德国国庆”代表团的迎接，为的是要告诉我们一项和当地的工会组织、独立党和共产党“协商”好的命令，其内容就是不允许我们举旗、奏乐（我们自己带了个有四十二人的整齐的乐队）和列队进城。

当时我就立即直接拒绝了这种无耻的条件，立即对在场国庆活动的组织者和这些政党进行协商并达成如此的协议表示出我的惊异，同时还表示我们的冲锋队将在奏响的鼓乐声中随着飘扬的旗帜列队进城。

后来所发生的也就是如此。

在车站广场上迎接我们的是几千名狂呼乱叫的人群。“刺客”、“土匪”、“强盗”、“罪犯”是他们给予我们这些共和国缔造者的亲切称呼。而我们年轻的冲锋队员依旧秩序井然地列队站在车站前的广场上并且根本就没有理会这些人的辱骂。通过心惊胆战的警察按照约定没有把游行队伍带到我们大家完全感到陌生的城市科堡市郊的部队宿营地，而是领到了离市中心很近的啤酒馆会场。游行队伍左右两边喧闹的人群还在不断地增加。就在最后一个百人方阵队伍快要进入会场的时候，大批的群众就在震耳欲聋的喊叫声中涌了进来。为了阻止群众，警察封锁了会场。因为这样的情景实在难以叫人忍受，所以我让冲锋队员原地踏步，同时要求警察把门打开。在拖延了很长时间以后他们才照办的。

我们又从原路返回前往宿营地，这回可真地打起来了。在他们通过叫喊和侮辱性的叫骂没有能够将游行队伍搅乱以后，这些真正的社会主义分子以及平等博爱的代表则拿起了石块。对此我们则忍无可忍了，十分钟左冲右突地一顿暴打就把他们给消灭了掉，一刻钟以后，街上再也见不到什么赤色分子的踪影了。

而晚上的时候冲突就更加激烈了。冲锋队的巡逻兵发现单独遭到突然袭击的国家社会主义组织成员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正因如此，我们对敌人采取了果断的措施。到了第二天早上，多年来危害科堡市的赤色暴力组织就给推翻了。

现在他们又用纯粹马克思主义式的犹太人的欺骗方式通过散发传单企图再次煽动“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同志们”走上街头，同时还完全歪曲事实地说什么我们是“凶手”，在科堡市挑起了“要消灭爱好和平的工人阶级的战争”。一场由四面八方赶来近万人的大规模“群众示威游行”应该在一点半开始。因此我果断地决定将赤色恐怖最终解决掉，在12点的时候就让在此期间又增加了1500名队员的冲锋队集合，我也和他们一起前往科堡市举行庆祝活动，同时也是那些赤色分子开始举行示威活动的广场。我倒想看看他们还敢不敢来向我们挑衅。当我们进入

广场的时候，原先所说的近万人也不过只有几百人到场，当我们靠近他们的时候，他们基本都保持平静，有的还悄悄溜掉了。只有那些从外地来的还不认识我们的赤色团体还想找茬儿，但转眼间他们又失去了兴趣。并且现在人们能够看到那些吓得胆战心惊的人们是怎样慢慢地觉悟起来，竟然有勇气向我们致意，并且在晚上我们离开的时候，许多地方爆发出了自发性的欢呼。

突然铁路上的工作人员在火车站通知我们火车无法行驶。我让人告诉火车司机我认为这种情况就是我们落入了赤色官员所设的圈套，要不然我们就自己开火车，不过打算在每一个火车头、每一辆煤水车和每一节车厢里都要带上几十名国际主义分子的兄弟和我们一起乘车。我马上提醒他们注意我们自己开车当然是冒险的行为，并且不排除大家一起摔断脖子和骨折的可能性。那么至少不是我们自己，而且与平等博爱的赤色官员们一起升天我们会很高兴的。

所以火车正点开出，并且我们在第二天早上又平安到达了慕尼黑。

自1914年以来在科堡市还是第一次恢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毕竟如果今天任何一个愚蠢的高官擅自断言国家要保障公民的生命安全，这在当时肯定不切实际，因为在那个时代公民要保护国家所代表的安全。

这一天的意义不能完全从随后所得到的结果来进行评价。并不只是获胜的冲锋队对其领导决策正确性的自信和信任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而是那些想和我们进一步交往以及许多第一次认识到国家社会主义政治运动，并且今后极有可能负有使命的组织机构开始为马克思主义的胡思乱想准备好了一个合适的结果。

只有民主党在抱怨怎么可以胆敢不以和平的方式命令把人打得头破血流，而且还得服从共和国的民主制度要用和平主义的歌曲，而不要用拳头和棍棒去进行血腥的攻击。

而和往常一样资产阶级的报纸有的表示悲伤，有的表现平常，只有不多的正直报纸会表示欢迎，这样至少在某个地方能够让马克思主义这

类拦路抢劫犯停止其罪恶行径了。

其实在科堡市总还是有一部分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想必他们自己就认为是受到了引诱，被国家社会主义工人的拳头教训过的也知道得到些教训的，所以这些工人也是在为理想而奋斗的，因为根据经验人们只为所信仰、所喜爱的东西去争斗。

但无论如何冲锋队所获得的最大利益就是冲锋队本身的快速发展。所以在1923年1月27日在召开党员代表大会的时候就有近六千人参加了授旗典礼，同时首批的百人方阵队伍的统一新式着装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从科堡市所取得的经验还表明，虽然不只是为了加强团队精神，而且也是为了避免混淆和防止相互之间的敌我不分，所以对冲锋队统一进行着装是多么的有必要。原来他们只佩带袖标，现在又增添了上衣外套和那种众所周知的帽子。

科堡市经验的意义还在于，我们从现在起就要开始有计划地在所有多年来赤色恐怖笼罩之下的地方制伏那些异想天开的人，不让他们去阻止集会，并且确立集会的自由。从现在开始要在这些地方不断地把国家社会主义的力量集中起来，并且要以国家社会主义的宣传作为武器一个一个逐步地击败在巴伐利亚的赤色堡垒。冲锋队本身也不断地熟悉自己的职责，因此他们渐渐地远离那些毫无意义和无关紧要的自卫队习性而提升到一个为了建立一个崭新的德意志国家的生气勃勃的战斗组织的高度。

直到1923年3月冲锋队就是这样逐步发展的。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使我不得不将原来政治运动的发展方向进行改变。

(三) 1923年的头几个月鲁尔区被法国人占领了，而在以后的时间里对冲锋队发展则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即使在今天还不可能尤其是从国家的利益出发在所有公开的场合

对此进行谈论或者进行报道。我也只能在公开讨论涉及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才让公众对此有所了解。

对鲁尔区的占领并没有让我们感到惊奇,反而更加让人期待胆怯的妥协政策以及因此让自卫队来承担某种使命的想法最终失败。即使是当时已有数千名年轻力壮小伙子的冲锋队也不应该回避所应尽的国家义务。从1923年的初春一直到盛夏冲锋队就要改编成为一个军事战斗组织。而这种改编大部分要归结于我们这场政治运动在1923年所遇到的形势发展变化。

我对1923年的形势发展变化进行了大量的描述,只想在此说明,如果导致冲锋队改编的前提条件,也就是开始进行反对法国的行动不相符合的话,那么从我们政治运动的观点来说,这种改编则是有害的。

1923年所缔结的和约乍一看来是那么可怕,但从更高的境界来看似乎更加有必要,因为这个和约把维护德意志帝国政府弄成是多余无用的,而现在又通过对冲锋队进行有害的改编想一下子结束这场政治运动,因此这样也就提供了一个可能,那就是总有一天在被迫离开的道路上会重新开创出新的事业。

1925年新成立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又重新建立、训练和组织了冲锋队。冲锋队必须回到其最初健全的观念上来,并再次以把冲锋队打造成为体现和加强为这场政治运动的世界观而奋斗的工具看作是最为崇高的使命。

而把冲锋队贬低为一种自卫队或者是秘密组织则是无法让人忍受的。冲锋队要更加努力地把自己培养成一支成千上万具有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并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是具有民族主义精神的队伍。

第十章 伪装的联邦制度

1919年的冬天或者更确切是在1920年的初春，我们这个刚刚成立的政党就不得不对早在战争期间就已经显得具有非常重大意义的一个问题进行表态。在这部书的上卷我已经针对就我个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问题，表明不论是英国人还是法国人已经开始以特有的宣传方式制造德意志南北分裂，威胁到德国崩溃的征兆进行过简短地描述。在1915年初就出现了系统性地煽动反对普鲁士的报刊文章了，认为普鲁士是战争的唯一罪人。到了1916年这种宣传体系变得更加完善，同时也变得更加狡猾和无耻。这种以人类的最卑劣的本性来煽动南部的德国人来反对北方的德国人不久就有了结果。人们对当时不论是政府还是军队，或者更确切地说就是针对巴伐利亚司令部这些权威性机构进行指责，责备他们有推卸不掉的责任，谴责他们是以上帝不可饶恕的玩忽职守，而不是以必要的果断来对这种卑劣的宣传采取相应的措施。而他们却无动于衷！相反，在不同的地方人们则显得还很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事情并且或许是脑子不够用，想不到这样的宣传不但会阻挠德意志民族的统一，而且还因此会自然而然地巩固联邦制的势力。这样恶意的玩忽职守恐怕会遭到历史上更为严厉的惩罚。人们添油加醋所说的那些普鲁士的弱点欺骗了整个德国。其结果却不仅加速了德国，首先恰恰是各个州自己本身的分崩离析。

而在那个针对普鲁士制造人为仇恨达到了极点的城市却第一个爆发了反对世代相传的王室的革命。

但如果要是相信把制造反普鲁士的气氛只归结于敌人的战争宣传，而且由他们所操纵的民众还没有申辩理由的话当然也是错误的。那种恰

恰以荒唐的中央集权制来约束，也就是欺诈整个帝国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战时经济的组织形式才是形成这种反普鲁士观念的主要原因。毕竟对于老百姓来说战争期间的社会经济中心是在柏林，柏林和普鲁士同样重要，那么柏林也就等同于普鲁士。但在当时却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这些掠夺机构的组织者，也就是战时经济组织的组织者既不是柏林人，也不是普鲁士人，甚至根本就不是德国人。他只看到了所存在的严重缺陷以及这个在帝国首都令人憎恨的机构不断地受到攻击，并且当然也就把他所有的仇恨都转移到这个帝国的都城，同时也倾泻到普鲁士身上。更有甚者，某一派不但不采取任何反对措施，而且甚至暗自还对这样的论调微微一笑表示欢迎。

而犹太人则更加狡猾，他们并不是不知道在战时经济的掩盖下组织对德意志民族进行无耻的掠夺必然会遭到反对。

只要德意志民族不去掐死这些犹太人，那他们也就不必害怕。为了在这方面阻止这些受到疑惑和愤怒所驱动民众的情感爆发，再也没有比让民众到别的地方去泄愤更好的办法了。

他们只想让巴伐利亚反对普鲁士，让普鲁士和巴伐利亚争吵，而且越多越好！双方的战斗越激烈对犹太人来说意味着和平也就最保险。公众的注意力完全被那些国际主义的民族蛆虫所误导，人们似乎要忘记他们。所以当危险好像要出现的时候，这些在巴伐利亚也大量存在的深思熟虑的家伙就提醒要理智、要深思、要克制并且借此让激烈的反抗渐渐平息下来，这样犹太人就只需要在柏林明目张胆地进行煽动挑衅，然后就期待着胜利的来临。所有德国南北之争的既得利益者一下子就转向这些突发事件，并且一直鼓吹直到愤怒的激情重新又燃起熊熊的火焰。

这是一场为了掠夺德意志民族，当时的犹太人所一贯从事的分裂德意志民族的巧妙、狡诈的游戏。

以后革命就爆发了。

如果直到 1918 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直到这一年的 11 月份，那

些普通百姓，特别是那些很少受到教育的小市民和工人对德意志民族彼此之间，尤其是在巴伐利亚所发生争执真正的来龙去脉以及无可避免的后果还不能够正确理解的话，那么那些自称为“爱国”的人们至少在革命爆发的那一天也必须懂得这一点。因为当这场革命的领导和组织者在巴伐利亚也已经变成了“巴伐利亚”利益代表的时候，这样的行动才勉强取得了成功。国际主义分子犹太人库特·艾斯纳就开始利用巴伐利亚去反对普鲁士。那么偏偏就是让这个在德国其它地方到处不断游荡四处散布小道消息的东方人恐怕才是最后一个可以委任来保护巴伐利亚利益的，而恰恰这个按照上帝的意志在地球上还继续存在的巴伐利亚对他来说又是最无关紧要的也就理所当然了。

同时这个在巴伐利亚煽动革命的库特·艾斯纳是个处心积虑反对德意志帝国的领导人，他不仅很少考虑到巴伐利亚的利益，而且还只受犹太人的指使。他利用巴伐利亚民族所固有的天性和憎恶，并借此想能够更加轻而易举地来分裂德国。而被毁灭的德意志帝国则很容易就成为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牺牲品。

由他所运用的手法在他死后还仍然得到使用。在德国常常把各个宗主国及其亲王们嘲讽得面红耳赤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则突然作为“独立党”向在亲王家族中和宗主国里有着最强大根基的那些人们呼吁什么情感和天性。

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反对不断向前推进的解放部队的战斗首先是作为“巴伐利亚的工人阶级”反对“普鲁士军国主义”的战斗来进行宣传鼓动的。只有这样人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在慕尼黑战胜苏维埃共和国和在德国的其它地方有所不同，因为这不是为唤起民众的觉悟，而更多是为了对普鲁士产生更大的愤恨和不满。

这种由布尔什维克的鼓动家把消灭巴伐利亚的苏维埃共和国塑造成“普鲁士军国主义”反对具有“反军国主义”和“反普鲁士”思想意识的巴伐利亚民族胜利的手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当库特·艾斯纳还在慕尼黑进行巴伐利亚州议会立法选举的时候，其追随者还不到一万人，



共产党的拥护者也不到三千人，而到苏维埃共和国倒台后，这两个政党得到了近十万选民的支持。

在此期间我个人也投入到了反对这种荒唐的离间德意志民族的斗争中去了。

我想在我的一生中我还没有比我当时反对针对普鲁士所进行的挑拨离间这样的事情更加不讨人喜欢的了。当慕尼黑还在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就已经召集群众集会了，集会上所激起的对德国其它地方，尤其是对普鲁士的愤恨达到了如此沸腾的程度，以至于不仅要把一个参加聚会的德国北方人处以死刑，而且集会往往是以荒谬的大喊大叫结束的：“脱离普鲁士！”“打倒普鲁士！”“向普鲁士宣战！”这种腔调只有和德国国会里一个出色的巴伐利亚神圣利益的代表所发出的战斗呼声一样：“宁为巴伐利亚死，也不为普鲁士活。”人们真应该亲自感受一下集会的场景，才能够懂得当时我是怎样第一次由几个朋友簇拥着去参加在慕尼黑附近的啤酒馆举行的集会反对这种荒诞言论所进行自卫反击的了。当时保护我的都是我的战友们，而当一群丧失理性的，并且大部分都是在我们保卫祖国的时候成群结队地当了逃兵或者在家里无所事事的人们咆哮着冲向我们还威胁要打倒我们的时候，也许人们可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我们的感受。而对于我来说这群人的出现当然是个幸运，因为我感觉到我那些不久将对我生死效忠的忠诚伙伴是和我在一起的。

这种不断重复发生并且贯穿整个 1919 年的战斗似乎在 1920 年初还更加激烈了。有些集会，特别是我回想起在慕尼黑附近阳光大道上的瓦格纳车辆厂车间的集会让我那在此期间变得不断壮大的队伍经受了最激烈战斗的考验，而我那十几个护卫遭到无端挑衅、拳打脚踢，最后死的比活的多地从会场被扔出去的情况却很少发生了。

我想要说的是我自己第一次只靠我那些战友的支持所进行的战斗现在则当作是这场年轻的政治运动的神圣使命而继续发展下去。

直到今天我都可以说我们当时基本上是唯一的一个向我们在巴伐

利亚的拥护者指出这种愚蠢和叛变的行径慢慢地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是值得我骄傲的一件事情。我之所以说这是愚蠢和叛变的结合，那是因为我相信的确有本身是好心肠但又不乏愚昧而随波逐流的民众，但不要把其组织者和煽动者也都看成如此地天真幼稚。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直到今天我都仍然把这些人看成是靠法国来养活和指使的叛徒。而在那里所发生的事件历史早就已经做出了判决。

而人们有意要掩盖真正的意图，同时又把联邦制观念作为受到人们关注唯一的起因的伎俩是当时这个事件所造成特别危险的结果。很明显，对普鲁士的仇恨和联邦制没有关系。但奇怪的是“联邦制的所作所为”也涉及到解散或者分裂其它联邦制国家的企图。因为一个真正的联邦主义者是不会用骗人的空话去描述其所引用的俾斯麦的帝国思想的，同时也不会期待去分割由俾斯麦所创造或者所完成的普鲁士国家的，或者甚至公开地去支持这种分裂的努力的。如果一个保守的政党支持或者以公开的行动要求和促使法兰克人脱离巴伐利亚的话，那么在慕尼黑的人们又该会怎样地大喊大叫呢！而这特别只对那些真正具有联邦制思想意识的，没有彻底识破这种卑鄙无耻的骗人把戏的人们造成痛苦，因为他们首先是受骗上当的人们。同时这种联邦制的观念所遭受到的指控却使其为自己的拥护者挖掘了坟墓。当人们自己贬低、漫骂和诬蔑这种联邦制国家最重要的成员，也就是普鲁士的时候，是不能对帝国的联邦制形象当作联邦制国家来进行宣传的，而且如果有可能的话，还要使其出丑。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所谓的联邦主义者同时还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至少还让十一月革命和民主有些关联的普鲁士。因为这些所谓的“联邦主义者”的漫骂和攻击并不是针对那些大部分以南部德国人和犹太人居多的魏玛宪法的创始人，而是反对保守的旧普鲁士的代表，也就是与魏玛宪法相对立的人。所以他们就小心谨慎地惟恐触犯了犹太人，这也不足为奇，兴许倒是为打开整个谜团提供了钥匙。

正如在革命之前犹太人就懂得如何从他们的战时经济组织，或者更加确切地说是从他们自己身上将人们的注意力移开，并且知道怎样让民

众，特别是巴伐利亚人去反对普鲁士人，所以他们在革命以后就无论如何也要必须将其新的、比以前还要坏十倍的强盗行径掩盖起来。并且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又成功地对所谓的德国“民族主义分子”相互进行煽动：让具有保守倾向的巴伐利亚人去反对思想上保守的普鲁士人。并且这些掌握着帝国命运的人又使用最为狡诈的手段故意粗暴无理地进行挑唆，使那些受到蒙蔽的民众热血喷涌怒火满腔。他们从来就不反对犹太人，而总是反对德国同胞。巴伐利亚人所看到的不是一个有着四百万辛勤劳作、努力创造的人们所组成的柏林城，而是一个充满着懒惰、腐化、最令人恶心的西方人的柏林！这仇恨不是冲着这些西方人的，而是指向“普鲁士”的城市。

而实际上这会常常令人感到疑虑。

犹太人将公众注意力从自己身上转移并忙于其它事务的伎俩在今天也可以再来进行研究。

1918年要进行有计划的反犹太主义行动是完全不可能的了。我还可以回想起当人们只是嘴上说一说犹太人这个字眼时所遇到的麻烦。人们要么傻呆呆地看你，要么会遇上最有力的抵抗。我们想要向公众揭示真正敌人的最初尝试当时也显得几乎是毫无希望的，只不过慢慢才开始有所好转。所以就其组织形式来说“保卫和防御同盟”也就是很不合适的，尽管在重新对犹太人问题的展开方面其功绩也是很了不起的。但无论如何，在1918年至1919年的冬天诸如反犹太人这类事情也开始慢慢地出现了。以后所发生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则把犹太人问题完全以另外的方式向前推进。这样就把犹太人问题从上层和下层市民阶层的狭小范围里完全突显出来并转变成为推动群众运动的动机。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成功地让德国民众获得了伟大的团结斗争的理念，同时犹太人也开始反击了。犹太人还是采取了原有的一切手段。他们自己极其迅速地在群众运动中煽风点火挑拨离间。针对教皇极权主义方面的问题就存在着天主教和新教教会的争斗并由此产生双方的相互争斗，正如目前双方的关系一样，而唯一的可能就是用其它的问题来吸引公众的注意力来阻止犹太

人集中发起的进攻。恰恰正是把这个问题抛给了我们民众的这些人，他们自己也未能得到什么好的报答。而犹太人却达到了他们所期望的目的：天主教教徒和新教教徒彼此间展开了令他们感到愉快的争斗，而雅利安民族和基督教的死敌则在一旁窃窃地笑着。

所以，正如人们从前所知道的那样，公众舆论参与联邦制和中央集权制之间的争斗已经有数十年之久并且都筋疲力尽了，而同时犹太人则高价哄抬民族自由并把祖国出卖给国际金融寡头，所以他们现在又成功地让德国的两派教会相互之间进行争斗并使他们吞下国际上犹太人的毒药而受到伤害。

而犹太人为了使我们民族退化每天所进行的蹂躏摧残行径则历历在目，人们要想到对我们血液的毒害恐怕只会在百年以后或者说完全都无法从我们的身体中消失掉，人们还要想到这种对种族的瓦解是在贬低，简直就是在不断地抹杀我们德意志民族中最后仅存的雅利安人种的价值。最终使我们作为文明代表的力量越来越明显地衰退并陷入危险的境地，至少在我们的大城市里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而今天的意大利南部早就这样了。这种对我们血液的玷污现在都是由犹太人有计划地进行着，而我们成千上万的人们却都熟视无睹。这些狠毒的民族寄生虫有计划地玷污着我们那涉世未深、年轻的、金发姑娘们，由此在这个世界上所造成的破坏是无法弥补的。而这两大基督教教派竟然对这种针对上天所恩赐给这个世界唯一高贵的民族所进行的亵渎和摧残竟是毫不关心。要知道这个世界的未来并不取决于是新教教徒战胜天主教教徒或者是天主教教徒战胜新教教徒，而是取决于能否维护雅利安民族的生存或者使其灭亡。因为今天这两大教派的斗争并不是针对雅利安民族的克星，而是试图自己把对方消灭掉。而恰恰正是具有民族主义思想观点的人才会有神圣的责任去注意其所信奉的教义不只是在表面上谈论上帝的意志，而是要在实际行动中去完成上帝的意愿，并且不容上帝的言行受到亵渎。因为上帝的意愿是通过其形象、行为和才智传播给人类的。谁要是亵渎他的言行，就是向上帝以及向上帝的意愿宣战。因此教派中积极主动且乐于助人的每一个人都要认识到其首要和神圣的责任就

是要反对那些通过言行所形成的影响力从自己的宗教组织中脱颖而出，并且到别的教派那里企图惹是生非的人。因为在德国现有宗教内部分歧所引起的一种宗教信仰的本质之争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两个教派同归于尽的战争。

而我们这里的情况完全无法和法国、西班牙或者意大利相比。比如在这三个国家人们都可以宣扬反对教权主义或者教皇极权主义，但在这种尝试的过程中却不存在导致这些国家的法国人、西班牙人或者意大利人产生分裂的危险。但这种尝试在德国是不可以进行的，因为从一开始新教教徒就必定会要参加的。那么在别的国家天主教徒针对其主教大人以某种政治方式的攻击所进行的抵抗，在德国就带有了新教教会反对天主教会攻击的特征了。信徒们对自己所信奉的教义，即使有不合理的内容，总还是可以忍受的，而这一点往往从一开始就会遭到最为严厉的反对，况且其反对者还是来自别的宗教组织。接下来所发生的就是这些很容易就可以组织起来的人们自己去消除他们宗教组织内部明显的弊端，并且还会立即一致对外建议或者甚至是要求，对不是自己的宗教组织里同样的弊端也进行同样的改革。他们把这看作是一种不合理的、不受允许的，也就是不正当的去插手没有涉及到当事人事件的尝试。而类似这样的尝试，如果有建立民族共同体崇高利益的理由也就不必为此做什么辩解了，因为在今天，宗教情感总还比所有国家和政治的理由要更加深入人心。并且现在人们让这两大教派卷入相互间激烈的争斗也没有完全得到另一个结果，而只有通过双方的和平相处才能够在宗教信仰方面给国家逐步带来一个达到和解的未来。

我并不赞成把那些现在使民族主义运动卷入宗教争端的人们看成是我们民族最坏的敌人，并宣布他们是当今具有国际主义思想倾向的共产主义者。而要使这些人转变观点正是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政治运动所负有的使命。谁要是把这项使命脱离实际行动，那他就是最可耻的。不管他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都不重要，那么他就是犹太人利益的帮凶。因为今天犹太人的利益就是让现在对犹太人开始变得越来越危险的民族主义运动为宗教的争斗去浴血奋战。并且我所特别强调浴血奋战这个词

就是因为，只有一个对历史完全无知的人才能够想象得到通过这场运动就可以解决这样一个让伟大的政治家们上百年来伤透脑筋的问题。

另外，事实本身也说明了这一点。这些先生们在1924年突然发现民族主义运动的最高使命就是要反对“教皇极权主义”，可非但没有推翻教皇极权主义，反而使民族主义运动产生了分裂。因此我必须表示反对的就是这些民族主义运动中的任何一个幼稚的人还以为他能够完成连俾斯麦都无法办到的事情。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最高责任始终就是反对，而且要最坚决地反对任何一种使我们的政治运动服务于这些宗教争端的企图，并且还要立即把宣传这种看法的人从我们的队伍中驱逐出去。事实上直到1923年的秋天，我们也完全取得了成功。在我们运动的行列中虔诚的新教教徒可以坐在忠诚的天主教教徒旁边而不必感到有丝毫宗教信仰方面的良心不安。双方所进行的使两大教派成为雅利安民族的破坏者的激烈斗争反而使他们学到了相互尊重和彼此赞扬。同时在这几年里这场政治运动针对中央党所进行的激烈斗争却不是出于宗教的原因，而只是由于国家、种族以及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当时所取得的成就则说明了我们的正确，正如今天给那些自以为是的人所做的证明一样。

近几年来形势有时会变化很大，这就使得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人们在遭到上帝所摈弃的宗教争端的盲目性当中不只一次地认识到其行为的疯狂，所以宣扬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分子的报刊也就根据需要突然变成了宗教组织的辩护人，为的是通过四处散布实际上时常是非常愚蠢的言论来给这一派或者是另一派增加精神负担，并且借此最大限度地来煽风点火。而恰恰就像德意志这样的民族才有能力为信仰而战并流尽最后一滴血，所以诸如此类的战斗号召都是极其危险的，这在历史上是得到了证实的。而我们民族又常常一再地被现实中真实的生存问题所误导。当我们因为宗教争端而受尽煎熬的时候，世界正在被瓜分。而在我们的民族主义运动还在考虑教皇极权主义的危险性是否大于犹太人的危险性或者正好相反的时候，犹太人却摧毁了我们民族赖以生存的基础并且借此永远消灭了我们的民族。我只能最为衷心地期望所有“民族主义”

的斗士、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以及德意志民族：先生们，要警惕这些所谓的朋友，即便他们也已经和他们的敌人断绝了关系。

在 1919、1920 和 1921 这几年以及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被犹太人以此狡猾的方式所煽动起来的有关联邦制和中央集权制的争斗，尽管因此遭到了反对，也迫使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对主要的问题表明自己的观点。德国应该成为联邦制国家，还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并且人们实际上是怎样看待这两种国家体制呢？对于我来说比较重要的是第二个问题，这并不只是因为这是理解整个问题的基础，而且这个问题具有澄清问题及化解分歧的特点。

那么什么是联邦制国家呢？我们所理解的联邦制国家不过就是一个由各个主权国家根据各自自由的意愿将各自的主权力量联合起来，并且把各自的主权让给能够维护和保障其生存的联盟。

实际上这种理论上的表述和世界上已有的联邦制国家完全不同。至少和美利坚合众国是不一样的，因为绝大多数美国的联邦共和制国家原来的主权完全都不再考虑了，而更多地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某种程度上被划入了合众国整个版图里了。所以这就涉及到美利坚合众国的各个联邦共和制国家，也许这也是出于管理方法的原因，也就是更多地是关于大大小小常常都是用直尺来划分以前没有过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自己主权的版图。因为毕竟不是这些联邦共和制国家组成了合众国，而是合众国建立起了所谓这些国家的主体部分。而同时转让或者更准确地说划归给各个联邦共和制国家领土最大程度上的自主权不仅要和联邦共和制国家的特性相符，而且特别还要和土地面积、空间尺度，也就是说几乎和陆地的规模相匹配。所以对于美利坚合众国的各个联邦共和制国家就谈不上什么国家主权，而只是享有根据美国宪法所规定和所保障的权利，或者也许应该说是权限。

而对于德国来说以上这些描述并不是全部和完全适合的，尽管在德国毫无疑问也有作为独立国家的，并由此组成了德意志帝国的各个联邦。但是帝国的组成并不是出于各个联邦的自愿和相互合作，而是因为

其中的一个联邦通过霸权统治的结果：那就是普鲁士。单单纯粹从德国各个联邦在领土面积上的巨大差别就无法进行比如像建立美利坚合众国那样去组成联邦。原来很小的、较大的和很大德意志联邦领土面积的差别表明其所能做出成就也是不相同的，也就是说对建立帝国所承担的责任以及帝国对联邦所做出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实际上对于大多数这样的联邦也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主权，除了国家主权这个词官方的空话也就再也没有什么意义了。事实上不仅过去，而且现在就有无数的所谓“主权国家”已经被消灭掉了，并且因此最为清楚地证明了这种“主权”政体是多么的软弱。

可是无法确定的是这些国家具体在历史上是怎样形成的，但它们大概几乎都无法和最初的国土疆域完全相同。这些国家纯粹只是政治产物的表现形式而且它们的根基几乎还一直延伸到了德意志帝国软弱无能的悲惨时期，并且在某种条件下，这也因此反过来又造成了我们的祖国德意志的四分五裂。

当然所有的，至少部分联邦都要遵守原有帝国的宪法，只要在联邦议会里的每个联邦不仅都要认同同样的宪法，而且在组建帝国的时候还要按照每个联邦领土大小、实际上的重要性以及所做出的成就按等级来区别对待。

只有很少的联邦才会为了建立帝国而自愿放弃自己所应该让出的主权，实际上大部分的联邦要么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主权问题，或者简直就是普鲁士强势的压力下被剥夺了主权。但俾斯麦的基本原则却是不要把无论如何从每个联邦所能够夺取的东西都要交给帝国，而是只要要求联邦交出帝国所需要的东西。这是既符合实际又聪明智慧的基本原则，这不但一方面最大限度地顾及到了各个联邦的习俗和传统，另一方面也因此很大程度上从一开始就确保新建立的帝国得到了拥戴和愉快的合作。而把帝国要永远充分地掌控所有的主权这样的决定归结为俾斯麦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俾斯麦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观点，相反，他还想把现在难以执行和难以应付的事情交给今后去完成。他所期待的是渐进的、均衡的、时间上的效果以及可以期望具有更大持续力量的发展本

身的推动力。而不是立刻挫败各个联邦抵抗的某种尝试。因此他展示出了其政治家治国方略之伟大，并且也得到了极好的证实。因为实际上帝国的主权也要不断地依靠各个联邦的权力来得到提升。这个时代满足了俾斯麦自己所想要得到的东西。

随着德国的崩溃以及君主制政体的消亡不可避免地加速了这种形势的发展。因为德国各个联邦的存在毕竟很少是取决于其所有的历史条件，而更多地则是归结于纯粹的政治因素，所以目前各个联邦的意义也就变得无足轻重了，也就是这些联邦的政治发展的最基本形式，即君主制政体及其王朝也都给消灭了。有许多这种类似于“国家的产物”因此就严重地失去了内在的支持，那么其本身就要承受放弃继续存在的后果，所以纯粹出于适当的理由要么和其它联邦合并，要么自愿加入到更加强大的联邦之中，这就是实际上主权软弱的可耻表现及其受到本地居民所鄙视的最为有力的证明。

君主制政体及其代表人物的消亡使得带有联邦制特点的帝国受到了很大的震动，而对《凡尔赛和约》所应承担责任的后果则更加令人震惊。

就在这些联邦失去了相对于帝国至今还仍然所拥有的财政自主权的同时，帝国却因为战争的失败而经受着靠这些联邦各自所缴纳的钱永远都填不满的财政赔偿的考验，也就是很自然和理所当然的了。而接下来接收帝国邮政和铁路的结果，必定就是要通过《凡尔赛和约》逐渐把我们民族引向奴役之路的举措。而德意志帝国则被迫让自己所有的财富不断地升值以能够满足由于不断地受到剥削而应承担的责任。

而如此进行国有化的方式是多么的荒唐，整个过程本身却又是多么地合乎情理和理所当然。那些最终没有尽力让战争取得胜利的政党和人才应该对此承担责任。特别是那些战争期间在巴伐利亚只为谋求自身的私利，忽视德意志帝国的利益而造成了必须要赔偿十倍之多的损失的政党也是有过错的。历史是会进行报复的！只是上天的惩罚很少像这次一

样在犯罪之后来得如此地突然。同样还是这些几年前还把各自联邦的利益，特别是在巴伐利亚，置于德意志帝国利益之上的政党现在则不得不尝尝在所发生的事变压力下为了帝国的利益来怎样扼杀各个联邦生存的滋味。这一切都是他们自己的过错。

而在向广大选民（毕竟我们现在的政党也只能去煽动他们了）抱怨联邦失去主权的时候，所有这些政党还无一例外地相互争先恐后地去履行最后肯定必然会导致德国内部发生彻底变化的政策，这简直就是虚伪。俾斯麦时期的帝国是自由和没有束缚地一致对外的。而这个帝国在财政上是不具备如此沉重的赔偿能力，同时还要必须完全遵照那个美国人道威斯德国赔款计划那种毫无建设性方式来执行。而当时国内的财政能力也只限于能够支付最起码的必要开支。所以，帝国大概是缺乏自己的财政主权而只得靠各个联邦的税赋来维持生计了，当然这样一方面可以保全自己的主权，另一方面还可以相应地让各个联邦通过向帝国缴纳很少的财政支出来得到加入帝国的喜悦。而把当时缺乏加入帝国的喜悦想要宣扬成为是各个联邦和帝国之间财政上的隶属关系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也是不正当的。对帝国观念的不以为然不能归结为这些联邦失去了主权，而更多地是由于当时的德意志民族看到当时国家可怜兮兮样子的结果。尽管也举行了各种各样的帝国授旗仪式和颁布宪法的庆典，但今天的帝国在各个阶层的民众心中依然陌生，而共和国的国防法案也许有损于共和国的建立只恐怕也不会赢得每个德国人的爱戴。而最大的担忧则是共和国只由自己的民众依靠法令和监狱来进行保护则会遭到最为轻蔑的指责和对整个国家机构本身的鄙视。

即使今天出于其它原因由某些政党所提出的论断认为对乐于加入帝国摇摆不定的态度归结为帝国对联邦某些主权的干涉也是不真实的。在整个所需缴纳的费用和现在的数目依然相同的情况下，假定帝国不扩展其权限恐怕人们也不会相信各个联邦对帝国的爱戴会变得更多。相反：即使是各个联邦今天承担起帝国为了满足受奴役的苛刻条件所需要的全部费用，那么加入帝国的喜悦也未必就会变得更大。各个联邦向帝国所应缴纳的款项不仅只是很难支付的，而且必须得用强制执行的方法

来进行征收的。因为共和国毕竟是以《凡尔赛和约》为依据，既没有勇气也没有任何打算去撕毁这个条约，那就只得考虑去履行条约了。而负有责任的则又是那些不断地用联邦独立的必要性去劝说耐心的选民，同时又要要求去支持一种完全不可避免地必然会导致那怕连最后所谓的“主权”都会丧失掉的帝国政策的政党。

所以，我不得不说，那是由于腐败的内政外交政策，对于今天这个帝国来说完全没有可能承担得起其的沉重负担。即使是这样，问题也会接二连三地出现，因为帝国通过其对外代表德国利益的犯罪行为给自己所带来了新的债务则必须通过其自上而下更加强硬的高压政策在国内来进行偿还，而这就一再要求逐步地取消所有联邦的主权，为的是在主权的本质方面不让反抗的因素复活或者存在。

所以，今天的帝国政策相对于从前在本质上的区别就在于：以往的帝国对内实行自由，对外展示自己的强势，而现在的共和国对外表现软弱，对内压迫人民。这两种情形则造成了另外一种情形：强盛的民族国家由于有公民的爱戴和忠诚对内则不需要太多的法律，而国际主义的奴隶制国家只有通过暴力才能使其臣民去服劳役。毕竟今天的统治者最厚颜无耻的行径之一就是谈论什么“自由公民”。只有过去的德国才有这样的人。作为外国奴隶殖民地的共和国是没有公民的，而顶多只有臣民。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国旗，而只不过是一面通过官方命令和法律规定而采用和看管的防护面具罢了。这种感觉就像是格斯勒帽子一样的德国式民主的标志因此在我们民众心中同样也感到陌生。在执政期间对传统没有丝毫情感，对过去的伟人毫无敬畏之心并对其象征还进行诽谤的共和国当时就很惊讶地发现其臣民对共和国的标志表现得是怎样地不屑一顾。共和国给德国的历史赋予了幕间插曲般轻松的特点。

所以，这个国家今天为了自己的生存就得不断地去削减各个联邦的主权，而且不仅出于一般物质方面的考虑，而且还在精神方面。因为当这个国家通过其财政方面的剥削政策吸尽了民众最后一滴血的时候，就不得不还要尽力去剥夺他们最后权利，如果不这样的话，那么民众普遍的不满终究有一天会酿成声势浩大的反抗。

而对于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来说，以上的内容相反则给出了以下的基本原则：一个对外最大限度地捍卫和保护自己人民的利益，对内给予人民自由的强大的民族国家是不必担心国家的稳固的。而另一方面，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政府本身要是在不损害国家观念的情况下，严重地侵犯了不论是个人自由还是联邦自主，那么当这个人在这些政策中认识到了如何使自己的民族变得强大的办法的话，国家要为此承担责任。

当然，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内部机构都会逐步走向统一的。即使是德国也不例外。今天谈论各个联邦的什么“国家主权”简直就是胡闹，因为实际上这些联邦连国家那可笑的样子都没有。不管是交通领域，还是管理技术水平，这些联邦都很落后。先进的交通，现代化的技术会使距离和空间不断地缩短。所以这样的话从前的国家在今天看来更像是一个省，而现在的国家在从前就像洲际大陆一样。纯粹从技术上看，管理像德国这样一个国家的难度也就不会比 120 年前领导诸如勃兰登堡地区那样困难了。克服从慕尼黑到柏林之间距离上的困难在今天看来比 100 年前从慕尼黑到施塔思贝格要容易的多。并且整个国家的疆域由于交通技术水平的原因也比任何一个拿破仑战争期间的中等德国联邦要小得多。谁要是想隐瞒这个事实的结果就是落后于时代了。这种人在各个历史时期，即使在将来也都是存在的。但他们是无法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也绝不会使其停止的。

而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却不能盲目地忽视这样的事实。即使是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的空谈也不会说服我们。我之所以用空谈这个词，那是因为这些政党本身就完全不是真正地相信实现他们自己目标的可能性。其二他们自己则对今天形势的发展负有并且必须承担主要责任。尤其是在巴伐利亚取消中央集权制的呼声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没有进行过任何严肃地深思熟虑的政党行为。而现在，当这些政党必须真正地认真面对他们所说出的空话的时候，他们则无一例外地怯怯地哑然失声了。而帝国对巴伐利亚联邦所谓“主权的窃取”事实上也没有任何的反抗能力，只

不过是令人生厌的狂呼乱叫罢了。是的，如果有一个人真地敢于向这种荒谬的社会制度宣战的话，那么这个人就会被这些政党指责和诅咒为“不应该在今天这个国家存在的人”，并且一直被跟踪到把他要么投入监狱，要么用一道违法的演说禁令来封住他的嘴。对此，我们的拥护者想必大都很了解所谓联邦制内在的欺骗性。就像有些宗教一样，联邦制的观念对于他们来说常常也不过是获得政党肮脏利益的一种手段而已。

所以，国家某种形式的统一自然就很明显地表现出来了，特别是在交通领域，因而对于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来说也就有责任在今天这个国家里表示最尖锐地反对，也就是反对那些庇护并且能够实现灾难性外交政策的措施。正是因为现在国家所谓对铁路、邮政、财政等等收归国有的政策并不是出于崇高的民族政治的意图而进行的，而只是为了在手中掌握无止境地履行赔款责任政策的一种手段和抵押，所以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就必须尽一切所能来防止，并在可能的情况下阻止这项政策的实施。因此，反对现在国家对与国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必要设施进行集中管理只是为了战后政策把上百万的款项和抵押物品给外国变成流动资金的斗争也包括在内。

出于这个原因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就要对这样的企图表示反对。

第二个促使我们反对这种中央集权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会使得国内政府机构的权力得以巩固，而由此所产生的后果会给德意志民族带来最为沉重的灾难。而目前犹太人所操纵的民主国家才成了德意志民族的真正厄运，并企图通过要使其彻底失去意义的压制手段而使得针对这些还没有全都满足于这种时代精神的各个联邦的批评失去作用。与此相反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则有一切理由去尝试不仅给予这些联邦的反对派能够预示成功的基本的国家权力，而且还要使其反对中央集权的斗争完全表达出其崇高的德意志民族的普遍利益。当巴伐利亚的人民党出于其心胸狭隘的小邦割据思想观念来为巴伐利亚联邦争取获得“特权”的时候，我们则要这个利用反对现在的十一月民主来体现崇高民族利益的特殊时机。



我们决定反对当时中央集权的第三个原因，就是我们认为大部分所谓的国有化实际上不是为了什么统一，也绝不是什么简单化，而在更多的情况下只是攫取各个联邦政府机构的权力，为的是给革命党的利益打开大门。在德国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像在民主制度的共和国里奉行比这更加可耻的任人唯亲政策的时候了。而今天对中央集权所产生的愤怒大部分都要怪罪那些从前曾经答应给有才能的人们以发展前程，而所看到占据官职要位的只是些党羽亲信的政党。特别是自共和国成立以来犹太人难以置信的数量涌入了经济部门和管理机构，并伙同国家来共同攫取财富，以至于今天这两个地方都变成了犹太人活动的地盘了。

尤其是从第三点内容方面的考虑，我们必须从战略理由出发，有责任对任何导致中央集权的措施进行最严厉的审视，在有必要的情况下要表示反对。但我们始终要出于高尚的民族主义政治观点，而绝非是可耻的小邦割据的念头。

最后一点的提醒很有必要，这是为了不让我们的拥护者们产生出就好像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不同于各个联邦那样向国家允诺代表崇高的国家主权似的那种想法。对于这项权利不应该也不必对我们有任何的怀疑。因为对我们来说国家本身只是一种形式，其本质，也就是说其内含即是国家与民族，所有一切权力都隶属于国家主权的利益。我们尤其无法赞同的就是，在国家内部的以及代表国家的联邦具有某种强权政治和国家主权。各个联邦相互商讨所谓能够对外代表国家的胡作非为要必须停止，而且要立即停止。只要这种行径还有可能进行，那么当外国对我们国家内部的稳固表示怀疑并有相应举措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有什么惊讶了。这些人的为非作歹除了更多地造成损失而没有丝毫益处。连一个德国人在国外的利益都不能够得到本国驻外公使的保护，那么在当今这个显得可笑的世界秩序下就更无法通过驻外公使来代表一个小国的利益了。在这些联邦里人们真正可以察觉到某个国家非常特别想看到的能够瓦解德国内政外交企图所攻击的薄弱环节。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也

不要对此理解为一个年老体弱的贵族把驻外公使的职位给他那些大都已经变得瘦弱不堪的子孙以新的机遇。我们在国外的外交形象在以往帝国的时代已经变得如此的糟糕，以至于要继续使用当时所形成的经验也就变得非常地多余了。

各个联邦的重要性在将来应该更多地转移到文化政策方面。而为巴伐利亚的重要性做得最多的君主也并不是一个执意要反对德国的分裂主义分子，而更多地则是一位具有大德意志观念、极具艺术鉴赏力的路德维希一世。同时他首先举全国之力确立起了巴伐利亚的文化地位，而不是去加强其强权政治，而他这样就取得了再也不可能比这更好和更持久的成就了。在他把慕尼黑从当时一个不起眼的偏远都城提升为德国伟大的艺术大都会的同时，还创造了一个自己在今天仍然在本质上不同于法兰克人依赖于这个国家的精神中心。假如慕尼黑仍然保留以前的样子，那么在巴伐利亚就会重复在萨克森所发生的事件，只不过其区别就在于巴伐利亚的莱比锡、纽伦堡不再是巴伐利亚的了，而成为法兰克人的城市了。并不是高喊“打倒普鲁士”的示威者让慕尼黑变得伟大，而是慕尼黑的重要性赋予了这座国都王城理应收到的重视和尊重，并且也确实受到了应有的重视和尊重，而正是他才把艺术珍宝赠给了这个德意志民族的城市。这也给了未来提供了一个样板。那就是将来联邦的重要性并不取决于国家政权和强权政治，我认为也不取决于种族和文化。恐怕只有时间才能起到两边平衡的作用了。现代化便利的交通把人们如此密切地联在了一起，以至于使种族的界限都渐渐地而且不断地消失了，并且其文化面貌也由此开始逐步地接近了。

但军队则完全要严格地远离所有各个联邦的影响。未来由国家社会主义思想所建立起来的国家也不应该对过去的错误重蹈覆辙，并且不要强加本不属于而且是完全不属于军队的使命。德国军队并不是一所保持民族特性的学校，而更多的是要培养所有的德国人去进行相互理解和互相适应。有别于国家日常生活中的东西应该就是军队所起到的团结作用。另外还要应该把一个年轻人从其狭隘的地方观念中提拔出来并使其

融入到德意志民族当中去。他不是只学会看到其家乡的大小，而且还要必须学会看到祖国的疆域，因为这才是他所必须要去保卫的。让这个德国青年呆在家里是毫无意义的，而要在其服役期间向他展示整个德国。所以现在更有必要的是让这个年轻的德国人不再像从前那样四处闲逛了，而要拓展他的视野。如果能够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在有可能的时候，就让巴伐利亚的年轻人不要只呆在慕尼黑，不要让法兰克人只呆在纽伦堡，不要让巴登州的人只呆在卡尔斯鲁厄，不要让符腾堡人只呆在斯图加特等等就不是那么荒唐了，并且还要让巴伐利亚的年轻人能够看到莱茵河或者是北海，向汉堡人展示阿尔卑斯山，把德国的中部山脉介绍给东部的普鲁士人诸如此类的做法不是更加合理吗？家乡的特征可以保留在军队里，但不要表现在驻地中。任何中央集权的企图都会对我们进行指责，但绝不要指责军队！相反我们不会欢迎这种我们必须感到高兴的企图。完全被忽视的就是现在的国防军内还保留着各个联邦部队是很荒谬的。那我们在接下来统一国防军，重新组建人民军队的过程中就不要放弃这一步骤。

另外一种新兴的、必胜的思想必将要摆脱妨碍其思想观念前进行动的任何束缚。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原则上也必须使用其权力毫不留情地让全体德意志民族接受其理论原则，并让其思想观念传遍到目前各个联邦的范围内。所以正如教会感觉到能够无拘无束地、无边无际地穿越政治界限一样，我们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也能够逾越我们祖国各个联邦的界限。

国家社会主义学说不是服务于各个联邦政治利益的，而是应当成为当时德意志民族的主导思想。这个学说可以决定并且革新一个民族的生命，并且因此只有必须迫切地使用超越拒绝其发展界限的权力。

这种思想所获得的胜利越充分，那么每个人的内心所能够感到的自由也就会更加明显。



第十一章 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

1921年对于我和这场政治运动来说在许多方面都是有着特别重要意义的。

在我加入了德国工人党以后便立即接受了领导宣传方面的工作。我认为这方面的工作在当时是极其重要的。首先组织工作方面所脑筋的问题就要比向多数人进行思想方面的宣传工作要少得多。宣传工作必须要赶在组织工作的前面，这样才能为宣传工作赢得相应的群众。就连我自己也成了草率和迂腐的组织工作的敌人。因为这常常只会产生出一种死板的自动运行机制，而很少是活生生的组织工作。组织工作毕竟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组织工作的存在要以其生机勃勃的发展来决定。而被一部分人所理解掌握的思想观念则要按照某种组织秩序在其组织内部体现出巨大的价值所在。因此至少在开始的时候就要考虑到误导人们本能地去抵触优秀人才的人性弱点。即使是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组织也存在着某个一旦得到任命而自己本身还不完全明白，也许还缺少工作能力的人出于嫉妒试图去阻挠组织内部有才能的人提升的极大危险。而这种情况所产生的损失尤其是对于整个新兴的政治运动来说只能是起到灾难性的后果。

由于这个原因，一种思想观念首先应该有目的地在一段时间里从一个中心出发通过宣传来进行传播，然后还要按照领导人的意见去仔细地寻找和审查逐步聚集起来的群众。这样有时还可以发现本身不起眼的人反倒可以成为天生的领袖人物。

想要在理论知识的宝库中去发现领袖人物的品质及其领导才能的

特殊依据肯定是完全错误的。

相反的情况则时常出现。

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伟大的理论家同样也是优秀的组织者，理论家和纲领制定者之所以伟大，首先是因为他们能够对真实的规律做出抽象的认识和判断，而组织者则首先必须要是个心理学家。因此他就是根据一个人原本的模样来认识了解这个人。就像这个人在人群中很少受到重视那样，他也尽量不要过高地去评价这个人。相反，他必须试图去关注这个人的弱点和残暴之处，为的是在考虑到所有因素的情况下塑造出一个有强壮和旺盛力量，并且还要适合于具备某种思想和为其思想开辟成功道路的活生生的形象。

一个著名的理论家同样也是一位伟大的领袖则更是少有。更多的则只不过是些煽动家，很多学者只从事科学问题方面的研究工作而不愿意听到外面的声音，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一个煽动家要展示他的能力那就要看他能否向广大民众传播思想，而他则必须是一个心理学家，甚至还是个民间领袖。但至少他也比不通人情、消极避世的理论家更适合做一个领袖。毕竟领袖就意味着能够鼓动群众。理论创造的天赋和领袖的才能完全没有关系。对确定或者实现人类理想和人类目标哪个更加重要的争论是多余的。这种现象在生活中常常会发生：一种事物在另一种事物不存在的情况下则变得毫无意义。最完美的理论观点如果领袖人物不让民众在政治运动中进行贯彻那也是毫无用处和没有价值的。相反，如果聪明的理论家不确立人类斗争目标的话，那么所有领袖的天才和领袖的一切激情又应该是些什么呢？而最少见的则是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一个人同时具备理论家、组织家和领袖的才能，而这种结合就会创造出伟大的人物。

当我在开始参加政治运动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要投身于宣传工作了。宣传工作就是要使一小部分核心成员逐步能够接受新的理论学说，并培养出能够为将来的运动组织提供最基本的成员。所以宣传工作的目的往往就要比组织工作的目的更加重要。

如果一场政治运动具有要去摧毁一个旧世界并取而代之建立一个新世界观点的话，那么其领导阶层就必须完全明白以下原则：任何一场政治运动都要首先把所赢得的群众分成两大类：追随者和组织成员。

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获得追随者，组织工作的任务就是争取组织成员。

一场政治运动的追随者是自己去认同政治运动的目标，而组织成员则是为运动的目标而奋斗。

追随者是通过宣传工作而对政治运动产生共鸣，而组织成员则是通过组织工作的安排，自己参与到争取新的追随者的活动中并从这些追随者当中又重新受到培训而成为组织成员的。

因为追随者只是被动地认同某种理论学说，而组织成员则要求主动代表和捍卫某种思想观念，所以在十个追随者当中常常顶多也就碰上一到两人会成为组织成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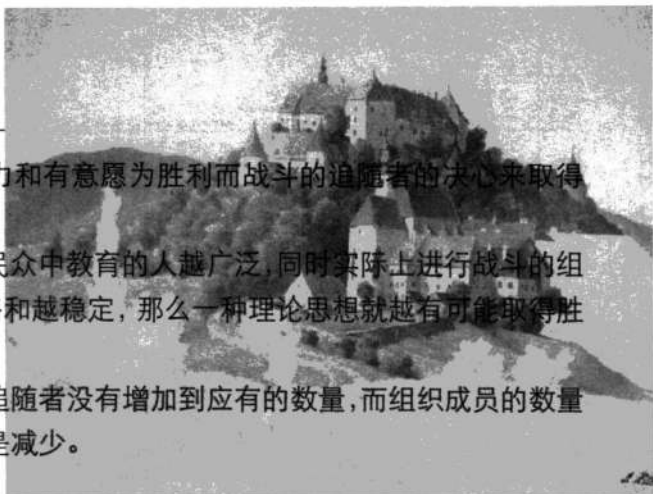
追随者产生于领悟，而组织成员则源自去代表其所领悟到的东西并且加以继续传播的信心。

在被动的情况下去认识事物适合于大多数懒惰和胆怯的人们。而组织成员则主动地去进行思考，而这只有少数人才能做到。

因此，宣传工作就必须考虑到要坚持不懈地去赢得思想的追随者，同时组织工作则必须竭尽全力注意到追随者当中的优秀分子并使其成为组织成员。所以宣传工作也就不需要对其所教导的每个人的重要性、能力、本领、理解力或者个人品质而伤脑筋，因为组织工作是从广大民众中谨慎地去征集那些能够使政治运动真正取得胜利的人们。

宣传工作是试图让全体民众接受一种理论学说，而组织工作则只需要在组织范围内抓住那些不是出于心理原因要去阻止这种理论学说继续传播的那些人。

宣传工作是按照理论思想的含义去教育全体民众并使其为取得胜利的那一刻而做好准备，而组织工作则是通过不懈的、有组织的、具有



战斗力并表现出有能力和有意愿为胜利而战斗的追随者的决心来取得胜利。

宣传工作在全体民众中教育的人越广泛，同时实际上进行战斗的组织工作越独特、越严格和越稳定，那么一种理论思想就越有可能取得胜利。

这样的结果就是追随者没有增加到应有的数量，而组织成员的数量却很轻易地增加而不是减少。

如果说宣传工作可以让全体民众去了解一种新的理论学说的话，那组织工作的结果也不过是只获得了少数几个人。所以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即追随者和组织成员因此有某种相互对立的关系。宣传工作做得越出色，组织工作就越无足轻重，并且追随者数量越多，组织成员的数量就越少，或者反过来说：宣传工作做得越糟糕，组织工作就越重要，政治运动追随者的群体越小，如果还要期望取得胜利的话，那么组织成员的数量就必须越庞大。

宣传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为今后的组织工作去争取民众，而组织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为了能够继续进行宣传而赢得民众。宣传工作的第二项任务则是对现有的社会状况进行瓦解并且贯彻新社会的理论学说，同时组织工作的第二项任务则是争取权力，以便能够使新的理论学说取得最后的胜利。

只有当一种新的世界观尽可能地对所有人进行宣讲，并在以后有必要的情况下还要进行强化教育的时候，同时思想方面的组织工作，也就是政治运动应该好像是占领一个国家的神经中枢那样绝对有必要去获得更多人的时候，为世界观而进行的革命才会赢得决定性的胜利。

也就是说：任何一场给世界带来巨大变革的政治运动必须首先要通过宣传工作来传播其政治运动的思想理论。宣传工作就是要坚持不懈地试图向其他人阐明这种新的思想，并把他们拉到自己的阵营里来或者使他们对自己目前的信仰产生怀疑和动摇。因为只有理论思想的传播，也就是宣传工作理直气壮的时候，那么这种理论思想才会形成稳定的组织

工作。组织工作是针对那些从通过宣传工作而赢得的普通追随者当中产生出来的组织成员。宣传工作进行得越深入，组织成员成长得就越迅速，并且宣传工作进行得越完美，作为后盾的组织工作就越强大有力。

因此，组织工作的最高使命就要考虑到任何形式组织成员内部的不团结而导致政治运动的分裂，并且因此而削弱组织工作，还有，坚定的战斗精神不至于萎靡，而且还要不断地受到振奋和得到加强。因此组织成员的数量不需要毫无止境地增加，相反：因为只有少数人才具有英勇果敢的气质，所以一场在组织形式上无限扩大的政治运动总有一天也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削弱。组织成员超过一定数量的政治运动组织会逐渐失去其战斗力，并且也就不能坚定有力地支持和进行理论思想的宣传工作了。

一种理论思想越是伟大并且在精神上越富有革命性，那么其组织成员就越会积极主动地远离那些可耻和胆怯的小市民，他们好像显得也适合这样做，因为对于理论思想的代表来说总带有某种变革力量的危险性。作为运动的追随者他们暗自能够感觉到这一点，但是作为组织成员他们在公开场合下却拒绝承认这一点。所以一个真正具有变革思想的组织只从通过宣传所赢得的追随者中吸取最积极活跃的分子作为其组织成员。而为了实现其理论思想所继续积极地进行宣传工作甚至取得斗争胜利的前提条件恰恰就取决于这种正常挑选出来的组织成员切实有效的活动。

能够威胁一场政治运动最大的危险就是在异常迅猛增加组织成员方面所获得的成功。因为即使是对于一场政治运动来说，只要还特别必须避免和那些生性胆怯和自私自利的人进行严酷斗争的话，通常都需要迅速获得组织成员，尤其当通过发展壮大兴许会成功地成为一个政党或者具备一个政党特征的时候。

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胜利在望的政治运动在取得胜利之前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最终圆满实现愿望之前，出于无法解释的、内在的软弱突然退而停止战斗并且最后消亡的原因所在。正是由于其最初的胜利所以才会有许多道德败坏、有失体面，甚至是胆小怯懦分子加入到运动组织当

中，以至于这些坏蛋会变得强大并且还会取得优势来迫使政治运动服务于他们自己的利益，使得政治运动的水平降低到他们那种没有什么英雄主义气概的程度，并取得根本无助于原来理论思想的圆满成功。因此狂热的目标消失了，战斗的意志麻痹了，或者正如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通常所正确表达地那样：“现在连酒里也都掺水了。”那么就连树都肯定再也无法长成参天大树了。

因此，从维护一场政治运动自我生存的本能以及取得胜利的目的出发，就很有必要立即停止招收组织成员，并且今后要非常谨慎地在严格审查之后才可以扩大组织规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保持运动核心的活力和健康。必须要考虑到这个核心组织还要继续领导这场运动的发展，也就是说宣传工作必定应该得到普遍的认同，并且有权为理论思想变为现实而采取必要的行动。

以往运动中的基本骨干力量不只是一要占据所有部门的重要岗位，而且还要担任全面的领导工作。并且要一直持续到现有政党的基本原则和理论学说成为新建国家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内含为止。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地将从政治运动的精神所诞生出来的国家宪法掌握在手中。而这种情况通常只会再次发生在相互间的争斗过程中，也许这正是从一开始就应该认识到，但一直没有得到引导的、作为人类游戏和活动能力来说很少涉及到人类判断能力方面的问题。

所有大规模的宗教或者是政治运动要取得巨大的成功就要认识到并且还要运用到这些基本原则，而不顾这些原则想要不断地取得胜利的话那完全是无法想象的。

作为这个党宣传工作的领导人，我不仅要尽力为今后运动的规模奠定基础，而且还要在工作中通过激进的观点来发挥作用，这就会使运动组织获得最好的成员。因为我所进行的宣传越是激进和强烈，就会吓退更多的病秧子和胆小鬼，并且还可以阻止他们涌入我们组织最初的核心中去。他们也许只是一些运动的追随者，可出于某种原因不但没有大声

地讲出来，而且还胆战心惊地隐瞒这一事实。当时就有数以千计的人们无法向我保证，他们自己本身好像对一切都完全赞同，但无论如何就是不加入组织。这场运动变得如此地激进，以至于加入组织也许会给每个人招致最严厉的指责，也就是会遭到危险，因为人们是不会责怪品行端正、和和气气的市民，即使是他们是全心全意地加入了组织，至少也还可以暂时袖手旁观的。

而且这样也很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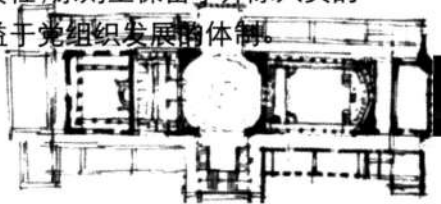
如果当时这些从内心就不支持革命的人们全部加入到我们党组织的话，尽管他们是党员，那么我们今天也只能把他们看作是好朋友，不再是为了这场新兴的政治运动而战斗的兄弟。

我当时赋予宣传工作生动而又大胆的方式使得我们的政治运动带有激进的倾向，所以除个别情况外，实际上我们现在则只招收激进的人加入组织。

同时这种宣传工作还要做到在短时间内让成千上万的人们不仅从内心支持我们的观点，而且还要期待着我们能够取得胜利，即使他们本人还很胆怯为此去做出个人牺牲或者完全对此表示赞同。

直到 1921 年中期这种招收人员的工作还是足以应付运动的需要的。特别是在这一年的盛夏期间所发生的事情就说明了宣传工作渐渐显露出来的成就很适合于组织工作，并且和组织工作具有同等的重要意义。

一伙民族主义的幻想家企图在当时党主席的支持下取得领导地位，而这个小小的阴谋诡计失败了，并且在一次全体党员大会上一致同意将这场运动的全部领导权力转交给我。同时还表决同意一项新的章程，章程规定党的主席对政治运动负有全部的责任，原则上保留了开除人员的权力，并从此取而代之以能够保证最有益于党组织发展的体制。



自 1921 年 8 月 1 日起，我就开始了进行组织内部的重组工作，同时还得到了一些我认为有必要是特殊组织成员的优秀党员的支持。

我将宣传工作的成果应用到组织工作方面，并且因此而固定下来所进行的尝试就必须清除掉一系列沿用至今的习惯做法而采用现在其它政党所没有的并且当然也不会赞同的准则。

1919 年至 1920 年期间全体党员大会决定选出一个委员会来领导这场运动，也再次对大会本身制定出了规章制度。委员会由一名会计和一名出纳员，一名一等和一名二等书记员，作为领导是第一和第二主席组成。另外还有一名组织方面工作的干事，宣传负责人和其他方面的负责人。

有趣的是，这样一个委员会所代表的竟然是这场运动本来想要极力反对的东西，那就是议会制。因为很显然这里所涉及到的就是一种从最小的地方组织，通过以后的市区、县城、联邦直到国家领导机构所代表的整个体系的原则，而我们大家过去和现在都还在忍受其害。

如果这场政治运动不应该由于这些组织内部糟糕的基础继续腐化下去，并且因此而没有能力足以去完成其从前崇高使命的话，那么就非常有必要在有一天对此进行转变。

由大多数成员同意和决定所形成会议备忘录的委员会实际上就成了一个小规模的议会。同样这里缺少的还是个人的责任和职责。同样这里也像庞大的代表国家的机构那样被同样的荒谬和同样的愚蠢来操纵着一切。人们根据委员会的决定任命了书记员、负责财务的出纳员、负责党员的组织干事、负责宣传工作的人，天知道还会有些什么人，但他们对每个问题却要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决定。也就是说负责宣传方面工作的人却要去决定负责财务人的事情，而这位负责财务的人又要去决定组织工作方面的事情，而他还要去决定书记员所应该照料的事情，等等。

为什么人们要对一个负责宣传工作的人或者是出纳员、书记员、组织干事等等所应该负责的事情来做出判断，这对于一个有着健康头脑的人来说同样是无法理解的，而这本来就是无法让人理解的，就像是在一

个大型工业企业中必须由其它部门或者行业的董事会或者设计人员来决定和他们自己的事务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的问题一样。

我无法忍受这种愚蠢的想法，不久就不参加会议了。我只干自己的宣传工作，其它的事情一概不管。同时也不让任何一个无能之辈企图来干涉我分内的事务。相反我也不去理会别人的闲事。

当新章程得到通过并且任命我为党的第一主席同时还赋予了必要的权力和地位的时候，这种胡闹的做法也就立即结束了。并采用完全负责的原则来取代委员共同决议的办法。

第一主席负责整个运动的领导工作，并将所需进行的工作安排给隶属于他的委员会成员以及分配给相应的工作人员。每个人都要对所承担的任务进行负责。每个人都要服从于考虑全局或者说是通过个人的选择和一般规章制度的发布来决定相互间合作的第一主席。

这种完全负责的原则渐渐在运动组织内部得到了理解，至少在党的领导方面是这样的。而在那些小的地方组织里，也许在县城和城市里的组织里恐怕要一年的时间才会贯彻这样的原则，因为天生的胆小如鼠和无能之辈总是会表示反对的，单独让他们对组织进行负责常常会让他们感到很不舒服，而如果对一项重要的决定能够得到一个所谓什么委员会大多数成员支持的话，那么这些人会感到更加自在和安逸得多。但对我来说则很有必要对这种想法表示出最为严厉反对意见，在责任面前不会对胆怯表现出妥协，即使是过很长时间以后才能够认识到那些真正受到任命和选举出来的领导人的责任及能力。

但无论如何反对议会制那种胡思乱想的政治运动本身都要从议会制度中脱离出来。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才会有战斗力。

一场在一个时期里由大多数人进行领导的，不仅所有人而且每个人自己基本上都以领袖的观念为原则，并且由此而形成责任感的政治运动肯定有一天会克服目前的困境而走向胜利的。

这种观点导致了对组织内部的全面重组。而理所当然的效果就使得

运动的公务活动和日常政治的领导工作明显地分开了。这种负责的观点基本上也延伸到了整个党务活动中了，那就是在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地朝着一种健康的、脱离政治影响，并着眼于纯粹经济观点的方向转变。

当我在 1919 年来到这个当时只有六个人的小党时，他们既没有一个办公室，也没有一名办事员，就连一份表格或者一枚印章也没有，更没有什么印刷品。委员会的办公地点还在海恩大街上的旅店里，后来又搬到了位于加斯太克的咖啡馆。这种状况简直不可想象。当我投身于这场运动之后，就在慕尼黑的许多饭店和旅馆中间寻找一个专门的房间或者另外的地方，以便我们党组织可以租用。以前在山谷中的斯特奈克大街上有一间带拱顶的房间，原来这里曾为巴伐利亚的帝国参议员们当作小酒馆来使用的。这里昏暗、阴森，倒也符合以往的那种气氛，恐怕也不会有人想到再有利用价值了。透过唯一的一扇窗户可以吹进来的一点点空气，即使是在最晴朗的夏天这个房间都是阴暗和昏沉的。而这里就是我们第一个办事处。因为这里每个月的租金只有 50 马克（而这当时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笔巨款了！），所以我们就不能提出更多的要求，也无法抱怨在我们搬进来之前尽快把原来给帝国参议员所使用的护墙板拆掉，以便这里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比起办公室来倒更像是一座坟墓。

不过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了。我们逐渐也有了电灯，还接上了电话，一张书桌和借来的几把椅子，以后又有了一个文件架，然后又添了个书柜，两个原来主人摆设餐具的柜子我们就用来放传单和宣传海报之类的东西了。

而现在的活动，也就是说每个星期举行一次的委员会对运动活动的领导也就难以持久了。只有一名由运动组织发薪的职员还在维持组织的日常工作。

当时的情况是很艰难的。运动组织成员还很少，而且在他们中间找出很少去满足个人要求，而可以满足政治运动多方面需求的合适人选的确是一种本事。

经过长时间寻找之后，终于找到了一名士兵，也是我以前的战友舒斯勒来当我们党的第一任党务负责人。开始的时候他每天六点到八点到我们新租的办公室来，以后则是五点到八点，再后来每个下午都来，不久后他就整天从早到晚工作了。他努力工作，诚实正直，勤勤恳恳、忠于组织。舒斯勒还把自己的一台小型鹰牌打字机带到办公室来使用。这是我们这个组织使用的第一部办公器械。以后则通过分期付款的办法买下了这台打字机。好像还需要一个小的保险柜来存放党证和党员登记表，以免被盗。买保险柜则不是为了存放大量的现金，当时我们只有很少的现金。相反，一切都还很简陋，而我还常常拿着我那少得可怜的存款来进行补贴。

一年半以后这里就显得很小了，所以就搬到了科纳留斯大街上新的办公地点了。我们搬进去的也是一个旅店，不过这次我们不再只租一个房间，而是租了三间办公室，另外还有一个接待大厅。在当时这对我们来说就已经很气派了。就这样一直持续到了1923年的11月。

1920年12月我们就买下了《人民观察家报》。这个一般从名字上就可以知道代表人民利益的报刊现在变成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机关报了。开始的时候是每星期出两期，到1923年年初就改为了日报，并且到1923年8月底就更换为以后醒目的大版面了。

当时我作为一个报业领域的新手有时还不得不花点倒霉的学费。

而面对犹太人的庞大新闻机构竟然几乎没有一家真正人民意义上的报纸这一事实本身就值得人们去深思了。正如我经过多次实践所做出判断的那样，这实际上很大部分完全是因为很少开展所谓民族事务的经营性活动。而他们往往会产生出精神思想必须要走在工作业绩前面的想法。只认为精神思想不是用于去进行表达的东西，而只是在工作中才能得到最好表现的观点就是完全错误的。谁要是为了他的民族做了真正有价值的事情，那么也就因此而表现出了有价值的精神思想，而其它那些伪造的思想，实际上对民族并没有做出什么有用贡献的人才是真正精神上的祸害。同时也给大家造成了精神上的负担。

即便是《人民观察家报》，从名字上就已经说明了是所谓“人民”的机关报，也具有国家机关所有的优点，但更多地则是有着其缺点和弱点。就报刊的内容而言很正派，但其管理机构简直就是商业性质的。并且其管理机构的基本观点就是既然是人民的报纸就得靠大家的捐赠来进行维持，而不用和其它报纸去进行什么竞争，并且想要用好心的爱国人士的捐赠去遮掩报刊经营方面的疏忽大意或者缺点错误也是不正当的行为。

当我认识到了他们的想法，那无论如何都要尽力去消除这种状况，并有幸让我结识到了一个人，从那时起他不仅是报纸的业务主管，同时也是党务负责人，并为我们这场运动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1914年在战场上的时候我就认识了现在是党务负责人（当时他还是我的上司）的马克斯·阿曼。在四年的战争期间我有机会几乎是不间断地去了解日后这位同事的卓越才干、勤奋和细心。

1921年盛夏时节，当这场政治运动处于艰难阶段，而我则对许多的工作人员感到不满，并且还和个别人有过极不愉快的经历，我就去找这位有一天偶然遇到、以前的战友并请他担任党务负责人。因为他当时已经有了极有发展前景的工作岗位，所以迟疑了好久以后终于同意了，当然也提出明确的条件，那就是他不再听命于任何一个委员会里的无能之辈，而被公认为是唯一的负责人。

这位在经营方面真正受到过全面教育的第一任党务负责人取得了不可磨灭的成就，这给党组织的活动带来了井然有序和焕然一新。自那时起，我们党组织活动就成为了榜样，没有一个基层组织能够达到我们的水平，更谈不上要超过我们了。正如在生活中所常常发生的那样，卓越的才华总会引起嫉妒和怨恨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也是在预料之中的，也就只能去耐心地容忍了。

1922年的时候不仅在党务工作方面，而且在组织建设方面基本上就有了固定的规章条例了。并且已经建立起了对所有党员进行完整的、统一的登记制度。同时在筹措经费方面也步入了健康的轨道。日常开支

可以通过平日的收入来进行弥补了，特殊的收入只用于特殊的支出。尽管当时处于困难时期，日常的小笔费用开支都不成问题并且基本上没有债务了，甚至由此还做到了收入在不断地增加。这就像在一个私营企业一样：职员自己是通过工作成绩来得到相应的报酬而绝不能只靠什么闻名的“思想”来任职的。我们每个国家社会主义者的思想首先是通过其完成人民所委任工作应取得的成绩所表现出的献身精神、勤奋和才能来得到证实的。谁要是没有履行他的职责，那么他也就不应该炫耀他自己实际上所违背的思想。而对于党务负责人来说，他要顶住所有可能出现的影 响，以最大的力量来代表其立场观点，党务工作不可以是给那些不怎么喜欢工作的追随者或者组织成员的清闲差事。一场以最严厉的方式为反对我们当今的管理机构政党式的腐败堕落而战斗的政治运动必须要使自己的组织机构远离这些恶习。

于是就出现了所招收的报社管理部门的职员原本还属于巴伐利亚人民党的思想水平，只不过从工作成绩上看还算是够格的情况。这种尝试的结果一般来说还是很显著的。而这恰恰就是因为我们的组织通过对每个人真正的工作成绩给予公正和公开的认同则比起其它状况来说更能快速和彻底地赢得职员们的心。以后他们便成了优秀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了，但这也并非只停留在口头上，而是通过他们全心全意地为我们的组织认真、有序和负责地工作得到了证实。当然合格的党员同志要比同样优秀的非党员同志要优先录用。只是没有人是因为其原来党组织的原因而得到聘用的。这位新负责人的坚定果敢表达出这种基本原则并且逐渐用于去抵抗一切阻力，而且以后对我们的运动有很大的用处。只是在艰难的通货膨胀时期，有上万家企业不得不倒闭，数千家报纸只得关门的时候，我们的运动组织不仅坚持了下来，还能够完成任务，而且《人民观察家》报还不断地扩大。并且还跨入了当时大报的行列。

另外，1921年的重要性还在于我逐步赢得了党主席的地位，来自委员会对各项党组织活动的指责批评也减少了。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要是为一项使命无法获得一个真正有能力的人，而总是让他去听那些好像什么都懂的无能之辈相互间的胡言乱语，那么实际上留下来的却是无法

收拾的烂摊子。当然这些无所不能的家伙通常在窥探到另一块可以让他们进行具有控制作用和激励效果活动的地盘后肯定会满意地离开的。有这样一种人，他们表面上有毛病，但人们会发现他们会以某种形式不断地孕育出优秀的计划、观点、项目和意图。他们最理想和最崇高的目标就是组建一个委员会作为监督机关来监视其它的行家所从事的井然有序的工作。如果一个不了解某一件事的人不断地去干涉真正专业人员的工作，这就是一种侮辱，也不是国家社会主义者的做法，这也许是委员会的成员失去理智了。为了免遭这些家伙的影响，这几年来我对运动组织中工作认真负责的人们进行保护，做他们的后盾，并把给予他们自由的工作空间来当作自己的职责。

而让这些无所事事或者实际上只会酝酿出无法执行的决议的委员会不再为非作歹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真正地去做些事情。但可笑的是这个委员会却悄然无声地溜之大吉并且突然找不着了。同时我想起了我们最大的机构帝国议会。如果不让这些议员夸夸其谈而给他们指派一项实实在在的工作，而且还是一项这些废话连篇的家伙每个人都应该承担的最起码的工作，那倒要看看他们是怎样突然从人间蒸发的。

我当时就已经常常要求在日常生活，同时在运动组织的每一次活动中必须去寻找，直到找到真正有工作能力和诚实可靠的公职人员、管理者或者是领导者。那么就自上而下给他们以绝对的授权和行动上的自由，同时他们要自下而上地承担完全的责任，这样除了这些适合于从事这项工作的专家以外，别人就不会得到授权了。在这两年的过程中，我一直在坚持我的观点，所以今天我们的组织至少在上层领导中间已经理解了我的观点。

坚持这种观点所取得的成就在 1923 年 11 月 9 日的结果就是：当我四年前来到这个组织的时候，他们连一枚印章都没有。而在 1923 年 11 月 9 日这个党被解散对固定资产进行查封的时候，所有财产以及报社本身就超过十七万金马克的价值了。

第十二章 工会问题

我们政治运动的迅猛发展迫使我们在1922年就要对一个即使到今天也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进行表态。

在试图去研究最早和最容易按照广大民众的心愿能够在这场运动中开辟出一条道路的计划时，我们时常会遭到指责，说只要我们在工作和经济方面，工人阶级的利益还把持在不同思想的人以及其政治机构的掌握中，那么工人阶级就完全不属于我们。

这种指责当然会有许多人赞同。按照一般人的理解，在一个工厂里上班的工人如果不是工会会员那就完全无法生存。不仅其工作上的利益，而且他在工厂里的职位也只能作为工会会员才会受到保护。大多数工人都加入了工会。这样他们才会在为工资而战的斗争中签订下确保其收入的劳资协议。无可置疑的是这样的斗争对工厂里所有的工人来说是有利的，并且对那些既想挣这份由工会争取来的工资，而自己又不想参与斗争，良心上处于两难境地的老实巴交的人来说尤其有好处。

和一般的资本家很难谈论这方面的问题。他们要么从实际方面的原因出发对此不理解（或者不想去理解），要么从道德方面也无法理解。最后他们还是无可避免地从一开始就考虑自己的经济利益，而反对隶属于他们的有组织的工人的见解。因此一般也就难以形成没有偏见的判断。正如时常会发生的那样，就会有必要转而去求助于那些不敢进行尝试，连眼前的东西都看不见的局外人了。然而这些人却故意地十分轻视这件对我们的今天和未来都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在上卷书里就已经对工会组织的本质、目的和必要性做了叙述。

在书里我所坚持的立场观点就是，只要不是通过国家的政策措施（而这种政策措施也往往都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或是通过普遍的新思想的教育的话，那么雇主对雇员的态度也无外乎就是根据所委任的职务保障其应有的权利，在经济生活中也作为协议一方来捍卫自己的利益而已。我所强调的是这种捍卫利益的表现绝对完全符合民族共同体的意愿，并且由此还可以阻止会导致严重危害整个民族国家的社会不公。另外我还要说明的是，只要在资本家当中还有那些不只是自己对于社会职责无动于衷，而且就连最基本的人权都没有那样的人存在，那么这种捍卫利益的必要性就必须要看作是正当的事情，并且我因此得出的结论就是，如果这种自我保护被认为是必要的话，那么其真正意义就只能是建立在工会组织基础之上的雇员观点的表达形式。

对于这个基本观点我在 1922 年没有什么改变。或许倒是必须对这些问题的立场观点找出某种明确的表达方式。这不仅涉及到对自己的认识感到满意，而且对所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也是有必要的。

需要对以下问题进行答复：（一）工会组织是必要的吗？（二）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本身也应该像工会组织那样进行活动或者说其党员也应该像工会会员那样进行活动吗？（三）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工会组织应该是个什么形式？我们的任务和工会组织的目的是什么？（四）我们怎样加入这样的工会组织？

我认为第一个问题已经得到了充分地回答。就目前的状况来看，我认为工会组织是完全不可缺少的。甚至工会组织在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中属于最为重要的组织机构。其重要性不仅体现在社会政治领域，而且一般还更多地表现在国家政治方面。因为一个通过正当的工会运动来满足其生活所需，同时还受到教育的民族，在为生存而战的过程中他们全部的抵抗能力也将会由此得到特别地加强。

工会组织尤其应当成为议会或者说联邦议院的组成部分。

第二个问题则可以很容易地进行回答。如果工会运动是重要的话，

那么很清楚的就是国家社会主义不仅再理论上,而且在行动上就必须表明自己的观点。只是如何进行解释倒是比较困难一些。

旨在实现国家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不容置疑地认为,未来民族国家的权力机构必须要产生于以往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本身。而如果只相信不过是突然间掌握了能够进行某种改革的权力,而缺乏在思想理念上事先受到教育的大众基础的话那就大错而特错了。这里就说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以某种形式所表达的精神思想往往要比机械和快速建立起来的表达形式要重要得多。比如人们兴许可以把命令式的领袖原则强行进行传达。而领袖原则只有当其自我发展的过程中在小范围内逐步形成,并且在严酷的现实生活中不断地进行持久的选择,以便在多年的时间里获得实施领袖原则所必要的领袖才能的情况下才可以行之有效。

要是从公文包里突然拿出一份新的国家宪法草案并且只靠着必须服从的自上而下的命令就能够进行“贯彻”的话,那简直是无法想象的。或许可以做一下尝试,但肯定是不会成功的,通常只不过是胎死腹中的结果。这倒让人想起了魏玛宪法的产生并且也曾尝试过赠给德国民族一部新宪法和一面新国旗,而这些东西则和我们民族过去半世纪的心理路程没有任何关系。

即便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也必须防止类似情况的发生。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只能从已经长期存在的组织中产生出来。这个组织本身原来就必须进行国家社会主义的组织活动,以便最终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

正如已经强调的那样,商业部的骨干分子大都是来自不同的职工联合会,尤其是来自工会组织。要是今后的联邦议员和国家议会应该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组织机构的话,那么这些主要的骨干分子也必须是国家社会主义思想观念的代表。运动的组织机构会过渡成为国家机关,但国家却不能一下子就从一无所有突然变出相应的政府机构来,即使是这些机构还不完全应该都是呆板的形象。

光是从这种最为崇高的认识出发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就必须承认自己工会组织活动的必要性。

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这样做的原因还有，因为在一个共同的国家里对不论是分属于对立双方的雇主还是雇员所进行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都无法通过理论传授、呼吁或者告诫，而是要通过为生存而战来进行的。所以这场运动要对他们或者通过他们必须来教育这个大型的经济团体组织，并使其接近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观点。要是没有这样的准备工作，那么任何重新组建国家的希望也就只是空想了。只有这场运动为之而奋斗的、具备伟大思想内涵的理想才能够逐渐形成从内心里感到好像是真正牢固可靠，而不只是草率地建立起来的新时代自己的风格。

所以，这场政治运动不仅要赞同工会组织的思想观念，而且还要为了将来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让大量的工会会员和追随者在实际活动中接受到所必需的思想教育。

对于第三点在以前的阐述中就已经做了回答。

国家社会主义的工会组织不是阶级斗争的机关，而是职工代表机构。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不知道有什么“阶级”，而在政治概念里只存在具有完全同等权利的公民和具有同样义务责任，但在政治意义上完全没有权力的国民。

按照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解，工会组织没有按照国家内部某一些人的决定去逐步推翻一个阶级，然后又联合这个阶级去进行反对类似国家内部组织机构的另一个阶级的斗争的使命。我们根本无法赋予工会组织这样的使命，而工会组织只有在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斗争工具的时候才会接受这样的使命。工会组织不是为了“阶级斗争”，而是马克思主义将工会组织打造成为一种用于阶级斗争的工具。马克思主义创造出了世界上的犹太人这种用来摧毁自由、独立民族国家经济基础的，消灭民族工商业并且以此来奴役自由民族以服务于犹太国际金融的经济武器。

与此相反，国家社会主义的工会组织则通过某些参与国家经济建设过程的某些组织团体成员，有组织的决定来提高国民经济自身的保障并增加其实力，通过不断地消除最终对民族国家产生破坏作用的，损害一个民族共同体也就是损害一个国家生命力的，但最后不会给经济本身带来灾难和破坏的一切弊端。


因此，对于国家社会主义的工会组织来说，罢工就不仅是一种摧毁和动摇国民生产的手段，而且还是通过和一切带有不符合社会需求特性、阻碍经济生产效率、因而也阻碍全体人民生存的弊端所进行的斗争来提高国民经济生产和筹措资金的方法。因为每个人的工作效率原本就是和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合法经济地位以及由于经济的繁荣兴旺而产生的对自己本身优势必要性的认识。

具有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雇员必须知道，国家经济的繁荣意味着他自己本身物质上的幸福。

具有国家社会主义观念的雇主也必须懂得，是他们的雇员得到幸福和满足才是他们自己经济发展和生存的前提条件。

具有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雇员和具有国家社会主义观念的雇主是一个共同国家里的两个代理人和管理者。最大限度上认同其作用的个人自由可以通过这样一个事实来进行说明，那就是从经验来看，每个人的工作效率在很大程度上自由地发挥比来自上面的强迫会得到更大地提高，并且还非常适合于去阻止或许会妨碍可以提拔那些最能干、最有能力和最勤奋的人的自然选择的进行。

所以，对于国家社会主义的工会组织来说，罢工只是一种可以用在并且或许也必须用于非国家社会主义性质的民族国家的方法。罢工当然应该取代工人阶级和资本家这两大集团的群众斗争（这样的结果无非也就是减少生产并且损害国家！）而接受法律的关怀和法律的保障。而保证国民经济的运行以及致力于消除其损害国家的缺点和错误就是商务部本身的责任。通过千百万人的斗争所奋斗的东西以后都必须在议会和商业部那里得到解决。所以资本家和工人就不再会为损害双方经济利益



的工资纠纷和劳资争端而大吵大闹了，而这些问题双方共同都会由超越任何一方的，眼前始终浮现着民族和国家幸福闪耀字眼的，更高一级的机构来进行解决。

即使在这里也无一例外地遵循着首先是祖国其次是政党的铁一般的原则。

国家社会主义工会组织的任务就是为了这样一个目标来进行思想教育和准备工作的，也就是说共同从事为了维护和保障我们民族和国家的，适合于每个人天生的以及通过国家教育所学到的能力和才干的一切工作。

第四个问题：我们怎样加入这样的工会组织？这在当时看来是最难回答的。

一般来说，在一个新的地方进行创业要比在一个已经有类似事业的老地方容易得多。在一个还没有某种生意的地方人们则很容易地进行创业。困难一点的是已经有了一个类似的企业抢先建立了起来，而最为困难的则是形成了一种只允许这个企业单独进行发展的条件。因此对于创建者来说就面临着不只是一定要创办自己的新产业，而且为了能够生存下去还要必须消灭当地现有企业的任务。

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工会组织要是和其它工会组织混为一谈也就失去了其本身的意义。因而就算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工会组织也必须深深感到满怀着自己的精神使命，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要坚定地反对其它类似的或者完全是敌对的精神产物的职责和唯一强调自我的必要性。在此，与相近的奋斗志向就不会有什么相互谅解和妥协，而只需要维护绝对唯一的权利。

现在要取得这样的进展有两条道路：（一）成立新的工会组织来反对国际上那些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工会组织而进行斗争，或者走第二条道路；（二）加入到马克思主义的工会组织当中去，并且力求对其灌

输新的精神思想，或者将其改造成为新思想的工具。

对于第一条道路来说有以下的考虑：我们当时的财政困难总还是很大的，而可供我们所使用的办法则完全是无用的。四处不断蔓延的通货膨胀则加重了这些年来对于工会会员来说工会组织几乎谈不上还有什么用处这种处境的恶化。每个出于这种想法的工人当时也就完全没有理由交纳会费了。现存的马克思主义工会组织差不多处于崩溃的边缘，直到那位库诺先生在鲁尔区采取天才般的行动才让这些工会组织轻而易举地一下子又得到了上百万人的支持。这位所谓的“国家”总理兴许可以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工会组织的救星。

我们当时没有料到这样的财政状况，没有人可以劝说别人来加入这种由于财政方面的无能为力连最起码的条件都无法提供的新的工会组织了。另一方面我还要必须防止的是，在这样的一个新的组织机构里只给那些多多少少都是些大人物的人们安排轻松愉快的工作。

人员问题完全成了最大的问题。我当时连一个我认为可以完成这项艰巨任务的人都没有。而谁要是在当时真的能够摧毁马克思主义的工会组织，并取而代之帮助以消除阶级斗争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工会组织思想赢得胜利的话，那么他就可以列入到我们民族伟人的行列之中，并且他的雕像有朝一日也会摆放在雷根斯堡附近的沃丁神祭奠英灵的殿堂里来供后人瞻仰。

可是我还没有找到适合于供奉到这个殿堂的头像。

要是认为世界上的工会组织只是些吵吵闹闹的庸才而受到迷惑那可就完全错了。实际上这完全并不说明什么，因为当它们建立之初还没有什么其它的组织。而在今天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就必须和这样一个长期存在的规模庞大的，并且还分散成众多小型分支机构的组织进行斗争。而征服者想必往往总是比防御者要聪明得多，因为征服者总想要战胜防御者。马克思主义工会组织的堡垒也许今天是靠普通的官僚们来管理的，所以只要用对方一位超凡伟人那无穷的力量和天才般的能力就可以推翻它。如果找不到这样一个伟人的话，那么抱怨命运是毫无用处的，

但要是用一个无用之徒来替代伟人的话则更是毫无意义了。

利用所认识到的事情也是很有有效的，在生活中有时将一件事先放一放总比开始做这件事却由于缺乏合适的人选而导致半途而废或者一败涂地会更好一些。

另外不应该称之为带有煽动性的观点也要考虑进去。在当时并且即使在今天，我还是坚定不移地相信将一场世界观方面重大的政治斗争过早地和经济事务联系在一起是很危险的。这一点尤其适合于我们的德意志民族。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斗争会立即汲取政治斗争的力量。就像人们当初相信他们通过节俭也可以拥有一所房子那样，所以他们就只顾着盖房子而再也没有时间去进行反对那些早晚会有一天打算把他们所节省下来的铜板再次拿走的人的政治斗争了。这些人不去通过政治斗争为所赢得的思想和信仰而奋斗，他们更多地也只是忙于“安居乐业”的想法，并且最终他们大部分都是两手空空。

今天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处于斗争的初始阶段。其大部分首先是要塑造和完成世界观方面的工作。这场斗争要投入所有的力量来实现其伟大的理想而奋斗，并且如果不遗余力地进行斗争，那么成功就是可以期待的。

只顾解决经济方面的问题而怎样使政治斗争的力量陷于瘫痪的，我们面前正好有一个典型的例子：1918年的十一月革命不但是由工会组织制造的，而且还是由工会组织实施的。并且德国的资产阶级为了德国的未来也不进行政治斗争了，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德国的未来通过经济建设就足以得到保证了。

我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因为我们也不会有其它的办法。我们越将这场运动的全部力量集中到政治斗争中去，就可以越早地取得完全胜利。要是我们更多地像过去那样被什么工会问题、安置问题以及类似的事情所拖累，那么我们事业的成果大体上就会越小。因为利益总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当我们已经能够让国家权力服务于这种观念的时候才会大

规模地履行这样的职责。至此这些问题就会更多地拖累这场政治运动，而越早忙于这些事情，就会对政治运动的思想意志造成更严重的伤害。这可能轻易地导致工会组织的观点会左右政治运动，而不是世界观来迫使工会组织走上正轨。

当这场运动在精神上已经受到了国家社会主义理想极大影响，以至于不再会有陷入马克思主义泥潭危险的时候，不仅对这场政治运动，而且也对我们民族，其真正的利益才只能来自于一场国家社会主义的工会运动。因为一个只认识到其使命就是和马克思主义的工会组织进行斗争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工会组织则是再糟糕不过的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工会组织不仅是作为一个组织，而且还要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和马克思主义的工会组织进行宣战。国家社会主义的工会组织必须要和阶级斗争和阶级观念的代言人针锋相对，并且还应该取而代之成为德国公民职业工作利益的守护人。

所有这些意见不仅在当时，而且即使在今天也都反对成立自己的工会组织，除非有一个受到上天的委派来解决这些问题的人突然降临。

这里也只有两条道路：要么建议自己的党员同志脱离这样的工会组织，要么就留在目前所处的工会组织里，然后尽可能地进行破坏活动。

而我一般则推荐后一种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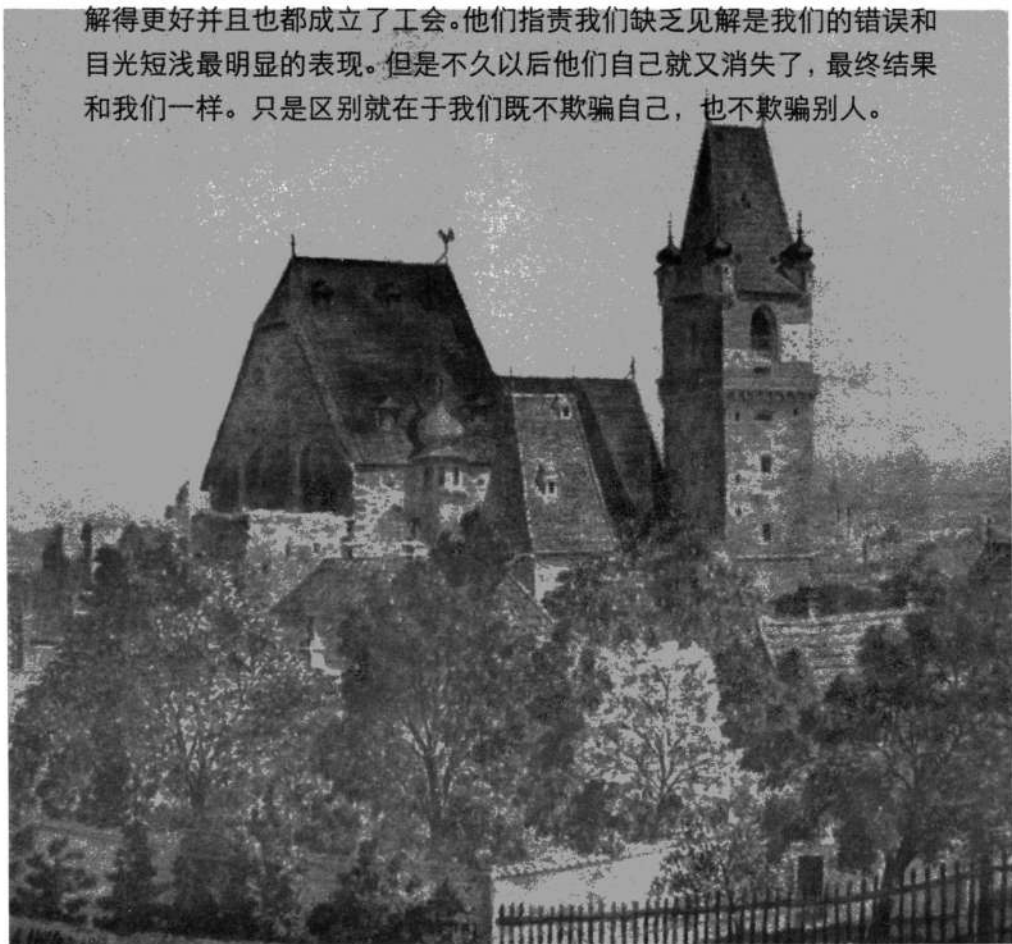
尤其是在 1922 年至 1923 年期间人们没有别的办法：由于是通货膨胀期间当初我们运动的工会组织还无法从本来就太少的工会会员那里捞到什么油水，所以财政收入几乎为零。这种伤害对工会组织来说是巨大的，因为国家社会主义的追随者是工会组织最严厉的批评者，并且也因此是其内部的破坏者。

我当时就完全拒绝了所有从一开始本身就会导致失败的尝试。无论如何都要从一个工人那少得可怜的工资当中拿出一部分来维持这样一个组织，我把这看作是一种犯罪，而靠这样的收益所维持的工会会员我

从心里也不会相信他们。

如果一个新的政党有一天又消失了，那么几乎不算有什么损失，而且总还有一些好处，并且没有人有权力去进行抱怨，因为每个人所给予政治运动的东西是不会有什麼回报的。但是谁要是交纳了工会会费，那么他就有权利要求工会组织履行其所承诺的回报。而一旦他没有得到回报的话，那么这样的工会组织的负责人就是骗子，至少他们是必须对此承担责任的草率行事的人。

根据这样的观点，我们在 1922 年采取了行动。其他人好像对此理解得更好并且也都成立了工会。他们指责我们缺乏见解是我们的错误和目光短浅最明显的表现。但是不久以后他们自己就又消失了，最终结果和我们一样。只是区别就在于我们既不欺骗自己，也不欺骗别人。



第十三章 战后德国的联盟政策

国家外交领导人对制定有效的联盟政策基本原则所表现出的精神沮丧在革命以后不仅还继续存在着，而且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首先，如果在战争前一般还可以把政治上的概念混淆当作是我们对外政策错误的原因来看的话，那么在战争之后就是因为缺乏真正的意志。当然那些通过革命最终看到达到了破坏目的的人是不会对以重新建立一个自由的德意志国家为最终目的的联盟政策感兴趣的。这样做不只是违背了十一月暴行本来的愿望，这样做也不只是打断了或者是完全结束了对德国经济和劳动力进行国际化的进程：这也就是外交上争取自由对国内政治所产生影响的结果对于现在国家权力的代表人物来说，在将来可是灾难性的。没有一场事先所发生的民族化运动，人们也不会把这想成是一次民族振兴，或者反过来说，任何一次外交上的巨大成就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同样意义上的反作用。任何一次争取自由的斗争从常理上看都会导致民族情感和自我意识的提高，并且由此对叛国分子及其他的企图更加敏感。在和平时期所能够容忍的人和事常常会被忽视掉，而在民族激情高昂的时期，这些人和事不仅会遭到拒绝，而且还会遭到因此而受到灾难的人们的反抗。人们或许还可以回想起战争爆发时，人们对普遍存在的间谍活动的恐惧突然迸发出火热的激情，并且还导致了极为血腥的，有时甚至是不合法的迫害行为，尽管人人都可以说间谍活动的危险性在长期的和平年代还会更大一些，即便是出于正常原因一般也不会引起同样程度的注意。

通过十一月事件跑到表面上的那些国家寄生虫细心的本能已经告诉他们，因为通过英明的联盟政策所支持的争取我们民族自由的运动和

由此所激起的民族热情很可能会消灭自己罪恶的生命。

所以，为什么自 1918 年以来大量的政府外交机关都出了毛病并且国家领导人也总是按照计划反对德意志民族的切实利益就可以理解了。因为第一眼就能够看得出缺乏计划性的就是所揭露出的要坚定地继续沿着十一月革命第一次公开踏上道路走下去的事实。

当然人们必须要区分出负责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应该负责的”国家领导人和议会里那些平庸的空头政治家以及我们像羊一般温顺的民族中那些愚蠢的笨蛋。

一些人知道他们想要什么。另一些人则要么是因为他们知道，要么是过于害怕就毫不留情地去反对那些认识的和感觉上有危险的人而紧随其后。其余的则只是出于无知和愚蠢而顺从罢了。

只要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在小范围内还只是个不出名的组织，那么外交政策上的问题在有些追随者的眼中就仅仅只占有次要的地位。这主要是因为，恰恰是我们过去和现在的政治运动基本上都认为对外争取自由既不会是上天的、也不会是大自然的力量所赠予的，而更多的则只是一种内心力量发挥的结果。只要是消除掉我们崩溃的原因之所在，并且消灭那些既得利益者就能够完成对外争取自由的前提条件。

如果从这样的观点出发，那么在运动初期与他们心中要从事改革的意愿相比，外交政策方面问题的重要性受到冷遇也就是可以理解了。

而一旦这个小小的、不出名的组织得到了拓展，并且最终迅速发展起来而且还形成了大型组织的规模，那么也就有必要对外交政策发表看法了。那么就要制定出既不违背我们世界观的基本理念，而且还要体现其思维方式结果的政策方针。

正是由于缺乏对我们民族外交政策方面的学习，所以产生的结果就是对于这场新兴的政治运动，不仅要对领导人，同时也要对广大民众有责任大致上讲解制定对外政策的思维方式，这就是任何为了重新获得我们民族的自由以及真正的国家主权所实际上执行的外交政策的准备工

作的前提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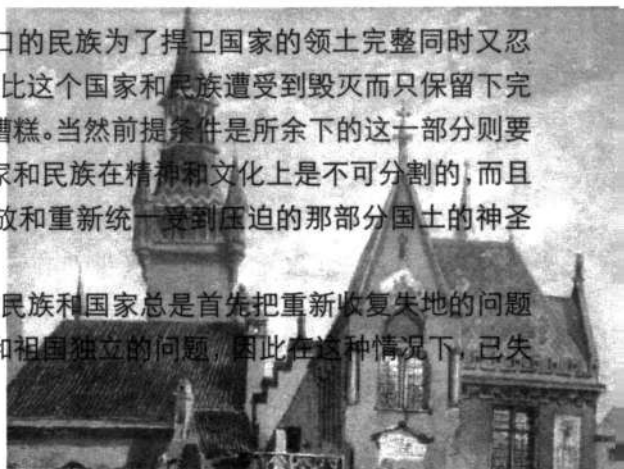
对这个问题进行判断总要必须想到的基本原则和纲领就是要达到唯一只能对我们的民族有所帮助的目的,即使是外交政策也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而外交政策除了下面的问题之外就不会有什么别的什么考虑了:对我们的民族现在或将来是否有利,或者是否对我们的民族有害?这是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唯一一个应该事先考虑的想法。而来自政党政治的、宗教的、人道方面的所有一切观点完全都不予考虑。

要是在战争前,德国外交政策的使命就是要通过进行能够达到目的准备工作以及同时得到具有同样目的的盟国必要的帮助来保证养育这个地球上我们的民族以及他们的子孙的话,那么今天的这个使命也是一样的,只不过区别就在于:战争前维护德意志民族的生存是依靠独立国家现有的权力,而在今天则是先把作为将来维护、促进和养育我们民族而真正执行外交政策的先决条件的自由国家的权力重新交还给人民。

换句话说就是:今天德国外交政策的目的是准备为重新获得明天的自由而战斗。因此,必须同时要时常关注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要重新赢得独立的可能性不仅绝对和国家的领土完整有关,而且更多地还和这个民族和国家即便是还剩下很小一部分的时候,但还拥有所必需的自由密切相关,因为这剩下的部分不仅是整个民族精神的体现,而且还准备通过军事手段来为争取自由而战斗。

如果一个有着上亿人口的民族为了捍卫国家的领土完整同时又忍受着奴役的迫害,那么这样比这个国家和民族遭受到毁灭而只保留下完全拥有自由的一部分还要糟糕。当然前提条件是所余下的这一部分则要完成不仅要不断地宣传国家和民族在精神和文化上是不可分割的,而且还要准备通过武力最后解放和重新统一受到压迫的那部分国土的神圣使命。

还应该想到的是,一个民族和国家总是首先把重新收复失地的问题当作是重新获得政治权力和祖国独立的问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已失



去的国家领土的利益就必须毫不留情地被摆在祖国重新获得自由这唯一的利益之后。因为一个受压迫和被分离得支离破碎的民族或者一个帝国行省的解放并不是由于被压迫人民的愿望或者一个傻瓜的抗议所发生的，而是要通过从以前统一的祖国所分离出去，但或多或少还拥有主权的剩余部分的统治手段来进行的。

因此，重新收复失地的前提条件是对收复失地最有力的支持以及蕴藏在内心里不可动摇决心的巩固，并且由此所形成的在关键时刻奉献给整个民族的解放和统一事业的新兴力量：也就是说忽视已失去国土的利益而只重视去争取剩余国土内的政治权力和力量才是改变敌对方胜利者意志的前提条件。因为受压迫的国土是不会只靠愤怒的抗议就可以一下子重新回到祖国怀抱的，而是要靠战斗的利剑。

而要铸造这把利剑才是一个民族领袖在内政方面的职责，确保铸造工作的进行和寻找战友则是外交政策方面的任务。

在本书的上卷里我就针对战争前我国联盟政策的不彻底性进行了分析。从四个方面的原因来看，为了将来可以维护和养育我们的民族，人们要认定第四个原因是最不好的。代替有效的欧洲领土政策，人们反而采取了殖民地和商贸政策。这比人们现在所错误地认为的由此可以避免武装冲突的观点还要荒谬。因为这种想要到处占领的企图其结果则是众所周知的，并且世界大战则是对德意志帝国错误的对外政策最后的报应。

而正确的则应该是当时所说的第三条道路：通过在欧洲获取新的领土来巩固和加强帝国陆地上的势力，同时正好还可以把日后所增加的殖民地自然而然就纳入到帝国的版图之内。这项政策只能联合英国或者借助于极端的军事手段来进行实施，以至于好像这四五十年来垦殖工作都给挤到后面去了似的。这也许是可以说明一些问题的原因。一个民族文明的重要性几乎总是与其政治上的自由和独立密切相关的，因此其文明的重要性也是其生存或者说其最初产生的先决条件。所以任何为保证政治上的自由而做出的牺牲都是值得的。而通过过度发展的国家军事力

量从文明的需求中拿走的东西会在以后更为丰富地被送回来。是的，人们可以说这种按照朝着维护国家独立的最初方向所进行的努力通过常常令人惊讶的、至今为人所忽视的一个民族文明力量的繁荣兴旺往往会产生出某种缓和或者补救。从波斯战争的苦难中产生出了伯里克利时代的全盛时期，而对布匿战争的忧虑则让罗马人的国家制度开始奉献给了更加文明的事业。

总之，人们不能把一个民族的整个利益完全归属到为了将来保卫国家而即将发生的战斗所进行的准备工作这唯一的任务上，并且还委托给议会里那些蠢货或者笨蛋去进行多数表决。弗里德里希大帝的父亲虽然忽视战争却还能够做些其它的事情，而我们民主的议会中带有犹太人烙印的胡思乱想的制造者们就连这一点都做不到。

光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战争前为了获得欧洲的土地和领土所进行的军事准备就只是一件平常的事情了，所以也就难以缺少具有同样目标的盟国的支持了。

但是因为人们对有计划的战争准备工作完全一无所知，所以就放弃了在欧洲获得土地，同时转而采取了殖民和商贸政策，牺牲了与英国可能进行的联盟，当然也就不去依靠俄国的支持，并且除了秉承哈布斯堡的恶习之外，最终还是众叛亲离，跌跌撞撞地投入到世界大战当中去了。

对于我们今天外交政策的特点所必须指出的就是完全不存在一个什么可见的或者完全可以让人理解的原则。如果说人们在战争前还以错误的方式走上了第四条道路的话，那总还是马马虎虎地在走，而自从革命爆发以来则完全走上了一条连最敏锐的目光都无法识别的道路。还有就是除了本身要使我们民族再次振兴的最后希望落空的计划之外，战争前就没有考虑要制定什么计划了。

要是对今天欧洲国家的力量对比进行冷静审视的话，就会得出以下的结果：三百年以来我们欧洲大陆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靠英国直接

通过和欧洲国家相互间建立起力量对比，以取得相互间和平，从而保大不列颠宏伟的世界政策的企图所决定着。



自伊丽莎白女王执政以来，有计划地呈现大英帝国历来外交政策意图的结果就是用一切手段并且在必要的时候采取军事进攻来阻止任何一个欧洲强国超出正常水平范围的崛起，而在德国能够与其相媲美的恐怕也就只有普鲁士军队的传统了。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根据形势和任务的不同所惯用的手段则是多种多样的，但决心和意志却总是一致的。是的，英国所处时代的形势越是困难，那么维持这种由于大国之间相互竞争对欧洲单一国家力量发展普遍产生阻碍的现状对于大英帝国的统治来说就显得越有必要了。当初北美洲殖民地在政治上取得独立以后也曾竭尽全力寻求务必要得到欧洲国家的支持。在西班牙和荷兰丧失了海上强国的地位之后，英国就可以集中全部的力量来对付正在崛起的法国了，直到对于英国来说很痛心地看着是最危险的军事强国霸权统治的危险拿破仑一世最终被推翻为止。

大英帝国对付德国的治国方略的调整只不过是进行得缓慢一些，这不只是因为缺乏民族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对英国不存在明显的威胁，而且还因为通过为了国家的某些目的所进行的宣传而鼓动起来的公共舆论要能够跟得上新的目标也是很缓慢的。在此政治家冷静客观的认识好像转换成不只在实际效果上更具有承受力，而且在持久性方面也更加稳定的富有情感价值的东西了。所以政治家也许在实现目标后其思路也不会转向新的目标，可广大民众则能够根据情感在缓慢的宣传工作过程中被改造成为创造生活新目标的工具。

光是在 1870 年到 1871 年期间英国就已经确立新的观点了。由于美国在世界经济上的重要地位以及俄国强权政治的发展壮大而使得英国举棋不定，但是可惜德国没有能够利用这个机会，结果则使得英国原有的政治方针更加稳定。

英国把德国看作是强国，但是德国贸易以及世界政治的重要性最终并不是因为其强大的工业化的原因才形成如此具有威胁性的规模，以至于人们应该权衡一下这两个国家的优势是否在同样的水平上。对我们的

政治家来说，好像是绝顶聪明地用“和平经济”去征服世界的方法反倒被英国的政治家用来进行组织抵抗的理由。而把这种抵抗伪装成全面进攻的形式才完全符合英国国家政策的本质，令人生疑的是其目的并不是为了什么维护世界和平，而是要巩固大英帝国的世界统治。因此英国把所有凡是在军事上可以考虑的国家当作盟友，这同样也是出于其本来就谨慎地估计对手的实力以对自己目前本身的弱点进行判断的原因。对此人们无法称其为是“肆无忌惮”，因为如此全面地进行战争准备不应该以勇敢者的观点来进行判断，而要看战争的目的。而外交方面所要考虑的则不是一个民族勇敢地走向毁灭，实际上是要维护这个民族。只要能够达到这个目的的任何途径都是可行的，而不这样做才被看作是玩忽职守的罪过。

随着德国的革命，英国对日耳曼世界霸权威胁的担忧在其国家政策里就不复存在了。

而把德国从欧洲的地图上完全抹去对于英国来说也是没有好处的。相反，正是发生在1918年11月那些日子里可怕的政变才使英国的外交政策面临着一场新的完全无法控制的局面：大英帝国里为了要打破想象中一个欧洲大陆强国的优势奋斗了四年半的时间。而现在德国突然垮台了，这好像把这个强国从地图上完全给抹掉了。这表现出是多么地缺乏最基本的维护自我生存的本能，而使得在48小时里就通过这样一个行动获得了欧洲势力的平衡：德国消亡了，而法国则成了欧洲大陆上的第一政治强国。

英国人在战争期间始终支持的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极大地鼓舞了人们原始本能和热情，想必对英国政治家的决心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殖民地政策以及经济和贸易手段英国达到了灭亡德国的目的，而所得到的结果却是削弱了英国的利益。通过消除德国在欧洲大陆上的这一强国获利的只是英国的敌人。因为从1918年11月那几天所发生的事情以后一直到1919年的盛夏，英国的外交政策则不可能再像以前长期战争期间那样更多地只是利用广大民众情感的力量来进行转变了。之所以这样的不可能一方面是因为要考虑到本国民众的观点看法，另一

方面则是由于军事力量的对比。法国打破了贸易规则并且还可以操纵其它国家。而唯一一个在这几个月里还能够在做买卖的过程中讨价还价带来一些变化的强国德国自己也处在内战的漩涡之中，并且那些所谓的政治家们还一再口头上宣布接受法国的那些苛刻条件。

如果在国际关系中一个完全缺乏维持自我生存意识的民族停止“主动”去当什么盟友的话，那么这个民族通常就会沉沦为受奴役的民族，其国家也会沦为殖民地。

恰恰就是因为不想让法国的势力过于强大，英国唯一可以做到的便是参与到法国的强盗行径中去。

事实上，英国并没有达到其战争的目的。这是因为不仅没有阻止，反而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一个超出欧洲大陆实力对比的强国的崛起。

德国作为军事强国在 1914 年是夹在两个国家之间的，一个具有同等实力的国家，另一个则是实力超过自己的国家。另外再加上具有海上优势的英国。法国和俄国只不过是给德国的迅速发展制造些阻力和麻烦罢了。德意志帝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在军事上是极其不利的，作为国家的安全系数来说也会大打折扣的。从军事上考虑，特别是在领海方面和英国的战争是非常不利的、狭小而受约束，相反地面战争则是非常广阔和开放的。

而法国今天的地位则是：军事上是第一强国，在欧洲大陆上没有真正的对手，并且其南面与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边境也防护得很好，而因为德国的软弱无能也不用去防御德国，其领海也触及到大英帝国的致命要害。英国的领导中枢不只是为了飞机和远程火炮制定出了有意义的目标，而且对于英国的贸易路线来说，潜艇的重要性也就显露出来了。在广阔的大西洋海域以及欧洲地中海法国沿岸或者非洲北部沿岸的潜艇战争将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这就是在政治策略上反对德国不断地发展壮大而导致的法国在欧

洲大陆取得霸权的结果。在军事上的结果就是：巩固了法国陆军的优势，并且也承认了同样强大的海军的联合。在经济方面则是：向以前的盟友转让大英帝国的利益范围。

正如英国历来的政治目标是希望和需要某种欧洲的巴尔干化一样，法国则正好对德国进行巴尔干化政策。

英国的企图是，并且永远都是要防止欧洲大陆具有政治意义上的任何一个强国的崛起，也就是说要维持欧洲国家之间力量对比的某种平衡，因为这才是英国称霸世界的前提条件。

而法国的意图则是并且永远都是要防止德国形成一个统一的强国，要维持德国各个小邦之间力量平衡的德国体系，使其没有统一的政府来领导，并且以占领莱茵河西岸作为法国取得和保持称霸欧洲的先决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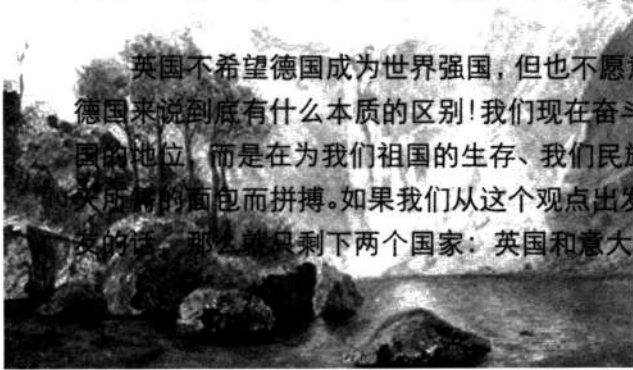
所以，法国外交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永远反对英国国家政策的最终意图。

谁要是从以上的观点出发来为今天德国联盟的可能性进行审视的话，那么就必须相信，摆在面前的联盟就只剩下倚靠英国了。所以过去和现在英国对德国战争可怕的后果就是，这个看法也无需进行隐瞒的，消灭德国在今天看来对英国不再有必然的利益，是的，相反英国的政策一年又一年则更多地必须要对法国那无休止的称霸企图加以制止。现在的联盟政策并不是受到对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回忆所产生观点的驱使，而更多的则是从以往的经验中所认识到的结果。人们应该从经验中吸取教训，实现消极的目标所进行的联盟是内心软弱无能病态的表现。国家的命运是和共同获取、共同征服的意义上所取得的共同成功，也就是相互间扩大实力上的愿望紧密相连的。

而我们德国人却很少考虑什么外交政策，这一点最明显可以从有关这个或那个外国政治家所说的伟大的“友好的德国”的新闻报道中多多少少看得出来，同时从这些对我们民族特征的猜测中也可以看得出一种

对我们有益政策的独特保障。真让人无法相信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这就是普通的德国市民在讨论政治话题时所表现出绝无仅有的幼稚的异想天开。而不会有英国或者美国甚至是意大利的政治家会有亲德的想法。每个作为政治家的英国人当然首先要是一个十足的英国人，美国的政治家也是如此，更不会有意大利人准备去实施不是亲意大利的政策。所以谁要是相信和外国缔结的联盟是建立在对方政治领导人有亲德想法的话，那他要么是头蠢驴，要么就不是人。国家的命运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条件从来就不是因为相互之间的尊重或者完全的好感所建立起来的，而是对双方约定目的的预见性。也就是正像我们所说的那样，就是某项亲英的政策利益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正好符合亲德政策的利益。这当然就需要在某种程度上才能形成这种情况，并且也可能在某一天突然朝相反的方向发生变化，只是政治领导人的谋略恰恰就表现在要实现自己的需要在特定的时期内，必须找到代表其利益并走相同道路的伙伴。

对于现在的实际需要就是回答以下的问题：目前有哪些国家没有兴趣通过欧洲中部德国的消亡在军事和经济实力上达到法国绝对的统治霸权的地位呢？是的，有哪些国家由于其本身的生存条件以及直到今天所执行的传统政策从目前的形势发展过程中看到了将来会对自己产生的威胁呢？因为对此人们必须完全要弄清楚：德意志民族不共戴天的死敌就是并且永远都是法国。不管是谁统治或者将要统治法国，无论是波旁王朝还是雅各宾党人，拿破仑还是资产阶级民主党，教会共和党人或者是赤色布尔什维克分子：法国外交活动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企图占领莱茵河地区并且通过一个土崩瓦解的德国来保障莱茵河法国流域的安全。



英国不希望德国成为世界强国，但也不愿意法国是一个强国，这对德国来说到底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我们现在奋斗并不是为了一个世界强国的地位，而是在为我们祖国的生存、我们民族的统一、我们的孩子每天所需的面包而拼搏。如果我们从这个观点出发来期待我们在欧洲的盟发，那么就只剩下两个国家：英国和意大利。

英国不愿意有那么一个凭借其军事力量在欧洲横行无阻,要保障其政策的执行反正早晚有一天都会触犯英国利益的法国。英国从来就不希望这样的一个法国会占有西欧巨大的铁矿和煤矿,会得到从经济上威胁世界的先决条件。并且英国还不希望法国在欧洲大陆的政治地位好像是由于其它欧洲国家的毁灭而得到保障,以至于不仅有可能,而且还正好因此会被迫去重新接受法国世界政策的大政方针。从前齐柏林的炸弹会在一夜之间增加上千倍,而法国军事上的优势则令大英帝国心痛不已。

可是就算意大利也不希望法国在欧洲的优势地位继续得到巩固。因为意大利的未来在地域方面要依靠地中海沿岸区域的发展。意大利参加世界大战的动机实际上并不是想要增加法国的势力,而更多地是要给这个亚得里亚海的死敌以致命的打击。法国在欧洲大陆任何一方面实力的增加对意大利的未来就意味着是一种阻碍,同时人们不应该混淆的就是民族间的亲近关系也难免消除彼此间的对立的。

首先,今天的英国和意大利这两个国家要极为冷静和清晰地进行思索他们自己本来的利益和德意志民族的生存条件至少在最根本的利益上是没有冲突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相互一致的。

总之,我们在对联盟的可能性进行判断的时候不可忽视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取决于我们自己,而另外两个则涉及到与此相关的国家本身。

那么能否和现在的德国进行联盟呢?一个为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想通过联盟得到一臂之力的强国会和一个几年来其领导人所给出的是一幅可怜兮兮无能为力的、软弱胆怯的、大部分民众受到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蒙蔽以闻所未闻的方式出卖自己国家和民族利益景象的国家进行联盟吗?任何一个强国都希望能够和一个国家建立起一种有利用价值的关系,将来为了共同的利益共同进行奋斗,反之如果这个国家就连保卫自己最起码的生存显然都没有勇气和兴趣去动一动手指头的话,那么还有国家希望这样做吗?对于任何一个强国来说联盟无外乎并且也应该无外乎就是一个保证维持缓慢腐败下去的现状的协议,这倒是

有点类似于以前的那个倒霉的三国联盟的意思，那就是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那怕是这个国家的生存状况对外是低三下四卑躬屈膝，对内是卑鄙无耻残酷镇压；那怕是这个国家不再有什么重要意义，因为这个国家的行为举止再也不配拥有什么重要性；那怕这个国家的政府再也无法炫耀自己国家的人民对自己的尊重，以至于连外国都无法感受到对其伟大的赞美了，难道还要对这个国家承担责任吗？不是的，一个自己注重声望并且期待着通过联盟想要得到的要比贪得无厌的国会议员的回扣多得多的强国是不会和当时的德国进行结盟的。是的，这是无法办到的。今天我们最终无法进行联盟的深层原因就是我们的敌人相互之间已经联合起来了。因为除了议会里的精英们几次愤怒的“抗议”之外，德国从来就没有表示过反抗，那么其它国家也就没有理由为保护我们的国家而进行战斗了，而且天知道我们那些胆小的民众本来就不愿意战斗，相反却为我们国家的军队不断地哭泣，所以，对这些国家来说也就对我们被毁灭完全没有兴趣，除了参加法国的强盗行径之外也就没有什么其它的选择了，恐怕正是因为共同参与和加入到抢劫行动的原因才最终阻止了法国独自一个国家强大的结果。

其次，还不能忽视现在那些仍然对我们表示敌意的国家朝着某一特定方向对广大民众产生影响的大众宣传开始发生的变化所造成的困难。人们本来就无法把多年来塑造成的“匈奴人”、“强盗”、“汪达尔人”诸如此类的民族突然一夜之间发现完全是相反的，并且在第二天就把原来的敌人当成盟友的。

第三点还要值得注意的事实就是对于建立未来欧洲联盟关系本质的重要性：从英国国家的观点立场出发，英国越是很少考虑继续毁灭德国，那么那些搞国际证券的犹太人对此发生的兴趣就越大。再也没有比官方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传统的英国国家政策与犹太证券资本家之间的分歧更能表现出针对英国对外政策各种不同的意见看法了。犹太金融资本家希望，这与英国的国家利益相反，不仅在经济上要完全消灭德国，而且还要在政治上完全奴役德国。德国经济的国际化，也就是说让犹太

人的国际金融资本拥有并接收德国的劳动力在政治方面就是在完全实行国家的布尔什维克化。要是马克思主义的犹太人国际证券资本的战斗队最终应该搞垮德意志民族国家的话，那也只能依靠外国的支持才能实现。法国的军队因此就长期对德国发动进攻，直到内部已经不断变得脆弱的德国屈服于犹太人国际金融资本的布尔什维克分子的战斗队。

所以，今天的犹太人才是想要彻底毁灭德国的最大的煽动者。我们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所看到的那些攻击德国的报道都是犹太人制造的，正如在和平时期还有在战争期间，犹太人的证券新闻以及马克思主义分子的道路一直都是在有计划地编造对德国的仇恨，直到政府为了国家利益而放弃了中立，甚至还真正地放弃了民族利益而在世界大战期间为同盟国去卖命。

因此，犹太人的思路就很清楚了。那就是要把德国布尔什维克化，也就是说彻底消除德意志民族的聪明才智，并且因此才有可能通过犹太人的国际金融资本对德国劳动力进行压榨，而这只不过还是犹太人征服世界计划准备工作的前奏。为什么历史上伟大转折点的大规模战争常常都是发生在德国。要是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国家将成为嗜血和贪财的犹太暴政牺牲品的话，那么整个世界都会落入到这位暴君的桎梏之中，而德国要从这种束缚中得到解放也就意味着为整个世界消除了最大的国际灾难。

所以，犹太人肯定要开始进行一切煽动活动，为的是不仅要保持各国对德国的仇恨，而且还要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增加这种仇恨，因此这样的活动也就只会符合一小部分受到毒害的民众的切实利益。一般来说犹太人在每一个国家常常所使用的手段就是基于要认清这个国家最为有效的，并且通常是有成功把握的民族气质。因此，特别是在这个用鲜血所造成分裂的国家里我们的民族气质则来源于此，或多或少地带有些“世界主义”的和平思想意识观念，简单地说就是国际主义思潮贯穿在为政权而战斗的过程中。在法国起作用的则是众所周知并且得到正确评价的大国沙文主义，在英国则是经济和世界政治观点，一句话，总是在利用能够体现一个民族最根本的气质特征。只有在这个过程中过多地受

到经济和政治方面强大势力的影响才会摆脱所采取手段的束缚，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真正内心的意愿和奋斗目标。而且这样做毁灭得就更加迅速，直到一个又一个国家变成了废墟，并在此之上则应该建立起犹太帝国的统治。

不论在英国还是在意大利这种本国的政治策略与犹太人国际证券资本意愿之间的分歧是很显著的，而且有时明显得用眼睛都能看得到。

只有在法国，犹太人所代表的证券交易所的看法和具有大国沙文主义思想倾向的国家政策观念之间还存在着思想上的一致。只不过恰恰就是这种一致性则对德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法国都是德国最可怕的敌人。而这个越来越变得像黑人国家似的法国本身和犹太人统治世界的目标结合在一起则意味着欧洲白种人生存隐藏着危险。因为在欧洲的心脏地带莱茵河领域，通过黑人的血液所造成的污染恰好符合这个具有大国沙文主义思想的、我们民族的宿敌那种变态虐待狂似的报复心理，同样也符合正在从欧洲大陆的中心开始进行退化变种活动的、通过劣等人种的传染来夺走白种人自我生存基础的犹太人那冷冰冰的念头。

而这些通过自己的报复心态所激发的、由犹太人按计划进行实施的、被法国所推行的东西就是反对白种人生存的罪恶，并且由此煽动起了在种族耻辱中认识到人类原罪的人们对这个种族复仇的欲望。

对于德国来说，法国的危险性则意味着是一种找回所有情感瞬间而伸出援助之手的责任，就像我们受到威胁而不愿意忍受和忍耐法国的统治。

那么在欧洲对于德国来说在可预见的将来只有两个国家能够成为盟友：英国和意大利。

谁要是今天花点功夫回顾一下在革命以前法国的外交政策，那么除了他要面对我们的政府接连不断不可遏制的失败而感悲伤，那么他必须放

弃，要么就愤怒地向这样的统治宣战之外也没有别的办法。这样的行为和愚昧无知没有关系：因为对于每一个具有思考能力的大脑来说，无法想象的就是我们那些十一月政党的思想巨人所完成的：他们企图得到法国的欢心。是的，这些年来人们一再地按照一位不可救药的空想家那感人的幼稚尝试着去讨好法国人，一再地给这个“伟大的民族”拍马屁，并且还相信从法国刽子手狡猾的诡计中可以立即看到其态度明显好转的迹象。而德国政治实际上的幕后操纵者当然对这种精神错乱的想法从来就没有表示过敬意。对于他们来说讨好法国只不过是一种实际上破坏联盟政策理所当然的手段而已。他们对于法国以及背后指使人的目标从来都没有糊涂过。那什么是驱使他们好像是诚心实意地相信改变德国命运的可能而这样去做的呢，还是对在另外的情况下我们民族自己也许会走上了另一条道路清醒的认识。

当然把英国当作将来可能的盟友并加入到我们自己政治运动的行列中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困难的。我们那些犹太人所控制的新闻界非常懂得特别要把仇恨对准英国，同时德国有些好心的蠢货竟然也跟着犹太人非常乐意地朝着粘鸟用的胶棒上飞，空谈什么让德国的海军“重新强大起来”，抗议抢夺我们的殖民地，主张重新去获得殖民地，并且因此还帮助那些犹太骗子把以后用于实际宣传工作所需的资金都汇往他们在英国的同胞。我们那些关心政治的资产阶级的傻瓜也应该渐渐地意识到为什么我们今天没有为“统治海洋”等等去进行战斗。事先没有确保在欧洲的地位而把德国的实力调整到这个目标上来在大战前就是一种妄想。而现在这种期望则是愚蠢，从政治方面的角度来看应该是一种犯罪。

如果人们注意观察地话，有时的确使人迷惑不解的是那些犹太幕后操纵者是怎样做到让我们的民族去忙于目前最琐碎的事情，去进行煽动和闹事，同时在这关键的时刻，法国则一块一块地撕裂着我们的国家并且按部就班地夺去了我们独立的基础。

这不得不使我想起这些年来犹太人所惯用的把戏：南蒂罗尔问题。是的，就是南蒂罗尔问题。当我正好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并不是要最后一次和那些建立在我们广大民众轻信和愚昧基础之上的、自以为表现得像个饶舌妇似地远离议会里的骗子们的正直秉性可以来假装出民族悲愤的无赖们算账。

我想要强调的是，我自己本人也是众多对南蒂罗尔的命运共同进行抉择中的一员，并且人们在1914年8月到1918年11月实际上就开始保卫这个地区，也就是参军了。在这些年里我参加战斗并不只是为了不失去南蒂罗尔，而是还为了那些本应该属于我们祖国其它的德国领土。

谁在当时没有参加战斗呢，就是那些议会里的强盗，他们全都是些只会谈论政治的党棍，反之，就在我们相信通过战斗可以让德意志民族获得南蒂罗尔并且在为此而进行奋斗的时候，这些议会里的厄菲阿尔特却一直在煽动和怂恿人们去反对赢得胜利，直到英勇战斗的西格弗里德最终死于背后袭来的暗算。毕竟德国人民要获得南蒂罗尔并不只靠勇敢的议员站在维也纳的博尔豪斯广场上或者在慕尼黑陆军司令部前进行激烈的演讲来保证的，而是要靠在前线战斗的部队。谁要是破坏了这一点就等于出卖了南蒂罗尔，就像出卖了德国其它的领土一样。

今天谁要是相信通过抗议、声明、团体组织游行等等行动就可以解决南蒂罗尔问题的话，那么他要么是一个十足的无赖，要么就是一个德国的败类。

也许人们对此必须清楚的是要重新获得失去的领土不是通过什么向上帝进行郑重的祈求或者通过国际联盟的衷心期望，而是要靠武力。

只是问题在于由谁去准备坚持用武力去重新获得失去的领土。

对于我本人来说，我可以在这里用良心保证，我会以极大的勇气走在由议会里那些空谈家和别的什么政党领袖以及各种各样委员会里的委员们所组成的参加征服南蒂罗尔突击队的最前面。天知道，如果有几发炮弹突然飞过这种“愤怒”的抗议集会头顶的话，我是否还应该感到高兴。我想，要是一只狐狸闯进了鸡笼，与其说是大声疾呼和解救笼子里的鸡，还不如赶紧解散这华丽无比的“抗议集会”。

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最无耻的就是这些人完全不相信通过这样的方法可以取得一些成果。他们自己最了解他们整个装腔作势的好意和无能为力，他们这样做只不过是因为在今天光是空谈重新获得南蒂罗尔当然要比获得南蒂罗尔而要去进行战斗要容易得多。每个人只做自己的事情，当时我们是用鲜血去做出牺牲，而今天这个社会则只会夸夸其谈。

还有令人可笑的事情就是可以看到维也纳正统的皇室表面上是怎样虚张声势地为了再次征服南蒂罗尔所采取的行动。七年前其崇高的和尊贵的皇室则通过违背誓言叛变的流氓行径帮助了国家联盟成为胜利者而得到了南蒂罗尔。当时国际联盟里的国家支持这个叛变王朝的政策，并且根本上就不在乎什么南蒂罗尔，把这当成一钱不值的東西来对待。当然我们今天为了这个地方所要进行的战斗要容易得多了，因为这是用“精神”武器来进行斗争的，而且还有更轻松的就是表达出发自内心的愤怒进行声嘶力竭的“抗议集会”，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写到手指都破了，而就在鲁尔区被占领的时候，我们却说把桥梁都炸掉了事。

为什么近几年来一些国家把南蒂罗尔问题当作德国和意大利关系中最关键的原因就非常明白了。那是因为犹太人和哈布斯堡正统的皇室对此有极大的兴趣想要阻止德国实施有一天会诞生出一个自由的德意志国家的联盟政策。今天人们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帮助，反而会造成伤害，这种对南蒂罗尔的装腔作势并不是出于爱，而是害怕德国和意大利之间有可能达成的谅解。

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制造谎言和诽谤的意图，如果他们会用冰冷和无耻的大脑来描述这件事情的话，那么就可以说成好像是我们“出卖”了南蒂罗尔。

应该向这些先生们这样明确地说：第一，每个在 1914 年到 1918 年没有上前线为祖国效力的德国人都“出卖了”南蒂罗尔；第二，这些年来每个没有帮助我们的国家增强进行战争的抵抗力量没有帮助我们的民族加强坚持斗争毅力的德国人出卖了南蒂罗尔；第三，每个在十一月革命爆发的时候无论是直接地通过行动还是间接小心地忍耐而一

起行动起来砸毁本可以用来拯救南蒂罗尔武器的德国人出卖了南蒂罗尔；第四，所有凡是签订了凡尔赛与神圣日耳曼之间那可耻和约的政党及其追随者都出卖了南蒂罗尔。

是的，这才是事情的真正原因，我那些勇敢地进行口头抗议的先生们！现在只有冷静的认识才让我明白，要获得失去的领土不是通过议会里那些能言善辩所磨练出来的精辟口才，而是要靠利剑来进行征服，也就是要浴血奋战。

总之现在我要毫不犹豫地告诉大家，既然事已至此，所以，我认为要通过战争重新获得南蒂罗尔也不是不可能的，并且我自己也拒绝相信对于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德意志民族所有激昂的爱国热情就能够解决的，尽管这也是取得胜利的前提条件。相反我却相信以前所付出的是鲜血，那么现在投入 20 万德国人的生命也是一种犯罪，同时会有将近七百多万人民处在异族的统治下受苦受难，并且我们德意志民族将会终生都徜徉在非洲黑人部落的游乐场里。

如果德意志民族想要结束这种在欧洲受到灭亡威胁处境的话，那么就不要再重蹈大战前的覆辙，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再把整个世界都当成敌人，而是必须认清谁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为的是要集中所有的力量对其予以痛击。并且为了赢得胜利，即使做出了牺牲，那么我们的后代也不会因此来错怪我们的。他们将会懂得如何去赞赏这种艰难的痛苦和深深的忧虑，以及由此产生出的坚强的决心，所以因此而取得的成就则会更加地辉煌。

今天究竟是什么在指引着我们，那就是要重新收复失地则首先要获得政治上的独立和祖国的强大这样一个基本认识。

而这些则要通过明智的联盟政策才能成为可能和得到保证，这才是我们国家外交政策强有力领导人的首要职责。

恰恰正是国家社会主义者才会保护我们，而在犹太人的引导下我们只会成为资产阶级字面上的爱国者。哎呀，要是我们的政治运动不准备去进行战斗，而是练习去当抗议者的话！这种异想天开和哈布斯堡王朝

像腐烂尸体一样的国家建立尼伯龙根式的联盟只会使德国走向毁灭。而今天在处理外交事务上所表现出难以置信的优柔寡断则是永远阻碍我们重新崛起的最好手段。

所以很有必要再把针对有关前面所列出的三个问题的不同看法简短地处理一下，也就是对于人们面对今天这个众目睽睽之下显得软弱无能的德国是否还肯定愿意与其进行联盟的问题，第二是那些敌对国家是否有能力适应这种变化，还有第三就是犹太人所造成的影响是不是不会强大到可以战胜所有人的认识和一切美好的愿望而使整个计划受到否定和失败。

第一个问题我想有一半已经得到了充分地回答了。当然是不会有人和现在的德国进行联盟的，世界上不会有任何一个强国敢于冒险把自己的命运和一个连政府都在损毁自己声誉的国家拴在一起的。至于有许多我们的同胞想要因为当时我们民族可耻的精神状况而原谅政府的所作所为，或者是看作道歉的尝试也遭到了坚决地反对。

当然，六年来我们民族的意志薄弱是极其可悲的，对最为重要的民族利益漠不关心是十分令人沮丧的，而胆小懦弱简直到了闻所未闻的地步。只不过人们不应该忘记的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这个民族是一个几年前还作为这个世界令人钦佩的人类最高道德典范的民族。从1914年8月的那几天开始直到这场世界大战结束，世界上还没有那个民族像德意志民族那样表现得如此富有男子汉气概、如此的坚忍不拔和具有忍耐精神，而今天却变得如此地可怜和渺小。没有人愿意断言我们现在的屈辱就是我们民族本质特征的表现。我们今天必须经历和承受的东西只不过就是1918年11月9日背信弃义所产生的可怕、荒谬和愚蠢影响的结果。这比文人们所说的那种继续制造不幸的罪恶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使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民族优秀的品质完全失去了，那么这些品质也只是静静地蕴藏在内心深处，并且有时会像乌云密布天空中的闪电那样让人们可以看到我们民族的美德所发出的光芒，而这正是我们以后还可以回想得起来的德国将来重新开始振兴的第一个标志。成千上万年轻的德国人常常会不止一次地产生出勇于牺牲的决心并在1914年也会再

次自愿而愉快地将年轻的生命奉献给他们所热爱的祖国。这样千百万人又能够勤奋努力地工作了，就好像革命所造成的破坏根本就不存在一样。铁匠又可以站在铁砧旁打铁，农民又可以跟在耕犁后种田，学者又可以坐在书房里做学问，大家都付出同样的辛劳和同样的忠诚来对待自己的职责。

来自敌人方面的欺凌再也不会带有以前那种判决者的笑声，而是痛苦和愁楚的表情。毫无疑问在思想观念上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如果直到今天所有这一切还没有表达出在政治上要重新强国和维护自我生存本能意图的话，那么，没有尽到职责而自1918年以来把我们民族引向死亡的那些人就要对此承担责任。

是的，如果今天有人指责我们国家，那么就有一个问题：为了使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好，那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是不是我们的人民对我们的政府所做出的决定，其实本来也没有做出过什么决定的支持不够就是我们民族缺乏生命力的表现或者不再是对待我们民族宝贵品德上完全失败的表现呢？而为了要让我们的民族重新树立起自尊的精神、男子汉般的坚强意志和对敌人的愤慨，我们的政府又做了些什么呢？当1919年《凡尔赛和约》强加给德意志民族身上的时候，人们还有理由指望正好通过这种极端压迫的手段兴许会使得德国自由的呼声更加强烈。而《凡尔赛和约》的条款就像鞭子抽打在人们的身上，同样也是为今后的民族振兴擂鼓助阵。

我们对《凡尔赛和约》又能做些什么呢！怎样才能把这种把握在政府手中想要进行极端的剥削和卑鄙的凌辱的工具变成激发起民族热情使之沸腾的手段！怎样才能巧妙地运用这种惨无人道暴虐的宣传来反对一个民族的冷漠无情并激发出无比的愤怒！怎样才能逐一地将这些观点长时间深深地印在民众的头脑和意识里直到在六千万的民众，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把共同感受到的耻辱和共同的仇恨变成燃烧的怒火，从这激情形成钢铁般的意志迸发出呐喊：我们需要武器！是的，这就是像这样的和约所应该得到的。在和约的极度压迫以及无耻的要求中隐藏着使



沉睡的民族精神受到再次震撼的强大的宣传武器。

总之，接下来就必须从孩子们的小学课本开始直到把所有的报纸、每个剧场和每个电影院、每个广告柱和每个报刊栏都用来为这项伟大的使命服务，直到我们今天那些热衷于社团活动的爱国者们恐惧不安的祈祷“上帝啊，让我们自由吧！”在年轻人的头脑中变成强烈的请求：“万能的上帝啊，今后请赐予我们武器，就像你永远都是公正的那样，现在就告诉我们是否配得上拥有自由，上帝啊，请赐予我们战斗！”然而人们却把一切都耽误了，并且什么都没有做。

当我们的民族没有应该和能够得到其应有的地位时，现在谁还会感到吃惊呢？如果其它的国家只把我们看作是奴仆，看作是为了表示感谢去舔原先还打过自己的手的听话的狗会怎么办？当然我们国家进行联盟的能力受到我们民族的连累，但主要是受到政府的牵连。政府的腐败堕落是在八年极端的压迫以后如此缺乏自由意志的罪魁祸首。

一项有效的联盟政策和对我们民族必要的评价是多么的密切相关，而这又取决于一个不愿意当外国的帮凶，也不是自己民众的监工，而更多的则是民族良知代言人的政府力量的存在。

要是我们的民族拥有一个能够认识到自己使命的政府，那么就不会浪费六年的时间，并且一个民族渴望自由的坚强意志就会被坚定果敢的外交政策所利用。

关于第二点敌对国家转变成为友好盟国的巨大困难可以做如下回答：以起不是通过整个德意志民族明显的维护自我生存意识的再次萌生，而是德意志帝国在欧洲一般的格局中进行博弈，并且能够进行较量的过程中重新得到的作为一个国家的品质特征来说，别的国家通过战争宣传所产生的普遍反对德国的心理作用还会不可避免地要长期地存在下去。只有当政府和民众对联盟的可能性进行必要的保证时，才会有一个或者几个强国出于同样的利益想到通过宣传工作的作用去改变公众的看法。即使是这样也需要多年持续不断巧妙的工作。正是这种需要长

期地去改变民族观念的必要性才造成了在实施过程中的谨慎小心，也就是说，如果人们绝对不相信这种工作的必要性和将来会取得成就的话，那么也不会投入到这样的行动中去。在没有一个新的精神思想价值观念得到保证的时候，人们是不会跟着多少还有些聪明才智的外交部长的夸夸其谈去改变一个民族的思想立场观点的。否则这就会导致公众思想观念的全面分裂。今后和一个国家有可能进行联盟的可靠保证并不取决于某个政府官员华而不实的言辞，而更多地是决定于一种人们能够看得到的，明显带有特定目的性的政府的意愿以及具有同样思想倾向的公众观念相结合的坚定信念。这样的信念越是坚定，那么在宣传方面所做的准备工作上政府就会明显地投入更大的力量和更多的支持，并且这样的信念越是鲜明，公众观念的意志就会更多地在政府的意愿中得到体现。

所以，从我们的情况来看，就是在政府和公众观念结合在一起并共同表达出同样热衷于为自由而战的意志的时候，这个民族才具有进行联盟的资格。而出于他们自己的认识并且想要代表他们自己本来的利益让他们站到还算过得去的合作伙伴这一边，也就是进行联盟，这才是开始对其它国家的公众观念进行转变的先决条件。

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由于对一个民族的思想意识本身进行改变需要进行艰苦的工作，对此许多人并不理解，同时由于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给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提供了进行攻击的武器，这简直就是犯罪和愚昧。

人们必须要懂得的是，要让一个民族完全掌握一个政府意图的内涵则需要一段时间是很有必要的，而在准备工作的过程中是无法对政府的最终政治目标进行解释的，所以这些要么是靠广大民众的盲目崇拜，要么就是领袖人物更高层次的思想境界才能够考虑得到的。因为有许多人是不具备这种从政治的角度还无法进行解释的、高瞻远瞩的政治洞察力和想象力的，所以总是会有一部分善于思考的领袖人物去反对那些与其说是缺乏经验，倒不如说是缺乏观察力的新的思想倾向。所以才唤起了人们所担忧的来自国家内部保守分子的反击。

所以，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必须考虑到要从这些相互间建立起联系的捣乱分子的手中夺下所有可以利用的武器和机会才是真正最主要的职

责，特别是在我们目前的处境下，当这些捣乱分子都是一些完全不切实际的、纯粹只是胡思乱想的、自吹自擂的热衷于社团活动的爱国者以及那些庸俗的只会在咖啡馆里高谈阔论的政治家的时候。因为那些要建造新型战舰以及收复殖民地等等的呼声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些幼稚可笑的空谈，只要我们心平气和地考虑一下也许就会无可争辩地知道这些都是无法实现的想法而已。而这些部分是好话，部分是疯话，最无聊的废话在英国却常常被我们的死敌用来进行政治抗议活动，可对德国来说却不是什么好东西。所以这些人就竭力去搞什么反对上帝和整个世界的非常有害的示威运动，而忘掉了取得成功所必需的重要原则，那就是：你所做的，别人也照样会去做！我们还会同时向五个或十个国家表示抗议，这样就忽略了要集中我们所有的精力和体力给我们最可恶的敌人以致命的痛击，而且这样则把商讨加强进行联盟的可能性也牺牲掉了。

同样这也是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项使命。那就是要教育我们的民众应当忽略小事而关注大事，不要让琐事分散精力，而是永远都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的奋斗目标就是要完全彻底地维护我们民族的生存，我们必须面对的敌人就是而且永远都是要剥夺我们生存权力的国家。

这会让我们中间的有些人感到痛苦。但这并不是放弃理智并且大声地向全世界去抱怨的理由，而应该集中力量去反对我们的死敌。

另外，我们德意志民族没有道义上的权利去指责别的国家是否要对出卖和背叛自己国家的犯罪行为进行追究。如果人们去辱骂和抗议远处的英国和意大利等等的国家是极不严肃的行为，反倒是那些为敌人的战争宣传卖命并窃取我们武器的无赖改变了方法，他们从道义上进行颠覆活动并且让趋于瘫痪的帝国为了三十个银币而叛变。

敌人的所作所为是可以预料的，而我们则应该从他们的行为举止中吸取经验教训。

谁要是不想完全拥护这种观点的伟大之处，那么他最后就只会想到放弃，因为将来所有进行联盟的可能性都会因此而排除掉。要是这样的

话，我们和英国则无法进行联盟，因为它夺取了我们的殖民地，和意大利也不行，因为它占领了南蒂罗尔，和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根本就沒門，而除了还有窃取我们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法国以外在欧洲就没有国家可以进行联盟了。

这样的做法对德意志民族是否有益是毋庸置疑的。而值得怀疑的却是这样的主张是代表着一个头脑简单的人，还是一个狡猾的骗子。

因为这会涉及到国家领导人，所以我更相信是来自于后者。

所以按照人们的理解和判断，如果我们国家的内部强盛以及维护我们民族生存明显的意愿使我们作为盟友再次显示出重要性，并且不再继续由于自己的无能或者说完全是犯罪的行为来给那些对今后和以前与我们作对的国家进行联盟的反对者的行为提供帮助的话，其真正的利益和我们的利益在将来几乎相同的个人乃至敌对的民族心理上的转变也许是能够产生的。

最难以回答的还是第三个问题。

难道可以想象得出进行联盟的国家是其民族利益真正的代表、能够违背自由民族国家的死敌犹太人的意愿来实现自己的意愿吗？比如英国的传统政治势力能不能打破犹太人可怕的影响力呢？就像上面所说的那样，这确实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这所涉及的因素太多，而不只是做一个简明扼要的判断。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要是有一个国家当时的国家实力稳固，并且绝对为国家的利益而效力的话，那么就谈不上有什么国际上犹太人的势力所形成的实际有效的政治影响了。

法西斯统治的意大利反对犹太人三大主要势力所进行的战斗，即使在最深层的原因方面或许不是故意而为的（但是我个人是不相信），但这却是一个最好的标志，那就是可以用间接的手段来拔掉这颗国际势力的毒牙。禁止同济会秘密组织、追踪国外的出版物以及坚持杜绝来自国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并且在国内不断地巩固法西斯国家理念使得意大利政府在几年的时间里一再地为意大利的民族利益服务，而不必去顾及犹太人这股世界祸水不满的声音。

而这种事情在英国就比较难以进行了。在这个“最自由民主的”国

家里犹太人今天还几乎间接地操纵着公众舆论。并且就在那里，英国国家利益的代表和犹太人国际垄断的捍卫者之间还不断地进行着斗争。

双方相互发生碰撞的激烈程度，一方面我们首先可以在大战以后从英国当局对日本问题的不同看法，以及另一方面新闻界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

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美国和日本两国相互之间的摩擦就又开始出现了。当然面对新的战争威胁作为在欧洲的世界强国不能保持无所谓的态度。对于美利坚合众国在国际经济和强权政治方面的不断崛起，毕竟所有在英国与此相关的事件都无法掩饰其某种妒忌的心情。从以前殖民地的土地上，从一个伟大母亲的孩子成长为一个世界的新主人。所以当英国今天惴惴不安地凝视着昔日的盟友并且提心吊胆地审视这一时期的国家政策发现不再是什么“英国统治海洋”，而是变成了“美国统治海洋”的时候，人们也是可以理解的。对付一个来自未开发的处女地拥有巨大财富且强大的美国比对付一个受束缚的德意志帝国要困难的多。而当时做出这个最后决定要与厄运为伍的就是英国。所以，就贪心于黄种人的力量并且想抓住结盟这棵救命稻草，虽然从种族的角度上看也许是不负责任的，但要是针对美洲大陆的崛起，从国家政治的方面来看倒也不失为一种巩固世界霸权地位的可能性。

而就在英国的领导人不顾欧洲战场的厮杀，也没有想要决定放松与亚洲的伙伴进行结盟的时候，犹太人控制的新闻界却对联盟从背后发起了攻击。

犹太人的新闻机构是怎么可能让这些直到1918年还反对德意志帝国的忠诚的英国士兵现在一下子就背信弃义走自己的路的呢？消灭德国并不是英国的利益所在，而首先是犹太人的利益，正如现在要灭亡日本对英国的国家利益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但却极其符合犹太人称霸世界的野心。在英国极力保持其世界强国地位的同时，犹太人也在开始去谋求征服世界。

犹太人已经把今天的欧洲国家看作是自己手中没有主张的工具，不

管是间接地通过所谓西方的民主方式，还是直接地通过俄国人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形式都是如此。犹太人不只是迷惑了昔日的欧洲大陆，而且命运同样还威胁到了新的美洲大陆。犹太人是美利坚合众国证券交易的主宰。每一年犹太人都不断地让这个有着一亿两千万人的民族的工人升格为监工，只有很少一些人才会完全由于气愤与此无关，直到今天还是如此。

犹太人把公众舆论说成是阴谋诡计，并为自己的未来从中制造出战斗武器。

即使是犹太人的大人物也都已经相信看到了这个国际大蛀虫的遗言差不多快要得到实现了。

在这些没有民族特征的殖民地国家中会有一个独立的国家能够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搞垮整个事业。毕竟一个布尔什维克的世界只有在征服了一切的时候才能够存在。

那么，也就将会并且必须只有一个国家以其实力和规模存留下来，那就是由国际上犹太人贪官污吏的所组成国家，就像世界上任何一个被民族国家理念所战胜的专制统治一样。

现在犹太人十分清楚地知道，他们经过上千年的生存兴许就能够奴役欧洲的各个民族并且还能够进行血统杂交，只不过一个亚洲的民族国家比如像日本就无法有这样的遭遇了。所以今天的犹太人就可以装作是德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和法国人，而和黄种的亚洲人他们则缺少沟通的渠道。所以他们现在就企图依靠和他们类似国家的力量来击毁日本这个民族国家，以便在日本的国家实力最后变成成为暴政的力量去对付无助的生命之前消除威胁到自己的敌人。

犹太人害怕在他们那千年帝国里有一个日本民族国家，所以就希望在其建立起自己的专政统治之前将其消灭掉。

因此，犹太人就煽动所有的国家来反对日本，就像以前反对德国一样，所以就在英国还在决定试图要去和进行日本结盟的时候，犹太人在英国的新闻机构就已经要求反对这个盟友，并且在民主的宣言和“打倒日本军国主义和皇权帝制”参战的口号下开始准备进行战争了。

所以犹太人在今天的英国就变得无法无天。


而反对犹太人这种世界祸害的斗争也同时在那里开始了。

因此，这又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所要完成的伟大使命：那就是要使民众面对陌生的国家睁开眼睛，并且必须要一再地让人们记住谁是我们在这个世界真正的敌人。取而代之的是对几乎和我们分离却又因相同的血液或者在文化方面的渊源有着某种联系的雅利安民族的仇恨，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必须把人类凶恶的敌人视为一切灾难以及普遍存在愤恨的真正的始作俑者。

但他们还必须要考虑到至少在我们国家里要认识到谁是我们的死敌，并且也要把反对敌人的斗争作为给其它国家指明道路，作为雅利安民族争取幸福光明时代的一个闪亮标志。

另外，理智就是我们的导师，意志就是我们的力量。所从事的神圣职责给了我们坚强不屈的精神，并且我们的信念则是最崇高的保护神。





第十四章 向东推进和东方政策

我认为对于德国和俄国的关系应当进行特别审视的原因有两个：一、在这种情况下这也许关系到德国外交政策决定性的关键时刻；二、对这个问题进行清醒思考和正确对待是这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政治水平的试金石。

我必须承认，对这两点有时我特别感到忧虑。因为我们这场新兴的政治运动的追随者不是冷漠无情之人，而通常还都是些具有非常极端思想观念的人，所以如果这些人首先在对外政策的理解方面带有偏见或者对此领域缺少了解，那事先把这些都归结为政治和世界观方面的原因那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同时这决不只是针对那些加入到我们这里来的左派人士。事实正好相反。至今对于这些问题所带来的教训必定是非常有害的，所以在很多情况下，至少有一部分要通过人类所剩存的自然和健康的本性来得以弥补了。所以，很有必要通过更好的观点来替代以前所渗透的影响，并且人们会常常出于自己尚有的本性和维护自我生存的本能认识到谁是最好的盟友。

相反，更困难的则是让一个人具有明确的政治思想，而他至今在这方面所接受的教育又缺少理性和逻辑，那你就只得把其天性中剩下的纯洁本性为客观现实而做出牺牲了。而恰恰就是我们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在成为其利益真正明确的代表，并且对外体现民族利益的时候才是最困难的。他们不仅受到胡思乱想和种种偏见形式上的困扰，而且主要还是因为偏偏把维护自我生存的健康本能给遗失和放弃了。就连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运动都要和这些人进行艰难的斗争，之所以艰难，那是因为这些人尽管全然无能但可惜还常常对一种在其他人，通常甚至还让健康的人

们不需要什么理由都看不起的幻想所着迷。而这些高傲自大，没有什么能力进行冷静审视和斟酌自以为是的人却被看作是外交政策思想和行动的基本骨干。

正是因为这些人才在今天开始以倒霉的方式把我国外交政治的方向从真正代表我们民族的利益，取而代之改变为服务于想象出来的意识形态，我认为有责任向我们的追随者对外交政策上最重要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和俄国关系的问题进行特殊和全面地处理，并有必要把这个问题让人人理解而有可能成为一项伟大的事业。

同时我还要做出如下的推测：如果我们不得不把外交政策理解为处理一个国家和其它国家的关系，那么这种处理方式则受到一定实际情况的限制。作为国家社会主义者我们还可以把一个民族国家外交政策的本质作如下的解释：民族国家的外交政策就是要保证通过国家所聚集起来的民族在这个地球上生存的安全，同时还要建立起一方面是人口数量与人口增长之间，另一方面是国土面积与国家财富之间一种健康的、有生命力的、符合自然规律的比例关系。

而只有确保能够在自己的国土上养育一个民族才总算可以视为是健康的状况。而其它的情况，就算这种情况可以持续上百年、上千年，也绝对是一个不健康的情况，并且早晚将会产生危害，最好不要导致这个民族的灭亡。

只有在这个地球上拥有足够大的空间才能够保证一个民族的生存自由。

所以人们不能只从目前的需要，也就是不能把土地收成的规模和人口数量进行换算来对所需居住面积的大小进行评定。正如我在本书的上卷中“战前德国的联盟政策”一章中所阐述的那样，因为一个国家的领土除了其直接养育人民的作用之外，还要有军事政策方面的意义。当一个民族已经保证以其国土能够养育自己的时候，因此就有必要考虑到要保卫眼前的这片土地。这通常取决于这个国家强权政治的实力，而这又常常由军事地理学的观念来决定的。

所以，德意志民族将作为世界强国来体现出自己的未来。正如我们应该称道我们或多或少还算是走运的外交活动那样，经过近二千年的时光，我们民族的利益就代表着世界的历史。我们自己就是见证人：因为1914年到1918年期间各国之间大规模的战争就是德意志民族为了在世界上争取自我生存的斗争，后来这个斗争过程的形式被人们称之为世界大战。

在这场斗争中德国成了假想的世界强国。我之所以说成是“假想的”，那是因为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要是德国在1914年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是另外一种状况的话，那么，除了另外一些原因，德国也许就是世界强国，并且这场战争也许能够有个更好的结局。

在没有“但是”的情况下去指出这些“如果”并不是我的职责或者说也只不过是我的看法。也许我感到非常有必要坦率而勇敢地阐述目前的状况，并指出使人不安的缺点和不足，以便至少在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队伍中加深对这种观点必要的认识。

现在的德国并不是一个世界强国。光是从需要克服军事上的软弱无能我们就没有资格享有这个称号。在这个星球上一个像今天的德意志帝国这样拥有如此的人口数量和少得可怜的国土面积比例关系的国家将意味着什么？在一个整个地球逐渐被各个国家所分割的时代，其中有些国家自己差不多把整块大陆都占领了，那么限制在一个只有五十万平方公里面积里的国家恐怕也谈不上是什么世界强国了。

如果单单从领土面积来和那些所谓的世界列强相比，德意志帝国就无影无踪了。人们不必拿英国来作反证，因为英国本身实际上是大不列颠帝国的一个大都会，地球上差不多四分之一的陆地面积都称作是大英帝国的领土。首先我们必须还要把美国，甚至俄国和中国都看成是大国。从领土面积上来看这些国家中有的相当于当时德国的十倍。法国也应该列入到世界强国的行列中。这不只是因为法国从不断扩大的疆域中让更多不同肤色的人来扩充军队，以至于实际上可以说是形成了一个在欧洲土地上的非洲国家。今天法国的殖民地政策和以往德国的殖民地政策

无法相提并论。要是法国按现在的方式再继续发展三百年的话，那么法兰西最后的血统就会消失在自己国家所形成的欧非混血儿的国家里。一个庞大的、完整的、住满了不断杂交所形成的劣等种族的聚居区将会从莱茵河一直延伸到刚果。

这就是法国的殖民政策和以前德国殖民政策的不同之处。

与其它所有的政策一样，我们以前所执行的殖民地政策也是不彻底的。我们以前所执行的殖民地政策既没有使德意志民族的居住地得到扩大，也没有尝试通过利用黑人的血统来增强帝国的实力，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犯罪。德属东非的本地士兵只能算是在这方面一个小小的、步履蹒跚的进步。而实际上这些本地士兵也只能用来保卫殖民地本身而已。把黑人部队投入到欧洲战场上的想法，就算是完全抛开世界大战过程中实际上的不可能性，即使是作为在较为有利的条件下才能够实现的主意也都是从来不存在的，而与此相反这个想法在法国人看来则被视为和意识到这是他们自己建立殖民地的活动。

所以，当我们今天看看这些世界上强国的时候，他们不仅在人口数量方面远远超出了德意志民族，而且特别在国土面积上也对其政治优势给予了极大的支持。而且不光从人口数量和国土面积方面来看，还有德意志帝国与这些显露头角的世界强国的关系，不管是两千年我们历史的开始以来，还是在今天都还从来没有如此地糟糕过。当时我们作为一个年轻的民族争先恐后地闯入了这个大国分崩离析的世界，我们自己还帮忙杀掉了最后一个巨人：罗马帝国。今天我们则身处在一个大国自己形成的世界里，其中我们自己的帝国却一再没落而变得毫无意义。

所以，我们有必要冷静而勇敢地记住这一惨痛事实。我们有必要对德意志帝国上百年来的人口数量和国土面积情况与其它国家进行研究和比较。我知道，那就会像我在开始观察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得出令人吃惊的结果：德国不再是世界强国，无论在军事上处于强大还是软弱的情况都无济于事了。

除了和世界上其它的大国处理好关系外我们都做得很好，这正多亏了我们德国那灾难性的外交政策，我几乎要说的是多亏了所制定外交政策目标的全然错误，并且还多亏丧失了维护自我生存的健康本能和意愿。

如果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真的为了我们的民族想要接受这一伟大而神圣历史使命的话，那么这场政治运动就必须充分和痛心地认识到我们在世界上的真正处境，并且要开始勇敢和目的明确地与把我们民族引向目前这种外交道路上的盲目和无能进行斗争。就必须不要顾及什么“传统”和偏见，鼓起勇气团结我们民族的力量行进在走出我们民族目前狭小的生存空间，走向新的土地，并且还要永远脱离从这个地球上消亡或者作为奴隶而必须伺候别人的危险的大道上。

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必须要试图消除不管是被视为食物来源，还是作为强权政治支柱的我们国家人口数量与国土面积之间这种不相称的比例关系，以及无论在过去的历史过程中或是现在对我们软弱无能的绝望情绪。同时还要意识到作为这个世界上高贵人类的保护者我们也肩负着同样崇高的职责，那么我们这方面的职责完成得越多，就表明我们越关心让德意志民族在种族意识上得到觉醒，并且除了养猫养狗培育种马以外也会怜悯一下自己的亲骨肉。

如果我把当今德国的外交政策说成是盲目和无能的话，为我这个断言作证的就是我国政治实际上的失败。如果是因为我们民族的愚蠢和胆怯，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奋斗的结果还不会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么糟糕。大战前整个一个世纪的发展也不会对我们掩盖什么，因为人们不仅可以估量出一个帝国的实力，而且还可以和其它国家进行比较。通过比较则正好证明了其它国家实力的增加不是越来越一致相同，反而在发展过程中差距越来越大，德国的发展过程中尽管好像一切都在欣欣向荣，但实际上自己与其它国家的距离则越来越大并远远地落在了后面，一句话，对我们不利的巨大差距在不断扩大。是的，就连在人口数量上我们都落后别人，并且时间越长，差距越大。世界上没有那个民族像我

们民族那样受到英雄主义的影响，是的，总而言之，为了维护自我生存肯定会让世界上其它民族付出巨大的牺牲，而失败只能是因为以错误的方式所做出的牺牲。

如果我们按照这种逻辑对我们民族千百年来的政治事件进行审视，把无数的战争和争斗都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并且对因此而产生出的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最终结果进行探讨的话，那么我们必须承认这些浴血奋战中只有三种我们可以称之为是出于明确的外交政策和真正的政治事件所产生结果的表现形式：一、主要由巴伐利亚人所开辟的帝国东部的殖民地，二、对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征服和占领，三、由霍亨索伦王朝所建立的勃兰登堡普鲁士国家形成为新德意志帝国的样板和雏形。

这对将来是一个极有教育意义的警示！前两项就是我国当初外交政策最经久不衰的伟大成就。没有这些成就我们民族恐怕至今还完全是无足轻重的。这是第一次，可惜也是唯一的一次将不断增加的人口数量与国土面积的大小进行协调并取得成功的尝试。而且在编纂德国历史的时候对这两项极其伟大以及对后世意义非常深刻的成就该会得到怎样正确的评价呢，而与此相反的则是尽可能地对非凡的英雄主义的大加赞颂，对无数冒险的经历和战争大肆宣扬，却没有最终认识到大部分这些事件对国家的发展路线是多么的毫无意义，想必这才是真正应该视为灾难性的东西。

德国政治活动的第三件伟大的成就则是建立了普鲁士国家和特别是由此所培育出来的国家理念以及符合当今世界需要的维护自我生存和自卫本能的有组织的德国军队。保护个人与保卫国家的思想转变是在国家以及国家观念中萌发的。这个转变过程的意义是完全不能过高评价的。正是我们这个由于充满辛酸血泪的、超出了个人承受能力的国家分裂，而七零八落的德意志民族至少在培养纪律性的过程中通过普鲁士军队的组织纪律性才找回了自己长期丢失的组织能力。其它民族在原始的群体意识驱动下还依稀尚存的精神，我们至少人为地通过军事训练为我们的国家重新找回了一部分。因此，取消普遍兵役制对其它国家可能是无关紧要的，但对我们来说则影响深远。十几代的德国人没有受过军

事训练和军事培训，这样所遗留下不幸的结果就是充满辛酸血泪的德意志民族精神思想上的四分五裂，并且我们民族真的会失去在这个地球上独立生存的最后机会。德意志精神只能以个人身份来受到其它国家的拥戴，也只不过为了连自己的起源都不知道的德国文化做点贡献罢了。这种长期的文化腐蚀最终会让北方的雅利安民族的最后血统在我们身上腐烂或者消失。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民族通过千百年的斗争所获得的这些政治成就真正的重要性反而受到我们的敌人比我们自己得到更好地理解和重视。我们至今还津津乐道地谈论着夺取了我们民族成千上万最为宝贵生命的英雄主义的最终结果则完全没有任何收获。

认真区分什么是我们国家政治方面的真正成就以及什么是为了毫无结果的目标而付出人民的鲜血对我们现在和今后的行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决不能够和我们今天那些只会到处高呼“爱国主义万岁”的资产阶级异口同声。特别要是把大战前最后的形势发展看作是我们应该走的道路也是非常危险的，即使只有很少的约束力。从整个19世纪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可以找出不只一个我们在这个历史阶段自己所应该承担的义务。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有不同于体现时代精神的行为，又代表着外交政策的最高理念，也就是说要使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保持一致。是的，我们要从过去吸取经验教训，我们必须为我们的政治行动制定出两个方面的目标：对外获得土地，对内则为政治行动的目标建立一个崭新的、稳固的、统一的思想基础。

我还要从伦理道德方面对有关对土地的要求怎样才算是合理的问题进行表态。可惜因为完全有可能从所谓的民众本身中产生出一本正经的空谈家，而他们就会竭力事先让德意志民族确定其外交行动的目标只是为了补偿1918年的不公正对待，所以有必要因此不惜以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博爱和同情来做保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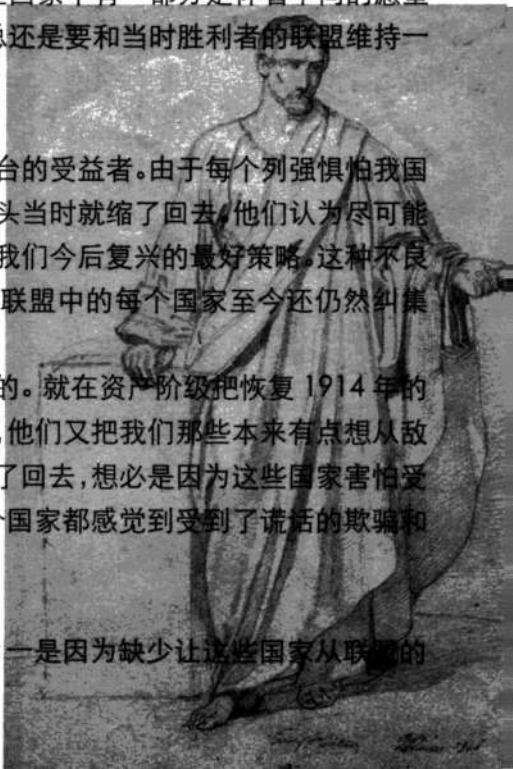
同时我事先还要说明的是：恢复1914年国境线的要求是一个政治

妄想，这种要求的程度和结果看起来却像是在犯罪。除非宁愿 1914 年德意志帝国的国境线跟实际相比是另一个样子。因为国境线实际上既没有完全把德意志民族包括其中，也没有合理地考虑到军事地理上的用途。国境线不是事先计划好的政治行动的结果，而只是决不会完结的政治争斗的暂时的分界限，而部分还是偶然事件的结果。人们可以以相同的理由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以更多的理由选定德国历史上其它任何一个年份，以便重新恢复当时的形势来解释外交活动的目标。以上的要求却完全符合对未来没有一个代表政治主张的资产阶级的愿望，他们更多地生活在过去，并且还生活在最近的过去，毕竟总是回头看这种行为本身是无法超越他们自己那个时代的。习惯性使得他们受到现有社会现状的约束，并使他们反对任何一种变化，而且任何的反抗行动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超出纯粹习惯性的范围。所以这些人的政治水平理所当然也就无法超出 1914 年的范围。同时他们还宣称要把恢复国境线的要求当作其政治行动的目标，却又重新和我们敌人摇摇欲坠的联盟混在了一起。唯一的解释就是世界大战后的 8 年这些国家中有一部分是怀着不同的愿望和目的加入联盟的，所以或多或少总还是要和当时胜利者的联盟维持一个完整统一的形式。

当时所有这些国家都是德国垮台的受益者。由于每个列强惧怕我国的实力则使得他们贪婪和嫉恨的念头当时就缩了回去，他们认为尽可能地共同来瓜分我们的国家才是防止我们今后复兴的最好策略。这种不良居心和对我国民族实力的恐惧才是联盟中的每个国家至今还仍然纠集在一起的粘合剂。

但是我们是不会受到他们迷惑的。就在资产阶级把恢复 1914 年的国境线确定为德国政治纲领的时候，他们又把我们那些本来有点想从敌人的联盟里跳出来的合作国家给轰了回去，想必是因为这些国家害怕受到孤立并由此失去盟友的保护。每个国家都感觉到受到了谎话的欺骗和威胁。

这些谎话有两方面的荒诞之处：一是因为缺少让这些国家从联盟的



污浊里回到现实中来手段；二是因为资产阶级自己也想把理想变成现实，而这样的结果却很糟糕，看在上帝的份儿上，所以就不值得重新让德意志民族付出鲜血了。

因为要恢复1914年国境线的要求只能以鲜血才能得以实现的想法好像几乎没有人会产生疑义。只有像孩子般天真的思想家才会考虑到通过秘密途径和乞求的办法来修改《凡尔赛和约》。这样的企图除非预见到我们没有塔列朗这样的人物才能够实现。我们国家的政治人物一半是非常狡猾的，但都是意志不坚定，并且完全还是对我们的民族充满恶意的敌对分子，而另一半则是心地善良、头脑简单、惟命是从的笨蛋。另外自从维也纳会议以后，时代则发生了变化：不再是王公贵族和他们的妻妾嫔妃用国境线来进行买卖交易和讨价还价了，而是残酷无情的犹太人在为统治世界进行着战斗。没有一个民族会逃脱他们的魔掌或者是把刀架在脖子上。而只有团结一致、充满民族激情的反抗力量才能够抵御这种对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奴役。这样的过程现在和将来都会是血腥残酷的。

如果人们仍然相信德国的未来反正要付出巨大代价的话，那么就必须抛开所有的政治主张，既然愿意付出代价，那么就为此确定一个相应的目标并为之而奋斗到底。1914年的国境线对于德意志民族的未来毫无意义。既然这样的国境线在过去没有保护德国，那么将来国境线里面也不会是个强国。德意志民族既不能通过国境线得到内部的团结，又不能靠它来保证养育自己的民族，从军事方面上来看，这条国境线也是毫无意义和无法令人满意的，也无法最终改善我们现在和其它世界强国或者说和真正的世界强国所处的关系。我们和英国的距离无法因此而缩短，我们也无法达到美国那样的国土面积，是的，就连法国在世界政治上的重要地位也无法真的可以降低。

只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就算是这种恢复1914年国境线的企图取得有益的成功则只会继续让我们民族把血流干，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为了真正能够确保我们国家生存和未来的决心和行动所应要付出的宝贵鲜血也都不复存在了。相反，人们会因为沉湎于这种空泛的成就而宁愿

放弃任何其它诸如改善“国家荣誉”以及发展经济，至少又进一步打开了一些通道的大门。

与此相反，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则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自己的政治方向，也就是要确保德意志民族在这个地球上自己所应得的土地。并且这是唯一的一项在上帝面前和在我们的后人面前可以公正地付出生命的行动，在上帝面前，只要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那就要为了每天的面包而战斗，作为人类，上帝并没有赋予我们任何东西，但我们多亏了人类的才智和勇气才拥有了人类主宰的地位，为了确保这个地位人类知道要为之而进行战斗，在上帝面前，只要我们作为国家公民没有做出牺牲，那么就不会诞生出成千上万的下一代。从现在的形势来看，这片德国的农民过去生儿育女的土地如今则容忍将来用他们的子孙为那些负责的政治家所欠下的血债以及人民为此而做出的牺牲来进行开脱。

同时，我必须坚决地反对我们国家那些把争取获得土地看作是“损害神圣人权”，并且还为此写出一些蹩脚文章的思想狭隘的人。人们不知道是谁躲在这些人的背后。肯定只会是那些想要引起混乱，希望与我们的民族为敌的人。利用这些罪恶的观点会帮助这些人让我们的民族自己削弱和消除唯一能够以正确方式体现其生存需求的意愿。因为在这个地球上一个只占据着一平方米土地的民族是不会还有什么崇高理想和高尚权利的。正如德国的国境线只是偶然形成的，并且也是由于各个时期的政治斗争而形成的暂时状态下的国境线，其它国家彼此生存空间的界线也是这种情况。而且正如地球表面的形状对于那些没有头脑的笨蛋而言好像是固定不变的，实际上每时每刻却是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中的表面上的静止状态，这种不断的变化是通过巨大的自然力量来完成的，也许就在明天借助于更加强大的力量就会产生破坏和变化，对于人类来说生存空间界线的变化也是如此。

国境线是由人类所创造的，并且也是可以由人类来进行改变的。

一个国家成功地获得大量领土的事实不是什么多么崇高的职责，但其本身则应该受到肯定。这证明了征服者的力量和受难者的软弱。并且只有这种力量才代表着权利。如果今天的德意志民族挤在一块无法生存的地方，面对着一个悲惨的未来，那么其命运的要求也只不过是对于这种侮辱表示反抗罢了。

就好像是一种强权势力允诺给别的国家更多的地盘，而给德意志民族如此少的土地或者通过不合理的划分来侮辱德意志民族一样。所以正如我们今天生活在我们的先辈所获得的土地上，这不是靠上天的恩赐，而是通过付出生命代价的战斗得来的，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土地以及为民族所应献出的生命将来也不是靠上帝慈悲的赠与，而是要靠取得胜利之剑的威力。

现在尽管我们大家都认识到与法国进行商谈的必要性，但为此而丧失了我国外交政策的目标首先是不值得的。而这种必要性只能并且只有当其支持扩大我们民族在欧洲生存空间的时候才有意义。因为我们并不是把获得殖民地看作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只是要获得定居区，扩大祖国的国土面积并不是让新的移民和宗主国保持更加密切的关系，而是要确保共同生存空间的有利条件。

民族主义运动并不是其它民族的维护者，而是自己本民族的开路先锋。否则这项运动就是多余的，并且特别是完全没有权力对过去说三道四。因为其所作所为就是如此。就像以往德国的政策错误地由君主时代的观点来决定一样，所以今后的政策也就很少由民族主义的多愁善感所引导了。尤其我们不是那些众所周知的“贫穷、可怜民族”的警察，而是我们自己民族的战士。

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还要继续走下去：拥有对土地的权利应当是一项职责，如果没有土地的扩展对于一个伟大的民族则意味着衰亡。另外完全不同的是这不是涉及到某个可爱的黑人民族，而是关系到以其文明的形象赋予今天这个世界的日耳曼母亲的生命。德国要么成为世界强国，要么完全什么都不是。而要成为世界强国德国就需要在当今这个时

代能够给予德国必要的重要地位和德意志民族生存的国土面积。

所以，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很明智地将大战前的外交政策一笔勾销。我们从六百年前先辈们倒下的地方重新开始。我们把开向欧洲南部和西部永不停息的德国战车停了下来并把目光投向东方的土地。我们终于结束了战前的殖民贸易政策并走向未来的国土政策。

而当我们今天在欧洲谈论新的领土的时候，我们首先只能想到的就是俄国以及受其奴役的周边国家。

命运之神好像愿意给我们一个示意。命运之神把俄国交给了盗取能够保证和维护国家生存的俄罗斯民族聪明才智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因为俄罗斯国家的组织形式并不是斯拉夫民族在俄国具有治理国家政治能力的结果，而更多的只不过是个日耳曼民族的基本特征在劣等民族中能够为组建国家发挥作用的完美例证。所以世界上有无数的强大国家才得以建立起来。劣等民族把日耳曼民族的组织者和先知当作是自己的领导人常常会一下子成为强国，并且只要还能保持住这个建国立业的民族核心就会长久不衰。近一个世纪以来俄国的上流统治阶层一直依靠德意志民族作为领导核心才得以维持。而今天这样的领导核心几乎完全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则是犹太人的出现。而对于俄国人本身来说则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来摆脱犹太人的束缚，所以犹太人也不可能永久地统治这个庞大的帝国。俄国人本身不是善于进行组织工作的材料，反而却是易于起到分化瓦解的发酵素。这个位于东方的庞大帝国已经快要崩溃了。并且犹太人在俄国统治的结束也就是俄国作为国家的完结。我们被上天选为将要成为一场最能证明民族主义种族理论正确性灾难的见证人。

我们的任务，同时也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使命就是让我们的民族明白自己未来的目标不是陶醉在新时代亚历山大大帝远征的幻想中来实现的，而更多的则要通过德意志民族辛勤耕种用利剑才能够得到的土地来完成的。

犹太人宣布要最强烈地反对我们这项政策是理所当然的。为了自己

的未来，我们会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容易地感觉到这种行为的意义所在。恰恰就是所有真正具有民族主义思想倾向的人才应该体会到这种新思想的正确性。可惜事实正好与之相反。不只是在德国，而且甚至在“民族”国家中人们都非常反对这种东方政策的想法，同时还时常借此机会扩大影响。用俾斯麦的话说就是要尽可能地在最大程度上掩盖其损害德意志民族的政策。

俾斯麦自己过去也极其重视和俄国的友好关系。这是绝对正确的。只不过同时人们完全忘记了还应当值得注意的就是他也非常重视比如和意大利的友好关系，是的，为了能够更好地解决掉奥地利，这位俾斯麦先生本人也曾经和意大利联盟。为什么不继续执行这项政策呢？人们会说“因为今天的意大利已经不是从前的意大利了”。不错，尊敬的先生们，请允许我提出批评，现在的俄国也已经不是过去的俄国了。俾斯麦从来就没有想到要从策略上把这条政治路线原则上确定下来。比起让他自己本人承担结盟的责任来说，俾斯麦更像是当下的大师。所以问题不应该是：俾斯麦在当时做了些什么？而更应该是：他今天该做些什么？这个问题也很容易回答。以俾斯麦在政治方面的聪明才智他不会和一个走向衰亡的国家去进行联盟的。另外俾斯麦在他那个时代就带着喜忧参半的心情对德国的殖民和贸易政策加以考虑了，因为对于他来说主要的原因在于要以最安全的方式来实现由他创建起来的国家内部的统一和稳定。这也是为什么他当时需要俄国的支持，以便他可以放心大胆地对付西方国家的唯一理由了。只不过这项政策过去给德国带来好处，现在则带来灾难。

早在 1920 到 1921 年期间，当时新兴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就开始在政治领域崭露头角，并且到处被人称作是争取德意志民族自由的运动，从四面八方加入到这场政治运动的人们就提出要试图和其它国家争取自由的运动组织建立起某种联系。就像许多人所宣传的“被压迫民族联盟”。这主要涉及到一些巴尔干国家，接着就是诸如像埃及和印度这样的国家，而每个国家给我形成的则是说大话、吹牛皮、装模作样的印

象，显然每个国家都有真正的背景原因。但也有不少，特别还是在民族主义阵营里的德国人竟然被这些自吹自擂的东方人搞得神魂颠倒，并且不假思索地相信任何一个跑到这里来站在面前的印度或者埃及的学生的确就是印度或者埃及的国家“代表”。人们完全不明白这些通常都是些既没有什么政治上的支持，也没有得到任何授权的人，如果人们不想把所浪费的时间也算作是损失的话，那么和这些人缔结协定实际上的结果就等于零。我一直就反对这样的尝试。并不是因为我有比混上几个星期进行毫无结果的“谈判”更好的事情去做，而是我认为即使这些人都是这些国家授权的代表，那么整个过程也是有害而无益的。

德国的联盟政策在和平时期由于缺乏主动进攻的意识而淹没在世界历史古老而落后的国家防御组织中就已经是很糟糕了。不管是和奥地利还是和土耳其的联盟都很少有什么可喜之处。就在世界上的军事和工业强国联合起来结成主动进攻同盟的时候，我们却纠集了几个越来越年老昏聩、治国无能的国家，并且还企图胆敢和这几个肯定会走向衰亡的破烂货一起跟同盟国进行对抗。德国为外交政策的错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只是为了防止我们这些空谈家一下子在犯同样的错误，这种代价好像显得还不够惨痛。通过一个什么“被压迫民族联盟”就能够解除最强大胜利者武装的企图不只是可笑，而且有害。之所以“有害”，那是因为这样会一再地误导我们的民族脱离现实而沉湎于奇妙但却毫无结果的希望和幻想之中。如今的德国人真的就像是溺水者想要抓住任何一棵救命稻草一样。就连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是如此。所以不管在任何地方这些人只要看到一点根本无法实现希望的鬼火就赶快以最快的速度开始追逐这种幻想。也许这种“被压迫民族联盟”是一个国家联盟或者是一种新的了不起的发明，但绝不会赢得成百上千人的信赖。

我还记得在 1920 到 1921 年期间，在民族主义阵营里突然冒出既幼稚可笑又无法理解的想法期待着英国将要面临在印度的崩溃。也许是一些亚洲的江湖骗子，我想也可能是真正来自印度“争取自由的战士”，他们当时在欧洲四处游荡并让真正理智的人们都坚定地相信以印度为

经济命脉的大英帝国将要在那里面临着崩溃。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的期待成为所有一切妄想的根源所在。同样他们也不知道这种期待的荒谬之处。因为就在他们期待着英国在印度的统治面临崩溃就是英国世界霸权和世界强国终结的同时，也就自己承认了印度本来对英国就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而这个有关生死存亡的问题也许不仅对于一位德国的预言家，而且想必对于掌握英国命运的人来说也早已不是什么深奥的秘密了。认为在英国人们不知道正确地去认识印度对英国世界强国的重要性是非常幼稚的。如果人们真的以为英国会毫无察觉地任由印度跑掉，那么对于没有从世界大战中吸取教训以及对盎格鲁撒克逊人坚强意志的完全误解都只是一个不祥的征兆。另外也证明了德国人对英国人统治和管理整个帝国方法的一无所知。英国只有在其管理机构要么遭受到异族的破坏（目前这样的情况在印度完全可以不予考虑），要么在强敌武力胁迫的情况下才会失去印度。可印度的叛乱永远都不会成功的。而要威胁英国是怎样的困难我们德国人则有足够的教训。除非我作为一个德国人宁愿让印度受到英国的统治而不是受到其它民族的统治。

这就像可怜巴巴地盼望着在埃及也发生传奇般的起义一样。这样的“圣战”可以让我们德国的公子哥们舒舒服服地学会感到害怕，光想着现在有人准备为我们去流血牺牲，说实在的毕竟这种胆怯的空想就是可怜的期望无声的根源所在，但实际上在英国人枪林弹雨的火力扫射下他们会遭受地狱般的毁灭。

但靠一个残兵败将的联盟去向一个下定决心为其生存在必要情况下要付出最后一滴鲜血的强大国家发起进攻是不可能的。作为一个按照种族基本特征来评价人类价值所在的民族主义者，我已经从所谓“被压迫民族”的种族劣根性中知道我们民族的命运不能和他们联系在一起。而我们今天则完全处于和俄国相同的地位。目前已渐渐失去日耳曼上流社会特征的俄国完全不考虑其新主人的内政计划，因而也不会是为自由而战的德意志民族的盟友。单是从军事方面考虑，如果是德俄联盟对西

欧国家进行作战，或许也就是和整个世界开战，那么这种形势简直就是灾难性的。这场战斗将不会在俄国，而是在德国的土地上进行，况且德国从俄国那里也只能获得少之又少的一点点必要的支持。目前德国的统治手段也非常软弱，根本不可能对外发动战争，甚至针对西欧国家包括英国的边境防御都无法进行，并且恰恰是德国的工业才使得针对敌人的进攻武器处于毫无自卫能力的状态。另外在德国和俄国之间还有一个法国时常插手的波兰。在德俄联合针对西欧国家作战的情况下，为了将第一批士兵送到德国前线，俄国则必须先占领波兰。同时不只是士兵，还要有武器装备。这样才会重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形，只不过还要更加可怕一些。正如当时的德国工业为了我们光荣的盟友而鼎力相助，并且德国几乎从装备上是独自承担了战争的需要一样，那么在这次战斗中也不要完全不考虑俄国作为武器装备方面的因素。整个世界的机械化趋势将会在下一场战争中以其强大的规模和决定战争胜负的形式显现出来，这一点我们是无法否认的。很惭愧，毕竟不仅是德国自己在这极其重要的方面大大地落后了，想必只有很少的国家才拥有这方面的技术，甚至包括俄国直到今天自己也还没有一个工厂能够真地生产出可以开得起来的汽车。所以类似这样的战争则只具有杀戮的特点。德国的年轻人将要比以前付出更多的鲜血，毕竟和往常一样落在我们肩上的只有战争的重担，而战争的结果则是不可避免的失败。

假如就算是奇迹发生，这样的战争不是以把德国完全灭亡作为结束的话，那么最后的结果也只不过是流尽鲜血的德意志民族和以前一样被军事强国所围困，因此德国真正的处境也就没有任何的改变。

与俄国进行联盟就不得不同时去考虑发动一场战争或者要全面去准备这样一场战争，人们现在是不会反对的。不会的。一个没有把打算进行一场战争为目标的联盟是毫无意义和一钱不值的。联盟把人们召集起来就是为了进行战斗。并且有关是否现在就签署联盟条约的争论也许还是很遥远的事情，但是尽管如此指望发动战争则表明心中对战争的渴望。而且人们肯定不会相信任何一个政权会对这样一个联盟的意义做出其它的解释。要么德俄联盟只停留在书面上，这样对我们来说则毫无意

义和一文不值，要么这个联盟就从条约中的文字变成看得见的现实来警告其它国家。那种认为英国和法国会在这种情况下等上十年让德俄联盟完成战争武器装备的准备该是多么的幼稚。不会的，暴风雨会闪电般地降临德国。

实际上和俄国签订联盟条约就已经表明要进行下一场战争。其出路也就是德国的末日。

另外还有以下原因：

一、目前俄国的统治者完全没有真心诚意地考虑缔结或者维护联盟。

人们不要忘记的是，当今俄国的统治者是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他们是人类的败类，他们借助于乱世危难一举占领了一个大国，他们野蛮残暴地屠杀上百万在他们国家举足轻重的知识分子而且还要斩尽杀绝，并且他们所实施有史以来最为残暴的专制统治已经差不多有十年了。人们还不应该忘记的是，他们这些统治者都属于少有的那些有着兽性的残暴和难以置信的欺骗手段而结合起来的東西，并且现在还更加相信自己必须担负起残暴地去奴役整个世界的责任。人们不要忘记那些今天完全统治着俄国有着国际主义思想的犹太人，他们并没有把德国看成是盟友，而看成是一个将要遭受和俄国同样命运的国家。人们恐怕不会和一个其唯一的兴趣就是要消灭对方的伙伴签署条约的。人们尤其是不会和一个无视条约神圣的、不是作为荣誉和真诚的代表活在世上的，而是代表谎言、欺骗、盗窃、抢劫和强盗的家伙签订条约的。如果人们相信能够和寄生虫签订条约的话，那么就好像是一棵树为了自己的好处企图去和寄居在自己身上的槲寄生去签订协议似的。

二，俄国从前所遇到的危险现在则不断地出现在德国。只有资产阶级的傻瓜才能够假装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着迷。也就是说他们是按照表面上的认识根本就不知道这是关系到一个犹太人想要谋求统治世界的大事，当然同样也关系到盎格鲁撒克逊人自己也要统治世界的愿望。而且

正如盎格鲁撒克逊人以其自有的方式追寻这条道路并以其自己的武器进行战斗一样，犹太人也有自己的方法。犹太人采取的办法就是潜伏到人们中间并使其内部受到侵蚀，犹太人所使用的战斗武器就是撒谎、诬陷、侵蚀和破坏，直至用血腥的手段将其所憎恨的敌人彻底铲除。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理论中我们看到了犹太人在二十世纪所要表明的就是自己要成为世界主宰的企图，正如他们在其它的历史时期也通过相互有内在联系的事件试图谋求同样的目标一样。他们的这种追求深深地根植于其性格本质之中。从本性上来看很少有其它的民族会自己放弃本民族的天性和权力的不断增加，而是通过外部形势所迫或者由于老迈无能而衰落，也很少有像犹太民族那样出于自愿放弃而中断自己成为世界独裁的道路或者是因为他们克制自己永久的渴望。所以，即使是犹太人要么他们通过除了来源于自己本身的力量实现自己的目标，要么由于自己的死亡使得其谋求世界主宰的所有努力全部完蛋。而民族的软弱无能及自己本身的生老病死都源于自己血统的纯正。在这方面犹太人比世界上的任何其它任何民族都维护得更好。所以犹太人就继续走在命运坎坷的道路上，直到遭遇到其它民族的抵抗，并在大规模的战斗中再次让想入非非的幻想家见鬼去了。

今天的德国将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下一个主要的战斗目标。为了重新振兴我们的民族，为了摆脱国际主义思想毒蛇的诱惑以及防止对我们体内血液的毒害，为了将因此而获得自由的国家的实力来确保我们民族安全在将来阻止灾难的再次发生，就需要一个新生的负有重大使命的思想所有的力量。但是如果为了追寻这样一个目标和一个我们将来自己当家作主的死敌的国家进行结盟的话，那可就是痴心妄想了。如果人们自己自投罗网，那么又怎么才能让我们的民族摆脱毒害的束缚呢？怎样才能够让德国的工人阶级明白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可恶的人类罪行，而如果人们自己和这种恶魔般的国家领导人进行结盟的话，那么这些恶魔会承认吗？如果国家领导人自己选择和这种世界观的代表进行结盟的话，那么人们会有什么理由去责备因为同情这种世界观的广大民众呢？

反对犹太人布尔什维克主义国际化的斗争要求对苏维埃俄国采取明确的立场观点。对此人们不可以用降魔驱鬼的办法。

如果今天的民族主义者自己还在热烈地谈论着与俄国缔结联盟的话，那么他们就应该只需要到德国来看看并且会明白在开始的时候能够得到谁的支持。或者又会像国际上马克思主义分子的新闻机构所介绍和宣传的那样把民族主义看作是造福德意志民族的行为？从什么时候开始民族主义者用犹太人送给我们的护身铠甲去进行战斗的呢？

人们可以对过去德意志帝国的联盟政策进行指责：由于不断地摇摆不定和软弱无能并且不惜一切代价去保卫什么世界和平，以至于我们的一切对外关系都变得十分糟糕。不过有一件事却是不可以进行批评的，那就是不再和俄国继续保持良好关系了。

我坦率地承认并且在战争前如果德国放弃愚蠢的殖民政策和贸易及海军炮舰政策而与英国结成联盟去对抗俄国，并且从毫无意义的世界霸权政策过渡到坚定地在欧洲大陆获得领土政策的话，那么形势会更好一些。

我不会忘记当时推行泛斯拉夫主义的俄国竟然不断地向德国进行狂妄地威胁；我不会忘记俄国不断地进行战争动员演习的唯一目的就是在奚落德国；我不会忘记大战前俄国公共舆论的态度就对德意志民族和德意志帝国充满仇视的诽谤；我不会忘记俄国主要的新闻机构总是一再地崇尚法国，而不是我们。

只是尽管所有这一切，那么兴许在大战前也还是有依靠俄国去反对英国的第二条道路的。

而如今的形势则不同于以往。如果说大战前人们还可以在扼杀所有可能出现的情感因素的情况下与俄国为伍，那么现在则不再会这样做了。世界历史时钟的指针继续向前移动，并在其巨大的撞击声中宣告了决定我们民族命运的时刻。目前世界大国之间的联合则是最后一次警告我们要认真地进行思索，并要把我们民族再次从梦幻的世界中带回现实。

酷的现实中来，而且还要给我们民族指出通往未来让我们国家重新繁荣昌盛的道路。

假如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能够考虑到伟大而又艰巨的使命，摆脱一切幻想并且只以理智作为唯一的指南，那么 1918 年的那场灾难也许还可以成为我们民族将来无尽的福祉。从这次毁灭中我们的民族能够在外交政策方面有了全新的行动方向，而且还可以对内通过新的世界观得到巩固，对外则形成外交政策的最终稳定。最后所得到的就是英国所击败的，俄国所拥有的，而且一再让法国为了其自身的利益做出正确决定的东西，也就是：一项政治嘱托。

德意志民族外交行动的政治嘱托应该并且必须永远都是：

永远不要容忍在欧洲大陆上形成第二个强国！要是有任何与德国邻近的国家有成为第二个军事强国的企图，即使也只是形成了具有军事强国能力的样子，那也要视为对德国的进攻，并且不只是有权利，而且有责任使用各种手段，直至使用武力来阻止这样国家的形成，或者一旦形成则要进行消灭。要知道我们民族优势的基础不是在殖民地，而是在我们的家乡欧洲！如果无法在几百年里给我们民族每一个后代以立足之地的话，那么我们的国家就永远没有得到保障！不要忘记这个世界上神圣的权利就是在人类自己所开垦的土地上生存的权利，最伟大的牺牲就是人类为土地所付出的鲜血！

要是还没有再次为我们指出欧洲目前唯一存在的联盟的可能性，我还不想结束这方面的思考。在前面的章节里我就已经针对德国结盟的问题把英国和意大利作为唯一在欧洲可以与其发展较为亲密的关系，并且对于我们来说是值得追求和有成功希望的两个国家。在此我想简短地提及一下这样的联盟在军事上的重要性。

缔结这种联盟在军事上的结果必定和与俄国进行联盟的结果完全相反。最主要的事实就是与英国和意大利亲近决不会招惹战争的危险。唯一对这个联盟持反对态度的强国就是法国也没有能力来进行反对。因

此这样的联盟就给了德国心平气和地在联盟许可的范围内做着对法国迟早都会进行报复的各项准备工作的机会。因为这样的联盟本身的意义就在于德国通过缔结联盟而不会突然遭到敌人的入侵，反而敌方的同盟自己会瓦解，我们不得不永远要把许多的不幸都要归功于他们的那个协约国就会自行解散，所以我们民族的死敌法国就会因此而陷于孤立。就算这样的成功只取得了道义上的效果，那么也足以给德国争取自由的运动一个在今天还几乎难以预料的余地。因为行动的规则掌握在新组建的盎格鲁 - 德国 - 意大利联盟的手中，而不再由法国来进行操纵了。

还有一个成果就是德国一下子就摆脱了因战略地理位置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对侧翼国境线强有力的保护一方面是完全保障我们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的供给，另一方面对新国家秩序的作用也是大有益处的。

另外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事实就是新联盟所包含的国家在某些技术方面的成就可以相互进行补充。这样的话德国就第一次成为了不再是我们自己经济的吸血虫，而是甚至还可以并且也将用其它盟友那部分力量来对我们的武器装备进行极大的充实。

人们不可忽视的最后一个事实就是这两种情况所涉及到的盟友无法和土耳其或者今天的俄国相比。比起上次战争中德国所联合的腐烂如死尸般的国家，这回世界上最大的强国和一个年轻的民族国家将为在欧洲的一场战争提供另外一种前提条件。

正如我在前面的章节中所强调过的，要想与这样的联盟为敌困难当然会是很大的。可是，难道说协约国的形成是一件不太困难的事情吗？凡是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所能够获得的成功，而且还有很大一部分是违背自己本身利益的成功，只要我们受到形势发展必要性的鼓舞，并且因此以机敏的克制来决定我们自己的行为，那么我们也将会能够而且必须能够获得成功。况且在目前记忆中充满了痛苦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取代最近十年来外交政策的盲目性而走上唯一目标明确的道路并且还要坚持走下去。我们外交政策未来的目标不只是向西向东的问题，而是旨在为

了我们德意志民族获得所需土地的东方政策。为此人们是需要实力的，可我们的死敌法国则毫不留情地对我们进行扼杀，还削弱我们的实力，我们不得不自己承担每一次牺牲，这样所造成的结果就是我们要为消除法国在欧洲建立统治霸权的企图而做出贡献。任何一个和我们同样认为法国在欧洲大陆的统治欲望都是无法容忍的强国在今天都是我们的天然盟友。只要是最终目标提供战胜我们最厉害死敌的可能，那么就没有什么成为这样一个强国的进程可以难倒我们，并且也就没有什么牺牲是说不出口的。那么就让我们安安静静地把较轻微的伤痛随着时间的减弱效果去进行治疗吧，因为我们能够治疗和愈合最大的伤痛。

当然我们今天会陷入我们国内敌人充满仇恨的叫骂声中。那么让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决不要被这些叫骂所迷惑，并且非常有必要把我们心中的信仰告诉大家。虽然我们现在必须要抵制利用德国人的疏忽大意而被犹太人的阴谋诡计所迷惑的公众舆论的潮流，虽然有时候这股浪潮还邪恶凶狠并且来势汹汹地围绕着我们，但是，只有在水中游泳的人才会更容易地看到谁才是与风浪搏击的人。今天我们只是一块礁石，几年后命运会让我们成为一道粉碎一切惊涛骇浪使其另辟蹊径的堤坝。

所以，恰恰有必要让其他人认识并且确信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是一种政治观点的代表。上天对我们有什么安排，从我们的脸上早就应该看得出来。

一旦我们自己认识到必须要确定我们外交政策行动的必要性，就会从认识当中涌现出我们有时所需要的坚定不移的力量，当处在敌人新闻界暴徒的猛烈攻击下会有这个或那个人感到恐惧，并且会使他渐渐地产生轻微的同情，为了不让所有人反对自己那么至少就要在这个或那个方面同意做出让步，并且也跟着人云亦云。





第十五章 紧急自卫权

伴随着 1918 年 11 月放下武器投降的则是采取了一项按照人们的预见会逐步走向完全被奴役的政策。类似的历史事件告诉我们，那些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就放下武器投降的民族，随后与其说试图通过暴力发出重新改变命运的呼吁，还不如接受莫大的屈辱和勒索。

这种解释还算是通情达理。在可能的情况下，一个明智的胜利者总会把他的要求分别向战败方提出。那么对于一个变得意志薄弱并且也许是甘愿为奴的民族，这个胜利者因此就要考虑每一次的压迫是不是再也感觉不到有再次拿起武器的充分的理由。但是以这种方式愿意接受的压迫越多，那么就会越显得对被压迫者更加不公平，因为每个人显然都会面对新的，而且肯定还是一再重复的压迫最终而进行自卫的，特别是当人们考虑到所有因素，知道反正已经受到了许多压迫但还要默默地和耐心地去忍受更多和更大的不幸的时候。

迦太基的没落就是一个民族咎由自取而慢慢走向灭亡的最可怕表现。

所以，克劳塞维茨在他的“三大经典理论”当中也就此以不可比拟的方式列举出这样的观点并且明确地指出永远都是如此，他说：“这种受到奴役的耻辱是永远都抹不掉的，这种在一个民族血液中的毒素将会传给下一代并将麻痹和削弱他们的力量”；与此相反有人则认为“血腥和光荣的战斗之后自由的毁灭本身是民族获得新生的保证并且生命的种子就如同老树发新枝那样总会生根发芽的”。

当然一个变得没有尊严意志薄弱的民族是不会关心这样的教训的。

因为谁要是把这样的教训牢记心间就完全不会如此沉沦，而谁要是忘记或者根本不愿意知道这样的教训则会走向毁灭。所以不要期待一个意志薄弱受到奴役的民族会突然明白去按照理智和根据人类的经验教训采取不同于以往的其它行动。相反恰恰正是这些人都尽量拒绝接受这样的教训，直到要么这个民族最终习惯了奴隶的枷锁，要么就会涌现出更加优秀的强者去夺下这些无耻坏蛋手中的权力。在第一种情况下人们一般不会完全感觉很坏，因为他们常常会得到聪明的胜利者所授权去看管奴隶的职位，而这些意志薄弱的人反而会比敌人所安排外来的恶人还要更加残酷无情地对自己的人民行使着这项职责。

可惜自 1918 年以来形势的发展告诉我们，在德国想要用自愿被奴役来赢得胜利者恩赐的期望以不幸的方式在左右着广大民众对政治的判断能力和行为举止。所以我要着重向广大民众强调，因为我自己也真难以相信，我们国家领导人的所作所为同样就是败坏道德的疯狂之举。同时我们国家的命运自战争结束以来更加完全赤裸裸地被犹太人所掌控，而真正让人无法接受的不只是对我们不幸原因的错误认识，相反必须确信的则是使我们民族清醒的意愿走向了毁灭。并且正如人们当初以这样的观点来看待我们国家对外政策明显的荒谬之处一样，这同样也揭示出为了犹太人征服世界的想法和战斗而服务的最狡猾冷酷的思维逻辑。

所以，自 1806 年到 1813 年这段时间就足以让几乎完全崩溃的普鲁士充满崭新的生命活力和战斗决心，而今天我们不只是白白地浪费大好时光，反而不断地把我们的国家引向衰弱好像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1918 年 11 月之后的七年签订了《洛迦诺公约》！这个事情的到来在上面已经提到了：因为一旦签订了可耻的停战条约以后，那么以后就不会出现突然立刻去反对敌人一再重复使用的奴役手段的力量和勇气了。但要是一下子提出过多的要求则是聪明得过头了。所以他们所提出的勒索永远都仅限于他们认为同时也是我们德国政府所认为的目前尚可承受的范围内，因而也不必害怕爆发民众的抗议。但是签署和强行接

受如此苛刻的条件越多，那么就显得更加没有理由因为一次继续勒索或者受到侮辱而突然由于其它更多的勒索和侮辱去进行反抗。这就是克劳塞维茨所讲的那种“毒素”：起初所形成的意志消沉本身会一再扩大，并且最糟糕的结果就是逐渐给以后的坚强意志拖后腿。而这样的意志消沉可以成为使一个民族几乎无法摆脱而最终是将其拖进作为奴隶民族而存在的举足轻重的因素。

所以，在德国人们会把缴械的命令和奴役人民的诏书，政治上的勒索和经济上的掠夺相互混淆，而为的就是在道德方面产生出某种按照道威斯先生的意见可以看作是一种幸福，在《洛迦诺公约》中则视为胜利的精神思想。当然人们可以从更高的观点立场出发来谈论这样一种悲痛中的幸福，一种可以迷惑人类但却无法感动上天的幸福。毕竟上天的赐福还没有到来，困难和恐慌从此就永远伴随着我们，并且我们唯一忠实的盟友就是不幸。在这种情况下上天也没有格外开恩，而只给了我们所应该得到的。同时我们也不懂得尊重荣誉，但至少还学会了去赞赏争取面包的自由。为了面包人们学会了呼喊，为了争取自由总有一天人们也会祈祷的。

在1918年以后的几年里我们民族的崩溃也是何等地悲惨痛苦和多么地明显，所以恰恰就是在这个时期人们就决心要密切关注最为严重的现象，并敢于对以后总还可以证实的东西在当时就能够进行预言。而我们国家的领导人竟是如此地糟糕，他们竟然如此的自负，尤其是当他们冷遇那些由于令人难以接受告诫所以令人不快的预言家的时候。同时人们还可以亲眼看到（并且在今天也仍然如此！）议会里那些最伟大的笨蛋其实都是些马鞍匠和手工制鞋工，不是按照职业来称呼，因为有些甚至连职业都说不出来的亲戚朋友忽然推举到政治家的地位，然后又从这样的位置上对着普通的凡人指手画脚的。同时大部分这样的“政治家”在其治理国家的第六个月里就会被当作最不可信赖的草包而引起其它国家的嘲笑和讽刺并予以揭发而不知所措，这的确也就给其彻底的无能提供了可靠的证据，而这些在过去和现在都完全被当作是无关紧要的！的确，这完全是无关紧要的，相反：共和国议会里的政治家越是缺少真

正的成就，那么他们既越发迁怒于那些期待他们有所成就，以及胆敢承认他们至今行为的失败并且还敢于预言他们今后失败的人们。但要是盯住议会里这样一个装模作样的家伙，那么这位政治家就真地不再会否认其整个行为和结果的失败，但却会找出成百上千不成功的理由，并且只是不愿意认同他们自己才是这一切不幸的主要原因。

最晚到 1922 年年底至 1923 年初的冬天，人们一般就应该明白法国要签订《巴黎和约》的结果已经是板上钉钉的情况下仍然还要竭力实现原来的战争目的。因为也许没有人相信法国在四年半决定其历史的关键战斗中牺牲了本来就不多的生命只不过是可以在以后通过战争赔款把以前所造成的损失重新得到补偿罢了。如果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还不足以说成是发动战争原动力的话，除非这真的不是法国对外政策伟大的未来政治计划中的一部分。法国的目的就是要将德国分解成小国多邦的大杂烩。为此具有大国沙文主义的法国而进行着战斗，同时，实际上却又把自己的民族当作奴仆出卖给了具有国际主义思想的犹太人。

正如人们当初在巴黎所期待的那样，如果这场战争要是在德国的土地上进行的话，那么法国的战争目的恐怕就会通过战争而得到实现了。试想一下，世界大战的血腥屠杀不是在索姆河畔，不是在佛兰德斯，不是在阿图瓦，不是在华沙、伊万格勒、加夫诺和里加或是其它什么地方开始展开，而是德国境内，在鲁尔区、在美因河畔、在易北河畔、在汉诺威、在莱比锡、在纽伦堡等等地方，那么人们也许就有可能同意把德国摧毁。而问题是我们年轻的联邦国家在这四年半的时间里能否像那个几百年来就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并且只把巴黎当作无可争辩的中心来进行想往的法国那样经受得住同样的考验。最大规模的多国战争在德国的国境线以外的地区展开不仅只是我们原来唯一的军队的不朽功绩，而且也是德国未来的最大幸福。否则在另一种情况下今天就已经不会再有德意志帝国，而只有“德意志的国家”了，这是我坚定不移的，有时也是我内心无法抑制的信念。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那些牺牲的朋友和兄弟至少他们的鲜血没有白流的唯一理由。

而所发生的一切则是另外一个样子！就在1918年11月德国像闪电般迅速地崩溃了。只不过当灾难在国内发生的时候，我们的军队还深处在敌人的腹地。当时法国首先忧虑的不是德国的分裂，而更多的是：如何使德国军队尽可能快地撤出法国和比利时？并且对于巴黎当局来说，结束世界大战的首要任务就是让德国军队放下武器并且接下来在可能的情况下把他们赶回到德国去，其次才可以致力于去实现最初和本来的战争目标。总之法国已经深陷其中了。在英国是把消灭作为殖民地强国和贸易大国的德国并使其降为二流国家则是以大获全胜来作为战争结束的。对于要完全彻底地消灭德国的兴趣非但没有，反而因为要针对法国将来在欧洲的崛起则希望有一个竞争对手。所以法国的政策就必须首先要坚定地沿着战争的道路来继续进行和平谈判，就像克列孟梭所说的那样，对他而言和平也不过只是战争的延续，这句话又多了一层含意。

渐渐地，出于各种各样可能的原因人们必须要触动帝国的内部机构了。巴黎当局希望一方面通过承担不断翻新的缴械所需的费用，另一方面因此尽可能地进行经济盘剥来慢慢动摇帝国的内部机构。国家的荣誉在德国消失得越多，经济压力和没完没了的痛苦就会越早地在政治上产生破坏作用。这种从政治上压迫，经济上掠夺的政策实施十年，二十年必然会把最好的国家逐渐毁掉或者解体。因此法国最终达到了其战争的目的。

想必人们在1922年年底到1923年初这段冬季时间里就已经认清了法国的意图。所以就只剩下两种可能：人们期待着要么使法国对于德意志民族的坚韧顽强的精神逐渐变得麻木，要么就最后干一次从没有做过的事情，也就是说在极端的情况下用力掉转帝国行驶的船头并且将矛头直指敌人。总之这就意味着是一场生与死的战斗，正如以前成功地孤立法国并使得接下来的战斗不再是德国与所有国家的搏斗，而是德国针对那个不断骚扰所有国家和影响世界和平的法国所进行的防御之战。

我要强调并且坚信的是，接下来的战斗肯定将会而且必将到来。我决不相信法国会改变对我们的看法，因为出于最深层的原因就是他们只想着维护法兰西民族的自我生存。如果我自己是法国人并且因此而热爱

法国的伟大，就像德国对我是那样的神圣，所以我也就能够并且愿意做出结果不同于克列孟梭的其它行为。这不仅是在其人口数量上，而且特别是其民族中的优秀分子才能够让慢慢消失的法兰西民族长期保持其世界上的重要地位，而德意志民族却遭到了毁灭。法国的政策也许会走许多弯路，但不管怎样最后都会以实现最终的愿望和内心的渴望为目标。但要，是相信一个纯粹被动地只想着维护自我生存的愿望能够抵抗一个同样有力且长期采取主动的意志的话那可就错了。只要德国和法国之间长期的冲突只是以德国进行防御而法国采取进攻的方式来见分晓，那么这种冲突就永远都不会有结果，但也许德国会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失掉一块又一块的地盘。人们要是追溯一下自 12 世纪开始至今德国语言的传播范围，恐怕很难在直到现在已经给我们造成许多伤害的立场观点和社会发展的成果之上再做出什么成绩了。

只有当德国人完全明白不再让德意志民族生存的意愿只停留在消极防御上，而最终是要振作起来积极地 and 法国进行争论，才会在最后决定性的战斗中让伟大的最终目标落到德国这一边：总之要有能力对长期并且本身又没有什么结果的我们和法国之间的争斗作一个了结，但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德国在消灭法国的过程中看到取代其它的方法，即最后能够让我们民族繁衍下去的办法。德国今天在欧洲的人口已达八千万！只有外交政策得到正确地认同，那么用不了 100 年就会有二亿五千万的德国人生活在欧洲大陆上，并且还不是像其它国家工厂里的苦力那样拥挤不堪，而是作为通过劳动创造来满足他们自己生活的工人和农民。

1922 年 12 月德国和法国之间的局势好像又变得危险尖锐起来。法国想到要进行新的敲诈并且还提出为此还要作保画押。经济掠夺之前先进行政治施压，对法国人来说有力地掐住了我们整个德国人民生活的神经中枢就足以能够把我们这个“倔强”的民族置于更加严厉的奴役之下。随着鲁尔区的被占领，法国人希望不仅可以在精神上最终搞垮德国，而且在经济上使我们陷入了必须承担任何的，那怕是最沉重的，不管是好是坏的责任的困境。

因此，要不惜任何代价。并且德国要立即行动起来，为的是要结束

今后全面的崩溃。

随着鲁尔区的被占领，命运反倒又给了德意志民族再次振兴的机会。因为粗看起来好像这是大祸临头，但是仔细观察反而却包含着完全使德国脱离苦难有着无限希望的可能。

从外交政策方面来看，占领鲁尔区使得法国第一次从内心里真正疏远了英国，并且还不只限于以冷静的目光来看待，以谨慎的头脑来维护与法国所缔结同盟的英国外交界人士，甚至还有广大的英国民众。

特别是英国经济界对法国在欧洲大陆势力难以置信的不断强大感到无法抑制的不满。因为光是从军事上来看，法国现在不仅占有了从前德国在欧洲还未能具有的地位，而且还获得了使其政治竞争力在经济上几乎和垄断地位联系起来的经济基础。就这样欧洲大型的铁矿和煤矿一并落到了一个国家的手里，与德国有很大区别的是，这个国家至今仍然坚定果敢并且积极主动地体现其生存利益，其在世界大战中所表现的军事可靠程度依然让人记忆犹新。因为法国占领了鲁尔区的煤矿，那么英国在战争中所取得的一切胜利又被从手中给夺去了，所以现在的胜利者已不再是那些勤奋而又辛劳的英国外交家了，而是福煦元帅和由他所代表的法国。

即使在意大利，本来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就有些不妙的反法情绪现在则变成了公开的仇视了。从前的盟友会变成明天的仇敌是会在重大的历史瞬间内发生的。但如果事情的发生是另外的一个样子，同盟国也没有像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突然彼此进入了敌对状态，那就只能归咎于德国没有恩维尔·帕夏将军，而只有一个帝国总理库诺。

但法国人入侵鲁尔地区不仅在外交上，而且在内政方面也给了德国极其远大的前景。我们国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这也多亏了那些谎话连篇的新闻报刊不断影响的结果，他们总还把法国看成是进步与自由的斗士，而这样一来这些人一下子就会从这种妄想中清醒过来。正如在1914年世界人民团结起来的梦想已经从我们德国工人的脑袋里消失了一样，现在却又突然送回到这个需要永远奋斗的世界中来了，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靠另一个生命为生的，弱者的死亡就意味着强者的生存，1923年



的初春就是这种情况。

当法国人将其威胁付诸行动并且起初还非常小心谨慎胆战心惊地开进德国矿区的时候，这时对于德国来说一个伟大的决定命运的时刻到来了。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民族能够转变观念，同时改变现有立场的话，那么德国的鲁尔区对于法国人来说就会变成拿破仑的莫斯科城。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任由别人侵略而无所事事，要么同时望着鲁尔区热气腾腾的饭菜和烟雾腾腾的火炉来完成德意志民族那炽热的心愿，那就是要结束这没完没了的羞辱，宁愿受到一时的惊恐，也不能继续忍受这无休止的灾难。

而要寻求第三条道路则是当时帝国总理库诺的“不朽功绩”，并且对他表示赞赏和支持的还有我们那些“光荣的”资产阶级政党。

首先，我想在这里对第二条道路尽可能简短地做一下分析：法国占领鲁尔区是公然地违背《凡尔赛和约》。因而法国也站在一些做出担保的国家的对立面，特别是英国和意大利。法国因为自己自私自利的强盗行径则不要再指望这些国家给予什么支持和帮助了。进行这样的冒险以及接下来所要发生的也都都得为了任何一个完美的结局而要靠自己去了结。而对于民族国家的德国政府来说就只能剩下唯一的一条出路，那就是对此表示尊重。当然人们暂时还无法抵抗法国的军事力量，可是有必要弄明白的是所有一切协商谈判的后面如果没有武力的支持是可笑并且是不会有成果的。在没有进行主动进攻可能的情况下就表示：“我们不要谈判”是很荒谬的，而更加荒谬的则是最终决定去进行谈判，但同时却又没有做好任何的军事准备。

不是好像可以通过军事手段来阻止鲁尔区的被占领。恐怕只有傻瓜才会提出这样的建议。只不过就在人们对法国所采取的行动仍然记忆犹新和整个行动进行实施的过程中，即使不考虑法国自我撕毁《凡尔赛和约》这件事，那么也能够并且必须想到要确保今后谈判代表在谈判的过程中能够给予他们军事上的辅助手段。因为从一开始就很清楚的是，总有一天关于法国所占领地区将在某一个会议桌上进行表决的。但是人们

同样必须明白就算是最好的谈判高手要是他所站立的地方和所坐的椅子不在国家保护的范围之内也难以取得胜利。一个体弱多病的小裁缝是无法和一个大力士相提并论的，并且一个毫无防备的谈判代表在他没有亮出自己优势的时候，总还是要忍受对方布雷努斯之剑的威胁的。或者真的可以不把自1918年以来总是不断地提出苛刻条款都能视为闹剧的谈判当作是一种灾难吗？这种向世人所展示的侮辱人格的表演像是在嘲弄我们才把我们请到谈判桌前，然后把早已完成的，也许还可以谈谈但从一开始就必须被视为不容更改的决定和条款摆在我们面前。当然，我们的谈判代表几乎没有一次能够受得了在一般情况下很少是合理的，恐怕也是受到了法国前总理西蒙冷嘲热讽影响的埃德·乔治的无礼言论：“德国人不会选出有才能的人作为国家领袖和代表。”就算是天才面对敌人坚定果敢的强权意志和自己民族各个方面无力自卫的悲惨处境恐怕也是很难有所作为的。

谁要是想在1923年初春时节把法国占领鲁尔地区当作是重整军备契机的话，那么他首先要给这个国家以精神武器来增强民族意志和消灭那些国家宝贵优势的破坏者。

就像是在1918年所进行的血腥报复那样，在1914年和1915年的时候人们没有转而一下子永远踩死马克思主义这条毒蛇的头，所以如果在1923年初春这个时候不利用这个时机最终阻止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叛国者和屠杀人民的刽子手的罪恶行径的话，那么就会同样遭到最为不幸的报复。

如果不向这些五年前在战场上自己还挫败过德国抵抗的国家进行宣战的话，那么任何一个真正要反对法国的想法都只是空想。恐怕只有那些资产阶级才会期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现在也许变成是另外一种学说，并且那些1918年无情地践踏着二百万人生命的败类为了能够爬上政府中更好的职位，现在突然在1923年却又准备着为了民族的良知去做出牺牲。这该是一个多么难以置信和毫无意义的想法去希望原来的叛国者突然会变成德意志民族自由的斗士！恐怕连他们自己完全都不会有这种

想法！就像狗改不了吃屎，马克思主义分子都是叛国者。

人们以极其荒谬的借口很高兴地忘掉了以前有很多工人也为了德意志而献出了鲜血。德国的工人阶级，是的，但不再是具有国际主义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分子。要是在 1914 年德国的工人阶级按照他们自己内心的立场观点都是由马克思主义分子组成的话，那么那场战争恐怕三个星期就结束了。恐怕当第一个士兵的脚踏出国境线之前德国就崩溃了。不是的，当时德意志民族仍然还在战斗，这就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妄想还没有能够侵蚀到社会的最底层。在战争过程中使得德国的工人和士兵在一定程度上再次落入马克思主义导师的掌控之中，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失去了祖国。要是在战争的开始和进行过程中就一下子把一万二千到一万五千名这些来自希伯来的民族败类用毒气毒死的话，那么十万名来自各行各业最优秀的德国工人就会经受得住战场的考验，而前线上一百万人的牺牲也就没有白费。相反：要是把这一万二千名流氓无赖及时消灭掉的话，或许还能在将来挽救上百万德国人的宝贵生命。这就需要那种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就把上百万人派到战场上去送命而又把一万到一万二千个叛徒、投机商、高利贷商的和骗子视为国家的宝贵财富，并且因此还公开地宣扬他们是不可侵犯的资产阶级的“治国策略”。人们无从知道对于资产阶级来说什么是更加重要的，是愚蠢、软弱和胆怯，还是一再堕落的信念。这真是一个命运决定走向衰亡可惜还要把整个民族都要拖进深渊的阶级。

人们今天在 1923 年面临着和 1918 年同样的局面。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反抗，人们决定首先的前提就是要从我们国家肃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流毒。同时我相信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的政府最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寻找，而且还要找到勇敢地向马克思主义宣战的人们而且还要给他们以自由发展的道路，并且政府的职责就是目前不要让人们去崇拜什么“安宁和秩序”的废话，因为外面的敌人会使我们的国家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而国内的街头巷尾还潜伏着密探。不，当时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的政府必须要期待没有安宁和没有秩序，因为只有在这种混乱状态下才有可能并且开始最后向我们民族的死敌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复仇。而

人们要是忽略了这一点，那么不管以任何方式去进行反抗的想法纯粹就是异想天开。

总之，像这样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复仇是不会按照一个什么内阁大臣或者一个年迈老朽部长的思维模式来进行的，而是按照世界上为生命而战的永恒生存法则来进行的。人们应该回想起的是从血腥的内战中常常会诞生出钢铁般坚强和健康的民族，但人为保护的和平状态则会经常滋生出腐化堕落。对待国家民族的命运是不应该心慈手软的。所以人们必须要在1923年尽最大力量抓获这条吞噬着我们民族的毒蛇。成功地做到这一点，那么准备进行积极反抗才会有意义。

当时我常常是声嘶力竭地尝试至少要在所谓民族主义政党的范围内明确地告诉大家这次所遭遇到的危险和1914年以及接下来的几年是相同的情况，并且不可避免地再次和1918年的结果一样。我经常一再地恳请大家顺应命运的安排并且要使得我们的政治运动有可能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分庭抗争，然而他们对我的劝告却置若罔闻。他们这些人，包括德国国防军的统帅们对此都十分明白，而最终却要面对历史上最可耻的投降。

当时我就从内心里感觉到德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完成了其使命，不能再继续承担起什么责任了。此时我看到所有这些政党只不过是出于嫉妒的心理才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去进行争辩的，但从内心里完全没有想要消灭它，他们在心理上早已接受了祖国消亡的这一事实，而他们可以做的就是唯一担心就是能否自己可以参加葬礼后的宴席。他们就只是为此才去“奋斗”的。

在这个时候我所要公开承认的就是发自内心深处地钦佩远在阿尔卑斯山以南的那个伟人，他非常热爱他的人民而决不和意大利国内的敌人同流合污，而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和利用所有手段努力去消灭他们。墨索里尼之所以可以被列于世界伟人行列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在意大利坚决不与马克思主义为伍，而且是要消灭国际主义思想来拯救他的祖国。

与此相反，在我们德国也算是政治家的那些人则显得是多么的渺

小,而当这些废物还胆敢粗暴无礼和目中无人地去指责胜过自己上千倍伟人的时候是多么地令人恶心,并且想到这是发生在一个不到半个世纪之前还可以把俾斯麦称为其领导者的国家里该是多么的痛苦!而正是在1923年,基于资产阶级这样的立场观点和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宽容才使得对鲁尔区问题所采取的主动抵抗从一开始就必须果敢。而想要在自己的国家和我们的死敌法国进行战斗那简直就是痴心妄想。那么人们所能做到的顶多也就是假装去安慰一下德国国内的民族主义分子,而实际上却是在平息或者是愚弄“沸腾的民族激情”。要是真地相信他们的所作所为,那么就得必须承认一个民族的优势首先不在于其武器装备,而是其精神意志,并且在战胜外来的敌人之前首先必须要消灭自己国内的敌人,否则的话这样的战斗从第一天开始就不值得取得胜利!一旦失败的阴影还徘徊在不是从敌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人民心中的话,那么他们的抵抗力也将会被摧毁并且最终敌人也将会成为胜利者。

当时在1923年初春的时候这一点就能够预料得到了。因此人们也就不再谈论军事抵抗法国成功的把握了。因为如果德国针对法国人占领鲁尔地区行动的结果就是消灭德国的马克思主义的话,那么因此我们早就稳操胜券了。一个从其生存和未来的死敌得到拯救的德国就能够具有任何国家都无法扼制的力量。就在德国粉碎马克思主义的那一天实际上也就永远打碎了加在德国身上的锁链。毕竟在我们的历史上我们还从来没有被敌人所战胜,而总是被我们自己的恶习和自己国内的敌人所击败。

同时德国政府在当时也没有能够因为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而振奋起来,毕竟本来按道理还可以选择走第一条道路,也就是无所事事,但却反而选择了随波逐流。

可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上天竟然赐给德国一个伟人,库诺先生。他本来不是专职的,也不是天生的政治家,而是逐渐成为一个只是需要完成一个特殊的使命,否则还不如在商业界发展的政治家的。对德国来说这是一道咒语,因为这个政治商人现在会把政治视为是一个商业公司并且以此来采取行动。法国占领鲁尔地区,鲁尔地区有什么?煤矿。那



么法国占领鲁尔地区就是为了煤矿吗？库诺先生自然就会想到现在举行罢工，这样可以使法国人无法得到煤，按照库诺先生的想法由于无利可图他们还期待什么呢，那肯定有一天就会又撤出鲁尔地区了。这大概就是这位“杰出的”“具有民族主义思想”“政治家”的思路，这让他前往斯图加特以及其它地方和“他的同胞”进行交谈并且使得他完全受到人们满心喜悦地赞赏。

而要举行罢工当然就得需要马克思主义分子参加，因为首先必须是工人才进行罢工。所以就有必要把工人（在这位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头脑中工人和马克思主义分子总是一样的）和其他所有德国人结成一个统一战线。当时因为这样一个独特的口号想必人们真的都会看到这种资产阶级腐朽文化的闪现！民族主义和这种独特的口号都一样，因为最后它们都有其内心里一直在寻找的东西！通往马克思主义的桥梁找到了，对于民族主义的骗子来说现在就有可能带着“条顿人”的表情和民族主义的幻想向信奉国际主义思想的叛徒伸出援助之手。而且这样很快就一拍即合。因为正如库诺先生为他的“统一战线”需要信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领导人一样，而这些领导人也同样需要库诺的钱。因为双方都互相利用。库诺得到了他那由具有民族主义思想倾向的空谈家和反民族主义的骗子所组成的统一战线，而国际主义的骗子则能够让国家出钱来完成其崇高的战斗使命，也就是说去摧毁民族经济，并且这次甚至还用的是国家的钱。通过出钱的方式组织总罢工来拯救一个民族是一个极特别的想法，而提出的口号本身无论如何都要让最冷漠的饭桶和热烈的激情保持一致。

通常人们都知道一个民族是不能通过祷告来获得自由的。但是否这样就不会让人随便就变得懒惰了还需要通过历史来进行检验。要是当时库诺先生不用钱来支持总罢工，并且把总罢工当作是建立“统一战线”的基础，而这让每个德国人多干了两小时的工作，那么“统一战线”的骗局恐怕在第三天就不攻自破了。民族的解放不是通过无所作为，而是要做出牺牲才能够得到的。

总之，所谓的消极抵抗本身是坚持不了很长时间的。毕竟只是一个

地道的军事门外汉就只能幻想着用可笑的方法把占领军赶走。这种做法唯一的意义就在于花费巨大，而主要则是有助于把国家的财富毁掉。

当然，目前法国人自己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心安理得地把鲁尔地区当作是自己的家呆下去，同时还把这种方式的抵抗本身看作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他们恰恰是通过我们自己在发现了倔强的平民百姓的行为举止中真的可以威胁到占领当局的时候，把如何去压制这些老百姓的最好的办法弄到手的。九年前我们闪电般地把比利时的法国志愿军赶走并且让老百姓明白形势的严峻，也就是当他们做出威胁到德国军队事情的时候，那么就要承受巨大的代价。而一旦在鲁尔地区的消极抵抗真的是很危险的话，那么法国占领军恐怕用不了八天的时间像玩儿一样就轻易地给这个完全幼稚的胡闹准备好一个残酷的结局。毕竟最后一个问题总会是：如果消极抵抗的结果真的会让敌人失去控制并且对此采取血腥暴力的行为来对待的话，人们该做什么呢？那么是决定继续进行抵抗吗？如果是，那么无论如何人们自己都必须承担最严重、最血腥后果。所以又回到了积极抵抗的原点，也就是要面对战斗。因此，在任何一次所谓消极抵抗的背后还有着必要时在公开的战斗，或者在不起眼的小规模的战争中继续进行抵抗决心的话，那么还是有心理上的作用的。一般情况下每一次这样的战斗都是有可能和取得成功的信心联系在一起的。只要是一个被包围的堡垒遭到敌人猛烈攻击而被迫放弃对援军的最后希望，那么实际上这是他自己放弃的，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吸引士兵的不是死亡的可能，而是生命的安全。占领一座被包围的堡垒是夺取了可能逃脱的信念，因此所有守卫战士就会突然进行突围。

因此，在鲁尔地区所进行的消极抵抗如果能够并且必须带来实际上应该成功后果的话，那么当这种抵抗的背后建立起了主动进攻的战线才有意义。那么就不得不拿出我们民族中无可估量的力量。如果每个威斯特法伦人都明白要是我们国家组建起八十或者一百个师的军队的话，那么法国人就会如坐针毡。为了成功，而不是显而易见的盲目性会有更多的人准备去做出牺牲。

迫使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对所谓的民族主义的口号做出最明确的表态则是一个典型的情况。并且我们也是这样做的。这几个月以来，我时常遭到一些人的攻击，他们这些人全部的民族主义思想只不过是愚蠢和徒有其表的大杂烩，他们只会随声附和，因为他们就是想得到刺激，现在突然又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干起民族主义的事情来了。我把所有这些最可怜的统一战线看成是最可笑的现象，连历史都对我表示赞同。

一旦工会组织的口袋里慢慢地装满了库诺的钱，消极抵抗也就显露了出来，从懒散的防御向主动进攻过渡的时候，这些赤色分子便立刻脱离民族主义的阵营并且恢复了他们的本来面目。那么库诺先生也只好无声无息地隐退，从这一点上看，德国丰富了经验，却失去了希望。

直到盛夏后期有很多政府官员，并且肯定不是最坏的官员从内心里都不相信形势的发展竟然如此的卑鄙。他们大家都希望，即使不是公开地，也是暗地里希望为了让将法国最无耻的入侵当作德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而做准备。在我们的阵营里也有很多人至少要把他们的信任建立在帝国军队上。并且这种信任是如此的有效，以至于在很大程度上会取决于无数年轻人的行动以及特别是他们所接受的教育。

但是，当这令人感到耻辱的毁灭来临，并且为此而牺牲了无尽的财富以及无数蠢到真地会相信帝国领导人许诺的年轻德国人的生命还是以如此令人沮丧无耻的方式投降的时候，对如此的方式出卖我们不幸民族的激愤像熊熊的火焰般突然迸发了。千百万人当时突然明智和清楚地相信只有用激进的手段来消灭整个统治制度才能够挽救德国。

从来就没有什么时机更加成熟的时刻，当时的形势迫切地在呼吁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法，因为一方面是公然赤裸裸地、无耻地背叛自己的祖国，同时另一方面在经济上带给我们民族的就是慢慢地饿死。因为这个国家自己践踏所有忠诚与信仰的规则，嘲笑人民的权利，欺骗成百上千忠于祖国的儿子献出他们的生命并且还窃取千百万民众的最后一个铜板，那么除了仇恨也就没有什么可以期待的了。并且这种对民族和祖国堕落的仇恨总会要发泄的。1924年初春的时候我在法庭对此做最后辩

护的结束语中就指出：“无论对我们的行为做出怎样的判决，这个国家的法官都希望我们保持肃静，而历史将作为更加崇高的真理和更加正义的女神，会不屑一顾地撕碎以前的判决书，并宣布我们的过失和缺点为无罪。”而历史随后也还会把今天践踏权力、正义和法律，把我们的民族引向痛苦和堕落并且在我们祖国不幸的时候把个人的利益视为高于整个民族利益的那些人传唤到法官的面前。

在此，我并不想对导致并决定了1923年11月8日所发生的事件加以描述。因此我也不想撕开在今天看来基本上好像快要愈合的伤口，因为我对未来并没有许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主要是因为那没有什么意义，而和那些也许内心深处同样热爱着自己的民族而只是错过或者是无法理解走同样道路的人们谈论罪责反正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鉴于我们祖国巨大的不幸，我今天也不再愿意伤害并且也许因此而离开那些将来有一天会建立起由真正忠实的德国人所组成的、反对我们民族敌人联合阵线的伟大统一战线的人们。当时与我们为敌的人自己将会以崇敬的心情回想起那些为了德意志民族而走上了痛苦心酸死亡之路的人们，因为我相信将来这个时刻就会到来。

这本书的第一卷我所缅怀的那十六位勇士，我将在第二卷的结尾处让我们信仰的追随者和捍卫者记住他们是在头脑极为清醒的状态下为我们大家而牺牲的英雄。因此你们必须牢记要不断地克服动摇和软弱，这是你们自己实现最高信仰和坚定意志的一项责任。因此，最后我要把一个人也列入到他们当中作为最优秀的一员，在他诗句的字里行间、在思想上以及行动中都把他的生命奉献给了他自己的、也是我们大家的唤醒民众运动，他就是：

迪特里希·埃卡特。

结束语

1923年11月29日在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进行了四年之后，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在全国范围内被解散和禁止。1926年11月的今天又在全国可以合法地进行，而且比以前更加强大和意志更加坚定。

所有对我们的组织活动及其领导人的迫害，所有的诽谤和诬陷都没有对这个党有丝毫的伤害。其思想的正确性、其意志的纯粹性、其追随者的献身精神，反而让这个党终于从所有的镇压中更加充满活力地走了出来。

如果这个党会在我们今天议会制度腐败的世界里不断地意识到其奋斗的深刻本质，而且感觉到自己纯粹是民族和个人价值的体现并以此来进行规范的话，那么完全可以按照数学的规则推算出这个党将会赢得战斗的胜利。如果按照这样的道理进行推理和排列的话，那么德国就有必要赢得在这个地球上所应得的地位。

一个在其民族受到毒害的时候还努力地保护其民族特性的国家，总有一天成为世界的主人。

我们这场政治运动的追随者们应该忘记的是牺牲之伟大会误导人们忧心忡忡地与可能取得的成功相提并论。



新加坡南洋出版社主要出版物列表:

书名	作者	出版年份
完整版《金瓶梅》(上下册), (全球唯一简体、双版本、带 200图 and 评点, 无删节)	笑笑生 著 董玉振 主编	2003年第一版, 平装 2006年第二版, 平、精装 2016年第三版, 平、精装
巨人的背影——为毛泽东辩 护及当代中国问题省思	董玉振 著	2003年第一版 2017年第二版
如何分析直销公司	董玉振 著	2011年
曹县董家祖传.经典珠算术 集萃(古籍线装、宣纸、书 函)	董凤林及先祖 著, 董玉振 释註修编	2016年
铿锵紫罗兰——我的坐牢日 记(上中下)	冷玉 著	2011年
加法人生	徐惠 著	2011年
跟我学拼音	赵善 著	2009年
跟我学汉字(1-4册)	赵善 著	2009年
汉语拼音练习册	赵善 著	2009年
防治学生性近视的实践	高世宏、赵文汝、 苏洪泉 著	2009年
李嘉伦篆刻集	李嘉伦 著 徐连萍 编	2011年
画外寻路	刘淘 著	2011年
莲心	徐连萍 著	2011年
苏中招商通讯信息(泰州卷)	刘赟平 著	2011年
<i>Claiming Grounded Theory for Practice—Chinese Mainland Students to the Universities in UK: A Study of Their Motivations and Adjustment to Study in UK</i>	By Dr Wenwei Lv	2010年
<i>The Influences of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on the Export of China's Electromechanical products</i>	By LI Junjie	2012年